

叶剑英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说明

叶剑英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人民军队的创立与建设、人民战争的运筹与指挥，以及国防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叶剑英同志的军事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学习、研究叶剑英同志的军事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编辑《叶剑英军事文选》，在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发行。这本文选，收入了作者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八二年关于军事方面的重要讲话、文章、电文等共八十五篇，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书编辑过程中，对讲话记录稿作了文字整理，对有些文稿作了少量的史实和文字的订正。为了便于阅读，编者还作了题解和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叶剑英军事文选

苏区东南战线军事部署报告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革军委[1]、总司令、总政委：

前电[2]谅达。东南部署，除独立师、团全线出击并准备三师及十师随时可以集中(十九军[3]经常集中)以打击敌人弱点，消灭敌人一部，以配合主力行动外，尚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卫戍方面：在闽西以上杭警卫营、连城独立团、曹温游击队及群众武装，在鲁溪、脐余田、棘树、桥同元、载兴乡、华家、白砂之线，逐段破坏道路，并不断挺进游击，以钳制闽敌人。旧县、官庄、才溪模范赤卫军监视沙河，防敌偷渡。永永游击支队[4]，岩太山游击支队[5]独立积极袭扰敌后，消敌力量。会寻武[6]方面，以武北、东游击支队，在千家村、朝岭、帽村一带，钳制抄武之敌。武西游击支队，罗塘、官丰、门岭一带武装，在招信、官丰、剑溪、吉潭、寻乌、三标之线，断路游击，钳制粤敌挺进寻南，袭扰威胁粤敌侧后。安远地方武装在鹅公坑、钟村、岗头圩一带钳制。六师独立团在隘高、塘埠一带，北向安西，南向月子，同时挺进袭扰敌后。

(二)按地形及群众条件，在兴于赣[7]间之五坊、七坊一带及隘高、塘埠一带，招信、官丰一带，鲁溪、明口一带及连[8]北之畏源、安东一带，建立五个赤色据点，各分区更按照当前情况，自行规定几个小的据点，在敌人深入时，则独立动作，袭扰敌后，以钳制敌人。

(三)白区游击队，除闽西已照规定建立外，赣南在黄乡、上坪及塘头、才狼岭等处亦在建立，经常袭扰敌后，并发展苏区。

(四)三分区挺进游击队，已编两个，一自袭太丰后，配合三师于十八日占至粤边上坪圩，现向龙川挺进。一于最近出动，已占至梅北之石正圩，刻向梅县迫进。闽西仅驻独三团一部，为基干之挺进游击队，已由铁山、罗地向岩北挺进，余无成效。

(五)备战工作：挖路阻河，向敌据点要点散发对敌宣传品，在边区重要道路上书写标语，均已有相当准备。各区至瑞金已有相互间的联系，除利用邮电外，已建立递步哨。坚壁清野工作尚未达预期程度，正在积极进行中。

(六)武装组织：十九军可集中闽赣武装，十师千人，三师六百，六师约六七百，独三、四团各百余，五团三百余，安远独立团二百余，会昌独立团百余。地方武装除瑞金、会昌已完全编好，积极训练并留红校[9]生组成游击运动训练组外，余不过编制半数。除积极执行进攻路线，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人，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弱点外，在组织武装方面，不仅尚足东南本身要求，并决定在两月以内抽调两师北上，以后更继续抽调部队北上，保障主力连续作战的胜利。

剑英

注释

[1]中革军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

[2]前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叶剑英发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敌情报告。

这是叶剑英就苏区东南战线军事部署给中革军委和朱德、周恩来的报告。叶剑英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苏区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委。

[3]十九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军，由福建上杭、南阳、旧县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和福建军区地方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合编组成，叶剑英兼任军长。当时正在酝酿过程中，尚无正式建制。

[4]原文如此。可能是杭永游击队之误。

[5]原文如此。可能是岩杭永游击队之误。

[6]会寻武指当时江西省会昌、寻乌县和福建省的武平县。

[7]兴于赣指江西省兴国、于都、赣县（今赣州市）三县。

[8]连指福建省连城县。

[9]红校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简称。

关于汀州防御作战的部署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

中革军委[1]总司令、总政委：

四日电示悉。

一、十九路军用两纵队企图袭取汀州，威胁首都[2]。

二、我们部署如下：

甲、已令谭周[3]率几路在杭、永、岩[4]间积极打击十九路军左纵队侧后。

乙、请准中央政府任令李韶九为瑞汀[5]卫戍司令，指挥汀连[6]武装，主要对永安、连城之敌进行运动防御战斗。

丙、令宁化独十一师马上集中编好，在清流、永安、连城间截击十九路军左纵队后方联络线。

丁、对会、寻、武、兴、赣、于[7]方面亦有原则上相同的训令。

三、闽西急需无线电，现用电话当电报打，恐阻断。

四、红校[8]看护连提前毕业八十人，中有六十余人可用，即分配各处工作。

五、(略)

剑英

注释

[1]中革军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简称。[2]首都指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3]谭周指当时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和总指挥周子昆。[4]杭、永、岩指当时福建省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5]瑞汀指当时江西省瑞金县和福建省长汀县。

[6]汀连指当时福建省长汀县和连城县。

[7]会、寻、武、兴、赣、于指当时江西省会昌、寻乌、兴国、赣县、于都县和福建省武平县。

[8]红校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简称。

苏区东南方向配合作战情况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

朱周王：

甲、彭湃[1]方面：

A. 原定赤化建宁、安远市、梅口三角区，一个月工作提前一个礼拜，于三月三日初步完成。

B. 刀团匪[2]大部溃窜龙安堡、万全两点，有土围子。

C. 安远市均口、依口、官仓、梅口，鱼潭已建立革命委员会在进行分田。

D. 北线建城区以北现存米五百二十余石，谷千一百七十余石，南线没收谷五千二百余石。

E. 由彭湃到建水阳江交通尚好。

F. 各部队从三月四日起进入第二阶段工作，赤化万全、龙安堡、鹅坑、空溪以西地域。其行动纲领：（子）独立团与特务团留九分之一兵力继续深入赤化原三角区。（丑）主力应相当集结使用，次第消灭龙安堡、万全两个土围子刀团匪。（寅）于泰宁、归化武力配合向黄潭、白莲推进。打通将乐、白莲、归化。（卯）江西保卫大队进至焦坑、鹅坑工作。（辰）建宁地域三五残匪由新地方武装负责肃清。

乙、黎[3]南东方泰宁方向：

A. 巩固关公拗、无廖上下，南桂林、郭桥、朱口、万安寨至闽地域，发展游击运动配合红军行动，运动防御有利的钳制邵顺[4]敌人。

B. 黎南游击队一部向樟村、德胜关游击，主力向坑口、新桥一线推进与东方苏区打成一片。

C. 东方游击队仍以桂林为中心，争取上清圩、双田市地带赤化，与泰宁苏区打通，相机向和平、龙湖、朱口一线发展，监视邵河南侵口，泰宁游击队主力争取良线赤化，与彭湃部队配合。

D. 闽中部队归六十一团指挥。

丙、为这一阶段工作顺利完成，请令宁化以北各部队由龙[5]统一指挥，进驻水茜、扇前、蒿溪一线，掩护我之侧翼及打通泉上。

丁、七日在均口开干部会，叶拟定六日经均口，八日回建宁。

可否，请电复。

二日十二时

注释

[1] 澎湃，这里指彭湃县，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增设。辖区在今福建省宁化县北部安远、水茜、河龙等地区。

[2] 刀团匪指当时建宁、安远、梅口地区地主武装大刀会、保卫团。

[3] 黎指江西省黎川县。

[4] 邵顺指福建省邵武县和顺昌县。

这是叶剑英从建宁发给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电报。当时叶剑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福建军区司令员。

[5] 龙指当时抚东分区司令员龙腾云。

对西安事变后战略问题的建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

估计时局将不能不出于战[1]。西北各军现已处于内战作战的状态，我们的战役应下大决心，集中全力夹击胡、毛、曾、关[2]向南移动之师，西安可守之；否则准备暂时放弃，求得西线胜利，可吸引川刘、鲁韩、李白、晋阎[3]参加转为外线作战，以开展局面。因这些人用力威胁不能吸引，只有战争胜利才能吸引过来。请考虑此建议。

剑英

二十二日二十时

注释

[1]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指挥两路大军进逼西安。当时红军曾作了支援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军事准备。由于中回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西安事变最终获得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2]胡指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胡宗南。毛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三纵队司令毛炳文。曾指国民党军第三军代军长、西北“剿匪”军第一纵队司令曾万钟。关指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西北“剿匪”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关麟征。

[3]川刘指国民党政府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鲁韩指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李白指国民党桂系首领、国民党政府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和国民党桂系首领白崇禧。晋阎指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这是叶剑英在西安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当时叶剑英与周恩来、秦邦宪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应张学良之邀赴西安处理捉蒋事变。叶剑英并参加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组成的西北联军参谋团，负责筹划军事行动。

请令联络员分赴各地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

洛毛朱彭任：

(甲)行营[1]消息：日本关东军纷纷入关，朝鲜日军亦已开动，日本国内增调两师团来华，晋绥[2]方面亦同时有军事行动。

(乙)南京正集中十个师在石家庄。十七师赵寿山[3]奉命准备开赴石家庄。

(丙)华北战局正在扩大，红军有被调往察[4]绥可能。

(丁)中央所派赴华北、晋绥各地的联络员如彭雪枫、张经武[5]等，请命令其尽早出来，分赴各地活动，其余自动报名的干部，最好亦早日出发，在不过早暴露我军企图条件下，分向各地活动。

剑英

七月十二日二十时

注释

[1]行营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

[2]绥即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赵寿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

[4]察即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5]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张经武，当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

这是叶剑英在西安发给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当时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代表，在西安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谈判红军改编、出师抗日等问题。

红军改编后的编制问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朱周彭任：

顷到行营[1]谈编制：

(甲)我军三个师番号为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八师、第一二九师(均东北军老招牌)。

(乙)每师编制可照我们此次所拟的新编制。

(丙)兵官阶级、名称需与国军一样，如战士为一、二等兵，官佐人员设副官之类。

(丁)集中地点：第二方面军庄里、鲁桥、迷子镇、倒贤镇、美原镇地域，第一方面军××[2]、红木、云阳、口头方里、石桥、淳化。第四方面军接第一方面军向彬县(不含)以北，不过泾源。

(戊)但第四方面军驻地须与蒋鼎文[3]再商定。

(己)我方请求补充物品，已电南京请领。

(庚)行营运输处本夜移郑州，允设法拨五辆老汽车来。

剑英

七月三十一日

注释

[1]行营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

[2]原文不清。

[3]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在西安参加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国共谈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剑英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代表，在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就红军改编、出师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叶剑英在西安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

关于抗日战争的政略战略问题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

一、中日战争估计，一般以为敌取得相当胜利后，即将进行谈判，以为可以利用谈判以行拖延。此种意见固属正确，但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空前之统一团结及国防力之增强，必另有一种估计：非给以大打击，否则，再过一二年后更不可侮，此为一因素。另一因素，即国际问题，我以为日本对象为苏联，既占我东四省[1]，即可引刀尖以向苏联。但日本为对付苏联，必先占中国。日本当局的企图，至少欲击破我主力及破坏我国防建设，最后占我华北，以使我多年不能恢复。彼可专心对俄。故日本乃大规模之破坏作战，决非不战而胜及小威胁而已。

英国不可靠，或对此日本行动已有默契，亦未可知。

日本战略展开，必先取得下列五点，即：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张家口。

日本对我估计错误，现动员计划及经费预算均须重新布置，尚未完成其战略展开。

当前我之防御重点在上海，虽胜利不能转移全战局；如在平绥线置重点，则可转移全战局，而破坏敌人整个计划。

要持久作战，真正助我者只有苏俄。故保守平绥，伸至察[2]、热[3]，以保有与苏联之联系，乃最重要者，因其他海外交通将被敌封锁。

二、战略上持久，但战术上仍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采取内线，但战术上仍应采取外线，随时包围敌人。

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之运动战，以此三原则以行作战。

三、武装民众。军委会之下设有总动员部，省有省动员部，具有动员支局或动员科（动员部以军事、政治人员混合组成）。

每县估计壮丁数，以不减地方生产力为限，将壮丁尽量动员，成立补充师、补充团。真正补充前线时，再来一次动员（双重动员），经过做政治工作后再赴前线。在补充团内不一定有枪，仅有刀矛坏枪等，第二次动员后，加入某部队再发武器。进行宣传鼓动，做好动员后之巩固工作。发动儿童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并帮助做好被动员者之家庭工作等。

四、战区工作。做好后方大本营之政治工作，如预计敌人可侵入者，进行坚壁清野工作。由战区工作委员会规定清野区域、后方收容区域及后方收容办法。对于壮丁，则事先编成游击队，在战区内扰乱敌之后方。壮丁中无游击兴趣者，则取其所长而分配战区工作。故战区以参战为原则，后方以生产为原则。

五、粮食问题。由政治部、经理部联合地方绅士共同组织粮食委员会。军队在行军中，过境前一二日，派人与之接洽集中在粮食补给点，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或代价购买）。

部队出发时及在沿途中，应由地方举行热烈之欢迎欢送。

这是叶剑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的国防讨论会上的一次讲话提纲。当时叶剑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注释

[1]东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

[2]察即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3]热即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

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战略之一。如果要具体的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先要把敌人的后方作一个轮廓式的研究。

第一，敌人的总后方——日本国内。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我国的军民，英勇的进行半个年头的浴血抗战，我们不要光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失利和困难，同时也要睁起眼睛来看一看敌人的困难在哪里，我们怎样来加重敌人的困难。

敌人困难之一，在于人员相当大量的死伤。据我们所知，日寇动员五六十万人参加作战，不到半年，在东线牺牲近十万，在北线牺牲近四万。这样大的消耗，和日俄战争时，作战十九个月，牺牲二十万比较一下，已严重多了。而目前的战争，正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开展着，今后在我们采取一些更好的战略战术原则下，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不断给敌以处处袭击的情况下，必然给敌人以更多的杀伤，使敌军的人员补充更加困难。现在敌人已经在个别队伍中间，采取四三三制的混合编制办法，来解决它的困难，就是说敌人的编制，十个人中有四个日本人、三个朝鲜人、三个中国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普遍采用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敌军人员补充的困难。在许多战线上，敌人已经使用所谓满蒙

军队与我们作战，这又看出在全面战争开展着的形势下，敌军自己兵力，亦不够分配了。因此，敌军牺牲众多、补充困难，加上国内过量的动员，差不多动员到百万人的数目脱离生产，使敌人一面增加前方战费，一面减少国内生产，影响到整个经济政治问题，更加恶化。

敌人困难之二，在于军费巨大支出。根据可靠的统计材料看来，在日俄战争时，敌人每人每天平均战费需二元四角，世界大战时，则加到三元六角，现在已增加到十七元三角。若就其后方所消费在战争方面的数目看来，则战争初起时，每天战费总额为一千万，现在已增至二千万乃至二千五百万。有人说，中日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敌人所消耗的战费，已超过昔年日俄战争十九个月的全部经费。像这样大的财政消耗，在敌人方面是完全靠自己来周转的，因为敌人的外国借贷，差不多没有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肯借钱给日本人。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侵略战争所加于日本人民的负担是极度繁重的，日本人民因为担负不了长期的巨额的战争军费，不能不反对战争，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摧毁了日本许多国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必然要引起人民生活严重的恶化。这样就加重了敌人在战争中所引起的经济政治的危机。

敌人困难之三，在于敌人对于连年所准备起来的武器，除了比较旧式的兵器已经拿出来使用以外，还有最新式的武器（如新式飞机），也在战场上出现了。听说他的汽油只准备到一年、钢铁只准备到一年半，而侵略战争却没有法子很快结束。

我想就根据这样不完全不具体的摘述，也可以知道敌人在继续进行侵略战争中，过份消耗了人力物力财力，将引起和加深国内的各种危机，而同时将失去其维持太平洋均势的力量。我们应该在国际宣传方面，充分揭露敌人

的困难和危机，在人民外交方面，要助长敌人内部的反战运动，更依靠着敌人国内坚决反战的政党和人民起来反对战争，直到把日本的侵略战争变为国内战争，推翻日本军阀的统治。能够这样，便是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的最伟大的成效。

第二，敌人的近后方——东北。“九一八”以后，东北四省[1]不愿当亡国奴而愿执枪刀以光复东北的志士，起来组织义勇军、游击队、抗日联军和敌人作战，这一光荣战绩，已延长到六年，现在更加扩大和进展着。东北是敌人依靠来进攻中国的军事根据地，今天是敌人侵略华北的近后方。那里有大山森林，那里有葱郁的高粱，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现在已有十万人，他们依靠东北人民的拥护和帮助，依靠有利的地形，依靠着青纱帐来活动。过去有一个短的时间内，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领导，得不到各方面的互相策应，得不到正规军给他们做支柱相互配合，仅仅在一种散漫的情况下行动着，支持着。这种情况，现在虽然他们的大队伍多半已在先进思想和先进政党的领导之下，虽然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发展得不够，他们的作用还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要东北的健儿，选择地形条件群众条件良好的地区，造成许多根据地，就依托在自己的根据地上，和敌人作较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一直发展到东北境内，与各地游击队配合，和敌人作运动战。能够这样，便是把敌人的后方——东北变为前线。

第三，敌人作战线的后方。在敌人作战线的后方，都是我们刚才放弃的领土，在这里，经过战争的破坏，秩序荡然。由于敌人的“怀柔”与欺骗，有些人民已经回到他们的故土。根据各方的消息，敌人在占领区域内的各种残暴兽行是惨无人道的，这是说明“顺民”的确不容易做。但是敌军向我们的进攻，都是沿着铁道公路前进的，交通线的两旁数十里以外，敌人老是不走的（如同蒲、津浦、平汉），占领区域只抓住几个较大城市，许多乡村，敌人是顾不到的，因此，我们才说敌对于我们的占领，只是对于线的占领，点的占领。线与线之间，点与点之间，尚有广大的土地人民，没有被敌人夺取去。很可惜的是在这些区域中，敌人的武装固然没有，可是我们的武装，也大半都不存在了，有的是逃跑，有的是被退却的军队收缴去了。这些人民，一面得不到自己武装的掩护，一面受到汉奸的胁迫，经过若干时间，伪组织公然出现了。像这样发展下去，残暴的敌人，将由点的占领，线的占领，发展成为整个的面的占领，河北山东的情形，不幸地恰恰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动员战区的力量，要动员敌人作战线后方的力量，组织游击队，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这一种游击战争的发展，可以保持敌人没有占领的区域，可以掌握这些区域的群众，可以打击敌人繁殖的汉奸，可以消灭敌人的伪组织，可以建立我们游击的根据地。游击运动发展到有根据地时，可以由较大的游击战争形式，发展成为没有巩固后方可是有临时依托的运动战。我们在山西有力的捣毁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不得不由前线抽调队伍回来，对付这些游击队，甚至停止敌人前线进攻，分散敌人的兵力到后方去应战，山西北部的情形，恰恰是这样。不过我们要指出，游击队只是完成战略或战役任务的一种辅助的武装组织，游击战争始终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游击战争只有和正规作战配合起来，才有意义。我们要在敌人作战线后方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在这里并没有减轻我们正规军的战斗任务，只有强化我们正规军的战斗力，只有无限制的建立我们坚强的正规军，与游击运动配合起来，才能消灭敌军，把敌人赶出中国去。

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让敌人国内矛盾和冲突集积成为一颗炸弹，把它爆炸起来吧！让敌人占领着的东北四省中一切反日力量，集积起来成为一颗炸弹，让它爆炸起来吧！让敌人作战线后方的游击运动猛烈的开展起来，与正规军配合作战，把当前之敌打回头去吧！

注 释

[1]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省。

论山西战局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山西情况如何？这是关心祖国的人们所急欲知个大概的。的确，山西的存亡，关系于抗战的前途极大。在敌人方面，它欲进窥中原，威胁武汉，先要肃清黄河左岸（包含山西在内）；敌欲进攻西北，先要奠定山西；敌欲截断陇海路，从河之北岸潼关到开封间处处均能用火力遮断或实行截断。在我们方面，保障山西不仅可以屏障西北，掩护河南，并且北进平绥，东出平汉，东北出涑源，均能给敌军以极大打击，直接威胁平津。因此山西阵地，为我方必须坚持，同时也是敌人亟图攻取的。

此次敌军倾华北之师，悉力西犯，其进攻情况依判断所得约略分述如下：

第一，土肥原[1]之第十四师团，及由山西抽调之第五师团主力，系沿平汉线南下，经道清铁路向西急进，直取垣曲；其第一八师团经武安、涉县攻占长治后，分两路一经屯留、府城、古县镇向洪洞，一经高平攻占沁水企图向翼城、扑侯马。

第二，历来在山西作战之第一军主力沿同蒲线南下，派出约一旅团之兵力，攻取离石，占军渡；又派出一部（约一团），则经大麦郊、川口，取隰县。

第三，由宁武派出一支队（约一旅团）攻占保德，以准备渡河，进攻府谷。估计敌军在山西境内作战的兵力，总在五师左右。

敌人用这多兵力，下这大决心，向山西总攻，企图把临汾当作“色当”[2]实行其迂回歼灭的作战。直到今天为止，敌军这一企图实现了没有呢？事实证明是没有的：

一、沿道清铁路西进之敌，其先头受挫于闻喜、曲沃，后路被断于新乡；我黄河南岸部队正渡河北上，侧击敌军。

二、由长治、长子西犯之敌，一面遇到地形的困难，一面受到襄垣、屯留方面我军之侧击。

三、沿同蒲路及其两侧南下之敌亦被滞于侯马。

四、进占隰县之敌，经我军英勇的袭击后，夺回县城，给该敌以严重的打击。

五、军渡、碛口、保德之敌企图渡河进攻陕北，但已被我军以坚决的攻击逐回东岸，并已克复军渡、柳林。

依上述情况看来，敌军总攻山西，并没有达到迂回歼灭的目的，相反的，在敌军不顾一切只往前趋的情况下，所谓敌人愈深，危险愈大，反把自己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依敌人三月四日自己的广播说：“山西南郊之日军各部队，皆备历艰险，继续行军，军行所至，岩山比接，行军极感困难，步兵无法散开作战，炮队和辎重等，更无法运输，子弹粮食之补给，特感困难，仅靠骆驼队补给少数之粮秣。我某部队特电乞陆军飞行队出援，由空中向我军投下粮米等。又因支那军将所有桥梁道路，尽行破坏，故日军进击之困难，实非言语所可形容。”像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千载一时之机，给敌人以歼灭的惩创。

从前许多战例，消灭敌人有许多方法，冻饿可以消灭敌人，拿破仑[3]

这是叶剑英为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

在莫斯科就是这样被消灭的。疲奔可以消灭敌人，苏联内战时代，夏伯阳[4]就是这样消灭哥萨克军队的。山西之敌冒万险而来，已深入到我们腹地，沿汾河两侧，左吕梁而右太行，山势险峻，恰如敌军的自白，我们可以自主的使敌冻饿，可以自主的使敌疲奔，兵法要乘劳，要善于承其弊。

但是如果有人以为敌人在山西，恰如鳖在瓮中，随便可以提取，像这样轻敌，又会造成不可挽救的结果。我们要战胜侵入山西之敌，除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以外，还应该：

第一，山西主将要有钢铁似的决心，因为山西今日所处的地位，是死地求生，亡地求存，只有主将自己有坚持在山西作战的决心和不惜牺牲的精神，才能激动三军，与敌人作艰苦的战斗。

第二、山西作战，因为主要的后方联络线，一时被敌断绝，作战军队，自然不能保持固定的战线，因此山西作战军队必须依托广大群众，依托有利地势，在整个作战计划下，造成几个新的作战基地，使作战军队有所依托，以便继续进行持久的战斗。

第三，在山西局面紧急的转变下，山西群众及其武装，和作战的军队，更要求得军民一致。因为失去了后方联络线的作战，要更多的依靠群众的支持，要进行更大范围的机动，使冀晋两省的广大地区，均成为作战军队大踏步前进、长距离后退的机动区。这些区域的人民，应有自己的合法的政权，才能更有力的清除汉奸，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参加战斗，帮助作战军队解决粮秣运输等问题。

很明显的，山西局面，双方均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支持着战斗。地形有利于我，人民是帮助自己的军队的，只要巩固作战决心，发动广大群众，利用良好地势，进行机动战斗，勇敢、沉着、坚持，我们相信是可以把敌人歼灭在山西山地的。

注释

[1]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日本战犯。当时任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

[2]色当，法国的国防要塞，位于法国东北边境的马斯河畔。普法战争时，法军战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于一八七一年九月二日率十万法军在此向普鲁士军队投降。

[3]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七九九年在法国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雾月十八日（十一月九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4]夏伯阳即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夏伯阳，前苏联国内战争英雄、红军指挥员。当时在领导红军消灭哥萨克白匪军时任师长。

中日战争发展趋势和八路军的近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

关于这次中日战争局面将怎样发展下去

这次中日战争局面将怎样发展下去呢？全国每一位同胞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心里。

现在中日战争进行了十一个多月，已进展到第二期的作战阶段。当南京放弃，开始第二期作战的时候，蒋先生曾召开过一次很重要的军事会议[1]。席间蒋先生曾检讨了第一期作战的经历，沉痛地、深刻地指示我们在第一期作战中所暴露出来的弱点。他指示我们对于第一期作战失败的原因应该这样去了解：第一期作战的失败，不在于我们的兵器不如敌人，因为我们有些兵器，比敌人的还要更犀利；也不在我们根本没有国防的设备，我们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国防建设，曾经花了很不少的金钱；也不在于我们士兵不愿意打仗，相反的，我们的士兵作战很勇敢，富于牺牲精神，上头有命令，要他们全营人死守某一阵地，他们就一人也不后退，全营人作壮烈的牺牲。这种精神在敌人方面也不曾发现过。我们可以拿这种精神来夸耀于全世界，而全世界人士对之也无不表示万分的佩服和赞叹。然则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呢？失败的原因何在呢？他——蒋先生，以为我们诚然有很好的兵器，但我们没有好好地对于它的使用加以研究和训练，以致不能达到发挥它最好的效用；我们诚然有几年的国防建设，但我们没有很称职的人员去加以好好的执行；我们的士兵诚然很英勇的作战，但我们的高级将领并未曾尽心尽力地指挥他们，因之我们第一期作战就不免于失败。第一期作战的失败，应该这样去了解，但我们更应该了解到怎样去争取以后的胜利。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觉得悲观。相反地，我们觉得这次失败，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教训和反省，使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来改正我们的错误。它使我们认识了许多在抗战前所见不到的弱点，如对于政治改革、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战场上许多复杂的问题，在战后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不是第一期抗战的失败，我们恐怕不会发现这些弱点。正因为失败，使我们得到反省的机会，使我们要立刻想法去补救我们的缺点。

是的，第二期抗战所表现的形势已经和第一期不同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已提高了，我们的国防建设也更切实地在进行了，我们的民族自卫组织更发达了，山西的战况，也已经好转了。我们有许多军队，虽然在敌人的后方，但都建立了根据地，都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在山西支持了长期战争，和在上海、南京一带溃退的情形完全两样。韩复榘[2]等，身居很重要的岗位，而到对外作战时，却望风而逃，经最高当局严厉地以军法处置，振奋了士气，并增强了各阵线队伍的战斗力。现在望风而逃的坏现象已纠正了。最近在临沂、台儿庄，都得到空前的胜利。这说明了第一期的失败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改善了战略指导，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我们军队指挥上的效能，把队伍反弱为强，得到空前的胜利！

在抗战初期，对于战略战术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许多人以为，

这是叶剑英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演讲的节选。原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第一卷第八期。

我们应该和敌人作阵地战，在阵地战中，我们还有把握取得胜利，但在东战场失败的教训，已经给予作这种主张的人一个否定的答复。然而有些人对东战场作战失败的原因，还没有充分加以了解，因之，在一次全国参谋工作人员的会议中，竟有人以为我军根本不能作阵地战，应该把正规军一律改为游击队，才能和敌人周旋，这种主张和上述的主张同样是错误的。我们把力量过分的用在阵地战上，消耗太大，损伤太重，固然不宜，而把军队都化为游击队，却不知我们要打到什么时候，方能得到最后胜利。从第一期作战，已证明了我们的军队并非没有抵抗敌人的力量，这表示我们的军队并非全不可能作阵地战。不过，我们应该换一个新的作战方式，就是，一方面正规军组成主力，在一些军事要点上和敌人打运动战。所谓运动战，就是在于探知了敌人是向我们某一点进攻时，我们乘敌人在行进中，或者是在队形的变换中，集中主力，以迅速的行动，利用人民的掩护和有利的地形，出其不意在敌人的背面、侧面加以致命的袭击。我们的地方有这样广阔，敌人只有那么多，正如一块大面包一样，我们一口吞不完，把它分成两块或三块来吃。我们的武器不及敌人的那样好，我们一时不能把敌人整个消灭，那我们就把它一个师团分成三四次来消灭。同时为着保障我们运动战的胜利，我们光是运动战还不够，所以另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广大的游击战。游击队要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比如敌人出来打水的时候，我们就三五个人地杀伤它，使敌人受到或大或小的损伤。更重要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断绝了后方的接济。敌人是现代化的军队，它的枪炮需要吃子弹，它的坦克车需要吃汽油，这就和人的肚子饿了要饭吃一样。假使我们截断它的运输线，就等于毁灭了它的生命线，使敌人陷于极不利地位，而暴露出它的弱点，我们就可以选择它的脆弱的地方向它袭击。在敌人方面，为要减少它在后方所受我们的威胁，必然要用许多的军队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它在后方所用的兵力愈多，则在前方作战的兵力就愈少。我们在前方作战的队伍，就愈容易达到战胜敌人，歼灭敌人的目的。这种运动战和游击战配合起来的新的作战方式，在作战上，比从前进步了。我们在第二期作战中采取这种新的战术，结果将敌人进攻的锐气大大地削减了。敌人的进展很慢，而且有时还遭受很大的打击，例如最近临沂和台儿庄的大败就是。这就是说明了我们在继续抗战的过程中，战术进步了，战斗力加强了，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了。

自然，第二期作战中，我们并非没有困难的，我们不要忽视我们的困难，而应该想法去把它克服。关于我们的困难的问题等一下再说。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敌人的困难。在第二期作战中，敌人的发展是很不顺利的，这一点大家在报纸杂志上可以充分看出。在敌人内部发生的最明显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论敌人前方的军队或后方的民众，都在口头上或传单中出现了厌战的事实和倾向，而且不止潜伏在前方的军队和后方的民众心坎里，而是不可遏止地在许多方面暴露出来。最近东战场有二十多个日本兵，用自杀来反对对华作战。在平津附近，有的宪兵公开地投到我军来。在敌国内，有的妇女在即将出征士兵所乘火车的路轨上横卧着，宁愿自己给车碾死也要阻止自己丈夫弟兄开往中国作战。在山西作战的敌兵，困在碉楼内，受了第八路军的宣传，公然地愿意缴枪。这些现象还在继续发展。这将是敌人所不能克服的最大弱点。战事不能结束而且延长下去，战债又增加起来了，日本全国人民对于战债的消化已经表示不满，日本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将随着厌战、反战的浪潮日

益增大，他们的统治更加困难。这就使我们更有把握抗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另一方面敌人的假宣传欺骗日本人民，宣传他们的胜利，夸大他们的收获。其实我们阵地虽放弃了，城市虽退出了，但敌军死伤很多，一船船死尸和骨灰运回日本作“光荣的皇军”的牺牲，这更会引起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的加剧。我们要知道，敌人的社会组织和我们不同，它是小家庭制度。这对战争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敌人的现役兵已征用完，要征预备役的军人，可是预备役军人都是中年人，也就是各家庭中的家长，全家靠他维持生活。若把这部分人强迫来参加作战，他们的家庭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在作战的时候，一面受着我军很大的威胁和无情的打击，一面又常常引起思家之念，这就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削弱他们作战的能力。其次，敌人的对华战费从哪里筹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战费的负担，是加于民众身上的。敌方的民众确已达到不能再负担的程度了。这些就使得敌人的军队和民众发生厌战的心理和行动，再加上别的力量鼓动，这种趋势就愈益显明而严重了。这种厌战、反战的趋势，已使敌人感到无法解决，再加上作战所必需的武器补给日见困竭，准备参加世界大战的军备都拿出来使用了。此外，还有种种的不可忽视的困难，使敌人困态毕现。这样就可以认识，敌人对我野蛮侵略与我们坚持抗战的继续发展下去，则敌人在军事上、财政上，以至统治上的困难愈益增加，愈不能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却愈战愈强愈有把握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就有把握说，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不过，我们应该指出：我们之所谓胜利，并不完全同于军事上所说的一般的胜利。所谓一般的胜利是作战军队的两方，此方把彼方的军队打败了，使他退出阵地，此方便是胜利。我们对于这次中日战争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识 and 了解。那末，我们之所谓胜利，是怎样的一种说法呢？这就是：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抵抗他，敌人受了我们游击队的袭击、正规军的打击，受了相当的损伤，结果，我们退出了一个阵地，让敌人前进了一步。在这种场合之下，敌人是大吹大擂他说是他们胜利了，但我们决不承认这是失败，相反地，我们得承认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有的是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区区的一城一地的失掉，并不引起我们怎样严重的恐怖，我们的胜利不在形式上，而在于隐藏在这种形式背后的事实。我们打击敌人的结果，使敌人的兵力天天在消耗，在消耗敌人兵力、增强自己的过程中，我们就算是积累小胜成为大胜。我们对于胜利如不是作这样的看法，则将重复我们第一期作战失败的大错误——我们死守阵地，让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将我们全部毁灭。我附带他说一件事：第一期东战场的战事失败之后，我们曾问过在东战场作战回来的兵士，得到什么经验。据他们说：我军在东战场的作战，是在“将不见兵，兵不见敌人”的状况之下进行的。因为将领是在后方用电话指挥作战，同时，因为敌人的炮火犀利，我们的兵士，整天躲在战壕里，而敌人的飞机却正好在我们的上空不断地掷炸弹，敌人的炮火，向我们的战壕集中狂射，结果是阵地全部被毁坏，兵士全部遭牺牲。我们现在决不能再用这种作战方法了。应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使他们受了相当损害之后，我们就要迅速地离开原来的阵地，避免更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将领不但要善于进攻，而且也要善于转移。我们的抗战，必然要实行这种办法，才能够长久支持，才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对于我国的抗战过程，我们应该这样去认识。

那末，中日战局将会怎样发展下去，达到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不能这样想象，以为依样作战，一面扩充我们的军实，终有一天，我们的军队的实力

会比敌人更强，就可把敌人赶出我们的领土。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了。敌人有四十多年的战事准备，它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它有全副武装的人民。我们不能设想，敌人进攻我们，终有一天会什么都用光。我们所能想象的是，因它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方面要用一部分力量来侵略我国，另一方面还要具备相当的力量来维持它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地位的平衡。假如它把力量过分消耗在我国，则它就要感到立国的困难。在远东问题上，世界问题上，就不能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就是这种事实，使得它无法把侵略我国的战事延长下去。而它本国的民众由于厌战、反战所形成的革命运动，也将严重地威胁着它，使得它再不能聚集兵力于对我国的侵略战争。这样一来，我们的作战能坚持，而它不能持久。我们抗战以来虽受很大的痛苦，而可不致举国骚然，而它国内现在的纷扰，已汹汹不可终日。我们胜利就表现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在这种场合。事实上，日本人民生活上的痛苦日增，政治上的困难日亟，国际对于它的帮助也日见不稳，等等。这种事实，已使它不能不设法结束这次战争。而且不只它要用尽方法去结束这次战争，就是国际上也都表现出这种趋势，英国、意大利、德国在欧洲方面和太平洋方面的活动，就是这种趋势的表现。

但是，我们观察中日战争这个问题，不能把它看做是孤立的问题，应该注意到它和世界上问题有关联的地方。高鼻子欧洲人，对于中日战争，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关于这点，我们从中日战争可能的结局来寻找解答。据一般的观察，中日战争可能有三种结局：第一是中国战胜了日本，其结果中国自然是得到自由独立和复兴，而日本国内起了革命，军阀倒台；另一方面是中日两民族以平等的地位，亲密合作，共存共荣。这种结局高鼻子们欢喜吗？不，他们根本不愿意中国复兴的。第二是日本战胜了日本，其结果我们做了亡国奴，而日本独霸了中国，这种结局，高鼻子们欢喜吗？不，日本究竟不是他们的好朋友，它独占了中国后，会把它的侵略移到安南、缅甸、印度及菲律宾、澳洲，高鼻子的这些势力范围便会受到日本的威胁。第三是战争延长下去，这也是可能的，而且应该想象的。高鼻子们愿意这样吗？也不愿意，他们需要日本在远东做进攻苏联的有力部队，中日战争延续下去，就要过分削弱了日本的兵力，使它不能执行进攻苏联的任务。这三种结局都不是高鼻子们所愿意的。那末，他们对于中日战争既然这样估计，很明显的，他们将出来调停中日战争。事实上是已经这样做了。德大使陶德曼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最近又传说有别的国家的代表们也在做这种活动。可是，他们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最高领袖和全国人民的抗战到底的信念。但他们的这种勾当，我们不能不注意。最近，英国正用牺牲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这种残酷的手段，来满足国际法西斯侵略者的愿望，企图暂时和缓欧洲政局，拉拢其他国家来商量调解彼此间的矛盾，更在连带讨论到中日战争的调解问题的时候，企图以集体的力量调解中日的战争。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那末，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们先估计他们可能提出的调解原则是什么，再来讨论我们的应付办法。依我的推测，他们所提出的原则，首先将是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个我们是赞成的，但是还有第二个，那将是希望中日两国顾及“既成事实”，例如，东北、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如果中国暂时没有力量夺回来的话，就是一种既成事实。又如中日战争，影响到远东方面的国际贸易，危害了世界和平，这也是一种事实，这两种事实要顾到。那末将这种办法具体的说来，

就是：一方面实际承认伪满，日军可以答应撤退，恢复当地中国表面上的政权，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外表上的完整；但日本在华北有经济上的特权，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切实合作，另一方面对调停的国家，给他们一些报酬，这就是所谓扩大淞沪协定[3]。各位同胞，假使形势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受这种办法呢？当然不能的。因为：第一，我国抗战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是依靠于巩固经济基础。华北占有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煤铁，若将华北经济权益拱手让敌，在经济上我们就要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而且上帝也不能够保证，日本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再来侵略中国，今天进占华北，明天进占华中，后天便要进来占华南了，这是大陆政策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只有坚决抗战，联合和平力量，驱逐日本法西斯。这就需要我们全体民众一致努力，同时也要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有确定的方针。换句话，我们一方面要克服种种困难，支持着抗战，一方面要设法打破这些企图停止中日战争的国际阴谋。我们还要考虑到，假使他们对我国来一个金融上的扰乱，或其他方面的扰乱，自己要有对付的办法。我们要有进一步求助于最能帮助我国的和平国家——苏联的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这就要看我们有否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关于八路军的近况

八路军的近况，是许多人记挂和关心的。它自从由红军改编成第八路军后，不久就参加山西前线作战。它改编时的军队有八九万人，因种种关系，它只编成三个师、一个总司令部，现在的四分之三的部队在山西和敌人作战，四分之一在陕西担任河防，因为敌人还想攻陕西，所以它的兵力作这样分配。现在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已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它所指挥的部队，除八路军以外，还包含了在山西作战的中央军队。几个月来的作战都是协同友军以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配合起来支持山西。直到现在，还坚决地保持着山西的阵地。

山西的民众训练，在昔阎主任[4]曾做了很多年功夫，因领导者都是胡子很长的人物，所以成绩不很好。这班领导者经不起这次战争的动荡，都逃走了，而需要由群众中产生他们自己的领袖。因之，八路军对于山西的民众训练，是一方面把自己军队的纪律严明起来，进而使军队和人民能切实联络，对于各地方政府和各地民众工作机关，也设法使他们强化起来；另一方面则注意改善民众生活，把苛捐杂税、高地租、高利贷等，或废除，或减轻，因得了阎主任的许可，这办法在战区内已见实行，而且大大地收了效。平型关一役[5]，八路军埋伏了三天，敌人一点也不知道。第一天有一中队日兵来了，我们嫌它太少，不动手；第二天它又来了一大队，我们还是嫌它太少，不动手；直至第三天，他们来了一个联队，我们想这可以动手了，便突然从敌人的侧后方出现，用刺刀和手榴弹，把板垣师团的一个联队完全消灭了。这完全靠了民众的掩护，使军队能隐蔽待机，突然出击。如果民众中有一个是汉奸，则我们便不能安然埋伏，伺机杀敌，完成这一次空前的胜利。因八路军能够和民众合作，每走到一个乡村，老百姓都诉苦说，日本人把我们的妇女一车车运去，当作日军的慰劳品，老年人被强迫替日本人修路筑桥，让它的战车驶过来屠杀中国人。因此，我们告诉人民，快组织游击队、破坏队、运输队帮助国军抗战。有一次敌人来了，群众把敌人后方的交通线彻底破坏，

一夜破坏了三百里，使敌人车辆不能行动，弹药、食粮接济不上，给敌人以极大的打击，大大地收了杀敌的功效，这就影响了山西的其他的部队，并且逐渐影响到全国其他方面的部队。

当日本主力还在太原北面作战的时候，八路军一面协助友军在正面抵抗着敌军的前进，一面派部队在敌人后方牵制着敌人的活动。敌人初时用很猛烈的炮火向我军攻击，渐渐的把火力变疏弱了，不久看得见它不断地将大炮向后面——崞县[6]移动。这就因为它后方的交通线被我游击队破坏，运输不便，致弹药不能继续得到接济，不能不把大炮向后移。同时也感觉粮食不够，要用飞机来运输，时常会把面包、牛肉干等物抛到我军的阵线内。这时敌人扼于正面，乃由正大路进兵，想迂回太原侧后，以包围我军，因此我方将增援队伍分调到那边去抵抗，以致兵力单薄，结果反致太原不保，而正太路方面也守不住，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在山西北部太行山一带四十三个县，因敌人沿铁路的进展，此等地带也成为敌人的后方。当地官吏都逃走了，八路军就在那里帮助人民起来自卫，业已成立了边区政府，由阎主任呈准中央委任干员推行政务。敌人曾三次围攻这个地方，结果都大败而返。现在边区的范围日见进展，在津浦线一带已发展到门头沟。另外晋西北吕梁山一带，也是八路军很活跃的区域。所以敌人在山西所占据的不过是点与线，而点则日见缩小，线则日见缩短了。现在山西还有不少阎司令长官的和中央军卫立煌[7]的部队，八路军协同他们，进扰和牵制着敌军，使它无法发展，也无法安居，到相当时机，还得将它驱出阵地。

八路军是在不断地发展中，而且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也是国家的军队。八路军的发展，也就是抗日军队的发展。我们民众一方面应该为它的继续发展而感觉喜悦，同时更应该尽力来协助它，使它更能负起它的抗日的任务。然而敌人特别仇恨的是八路军，他们宣言要用飞机投放毒瓦斯消灭晋陕抗战的军民。敌人这一狠毒的兽行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更加努力地抗战，为民族解放奋斗到底！

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涛中，它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有否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

注释

[1]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开封召开了第一和第五两个战区团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蒋介石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报告，总结了国民党军队过去几个月的失败原因，并提出了巩固武汉的战略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后来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武汉于同年十月被日军攻占。

[2]韩复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3]淞沪协定指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自签订之日起，双方实行停火；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昆山、苏州一带驻扎军队，而日本则不受此限制；同时还承诺取缔抗日活动。这个协定是国

民党政府向日本妥协的卖国协定。

[4]阎主任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

[5]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6]崞县即今山西省原平县。

[7]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

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

敌人进攻武汉，是集中在华海陆空军最大力量来进行的。依最近情况看来，敌似以多数空军掩护海军，以海军掩护陆军，求得在海陆空军适切配合下，沿江跃进，企图迅速夺取武汉，控制长江天堑，横断中原，以遂其切断我南北交通和达到宰割我全国同胞的毒计。敌以为我军若失去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武汉，将陷我于中枢播迁，国交变化，举国惶惶，军心动摇。然后利用长江运输之便，依据长江沿江已经巩固的据点，自由转用大军，机动于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寻求我军作战，并肃清平汉、粤汉以东的我军，这样来实现其占领半个中国的计划。

根据一年作战经验，敌军有较高级别的机械化部队，因此，敌之进攻，必须依托巩固的后方，依托安全而有输送力的后方联络线。无论在哪个战线，差不多都是沿着铁路、公路向我们进攻。人们对于敌人进攻武汉的估计，也按照这个成例，以为敌之企图，起初是想沿平汉线南下，后来受到黄水的打击[1]，转移到江南，以为敌之主力将沿京赣、浙赣、南污三铁路及其平行的许多公路，由赣入湘，截断粤汉。在其他方面，只是辅助的突击。这种估计，在今天看来，又不完全合于敌人的部署了。原因是：

一、抗战的经验，特别在山西，敌人已深深的感受到机械化的兵团，在山地作战，没有源源不断的弹药、汽油、粮秣的补给，是不能致胜的，但我军游击队的活动，使敌人后方联络线几乎完全没有保障。华中一带，山深林密，游击战争最易发展。在地势上说，大别山屏障着武汉，达长江之北，黄山、天目山蜿蜒在鄱阳湖以东，九岭山、幕阜山耸峙在南污以西，地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人民富有斗争经验，胜过华北，迫使敌军对此荆棘满途的茫茫前路，不能不有许多的踌躇和顾虑。

二、说到长江，目前正是江深水阔有利于敌人海军活动的时候，九江以下，敌已突破封锁线。因此敌人现正利用长江，求得海陆空联合作战。最近敌人行动，是沿江掠取要点，马上进行迅速作业，把这一要点巩固起来，并准备继续跃进。我军如果反攻，敌即在海陆空军配合下和我作战，我军如围困，敌依海军掩护和输送，不能根本给敌以合围。这样，敌人掠取沿江各要点，一般的说，一时颇不易收复。敌人便能在这种情况下，逐段的控制长江，继续西进，同时可以相机向内地发展。

三、敌人沿江跃进，直趋武汉，仅仅暂时的避免和我军作山地战，但并不避免和我军在沿江作战，及进行湖沼战。相反的，敌正是采用锥形突击的方法，直趋武汉，俨然有直探虎穴的企图。这自然迫使我军为抢救武汉而与敌在沿江作战。这样敌人便用海陆空军的配合，以消耗我们。因此敌之沿江跃进，不仅企图吸引我空军，同时也吸引我野战军被迫作战。假使被敌吸引在沿江之兵力愈多，也就使敌在其他方面——辅助突击方面，进展容易，甚至敌可以把助攻转变为主攻，向着有利方向，沿交通路前进，以包围武汉，或截断粤汉。

四、武汉周围，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沼。过去在苏州战斗，在常熟之尚湖战斗，在苏州之太湖战斗，均属湖沼战的性质。经验告诉我们，敌军对湖沼

本文原载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新华日报》。

战之准备，比较我们充分，敌用装甲汽艇，及帆布船、橡皮船等，在湖沼中颇为机动。因此可以估计敌人进攻武汉，在海军掩护下，不惟不避免湖沼作战，而且要企图迅速进入湖沼地带，进行其扰乱破坏与威胁。其沿江跃进的前途，是可以由比较狭窄的江面，进到比较宽广的湖沼，这样则敌之活动范围，将因更迫近武汉而益显活跃。

上之所述，说明敌人采取沿江跃进的作战，是依据其军事技术高度的发展，其海军在长江可以取得配合的优势，同时也依据一年来受过许多山地战与游击战的打击所得出的一些经验。不过所谓沿江跃进，决不是敌人抛弃陆军不用，只是空军与海军配合，相反的，敌人海军空军的活动，完全是协助陆军的。也不是敌人只在江中前进，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相反的，敌人沿江跃进，是与长江两岸之陆军行动，完全在一个计划之下相配合的。

但是，要说明敌人所以采取这一作战计划，其主要原因，还要在政治问题上去找。

敌寇一年来的侵略，动员近一百五十万，伤亡近四十万，消耗战费五六十万万日元，被炸毁军舰四十余艘，飞机损失六百余架，而战争日益扩大，战线后方的危机日益增长，国际反战、反侵略、反轰炸、抵制敌货的运动日益普遍，敌方军民在战争所给予的饥饿、穷困、死亡、失业、逮捕、屠杀、压迫、剥削情况下，反战情绪日益蓬勃。敌寇无论对外为着国际环境的改善，对内为着维持军阀的统治，企图提早结束战争，均不能不向武汉进行冒险的突进。因此，武汉如果轻易失去，毫无疑问的将直接引起战争形势严重的变化。敌之沿江跃进，直取武汉的企图，是直接联系着敌人总的战略方针——速战速决的。

目前情况，南岸敌军已攻占污阳，北岸之敌，猛扑潜太，江上之敌，一度进到小池口，形势较紧，无庸讳言。我政府对坚守武汉，早具决心，惟保卫武汉，人人有责，除了一些政治意见，本报历有论述，而军事上具体问题，又不便公开讨论外，特提出下列原则上的对策，以供参考：

一、敌人进攻武汉，其决定胜负的兵种依然是陆军，其海、空军只起协助作用。当长江南北两岸前进的陆军，将进到我们有利的山地时，应以坚决的反攻，乘其与海、空军得不到配合之际，给以致命的打击，使两岸敌之陆军受重挫，影响到江中之敌，不敢贸然前进。

二、敌军登陆，是在海军掩护之下进行的。对敌登陆部队之扫荡，当然是一种极端英勇的行为，而使其奏效，应注意利用时机，并学习坚决的短促突击。

三、约束敌人海军的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论空军轰炸，江上设防，沿岸筑堡，沿江设伏等一切有效方法，均应适时采用。一般说来，海军建造，其经费远过空军，敌人结集许多海军在长江作战，其活动范围比较在海洋中要狭窄得多。假使我们采用最有效的方法，求得尽可能的打击敌海军，不仅直接协助保卫武汉，同时也是持久抗战中大量消耗敌人的有效手段。

注 释

[1]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棕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东北的七年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

沦陷了吉、黑、热[1]、辽，迄今已整整的七年了。在倒悬中的东北同胞，被压迫之重，生活之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在这悠悠七载的历程中，旧日儿童，今已长大，昔年少壮，多受摧残，经历敌人毒化与奴化以后，东北情形，好似个：“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已半非”[2]了。然而我们英勇的东北义勇军，和许多游击队与东北抗日人民，就在这种艰险困难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支持了整整七年。当着全国人民坚持着抗战来纪念“九一八”的今天，我们对于七年来呻吟在暴敌铁蹄下的东北同胞，寄沉痛的哀思，对七年来英勇抗战的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战士们致崇高的敬意。

显明的，当着敌人侵进我们的东北，并占领了我们许多要线和要点，而正规军队已经离开这一区域时，对我们东北人民抗战的继续，主要的是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与敌周旋。

总结东北七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虽然取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和发展，但是它存在着许多弱点，其中应该指出：

第一，没有把游击战争当作是一种发展过程来进行，在不断的斗争中把游击队壮大、锻炼成为正规军队，配合群众抗日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创造、地方政权的建立，一直走向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东北游击战争多年来只在流动不居、聚散不定的情况

下，支持着零星的战斗。

第二，没有把游击战争与其他战斗联系起来、配合起来。游击队应该把自己处在辅助的地位，协助正规军作战。形成这样一种过程：在群众斗争最高阶段上产生游击队，在战斗中壮大和锻炼游击队，成为正规军。复在正规军指导和帮助之下，繁殖许多游击队，协助正规军作战，并扩大正规军。

以上所说的弱点，都在抗战一年来，加以纠正了。开展在晋、冀、察[3]、热、鲁、豫、皖、苏、浙各地的游击战争，在那里截断敌人的交通，破坏了敌人后方勤务机关的设备，消灭了伪组织及其武装，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用武装来参加战争，建立起中华民国的地方政权，创造了巩固的战略基地，逐渐把敌人较远的后方变为前线。这些光荣的战绩应该给东北义勇军和游击队以宝贵的教训，应该学习这些经验，把东北游击战争更加广泛的发展起来，与全国的抗战相呼应。

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对目前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感到满足。我们应该把当前发展着的游击战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第一，利用战争延长和敌人深入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兵力配备和组成上的弱点。换一句话说，就是敌人的兵力有限，当其深入之际，一面要保持足够兵力在前线作战，一面要维持足够兵力巩固其后方，因此就暴露出敌军前后配备上许多弱点；由于同样的原因，迫使敌人不得不用一些威迫利诱的手段，吸收许多中国人，参加到敌人的军队中去为虎作伥，因此，就暴露出敌军组成分子上许多弱点，所有这些自然便利于我们进行瓦解敌军伪军工作。

假使研究苏联内战史，便可以看出他们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围攻的时候，曾经在非常艰困的条件下，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结果，这一部门的工作

作获得了光荣的成绩，做到使敌我两军中止战斗，敌我两军士兵，在战壕里开会联欢。他们这种工作的中心。是向敌军启发其阶级意识，提高其国际意识，使两相对垒的军队，虽然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依然能够在国际意识启发之下，亲密的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今日的中国，是在暴敌侵略下抗争着。整个民族生命，是共同的整体，所谓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经过一年来英勇的抗战，在广大的军队和人民之间，已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誓与倭奴作拚死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瓦解敌军。伪军的工作，只要有计划、有组织、有耐心，去启发敌军中或伪军中的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4]的民族意识，提高其民族醒觉，比较苏联内战时期对敌国人民启发其阶级意识，促进其国际团结，要容易得多了。

事实已经证明：虽然我们进行瓦解敌军、伪军的工作，还仅仅在华北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可是最近数月来，许多伪军、伪保安队均已纷纷起义，参加抗战。假使我们能够更加着力去进行，则成绩更加伟大。所以游击战争的充分发展，是与瓦解敌伪军工作不可分离的。

游击战争的发展，不仅仅起着军事上一些破坏、扰乱等作用，还要进一步的在政治上发生有力的“震撼”。八路军宋邓两支队[5]挺进冀热边境，发动整个冀东人民起来抗战。这对于被敌骑蹂躏了七年的热河人民，犹如注入了强心剂。这种政治上的震撼作用，可以给敌人以迅雷般的威胁，给东北人民以极大的兴奋。

把这种英勇的行动，与瓦解敌军、伪军工作配合起来，并且与城市工人、学生、市民的救亡运动配合起来，则游击队虽然没有飞机、大炮，但是在各种形式的配合下，可以把敌人占领的一些据点夺取过来，给敌人以极有力的震撼。

因此要把发展着的游击战争提高到更高阶段，必须加强游击运动与瓦解敌军、伪军工作的相互配合，必须注意游击运动与城市工人、学生、市民的救亡工作相配合。

第二，艰苦的建立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基础，并移植到雾灵山脉，移植到泰山山脉，把五台山与泰山联系起来，把泰山与大别山联系起来，把大别山与黄山、天目山联系起来，同样的把雾灵山与长白山联系起来，俨然在敌人后方造成一条极其蜿蜒的战线。这样，敌人的前线，依然是紧张的前线。敌人的后方，还是一条紧张的前线。这不仅在抗战过程中，能够与正规军作战相配合，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而且在将来战略上转入攻势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一面出击，而且具备着从两面出击的态势，把深入中原的敌军歼灭在两条战线的夹攻之中。

因此，要把发展着的游击战争提到更高阶段，必须加强各个游击区的活动和发展，同时必须加强各个游击运动的配合和联系，要求在一个战略意旨之下统一的行动起来。

第三，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同时是市场和资源的占领。暴敌对华兽性的侵略，遭受到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们的反对。在世界范围内，许多中国的友人，自动的进行抵制敌货等运动，这将使敌人在经费的支持力上受到打击，帮助我们的持久抗战获得胜利。

现在敌人的补救办法，便是将这种损失，依然取偿于中国。据前线来人所说，许多战区的人民，其日常的用品如火柴、纸烟、白糖、布匹之类，充

斥着敌人的商品；敌人在华北，正多方设法的收买许多棉花和羊毛粮食之类，这些都是敌人的续命汤。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中国人民，肯把这些续命汤供给敌人吗？我们决不能把沿海各省区，静静的交给敌人做市场，成为敌人资福收集地。我们要认清敌人之所以下向沿海这些地区进行军事活动，正是因为有一些奸商和汉奸，在那里为敌生财，为敌续命。

只有把游击战争发展到沿海各省去，把沿海各省的抗日人民组织起来，肃清一切汉奸和奸商，巩固我们的国防，保有我们的资源，拒绝敌人的商品流通到我们国内，同时开扩我们国内的市场，加强我们抗战中的经济力量，增加敌人长期侵略的经济困难。

因此要把发展着的游击战争，提到更高阶段，必须开展沿海的游击战争，以游击活动封锁我们的海岸，打击敌人的经济侵略，巩固我们的国防。

东北的同胞，全国的同胞，在我们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的民族解放事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事业，胜利是可期的。有了坚强而英勇的国军在我们的前线努力作战，有广大的游击队在敌人后方艰苦斗争，让敌人就在这种非常狼狈的情况下崩溃下去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

注释

[1]热即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见宋代文天祥《金陵驿》。

[3]察即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4]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一八九五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将其割让给日本，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归还中国。这里的台湾人是指台湾籍的敌军、伪军人员。

[5]宋邓两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的八路军一二师雁北支队和邓华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六月，向冀东挺进。

从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 (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

目前的战局，已进到紧急的关头，我们主要的战场，是环绕着武汉，成为弧形的阵势。我们英勇的战士，正为着保卫大武汉而浴血坚持。敌以武汉为目标，从八月二十七日开始进行总攻击（事实上六月二十三日已开始进攻马当）。依目前情况看来，江北江南各战区，已进入山岳战斗，在沙河、广济、瑞阳、瑞武间，曾给敌军以严重打击。平心静气他说，我军在这一带有利的地形作战，假使配合着良好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动员，是应该可以顺利完成其作战任务的。退一步说，在这样有利的山地作战，尚且不能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目的，那在其他地区，困难就更多了。

一年来山西作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军挟其高度机械化的军队，并得到空军的配合，向我军作猛烈的进攻时，我军并不作死守某一线的计划，只是以运动的姿势，向敌人翼侧，寻求机动，努力求得在敌人运动中，给以猛烈的突击，让敌人付出极高代价，换取一点或一线，这是第一；第二是最广泛的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空室、清野。使在莫斯科对付拿破仑的办法[1]，在中国的各市镇、各乡村，普遍地采用起来，使占领我们一点一线的敌军，没有办法在当地取得生存的条件，迫使该敌一粒米、一颗弹、一桶油、一束草，都要从其遥远的后方，艰难地输送。我军却以有力之一部，配合

广大的群众武装，在敌人后方联络上，不断地截击之。我们就可以看到，经过若干时间以后，敌军因疲劳、饥饿、弹尽、援绝等困难，便放弃其占领地，自动地撤退了；第三，由于我军日夜与敌接触，使敌不能施行其秘密撤退，不能不派遣兵力，轮流掩护，且战且走，以脱离我军，我军主力部队，便能趁敌引退之际，用最大的积极性和最高的英勇，给该敌以穷追和猛击。结果阵地恢复了，敌军消耗了，我军胜利了。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当敌向我猛攻，企图占我一点或一线，我们只求取得相当的代价，当敌人已经占领我们某点某线时，我们就给予物质的饥饿及实力的消耗，当敌人感受到不能生存而须撤退时，我们就给敌以致命的打击和歼灭。

在这里应当指出，这种战术，与见敌则逃跑的流寇主义，固然绝端不相同，就与那些死守一线，徒消实力的单纯防御也不一样。

在这里也应当指出，要进行这种战术，没有正规军与游击队和广大群众动员参战的配合，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们抗战，是全体性的战争，进行全体性的战争，需要有全体性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因此我们领导抗战的司令部参谋部，假使在战略或战术思想上，只因循着旧时的途径，把自己的工作内容，拘束在一个单纯的军事范围，只是单纯看到自己的部队，应如何针对着当前的情况，定出一些行动计划就算完事，把许多政治因素，例如政治工作配合的程度，群众动员的程度，游击运动的强度等抛开，不加以估计，不把这些力量（政治的，军事的，群众的）统一在一个作战计划之下，配合起来，组织成为带着更多全体性的战斗，像这种作战的领导，已经不适合抗战的要求了。必需重复说一句：全体性的战争，必须有全体性的领导。

用这一观点，来估计当前保卫大武汉的战局，自然就会感觉到，我们在

某些战斗，失于无抵抗的溃退，而在某些战斗，又失于顽固的死守了。据前线人来说，有些作战区域，游击队在敌人后方行动，颇为微弱，广大群众，在战斗中真实的动作和配合非常不够，真足令人深省。

许多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的教训，不仅在山西，不仅在上述的意义上，在其他方面，亦可以看到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

已经不止一次了！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常常见到许多战区，正面打得很好，忽然两侧或一侧钻进了敌人。举些较大的例子吧，在长城一带南口战斗，以汤恩伯将军的英勇善战，几次击退了敌人南口正面的进攻，坚守我们的阵地。而敌军忽然从我军的侧后抄来了[2]。平型关正面八路军胜利了，可是敌军却从茹越口等处打进来[3]。在山西忻口正面稳住了，敌军却从娘子关打进来[4]。在河北我军退出平津以后，永定河右岸阵地，可以说相当稳住了，敌人却从右侧抄到保定[5]。在山东方面临沂战斗台儿庄战斗胜利了，敌军却从蒙城、永城、济宁、砀山方面打出来[6]。在东战场方面，敌军由罗店截击大场，由金山卫登陆截击青浦、安亭[7]。都是说明敌锥形突击，只是指向我军阵地的间隙。我们研究这些间隙的形成，可以得到如下的概念：

一、在作战指导上，由于侦察不周密，配备不适当，因而出现一些阵地的间隙；

二、因编制不充实，部队有许多指挥员，当授以任务时，没有估计到该部队的实力，因此，把任务接受下来后，便感受兵力不够分配，阵地上遂生出间隙；

三、兵力使用上，常常陷到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对于阵地防守时，常常形成逐次填补的错误，这样，也要发生时间上的间隙，为敌人各个击破；

四、在政治上，缺乏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工作，增强部队与部队的团结，发扬战场上互相应援协同动作的精神，因此阵地上发现了间隙，亦不能自觉地把间隙填补或封锁起来，这也可以说是政治的间隙。

依上所述，阵地上间隙的发生，固然是我们战线的弱点，易为敌人所乘，给敌人以锥形突击的战术，能够经常地采用，敌常用之以突破，常用之以包围，常用之以迂回。但在目前敌我两军装备优劣的条件看来，我们要以装备劣势而人员占优势的军队，战胜装备优势，而人员占劣势的军队，常常采用诱敌深入的办法来伏击敌人消灭敌人。在这种企图下面，我们的部署常常故意地在部署上暴露出我们的间隙，让敌人袭进来，俟敌进到有利地带，一举而消灭之。因此，自觉的间隙，成为巧妙的战术布置，不自觉的间隙，便为战术配备的错误。但是，如果我军的政治工作做得好，部队极其团结，虽然有不自觉的间隙出来，如在我们沿江南两岸的我军部队和炮兵，能够良好的协同，虽然敌人以海陆空军配合下，沿江跃进，我军终能给敌以极大地打击，迟滞敌之前进。

现在，信阳一线的敌军，已乘隙深入，威胁信阳，假使战区与战区之间，能够良好地协同，依然能够给深入之敌，以极大的打击。同样的，侵入瑞武线之敌，在万山丛中，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疲乏的前进，只要兵团与兵团之间能协同，必能给该敌以彻底的歼灭。这种互相策应，不仅为着自己的任务要战胜敌人，同时也是避免自己为敌人所各个击破。江南之敌，正以全力沿瑞阳线及瑞武线，分途锐进，然而在遭受到我军有力地抗击的当儿，我南浔线上英勇的健儿，在这种有利时机，能乘敌人在自己方面的动作比较沉寂时期，组织一个有力兵团，给瑞武线上作战之我军，以极大的协助，成为犄角

之援，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类而推之干部队与部队之间，兵团与兵团之间，战区与战区之间，只有发挥我军政治上的团结与动作上的协同，才能把间隙变为“口袋”，把侵入之敌，夹击而歼灭之。

注 释

[1]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2]一九三七年八月，占领平津地区的日本侵略军，为了解除西北方向的威胁，于十一日向驻守平绥铁路东段南口、居庸关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发起猛攻，守军凭险扼守，与敌展开反复争夺。日军见正面强攻不下，乃调整部署，以第五师团主力向南口西南的镇边城、横岭方向迂回攻击。二十三日，日军攻占镇边城，前出到南口守军的侧后方，迫使守军于二十六日放弃南口阵地。

[3]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占领山西北部的日本侵略军分两路向内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西路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由大同南下进攻雁门关，东路敌第五师团由广灵、灵丘指向平型关。九月十五日，协同国民党晋绥军作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外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歼敌一千余人，打乱了日军突破平型关、迂回包围雁门关守军的作战计划。敌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遂东移策应第五师团，并于二十八日乘隙由雁门关与平型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内长城防线，迫使中国守军全线向忻口一线后撤。

[4]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突破晋北内长城防线的日军南下进逼太原，防守山西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部队集中主力于太原以北的要隘忻口堵击日军，双方形成对峙。八路军在日军侧背发动攻势，袭击日军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忻口正面作战。十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军鉴于忻口作战形成僵局，乃命占领石家庄的日军沿正太铁路西入山西，进攻太原。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二十师团突破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晋东门户娘子关。十一月二日，忻口守军回防太原。八日，太原失守。

[5]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侵占平津地区的日军南下，进攻在房山、琉璃河、固安一线沿永定河西南岸布防的中国军队。八月二十一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与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在窦店、琉璃河、马头镇一带展开激战。九月十四日，日军第六、第十四师团从守军战线右翼南渡永定河向西迂回，企图插入涿县以南地区，切断守军后路。十八日，中国军队放弃阵地后撤，日军趁势南下，二十四日占领保定。

[6]一九三八年初，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铁路、沟通南北日军间的联系，乃集中主力南北夹击作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三月至四月，南下之敌第五、第十师团先后在临沂、台儿庄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第五战区部队的沉重打击。日军随之调整部署，以少数兵力正面钳制守军，主力从南北两面向徐州以西迂回。五月上旬，南线日军第九、第十三师团沿涡河西进，连陷蒙城、永城；北线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南渡运河攻占金乡、鱼台，第十四师团从濮阳南渡黄河经菏泽直插兰封（今属兰考）。五月十六日，南北日军会师碭山，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守军被迫向西突围，日军于十九日占领了徐州。

[7]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淞沪战役开始。八月二十三日，日军两个师团从上海以北吴淞至浏河一线的长江沿岸登陆，向西南方向迂回上海市区，与中国军队在浏河、罗店、刘行、大场、江湾一线展开激战。九月下旬以后，中日双方陆续增调援军，战斗呈胶着状态。十月十六日，日军在刘行突破守军阵地，二十六日攻占大场，苏州河以北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南岸。十一月五日，日军三个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一带登陆，从背后包抄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九日，日军攻占松江，直指上海以西的青浦、安亭，守军因后路受到威胁被迫全线撤退，十一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军长驱直入，于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

论晋察冀边区粉碎敌军进攻的初步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

华北游击运动，已在黄河左岸，包含山西。河北两省及豫北一部、鲁西北一部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不止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目前正向绥远[1]、察[2]南、热[3]南方向狂烈的发展着。华北游击运动的发展，使敌人感受什么痛苦呢？

第一，破坏了敌人建立的伪政权。敌人在华北所组织的傀儡政府——北平临时政府[4]，事实上是个架空的政权，所谓空中楼阁，它既没有行政系统（例如省、区、县、市等政权），更无社会基础（无人民），原因是敌人除占领某些要点和要线之外，许多点与点之间，线与线之间广大地区和人民，仍为我军游击队掌握着，在那里支持着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与之对抗。

第二，吸引敌人极大的兵力。敌人的第三期作战，是集中海陆空军最大力量进攻武汉。可是华北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敌感受到严重的威胁，不能不在绥蒙方面控制两个半师，平汉北段控制两个师，同蒲南段控制约三个半师，陇海东段及津浦北段控制约三个半师。据报，敌在华兵力，犹嫌不足，尚拟在关外调两个师，这样敌在华北兵力足足有十一个师之众，被游击运动牵制着。这种牵制，决不是深沟高垒的双方对峙，而是在不断的与敌血战中，把敌人力量消耗，把自己力量生长出来，胜利的向前发展，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

第三，破坏敌人在华北的经济开发。敌人拟在华北占据区，施行经济的开拓，挽救其军事工业资源枯竭的危机，特别是敌方燃料缺乏，企图在冰雪前期大量采取，然而这些企图，都为华北英勇的游击运动所粉碎了。

以上诸端，只是荦荦大者，然已足以证明华北游击运动的发展，已给敌人以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严重的打击。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华北抗日游击运动光荣的胜利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一切沦陷在敌人占领区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群众，要发动散漫无组织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是极其艰巨的工作。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问题上曾说过：“虽说农民在可怕的压迫之下被煽动了，然而要怂恿他们起义，却不容易。因为散居在各地，想使他们得到一个共同的觉悟，极感困难。世代相传的服从的习惯，在许多地方缺乏武器使用的练习，剥削程度的深浅，又视其主人之个性而异，凡此一切，就把农民安静了。”[5]

华北的广大群众，在领土沦陷以后，虽然遭受到日寇残酷的屠杀、压迫、剥削和奸淫，然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宣传解释和鼓动，没有严密敏捷而普遍的组织，没有坚强而富有战争经验的干部为之领导，华北游击运动依然不会发展。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求有领导这一全部工作的司令部。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领导华北敌后游击运动的司令部，便是好几次遭受过而且现正遭受着敌人几路围攻的晋察冀边区政权及其所领导的政治组织。

由此就可以了解，敌人欲占领整个华北，必须肃清华北人民抗日武装，要肃清华北人民抗日武装，首先要肃清在华北抗日游击运动的主要根据地——晋察冀边区。

当着敌人围攻武汉，不断的受到我军严重打击，在战场上显示出敌军趋

于疲惫的时候。敌人为着策应华中作战并巩固华北后方，在华北已进行同时的进攻，其重心则在消灭晋察冀。

依前方消息，敌军约五万余人，自九月下旬起开始向晋察冀边区分途进犯。其进攻方向：平汉方面，由易县进攻涞源，由保定、唐县、曲阳、平山等地一沿沙河向阜平、一沿滹沱向灵寿；正太方面，由井陘、阳泉、平定、盂县北进；同蒲方面，由忻县、定襄向河边、五台，又在山阴、代县、崞县[6]、原平线上，控制重兵，以截断晋东北与晋西北联络，并相机策应进攻晋察冀，同时准备着进攻以宁武为中心的晋西北；在北面由广灵进攻灵丘，由浑源、应县、繁峙进攻五台山之北。

进攻晋察冀之敌军，由于过去几次围攻受过惨败的教训，战术动作已极其慎重，且有许多改变。显著的是对占领地带，构筑据点，逐段跃进，逐段肃清，后方联络极其注意，逐段的延伸构筑公路，以保障其后方供给。似乎采取中国旧兵法，所谓步步为营，逐区紧缩，但战斗中则大量使用毒气，空军滥施轰炸，并大肆烧杀，似乎要用华北人民的血，来洗净华北的抗日势力。

然而敌人这一残暴的企图，是不能实现的。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和军队，在他们的领导机关指挥下，粉碎过敌人几次的围攻。它生长有更大的力量，积蓄有更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试考查晋察冀边区人民和军队在最近两月中打击与进攻敌军浴血战斗的情形，已得到不少光荣的胜利。

一、平汉方面之敌约五百余人，十月三日向阜平前进，被我击溃，敌向东溃退，我军追击至王快地域；

又同日由平山进犯灵寿之敌，亦经我猛击，退回平山。

二、正太方面之敌约三千余人，从十月二日开始自盂县向柏兰镇进犯，在该地以西之耿家庄附近，被我全部围困于山沟中，血战八昼夜，敌伤亡极大，残部乘黄昏突围，向西北溃窜。

三、同蒲方面，十月五日有步骑炮联合之敌约七千人，由定襄以北分三路向五台进犯，经我军奋勇迎击，敌势大挫。傍晚敌由原平增援，并有敌机毒弹，大肆轰炸，我军正与晋西北友军相配合，争取夹击歼灭的胜利。

四、平绥以南方面，自九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日止，我军与步骑炮联合之敌四千余，并飞机六七架，在晋北直峪、冯家沟、聂家沟、晏力村、奇山地域，苦战六昼夜，毙敌八百余，将敌全部击溃。

据各方面战斗经过看来，证明晋察冀边区已经用他们自己的力量部分的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粉碎敌人围攻的初步胜利。我们相信，以华北抗日力量整个的配合，必可以用冀中的力量，西向以夹击平汉线上之敌；用晋东南的力量，北向以夹击正太线上之敌；用晋西的力量，东向以夹击同蒲线上之敌；用冀热边、晋察边、晋绥边游击队的积极动作，可以分散五台以北、平绥以南之敌。只有巩固抗日力量，在单一的作战意旨之下，俨如身之与臂，臂之与指一样的配合起来、呼应起来，才能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这应该成为整个抗战军队的经验。

我们也可以相信，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和军队，在一年多的战争中，深刻地认识到抗战全面性的重要，及战争全面性的领导是战胜日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每一战斗，只有充分发挥全民族的力量(包含有生力量与无生力量)，才能战胜强寇。同时，也只有领导机关，普遍而深刻的懂得全面性的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全民族的力量。我们看到晋察冀边区，在粉碎敌人的进攻中，所有一切的政治动员、组织动员，以至于空室清野、填井、藏粮等工作，都

在边区统一计划之下进行的。依边区来讯：我各重要市镇地区，空室清野工作已进行完毕，将予敌以严重打击。又讯：我晋察冀边区及其周围的广大民众和军队，已充分动员，坚决与敌周旋，将给予疯狂的敌军以粉碎的打击。足见指导战争，不仅仅着重在武装力量的运用，同时也要注意到其他力量有机的配合，以全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点同样应该成为整个抗战军队的经验。

晋察冀边区的人民和军队，为着粉碎敌人的进攻，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这一胜利，提高了边区人民和军队争取彻底胜利的信心，同时也提高了华北军民以及所有沦陷区域的军民坚持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的勇气和信心。当第三期抗战的严重关头，敌骑已迫近了我们武汉，阵地是一线一线的坚持，时间是一天一天的争取。我们要在这些时间中，在各方面来生长力量；我们要很好的运用这些力量，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只有力量，只有时间，才能战胜强寇，因为强寇已经愈战愈弱了。胜利者只有我们优秀而和平的中华民族！

注 释

[1]绥即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察即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3]热即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4]一九三七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两地分别成立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同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者为统一华北各地的伪政权，又将平、津两地的维持会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简称临时政府，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敌占区和平、津两个市。

[5]这段话的新译文是：“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8页）。

[6]崞县即今山西省原平县。

论南浔路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

据中央社德安十日上午九时电讯：德安西方敌军第一六师团与一一师团各一旅团，盘踞万家岭、张姑山一带高地，经我薛兵团[1]自七日下午六时开始围攻后，八、九两日发生激战，至九日晚敌军后路断绝，顿呈崩溃动摇之象。我军奋勇猛攻，连将王家山、老虎尖克复，并于当晚将敌军包围成功，我军彻夜联合围击，敌军万余人全部被我歼灭。敌军遗尸满野，抛弃枪弹无算，确数正在清查中，闻机枪已在千数以上，其他可知。敌残部约二百余，向北方杨坊街逃窜，我军已派队尾追中。

薛兵团以其灵活的使用兵力，获得了南浔路方面伟大的胜利，消灭了敌军第一六师团及一一师团四个联队的兵力，转变了江南战线严重的形势，这一胜利，不仅兴奋了江南战线上的抗战军队，给予胜利的信心，并且兴奋了全国军民，只要作战指导，能够巧妙的使用兵力，日本强盗是不难战胜的，最后胜利是不难争取的。

南浔路伟大的胜利是怎样获得的呢？一方面是敌寇冒险的深入，另一方面是我军能够机动的不失时机的给敌以夹击的歼灭战。

这一胜利教训了敌人，如果不顾一切的使用锥形突击，一意猛进，必然受到中国军队严重的打击，另一方面教训了中国军队，当敌人不顾一切冒险前进的时候，是给我军以夹击歼灭的机会。

现在用中国人民所习知的口气来说吧：消灭敌人的“锥形”突击，只有“口袋”战术。一年来的抗战，敌军是惯用锥形突击的战术，针对着我军配置上的薄弱部分，给我军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又因为我军在战场上，缺乏协同一致的行动，客观上使敌之锥形突击容易得到成功。由于此次南浔路作战的胜利，证明我军只要能够协同一致，如身之与臂、臂之与指，趁敌军冒险深入的时候，是能够给敌以两翼侧击的歼灭，这正是中国留传的“口袋”战术，把敌人消灭在口袋的内面。口袋战术的胜利同样证明中国旧时兵略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的原则。这就是说，当敌军以大力突进的方面，我只以较小的兵力钳制之，而以主力部队从敌之两侧活动；因为敌之锥形突击，其两侧正是非常空虚的方面，我军得以侧击致胜。在这里，同时证明，只有乘敌人薄弱方面进行坚决的突击，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才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否则单纯防御，节节设防，只有消耗我力，于敌只是物质的消费而已，不能大量歼灭敌人，达到持久消耗的目的。只有坚决的出击，包围或迂回敌之翼侧而突击之，才能获得我们所预期的胜利。这是南浔以西胜利给予我军的教训之一。

但是南浔方面此次胜利所给予我们的另一教训，是敌人一切迂回我军的战斗，都不应仓皇溃退，相反的应予敌以坚决的对抗迂回，才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敌军此次以我兵团之间的接合部，以为是阵地的弱点，竟欲以一六、一一师团四联队兵力，从各部队之间的复杂的接合部，进行其素所惯习的锥形突击，实施其两翼迂回。然而薛兵团的胜利，便在于能够善于各

一儿二八年九月下旬至十月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同日军进行的武汉会战中，于南昌至九江铁路北段西侧的万家岭地区，歼灭日军第一六师团一部，约数千。本文是叶剑英就此次作战的胜利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

部队的协同动作，进行对抗的迂回，对敌之迂回部队，给予坚决的歼灭。这是南浔以西胜利给予我军的另一教训。

南浔以西胜利给予我军的又一教训，便是在各战役中，正面堵击的部队和在敌侧后方截击夹击的部队应密切地配合联系起来

来，例如一期抗战在山西的忻口战役[2]和平型关战役[3]，八路军达成完全截断敌军后方联络和消灭敌军后尾兵团的任务，在徐州

战役[4]汤集团军[5]亦能将敌军后方联络线完全截断，以致取得小的胜利或持久作战。这次南浔以西的胜利，的确发挥并且超过了忻口、平型关、徐州等战役的优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收获了更大的歼灭效果。这是南浔以西胜利给予我军的又一教训。

最后，南浔方面的胜利证明：一切战术的动作，没有群众的配合，则不能得到军队所预期的目的，因为群众不拥护我军，则行动不能秘密，突击不能是突然的。要做到军队行动得到群众拥护，非军队本身有严肃的军纪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工作不可。在这里，自然显示出薛兵团所指挥的军队，有模范的政治工作，足为其他友军所矜式；这是南浔以西胜利给予我军的政治教训。

南浔方面的战斗是光荣的胜利了，但不能说已经解决整个的战役任务。只有全军一致的争取继续的胜利，特别是保卫大冶、通山以及粤汉路方面的胜利，才能转移保卫大武汉的战局。

这一南浔以西的伟大胜利，恰恰是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国庆节的前夜和拂晓取得的，这是我薛兵团所指挥的英勇将士给予纪念双十、保卫大武汉的最光荣、最隆重的礼物。我保卫大武汉的各线将士，我全国一切抗战的军队，闻风兴起吧，继续南浔方面光荣的胜利，保卫我们铁的武汉！

注 释

[1]薛兵团指薛岳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一兵团。

[2]忻口战役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战役过程中，八路军在敌人的侧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有力地配合了会战的进行。

[3] 国民党第二战区原定于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以八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出击平型关左侧团城口的日军，并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但由于阎锡山等战区负责人对平型关的守、弃举棋不定，致使军心涣散，斗志动摇，虽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竟不敢与日军交战。只有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执行命令，英勇奋战，在平型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

[4]徐州战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合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5]汤集团军指汤恩伯任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

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新局面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法西斯就是战争。我们的抗战是用战争来反对法西斯的武装侵略。这就是我们目前国内生活的主要内容。自日本法西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侵占东北后，直到“七七”事变，才发动全国一致的坚决抗战。我们的抗战现已成为全世界反侵略的主要战场。中日两国虽然同样是进行战争，可是在我们这方面的意义却不同。我们不是侵略的反历史进步的战争，我们是进行的反侵略的为争取民族解放及人类和平的战争，是有全国人民拥护、全世界和平人民援助的正义战争。但因我们是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武器装备均比敌人落后，我们就要从战争中来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抗战以来，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这进步不仅是军事方面。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次战争，敌人给我们全国上下以亡国之威胁。我们主要的城市和广大的土地被占领，无数的民众被蹂躏、被屠杀，甚至于对我被俘虏的伤兵也施以最残暴的待遇，重伤的兵士都被杀了，轻伤的兵士被迫着做苦工，如南京沦陷后俘虏则无条件杀戮，以至布菌、放毒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情形下，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从抗战求生便是屈辱而死。

这种生死的斗争，就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这些进步是什么呢？

(一) 空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十年前国共两党虽然有过一次合作，但那时的统一战线，其包涵的阶层成份没有这么广泛。这回，全国所有各阶层各党派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都参加了统一战线。比方在沦陷区中，有许多地主自动拿出钱来发动游击战争，有些是自动减租减息[1]，就是最显著的证明。这都是为了抗战才形成的统一战线。(二) 空前的政府的统一。辛亥革命以来，直到抗战以前为止，我国虽然一样到处飘着国旗，而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总是时常有许多磨擦，党派与党派的无数冲突，更是错综复杂之至。这种形势在抗战以后也就消释了，因为这些国内矛盾被压低以至消灭于中日武装冲突之下了。(三) 军队的统一。为了抗战，从前的封建残余势力所把持的军事割据，收税庸兵，制度不一，这现象没有了。因为从私人的军队转化为国家的军队，这是抗战以后才有的。(四) 抗战领袖的形成。这对抗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里附带说一下我们对蒋先生的了解。西安事变以前及当时，我们即认为蒋先生乃是全国抗战的领袖，因为今天真正要完成民族革命首先必须抗日，而要集中和指挥这个抗日力量，必须有一个领导全国抗战的领袖，现在事实证明蒋先生能领导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所以，形成抗战领袖，是抗日战争发展中的必然的结果，而抗战领袖的形成，更增强抗战的力量。(五) 政治部之建立。全国军队如果是没有政治工作，必不能在政治上将思想各异之兵民坚固团结为一个整体，而抗战力量即建立于这个坚固的团结之上。所以要发动全体人民参加抗战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需加强对民众、对士兵的政治工作。抗战以后，成立政治部，其意义和作用就在此。除上面指出的各点外，如国民参政会之成立，抗战建国纲领[2]之颁布等等，也是表示政治上很大的进步。许多人怀疑抗战期中民众是否有应得

这是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于长沙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的演讲。

的民主自由？又有人怀疑抗战期中民众应否有必要与叫能的生活改善？其实这些问题在纲领中都已解答得很清楚。各党派都在这个抗战建国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合法存活着。所有这些都是进步的证明。这许多进步，提高了抗战力量，而抗战力量的提高，又辩证地促进了这些政治的进步。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进步还未能配合客观形势的发展，即是说这些进步还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若干障碍进步的地方，仍然存在着，这些东西即：（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间，仍然有一些动摇悲观的分子。（二）在中国的托派分子[3]们至今日为止，还是根本反对抗战、反对进步势力的。他们不知道集中全民族生动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他们喊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漂亮口号以减弱对日的力量。他们破坏抗日工作，破坏统一战线，各处乱钻的阴谋捣乱，企图钻进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或钻进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甚至公开“反蒋”。他们已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人民的公敌，日寇的工具。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上面所说的悲观分子以及一些坚持成见的顽固分子，恰好被托派所利用以破坏民族的团结。他们对于新的环境新的条件之忽视，都成为障碍进步的绊脚石，实为遗憾。大家晓得抗日必须团结，团结可以使抗战力量增大，但只有我们整个国家在政治上进步，才能使力量团结，继续抗战。

但我们并不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障碍进步的东西存在而悲观。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在抗战过程中，战争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改善一切。抗战愈坚持，一切不适合于抗战要求的東西自然失掉存在的价值。我们坚决相信有一个时期，在抗战走到更坚决的阶段中，那些动摇的中间分子，不能够长久的徘徊歧路，必须择定一条道路，旗帜分明的或投入维持会的阵营中，或转向抗战力量中来。但我们主观的努力，是要争取绝大多数人民参加抗战，这是要随时间的进展而进展的。因此，抗战必须坚持。

其次，我们再看战争爆发后敌人的情形。（一）人力方面。战争的消耗，双方都颇为惨重的，它不但损害我们，也损害敌人自己。敌人对我作战，因战争而动员的人员，在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以上。“七七”事变一周年，日寇还只有三十五万的死伤，最近四个月以来经过武汉保卫战[4]，日寇死伤在四十万左右。这是我们战斗力量提高的证明。如果再继续作战下去，敌人人力的消耗，必然要到无力支持的时候。（二）财力方面。在战争开始的时期内，敌人一天里战费消耗已是一千万，现在每天要消耗二千万了，这些战费都是向劳苦群众剥削而来的。现在，更设法发行六十万万的战时公债了。日本人民大众在压榨之下呻吟着，捐税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业物价指数六月间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二，工业减低，农业品跌价[5]，这只有使人民生活一天天的恶化。这些情形首先从人民影响到士兵，所以在日本国内正展开着各种各样的反战方式：自杀，逃避或者自己弄成疾病。此外，兵士家属的阻车卧轨，公开游行等，更证明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高涨；同时又从国内影响到国外，在战场上士兵散发传单，伪军的反正等等随时可见。总之，从人力，财力及各方面看来，敌人的损害是不可掩饰的。敌人受了这种损害，增加了战争的困难。并证明侵略战争是怎样危害人民而为人民所反对，固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困难，但这种困难总是一天天向前增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日本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帝国主义，他们用几十年的准备想来灭亡中国，并且有人卖给它军火，最近的欧洲形势更予敌人以侵华的便利，因此，我们如果认为敌之困难已快要达到不能继续侵略的程度，这都是过分估计敌

人的困难。但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战争的长久支持下去，敌人的困难也是与日俱增的。

再次，更从国际方面看，日寇大举侵华，不但损害中国，损害自己，而且损害第三国的在华利益。今天的报纸消息，沪敌大使馆发言人声明：日方否认外人财产具有不可侵犯性，即可证明：敌人声明不保护驻华外侨的生命财产。敌人一方面侵略中国，另一方面，威胁着全世界。日本军阀以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迷梦自豪，这样，敌人威胁中国也威胁第三国，其结果一面引起我国之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引起国际的对我们同情和援助。如全世界人民的自动援华，抵制日货，及最近国联[6]通过盟约第十六条[7]等，即是事实。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何以“九一八”时候，国联即喊着要制裁，却不见实行，而这次的盟约第十六条便马上通过了呢？这即说明：我们如果抗战，如果坚持抗战，国际对我们的同情和援助必随而增加。十五个月以来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进展，日本消耗增大，中国战斗力提高，国际援助增进。这三者是贯串在一条坚持抗战的红线上。我们所以必须争取时间，所以必须坚持抗战，就是使长期抗战过程中，这个战争的时间的量的增加引起空间的质的变化。这是说明在长期抗战过程中战争的长期性之所以必须坚持。有人高喊三天亡国论，能人高喊速胜论。我们对于三天亡国论固然不同意，但对于孤注一掷的以速战求得速胜也不赞同。这次战争一定是残酷的长期的过程。战争的胜败决定在力与力之比，敌我力量经过某些时间，敌人力量向下削弱，我方力量向上增加，才能转变战争形势，转为反攻。有人说，这个长期过程究竟有限度吗？打到一百年吗？不。在这长期作战过程中仍可分别阶段和时间的。因为敌人是人少、地小、物产不丰，而我方是人多、地大、物博，但敌人却有优良武器、精悍士兵，而我方的一切，只有在抗战后才积极准备、在抗战中陆续改变、在抗战中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的国防计划不能像法国对付德国那样的作战方针，正如同法对德作战也不能像今日我们对日作战一样。法国对德不能不建筑坚固的国防工事——马其诺防线[8]，准备与德作战阵地战，拒止德军于国境以外。至于中国，与敌作战依各种条件研究起来，想筑成长城那样的国防线，拒敌于国门之外，在中国今天是不可能的。因此，抗战初期是敌人进攻，我们是运动防御，这样，必须经过一个长的过程于战争中消耗敌人力量。同时，日本对华作战，它不能无视英美和苏联。它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来应付其他第三国，特别是应付苏联。如果敌寇深入中国内地，在那样广泛的领域上，只能集中兵力于某几点，同时不能不放弃许多地区。所以，在敌寇占领区域即敌人后方，一定空出许多地方，我军容易在那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样就使敌后的游击战争日益普遍开展起来。敌后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日益扩大，它不断的牵制敌人兵力，破坏敌人后方联络，捣毁敌人伪组织，瓦解日伪军，一直到伪政府不能成立，汉奸无法存在，差不多否定了敌人用极大的牺牲所得来的胜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敌军愈深入，作战愈加困难，我军抗战愈久，战斗力愈加坚强。民众参加亦愈加广泛；加以内部作战地区全是山岳，使敌之继续深入部队为我军所迟滞和纠缠。敌人在此时期中，为了巩固其既得的胜利将要停止其不利的深入，不得不分出大部时间和兵力来应付其后方游击队。这时使敌人前后失据，疲于奔命，它必须拼全力来巩固平汉线粤汉线以东的地方。在原则上说：这是一个转变时期，为我们的战略转移攻势的有利时机。但是这个时机我们抓不住的，因为我们战争的准备，我们力量的增长，实在太慢了。所以我们的前

线在不固定的地带形成对峙，在敌人后方则艰苦支持，这就造成对峙的形式。在对峙时期中，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大大的准备一切反攻的力量，在有利地带和有利时机，使我们的抗战进入到战略反攻。大家明白：中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上有三个阶段，一为敌人进攻，我方防御；二为敌人保守，我军准备反攻；三为我方反攻，敌军败退。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9]是一战而亡之。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退出莫斯科，但主力未消灭，在退出后三十二天即行反攻，把拿破仑打得惨败而回[10]，这可说是两个阶段。中日战争不像意阿战争，亦不像俄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全部过程上，有这样一个中间阶段即彼此对峙的阶段——这中间阶段是全部发展过程中主要的一环，而抗战能否胜利的关键，也就在第二阶段。在这时期是否能够抓紧主要环节，克服困难，产生新力量，准备反攻，这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所以在这时，必须发展敌人后方的活动，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必须坚持抗战，支持前敌阵地；必须积极增加反攻力量；必须以抗战的继续胜利来争取国际援助。简单他说，有四个条件必须努力争取。即：敌前支持，敌后发展，我后准备，国外帮助。这个时期——是决定民族存亡的时期，目前已经步步地迫近了。

以上是对于抗日战争的全盘看法。现在：再说武汉和广州的问题。

对于放弃武汉问题的了解。这很分明的，当着武汉还成为粤汉、平汉、长江交通总汇的时候，当着武汉还是中国一个军事政治文化中心的时候，当着武汉还有许多人力、物力未迁移的时候，武汉应该保守的。但当着武汉已成为前线的时候，其价值即随时间、空间的变动而变动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在变动的观点上看事物。当广州沦陷，信阳失守，敌已逼近核心，我方人力物力已经转移，在这个时期，就无须把武汉当作心脏来保守了。这样一定有人问：为什么徐州还未放弃，便老早喊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这是因为徐州和武汉之间为中州平原地带，军事发展颇为迅速，所以徐州沦陷后必须立即准备保卫武汉。如果又有人问：既然武汉迟早要放弃，何以又来一套保卫武汉的经营呢？这是因为保卫武汉有着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及掩护人力物力迁移的重大意义！我们放弃某个据点是要取得应有代价的。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消耗敌人兵力在四十万左右，消耗敌人的军火财力更不可计数。我们的代价已经取得了，所以，在适当的时期，主动的放弃核心，保存主力，越到外围，坚持敌后作战，配备新的部署，这是正确的。武汉保卫应有三个步骤：首先消灭敌人在大别山、幕阜山之外，其次则消灭敌人于大别山、幕阜山之间，最后则从核心转到外围，包围并歼灭敌军于武汉湖沼地区。这是有整个计划的。而且对于难民的疏散、壮丁的迁徙、资财的搬走，以至建筑物的破坏等等，我们已经完成了，如像俄军对待拿破仑的办法，使敌人所得不是焦土，便是一个空城。我们的主力，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转移到外线上去继续抗战。大家明白，保持有生力量是继续抗战的主要条件，但有生力量不是消极的保持，而是要积极的发展。总之，对于武汉的放弃，我们并不悲观，也无须悲观，因为原先计划就是如此的。

其次说到广州。广州的放弃实在太快了。何以广州失守这样快呢？这是证实了广东当局：（一）未曾发动广东应有的力量去抗战；（二）对抗战指导原则的了解仅仅知道保全自己而不知道消耗敌人。倭寇人口不过七千万，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对敌作战中，敌我伤亡数目的对比虽然不能做到一比一或一比二，就是一比三，这个比例，也可以拼得最后胜利的。（三）对敌寇

字垣[11]下台便是日本对英态度的变动——将影响华南局势的警觉十分不够，这一教训太严重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三灶岛壮丁之偷渡杀敌，英勇牺牲；（二）南澳岛民众配合政府军作战，一度收复该岛；（三）最近惠州沦陷后，市民跑到广州要求政府发枪，参加抗战；（四）广州青年男女报名参加为保卫广州而战的有四万多；（五）中山县农民，在万顷沙击退敌军登陆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广州的群众，自动的要求抗战并能够抗战，广东民众是有为的。现在广州是沦陷了，我们并不能说广州沦陷于战局毫无影响，但从广州民众抗日之积极性上来看，他们实可以配合华南抗战的军队，给进扰华南的敌人以重大的打击。至少，他们能够用游击方式牵制敌人，不至很快的向粤东、粤北、粤西蔓延。

综上所述，武汉、广州虽已沦陷，但不必悲观。因为整个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今后能否继续抗战。我们是否会中途妥协呢？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否有利于我们继续取得外援呢？这些问题要加以回答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我们是否能够继续抗战呢？完全能够的。因为：（一）我们的主力并未消灭，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二）我们还有广大领土和有利于抗战的地区——平汉线、粤汉线东西两侧。（三）敌人后方有广大的游击运动和抗日根据地，平汉线、粤汉线以西为我预定与敌决战地带，这是有利于我方作战的地域。决战必须在此线以西，因为现代的军队必须在现代的地区上作战，现代的部队必须在铁路线、公路线及平原地带才能发挥效能，而我们的公路、铁路及平原大多偏于平汉线、粤汉线以东。不能否认，在抗战以前，我们建设的交通网，无意中做成有利于敌的局面，但是在平汉线、粤汉线以西，地理交通条件将赋予我们以有利的作战形势，所以，决战必须在西线。（四）统帅的抗战决心是一贯到底的——这一点在继续抗战中更可以无限的发展抗战力量。第二反过来看，我们会中途和平妥协吗？我认为：（一）发动抗战到今日，全国军民的仇日心理，已普遍发展，全国抗日力量日益增长，这使和平妥协很难实现。（二）在抗战中教育了人民，教育了军队，全国上下得到无数经验，使我们深切理解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得到最后胜利。这一点已足说明抗战能够坚持。抗战愈坚持，妥协愈困难，妥协愈困难则抗战愈能继续。抗战愈继续，新的力量、新的有利条件即会产生出来，并且迫使这个抗战的时局不得不向前继续开展。第三，国际形势是否会有利于敌人使和平空气更加浓密呢？我们看最近英、意大使不能不辟和平的谣言，这是因为我们是继续抗战。这已经够说明只要我们英勇的继续抗战下去，我们国际地位是会一天天提高的。我们晓得，日本对于中国，决无法一口吞下去，这期间需要适可而止的休息一会儿。远东战争的延长，就要影响到太平洋上有关系的几个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华的利益。日本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自己要适可而止的休息一会儿，所以，日本对英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不敢与英敌对，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对英加以威胁。为了必须威胁，所以敌人敢于趁目前欧局混乱而侵入华南，为了不敢与英敌对，日本又时而有亲英的外交活动。至于英国，这个老绅士的国家的的外交姿态是摇摆不定的。看到中日战争，如果日本打胜中国，于己不利，就帮助中国；但如果中国打胜了日本，中国强盛起来，于己也无好处，则帮助即随而弛缓。因此，中日的战争是随着国际的矛盾发展而发展，但国际间英日的矛盾却因中日战争的变化而变化。显然的，最近广州、武汉相继沦陷，使英日矛盾更趋尖锐，英国在远东利益受到更大的威胁，日本独霸亚洲的野心更大。日本军阀认为英

国的所谓“在华利益”，已经落在日本夹袋之中，英国如果想维持其在华利益，必须向日本低头，这样，迫使广州武汉沦陷后的英国外交活动更形复杂而困难了。英国继续帮助中国抗战的必要性也就增加了。还有，是中国因抗战而使中苏亲密这一事实。苏联二十年的建设，使得“谁胜谁？”的问题，即到底是资本主义胜利呢还是社会主义胜利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已经完全解决了。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到国际舞台，要在国际范围内来解决谁胜谁的问题，要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了。中国的抗战胜利，是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因此，毫无疑问，苏联必然是援助我们的。所以说国际形势是有益于我们的，继续取得外援自然不成问题，问题在我们应该努力坚持持久战以争取更多的外援。这里连带说到内政问题，必须内政修明而外交才能得到更多援助，就是说必须国内团结统一，肃清动摇妥协和投降分子，坚持继续抗战，然后国外的援助才会继续增高。比如医生对病人一样，如果根本是垂死的人或无药可医，那谁愿意去医他呢？

综合前面所说，我们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因为：（一）主力不会消灭；（二）广大领土的保持和军队转移于对我有利的作战地域；（三）统帅抗战的决心；（四）国际继续帮助我们等等。投降妥协的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根绝，但困难是增加了。因此，抗战前途虽尚有许多困难，但我们必须认定这些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

最后再说到最近日本的军事动向，可能是要打通粤汉、平汉线及陇海线的一部，但主力方向是朝着什么地方呢？在此寒冬时期，雪地战斗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最近的敌军主力方向可能的会向华南发展。尤其可能的是由武汉向南，广州向北，自浙赣向西三路会攻湖南。在长沙工作的同志们，敌人的刀尖是已经向着我们进攻，只有尽量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只有不断削弱敌人的力量，产生并发扬自己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紧紧握住战争的转变点，只有这样才能转化自己从劣势变为优势以反攻消灭敌人！这战争是长期的，痛苦的，但必须设法减缩这个过程，很快的改造自己以应付新的时机的来到。不要老是划着历史的龟步在那里慢慢的爬。坚持抗战，新的形势正有利于我们。

注 释

[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代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

[2]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3]托派分子，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

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间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4]武汉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为准备进攻武汉。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武胜关方向实施迂回，兵分两路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5]这里指战时工业品价格急剧上涨后造成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扩大。

[6]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体，一九二一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布解散。

[7]盟约第十六条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通过的国联盟约条款之一。它规定了国联会员国对违反盟约进行战争的会员国所采取的制裁行动。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政府曾要求国联对日采取制裁，但由于英法等国的阻挠，未能通过。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在世界舆论压力日增和英法日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通过了同意中国要求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对日实行制裁的决议，规定各会员国应个别决定依盟约采取步骤。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没有任何约束力。

[8]马其诺防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一年五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9]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战争侵占了阿比西尼亚。

[10]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二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11]字垣即宇垣一成，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九月任日本近卫内阁外务大臣，在职期间企图通过英、美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谈”。

论日军的跳跃作战 (一九三九年六月四日)

敌军侵略，在策略上自汪精卫[1]出走后，基本上仍然没有改变。但整个战线上的活动，已没有从前的积极，也没有像最初发动侵略时期如京沪会战[2]时候那样大规模的作战，所以在最近时期内某些战线比较沉寂。然而，军事进攻虽沉寂，而政治进攻却加紧了。日本军阀得到汪精卫供给许多中国真实情报之后，正利用党与党之间的间隙，中央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地方与地方中间的间隙，实行政治的进攻，实行各种破坏工作，使全国政治上起离心作用，并使之严重化，以便利他的继续侵略，灭亡中国。

现在第一个问题，是日本军阀的战略方针有没有新的改变？从战略原则上一般说来，他们进攻目标有二：（1）我们的军队特别是其主力；（2）中心城市。过去日军曾集中力量，向一个中心城市进攻，像上海、南京、武汉，企图夺取政治经济中心，求得胜利，屈服中国。其次，是以我军队主力所在地为目标，尽可能的作迂回歼灭战，企图消灭我们有生力量。根据过去的作战事实，日军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战略方针，现在看来已经是失败了的，然而敌军采择这一方针，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这种前例。比如楚汉相争[3]，先入关者王。当时据日寇的估计，以

为南京是全国首都，若南京陷落，便可使我们屈服。其次论到乡村

与城市关系。照欧美社会情形看来，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人口集中地，乡村只能依附城市的。日寇用这种眼光来观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因此敌人以城市作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但他们可错了。第一，今天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同于旧时的封建时代，以为夺取了京城，迫走了皇帝，就能统治天下。现在，中国是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进步时期，而且有进步的政党，推动着时局。第二，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否与欧美一样呢？不是的。在欧美如法国有人说：一个巴黎等于半个法国。但中国情形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地大物博，物资人口均散布在乡村，日军虽然占领了城市，反因我们力量分散在乡村，可以把城市包围在广大的乡村之中，使敌人孤立起来。由于敌人失败的教训，使日军明白，徒然用全力进攻城市，已不能完成政治任务。于是不能不转移目标，寻找我军主力，企图与我主力决战。在作战上采用迂回包围歼灭我们。但是这一着也没有成功。如武汉会战[4]，日军使用在江南的兵力，只有八九个师团，而中国却有七十余个师与之抗战。在这样广大的地区进行运动战，敌军以这样少的兵力，是无法来歼灭我们的，因为他既要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正面，敌所能抽出兵力与我们作竞翼运动来包围我军的兵力就愈感不够了。欧战时候，德法都运用包围敌人的竞翼运动，一直延伸到海边，假使日军也和我军作延翼的竞赛的话，那他的薄弱且暴露的翼侧，将受到我们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作战并非不知道迂回包围的利益，只是他兵力寡少，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战果而已。今天我们主力已隐蔽在蜿蜒的山岳地带待机突击，我们只以一部分兵力深入到日军后方，一部分在最前线与敌作运动战，因此敌军已找不到我军主力的所在。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敌军目前的作战方针，中心城市既不作为目标，军

这是叶剑英对中国国际新闻记者的谈话。

队主力也找不到，这样就使敌人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这是敌人第一个困难。第二，日军兵力不够，从沿海到内地，从西北到西南，这样宽大的地面都成广泛的战场。兵力过于分散，其后方又有我游击队活动，也牵制敌人不少的兵力，因此，敌军便不能集结主力继续作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所谓战略上大规模的进攻，就是说，假使敌军主力用在华北，那同时就要在华中、华南配置兵力进行助攻，这是敌人的兵力有限，不能办到的。因此，现在日军最多只能在战役上组织一个突击力量，一个突击方向。例如进攻南昌时，则其他方面就沉静下来，进攻襄樊时，其他方面差不多没有动作，不能配合。

然而有一个严重事实，对于作战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我国许多交通线，无论铁路、公路、水路，大都被敌人占领了。这一事实，给敌人以一种便利，敌人可以自由转用兵力，进行伺机的突击。这就是说，敌人在军事上，虽然有两种困难，却有一种便利。

在敌国内，自武汉会战后，总的说有三种意见：第一，不停止的进攻，求得彻底的解决；第二，以军事为掩护，积极地掠夺占领地区的富源；第三，继续沿交通线进攻，占领残余交通线。这第三种意见便是代表板垣、荒木的军事意见[5]，也是敌人在两种困难一重便利条件下所产生的战略上的变化。这种新的攻击作风，我们叫它做“跳跃作战”。像南昌的攻陷与襄樊的突击，都是这一新战略的实施。

从敌人进攻到现在，已在战略上迷失了方向，只是“投机性”的进攻，或者说以“战役行动代替了战略行动”的投机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充满了战略上没落的成分。敌人采取这个“跳跃的作战”的战略，有两个好处：

第一，从华北到华中到华南，沿江沿海这样广延的战线，我不可能处处设防，像法兰西沿着他的国境构筑一道完整的国防线一样，这在我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因为在军事配备上，容易暴露空隙与弱点，敌人也很容易找出我们的空隙与弱点，以迅速的攻击，取得便宜的胜利。在今天，敌人也需要这样便宜的胜利来掩饰国际上的视听，来刺激被长期的战争拖得力竭声嘶的敌国民众。

第二，他保存着交通线的便利，可以迅速地调动兵力，无有定向的向全面中某一点作跳跃进攻。造成疲劳我全线兵力的效果。此外，敌人的全面跳跃作战，还可以用少数兵力进攻我多数

兵力。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用数字计算做个比方。我在华北布置二十个师，华中、华南各二十个师。敌若以二十个师来犯华中时，我华北、华南两地军队，因交通限制无法应援，仅华中二十个师单独对抗。将来敌转移兵方向华北或华南时亦然，这就是说，我六十个师的兵力只能当作二十个师用。而敌之二十个师则可利用交通工具迅速调动，自由进犯我华北、华中、华南。这就是说敌二十个师可能当作六十个师用。

敌人所采取的新的作战形式，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

第一，我们首先要认识敌人这一新战略，是在他失败之后，失掉了战略方向中间所产生出来的，因此不能将它的价值估计得太高。

第二、在战略上没有方向的跳跃进攻，虽然像沉在海水里的潜水艇，不易发现他进攻的动向，但他的跳跃作战是有一个依存条件的，那就是交通工具；任他怎样无定的跳跃，他总离不开交通路线。像进攻南昌是依凭南昌铁路、南万公路与修水航线；像进攻襄樊是利用钟京公路、汉宜公路以及随枣公路等线。既然敌人的跳跃作战依存于交通线，则主要的判断与兵力的配备

我们还是有依凭的。

第三，我们不要被动地跟着敌人跳跃，要在每一个作战地区，配备着能够独立抵御敌人跳跃进攻的兵力。已故的军事家蒋百里[6]先生说得好：“英雄跳，我们笑！”我们要以“静”的“笑”来制服敌人“动”的“跳”。就是说，当敌人在他依存的交通条件下，发动了某一点的“跳跃进攻”时，我们要在敌所利用的交通线的两边集中兵力，静待敌“动”时予敌以迎头痛击。这是兵家所说“以静制动”的实施。

第四，利用敌人兵力不够，在作战上只能发动一点进攻的缺点，我运用大部队或小部队，经常以运动战的形式出击敌军，扰乱与杀伤敌部队兵力，这叫做“以动制静”。

第五，加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努力达到“破坏重于作战”（这是我们所提出的一个口号）的任务，粉碎敌人“跳跃作战”的依存条件——交通路线，逼迫敌人改换装备。他为了适应山地战放弃现代化的装备时，则跳跃作战将失去效用。

注释

[1]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昆明至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2]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淞沪战役开始。八月二十三日，日军两个师团从上海以北吴淞至浏河一线的长江沿岸登陆，向西南方向迂回上海市区，与中国军队在浏河、罗店、刘行、大场、江湾一线展开激战。九月下旬以后，中日双方陆续增调援军，战斗呈胶着状态。十月十六日，日军在刘行突破守军阵地，二十六日攻占大场、苏州河以北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南岸。十一月五日，日军三个师团在杭州湾的金山卫一带登陆，从背后包抄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九日，日军攻占松江，直指上海以西的青浦、安亭，守军因后路受到威胁被迫全线撤退，十一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军长驱直入，于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南京。

[3]楚汉相争指项羽和刘邦争夺封建统治权的战争。公元前二六年秦王朝灭亡后，按当句“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首先入关中攻克秦都咸阳的刘邦本应领有关中之地，但项羽背弃诺言，自立为西楚霸王，将刘邦封为汉王，并分封了十七个王。不久，刘邦自汉中起兵攻楚，楚汉双方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公元前二二年，刘邦在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决战中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统一的汉王朝。

[4]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武汉。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式胜关方向实施迂回，兵分两路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5]板垣即板垣征四郎，日本战厄。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

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第五师团师团长等职。当时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即荒木贞夫，日本战犯。曾积极专与侵略中目的活动，是日本“皇道派”法西斯军人的领袖。历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陆军大臣、最高军事参议官等职。当时任日本文部大臣。板垣、荒木的军事意见，即将以前日军沿交通线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改变为分散配制、逐步推进，由点线扩大力面的占领。

[6]蒋百里，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陆军大学代校长等职。其军事著作大部收入《蒋百里先生全集》。

正规军当前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

敌寇侵华的终极目的，是大陆政策的实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自卢沟桥燃烧起中华民族解放的战火以后，战争在非常宽广的战场上，整整的经过了两个年头。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以无情的考验，把中国的历史，推进了好几十年！

战争永远的是两个活力的冲突，而军事行动的当前目的，是在于歼灭敌军战斗力，占领敌国土地，直至屈服敌国的战斗意志。中国两年抗战说明：我们的战斗力是愈战愈强，我们的战斗意志是愈战愈坚定，我们的国土只是丧失了一些线和点。

敌寇方面在战争第一年度，使用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第二年度，已增至三十一个师团和三个骑兵旅；第一年度向我进展一千八百公里，第二年度只进三百一十公里。可见敌军益增，战果益小，其战斗力之衰退，已为事实所证明。

敌力之衰退，固然是受着敌寇帝国主义野蛮侵略所引起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影响，而主要的是为我愈战愈强之师所抗击的结果。因此，敌军战斗意志不是也不能是愈战愈强的。敌军在前线上反战思潮的普遍化，以至在战斗部队中反战行为不断发生，这是与敌国内政治的动荡联系着的。

如上述数目字所指出的，敌寇在两年中，虽然向我前进了二

千一百一十公里。可是谁笑得最后，才算笑得最好。这种没有胜利的凯旋，已经逐渐的为我军英勇的游击战所否定了。敌寇长驱进展的另一面，恰恰给我们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的可能，给我们造成战略决战的有利态势。

两年战争无情的指出，敌寇企图一气走到终极的目的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已经是不可能了。战争已属长期，鹿尚不知死于谁手？从这一念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敌寇在到达其终极目的的征途上，安置了一个中间的目标。这个中间目标，意味着奄有中国之半，再来一个“佛朗哥”[1]。口号是“以战养战”，实质是“以华制华”。

从这个基本企图出发，敌寇如近卫[2]之流，便不止一次的发出一些和平引诱的“嚶嚶之鸣”，果然求到一批“精卫[3]之友”，同时又怂恿国际投降主义者，奔走劝降，果然又来一个太平洋调停会议[4]，我们叫它是“东方慕尼黑”。

敌寇把重兵移向后方，进行所谓分区的“扫荡”，只以一部进行伺隙的进攻，维持前线，企图肃清占领区抗日力量，压迫、欺骗与麻醉占领区人民，组织成为敌寇的社会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所谓新秩序，成立所谓新政权。同时，积极威胁英法，要英法不仅放弃援华抗日，而且要进一步的援日制华，协同敌寇建立东亚新秩序。

敌寇已疲于中国，又战于苏蒙[5]。敌以第二十二师团全部，另附一个步兵团。第三、第四战车团及六个骑兵团，配合大批空军进犯外蒙边境，已经受到严重打击，而战事依然在扩大着。

根据以上所述各方面情况，用军事观点看来，可以知道，以疲弊之敌，应多方面作战，加上敌先天不足兵力不够的条件，可以肯定的说，敌在前线

进攻之力虽较微弱，然而我在敌后的斗争则大大的加紧了！

战争是全面的，胜败是整个的。两年英勇的抗战证明，正因

注 释

[1]佛朗哥，原为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武装叛乱。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2]近卫即近卫文麿，日本战犯。一九三七年任日本政府总理大臣。同年七月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宣言，联合德、意法西斯缔结“防共轴心”协定。一九三八年先后三次发表诱胁蒋介石投降、灭亡中国的声明。

[3]精卫即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昆明至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4]一九三九年初，英法等国由于欧洲局势的牵制，无力东顾，美国亦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同日本妥协，遂策划召开对日绥靖、牺牲中国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同年七月二十四日，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出卖中国利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后由于欧洲大战爆发，英、美国同日本的矛盾无法协调，计划中的太平洋国际会议终于流产。后来把这种袭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方式，称为远东慕尼黑。

[5]这里指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蒙边境诺门坎挑起的大规模的民苏武装冲突。为我军游击战在敌后给敌以严重的打击，吸引了敌军回向后方，因此就拖住了敌人前进之尾，这是游击战已经光荣的达到了协助正规军作战的战略任务，给正规军以坚守阵线、趁时整练之机，以为反攻之用。今抗战重心，移向敌后。如果说，中日战争的胜败，是决定于将来战略决战的胜败，那末同时应该说，战略上决战的胜败，是预决于敌人后方全部斗争的胜败。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的任务，应该是积极的机动的抓住当前的良机，进行胜利的出击。采用灵活的战术，遇大敌则钳制，遇劲敌则打击，遇小敌则歼灭。一面可以帮助在敌人后方的作战，一面可以把整个战线往前推进，与敌争取已失的空间，造成战略反攻有利的态势。只有前线的积极战斗，才能顺利的完成敌后坚持的政治任务；只有在敌人后方的斗争得到胜利，才能顺利的完成战略反攻的历史任务。因为抗战是全面的，胜败是整个的。如果坐山观战，那就等于自毙！

由此可以明了敌寇在这一时期，正为着达到其中间目标而展开了各方面的战斗。前线伺机进取，后方积极“扫荡”，沿海择要占领，加强经济封锁，积极威胁英法，同时牵制苏联，建立新的秩序，组织新的政权。凡此一切，都是为着达到其最终目的，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所必经途径。战争正以新的形式，在别的方面开展着。近视者翊翊然便以为敌已无力进取，胜利可以不战而获，这种轻敌观念是和怕敌观念一样有害的。

因此认识当前战争的环境，积极提高前线的士气，组织各个战线的局部的反攻，争取许多小的胜利，配合敌人后方艰苦的斗争，是正规军当前的光荣的任务。

飞翔在暴风雨中的无数的海燕，在敌人后方，勇猛的飞掠着。同时也在叫喊着以求其前线上英勇的伴侣。让那些投降的企鹅，畏缩地在屈辱的崖岸底下，躲藏它肥胖的身体吧，只有正规战与游击战在时间上及空间上适切的

配合，才能战胜凶恶的敌寇。

游击战线上目前的军事问题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当前的敌人正以大力回向后方，进行积极的“扫荡”，企图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略。依敌人自己吹的“牛皮”看来，似乎在山西和山东，打得特别热闹。这就证明敌之“扫荡”，在战略上，首先是要集中兵力肃清华北，而肃清华北的步骤是先打山东，次打山西，然后“扫荡”河北。

华北地势，右泰山而左太行，中间拥抱着河北平原，交通四达，人民殷富。两年抗战，华北各地坚持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依托广大群众积极的拥护，颇为发展。其发展形势是把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与太行、五台、泰山、雾灵、大青各山地游击战相配合，深入敌后，威胁平津。

因此，华北作战形势，从战略观点看来，要保障西北必先巩固山西，欲保障山西必须坚决的进军河北，而河北平原游击战的支持，必须得到太行与泰山两条山脉的游击战相呼应。

也就是说，华北局面是整个的。山西、山东、河北的斗争，是互相配合，不能分割的。以太行及泰山两山，作为华北“螃蟹”的“双螯”，护卫着河北平原，形成整个的巩固的态势，只有这样才能在华北与当前“扫荡”之敌坚持抗战。

从敌军最近行动上看来，敌在山西正以主力围攻晋东南，企图进出晋西南三角区域，渡河西向。其力量配置似是：

- 一、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的军队，集结博爱，自南而北指向晋城；
- 二、以一八师团为主力的军队，在安泽、浮山一带，由西向东指向屯留；
- 三、以一九师团为主力的军队，在白晋公路北段，由北而南沿公路南下；
- 四、以独立第四旅团为主力的军队，集结辽县，由东北指向西南；
- 五、另以一部经东阳关，由东向西。

在上述情况下，我晋东南抗日部队，依太行山地，得民众协同，无疑的将给敌以有效的反击。但晋境之敌，分五路进攻晋东南，企图肃清太行山抗日游击队。从时间上看，是在敌军“扫荡”鲁南山地游击队，自告结束以后（敌自六月三日起便开始“扫荡”鲁南）。事实更加证明了，敌对华北作战，正是把华北形势作为一个“螃蟹”来决策的。其进攻步骤是先剪除“螃蟹”左右两螯——右泰山而左太行，同时也是先泰山而后太行，然后肃清河北。

这就是说，敌在华北作战，虽然已经尽可能的集中使用其兵力，可是对山东、山西、河北三省抗日军队的作战，是不能同时并举的，因为敌寇永远是兵力不足；

这就是说，假使要在策略上不犯错误，就必须发动并领导整个华北的抗日力量，配合着全国的抗日力量，给敌寇“扫荡”企图以打击，首先争取晋东南的伟大的胜利，以保卫山西，保卫华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来保障西北。

在今天这样一个艰苦的游击战线上，我们要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

只有给游击队以各种合理的自由的条件才有可能。

给游击队以动员群众的自由，使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不要怕民众有权，只有到了民众有权的时候，政府才会是有能的。

给游击队以建立根据地的自由，例如建立了山西抗日根据地，同时必须要建立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要知道在敌人后方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则不能达到驱逐与消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任务。仅有一个根据地，无周旋余地，也不能支持长期的斗争，完成政治的任务。

给游击队以收复失地的自由。敌人以小国少兵侵占我们广大的领土，许多战略要点、要地、要线固然要努力收复，就是许多间隙成为虚空，许多点线残敌极少，然而我正规军队早已远离，乡村秩序无人负责，一任匪盗纵横，群情惶惑；游击队也应机动地深入敌后，迅速收复，在那里组织民众，恢复政权，以充实敌后抗日力量，开展全面战争。

给游击队以向正规军发展的自由。只有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创造正规军，才能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

只有游击队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普遍地发展起来，正确地执行游击队所担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务，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

我们更进一步地研究游击战争中的战术问题，要注意到敌寇对我游击队的进攻，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敌寇在不断的进攻中，是不放过每一次失败的教训来改进其进攻的方式。试研究游击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作战方面的战斗技术，双方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现在把敌寇对我游击战研究和对策介绍几点，就可以警惕地知道敌人是怎样的努力来改进其反游击战术。

第一，敌寇对我游击战的对策，用敌人的话说：

一、化整为零，是华军被包围时一种脱出危险的手段。此时华军已走，民众尚未全跑，应即进行宣抚工作，其工作方法应是：

（一）选出中国通之工作人员随同应急要员中之搜查队，择要进行搜索。

（二）在部队中应附属宣抚班[1]，或从军先导员、从军僧侣、从军记者，以协助进行宣抚工作，恩威并济，使游击队员不能潜伏民间进行扰乱。

二、化零为整，是华军集结兵力袭击我军之弱点所采用之手段。其袭击目标，常常选择分散之我军、各种军需品屯集地、飞机场、各级指挥机关等。但华军游击队常与正规军相配合，成为正规军有力助手。

因此，我军应用装备完善、配备适当之快速部队，乘华军集合未整之际，选择良好目标而猛击之，但应注意勿为华军正规军所袭击。

三、旋磨打圈。华军游击活动，常在攻击我军正面之际，忽然转到我军背后或侧面突然袭击，以协助其正规军作战。当华军旋回攻袭之时，应派应急要员，运用高度机动力，勇敢进行截击，予以歼灭。

四、小群游击。小群游击为华军普遍采用的战术，系以最多十人为一群，除步枪外，并配有轻机关枪，潜伏于要地，我军通过时袭击之，若被我军发觉则分散退却。对付此小群游击，须强化应急要员的组织，使之质量优良、装备精良、小心精细、镇静从事，一旦遇警，即予歼灭。

五、掠夺粮械。华军常派游击队或便衣游击队掠取粮秣、强夺兵器，不能夺取时，常破坏之、毁弃之。因此，我兵站辎重输送部队，须特别注意与各大小队、警备部队以及各种特种编制之歼灭突击队取得联络。输送队出发前，应将护送距离、到达时间、经过道路等预为规定之。遭遇顽强之敌时，

可用毒粉瓦斯等掺于粮秣中，伪弃于敌，实施毒攻歼灭之。

第二，敌寇在“扫荡”时所采用的战术：

一、敌寇进行“扫荡”时，常常修复与新筑许多公路网，增筑并强化其据点群，使之星罗棋布、蛛网纵横，依据其公路与据点之进展，逐步缩小我军活动范围，并实行分区“扫荡”。

二、在交通线上组织流动巡查队，人数约等于一中队，昼夜不息的梭巡各据点，若发现我军游击队袭击时，各据点则分途应援，合围合击。

三、进“剿”时，多采用分进合击、夜行晓袭，在时间上颇能协同。在分途进“剿”时，其主力常不止一路，倾巢而出，后路空虚。进击中若某路发现我军时，则其他各路均向此目标转进，以收合击之效。

四、敌寇常轻装掩袭，有时伪装撤退，诱我追击，以伏兵打击我军。其运动部队常避开大道，走小路，采取曲线前进，以行包围或迂回。

五、敌军常在树上或屋顶放哨，公路上的桥梁常有伏兵，防我破坏。宿营时，常在夜间变换宿营地，避免我军夜袭。六、敌之通信联络，夜间用红绿信号枪，战斗时用旗语，排长对各班长则用记号指挥。每据点内设有袖珍无线电机，其通信联络颇为迅速。

七、沿江之敌则以兵舰、装甲汽船上下来往，巡查颇周。内河水浅，则以小划子加装摩托，行驶便捷。

第三，敌人据点的构成：

敌常利用巩固之独立民房，加以改造、构成据点。在墙根地平面上设枪眼；并在屋内墙根挖成狭小散兵壕，上有掩盖，另开地道与屋外交通，地道出口有数道散兵壕相贯通，并设掩盖；散兵壕外，遍布铁丝网或洋油箱，以便报警。据点侧防之散兵壕，通常距据点约五十米，途中有交通壕。房顶上有机枪掩体，设有瞭望哨、探照灯。每据点约容四五十人乃至百人不等，育值班的应急要员担任警备。

以上所述是关于敌人对我游击队作战的一些战斗动作，因而敌寇对游击战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

战争或战役的任务，要靠许多胜利的或不一定胜利的战斗来完成，虽然基本上是要积小胜为大胜。今天，我们把游击战术上的某些问题拿到敌人后方去，用来粉碎敌人“扫荡”的进攻，这就要求活跃在敌人后方的游击英雄们，要细心地研究两年来在敌人后方艰苦作战的经验，研究两年来敌我两军在游击战线上所发生的一些作战方式的变化，把握着正确的战略方针，灵活的指挥游击队作战，这样才能战胜敌人。

敌人正以大力“扫荡”山东、山西以至整个华北。目前形势是颇为紧张的，把正规战与游击战配合起来，把华中、华南游击战与华北游击战配合起来，争取敌人后方游击战的伟大胜利！

注 释

[1]宣抚班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机构。

论沦陷区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

经过两年多的抗战，全国军民已经清楚的看出，敌寇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各种困难，是在日益的增长着。这是在许多纪念“七七”事变二周年的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无须我们赘述的。

今天摆在全国军民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不仅要认识敌寇的困难，而且要加深敌寇的困难；不仅正确的认识敌方的困难。而且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困难、克服自己的困难。只有凭着举国一致的努力，从各方面来加深敌寇的困难，从各方面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才能争取战略上相持阶段的到来，顺利的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战局的关键就在这里。

目前的敌人，正在用一切力量，企图克服自己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够阻碍敌人使其不能克服困难，便是实际上加深敌人的困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不见敌人正在企图克服其困难，反而过分的估计敌人的困难，以为敌人已经无能为力，胜利可以从拖延政策上获得，那就无所谓当前的困难，便用不着克服当前的困难，结果是实际上增加我们的困难。

究竟敌人向着哪一方面来突破它目前的困难呢？无疑的是向着我们的沦陷区。在目前整个战争环境来说，我们的沦陷区，便是敌人的生命线。因此，敌人今天是用最大的力量来经营我们的沦陷区。

假使我们要研究敌人是怎样的来经营我们的沦陷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步骤：

第一，是“新秩序”的建立。在这里包含着对于敌后抗日力量的肃清，因此，分区“扫荡”的计划，便雷厉风行起来。其次是社会基础的建立，通过改良欺骗，威迫利诱，在各侵占区加紧的宣传和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再次是傀儡政权的组织，那些朝秦暮楚的沐冠之猴也就汹汹拳拳的准备着自己的粉墨，待机登场了。

第二，是顺利的国际环境的造成。在这里：是包含着外蒙[1]挑战的发动，企图以战争来破坏英法苏的谈判，因为这一谈判的成功，便是宣布侵略者的死刑；同时也在企图着从东方来牵制苏联，以造成希特勒进占但泽[2]、并吞波兰的顺利条件。侵略者在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挑战，都吸引着英法，使其不能分力东顾。这样也就便于日寇在东方横行无忌。在这种环境下面，日寇对于英法施行无情的压迫，便易于成功。英法将不能不更服从于现实，采取更大的让步，因为敌人在盘算着：伪组织如何组成？伪国家有谁承认？

这就是“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具体内容。敌人如果实现了这一策略，则一切人力、财力、物力的困难，都可以在沦陷区得到解决。造成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态势。在相反的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粉碎它，那末敌寇将在不能克服的危机中崩溃下去。

和这里平行的策略，便是造成几支政治的别动队，积极进行诱降、分裂的活动。这些别动队员很会装饰各种各样的政治面孔，装甲打乙，联乙打丙，向张骂李，又向李骂张，等到张李火并的时候，彼则一笑而去，又顾而之他。一句话，尽其挑拨离间、分裂劝降的能事，以牵制抗战的力量，分裂抗战的团结，以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

战争形势是极明显的，敌在侵占武汉、广州后，即将侵略政策的重心放到政治诱降和奠定敌后上面，在前线上的伺隙进攻只是策略上的配合行动。这是说明敌寇在用新的形式进行继续的侵略，战争依然在从第一阶段走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我们所企求的相持阶段并未到达。因为敌寇并未停止向我军的进攻，仅仅把攻击重点指向敌后，我们政治的进步和力量的增长还不足以抵御与停止敌军的前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便从敌人方面放射出一种迷离的幻影，引起一些人们的错觉，以为战略的相持阶段已经来临，而且把前线上一时的沉寂，误认为不是敌军知吾有备而不敢来，而是敌寇自身已无力再进。换一句话说，就是敌已无力再进，那末我虽无备，敌亦不能来。这一错觉的影响，使我们抗战的全部工作受到消极的怠工，抗战的团结受到部分的侵蚀。

正如战地党政委员会李副主任[3]发表谈话所说的：“……敌在多面受敌、顾此失彼的环境下，敌寇唯一的打开困难的办法，厥惟竭尽全力的以图巩固其所谓‘侵略区’之统治。……”“我们应积极组织经济游击队，以破坏敌伪之经济建设；争取伪军反正，以瓦解敌寇‘以华制华’之阴谋；编整人民武装，提高游击队素质，以增强战地牵制敌军的力量；扩大战地不合作运动，以阻碍傀儡政权之建立，阻碍敌寇欺骗建设之推行……”

只有这样的把握着目前战局的关键，妥定出敌占区的斗争纲领，把这个纲领服从于抗战建国纲领总原则之下，团结抗日人民的力量，开展敌侵占区的全面抗战，把各战区所组织的战斗与之相适应，击破敌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毒计，才能转移抗战的局势。

注 释

[1]外蒙指现在的蒙古国，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称外蒙古。一九二一年宣布独立，一九二四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独立。这里所说的挑战，指一九三九年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蒙边境诺门坎挑起的大规模反苏武装冲突。

[2]但泽，当时为自由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恢复原名“格但斯克”。

[3]李副主任即李济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作战与磨擦问题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

本席未报告以前，先要说明一点：本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派本席跟随统帅部担任联络，因此我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完全是由文电中收集起来的，不免有许多不详尽之处，希望各位原谅。我的报告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作战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与友军磨擦问题。

第一部分 关于作战问题

一、华北斗争形势的估计。本集团军二年来的抗战地区都在山西、河北、山东、绥远[1]、察哈尔[2]、冀东一带。因此在没有报告作战经过以前，首先要把华北形势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我很同意大会中有些长官们所指示的，说敌人对中国的侵略，直到现阶段为止，对华南是守点，在华中是守线，对华北是守面。这样，本集团军要坚持华北的抗战，必然要和敌人展开全面的斗争。可是坚持华北，必须把整个华北当作一个整体来打算。比如要坚持山西，决不能仅仅与敌人作战于山西境内，还必须与敌人作战于山西境外。就是说，我们要进出河北平原，开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而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又须同建立燕山、泰山的抗日根据地，密切联系起来，使整个华北的斗争，能够互为犄角，适当地配合。就是说，假使敌人以大力进攻山东，那末我们河北、山西的力量，就策应起来，假使敌人以大力进攻山西，那末山东、河北的力量，也同样的起而策应，这样敌人就不能各个击破我们，华北的局面，才能得到坚持。两年半以来，本集团军在华北的斗争，就是在这一战略意志之下，艰苦进行的。

那末同志们要问，这两年半以来，你们在华北打了些什么仗呢？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在华北的作战，不能详细报告，只能将作战的总结报告给大家。

二、总结本集团军二年来的作战，除了小的战斗不计外，比较大的战斗共有二千六百八十九次。许多著名的战斗，均有地点可查。比如平型关、阳明堡、平鲁、井坪、灵丘、午城镇、井沟、南偏城、宁武、平社、牛武村、岱岳、洪子店、旧关、定州、保定、望都、昌平、兴平、涿州、涑水、琉璃河、门头沟、清风店、神头村、响堂铺、沾尚镇、水冶镇、马房、威县、长乐村、张店镇、王安镇、西合营、彭城镇、町店、香山、王家池、冯寺、曲周、香城固、南宫、黄家庄、猫儿寨、景县、徐沙村、大营镇、大宗家、北魏镇、三十里铺、卧佛堂、大王庄、董庄、上下细腰洞、对村林、大龙华等战斗，都十分激烈，每次作战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和杀伤。在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战斗中，我们击毙敌伪、缴获等数目统计如下：

敌伪死伤：日军六万五千余人，其中有清水联队长、山口少将、归森少佐，常冈宽治旅团长，正亚联队长，伪军死伤约一万五千四百余人。

俘获敌伪：日军三百八十五人，伪军九千六百一十五人。

缴获武器：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关枪四百余挺，大小炮百余门，电

线二十万斤。

争取伪军反正：六十三次，共约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一人。

破敌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其中破坏铁路一千三百零七里，公路二千四百六十里，破坏车站三百一十六个，炸毁桥梁三百八十七座，炸毁汽车二千余辆，破坏飞机二十余架。

缴获文件：敌军通电密码，共有二种，已呈交委座，并蒙委座赏赐二万元，其余各种军用文件极多。

在这两年苦战中，本集团军伤亡官兵统计如下：

阵亡将士：一万五千余人。

负伤将士：四万余人。我负伤将士中有林彪[3]师长、贺龙[4]师长，以及周建屏、陈锦秀、叶成焕、邓永辉、朱仰兴[5]等高级指挥员。

这就是本集团军两年来抗战的总结。

三、冬季攻势的总结。本集团军在未奉到委员长皓申电以前，敌人已经在九月十八日开始“扫荡”晋冀察边区。我们奉到冬季攻势的命令以后，一面要粉碎敌人对晋冀察之“扫荡”，一面要配合友军作战，完成二战区冬季攻势所给予的任务。为执行委员长皓申电，我们制定了如下的作战部署：

（一）晋东南方面：

1. 上党一带，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个团及先遣支队一部，监视和打击顺县一带之敌，保证白晋、长武、正太各线我军之安全。

2. 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及三四四旅一个团，主要配合当地游击队，东西夹击白晋公路北段，置重点于虢亭、南关间，确实断绝之。

3. 三四四旅两个团、一二九师四个团，南北夹击长武公路，重点置干涉县黎城间，而确实断绝之。

4. 以上部署，系配合庞、范两军[6]收复上党。而收复上党之整个作战部署，另令行之。

（二）平汉线方面：

1. 以萧克[7]部两个团截断宛平至涿县之线，并相机袭击涿州、卢沟桥。

2. 吕正操[8]部两个团截断望都至保定线，并相机袭击望都、保定。

3. 一二九师张贤约支队，配合冀游击队，袭击临城沙河线，并截断邯郸磁县段。

4. 平汉线两侧各大小游击队，以配合上述作战企图，向平汉线作宽正面的不断的袭击与破坏。

（三）正太路方面：

1. 正固以桂支队[9]两个团，确实截断并陘至娘子关段，以策应配合晋冀察边区作战。

2. 另一个团配合当地游击队，向平定至太谷线，作宽正面之袭击与破坏。

（四）同蒲线方面：

1. 一二九师三五八旅两个支队，袭击忻县至大同之线，置重点于雁门关南北，并策应配合晋冀察边区作战。

2. 以一一五师陈支队[10]两个团，袭击灵石至太谷线。

（五）平绥线方面：

1. 萧克之有力一部，置重点于昌平、怀来间，袭击平绥东段。

2. 以大青山支队袭击归绥东西近郊。

3. 以萧克冀东之游击队，分袭天津至山海关，及平古北宁各线。

(六) 津浦线方面：

1. 以吕正操一部，配合一一五师挺进纵队之一部，置重点于沧州东光间，夹击德州至静海之线。

2. 以一二九师宋任穷[11]一部，一一五师挺进纵队一部，夹击德州至济南之线。

3. 以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之主力及山东纵队一部，夹击济南至铜山之线。

4. 山东纵队之另一部，配合当地游击队，向胶济路作宽正面之袭击与破坏。

(七) 陇海线方面：

1. 以一一五师彭支队[12]袭击铜山至东海之线。

2. 以一一五师杨支队[13]袭击民权至碭山之线。

(八) 晋冀察区聂荣臻[14]部及一二 师贺龙一部，则以粉碎向晋冀察区“扫荡”之敌为基本任务。

现在我来报告本集团军冬季攻势作战的经过。

(一) 晋冀察方面，敌人在九月间集中了联合兵团三万余人，从九月十八日开始“扫荡”晋冀察。我军经过四十余天的血战，将各路进攻之敌完全击溃。西路之敌退至五台，北路之敌退至灵寿、涞源，南路之敌退至完县、唐县、曲阳。此次战斗，继续到十二月八日才停止，共计毙敌三千余人。此次战役有两次战斗值得在大会上提出来报告的。

1. 涞源战斗。此次战斗是同敌之过村部队作战的，战斗的经过，十分剧烈。现在我把敌军十一月十九日的广播念给大家听，请各位好从反对的方面了解作战的实际情形。敌人广播说：三日进出于涞源南方之过村部队沿山间之谷地进军，午前七时，突与共产军独立第四师，第一百二十师，合计三千之敌军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敌（就是本集团军）以重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十门，轻机枪六十三挺，占据山顶之有利地势，对我（就是敌寇）以居高临下之势，反复数十次逆袭，尽量发挥其炮火威力。我过村部队，自部队长以下，前仆后继，继续奋战，突击之后，占领附近之丘陵，进据有利之地势，使战局突转而有利于我方。及晚，敌人又来作顽强之逆袭，展开猛烈之手榴弹战。终至于四日午前十时，阿部旅团长亲调部队二千余增援，阿部亲赴前方指挥，此次竟作悲壮无比之牺牲。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产军，以殓阿部部队长之英灵。

当阿部中将被我击毙后，敌第三批增援部队七百余人，亦被我击溃。此役经四日之血战，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我缴获步枪四百余支，机枪十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未算，我伤亡营长以下八百余人。

2. 陈庄战斗。陈庄是晋冀察边境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交通枢纽，敌人想破坏和摧毁陈庄，是他们“扫荡”华北进攻边区必然的一着。因此敌人在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就用了素有“扫荡”经验的水原旅团，以田中大队（内有山炮一门）为骨干及水原近卫部队，灵寿行唐守备队二百余人，共约千余人，并附迫击炮一门，轻机枪八挺，重机枪一挺，在水原旅团长的亲自率领下，配合敌机的轰炸，开始向陈庄进犯。由于我民众的积极帮助，和我贺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全体将士英勇搏斗，连环包围敌人三四次，与敌反复肉搏数十次，经五日之血战，使千余名顽敌除十余就俘外，全部被我歼灭。这是抗战以来最模范之歼灭战。

(二) 本集团军在晋东南方面作战，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友军(即庞炳勋、范汉杰二军)执行冬季攻势，完成夺取长治的任务，依照本集团军的作战部署，开展了各个交通线上的战斗。

1. 白晋公路：在同蒲线上太谷方面的敌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分四路向武乡进攻。敌之兵力约六千余人，来势甚猛。经我军顽强抗击，激战二昼夜，将该敌击退，毙敌八百余人，乘胜占领段村、马牧、涌泉、山羊塙各据点。为着彻底切断白晋公路北段起见，我军又向白晋公路北段各据点，展开宽正面的袭击与破坏，先后袭占虢亭、漳源、权店三据点，同时破坏了夏店到桥亭、号店到河口、南关到分水岭的公路，共约百余里，使敌人沿白晋公路南下增援长治之企图，遭受严重的打击。

2. 长武公路：我军在长武公路的战斗，是从十二月初开始的，前后与敌作战大小七十二次。在作战的过程中，我军曾于十二月十四日，袭入东阳关、赵店镇、潞城之靳村，及黎城之七里店，毙敌二百余人。十二月十五日，伏击了敌人的汽车，将其全部破坏。十二月十六日，袭击黎城外围各据点。十二月十九日，袭入响堂铺。十二月二十日，又二次打入东阳关、赵店镇。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分向长武路各点总攻。十二月二十三日，收复黎城，即夜克复东阳关。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复涉县。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复徘徊镇(在武安涉县间)。总结二十多天的战斗，前后收复比较重要的据点计有：东阳关、黎城、涉县、赵店镇、徘徊镇、神头镇、微子镇。还一度克复潞城。毙敌在二千人以上。

3. 正太铁路：我们在正太铁路两侧活动的结果，破坏了铁路四千余公尺，遮断敌人半个月不能通车。一月四日在寿阳县西南炸毁敌人火车一列，并消灭其运输部队。

4. 平辽公路：我们在平辽公路的战斗部队，十二月十一日袭入昔阳县之东冶头，十二月十二日袭入韩王镇(在和顺辽县之间)，十二月十四日袭入代丰(辽县附近)，前后消灭敌寇三百余人。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军在皋落镇战斗，敌军正在危急之际，便放毒瓦斯，我中毒的战士四百余名，可是我军依然冒毒冲锋，将敌击退，收复皋落，毙敌二百余人。我军官兵除了中毒四百余名外，还伤亡二百余人。二月一日，在长城镇战斗中，敌以联合兵种千余人进攻长城镇。经我军英勇抗击，敌人阵地动摇，又放毒气。我军中毒者百余人，卒将敌军击溃。敌死伤一百六十余人，我军伤亡除中毒百余名外，还伤亡四十多人。我前后破坏公路七十余段，共一百多公里。我军在白晋、正太、长武、平辽各路胜利的战斗，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给我围攻长治之友军主力以莫大之援助。虽然未完成在冬季攻势中克复长治的主要任务，然而本集团军所负担的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的。

(三) 河北方面：河北平原由于地形平坦，交通四达，敌人又用筑碉修路的办法及常用快速部队的袭击，加上河北社会情形的复杂，内奸暗探的活跃，使河北的斗争内容就更加复杂和艰苦，因此我们要坚持河北平原的游击战，必须：

1. 要把我们的斗争基础建立在军民巩固的团结上面。任何革命战争的胜利，都要有优越的群众条件。在今天已经沦陷的河北，我们对于群众的依靠比任何时间和空间都要紧。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地动员组织训练河北的群众，造成人山，造成人海，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比如我们的游击队，在某种不利的情况下，须要退却或转移时，我们是靠人山来掩护的；又如我们的

游击队在某种有利的情况下，要像潜水艇一样突然袭击敌人时，我们的游击队，是潜伏在人海里头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河北的斗争，无论保持自己的生存或进行残酷的斗争，首先要建立群众的基础。

2. 平原战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是颇为活跃的，我们没有大山大河，以资依托。但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动员河北的军民，克服自然条件，改变地形，把平原道路变为沟渠（或凹道），把城墙寨子毁为平地，把可以为敌利用的道路桥梁加以彻底的破坏。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能够识别地形，而且还能够改变地形，使之有利于我而不利於敌。

3. 正是由于河北社会情形的复杂，内奸的活跃，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战斗的方式又是经常采用奇袭，那末军队行动的秘密问题就非常重要了。行动的秘密，一面要靠军队本身的秘密动作，一面要靠群众的掩护。假使群众中间潜伏着内奸，他可以把我们的行动报告敌人，那我们的秘密就无从保障了。因此河北平原游击战的坚持，肃清内奸的工作，不论在军队中或在群众中，都是极端重要的。

这就是由于河北的特殊情形所产生的斗争的特点。在冀中，有吕正操同志在天津、北平、沧州、石家庄之间，坚持了两年多的冀中游击战。在冀南，有杨秀峰[15]、宋任穷等同志领导冀南五十余县的军民，坚持了两年多的冀南游击战。这些游击战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此次冬季攻势，在冀中、冀南各地都有非常激烈的战斗，他们都坚决地为完成冬季攻势所给予他们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现在分别地叙述他们战斗的经过：

1. 冀中区：冀中区域是在平津、津浦、平汉、沧石四线之间。它的存在和发展，它的行动和战斗，都给平津、沧石各地的敌人极大的威胁和打击，特别是经常不断地威胁平津。敌人对于这一地区的“扫荡”已经进行过五六次了。当着我们执行冬季攻势任务的时候，平津、沧石的敌人，已经从十二月十五日開始作第五次分区“扫荡”。敌人“扫荡”的区域：

（1）在永定河、大清河之间，敌调遣了一百一十师团的部队约七千余人，附大炮三十余门，坦克车数十辆，汽车百余辆，并有空军、骑兵、化学兵种相配合。我们经过半个月的苦战，将敌击退。敌人经过此次的惨败后，又于今年二月一日开始第六次的“扫荡”，激战十余天，我军毙敌千名，将敌击退，坚持了永定河、大清河之间的游击地区。

（2）在大清河与子牙河之间，敌以联合兵种近万人，于十二月十五日開始进行残酷的“扫荡”。经过十多天的苦战，我军将敌击退，保持了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之间的游击地区。

（3）在子牙河与津浦路我军之间，敌以联合兵种五六千之众，于十二月十五日開始对我军进行“扫荡”。经过十天苦战，我军将敌击退，保持了子牙河、津浦路之间游击地区。

冀中区的我军，在执行冬季攻势任务期间，反对敌人“扫荡”，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九十余次，粉碎了敌之“扫荡”，保持了冀中游击根据地。

2. 冀南：我冀南游击区，以南宫为中心，包括沧石路以南五十余县。冀南民众与抗日武装有极良好的联系。不久以前，动员冀南全体军民进行挖沟破路的工作，挖成的沟共有十二万华里之长，与冀中联成一片。由于挖沟破路的成功，给敌寇“扫荡”以极大的困难，使我们平原游击战争，更加容易坚持。我们挖沟的成功，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1）去年一月十三日，敌分九路进攻冀南时，有一部分敌军由邢家湾向

巨鹿进攻。查邢家湾到巨鹿只有四十华里，我游击队以劣势的装备与敌现代化的快速部队作战，我游击队节节阻止敌军，经过三昼夜，敌军始逼近巨鹿城郊，这证明挖沟可以更加有力地阻止敌军。

(2) 去年五月间，南宫之敌计有步兵二百余人，汽车九辆，坦克二辆，装甲车二辆，炮三门，向河头的游击队进攻。我游击队诱敌至官亭附近，给敌以猛烈的袭击，敌军溃退。我游击队徒步追击敌之汽车，由于挖沟破路的效果，使退却的敌军和汽车行动非常迟缓，沿途被我游击队射击和杀伤。

我军冬季攻势以来，敌军千余人于今年一月四日由威县、巨鹿、广宗等据点分五路进攻冀南游击区，激战数昼夜，我将敌击退，毙敌二百余人。

以上就是我们在河北与敌作战的经过。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敌寇对于华北“扫荡”是极端残酷的。敌军企图毁灭我河北人民与军队所赖以生存的粮食，在占领的乡村，特别注意粮食的搜刮和毁坏。去年夏季下了很久的雨，敌军便到处决堤。河北水灾极端严重。经过此次水灾以后，使我们在河北坚持抗战的条件更加艰苦了。然而我河北的人民与军队，依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支持和支持着我们河北平原的斗争。

此外，还有大青山的游击根据地。那里有近万人的游击队在李井泉[16]同志领导下，与当地蒙古旅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在归绥[17]、包头、百灵庙之间开展游击战，获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

在冀东有邓华[18]同志领导的游击支队。在极端艰苦条件之下，创造了冀东、热河[19]之间的燕山根据地。目前不仅是坚持着，而且是发展着，给北宁路上的敌军以极大的威胁，给关外的人民以极大的兴奋。

在察哈尔南部有萧克同志直接指挥的游击支队。经常活动于察南冀西之间，给冀察的敌军以极大的威胁与打击。

总结我们冬季攻势的斗争，本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之下，正确地执行了最高统帅部在冬季攻势中所给予的战斗任务，无论是坚持抗日游击根据地，或配合友军作战，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统计本集团军参加冬季攻势的战斗员有十五万五千二百四十人。在作战过程中，我伤亡连长以上的干部有四百余人，伤亡战士七千九百四十六人。可是我军给敌伪军队的杀伤和俘获的数目也是很大的。计毙敌伪官兵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人，生擒日军三十五名，生擒伪军一千三百五十五名，获战马一千零二十二匹，骡马六百六十三匹。

在冬季作战中，我们缴获敌人的步枪二千一百三十六支，轻机枪五十七挺，重机枪六挺，短枪五十四支，迫击炮四门，山炮二门，掷弹筒三十三个，尚有其他许多军用品。比如自行车一百九十九辆，大车二百七十辆，望远镜十四副，无线电台五架，电话机三十一架，钢盔三百九十八个，大衣军毯一千六百零八件，敌伪的旗子一百五十二面。

在作战期间，我们同时进行破坏敌军交通的工作。前后执行了二百四十八次的破路工作，计破坏铁路四百一十九里，破坏公路一千八百四十九里（冀南的除外），破坏桥梁三十六座（内有五座铁桥），颠覆敌人的火车十列，炸毁敌人的列车三十六列，炸毁敌人汽车七十二辆，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敌人的通讯密码，已经呈上统帅部，炸毁敌伪的矿井二个，炸毁车站十二座，炸毁敌人的仓库二个，砍断敌人的电线杆四千二百八十根，收回电线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三斤。

在冬季作战期间，我军损失了步枪四百九十六支，轻重机关枪十五挺，

迫击炮二门，短枪三十一支，消耗步枪子弹二百多万发，手枪弹近四万发，迫击炮弹近二千颗，山炮弹二百三十发，手榴弹近四万枚。

关于我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就到此结束。

第二部分 关于与友军磨擦问题

现在我来报告关于与友军磨擦的问题。在这一次大会中，许多同僚都提到关于本集团军与友军磨擦的问题。比如天水行营的盛参谋处长说：第二战区为什么没有完成冬季攻势的任务，就是因为山西新军[20]叛变及十八集团军借名收集公粮，又禁止民众与友军接近，使友军作战非常困难。冀察战区不能完成冬季攻势的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侯如塘、夏维礼[21]，给敌人以“扫荡”的机会。第二战区的楚参谋长说：二战区为什么不能彻底完成冬季攻势的任务？是因韩钧[22]叛变。叛变的原因，因抗战开始时，阎长官[23]拟整顿部队乃招收一批年青的政治工作人员担任新军政治工作，后因行动幼稚，阎长官乃着手加以整顿，韩钧起而反抗，实行叛变，公开说阎长官与中央与敌妥协，十九军六十一军已投降敌人。当变乱初起期，我尚在晋西，闻变即返秋林长官部，始知阎长官同中央并未与敌妥协。十九军、六十一军并未投降，还在抗战。叛乱的军队，不过六七团人，经我军痛剿后，残余部队退至大麦郊，本来可以乘胜消灭，而十八集团军陈士榘支队公开宣言大麦郊一带是他的防地，不让我军进入，否则恐有不便。阎长官接此信乃致电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询问关于陈士榘支队防地的问题，此电直至今天尚未答复。赵承绶军长所部奉阎长官命调回晋西南，在途中又受十八集团军袭击，损失颇大，十九军后方机关移动时被十八集团军抢掠一空，许多家属被难，此事后来萧劲光[24]承认错误，已将人、物完全交回。五台附近，原来驻有反正过来之金宪章部[25]，因颇受压迫，粮食衣服非常困难，不得已乃开拔南下，又被十八集团军沿途袭击，其中有数百青年，被打死二三百人。长官部为训练补充干部，派人招收的青年学生，行至牛武镇，被十八集团军抢去三四百人。据萧劲光回电，是他们自愿去的，但据逃回的人说是被压迫去的。其他事件，如破坏法币[26]、屯积粮食等等、不能尽说。我曾看过朱彭给阎长官的电报，其措辞颇光明正大，但是贺龙、陈士榘等则随便行动起来，致高级长官之间互相猜疑。当此大敌当前，若自相磨擦，枪口向内，则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第八战区章参谋长说到陇东事件[27]。第十八集团军与友军和地方政府时起纠纷，甚至发生武装冲突。例如去年夏季在旬邑、淳化的冲突，镇远、宁县的冲突，宁县与九十七师部队之冲突，合水与保安之冲突。许多冲突事件，都是十八集团军有计划地向友军进攻，又破坏行政系统，在西华自行设立县政府，在曲子镇自行设立省政府，又有所谓固北县等在陕北设立光华商店推销仇货，散发伪钞。有一次兰州有空袭警报时，破坏电话交通。

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说到陕北情形。陕北之王震旅渡过河西以后兵力骤增，计有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一人，步枪二万零六百八十支，轻机关枪二百八十九挺，重机关枪二十五挺，骑枪二百五十支，迫击炮二十门。在陕北现在的情况下，是否需要留置这样大兵力，尚需考虑。陕北一带，仇货充斥，已经侵入到关中去。当然有许多仇货是从东边来的，但是大部分经过陕北。他们用屯积公粮的名义搜刮粮食。对邮电检查，强迫执行。富县县长是省府委

任的。延安方面最初说要派人护送他走，该县长因得省府命令不能擅离职守，延安方面又说他有刺杀某要人的嫌疑，不走恐有不便，最后说他是汉奸。诸如此类之事件，屡出不穷。各地方函电纷至，请求制止。战区无法答复，后来函电日多，不能不复，乃叫他们暂时忍受，并且说你们受友军压迫，总比受敌人压迫好些。但我想忍受是应有限度的，请求中央必须设法解决。

冀察战区参谋长黄百韬说：在冬季攻势中，冀察战区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首先攻击夏维礼、乔明礼[28]部队。今后对冀察战区有许多问题，应加以改正。例如游击区的划定，须尽快划好。刘伯承[29]、贺龙、吕正操各部队原归鹿主席指挥，但鹿主席打电报给他们，向无回电。河北各部队磨擦，队去年八月间开始。首先击溃张荫梧[30]，指张荫梧为磨擦专家，但张荫梧已去，磨擦应该停止。接着今年正月十一日，又包围侯如墉。当时中央派到河北的典验团，正在侯部，典验团全部跑散，失踪三百四十四人。据说有某某等八十余人均被惨杀。二月十二日，乔明礼部在某地亦被围攻。二月二十日，新十四旅第三营押运总部后方行李，在某地受一二九师伏击，官兵死伤二百以上。一月九日，十八集团军两万余人进攻石部，激战三昼夜，双方死伤均在三千以上。石军长不忍自相残杀，乃向南撤退。二月四日，刘伯承、吕正操部四万余人围攻朱怀冰[31]部。在激战中，十八集团军攻击张荫梧，张走后又攻击其他部队。攻击前先加罪名，然后攻击之。鹿主席对此十分为难。鹿主席是个责己主义者，每次对部下训话，力戒冲突。对十八集团军来往人员招呼特别客气，倒茶倒水，把好房子、床让他们睡。但十八集团军始终不能谅解，一再压迫他们，可以不报告中央而自由行动。此外，冀南行政公署自己委任许多县长，而将鹿主席所委县长杀掉。河北灾情甚重，实际上是由十八集团军造成的。他们用屯积公粮名义，把河北粮食运上太行山。恰恰在七月间一连下四十多天的雨，所有屯积的麦子，全部生芽不能吃，仍旧下山筹粮，现在粮价已经涨到八十多元一担。冀南银行去年十二月间，发生三百万钞票对中中交农各行[32]钞票破坏之事，甚至枪毙使用中央钞票的人。至于捐税之多，不可胜数。有救国公债等等。使稍为富裕民众，都跑到平津或附近为日军占领之城市。这正是为贼驱兵。华北资源应该尽力封锁，与敌作经济战，而十八集团军反将羊毛皮革大肆出口卖给敌人。他们到处成立合作社，所贩卖的都是日货。以上所说，应请中央严加制止，并使十八集团军彻底觉悟。

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参谋长罗泽闳报告：在冬季攻势中，第二战区所负责任其中心在于夺取长治。委员长昨天追问各战区，要详细检讨不能达成任务的原因，我现在可以马上回答，原因有二：（一）攻城军范汉杰、李文两部[33]没有炮兵；（二）十八集团军没有完成任务。他没有截断白晋公路。敌之十六师团增援长治，都是由白晋公路来的。

以上便是许多同僚所说的关于本集团军和友军磨擦的话。我想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内部磨擦的问题是一件严重的事。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提出，应该是把磨擦的事实加以研究，找到磨擦的原因，求得解决的方法，提供最高统帅部作为消除磨擦的参考。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说话，才是正确的。在这里，我们不应该抹杀事实，不应该曲解事实，应该正视事实，这是本席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从各同僚提出的许多磨擦的事实，可以说全部都属于华北范围。磨擦的情形不仅是个别的意见分歧，或个别的相互捕杀。磨擦的严重已经到

了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当作结果来看，就是说，这种现象是由于许多政治意见的分歧，工作方法的差异，奸人挑拨离间的活动，下层干部互相仇视和报复等，都没有及时地加以正确的解决所产生的恶果，那末对于这一种磨擦问题的解决是不困难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种现象当作原因来看，抹杀了产生这一种现象的政治原因，仅仅在武装冲突本身求解决，那末问题不但是不能解决，而且会产生更严重的结果。

第三，为了使问题的本身容易了解起见，我想对于十八集团军整个部队的观察有说明的必要，因为有些人已经公开在报纸上（比如《商务日报》）企图说明十八集团军是另外一种军队，这种说法是非常有害的。究竟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国家的军队呢？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的军队，不是异军。因为他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他的干部，团长以上是经过军事委员会任命的，他的编制是军事委员会规定的，他的经费是从军政部领的，他的行动自抗战以来，无论在山西、河北、山东、冀东、绥远、察哈尔，都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完成战斗任务的。但是本集团军和其他友军有没有差别呢？有的。本集团军大多数的指挥员和一些战士，他们身上都佩有党证，这个党证是共产党的党证。其他的友军大多数的指挥员和战士也有党证，这个党证是国民党的党证。这就是本集团军和其他友军的一点差别。这一点差别是有历史原因的。可是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差别，还不止这一点，比如军队地方性的差别，这种地方性产生了各省的军队有各种不同的战斗作风，有各种不同的军队生活。就是根据中央所规定的规章来说，对军队的编制有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战编师、机械化师。各种不同的编制，军饷额也不同，有每月经费二十多万一师的，有十多万，有八九万一师的各种不同的饷章。对于政治工作的制度也不是全国一致的。比如山西和其他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有区别。这就是说从抗战以来，全国军队在执行抗战建国的大前提之下，基本上是统一的，仅仅在个别的问题上有些差异，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也就是大同小异的事实。我们在今天应该强调大同不应该强调小异。只要最高统帅部能够正确地估计各个部队的特殊作风，在使用部队的时候能够发挥他们优良的作风，避免他们的短处，我想这种小异在今天是不足为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固执这个小异呢？不是的。我们希望把全国军队所有的特长都汇集起来，组织成为统一的国防军。这一点不能不有待于抗战胜利之后。在那时我们成为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国民党遵照孙总理[34]的遗嘱，实行还政于民，一切党派都把军队缴还政府，同时实行征兵制度。按照统一的组织形式，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统一的军队。因此我们的军队在目前虽然有些小异，但是不足为患的，而将来也可能解决的。我想各位对于本集团军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第四，现在我们要问，本集团军与各友军的磨擦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在政治的原则上有不能解决的矛盾存在着呢？如果我们今天有绝不相容的政治上的分歧的话，那末我们的磨擦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会日益扩大，以至整个破裂。事实上，我们大家有了三民主义作我们合作团结的政治基础，有了抗战建国纲领[35]，与全国军民一致奉行的遵守。因此我们可以说，本集团军与各友军之间在政治原则上，并无不可调协之处。那末对于目前一切磨擦事件，我们在空间上只能当作局部的现象，在时间上只能看作是一时的现象。当然局部的事件一时的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也可能影响到全局，动摇我们团结合作基础，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避免的。

现在说到磨擦问题的本身。

一、河北问题。本席曾经说过河北的斗争是在颇为艰苦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我们要坚持河北斗争和争取胜利，必须有顽强的坚持的和积极的创造性。因此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不能不有一些新的做法。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曾经和鹿主席在南京时详细地商量过。各位都知道，河北沦陷以后，许多军队和各级政府人员都退出了河北。本席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次面谒委座时，委座亲自指示本集团军组织几个游击支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我们执行这一指示，曾经组织了五个支队，分途进入山东、河北、冀东。经过许多大小的战斗，把敌人约束在许多据点里面，部分地恢复了河北的失地，建立了冀中、冀南的地方政权，由当地民众公举出贤能干部，主持县政开展斗争。鹿主席是在这个时候进入河北的。当鹿主席进到冀南时，与杨秀峰同志对于河北的行政问题也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各县县长，鹿主席是承认了的，并已由省府加委。至于冀中、冀南的两个主任公署，鹿主席说要由行政院通过，省府无权批准，答应转呈行政院加委。所有这些，证明我们与鹿主席之间关系是很好的，我们也愿意和鹿主席共同支持河北的政权。但是自从张荫梧和一些特务工作人员，在鹿主席的周围起了作用以后，情形就一天一天恶化了。我们有一些新的做法，不仅不为鹿主席所采纳，反而用来作打击我们的资料，因此磨擦也就一天天地强化了。那末我们与鹿主席之间究竟有哪些做法不相同呢？我简单举些例子：

1. 关于干部问题。我们认为要坚持河北的斗争，必须发动河北民众，一致起来抗战，而我们和广大民众的联系，必须经过地方干部，为群众所信仰的干部。用这些干部来主持地方行政的工作，才能做到军队和人民一致，政府与人民一致。因此我们就勇敢地信任了地方上经过斗争锻炼出来的干部。比如曲周县长郭企之，他是南宫优秀的青年，为当地人民选举出来的。去年五月间，他到乡下去巡视工作，为汉奸告密，被敌军包围。郭县长率领武装抗击敌寇受伤，民众把他藏起来。敌军进入村庄后，挨户搜查，寻找郭县长。他被俘后，敌寇威逼利诱，始终不屈，从容就义。国府已有明令褒扬。

威县县长范若一，是北平大学毕业、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优秀干部。他被民众选举后在威县整理田赋，发展游击战争，挖沟破路，力疾从公。威县到南宫仅九十华里，敌寇在此修路，一个月不能成功。因为敌修路三天被我一夜就破坏了。其他如武邑县长李凌霄，隆平县长傅充闾，都是经过民众选举而最得民众拥护的。鹿主席对于这些县长，已经委任，后来并未免职，却又另委县长，这样一县就变成双县长了。我们再来看鹿主席所委任的县长。例如衡水县长唐介人，在县二十多天搜刮民财三十余万。经民众向省府保安旅长邵伯武告发，积状盈尺，乃下令撤差。又如威县县长荆树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抽大烟抽白面的。这就是在应用干部问题上我们和鹿主席的分歧。

2. 关于田赋问题。我们要发动河北人民起来抗战，就必须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尽量地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因此我们在田赋问题上主张公平负担，每家每人平均在一亩半以下的贫苦农民，免除其赋税，在一亩半以上的则按级累进，尽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鹿主席则主张按亩摊派，每亩每月一角，此外还要缴纳三斤小米。在一顷（一百亩）以上的人家，每月要缴纳六十斤麦，六十斤小米，三十六斤马料，数千斤柴草。这样一来民众当然负担不起，于去年十月民众自动开大会，公开拒绝缴纳重税。这就是我们与鹿主席的另一个分歧。

照上面所说，虽然我们与鹿主席之间有许多分歧，可是我们对于省府与鹿主席是拥护的。当省府在路罗（邢台西）为伪军崔培德[36]围攻时，我一二九师李聚奎[37]部，为掩护省府撤退，与该敌激战三昼夜。因粮食缺乏，每天只吃两顿饭，甚至吃野草。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之下作战，将敌击退，证明本集团军对于省府是拥护的。鹿主席对于许多小的磨擦事件不惟不能及时制止，实际上是怂恿。本集团军与张荫梧部队冲突时，缴获许多文件，其中有许多命令，称本集团军为伪抗日军。我们把它用照相机照出来作为一个证明。现在我把几个重要的命令念给大家听：通令。（八月十二日午后九点于委底村司令部）。为通令事顷奉总部文午电开：在上中马峪与我王致和部接触之伪抗日军，除大部被我包围正歼灭外，其一部约百多名刻向西南方向逃窜，希率属相机堵击歼灭为要。查伪抗日军受此巨创后，必不甘心，仍有征调部队重来犯我之可能，本旅除派队堵击外，仰我各部队，务要在各该防地严阵以待，勿稍松懈为要，右令二、四连。旅长韩祖光。

张部独立第五旅通报（八月十四日午后六点于委底村司令部）。顷奉总部文电内开：占据中西马峪之伪抗日军经我各部痛击后，除一部已被歼灭外，其一部窜逃赞属田村一带，又被我第四纵队击溃，其残部已向山西方向窜去，刻仅住黄北坪之伪抗日军三百余人，已令王致和、刘擢升等部正在围歼中，等因奉此，仰各该主官相应知照为要，右通报第二连。

命令（八月十五日下午四点于委底村司令部）：（一）顷奉总部命令：伪抗日军被我击溃后，于十四日窜赴山西，窥情伪抗日军有由山西征调兵力，向我攻之可能，为防御该逆东犯之企图，着我部有力之一部进驻虎寨口，接第二民军区防务，第二团刘擢升部住长荫沟、王家坪、槐格疸，任虎寨口、黄北坪之联络；（二）高白信部应以主力移住虎寨口、落坡等，对通山西山川严加警戒，确保野狐泉之安全，但野狐泉仍由该团约住一小部施行警戒，对住毛家坪、槐格疸第二团切取联络；（三）胡春成营，应以主力移住郑家峪、一部住磨河峪，对通山西三交河小道严加封锁，与住野狐泉二十团切取联络；（四）第二十团从郑家峪、磨河峪防地出发时，须留人向特务营交代防务；（五）各部务于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移防毕，具报；（六）余在委底村司令部。右令胡春成营长。旅长。

河北民军贵部钧鉴：刻本旅以受环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领一部暂驻大贾乡，已与吴团长取得联络，祈贵部于可能范围内与敝部密切联系，并祈与石头庄皇协军李副旅长、刘团长亦取相当联络，刻吴团长已电知该部勿令发生误会，望见信后将贵部番号、主管姓名、兵力若何，一并示知为盼。特此致请勋祺。韩祖光谨启。

各位参谋长，我把这几张通报和命令念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当张荫梧把本集团军作为一个伪抗日军来进攻的时候，鹿主席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停止张荫梧对本集团军的进攻；（二）当张荫梧进攻本集团军的时候，第四纵队侯如塘部是参加了的；（三）张荫梧的部队一方面向本集团军进攻，一方面与皇协军（真正的伪军）是有联系的；（四）当张荫梧与本集团军冲突的时候，鹿主席最初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解决我们的纠纷，最后同张荫梧一道进攻本集团军。这就是我们同鹿主席磨擦的大概经过。

其次，说到我们和石友三的冲突。石友三的为人和他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必重说了。说到石友三在河北同我们的关系，最初还是很好的。比如冀南主任公署是本集团军到达冀南后才组织成立的。石友三曾经向冀南公署借款

三万元，当时就给他两万元。冀南公署曾经送给石友三两万套棉衣、四万套单衣，还有许多粮食在外。石友三部曾经与敌军在件只地区（在南宫、巨鹿之间）作战，当其率部败退时，曾遗弃伤兵三十余名。本集团军的地方工作人员，曾经动员群众，把石部伤兵全部抢救出来。照上述两件事看来，我们与石友三的关系并不坏的。等到特务工作人员在石部起了作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才逐渐变坏的。当然我们在河北也有许多问题是和石友三相对立的。比如：（一）兵役问题。我们主张兵员补充首先要从政治上动员群众，其次要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在河北许多壮丁都组织在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中，再由自卫队中的勇敢分子组织成半脱离生产的基干自卫队。这种基干自卫队，有时要配合游击队作战，这样就可以在战斗中逐渐地锻炼地方武装，然后再由基干自卫队中抽调勇敢分子，加入县游击队或军区游击队。这样做法民众并不感觉到是强迫和威胁。但是石友三是主张征兵的。在他活动的各县如枣强、南宫等，到处设立征兵机关，实行强迫服兵役，以致群众不是逃跑，便是贿赂。他们公开的对群众说，如果你们不愿当兵，可以拿钱来，我代你雇。代雇兵役的价钱，已经由一百六十元涨至二百六十元。如果民众自己雇请，则以检查身体等为名，实行多方的敲榨。这种做法，民众是反对的。（二）存粮问题。在大会上有人说，十八集团军把河北的粮食统统集中到太行山去了。这不是事实。第一方法不对，第二时间不符。因为我们存粮的方法是存在群众自己家里，只存在登记簿上，不是集中贮藏的。在河北斗争的环境下面，只有分散保存，才不致为敌寇所抢掠。而石友三在南宫一带却是把粮食集中起来，屯积在一个地方，敌寇一来，全部抛弃，这是十分笨拙的办法。去年夏天河北大雨，敌寇决堤，冀中、冀南水灾惨重。说我们在八月间搬粮上山这是不合事实的。这就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和石友三的争执。（三）碉堡问题。我们在河北平原坚持游击战，以劣势的装备和敌人快速部队作战，我们是反对筑碉堡的。我们只有坚决地改变地形，把道路挖成沟，把城墙拆成平地，才便于作战。而

石友三则到处筑碉堡，敌人进攻又让给敌人。这是我们同石友三所不同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同石友三磨擦的主要原因。

以上便是河北磨擦事件的说明。至于冀南银行发钞票的问题，本来这是地方行政事件，不归本集团军范围，不过有人已经提

出，我必须解释。我们在沦陷区要和敌人作经济斗争，要避免敌

人套取外汇，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准许地方发行省市。因此冀南银行的钞票在原则上是合法的。事实上在河北作战的国军差不多全部使用十元、五元的法币，民众买卖感觉辅币的需要，因此冀南银行所发的一元以下的纸票是合乎需要的。这是关于纸币的说明。

二、山西问题。本集团军是归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指挥的。我们自平型关战斗直到现在，和在山西作战的友军没有什么磨擦。新旧军冲突的事件，有许多人怀疑是本集团军挑动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新旧军的冲突，我们不仅是没有挑动和参加，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当事变初期，彭副司令曾经亲赴秋林见阎长官，劝其和平解决，不要扩大事件，为亲痛仇快。后来新旧军在晋西作战，新军向北撤退，我陈士榘确有隔断新军，不让他们继续作战的决心，因为我们枪口应该对外，对自己的友军打一颗子弹都不应该。这就是陈支队在当时所采取的态度。我们是不是要他的人枪呢？我们决不会这样贪小利而失去全国人的同情。现在楚参谋长也在座，当忻口、太原撤退时，

晋绥军的队伍相当溃乱，我们曾帮助他们收容散兵，把抛弃在河川里的大炮抬回给阎长官。后来阎长官说，你们没有炮兵，我把野炮收回，山炮则送给你们。本集团军的炮兵团就是这样成立的。因此我们有根据说，陈支队的行动是顾大局的。后来陈支队受到六十一军、十九军的攻击，不得已撤回晋西北。本集团军的兵站线，遂被该军切断，病在医院的伤兵，遭受牺牲。本集团军群情愤激，始有与友军发生小的冲突。至于赵军南下时，正值敌军由柳林进攻我河西部队，我军渡河侦察，不期与赵军遭遇，发生误会，这是偶然的事。山西情形就是如此。

三、陕北问题。关于陕北的问题，主要的是解决边区的问题。三年来对于边区问题，始终是拖延下决，引起了陕北的后方留守部队，在陇东各地与友军时生冲突。我完全同意何总长[38]所说的要停止陕北的磨擦，主要的是要划定边区的范围。而且事实上，我们同中央正在谈判此事，我相信不久可以解决。不过陕北问题。大部分是政治问题。我手中虽然有许多磨擦的材料，因为问题牵涉到政治方面，本席乃属军人，不便多谈。我相信中央必能以公正的态度正确解决。

我的报告，第二部分就这样结束。总而言之，本集团军全体将士，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在国民政府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追随全国友军之后，一致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

注释

[1]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3]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4]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 师师长。

[5]周建屏，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兼第三支队司令员。陈锦秀，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叶成焕，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邓永辉，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治处主任等职。朱仰兴，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兼第四支队第十一大队大队长。

[6]指庞炳勋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和范汉杰任军长的第二十七军。

[7]萧克，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 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

[8]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政治主任公署主任。

[9]桂支队指桂于生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独立支队。

[10]陈支队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

[11]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副主任。

[12]彭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13]杨支队指杨得志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冀鲁豫支队。

[14]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5]杨秀峰，当时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

[16]李井泉，一九三八年任八路军第一二 师大青山支队支队长，率部

开辟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17]归绥，旧市名。一九五四年改名呼和浩特。

[18]邓华，一九三八年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兼第十一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20]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消灭新军，但未能得逞。此后，新军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21]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夏维礼，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二纵队司令。

[22]韩钧，当时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政治主任。

[23]阎长官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4]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25]指金宪章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系阎锡山收编的伪军。

[26]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

[27]陇东事件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陇东各县的武装进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军第一六五师一部纠集地方保安队袭击

陇东镇原、宁县等地的八路军，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同年十二月，在第一

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等部再次向驻镇原、宁县的八路军发动进攻，杀伤干部战士三百余人，夺占镇原、宁县两城，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

次年二月，国民党军队又夺占了陇东地区的正宁县。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八路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

[28]乔明礼，先后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副总指挥、总指挥。

[29]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30]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民军总指挥。

[31]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

[32]中中交农各行指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33]指范汉杰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和李文任军长的第九十

[34]孙总理指国民党总理孙中山。

[35]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36]崔培德，当时任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

[37]李聚奎，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

[38]何总长指何应钦，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参谋人员应如何修养 (一九四一年五月)

目前国际国内环境，要求我们每个参谋人员应该时刻地警觉起来，并随时研究周围的环境，准备充足的材料作首长定下决心的根据，并根据决心，部署军队指导及维持交通联络与后方勤务等保证工作。毛主席在指示干部学习的时候，曾要每个干部研究周围的环境，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马列主义与党的策略等等，而这些知识的获得，对于我们每个参谋人员则更加重要。

今天战争胜利指导的中心原则是要使许多各种不同的力量，能在同一时间发生合理性的作用，能求得一致的协同动作，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计划，就是用组织的力量去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并不可把计划看作是神秘的脱离实际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如果这样的来认识计划，那是极端错误的。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发展都有它的规律性，这个规律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军人看来，是不难获得的，但是要具有一个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不掌握这个武器，离开了这个武器，或以唯心论的辩证法来代替这个武器，那就始终不会正确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而也就不能产生切合实际的计划。

把唯物辩证法正确的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导战争的唯一法宝，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典型的创造。在今天作为一个真正好的参谋人员，在收集情况，实现决心，指挥军队作战的时候，都必须根据周围的环境，根据不同的情况，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深思熟虑，作深刻的研究判断与分析，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历史发展的结果，使军事与政治打成了一片，假使我们把军事当作一个纯粹的领域，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事实证明，任何一个领导革命的同志，不懂得军事，就不能遂行领导，同样的作为一个红色军人的军事干部，如果不研究政治，不掌握马列主义，也就不能在军事这一门有更大的深造。

今天革命的分工，既然使我们担负军事工作，成为一个军事干部，那就一定要把军事这一门弄通。大家应该懂得桐油罐就只能装桐油这样一个道理，而我们军事干部之所以要研究军事，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军事，更好的领导部队，与此相适应的对于军事学问的研究，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课题。

有些同志不安心于当前的工作，总希望到前方去打仗，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工作受到损失，另一方面也没有认识到高尔基[1]所说的“生活就是斗争”这样一个革命的红色军人应有的、确切不移的真理。我们在哪里生活着，就在哪里斗争着，虽然我们目前所处的生活不是与敌人战斗，但是我们每个同志的本身却存在了不少的缺点，因此就要抓住自己的缺点，克服自己的愚昧无知，克服自己军事理论上的贫乏，克服自己工作上不能圆满执行任务的缺点。一切工作中的缺点，不用斗争是不能克服的，而且任何事物离开了矛盾的斗争就不能求得发展。当着物质的环境与自己的内心发生矛盾而不能用斗争来解决时，就会走投无路，悲观失望。历来没有过这样的医生，能用自己的刀割去自己的疮，只有我们的红色战士才有这样的决心，才是空前未有

这是叶剑英在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第二次作战教育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的医生，才会用自己的刀割去自己的溃疡，才会用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才能前进一步。只有日益不断的斗争，才会产生出伟大的东西。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来充满自己的精神，并以此培养出能够不断前进的干部，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完成革命的军事任务。

注 释

[1]高尔基即玛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原苏联作家。

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

我记得列宁在《做什么?》[1]这本书上,曾引证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论到革命斗争形式的问题,恩格斯承认革命斗争形式,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还有与这两种斗争并立的理论斗争。

假使我们把这个斗争形式的问题,放到中国革命特殊环境中来研究,那末我们首先就得指出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提示。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2]因此,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理论的,而且还有与这三种并立的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作为中国革命主要形式之一,同时又是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点,已经由中国革命及我们党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所领导的许多伟大斗争的经验所证明的真理,同时也是为我党中央的铁掌所把握着的東西。

拿中国近代五十年的革命运动来说,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即着手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组织暗杀,进行暴动等事。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认识革命是群众的事,但已经懂得革命是离不开武装的。我们看孙中山从开始革命活动以后直到出师桂林以前,是幻想着旧军队也可以进行革命的。直到晚年出师桂林的时候,才开始用他的思想体系、亲自进行由上而下的革命军人精神教育,企图这样来改造旧军队。不久,其部将陈炯明[3]即在革命的根据地——广州叛变了,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进行好几年的镇压叛乱的战争,而且在这些战争中,他曾经有过许多残酷的教训。

试举一例:记得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参加东江讨伐陈炯明各役。当时我军败于博罗,退至石龙——广九铁路上一个重镇,广州受到威胁。孙中山乃亲率卫队,进驻石滩督师。他立即在石龙车站上,悬一大旗,上书“我在石滩,退秆枪毙!”下署大元帅孙文。并派员督师,要求稳住阵线。然而部队后退,依然络绎不绝。孙中山乃乘车进至石龙,停车于石龙桥上。一面发布命令,禁止后退,一面用其所乘之车阻塞铁桥,以遏退军。然而溃退的军队,依然攀桥而退,后尾部队,甚至鸣枪威胁,引起过桥溃兵射击大元帅乘车的暴行。迫使孙中山只好向广州撤退。直到广州近郊,才把陈炯明部将洪兆麟、林虎[4]两军击退,巩固了广州。经过此次教训,孙中山才抛弃用旧军队干革命的观念,乃决心训练革命军队,创办黄埔[5],培养国民革命军的革命干部,建立了北伐军能够胜利的前提。

由此观之,国民党几十年来的军事政策,是有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也有其本身的宝贵经验。我们对于这些教训、这些经验,应该研究,应该学习。

恩格斯说:“德国实际的工人运动,永远不应该忘记,它是在英国和法国运动底肩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可以现成地利用英、法运动中,以高价买来的经验;它现在可以避免当时它们在大多数情形之下所不能免的错误。”[6]一个年龄轻过国民党近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如果全党同志都来研究环境,研究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话,那末,我们决不能忽视我们党在大革命期间,尤其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所受的陈独秀[7]机会主义所给予我们党的祸害。试作个回忆吧:克己从人友不谅,一皱眉头起杀

这是叶剑英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三周年学习会上的演讲,原载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出版的《共产党人》第十九期。

机。此情此景，同志们偶一念及，应该得到什么教训？

十多年来，我党我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武装。这个武装所起的作用，对抗战方面说，它是一个坚持抗战的推进机，对投降方面说，它是一个反对投降的制动机。如果这种革命武装愈强大，就愈能推动抗战，制止投降。今天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严重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军事任务是：努力建军，积极抗战。因此，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士的政治家一样。我们读一读马克思《论领导起义的艺术》，《恩格斯论军队》，《列宁论游击战》，《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书，部证明善于领导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战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官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可争辩的真理。

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用这句话向着延安在职干部敲一声警钟。这一钟声，应该冲破数年来或多或少的“偃武修文”的沉寂，把研究军事成为研究辩证唯物论继起的热潮，把辩证唯物论与军事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

应当指出，我们一些军事工作人员热心研究马列主义的政治是必须的，之所以需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政治，为的是能够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更好地掌握部队，更好地训练部队，更好地指挥作战。换一句话说，我们军事干部之所以需要学习政治，正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军事任务。

然而，有个别的人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就不愿意做技术工作，甚至军人也不愿意干军事了。要知道，假使他真正地学好了马列主义的政治，懂得技术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党的工作中的政治地位和联系的时候，那末技术就不是纯技术而是政治化的了，军事就不是纯军事，而是政治化的了。这在我们党里，叫做革命技术家，叫做革命军人。否则就是“半吊子”，所谓“半文不武”。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更进一步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同时也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

注 释

[1]列宁《做什么？》一书今译名为《怎么办？》。

[2]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3]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三年一月，被拥护孙中山的军队逐出广州。一九二五年，其所部武装力量在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战役中被歼灭。

[4]林虎、洪兆麟，当时分别担任陈炯明部粤军东路正、副总指挥。

[5]这里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州岛，所以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

臻以及后来入党的叶剑英等同志，曾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6]见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新的译文是：“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7]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粉碎敌寇新的战略进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松冈[1]游欧以后，敌军动向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四月间曾调动华南部队攻占我闽浙沿海各要地——镇海、宁波、温州、平阳、福州，以加强沿海的封锁。接着便在华北华中各地，开始其进攻的部署：敌酋畑俊六[2]亲赴华中前线视察战地，板垣[3]中将进抵临汾，其高级指挥官多田骏[4]，亦飞往各战地布置军事。敌军在最近期内，不间断的向着进攻准备地区调动军队，计在晋南集中的有七个师团以上兵力（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十九、二十四、二十一、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十六混成旅团），在豫南，鄂北地区大约集中了三个师团。在太原附近添筑飞机场，在正太路上向着同蒲、白晋两线运输许多粮、弹、橡皮船且有铁道材料。在平绥路上各车站的护路敌军均已集中，除大站外改以伪军驻守。在平汉路上许多重兵器及战车等均运信阳转应山。宜昌方面亦新到敌机近二百架。

直到现在敌军已发动了进攻。晋南敌军向中条山一带的我军猛烈攻击，并已占领垣曲、济源两城及控制沿河北岸的渡口，其进到河岸部队曾在飞机掩护下试行抢渡，但未得逞，仍在两岸对峙中。在鄂西北一带之敌，分由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各地向大洪山一带我军开始攻击。

敌寇发动此次新攻势，是在严重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就是说：敌军此次攻势，正值英国在地中海失败，英军由太平洋逐渐撤退，不得不交由美国接替，而美国在太平洋上，也不能不准备单独对付日本的时候；又是美国取消对日输出锌与橡胶禁令，对日作某些妥协的时候；又是日本取得荷兰石油一千万吨的供给，并成立日越商约，在东京成立法泰停战协定[5]的时候；总之是敌在太平洋上经过外交活动已取得一些便利的时候。敌寇一面利用这一似乎有利的国际环境，一面也利用中国内部的间隙，企图把中国问题作最后解决，以便将来更主动的应付国际事变。因此，敌寇在军事上便组织了新的战略进攻。

中日战争经过了整整两年半的战略相持。在相持的阶段上，由于国际的及敌我的国内形势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必然要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战斗力相互消长。然而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是能动的。在我军方面，是如何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在敌军方面，是如何破坏我之准备，组织新的进攻。如果说：敌后抗战愈发展，则敌之“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之企图愈难于实现；我后方政治愈进步，则抗战力量愈坚强，反攻准备则愈容易；正面作战军队愈积极，则敌之力量愈消耗，我之阵地愈巩固。这样，则敌之战略再进攻的困难就愈增加，而我之战略反攻准备和实施就愈顺利。列宁说得好：咬紧牙关，不要假作顽强，而要准备力量。从这里可以认识敌之所以能够重组战略的进攻，主要的是由于我方执政当局不能利用相持阶段上所获得的时间推行正确的政策，而这个时间是放弃了许多空间得来的。相反的，执政当局两年半以来所执行的抗日反共的两面政策，无疑的给敌寇以许多的便利。

应当指出，敌寇先天不足、泥足深陷，仍然是敌寇最致命的基本的弱点。因此，敌寇组织此次新的进攻，来势也许更加疯狂，但是骤雨是容易过去的。

任何战争或战斗，如果要达到其自己的目的，首先要歼灭对方的有生力

量才有可能。从这一观点出发，估计敌在晋南、鄂北的行动，其最近目的无疑是在晋南、鄂西一带组织歼灭性的进攻，其作战目标是针对着晋南三角地带和豫鄂边的抗日军队。然而，这是不足怕的。根据抗战四年来的经验，如果能够从政治上提高部队和人民作战胜利的信心，军事上进行灵活主动的运动作战，并能与敌后游击相配合，则敌之歼灭企图一定能够被粉碎。只有粉碎敌寇歼灭的企图，保持抗战的力量，与敌持久地周旋在抗日战场之上，将敌疲弊、困饿、疾病、杀伤而消耗之，则此次敌之发动攻势、企图最后解决中国事变的政治目的，必然要遭受到抗战铁拳的粉碎。

注 释

[1]松冈指松冈洋右，日本战犯。当时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积极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扩大对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侵略战争，并参与缔结德、日、意三国法西斯侵略同盟。

[2]烟俊六，日本战犯。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3]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当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4]多田骏，日本战犯。当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5]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泰国军队在日本唆使下向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法军进攻，后日本出面调停，于一月二十三日在东京签订《法泰停战协议》。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

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时机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美国的朋友们谈一谈我们七年来华北抗战的情形，把华北战场上的敌军、友军和我军的情况作一简单的介绍，以便反法西斯的国际战友们有一个概况的了解。

七年的华北抗战，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平型关战役至武汉失守；（二）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三）百团大战至我国抗战五周年；（四）抗战五周年至今。现在逐一叙述其具体情形于下：

第一个时期——平型关战役（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至武汉失守（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一、敌方情形：

日寇进攻我国，最初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这个方针用之于既无准备又无决心的国民党军队则可，用之于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和抗日思想酝酿已久（自“九一八”以来即开始）的广大人民则不可，因而他只能获得初期的某些胜利。敌人进攻作战的重心，首先是在华北，这是根据田中奏析[1]的老计划，由东北四省[2]而进入华北，企图尽掠黄河以北，抢夺河北的棉花、山西的煤铁，然后举兵南下，经华中、华南而直抵南洋。在太原尚未沦陷之前，敌人作战的对手，主要的是国民党

的军队。当时，敌人的华北派遣军司令是香月清司[3]，集十二个半师团的兵力，为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二十师团、第一八师团、第一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铃木旅团、酒井旅团、山井旅团等之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第八师团之一半，近三十万人，约占当时日寇侵华兵力二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的兵力，作所谓“堂堂阵容”的正面进攻。敌人由北而南长驱直入，未及四月即占领了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控制了北宁路、平绥路、正太路，以及同蒲路、平汉路、津浦路之北段。

太原、临汾相继失陷后，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沦入敌手，友军望风南溃，退出了华北战场，此时在华北与敌人作战的，只有共产党人、八路军、山西新军决死队[4]、河北的杨秀峰[5]、山东的范筑先[6]，以及由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新兴的抗战力量，团结在八路军的周围，与华北人民相结合，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地生长起来，到处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从此，日寇在华北的作战，就以八路军为其主要敌手了。这时敌人提出“巩固已经占领的战略要点和交通线”、“确实掌握华北”的方针，在其占领的铁路沿线和城市周围，修筑据点碉堡，以资防守。同时又提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口号，进行培植伪军、伪政权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阴谋毒计。为了镇压方兴未艾的游击战争，敌人以寺内寿一代香月清司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除调走两个半师团（第六师团全部及第一师团、第二师团，第四师团之一半）参加徐州会战[7]外，复增派七个师团到华北战场（第二师团、第十一师团各一半，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三师团、第一四师团、第一一师团和第二、三、四、五混成旅团之全部），并另将铃木、酒井、山下等三个旅团扩编为三个师团（第二十五、

这是叶剑英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的讲话。

二十六、二十七师团)。在华北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约四十万人，较战争第一年增加了六个师团，仍为当时日寇在华作战兵力三十又半个师团的五分之三。

敌寇初与我八路军交锋时，尚不知我军的特点和厉害，在战

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单刀直入式的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国军之易欺，企图把我们碰垮，但结果反而碰伤了他自己，常常遭受我们的歼灭打击。敌人遂不得不变“突贯攻击”的战法为

“分进合击”。在武汉失守之前，敌人以千人以上兵力向我合击者已有十余次，以万人以上围攻我一个地区者已有五次，企图乘我立足未稳、抗日根据地尚未臻于巩固之际一举加以摧毁，以扑灭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但这些合击都在我集中力量、打击一路之敌的战役方针指导下，一一被我击破。根据地在反围攻中逐渐巩固起来，我八路军也日益强大起来。

敌人为了巩固其占领要点，便利对我作战，吸吮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乃开始修筑铁路。至一九三八年底，被我加以破坏而敌人重行修复的铁路，有平（北平）绥（远）线、平（北平）汉（口）线、北（平）宁（辽宁）线、津（天津）浦（口）线、同（大同）蒲（州）线、宅里（良乡至宅里）支线、西陵（高碑店至易县西陵）支线、六河沟（安阳丰乐镇至六河沟）支线、济宁（滋阳至济宁）支线、口泉（大同至口泉）支线等十线约二千七百九十二公里，新筑平（北平）古（北口）线一百四十六公里，合计二千九百三十八公里。在部分地区且已开始建筑碉楼据点，但为数还不多。

在华北的伪军，在抗战前即有李守信、王英与赵雷[8]等组织的伪蒙军及冀东保安队。抗战初，大汉奸齐燮元[9]成立靖安自治军（后改称治安军），初仅有四个连，至一九三八年底已扩大为五个团，为华北正规伪军的主力。此外，敌曾大肆收编散兵、土匪、会门武装，组织伪皇协军、剿共军，以及伪护路保安队等。至一九三八年底华北伪正规军与伪地方军合计约有七万人，但系统复杂、

素质低劣，在我游击战争开展之下，多半（估计约四万五千人）为我八路军所消灭。

二、友军情形：

抗战开始，华北战场上的友军有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等不下七十五万人，当时士气一般的还好，且也打过几次仗，比如南口之战、忻口之战[10]，并有若干将领于作战中英勇殉国，如赵登禹、佟麟阁、郝梦龄[11]等。但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缺乏信心，更无远久打算，所采取的政策是单纯的片面的军事抗战，而不是发动民众进行全面抗战。在战略指导上，又是正面单纯防御，而不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不是积极防御作战，更不承认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因而处于被动的、处处招架、处处挨打的形势。再加以若干高级将领的贪生怕死，拥兵自肥（比如韩复榘[12]不知搜刮了多少金钱），在敌人进攻时，不作抵抗，一味的保护着“私人财产”向后退却。晋绥军战斗力很差，但高级军官们个个会做生意，个个发大财，李服膺[13]当敌人占领大同，距敌尚有几十里远时，就望风而逃，急急向雁门关以南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而太原、临汾、新乡相继失守，铁道城市被敌人控制以后，友军更溃乱不堪，争先恐后的抢渡黄河，就是当初高唱“守土抗战”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14]先生的晋绥军亦全部退至黄河以西，被敌人遮断而留在敌后侧翼的，只有刘戡第九十三军的五十六师，也是惊慌

失措。至于平时鱼肉人民的官僚政客，一闻炮声即携带妻妾细软逃之夭夭，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更有摇身一变，奴颜卑膝以事敌人者，如王克敏、潘毓桂[15]、齐燮元之流。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三、我方情形：

抗战开始时红军有官兵八万人，八月二十五日奉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只给三个师的番号，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和发饷，即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番号。九月，我们自韩城、潼关两处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进，踏入了华北战场，增援前线。当时，我们就知道中国抗战是长期性的，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也给我们规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因为根据敌我装备上的优劣悬殊、留置敌后进行长期战争的艰苦环境，以及我们具有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与特长，只有在此种作战指导原则下，才能制胜敌人，这已是被七年的战争实际所证实了。

我军先头部队，由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甫抵前线，一与敌人接触即创造了平型关大捷[16]。我军在运动战中击溃敌精锐的板垣师团并歼灭其一部，创开战以来的胜利纪录，一扫友军节节败退的耻辱，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平型关战斗使敌锋受挫，但敌人已自茹越口友军防地突入长城以南，我军旋即迂回敌后，猛袭敌交通线，配合友军忻口作战，保卫太原。此时，我一一五师光复冀西、察南十余县，一二师数度占领雁门关，一二九师则袭入阳明堡飞机场，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敌人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全被我军切断，忻口被围之敌粮弹俱绝，死伤极重，大有歼灭可能。狡诈之敌，乃由石家庄沿正大路西犯娘子关，声援忻口之敌。我一二九师闻警驰援，尚未进抵阵地时，该关友军已弃守。刘师长、徐副师长[17]机断行事，在正大路南平行路上之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打了三个胜仗[18]，打开了敌人阵地的一个缺口，救出被围友军曾万钟[19]之第三军，阻滞了敌人的西进，掩护了友军的撤退。但不久太原失守，遂使忻口敌人获救，至为可惜。

在此以前，我军在华北的作战，主要尚系配合友军行动；在此以后，我军在华北即开始单独作战，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

太原失守前，我军已预见华北之将沦为敌后，故即确定方针：变敌后为前线，发动广大群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追太原失守，即有计划的将兵力分置于同蒲路两侧与雁北敌后，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管岭山等为依托，从事创造抗日根据地。对于敌人之围攻与合击，我则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以对抗之，使敌人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常常扑空，我则灵活集中兵力，乘敌之隙，打击其一路予以坚决粉碎。如敌人对晋东南和晋察冀的围攻，均合击一个中心点，待敌进至转换线上，我主力即跳出圈外，集中力量打击其一路，使敌人在尚未进抵中心点时，即被消灭与击溃。同时，我遣军东下冀鲁豫大平原，北出绥、察、热、冀东长城口外，光复祖国河山，拯救沦于敌人铁蹄下的人民，协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与爱国人士，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开始抗日游击战争。在光复的国土上，我们即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安抚流亡、救护伤兵、实行二五减租[20]、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廉洁政治，发动广大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帮助友军进步，……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增强抗战力量，树立长期抗战的基础，把华北创造成为坚韧不拔的抗日基地，使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以外更增辟出

一个敌后战场，以便前后夹击敌人，制敌死命。

在这一时期，我军为配合徐州、武汉两大会战，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对我新建根据地的“扫荡”与围攻，消灭敌有生力量，牵制敌人的调动，如一九三八年三月晋东的一二九师反对敌人九路围攻，长乐村一战[21]，歼灭敌第一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一部，并给敌由同蒲路调兵东援徐州造成很大的困难。九月，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反对敌三万兵力的二十五路围攻，曾击毙敌常冈宽治[22]旅团长与正亚、清水两联队长……。另一方面，我军又主动的向敌交通干线、战略要点进击，并扫荡日寇所培植的爪牙——伪军。计一九三八年初，晋察冀我军大破平汉路北段，袭入保定、定县、望都、正定等县城。二、三、四、五月间，一二九师破袭平汉路、津浦路，在南宫赶跑敌清水司令，消灭盘踞河北伪军崔培德[23]等约五千人。三月三十一日，一二九师在东阳关与涉县间的响堂铺伏击敌人[24]，焚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山东我军在台儿庄会战[25]正酣时，破击鲁南之台（儿庄）潍（县）公路和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发动矿工起义。七月六日起，晋察冀我军同时出击平绥、正太、平汉诸铁路，激战三天二晚，毙伤敌一千四百余人，炸毁北平城北石景山之发电厂，使北平顿成黑暗世界。七月十六日，唐山矿工在我军领导下，发动抗日起义。“七七”抗战一周年，我宋、邓支队[26]进入冀东，与当地共产党组织一起领导冀东人民举行了二三十万人的抗日大起义，占领遵化、玉田、迁安等十八个县城。我一二九师所部主力进击平汉路、道（口）清（化）路，消灭冀鲁豫伪军扈全禄[27]部。九月，一一五师陈旅[28]在晋西三战汾（阳）离（石）公路。八月十三日，山东我军袭入济南。十月三日，山东我军又破坏胶济路百余里，等等。

由于游击战争之广泛开展，反“扫荡”作战的连续胜利，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我军力量倍增、声威愈壮，活动区域东临渤海、黄海、北达冀东长城口外，南至陇海路，西襟黄河，数大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在抗日民主政府确实管辖下的人民，为数达千万之上。

第二个时期——武汉失守至百团大战（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

一、敌方情形：

敌人在未占领武汉之前，已深感八路军在敌后的严重威胁，认为是灭亡中国的“绊脚石”。一九三八年八、九月时，敌华北派遣军即提出“五台与武汉并重”的口号。敌人占领武汉以后，立刻改变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从此在中国抗战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中，即以敌后战场为主。

此时期内，敌寇回师华北兵力骤增。一九三八年敌寇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十八个半师团，曾调走第五、十、十四、二十、一 九等五个师团参加武汉会战[29]，但旋即新增第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和第六、七、八、九、十、十五混成旅团及第二十师团之一半等计八个半师团，因而此时期内敌人在华北战场的兵力为二十二个师团，四十四万人。较抗战第一年（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九个半师团，较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三个半师团，占当时日寇侵华总兵力（一九三九年初为四十八个师团）之一半稍弱。

为了加紧进攻，敌曾三易其帅，由寺内寿一面杉山元而多田骏[30]。其间阴谋层出，花样翻新。由于“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加以在上一时期敌人已饱尝我们的老拳，知道八路军和华北人民是个很“讨厌”的敌人，故改

唱“百年战争”，说要“掌握民心”与我“进行比赛忍耐力的斗争”。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因为任何延年益寿的仙丹灵方，也不能使日本法西斯有百年之寿。一九三九年春，敌华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31]，提出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们”所早已唱滥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军政会[32]民一体”的“总力战”[33]。在军事上提出“巩固点（城市）线（铁道、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一九三九年九月多田骏上台后便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34]，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牛刀子战术”为一日本术语，取中国语“杀鸡焉用牛刀”之义，表示八路军虽“小”，但需要很大的力量去进行战斗。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说什么“黄种人联合起来打倒白种的英美”。在敌占城市举行反英美宣传，并把侵略中国的战争叫做“打回祖国去”。对于老百姓则大烧、大杀，强迫人民承认“不抗日”、“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英美”，一经承认则又施以小恩小惠以事笼络，称之为“威德并用，软硬兼施”。在经济上，敌对我解放区施行严密封锁，说要陷我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这种封锁政策以后长期继续，从未放松。敌人用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毒辣办法，猛烈的向我们进攻。

战局是空前紧张，“扫荡”是大大加紧了，北起冀东及大青山，南迄黄河两岸冀鲁豫，到处都爆发全面的“扫荡”与反“扫荡”。抗战第二、第三两周年，敌对华北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万左右，其间一万人至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扫荡”有二次，还有一次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配合这些“扫荡”，敌人疯狂的实施“囚笼政策”，大事修筑铁道、公路、据点、碉楼。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中，敌修复的铁路有同蒲、正太、胶济、道清、汾阳（平遥至汾阳）、微水、博山（张店至博山）、阳明堡（至原平）、周口店（琉璃河至周口店）等线，计长一千八百七十公里；新建铁道，有白（圭）晋（城）、石（家庄）德（州）、新（乡）开（封）、凤山（南张村至凤山）、西佐（马头至西佐）等线，计长四百七十七公里；合计二千三百四十七公里。新建公路有平（北平）大（沽口）路、唐（山）大（沽口）路、邢（台）济（南）路、邯（郸）济（南）路等，计长一万五千六百公里。新建碉楼、据点二千七百四十九个，其中一九四一年即较一九三九年增加四倍。

所谓“囚笼政策”，为德国塞克特的“堡垒政策”[35]与清代曾国藩[36]“步步为营”政策的结合，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给敌占区人民加上一付深重的枷锁。在“囚笼”之内，强化伪政权，组织伪自卫团，厉行“人质”政策，掠夺粮食、棉花，倾销海洛因毒品，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但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阻止人民的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和反抗，有八路军与解放区的支持，敌占区人民是绝不愿当“顺民”的。比如，敌军散发鸦片种子，老百姓将它在蒸笼里蒸熟之后再撒播在田里，自然不会发芽，敌人莫名其妙，大叫“皇军倒霉，皇军倒霉”。对于我根据他说来，“囚笼政策”则是敌封锁、割裂、蚕食、“扫荡”我根据地的依据。白晋路的贯通，把晋东南划成太行太岳两区，平汉路封锁沟墙的修筑断绝我山地与平原的物资流通，而在平原地区大修公路将我平原地割裂成井字、王字、田字形，缩小了我军活动的周旋地区。此外，敌还专门修筑了一种圆形式螺旋形的公路，以为包围合击我军的基线。在敌人进行修筑“囚笼”之前，必先以兵力向我“扫荡”，迫我让路，而“囚笼”筑成之后，“扫荡”遂更有所凭借。敌“扫荡”愈繁，

“囚宠”愈密，“扫荡”愈烈。这是华北战场敌寇活动的规律。

“囚笼”政策的实施，使敌人产生另一弱点，即兵力愈加分散，更感不敷应用，而此时由于汪逆精卫[37]之投敌，敌人遂更加强化其“以华制华”的政策，大量的有计划的培植伪军，繁殖其爪牙，并开始将伪军加以整顿，小股的合成为大股。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更采取“精兵之义”，放弃过去的乱编办法，改“皇协军”为“剿共军”，改“靖安自治军”为“治安军”，并加强伪军训练，提高其战斗力，使之协助据守公路、据点，配合“扫荡”及进行清乡，时常以一班敌军控制一排伪军而据守一个小据点。同时，又大量建立伪军之地方部队，如伪县警备队、伪警察、伪保安自卫团等。又建立爱护村和厉行连坐法，胁迫群众为其守望道路、电线。连坐法为古代“专制魔王及内战时间“反共英雄”所用的“一人犯事十人同罪”的杀人不眨眼的老办法，以期根绝抗日分子。至一九四一年底，华北伪军为数已达十四万五千人，较第一时期内约增加一倍，而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有投敌被改编为伪军的，如驻防绥远[38]的东北挺进军所属的热河先遣军司令白凤翔率部投敌，豫北的张岚峰[39]也率部数连叛变，使伪军的势力更加扩大。

(2) 友军情形：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失守、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政治即开始倒退。他们错认日本人再下会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八路军，而不是日本人。因此，把抗日政策改变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政策，专制独裁，倾向法西斯。一九三九年六月颁布了钻进共产党内破坏共产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40]，九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41]。此后，共产党遂被称为“奸党”，八路军遂被称为“奸军”或“匪军”，敌后解放区被称为“匪区”。抗战初期，他们曾将华北弃如敝履，但到了八路军艰苦作战、解放沦陷国土、打开一个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遣军北上，要再从抗日人民的手里去“收复失地”。这些被派到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其目的不是为了抗战，而是为了“反共”。因此这一时期他们在抗日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做出来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危害抗战的罪行。

他们一方面下命令要八路军退过沧石路、正大路以北之线，一方面调集大军二十六个师，以中条山为基地，杂牌军为先锋，嫡系部队在后督阵，自南而北向我迫来，以与当时日寇由张家口、北平一线自北而南向我军的“扫荡”遥相呼应。而旧日被敌截留于敌后的石友三[42]、张荫梧[43]、秦启荣[44]、赵云祥[45]、胡和道等，当其托庇于我军之时皆曾相安无事，此时在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指使和特务活动的阴谋下，也就勾结敌寇，袭击我军后方，杀害我官兵，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破坏对敌作战。此时我军处于敌寇和国民党的两支大军夹击之中，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处境十分艰危。

同时，当局又下令取消各地民选的抗日政府，连国民政府既经承认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企图加以取消，硬派一批法西斯分子充任县长、专员，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解散群众抗日团体，暗杀活埋抗日干部家属，摧毁一切抗日民主秩序。陈立夫、戴笠、康泽[46]的特务系统更派来大批特务混入解放区，造谣惑众，放毒暗杀，无所不用其极。至于我八路军每月应得六十三万元军费也从此取消，再无分文发给。总之，种种倒行逆施，使志士侧目、寇奸弹冠，记得当时北平敌伪还曾召开过一个庆祝会，庆祝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战绩。

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内战内行”的措施，我共产党、八路军起初曾一再忍让，据理交涉，希以团结抗战为重，勿令盟帮失望，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但竟未获见谅，反被目为“示弱”而进攻愈急。有些人甚且高唱“曲线救国论”，决心“联日反共”，释其卖国行为为“先联合日本，打倒八路军，然后再行抗日”。在如此“反共第一”的政策下，终于爆发了一九三九年冬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正式向我们开火。当时情势紧急，迫不得已，乃对向我总司令部所驻之地进攻的朱怀冰[47]的一个军予以还击。朱军起初声势汹汹，作战时且有日本飞机配合助战，暴露了其与日本军联合进攻之事实；对此，朱军官兵多感愤慨，一经接触，其内部即土崩瓦解。朱怀冰本人身为军长，竟经敌驻之邯郸，由平汉路、道清路坐日本人火车回大后方，至今尚在我大后方作官，诚如咄咄怪事。这次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不仅是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而且是抗战与投降之争，如果我军当时未能妥善应付，克服反共投降高潮，则华北早已被国民党断送给日本，决不会再有今日敌后抗战形势，也不会有今天的全国抗战形势，更不会有与英美盟邦共伸正义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共同事业。

（3）我方情形：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正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的局面遂一天更比一天艰苦。这时期内，我们坚定不移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既定方针，努力巩固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作战指导上，针对着敌人的“联合扫荡”与“囚笼政策”而着重进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辅的“反扫荡战”与军民结合的“交通破击战”。

反“扫荡”战，此时期内在全华北展开。在晋察冀：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边区北部进攻，我在上下细腰与大龙华打了两个大胜仗，敌遗尸近千；九月敌向我腹地陈庄突进，被我包围歼灭千余，敌水原旅团长[48]即于是役毙命；十月敌以二万兵力分十二路向边区进攻，我军血战四十三天，将敌击退，并于涞源战斗中毙敌阿部规秀[49]中将，此为中国战场上打死敌人中将领军官之第一次，敌酋多田骏在追悼阿部之挽联上写到“名将之花，凋谢太行山上”。在冀中，曾粉碎敌人的五次围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河间齐会战斗[50]中，我贺师长[51]中毒负伤。此类为国际公法所禁止使用之毒气与达姆弹等，敌寇在中国战场上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使用了。在冀察热：平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粉碎了敌人三次“扫荡”；冀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粉碎了敌人的大举“扫荡”；七月间我冀热察挺进军派一部队越平绥路深入平北，在明代十三陵地区创造游击根据地。在晋冀豫：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以六万之众发动九路围攻，贯通白晋路，深入我腹地，尽占所有城市，企图“釜底抽薪”，一举摧毁我根据地，但终为我所粉碎。在冀鲁豫：敌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年底连续发动四次大“扫荡”，兵力由一万五千至三万不等，并配备有机械化部队，也终归失败。一九三九年二月，刘师陈赓旅之一部[52]，在威县香城固创造平原歼灭战，一小时内歼敌两个中队。在山东：自我一一五师之一部于一九三九年春挺进山东后，战事即告紧张，六月，敌以二万兵力合击沂蒙山区，为我击破；八月梁山战斗，我以一个营歼敌三百余；一九四一年一月，敌以三万人“扫荡”鲁西南，又为我粉碎。在晋绥边区：一九三九年二月，粉碎万余敌的六路进攻；六月，我一二师三五八旅歼灭静乐敌六百余。大青山区，也粉碎了敌人的两次“扫荡”。此外，在此两年中，敌曾七次进犯我陕甘宁边区河防，悉为我河防部队与一二师健儿

联合击退。在这些胜利的反“扫荡”战中，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便日益巩固起来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囚宠政策”，我们发动了“交通斗争”。“交通斗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是群众斗争，唯有军队与人民结合，协助破击，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这一斗争，起初是将重心放在平原，但也不放松在山岳地区的破击战。在山区，我们曾主动地发动白晋战役、邯长战役、平汉战役[53]等，破坏敌深入我根据地的交通线，摧毁平汉路两旁的封锁沟墙。在平原，我们整年的从事有计划的交通破击战。在组织上，有军、政、民破路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破击时划分一定地段，且有指挥、掩护、联络、侦察、警戒、破击等之具体分工。破坏性质，有战术性的破击与战役性的破坏。破击时机，有季节性的破击（如春季泛滥时期、秋季青纱帐时期以及“扫荡”前后等）与随时不间断的破击。特别是对沧石路、石德路的破击，冀中、冀南均各动员五万人以上，坚持时日甚久，敌人的修路计划为之推迟半年。总计抗战第三周年，八路军在华北共破坏铁路五千三百二十里，公路一万六千四百零八公里，毁电杆四万二千二百二十根，收电线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三斤。抗战第四周年，计破坏铁路二千一百六十四里，公路一万零四百八十二里，毁电杆二十三万四千五百零一根，收电线一百四十万六千五百三十二斤。平均每天破坏铁路六里，公路三十里，桥梁一座半。差不多每七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站，九天炸毁敌人一个火车头，每天炸毁敌人一辆汽车，每天毁电杆六百四十二根，收电线三千八百五十三斤。仅抗战第四周年所破坏铁路的长度就将及一条平绥路，或一条半同蒲路，或三条胶济路，给敌人的“交通建设”的打击之大是不难想见的。

在平原地区作战，不仅要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而且要挖掘道沟，以改变平原地形。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让路。一九四一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有所有道路的百分之八十二。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运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八至十二里，这样就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拔除敌人据点是反击“囚宠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冀南经验共有六种办法：（一）常用袭扰、袭击、强攻以袭敌；（二）钓鱼，即诱敌外出，以伏击之；（三）狐狸咬鸡，即埋伏于据点附近，待敌出来时给以意外的突然袭击；（四）利用坑道进行爆炸；（五）地道战，即在村庄内普遍挖地道，其内有横墙，并村与村相通，洞口多为隐蔽，内有储粮储水及防毒设备如黄蜂窝形，敌来则利用此地道以进行战斗，小股敌则消灭之，大股敌则我从地道中进行转移，伺机以打击之；（六）利用地雷封锁，并利用坑道钻入敌人据点内打击敌人。

为了更进一步的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大量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计划，以及克服当时严重存在的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投降危机，我军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发动了百团大战。

第三时期——百团大战后（一九四一年底）至抗战五周年（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

一、敌人情形：

百团大战[54]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55]，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改为致力于“剿共”。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实系“治安肃正”之演进，意即强化其对华北的进攻、统制、奴役和掠夺。把华北变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更提出“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建立华北防战体制的方针，企图将华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太平洋的兵站补给基地。

此时期内，敌人抽走了第二十一、四十一师团去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三十三师团也曾一度抽走，但不久即被调回，此外又由华中一度调来第十七师团，并将第十、十六混成旅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六十九师团，经常在华北保持着十五至十七个师团的兵力。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敌人以“囚笼”为依托，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与“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而施行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县筑县界沟，乡筑乡界沟，强化保甲制度连坐法，用圈村办法编制大编乡，肃清内部的“不稳分子”（抗日分子或动摇分子），掠夺粮食物资，以一切方法巩固其占领区、强化其奴役的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或制造“无人区”，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墙与碉楼，防止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严重的摧毁和破坏，企图在人民中制造失败与悲观的情绪。在“扫荡”作战的战术上，则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而“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又是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我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根据地，消灭我八路军主力，以便“确掌华北”，这便是敌人政策的中心目的。在敌人的千奇百怪的阴谋进攻之下，华北战场的敌我斗争愈演愈烈，至为复杂，至为残酷，非目睹者所能想象。以“扫荡”而言，抗战第四、五两周年，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一百七十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达八十三万八千九百人，较前增加一倍，其中一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十五次，亦较前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也愈演愈为毒辣，有所谓“毁灭扫荡”、“抢粮扫荡”等，时间有延长到两三个月的，企图彻底破坏我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产、收割，消灭我之“生存条件”，情形是十分严重的。

同时，“囚笼政策”仍然是继续强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新筑与修复之铁路七百五十二公里，公路发展至三万七千三百五十一公里，封锁沟墙增加至一万一千二百三十公里，新增据点碉楼共七千八百零一个，尤以平原地区为最繁密。一九四二年十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谈话：“华北碉堡已新筑成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外长城线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所耗工程之巨，扰民之苦，是骇人听闻的。这些堡垒、沟墙，都是拆老百姓房屋的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地，强迫老百姓的劳力而修筑起来的。被抓去的老百姓，二三十人一起做工，稍有怠慢，敌兵即用皮鞭抽打，并有以水泡

石灰，使之滚热，将怠工者抛入而被脱皮烧死的。

由于前一时期受我“交通斗争”与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和教训，敌人对于交通线、据点的建筑和保护，也采取了许多新的办法。比如，填高铁路之路基，路轨不用螺旋钉钉在夹板上而改以死钉钉死，使不易拔取与破坏，又在重要地段附近预置铁轨器材以便遭我破坏后迅速修复。公路两旁挖护路沟，深八尺宽一丈二尺，许多重要公路且筑有平行路，此条遭破击，另一条仍可通行。电杆用钢筋水泥之建筑保护，上悬路灯，每隔三五里置一电话机、不断的联络通报。碉楼筑外壕，架铁丝网，最重要的且通以电流。最毒辣的是利用编乡保甲强迫敌占区人民分段保护交通，要他们晚间放哨当“肉电杆”，哪一地段遭到破坏，即由该地段附近村庄负责修筑，赔偿损失，甚至屠杀人民以为报复。这些，就使我们在破坏敌人交通上增加很多困难。

由于交通线与据点之增加，需要更多兵力配备，同时敌人企图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乃更加大大地扩充与整顿伪军，虽有我军之争取与瓦解，华北伪军在一九四二年仍达三十四万之众，尤以山东为多，占十五万七千人，多半是由国民党地方武装哗变投敌的。国民党在敌后，为敌人培植了不少爪牙，增加我抗战军民的许多困难与负担。

但这一时期，敌人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和矛盾，主要的是：（一）“治运”之推行，奴役与掠夺分外加紧，民族矛盾空前增长，敌占区人民无论哪一阶层都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均增加了同仇敌忾之心，便于我对敌占区工作的开展。（二）交通线与据点之增殖，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愈益暴露，不能不更多的依靠伪军，并分散配备，将旧据点的兵力抽到新据点去，使其后方更加空虚，为我造下更多的活动余地；至于伪军的“不可靠”，更是敌人不可挽救的悲哀。（三）日军厌战情绪比以前严重，士气比以前低落，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敌兵感到返国无望，悲观沮丧与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我要在这里代表华北一万万同胞，控诉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这一时期，日寇绝望之中的疯狂暴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决非世人所能想象。这种暴行并非个别日本士兵的行为，而是日本军部有计划的“杰作”，反之有许多日本士兵倒是不愿意而被强迫干的。这个“杰作”的名字，就是每一提到都令人热血上涌的所谓“三光政策”。在“扫荡”中，凡敌人兵行所遇、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许许多多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杀人之惨，较之吃人生番的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平白无辜的老百姓都被杀掉。八路军士兵或抗日干部被俘获了只有死路一条，有用以训练新兵射击或刺杀作活靶的，有用以训练军犬作猎物的，有被活埋的。杀人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滚水剥皮的，有挖眼睛的，有抽舌头的，有摘心肝的，有“五牛分尸的”，有将人挂在树枝上割为两半的。小孩子也被杀掉，并有剖开孕妇之腹以取出胎儿杀戮的。对于妇女的侮辱，更为古今中外所仅有，强奸之后，有割其阴户钉在树上的，甚至强迫父淫其女、子淫其母，以为作乐取笑，颠乱我中华民族的人伦和道德。虽疯狂的野兽，也赶不上日本军阀的残暴。敌人梦想其残暴兽行，可收震慑人心、动摇我军民抗战意志的“功效”，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全体军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是更加深重，抗战意志是更加坚定，坚信只有消灭日本法西斯才能获得解放。这笔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我们希望在打败日本以后，能把在华北作恶的那些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交给华北人民来公审制裁。

二、友军情形：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友军遍布于晋、冀、鲁、豫各省，号称八十万大军，实际上约有四十八万至五十万人。计中条山周围有曾万钟、刘茂恩、李家钰[56]等集团军约二十五万人，晋冀豫交界地区有庞炳勋、孙殿英[57]集团军及地方纵队约八万人，山东于学忠、沈鸿烈[58]、秦启荣部及地方保安队约十五万人，此外还有阎锡山部队之一部。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这个数目不能算小，但他们采取的方针仍是：“反共第一”。他们认为敌人“不足虑”，在剿共中容易与敌订无言协定（反共将军李仙洲[59]语），因而对敌人则一味观战，被动招架与应付，求得“和平共居”。更有暗地与敌人谈判投降条件者，信使往返于平津、太原、新乡，大摇大摆，毫不以为可耻。而对八路军与抗日人民，他们则视之若眼中钉，所谓中条山抗日基地实际上主要还是反共基地。庞炳勋窥我太行，阎锡山于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复派四十三军与六十一军袭我大岳，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之率部奉命入鲁也是为了反共。

敌人抓紧友军之“反共第一”的特点，采取诱降与威逼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即继之以军事压力。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敌人发动中条山战役[60]，友军既以“反共”为事，对敌人作战就毫无准备，致使不到三日敌人尽占温、孟、济源、平陆、垣曲等县，全军溃散，被俘达十万之众，有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以及第三、九、十七、八十、九十三、九十八军之各一部投敌，为数约二万二千人。与此同时，日阎谈判失败[61]，敌人进攻晋西南地区，晋军骑兵第一军被击溃，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团被消灭，骑一师师长赵瑞、骑二师团长杨诚[62]各率一部投敌。一九四二年六月，敌在“扫荡”太行我军之余，进攻陵川、林县，新五军暂三师的两个团溃灭，第二十七军四十五师溃不成军，预八师在当时仅得保存两千入，新五军暂三师师长刘月庭率部三千人投降敌人。接着敌人又“扫荡”山东，东北军大受损失，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三个团（约五千人）投敌。这就是友军在这时期内的表现。

此外，这一时期内华北友军投敌者逐渐增加，其较大者有：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率部六千人投敌，山东警备处长孙玉田[63]率部三个团投敌，山东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率部八千人投敌，暂编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率部四千人投敌，山东警备第三旅旅长齐子修[64]率部八千人投敌，新五军四师团长王天祥率部一团投敌。此外，较小的在冀鲁方面尚有杜心齐、吴恩胜、周长富、刘经川、高玉林、曹振东、苗春庭、董砚朴、成建基、董硕儒、徐斌彝、杜孝先、莫正民、高玉朴、蔡吾康、李岐山等多人率领地方武装投敌，给敌人大大扩张了实力，且其中不少为保安队、地方武装等，对地方情形熟悉，为害不小。所有这些人的投敌叛变，国民党当局从无有一纸明令讨伐或通缉，而这时却正是国民党当局高唱“军令军纪”唱得最响的时候，所谓“军令军纪”为何也就不难了解了。

三、我方情形：

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但我也支付了相当的代价。百团大战时，我军使用兵力的总数为四十万人，而一九四一年曾一度略有减少。同时，由于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下采取了一套新的特别野蛮和狠毒的进攻办法，而我们在初时还缺乏充分的研究，缺乏一整套针锋相对的方策，因而也曾吃了一些亏。至一九四二年春，华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

了三分之一，冀中、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变成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处于非常严重的局面，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与锻炼，我们便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寻到了制胜敌人的办法，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根据地；同时，针对敌人的“总力战”，我们也实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上的一元化的对敌斗争，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深入到敌人心脏里活动，打击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使敌人“变华北为兵站基地”的企图归于破产。如果详细说来，则可分别为在根据地、在游击区、在敌占区的三整套办法如下：

甲、在根据地：

我们首先努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为只有根据地建设得好，抗日的力量增强，才能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

在建设根据地上，我们做的工作是：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实施三三制（即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治。经济政策上，厉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倡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分散建设手工业，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自给，冲破敌人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文化工作方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增设国民小学和中学，加强冬学等社会教育活动；帮助报纸书刊的出版发行，提高人民民族民主思想和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军事工作方面，加强军区建设，培养地方武装和民兵，将正规军分遣于各分区并抽调部分军队干部和武装分配给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以帮助他们发展和训练，提高其战斗力，建设起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一九四一年我正规军数量虽有减少（但质量提高了），而县以下的地方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又是兵又是民的民兵，差不多都较前发展了一倍。

在反“扫荡”作战方面，我们采取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我们以一部分主力分散开来与民兵相结合，依靠地方游击队与民兵日夜和敌人扭打，在敌进犯时，不断的袭扰敌人、截击敌人、围困敌人。民兵利用土制的地雷、手榴弹和石雷到处巧妙地杀伤敌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所掠夺，以切实保卫人民的利益。同时，我另以有力部队转进敌后，破坏敌人交通，打断敌之补给线，摧毁敌占区的统治机构，错乱敌人的作战布置，主动的制造敌人的混乱和恐慌，然后灵活的集结部分主力坚决消灭敌之一部，迫使敌人撤退，粉碎敌人的“扫荡”。这就是依靠地方武装与民兵有力的坚持我腹地游击战争，使二者作为主力的有力配合的战法。此时期中之后期，许多次敌人的大“扫荡”都是在这种战法下被粉碎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以六万兵力“扫荡”我晋察冀北岳区，敌人事先有周密的计划，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岭上建筑起一条南北五百里长的封锁线，然后反复合击我腹地，以寻求我主力决战；我即在腹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同时以有力部队出击平汉线，敌虽坚持了三个月的“扫荡”，但终于支持不住，鼠窜而逃，沿途又遭受我严重打击。又如，一九四二年四月，敌以五万兵力发动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采取“拉网捕捉”的办法企图歼灭我主力，但在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下，其目的终归落空。唐河两岸地区虽为敌一时所控制，但不久在游击战争火焰的

燃烧下，又把敌人在大“扫荡”中所获得的些微成果夺取回来了。再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以八万兵力对我太行山区实施“铁壁合围”，起初凶猛无比，但当我游击战争展开时，便疲于奔命，终于在我军不断袭击下被迫撤退。

乙、在游击区：

针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向敌人展开反“蚕食”斗争。我们采取充分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结合，实行“正面坚持们敌后配合”。在正面我们组织联防线，以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结合、乘敌立足未稳，给以坚决打击，斩断敌人的蚕咀。在平原地区，堡垒林立，活动异常困难，我们便创造了黄蜂战，即以地道战（坑道和掩体）、坑道爆炸（掘至敌人堡垒下，以硝药爆炸）和地面的游击战结合，以保卫村庄，使敌人每占领一个村庄、一条河流都需支付重大的代价。比如争夺冀中北垞村，敌人便死伤了七百多。在敌后我又以武装深入敌占区活动，激发群众的抗敌热情，推翻伪政权，使敌人腹背受敌，顾此失彼。此外，我又集结主力，乘敌之隙，坚决拔除深入我内地的敌据点，或袭占敌纵深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被动地位。采用了如此种种对付的办法，至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蚕食”政策即归于失败了。

丙、在敌占区（或敌后之敌后）：

以反“清乡”斗争为主，我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越过敌正面的封锁沟墙、据点、公路，潜入于敌人的格子网内（囚笼里面），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一致对敌”的口号下与群众共商对敌斗争的办法，切实保护人民利益。

武装工作队是军队、政府、人民结合的一元化组织，也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斗争形式。其成员包括军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和模范战士、政府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敌工干部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友等，组织精干，纪律严明，政治觉悟也较高。每个队员都是战斗员、宣传员、组织员，能打仗又能独立作政治活动，分合自如，出入无常，敌人找下到他们，老百姓却经常与之会面，同敌人进行明的、暗的、文的、武的、动的、静的各种斗争，其活动的最高准则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一切为着人民利益、为着抗战利益。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的经常工作，是发动与组织人民，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比如寄慰问袋给日本士兵，利用机会与日本士兵用电话通话，上夜课，占领敌人的会场宣传我军与盟国的胜利战绩，通过访问伪军家属进行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等。总之，用各种方法，燃起日伪军的反战火焰。打击敌宪兵队、特务队及死心踏地、鱼肉人民的汉奸，使其不敢随便入乡勒索人民，减轻人民的负担与痛苦，同时对于可以争取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也设法加以争取，摧毁伪政权、伪情报网，解放伪合作社和仓库，使敌失去统治、奴役和掠夺人民的爪牙。反对敌人的抓丁、抢粮，在敌人抓丁、抢粮时，予以袭击和截击，以解救壮丁、保护粮食等等。

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活动，处处要取得人民的掩护与配合，因而宣传与组织人民为其经常的重大工作。比如，组织“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游击小组、“保家民团”等，增加真正的人民自卫力量，以数村或数十村互通声气、齐心对敌。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生了根，就可以创造出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如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三者相结合的斗争，一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停止了敌人的前进，使其压缩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同时又在敌后之敌后解放出许多村庄，建立起抗日基地，把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以至游击根据地，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破产，使“治安区”永远不安，使其一切吸吮物资、征兵南下的计划均成泡影。敌人一九四二年曾拟在华北征粮二千万石，结果其所得当不超过十分之一。如在太谷县预定征粮六万石，结果连抢带买只得三千石，仅及预征额的二十分之一。在我政治攻势宣传下，日军士气逐渐下落，一有调往太平洋的风声，士兵们就愁眉不展，向人表示“死啦！死啦的！”山西、河北、山东各地，都一再出现日军集体自杀或失踪事件。石家庄、安阳等地还发生过日兵暴动事件。这样士气的部队，即使有一两个师团调往太平洋作战，效能也要降低。抗战第四、第五两周年，我俘获伪军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人，反正的有九千四百八十四人，此外，被我打散、解放的伪自卫团与被征壮丁则更不计其数，无怪乎敌酋和汉奸头子王揖唐[65]都叫苦连天，说什么“华北因匪患不靖，兵站基地的一切使命均无法实现”。

这就是我们从敌我的生死斗争中创造出的一整套战胜敌人的办法。

第四个时期——抗战五周年至今。

这一时期的情形，由于交通困难，有些报告尚未收到，有些材料尚在整理，因而只能较简略的谈一谈。

一、敌方情形：

这一时期，敌人经常保持十四个师团左右的兵力。敌人进攻中原时，曾从华北抽调了第三十七、一一一师团和独立第七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第一一师团原在石家庄地区，现已为敌新编师团所接替；独七旅团原在胶济路西端，已为申板旅团所接替；第三十七师团原在晋南之三角地区，现为第六十九师团所接替；第六十九师团原驻之临汾、汾阳地区，现由第十三旅团和特务旅团接防；骑兵第四旅团原在陇海线开封、碭山地区，现为伪军张岚峰所接替。此外，第三十五师团他调后，新乡、开封及道清西段之防务，已由铃木旅团及第四旅团所接替。

在向我进攻的方针上，自“治强运动”破产后，敌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提出了诱降之所谓“对华新政策”。这是敌人“以华制华”政策的新发展，因敌占领南洋后，要利用汪逆的臭招牌接管敌后，所以企图以所谓“民族形式和地方形式”来统治和进攻我国。同时，在华北敌占区，敌人还发动了所谓“新国民运动”作为“治强运动”的继续，不过其名词更较“温和”一些而已。

“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对付友党友军，并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幌子；而对于八路军的进攻和压迫，不但没有丝毫放松，反而更加疯狂和残暴。抗战第六、第七两周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千人以上的“扫荡”共一百七十七次，使用兵力为六十六万多人，其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二十二次，使用兵力二十九万七千人。此时期内，“扫荡”的特点是以“铁壁合围”与“驻守清剿”相配合，更带有毁灭性与长期性。

在“对华新政策”的诱降下，华北友军大批叛变，敌人并以“青天白日”旗帜诱骗善良的农民参加伪军，伪军数量遂较激增，总数达四十七万。齐燮元的伪治安军，即由号称七个集团军扩大为十二个集团军。一九四三年冬，敌人更大肆整顿伪军，表面上由汪逆统一指挥（实际上绝不能达到统一的目

的），将治安军、剿共军陆续改编为华北绥靖军，并另扩充伪中央军，逐渐向充实装备、严整编制的方面发展。

二、友军情形：

中条山战役以后，华北战场上友军的实力已大为弱削，剩下的只有在山西的晋军，在晋豫边的庞炳勋、孙殿英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在山东的李仙洲、吴化文[66]（于学忠在李仙洲入鲁时奉命离鲁），此外为一些地方性的武装，如山东的宁春霖、秦启荣和晋豫边的侯如墉等。

这些在华北战场上残余的友军，不但没有从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中取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以求改弦更张，放弃“反共第一”政策；反而变本加厉，更为丧心病狂地与敌寇“联合反共”、采取“变奸伪区（反共将军们给我抗日根据地的称号）为敌区，再由敌区变为自卫区”的借刀杀人政策。这明明白白地是在为敌人效劳，是和敌人“以华制华”的“对华新政策”两相心照呼应。

但是，敌人并不完全满意于友军的如此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态度。所谓“对华新政策”中不仅有“拉”的手段，而且有“打”的手段。敌人见“拉”的手段已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已把许多友军“拉”为实际上的奴才，乃进而迫其“明朗化”。一九四三年敌人对友军连续进行军事上的压迫，于是有所谓“山东战役”与“昭和十八年夏的晋豫之战”。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或公开与敌相勾结。除李仙洲部有一部退过黄河外，其他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豫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宁春霖、冀察游击四纵队侯如墉、山东游击三纵队秦启荣、山东游击四纵队王尚志、河南九纵队李旭东等，都纷纷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自中条山战役以来，友军正规部队投入“汪逆之伪和平阵营”的前后约有十五万人，许多部队在投敌以后番号不变、防地依旧，完全证明了是久已暗中通敌；而我英美盟国援助我国的武装弹药，不但早已不曾用之以打击敌人，而且整整齐齐的公开的奉献敌人，实堪痛心。今天，这些伪军大多环伺我各抗日根据地周围，充当日寇向我“扫荡”之鹰犬走卒，其行为特别残暴和无耻，为我抗战军民之死敌。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一意孤行的巨共反民主政策的恶果。

现在华北战场上仅存的友军，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张里元（新三十六师）、赵保原（暂十二师），都是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阎锡山部号称二十五个师，实际每师平均只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大部都背靠后方与日寇“和平共居”。只有一个六十一军，为进攻八路军与决死队，于去冬与日寇订立协定，在日寇掩护下由晋西南进入晋东南，形式上好像是在敌后，实际上跟敌人是一家人了。

三、我军情形：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奠定了这一时期胜利开展的基础。我们继续坚持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更努力于开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对华新政策”，揭穿其各种各样的欺骗，宣扬美国在太平洋上反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以振奋人心，更进一步动摇日伪军，并不断的主动出击敌人，打击作为敌人爪牙的伪军、伪组织。

反“扫荡”作战方面：山东清河区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与十一月两次粉碎敌二万人的大“扫荡”。晋冀豫太行区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五月先后在四次反“扫荡”战中都取得胜利，特别是后一次反“扫荡”战，在主力与民兵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下，依靠着出敌不意的袭击和广泛开展的地雷战，显示了我军民作战的很大威力；辽县、武乡境内，凡与敌人接战村庄的民兵，平均每村打死十三个日本兵，每五颗子弹打死一个日本兵；警卫团第五连与民兵相结合，百余人打死了一百二十三个敌人，自己仅有数人伤亡。晋察冀北岳区于去年九月到十二月胜利地粉碎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万五千敌人的大“扫荡”，由于在这次“扫荡”中，敌人不仅想打击我主力部队，而且要破坏我秋收及囤粮计划，企图在经济上予以摧毁，因而我们反“扫荡”作战的组织也十分复杂，一面要艰苦作战，一面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从事生产，最后终将敌人驱走，完成了秋收和囤粮计划。冀东区曾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二月至四月击破敌人的两次大合击，第一次在山海关附近，第二次在锦热路上。

各地我军主动出击和组织远征方面：晋冀豫的太岳区在中条山友军退出后即遣军南下，又从敌人手中重新解放了中条山，今年四月复攻克沁水等县，前后解放国土一万六千平方公里，我军先头已活动到黄河沿岸；太行区于今春收复林县、榆社；在冀鲁豫平原，自德石路以南至陇海路，我军克复了清丰、内黄、朝城、城武、莘县、菏泽等县，并由武工队开拓了数十块隐蔽的小游击根据地，共解放人口千万。晋察冀的北岳区，去年一年中消灭了敌人五百八十一一个据点，恢复和开辟了三千个村庄；冀中，我军克任丘，肃宁、高阳等十余县城，敌人据点在一九四二年为一千三百四十三个，至今被我消灭得只剩下四百九十五个了；冀察热我军北出长城口外，东向辽宁之锦州和热河[67]之凌源、承德，新开辟了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此外，晋绥边区和山东我军的的活动均有发展，山东方面已扩张至海岸线。

讨逆战争方面：去年八月，大行我军出动讨伐伪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毙俘伪军六千人，伪暂编第七军军长刘月庭为我击伤。十一月，鲁南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刘桂堂部，将其全部消灭，滋扰华北六七省、为匪数十年之刘桂堂也为我击毙。同时，鲁西我军讨伐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孙逆总部直属队被消灭，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人 就擒。又滨海我军讨伐伪和平救国军三十六师七十一旅，攻克赣榆县城，活捉伪旅长李亚藩等一千二百人，使之全军覆灭。鲁中我军于去年冬至今年春，曾发动三次讨伐伪和平救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部的战斗，将吴逆总部各处和伪四十六、四十八师两个师部，以及其部下十三个团消灭殆尽。这些战斗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羽翼，破坏了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某些收获，也使其始终无法由华北战场抽调大批兵力出去，其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以上的许多战役，华北解放区的面积大为扩张，人口新增加了二千万，因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军在华北敌后渡过严重困难后再次开拓和发展的时期。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于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二十二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敌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

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胜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既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我根据地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68]之多伦和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里；跨越华北之晋、冀、察、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兵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兵力。人力方面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至百分之二十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五十七，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兵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敌人七年来对华北我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下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

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的，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胜利地坚持下去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黩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道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都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在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等；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来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笼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得不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也应该是属于优势，但可惜的是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的加以利用。相反的，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厌、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部队的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且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以上这些，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不如敌人，

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特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当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出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并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间，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当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巨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最终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我把华北七年抗战的真实情形，向我们反法西斯的美国盟友介绍，就此结束。

注释

[1]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七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当时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假借“中日共存共荣”、“发展贸易”等名义，提出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扩张计划。这个奏折被称为田中奏折。日本以后的侵略步骤与这一奏折中的计划相吻合。

[2]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省。

[3]香月清司，一九三七年七月任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华北地区的日军作战。同年八月，日军撤销中国驻屯军建制，改设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任方面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任华北方面军所属第一军司令官。

[4]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决

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民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此后，决死队纳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5]杨秀峰，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冀西游击总队（后纳入八路军建制）总队长、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等职。

[6]范筑先，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六区（聊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7]徐州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

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

北两线兵为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

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

[8]李守信，曾任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一九三三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任伪热河游击司令、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

后曾任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等职。王英，曾任国民党

军第二十九军参议。一九三六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后任伪绥西联军司令。

赵雷、曾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第四师师长。

[9] 齐燮元，原为旧北洋军阀将领，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部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

办、内政总署督办、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等职。

[10]南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河北南口地区进行的战斗。忻口之战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

与

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这两次战役均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共歼敌近二万三千人。

[11]赵登禹，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战斗中牺牲。佟麟阁，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南苑战斗中牺牲。郝梦龄，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忻口战役中牺牲。

[12]韩复榘，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底至次年一月初，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

[13]李服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第六十一军军长。一九三七年十月因天镇战役失利被阎锡山枪毙。

[14]阎锡山，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5]王克敏，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潘毓桂，原任国民党北平（今北京）公安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任北平（今北京）维持会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天津特别市市长。

[16]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7]刘师长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徐副师长指徐向前，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18]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平定七亘村以东及以西地区两次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辎重队，歼敌四百余人。十一月二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黄崖底地区伏击日军第一九师团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山西昔阳广阳伏击日军第二十师团一个联队，歼敌二百五十余人。

[19] 曾万钟，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军长。

[20]二五减租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的一种形式。即地租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

[21]长乐村一战是八路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中的一次歼灭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武乡长乐村地区与日军一八师团步兵第一四旅团旅团长苦米地四楼指挥的两个联队展开激战，歼敌二千二百余人。

[22]常冈宽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山西广灵邵家庄战斗中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五九旅击成重伤，当时曾认为将其击毙。

[23]崔培德，当时任伪皇协军第二军军长。

[24]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河北涉县响堂铺地区伏击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

[25]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第十（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26]宋、邓支队指宋时轮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雁北支队和邓华任支队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一九三八年五月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政治委员。六月，向冀东挺进。

[27]扈全禄，原为豫北一带的游杂土匪武装头子，后曾任国民党军豫冀边区游击独立第八支队司令，一九四三年率部投敌，任汪伪暂编第六军独立一旅旅长。

[28]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29]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占领徐州，随即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武汉。同年六月至八月，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庆至九江一线的长江沿岸地带。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通路。自八月下旬起，日军以第十一军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向西推进，以第二军为侧翼经大别山北麓向信阳、武胜关方向实施迂回，兵分两路会攻武汉。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了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十月中旬，日军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近武汉。十月二十五日，守军被迫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30]寺内寿一，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

[31]治安肃正计划是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

[32]这里的会指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后在华北各省、市、县设立了分会。

[33]所谓总力战，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34]“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

[35]塞克特，德国将领。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堡垒政策又叫碉堡政策，是国民党将领鲁涤平、金汉鼎、柳维垣和戴岳等人先后提出的。

[36]曾国藩，晚清地主阶级军事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任兵部侍

郎、两江总督等。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将。

[37]汪逆精卫即汪精卫，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离昆明至越南河内，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8]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9]张岚峰，原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抗日战争爆发后授降日寇，历任汪伪苏豫边区绥靖军副总司令、第一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等职。

[40]《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春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文件规定采用各种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行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41]《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指国民党中央一九三九年六月秘密制定，十二月明令实施的《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这个文件包括最高原则、施行通则、具体办法、方式与技术四部分。主要内容是：“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两种，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则予以‘事实上之教训’，以‘严厉’对之”；在“制裁共产活动”的方式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扣地位，军队则为后盾”；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晋察冀、冀中、冀南等根据地，严禁十八集团军发展，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等等。

[42]石友三，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

[43]张荫梧，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44]秦启荣，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山东第三游击纵队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勾结日寇，制造磨擦，行同汉奸。

[45]赵云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

[46]陈立夫，国民党CC派首领，中统特务的创建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长期控制国民党中央人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戴笠，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代行局长职权）。康泽，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中华复兴社书记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等职。

[47]朱怀冰，一九三九年时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十七军军长。

[48]水原施团长指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一九三九年九月，八路军第一二师等部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战斗中歼灭该旅团第三十一大队等部一千余人。当时曾认为已将水原义重击毙。

[49]阿部规秀，曾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战斗中被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击毙。

[50]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师长贺龙的指挥下，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在河北河间县齐会地区展开激战，歼敌七百余人。战斗中，日军发射毒气弹，贺龙等人中毒。

[51]贺师长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52]刘师长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陈赓之一部指陈赓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第三四四旅六八八团。

[53]白晋战役指一九四〇年五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山西白圭至晋城铁路（简称白晋铁路）线摧毁日军交通线的作战。是役彻底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消灭日伪军三百五十余人。邯长战役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公路（又称邯长大道）沿线的破击作战。是役消灭日伪军七百余人。平汉战役指一九四〇年四月八路军冀南军区部队对平汉铁路以及由该路伸向冀南抗日根据地内的主要公路展开的破击作战。是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分割、封锁我冀南根据地的企图。

[54]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

[55]冈村宁次，日本战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历任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56]曾万钟，一九三九年二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刘茂恩，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一九三九年十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

[57]庞炳勋，一九三九年九月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一九三九年后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58]于学忠，一九二九年后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总司令。沈鸿烈，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任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59]李仙洲，一九四一年五月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三年二月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

[60]一九四一年五月七日至二十七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大约十万人的兵力对位于晋南、豫北的中原山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十七、八万国民党军队，本以反共为其主要任务，对于日军的进攻疏于戒备，因此在敌人进攻面前迅速溃败，大部分部队撤往黄河以南地区。

[61]这里指一九四二年五月阎锡山和日本侵略军在山西宁乡县安平村举行的秘密会谈。由于阎锡山中途溜走，未能达成协议。

[62]杨诚，曾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团长。投敌前任骑兵第一军第四师师长。

[63]孙玉田，原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署保安旅旅长，一九四二年随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投敌，任汪伪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七师师长。

[64]齐子修，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保安第五师师长、山东省第六区（聊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率部投敌。所部编为汪伪第五十七军。

[65]王揖唐，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亲日派汉奸。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一九四二年六月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66]吴化文，一九四一年五月后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师师长。一九四三年三月投敌，任汪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67]热河，旧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68]察哈尔，旧省名。原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后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建制。

关于外线作战问题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

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是外线作战。内线作战是有后方的，是在十年来熟悉的战场上作战。到新区去是无后方作战，群众没有马上发动起来供给军事上的需要，人地两生。在这样困难条件下，依靠什么呢？依靠我们坚强的阶级队伍，即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因此我们要在上改中巩固我们的部队，这也要打通思想，整顿组织，提高和起用大批工农干部。任何没有纪律的队伍，战斗力是不会提高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巩固部队，整顿军纪，要同打仗一样重要。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即是为了打好仗。

朱总司令已宣布并解释了自卫战争[1]第二年的战略新方针，提出了进行全国的新反攻，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这样打法，既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又可以留下一部分主力配合广大人民，继续在内线消灭敌人的主力。这样即开发了我们人力物力的资源，缩小了蒋之人力物力。有人问，我们已经消灭了他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内线再打一年，再消灭他三分之一，也不行了吗？何必打出去呢？出去了是否能存在住呢？有很多困难怎么办呢？我们说这个方针肯定的是对的。我们过去爱国自卫战争的方针，是在解放区内打歼灭战，我全解放区党政军民一致努力，团结英勇作战，

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获得了伟大胜利。今天打出去，决不是偶然的动机，而是根据一年来，战争规律的发展，斗争形势决定的。这即是蒋管区人民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反饥饿，得到土地，得到民主。在经济上，我们要开源节流，在军事上打乱蒋之部署，更便于有机会歼灭他，达到彻底消灭蒋介石军队。

我们的根据是：积极方面，我们已经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力量，有力量打出去。从消极方面看，战争是打家务，打本钱，我们要消耗，敌人要破坏。今年华北的收成又不好，增加了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要努力工作，使消极的因素积极化，缩小消极的因素，扩大积极的因素，因此使我们不能不打出去。

从战争的实际情况看：

- 一、我们已经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了敌兵力三分之一。
- 二、把汀进解放区的进犯军歼灭了二分之一。
- 三、把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吸引到解放区。
- 四、已把敌人的全面进攻打破，敌人已转到重点进攻。敌人加强两翼，中间薄弱，这便利我们从中间突破。
- 五、东北我军的强大，迫使敌人两面作战。过去蒋介石利用停战，先打关外，再打关内，企图各个击破，消灭我们。但我们并没有上当，我们经过了六个月的和平，得到了准备与组织的时间。

我们现在已更加强大，与敌人实力已相差不远了。我们的军队经常是满员的，我们伤亡了三十万，俘虏敌人六十多万，争取了三十四万参加我军，正补充了我们的缺额。再加上土改后农民踊跃的参军，我们的部队就更加壮大了。我们的装备也加强了，重火器，特种兵器加多了，质量方面也提高了，

这是叶剑英在土地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大批翻身农民加入军队，政治质量就提高了。俘虏兵到了我们部队里，实行了三合教育（一个翻身农民，一个老战士，一个解放战士[2]，互相诉苦控诉），更提高了部队觉悟。这应是全军普遍采取的办法，它可以提高觉悟，提高技术，提高战斗力。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带进部队里去，为政治部门所掌握，即成了部队结合地方，发动农民的有力武器。我们的后勤工作也大大改善了。今天的战争，需要有坚强的后勤工作。后勤工作与农民工作结合，就成为长期支持战争的力量。

一年来我们胜利了，强大了，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而敌人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失败情绪，官兵士气极度低落。

蒋介石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兵力，抽调到陇海路以北，后方极为空虚，只有二十七旅守备整个蒋管区，有六个省无一个正规军。他两翼作战的结果，中间薄弱了，后方空虚了。蒋管区群众因蒋之总动员、总压迫、总抢劫，怨声载道而对我们的胜利则表示热烈欢迎。

从以上情况看来，我们应当促成革命高潮早些到来，这都是积极的因素。

下面再分析一下消极的因素：当前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浩大、持久的，无论是胜者或是败者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蒋介石想从时间上、物质上战胜我们，因他有美国的支持。我们的对付办法，除节约外，即是发展空间。过去我们是不惜一城一地的得失，现在是扩大空间，支持时间。我们是落后的交通供应，支持近代的战争，故人力物力的消耗是很大的。歼灭敌人一个旅，要付出三千人、三千发炮弹的代价，打了个峰县就打了六千发炮弹，打得财经机关猛叫！再加上敌人的破坏，蒋介石请了冈村宁次[3]作顾问，实行“三光”政策，创造无人区“竭泽而渔”的残酷办法。敌人可用黄河决堤放水的办法[4]，来破坏我们的生产力，又加上解放区的旱灾，最好的地区仅收六成。解决以上困难，也需要我们打出去。

总合以上各方面的情况：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可以打出去。三、为保证最后战胜蒋介石，不让敌人破坏，保持我们的人力物力，也需要打出去。

十年内战时，敌我力量悬殊，毛主席即主张把主要战争引到蒋管区去，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但今天打出去，是与过去不一样，是于我们更为有利。不打出去，是蒋之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蒋介石要求我们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我们不打出去，即犯了错误。

今天是革命高潮的前夕，我们一打出去，蒋介石即吓得手忙脚乱。自从我们打出去后，蒋介石的部署大乱，王仲廉[5]要交法庭公审，说他放走了刘伯承[6]，罗广文、王敬久[7]部下好多官员被撤职，蒋介石说要布置长江防务，武汉忙于设防搬家。

中央指示：打出去要建立新根据地，要大量歼灭敌人，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权，经过反复作战，才算是根据地。

我们打出去是有困难的，如何克服呢？有很多人担心。我们相信在中央、军零指示下，刘邓[8]是会打得很好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支援，使他们完成任务更迅速。我们要支援他们，不要搞本位。

目前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一、解放区巩固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遇到过抵触的，当时在边区提出打阎锡山[9]，很多人强调巩固中发展，实际上这是保守观点。毛主席说一定时候只存在发展中才能巩固。应发展，而强调巩固，这是保守的；

不能发展，而不估计困难，这是冒险的，今天发展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方针，一定要发展，一定要他稳得住。老解放区有责任帮助正在发展的刘邓。一切保守自私，没有远见，没有整体观念，对我们是有害的。

如何帮助呢？我们是他们后方的后方，他们一定时间要进行无后方作战，但大兵团又不能无后方作战，后方要他们自己创造、我们老地区也要担负起他们的后方任务。首先抽调训练运输干部，这是全解放区的任务，使他们得到很多的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他们有了干部，可组织无数武工队、游击队在我们主力周围。我们就像一个铁螃蟹，各处发展歼灭敌人，我们即由流动的变成相对固定的。我们还要在物资上兵员上帮助他们。

二、战争是全面的，要配合作战，甚至集中作战。打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就不管是错的。这要求我们要有全面的观点，要有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精神。

要加强集中领导，如野战军归军委直接指挥。最高统帅部才有好的全国战略的部署。战略部署好了，战役指挥归各指挥员负责军区还是有用，有工作做，协助野战军，指挥地方武装，扩大武装。保证野战军人力物力武器的充足，监督野战军，执行军委命令。

三、军事上的几个问题：

1. 加强武工队的组织，特别是外线作战的部队。武工队不要成为暂时的，要成为野战军的建制之一。要经常存在，经常有工作，通过它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政府。武工队多了，即减少了野战军的困难。

2. 加强战地俘虏工作。对俘虏要大量争取使用，只要换脑筋，即使用，随俘随补。没有教育是不能巩固的。

3. 先前不重视一城一地的得失，目的为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今天要大量使用力量，不怕牺牲，大量歼灭敌人。要大力发动人民，而广大乡村人民的发动，将成为我们生根稳脚发展的关键。乡村与城市同样重要，我们是先占乡村，再占城市，要加强乡村工作。

4. 地主武装不消灭，农民是不敢抬头的，也给建设根据地增加困难，因而消灭地主武装与消灭敌人野战军同样重要。

四、蒋管区的工作，今天主要说城市。中央要加强蒋管区工作，城市工作更有其重要性。我党是由城市开始的，后来到了乡村，再到城市，这是运动的起点，也是运动的止点。过去是由南方到北方，现在是由北方再到南方。根据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我们历史上的经验，敌人投降后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经验，进城市是一件麻烦事，是一个大事。城市工作的任务是里应外合和严肃管理带农民进城是个麻烦问题。应首先认识城市的设施是人民的血汗，要爱护人民的血汗，要以土改中爱护农民血汗的精神，爱护城市的东西。一切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谁也不准破坏。要把这个思

想带进去。

一九二七年是革命的低潮时期，今天是革命的高潮时期，将来城市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城市工作做好。今天要加强城市工作，要派坚强干部去做。

城市工作的路线，也是依靠劳动人民，依靠各方面的配合。要针对军队需要，布置城市工作，加强对城市工作的研究。

注 释

[1]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和停战协定、发

动了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后来自卫战争发展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2]解放战士是指被解放后、经过教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当时也称被俘国民党军官为解放军官。

[3]冈村宁次，日本战犯。曾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秘密充当国民党政府高级军事顾问，出谋划策，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4]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配合其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堵死黄河花园决口，使黄河东归故道，水淹解放区军民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为此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争取时间组织解放区军民抢修黄河故道两岸的大堤和搬迁故道中的居民，最终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堵口前完成了复堤和迁移工作，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5]王仲廉，原任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司令官。因为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鲁西南战役中失败，于八月被撤职。

[6]刘伯承，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兼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

[7]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8]刘邓即刘伯承、邓小平。

[9]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办好华北军大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

华北军政大学，自从六月份成立到现在，已经育四个多月。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根据中央军委的方针，及华北局的指示，在六月召开了政工、教育、行政三个会议，在会议上，对于军大的教育方针，作了传达，对各部门的工作中心，作了详细的报告。整个学校的工作，虽然存在很多缺点，但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今后顺利完成学校的工作任务，今天我着重讲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教育方案

甲、教育方针。

毛主席在中央提出的现阶段的战略方针是：军队向前进，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过渡到正规战。这个战略方针，同时就是军大目前的教育方针，就是说，军大目前的教育除了为目前战略方针服务以外，没有别的方针。

目前战争已发展到黄河长江之间，大规模的正规战正在广大的原野上进行着。估计本期军大学员毕业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秋，此时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度，战争将往长江以南的山区水网地带进行。因此，军大在本年度教育方针，主要的方面，是要培养大批足以在长江以内的国民党地区作战的、指挥的、政工的、技术的干部。我们依照这一具体要求，在教学方面，规定了重点。这个重点，在战术教育上，是进攻战，攻坚战，山地战，水网战，河川战，而特别重要的是各兵种的合同战术。技术教育上，着重训练炮兵，炮兵教育着重在山炮；注意训练工兵干部，工兵教育着重在爆炸和架桥；准备训练摩托干部，应付现代战争的需要。在政治教育上，着重政策教育，而政策教育中，又着重新区的政策教育。所有这些，都是在战略进攻的总任务之下，适应在国民党区作战需要的准备工作。明了这一点，才能懂得教育任务的庄严性和教育工作的战略性，才能树立安心和努力于教育事业的党性。

乙、军事教育的基本内容。

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就是军大的军事教育基本内容。这十条军事原则明确的教导我们：

- 一、打敌人的方法：先打孤立分散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
- 二、攻城的方法：先取小的、中等的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的城市。
- 三、作战目标：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 四、使用兵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力求全歼，或给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 五、未发起战斗以前，要有准备、有把握。
- 六、发起战斗以后，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
- 七、力求运动战歼敌，同时注意攻坚。这是指出战争发展的过程，提出学习阵地战、攻坚战的重要性。
- 八、规定攻城的三原则。

这是叶剑英在华北军政大学校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一部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当时叶剑英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政治委员。

九、以战养战，取资于敌。

十、要善于休息整训。因为在整个战争不断的发展中，一方面必须善于利用战役与战役之间休整，另一方面决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时间。

我们的军事干部如果真正学通并掌握了这十条军事原则，就更有保证的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根据这十条军事原则使我们的战术教育，炮兵、工兵、摩托的技术和战术教育，以及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教育得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有根据来具体的规定自己的教育内容。因为我们的战术教育，是为我们的战略所规定、所要求的，好像我们的技术教育也为战术所要求一样。这就是说，我们在现有技术水平上，提高战术，在战术要求下，准备技术。

丙、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

党中央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掌握党的政策，特别是新区政策。最近党中央颁发了对于党校的政治教学的规定[1]，军大根据党中央的规定同时参照本校实际情况，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一、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三、时局与任务。四、党的政策。

政治教育的实施，又须按各连队实际条件，对内容及时间酌予增减。

丁、本期的教育计划纲要。

一、教育任务：一年内培养出五千名以上的炮、工、摩托的特科干部和团营级军政及参谋干部，提高一部分旅以上的高级干部，并确定以培养技术干部为主。这在一九四七年中央二月一日指示[2]中已经确定了的。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与工兵的建设。

二、教育时间规定：

学习一年的高级队，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四十；

学习八个月到一年的团干队，军事百分之七十，政治百分之

学习八个月的营干队，军事百分之七十五，政治百分之二十

五；

学习一年的炮、工队，军事百分之八十，政治百分之二十；

学习一年的参谋队，军事百分之七十，政治百分之三十；

学习八个月到一年的政工队，军事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五，政治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七十五。

三、学员的编组：炮兵大队的学员约一千人，组成山炮两队，野榴炮一队，高射炮一队，重迫击炮一队。步兵部队使用的各种小炮各队都教，但不另编队。

卫兵大队学员约一千人，其教育重点以爆破为主，其次是架桥、坑道作业，与坑道斗争，最后才是筑城。

摩托队学生约三百人，教育计划另定。

团级学员约五百人，营级学员约一千人，指挥干部的战术教育着重于进攻，而进攻战术的教育又着重在对占领防御阵地的敌人的进攻与攻城，同样要着重联合兵种的战斗组织及作战指挥。

政治大队学员约八百人，除教授党的理论和我党现行的各种政策（土改政策、城市政策、整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外，着重新区政策的教育。

参谋大队学员约六百人，照原计划进行。

多数教育单位均须进行五十小时的自然科学及史地常识的教育。其时间是从各单位的军、政教育时间中按比例抽出。例如政治教育时间占百分之二

十，便有五十个钟头，即在其中抽出百分之二十，就是十个钟头时间。内容着重在数学，以一部分时间讲授与军事有用的物理、化学。

高级队的教育，除部分的采用团级队的课程外，还要加上军事思想、政治经济学和一部《毛泽东选集》。如有阅读能力的同志，还可以选读马恩列斯五本书。

第二，动员干部坚持学习

在我们会议期间，我向到会各同志提出五个问题，要求大家表示态度：（一）下决心学习没有？（二）犯过纪律没有？（三）放下包袱没有？（四）个人与党的关系解决了没有？（五）下决心把学校办好没有？大家在发言中都表示了态度，很好。我个人与大家一样，要用毅力来克服工作上、学习上的阻力，把学校办好。因此，我来讲一讲学习问题：

甲、干部要学习。

干部学习是一个任务，不是一个额外负担。古语说过：“不教而战是谓弃之”，意思是说，军队一定要有教育，如果不经过教育就拿去打仗，那就是抛弃。我们的部队是有教育的，远至红军成立以至现在，我们就抓紧军队的军事、政治教育工作，教育早就成为我军的生活要素。不论在前方或在后方，只要有点时间，我们就进行军事、政治的教育，这是我们经常的工作。必须向全校干部提出：“不学而教，是谓害之”的警语，作为加强干部学习的动员。因为我们的军大教育，多是老人教新课。新对象、新内容、新方法，而教的人，还是老的。就是说：人是老的，但“事物”是新鲜的。如果我们不学习新鲜的事物，就无法来教人。所谓在新形势之下，提出了新的任务，而完成这新的任务，要靠新的人物。我们所谓新人物并不是说把我们这批人都换掉，换一批新的人来，乃是我们吸收新鲜东西、学习新的本领，用重新学习的方法实行刻苦的自我改造，经过自我改造而成为新的人物。基于这一点，我们就提出了干部学习任务。我们再三强调干部学习，提出干部必须苦学，目的就在于使中上级干部先弄通思想，动员起来学习本领，这样才能纠正经验主义与事务主义的教学作风。在全校展开干部学习的热潮，干部因学习的收效而提高，教育自然就因此而

收效更大。

乙、学习要端正态度。

在学习态度上，大家要虚心，提倡“相师”，你以我为师，我以你为师。我们的教学民主，就是这个精神，教员与学员互相学。

今天大家开会的发言，就是我们的教师。同志们，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这样虚心的态度。

丙、学习的基本内容。

一、学习马列主义。政治为学习之母。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水平高，觉悟水平也就高，任何学习都可以学得好。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到党的宣传工作时说：“在国家工作和党的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的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越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越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

的小人。” [3]

我还记得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也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4]可

见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觉悟水平的重要。因此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经常不断的向全党全军干部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

二、学习自己要教给别人的东西。即如教兵器的同志，首先要学习兵器。要教什么，先学什么。所谓学习，不仅是学习要教的内容，还要学习教授的方法，这一些，就叫业务学习。教员们教得好不好，首先决定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学得好不好。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这是学与用的统一。在学校中，听课是学习，授课也是学习，这也是教与学的统一。

三、学习军事科学。军事科学与军事艺术不能混同，军事科学比军事艺术范围更广泛，包含战略与作战艺术，即研究军事行动以及与战争有关问题的一些方法。此外，还包括国家的经济与精神可能性的问题。在作战之前，要估计到本国和敌国在战前战后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毛主席指示我们：军事科学，不仅是个战略战术问题，并且包括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以及军事文化，因为文化是政治军事的反映。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提出军队任务是：（一）打仗（属于打仗的艺术）。（二）群众工作（属于政治工作）。（三）筹款（属于经济工作）。这也就是军事科学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军事科学提到这样一个地位，我们必须学习它，才能提高自己，成为有军事科学头脑的军事干部。

至于学什么书，如何开始，大家提的很好，要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要知道，现在已经印行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马列主义，在军事范围内说，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科学全书。其中包括了中国革命战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部内容。

校中有许多同志特别提出学习战略的问题。过去游击战争环境，许多地方是单独对敌作战，指挥员要掌握全盘、要照顾各方面与各阶段，因此实际环境自然而然使各级干部注意战略问题。但有些干部发展到教条主义的学习，专门从事于克劳塞维茨[5]之类的研究而放松了战役、战术、技术基本的教学努力，这种偏向需要纠正。在目前集中作正规战，战略上的组织与指挥是完全统一的，这就要求我军要在战场上、在学校中锻炼和培养大量的优秀的战役指挥员与战术指挥员。但是毛主席也指导我们要学战略问题，要求战役指挥员及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目的在于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下级要更好的了解上级的意图，才能更好的执行上级的命令。例如一个营长必须懂得团的指挥艺术、了解团首长的意图，才能把自己的一个营指挥得更好。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上述的观点上来学习我们的战略。

四、要把党报作为经常的学习文件。要自觉的意识到，任何干部如果一天不读报，便要落后别人一天。可以这样说：党报是供给我们最新鲜的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的精神供给部。我们必须认

识到一切部队、一切机关、一切学校的领导同志，如果学会了掌握政策、掌握干部、掌握通讯、掌握报纸，那末，工作就好做了。

丁、组织检查。

读书要有摘要，古今名人读书是有笔记的，他们的笔记有系统而且经常。看过的东西，自己认为要紧的或自己受启发的感想等部随时记下来，可以随时翻阅，随时参考。请同志们采用这样的办法，将来拿这个来检查大家的学习。干部学习有了四个条件就

可以学好。即要有时间，要有环境，要有材料，要有决心。在学校学习，时间有一年，仅靠在校时间是不够的，出校以后在工作中仍

然要挤出时间不断的学习。学校是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学习材料也可以供给，现在的问题是每个干部要能够定下自习自通的决心，学习计划才能完成。

再检查大家的书有无顶批和标记，中国有个金圣叹[6]，他读书是常常做顶批的。这个办法很好。比较重要的内容，用红蓝铅笔划上，也可以帮助自己记忆。

第三个办法是检查大家的写作，我们的同志，要学写作，到了一定的工作岗位，一定要有这个操习。否则写个决议，写张报告都非常困难。如何把自己想的说的用文字表达出来，写成文件，这是每一个领导干部所必须要操习的。同时也是检查学习进步程度的办法。

第三，教学民主

朱总司令在延安时期，号召全军训练部队要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官教官，兵教兵的办法。教学民主是一种教学方法，当着教员与学员之间，教员与教员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发生许多矛盾时，就是说：教员教授的东西与学员要求的东西不一致，教员讲授的内容与学员理解的程度不一致，教员用来说明原理原则的事例与学员作战经验不一致，教员与教员之间见解、经验、教法不一致时，就可以用教学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其内容及过程值得特别提出的，要加以系统的说明。

甲、教学准备。

教员们的讲授提纲，是由主讲的教学组（不是一个教员），本着上级方针和计划，经过自己一番研究和思考，并拟定了腹案和草案之后，由教员们分头到所教的学员中进行有目的深入调查，了解学员的文化程度、有无作战经验、对本课目有何要求、有何建议，采取其合理的东西，然后写成讲授提纲，又将此讲授提纲交给教育准备会（有学员代表参加的）反复讨论、修改、补充、通过。

讲授提纲制定之后，必须进一步研究讲授方法及讲授时所必须准备的教育器材，如模型、沙盘、图解各种兵器等类的实物，帮助学员易于理解，使学员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既听过了，又看过了，而且做过了，这样就能学得更好。

如果是在有战斗经验的学员中教学，教战术时，必须规定学员们每人准备一个（或一个以上）典型战例（自己亲自参加的或亲自指挥的成功的或失败的，但都是比较典型的战例）。待教育进度讲到某一问题时（例如讲到营进攻），教员讲毕，组织讨论，就在这个时候用学员中事先准备好的营进攻的战例报告（也有挂图和沙盘等）来证明原则，由经验上升到理论。

乙、教学实施。

一、教学组的活动：教员授课不是一个人，而是若干人（教员与助教）所组成的教学组。整个教学组的教员，都一齐去上课，其中一人主讲，其余旁听，主讲讲完以后助教可以补充，学员可以质疑。用教学组一齐授课的办法，可以使教员与教员间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得到统一。

在人力可能的条件下，教学组内部可以分工，根据最近的经验，教学组可有以下分工：

讲授组（担任主讲、解答、总结及课外帮助）。

作业组（分任野外演习时制定想定、指导活动、沙盘、图上作业）。

保证组（行政首长在教育上负器材保证的责任）。

这种分工，可以使教员中各自特长得到发挥，劳逸之间得到调剂。

二、组织讨论：教员授课以后，必须有一讨论阶段，把所教的问题深入下去。如果说，上课时是教员教学员，那末在讨论时，特别在学员作战例报告时，或学员有不同意见且提出反驳时，就带有学员教教员的实际作用了，这样使教与学得到统一。

三、组织总结：每一个课目经过讲授、讨论之后，必须加以总结。总结会上，不仅要总结课目内容（有无错误遗漏），而且也要总结教学方法、教学保证及学员们的心得。总结工作如果做的好，可以收到以下效果：可以确实知道教学的效果如何；可以知道教员对教学态度及教学情形；可以得到对学员考绩的根据。

丙、教学检查。

无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必须分期考试（季考）及毕业考试（年考），确立考试制度，用考试的方法来检查教育的效果。

其次，由上而下开定期教育检查会，又由下而上开学员代表座谈会，实行对于教育计划、教材内容、教学方法、教育保证等检查。

这就是教学民主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三段，即教学准备、教学实施及教学检查。这种教学民主的方法对政治教育同样适用。

第四，加强纪律性

加强纪律性的问题，是全党全军在目前发展形势下推动一切工作，争取并巩固全国革命胜利的中心环节。党中央号召我们要认真阅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及中宣部的前言等文件，就是要使我们大家能够理解到：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

革命军队同样要铁的纪律、铁的纪律依靠于下列三个条件：

一、军队的指战人员、政工人员，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忠心、坚毅精神与自我牺牲的勇气；二、要保持指战人员之间、党与非党之间的亲密的联系；三、要使全体指战人员相信指挥员领导军队和指挥作战是正确的。有了这三条之后，才能实现革命军队中自觉的铁的纪律。可是，这些条件的形成，必须在实际战斗中，经过长期斗争，长期教育，才能养成。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经常的理论教育与纪律教育。

进行纪律教育，必须：（一）教育人们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到加强纪律性重要；（二）明确指出，要发扬民主，依靠群众维持纪律；（三）建立制度，

大家照章程办事；（四）领导人要以身作则，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五）严格检查，信赏必罚。

可以一般的说，军队的政治教育、纪律教育愈收效，政治觉悟愈提高，则纪律愈严明。觉悟性与纪律性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评量军队质量的好坏高低，可以军队的纪律表现力标准，评量干部的品质也是如此。干部品质好的纪律性就强，否则就弱。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战斗的连续性，军队人员的流动性及成分的复杂性，影响到军队的政治教育、纪律教育不易整齐和普及。政治觉悟程度，不能平衡。因此，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素养就有所差别。但是古今中外都证明：如果军队没有严格的铁的纪律，没有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命令的军纪，这种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军队的命令是无条件的，觉悟高的固然要自觉的执行，其中有些觉悟比较差的也要勉强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律就成为觉悟的补充了。我们的纪律教育的原则之一，就是寻之以觉悟，齐之以纪律。。

军大自成立以来，虽然注意到正规化的建立，但没有很好的注意到纪律的教育。全校说来，纪律不够严格。从领导者与校领导者的关系来说，不请示、不报告、不讨论指示、不遵守制度的现象是严重的，但另一方面，请示而迟迟不复示的现象同样的存在着，至若连队中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如自由行动、逾假不归、不请假外宿、破坏公物、浪费偷窃、伤害群众利益（演习时）、打靶时打伤甚至打死群众、卫生人员开错方拿错药等等，今后必须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严格的整顿纪律，深入纪律教育。整顿纪律的钥匙，就是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因为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如果不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则上下隔膜。上级的决议命令是否正确执行，无从得到反映；下级在执行上级决议命令中，有何困难，有何经验，既不报告，亦不请示，假使有报告的话，也是报好不报坏、报多不报少，以致于上下脱节，政策不能贯彻。报告请示制度一经建立，则上级抓紧下级，下级紧靠上级，真正的领导关系才由此真正的建立起来。中央的正确政策才能真正的贯彻下去。这样党才算是有纪律的党，军队才算是有纪律的军队。领导者对于本单位的全面领导的掌握，才能做到若纲在网、执简驭繁。

党的报告请示制度，是我党用来加强全党全军铁的纪律的锁钥。军大必须从上到下一律遵守。下级党的书记向上级党委按月作综合性报告，下级首长向上级首长按月作业务上的重要问题总结报告，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按月作全盘工作报告。

必须把综合性的报告与各个具体问题的报告配合起来，才能反映各部门工作的全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应当认识写作报告本身就是领导学习的重要方法。因为既然要写综合性的报告，必须充分的搜集材料，必须仔细分析问题，既要联系到各种具体问题来研究，又要超脱各种具体问题来思考。所谓超脱性的思考，是把握各种问题内部的联系，因而发现问题的本质，这是毛主席教育全党全军中的每一个领导人必须学习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主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7]如果我们的综合报告，是经过这样的过程的话，无疑的，这种报告必然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

西。

第五，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官

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队和旧军官的问题，在党的七次大会中有明确的指示：中国的旧军队、旧军官有几百万，不能简单的对付，必须争取、改造及使用他们，因为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的眼睛要看到几百万的上面。

我们军大的旧军官中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放下武器解放过来的，这已经有了百多军官，参加了教学工作；另一部分是自动过来，或暴动过来的，这批人在军大亦不少。这两批人参加革命工作的动机是不同的，一是被迫参加的（虽然由被迫亦可以经过教育，走到自觉），一是自动或自觉参加的。但是，所有一切旧军官中，由于历史原因，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受到长期的欺骗宣传的影响，多少做过反人民的事。其中有些人，对我党抱着怀疑甚至仇视的态度，而且他们多半是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多年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上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是不相同的。要争取他们，必须经过耐心的、长期的教育改造工作，才能使他们真正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总的说来，解放过来的军官与自动过来的军官，一方面有相异之点，另一方面又有共同之处。这就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具体的人要有具体的分析。

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官，领导他们参加革命工作，是党给我们的任务。当着中国人民革命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处处惨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革命与国民党反革命斗争的胜败之局已完全明朗的时候，只要我们执行争取、改造旧军官的政策，不犯错误，那末旧军官的争取和改造是有极大可能的。这种可能不仅有实际的条件，而且也有理论的根据。

恰恰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到：

“当阶级斗争接近决定的时刻时（好像现在我们的中国——叶注）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统治阶级内部瓦解过程，是存着这样强烈、这样尖锐的性质，致使统治阶级一小部分，从它脱离出来，而加入革命的阶级，加入将来属于他的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从前一部分贵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现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提高到了整个历史运动进程底理论的认识。” [8]

马克思所说的这一真理，阐明了为什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不断的有国民党将军们亲自率领部队在火线上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这种事实不难从理论上来理解它。

已经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旧军官们，如果经过一定时期政治上的教育争取，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能够对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进程有着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时，那末他们对于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将由被迫走到自觉，这也是不用怀疑的。

根据军大这一时期对于争取改造旧军官的工作检讨，认为已经得到一定的成绩。原因是各级党的领导人员中间的大多数，在思想上认清了这一工作的必要和可能。因此，对于旧军官的态度，是谦虚、谨慎、诚恳、坦白的，能够从政治上出发采取积极改造的方针，组织学习，吸引他们参加党的有教

育作用的会议。在干部方面，把他们与党员干部编在一组，不轻视，不歧视，经常关心他们政治进步，对于他们的错误思想、错误表现能够采取妥善步骤，进行有效的教育（如生活检讨会）。另外，又从政策上出发加以各种必要的照顾，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和要求。思想上分清界限，生活上打成一片。总之，我们要从各方面想办法，把他们的政治水平逐渐的提高，思想上一天一天的向党接近。

应当指出，这一件争取、改造工作是很艰苦的。因为旧军官出身的人，特别是解放过来的，除了少数思想进步的人以外，他们直到现在仍然是小心、多疑、怕别人看不起、怕别人不信任、怕自己没前途，注意生活，计较地位，留恋过去的腐败生活，对国民党还有些幻想，过分的自尊，羡慕虚荣，爱惜羽毛，放不下架子，受不了苦（实在并不苦），想妻子，想回家，所有这些都为争取改造工作增加很大的困难。我们的干部中，也还有许多人不明瞭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官是党的政策和革命的需要，因此，不能主动的耐心的进行工作，甚至以狭隘、骄傲的态度对待这一批旧军官。他们看见学校的行政机关特别给旧军官以必要的物质上的照顾时，他们便降低自己来和别人比生活，如果看见旧军官在意识上或生活上有些不良表现时，又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旧军官，很不善于接近他们，用谈心、漫谈的方式解答他们的疑问、解释我们的政策，团结他们到党的周围。有些则采取排挤态度，如说：“过去没有他们，也一样的办教育”。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干部对于这一争取、改造工作，把重点摆在单纯的物质照顾，忘记了政治教育、政治争取乃是最主要的。这种错误观点，必须纠正。

产生上述现象的思想根源是：

一、领导上对争取、改造旧军官的政策、策略教育不够，使执行的干部不能真正了解到把旧军官争取到人民方面来对人民是有利的。同时，更不了解争取他们，由敌人变为朋友，又由朋友变为我们自己的人，这是有极大可能、同时又是有极大困难的工作。

二、宗派主义思想，狭隘胸襟，不能容人，不能用人，没有收罗天下人才而善用之的气魄。

三、骄傲自满，不愿向别人学习。

四、思想上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或陷于“左”的关门主义，或陷于右的无原则的迁就。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进行争取、改造旧军官的工作，应分作两方面来努力：

一、在党内应进行反复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其内容应包括：

（一）政策上争取、团结、改造和使用旧军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二）策略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左”反右；

（三）思想上严格分清敌、友、我，但生活上应打成一片，主动的团结他们。

二、对旧军官方面，应以政治教育为主，同时照顾生活：

（一）对一般的旧军官，政治上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二）对解放军官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反省，树立痛改前非将功赎罪的

精神，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

（三）对少数思想反动顽固、生活腐化堕落、不易改造的分子，应抓住适当时机开展斗争；对于思想进步、努力工作、在旧军官中常陷于光荣孤立者我们应给以群众性的表扬和撑腰；

（四）必须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照顾他们的健康，解决他们阅读的书报，关心他们的进步。

最后，引证一段已故的苏联伏龙芝[9]总司令一九二四年在军事学院开学演说时的话，供我们参考，他说：“在军队中，特别在我们军事学院的范围当中，吸引其他一切非党同志群众，到党的思想影响周围，以便真正的造成一个亲爱的家庭，使一切非党的人们，都感到在这个家庭内，他们是很亲切的，并很畅快的，并且使他们在家庭内感觉到他们在职务上或在其他方面，有着与党员一样的前途和可能。这里就是我们学院党的同志面前所摆着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在今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经过一百多年的牺牲奋斗，已经接近了胜利，我们军大党的同志同样的应该担负起这个第一等重要的任务。

第六，接受批评与建议

我们这次会议的程序，先开过校委会对校委本身工作做了一番检讨，然后开过校委扩大会着重请各党委书记对校委领导作严正的批评。整个会议过程中，对于校党委的领导提出许多正确的批评和建议。例如：一、党委对全校领导思想抓的不够紧；二、对党政、教育、行政工作的检查不够深入，也没有紧紧抓住教育是领导的中心；三、上下联系不够，校首长及各部长很少到各大队去了解情况，具体指导工作；四、党委本身工作的经验主义性，会议的准备不完全，会议时间太长，应写的决议没有写，会后无人负责检查决议的执行程度；五、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批评与教育；六、校委本身的学习没有系统的坚持进行。所有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校党委完全接受，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改正。同志们有许多好的建议，校委完全采纳，并付诸实施。

我的结论就是经过这次会议之后，如果全校同志能够做到：一、明了军大目前所负的使命，明了军大的教育方针；二、能够动员教育干部加紧学习，认真从事于教育；三、能够采用教学民主的方法；四、能够加强纪律性；五、能够争取、团结、改造、使用旧军官为本校努力工作；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经常能够从事事实上接受同志的批评与建议，那末，军大教育任务的完成，就更加有把握了。

注 释

[1]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颁发的《中央关于党校教学计划的规定》。

[2]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

[3]这段话的新译文是：“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见斯大林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1页）。

[4]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5]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争论》。

[6]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喜评点书籍。曾批点《离骚》、《庄子》、《史记》、《少陵集》、《西厢记》、《水浒传》，合称“六才子书”。顺治十八年以叛逆罪被腰斩。

[7]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8]这段话的新译文是：“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9]伏龙芝，前苏联党和回务活动家、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曾任苏联红军东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司令等职。

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一、任务和情况

一、现在全国即将全部彻底解放。七大解放区中，东北、华北已经全部解放，华东只差闽南及台湾，华中只差湘西、湘南、鄂西数处，西北已解放了陕西、甘肃、青海、绥远[1]的大部地区，所余只有华南和西南了，而华南也已有三分之一土地解放了。

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华南，首先是解放广东。做事有缓急先后，今天在这里我们先要集中精力来讨论广东的问题，到了广州之后再讨论广西的问题。广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们要解放它，就必须去认识它，了解它。关于广东三年来游击战争的状况，方方[2]同志已经讲过了，说清楚了，我要讲的，是一些一般的情况。

1. 广东人民。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渐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后来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广东：明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葡萄牙人到了中国，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明朝官吏受贿，以每年一千两钱的租价出借澳门给他；万历三年（一五七五）西班牙人也自马尼拉来到中国；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荷兰人也由爪哇[3]来到澳门；崇祯十年（一六三七）英国人也到了澳门。从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逐步向中国侵入，引起中国人民，首先是华南人民的反抗。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4]，为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斗争，其后广东的三元里抗英斗争[5]，中法战争[6]，击败法军于谅山，以至辛亥革命[7]，一九二二年的香港三万海员大罢工[8]，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都无一不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所以华南人民的历史，是不断地抵抗外来民族压迫与侵略的历史，而这一切的斗争直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之后才找到了道路。对于历史上广东人民抵抗异族侵略的认识，我们可从一八五七年恩格斯所著《波斯与中国》一文中看到一个恰当的描写，恩格斯写道：“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冲突只限于这些省份底领域之内——民众是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人的斗争，华人完全镇静地和有意地在香港欧人居住区域内，将毒药渗入大宗面包（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赫加以分析，李比赫发现多量的砒霜；但因毒药分量太重，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这样就使毒药失去效力）。华人暗带武器乘搭商船，而在中途就突出痛击船长水手和欧洲搭客，并夺取船只。凡落到他们的手内的欧人，一概被他们虏去和杀死。甚而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的一样，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一同沉于海底或者是在船上烧死而不愿降服。甚至侨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良的良民——现在也密谋起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主持下，于江西赣州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解放广东的方针、政策、作战计划等问题。本文是叶剑英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事，突然在夜间举行暴动，如萨纳瓦加或新加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当局只有严加戒备并使用武力才能压服他们，英国政府的强盗政策，引起了华人对一切外人的这种愤激情绪，并使这种愤激情绪带有完全歼灭敌人的战争性质。”[9]恩格斯对这种人民的反抗是赞美的，歌颂的，他说：“我们最好是不要像英国贵族的报纸那样去斥责华人可怕的残暴行动，而来承认这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战争，这是谋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这个战争中具有中华民族的一切自傲的成见，荒谬的举动，读书人的愚昧无知和愚昧妄行的野蛮行动，可是这个战争终究是真正的人民战争。”这就是恩格斯的见解，是中国人民，首先是广东人民的光荣，是广东历史的光明的一面。

2. 广东华侨。广东人遭受外族压迫，生活困难，有许多人远涉重洋，到安南、暹罗[10]、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11]、爪哇、婆罗洲[12]、以至美洲、澳洲各地去。据统计，现在全国共有华侨一千一百万人，其中，一百万分散在欧美各洲，有一千万分散在南洋群岛，而这一千万人中，约有六七百万是广东人，假定广东以三千万人口计算，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华侨。这些华侨除了极少数发财致富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几重压迫之下过着极端困苦的生

活。因此，他们对外族的压迫十分仇视，对祖国的解放十分热望，常常不惜将自己血汗所得的微薄工资输献给祖国的革命，孙中山搞革命就得到华侨的很大帮助。但是由于同一原因，也产生一个黑暗面，这就是中国老话所说的：“志士穷且益坚，小人穷斯滥矣”。在社会各阶层中，在贫困压迫与势利习染之下，表现在士大夫方面是荒淫无耻；文化方面是商人文化占统治地位；农村方面多土匪；城市方面多流氓烂仔。不管你什么民族英雄革命战士，如果你归来，连一个皮箱也没有，那是吃不开的。所谓衣锦还乡，有钱盖房买田，即使你是男盗女娼也有人尊敬。这是商人意识深入到社会意识中的表现，是一部分人精神上被征服的结果。将来到广东，在文化建设上，要花很大的力气，发扬它光明的一面，克服落后的一面。

3. 广东党的组织。广东的党组织是有无产阶级基础的，因此也产生了許多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如苏兆征、杨殷、罗登贤、李源、黄甦、邓发[13]等同志（现在都牺牲了）。他们领导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进行过许多英勇斗争，领导过广州暴动[14]，成立过广州公社。

广东党组织也领导过广大的农民运动，进行过土地革命，其中规模最大的，如彭湃[15]同志所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组织过几十万农民群众。

广东党组织也组织过党军。大革命时期，叶挺[16]同志领导的独立团就是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军队。可惜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整整的十年土地革命中，广东的武装斗争没有得到坚持和发展，许多党的干部没有在武装斗争中被保存，相反，都在城市中，在地下，被反革命杀光，只有一小部分，在广东境外，在军队中保存下来。因此、现在的广东干部参加过大大革命的已经很少了。据方方同志报告：在六十多个地委书记级以上的干部中，只有十几个是大革命时代的干部了。可是广东党组织毕竟在大革命时代领导过农民运动，给群众造成不可磨灭的印象，和群众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时机一到，他们是会立即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的。这就是在抗日时期和在自卫战争[17]时期，广东游击战争所以能够很快发展的原因之一。

4. 广东敌人。蒋介石集团的李宗仁[18]、阎锡山[19]、余汉谋[20]、薛岳[21]现在都已逃到广州，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可是敌人的残余兵力已经很

弱，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我大军压境下，异常动摇。目前一面扬言抵抗，一面急急搬家，准备退到海南岛，和我们作海面的斗争。粤桂两系军队在战术小动作上是灵活的，我们在战略上要大胆进军，在战术上要谨慎作战。

5.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我进军华南，表现异常恐慌，急急调兵增防。这不是显示它有如何强大的力量，恰恰相反，是它力量薄弱的表现。因为华南的解放，不但使他们丧失在中国的市场，而且威胁到它的生命线——殖民地。因此，帝国主义现在虽不可能向我们进攻，但它对于它在中国的权益总是要想法保存的。

我们解放华南的意义是重大的，从政治上军事上看，有如下几点：

1. 给英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使它丧失在华市场，而且威胁到它在远东的殖民地——生命线。

2. 宣告蒋介石统治最后死亡。

3. 造成桂系军阀的孤立，造成消灭桂系军阀的有利条件，乃至造成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

二、讲讲如何解放广东的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作了分析，指出今后的全国解放战争，有三种方式：一是天津方式，即战争的方式，这是基本的，我们要时刻准备。一是北平方式，即和平解决的方式。一是绥远方式[22]。和平解决的方式，现在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种方式，仍然是一种斗争，不过是不流血的斗争，其目的，同样是干净彻底消灭敌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望风归顺”，假定敌人愿意“望风归顺”，缩短了战争时间，保存了人力，保存了财产，保存了城市，这是合乎大多数人民的要求的，是好的，应该争取的。用北平方式解决广东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创造的。

1. 政治条件的创造。我们对待敌人应该采取分化政策，就是从政治上去瓦解和孤立敌人的阵营，分裂一部分人跑到人民方面来，使敌人内部发生动摇。我们有些同志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对待从敌人营垒里转到人民方面来的人那么客气，那么宽大？同志们，他们这些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各方面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他所代表的人们都在观察着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看我们的行动而决定趋向的。我们对他客气，是因为他代表着许多人。这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方法。诚然人民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却可避免许多损失。人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人民仍是欢迎的，因为这也是符合于他们的利益的。所以，主动地在政治上造成瓦解敌人的条件是必要的。

2. 军事条件。和平解决是必须用军事条件作基础的。如果没有天津、张家口的解放，把北平完全孤立起来，傅作义[23]是不会接受和平条件的。我们要争取和平解决广东，必须坚决地向敌人进攻，迅速造成军事的有利条件，那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敌人如投降就改编它。

3. 要加强策反工作，从敌人内部去策动反正。现在这些条件是完全成熟的，我们读《共产党宣言》，里面有一段话说：“当阶级斗争接近决定的时刻时，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瓦解过程是有着这样强烈，这样尖锐的性质，致使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从它脱离出来，而加入革命的阶级，加入将来属于它的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从前一部分贵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现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也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提高到了整个历史运动进程理论的认识。”[24]这一论断完全合乎中国统治阶级现在的情况，他们内部的分裂是急剧起来了，例如今天许多国民党的军政官吏，他们在紧急关头，在他们的阶级发生死亡危机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个地跑过来了。

三、如何对付干涉和封锁。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设想，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个联系整个世界局势的问题。

现在是个和平的时期、我们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推动革命，必须和全世界的民主力量结成和平阵营，坚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我们的口号也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是拥护和平的

口号，这个口号是进攻的不是退却的。

至于美国对华的政策，在艾奇逊[25]的白皮书中，已经完全招供出来了。白皮书说：要想支持蒋介石的政府，需要几千人的顾问团，无可计量的军事装备，以及准备把美国卷入战争，这一行动是一种不可预计的冒险，势必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美国人民的谴责。因此，发动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美帝国主义决不会就此甘休，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仍将继续进行破坏。

1. 从内部来组织破坏。组织所谓个人的民主主义者作为反对派。组织特务、据说军统[26]的特务，已在广东组织一个临时工作部，宋子文[27]给了五百条金子作本钱，唐纵[28]也组织了五万名警察。组织土匪，据说珠江三角洲的李福林[29]，在组织一种地方武装，即 cc[30]的地方行动队。梁华盛[31]在组织一个以苏联内战时期白军领袖邓尼金为名的邓尼金大队。马超俊[32]在纠集一些工贼，组织帮会。据说葛肇煌[33]已在组织反动帮会武装。同时还想去有计划地去支持地方军阀，支持陈济棠[34]在海南岛的统治，支持白崇禧[35]于军事失败之后，退到十万大山去建立反动据点。

2, 实行经济封锁。如在上海的封锁一样, 来切断我们和国外的经济联系, 组织走私, 来破坏我们的市场, 截断侨汇, 压迫华侨回国, 来增加我们的困难。

3. 从外部来组织破坏。如组织太平洋公约，长期占领日本，重新武装日本，扶植南韩的傀儡政府，托管台湾，占领海南岛，建立一连串的反动基地来包围我们，以至把云南与广西组织成一个隔离地带，阻止革命力量进入西南，或是组织海面斗争，以海盗的方式来骚扰我们。

不管美帝国主义可能采用何种方式，或是几种方式同时采用，我们对它的态度，是遵循一条原则，“既不挑衅，也不示弱”，你不来侵犯我，我也不去侵犯你，你如果敢来侵犯，我就一定要抵抗。

四、广东是一个和境外接触最频繁的地区，不说香港和澳门，单是海关就有拱北关、三水关、公益关、甘竹关、北海关、海口关、广州湾、粤海关、潮海关等许多个，每天都要和外人接触，处理得不好就要出岔子，造成外事工作上不必要的纠纷。同志们要十分注意这个问题。进城之后，要严格遵守以下的规定：

1，凡属有关外侨的问题，在没有请示军管会并得到指示前，不得自行处理。

2. 除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公安局外侨管理科和被指定与外侨接触之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员不得与外侨接触，特别禁止与外国记者、外交人员来往接谈。

3. 任何机关部队人员非经军管会主任批准，不得擅自借住外侨的房屋、教堂、学校、医院、工厂、商店及文化机关或擅借其电影、图书、画片等。

4. 任何人员不得私自接受外人礼物、邀请及参加外人各种宴会，尤其不

得擅自处理有关外事问题。

5. 非经军管会批准或指示，任何人员均不得进入外国使领馆、外侨住宅、医院、教堂、学校、工厂、文化机关（如图书馆、电影院、俱乐部、音乐团体等）检查或参观。

6. 各接管部门，在接收敌产时，凡遇与外侨有关的部分（如机构、人员、档案、文物、财产等），均须协同军管会外事处共同处理。

第二、城市政策

城市政策，一是接，一是管。如何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就是城市政策的基本内容。我们到广东后要做城市工作，并不是说乡村工作就不重要。中央从来没有叫我们只要城市不要乡村。世界上是先有乡村后有城市的，城市如果没有乡村，就等于没有工业原料和市场，就不能存在。所以城市是乡村造成的，乡村工作做不好，城市工作就不堪设想。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要领导乡村，帮助乡村，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这些问题我们当在以后再讲，现在先讲城市工作。

一、城市政策。是我们有了城市以后才有的，时间还不长。现在，接的这一门工作，各地方都做得不错，大体学会了。管的这一门，还要进一步来学习。在接的工作中，我们创造了一个办法，叫做“军管制”。这个制度，在我们还缺乏全部管理城市经验的时候，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利用军管时期的特点，来制定与颁布各种临时性的、试验性的法令，中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指示“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需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之。”这就使得我们争取了调查研究的时间，避免出岔子与犯错误。

二、军管会的任务。中央指示，要做以下几件工作：

1，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

2. 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

3，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

4，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

5. 解散国民党、三青团[36]、民社党[37]、青年党[38]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

6，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

7. 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

8. 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9. 整顿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三、军管会的组织是放在市委之下好呢？还是放在市委之上好呢？中央

没有做结论，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如济南是放在市委之上，即军管会领导市委，北平是放在市委之下，即市委领导军管会。我觉得市委领导军管会的办法好，这样能够加强市委的领导，建立市委的威信，一旦军管会取消了，工作不受影响。少奇同志在北平曾说：市的最高领导机关应该是市委，市委领导军管会符合这个原则。

四、接收工作：

1. 接为了管，接服从管。开始，我们在接收城市的时候，这个观念不明确，接与管脱节，接的人不是管的人，接的时候也分工很细，你接卫生，他接通讯，接卫生的对所有工厂学校的医务所也要去接，接通讯的对所有的电话机都要去接，结果把原来的机构搞乱了，增加管的时候许多困难。我们必须设想，今天我们把它接过来，明天就要去管它，接和管应该尽可能统一起来，接的人就是管的人。

2. 系统接管，完整接管。即是要按原来的一套，系统地接过来。如须改革调整，待接过来以后再说，不要太早把它分散弄乱。

3. 对人才、物资、文件、档案要同样重视，不要先注意物资。把图表丧失，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工厂的复工，技术人员跑掉了，再找也是不容易的。

4. 纵的接收，横的检查。入城之初，我们按系统调查接管对象。有些我们调查到的，去接的时候没有了。没有调查到的又出来了。如果没有普遍地按地区去检查，是很容易把应该接收的单位漏掉的，所以在按系统纵的去接收的同时，必须有地方工作的横的检查，才能保证接收工作的完满无遗。

5. 两快两慢。我们要接收的单位，大概可分政权、物资、文化、外侨四大类。政权是统治的工具，一进城我们就要抓住它工作。物资接收慢了，就会散失。所以这两个部门在接收的时候要快，文化和外侨部门慢点不要紧，要仔细考虑，慎重处理，尤其对于国际有名的高级学校更要慎重。

五、接管纪律：

1. 凡接管的一切物资，接管人员有保管责任，无擅自动用权力。

2. 对被接管单位的旧有人员，要负责安置，不得弃置不问。

3. 捕人、杀人必须由市公安机关经上级批准执行，任何接管人员，不得随便捕人、杀人。

4. 对外国人事无大小，统由外侨事务处及公安局外侨管理科报告军管会后处理，任何接管人员不得私自处理。

六、军事代表的设置，除开政府机关，其他各接管单位都派遣军事代表，或由军事代表组成的代表组，负责接收工作。军事代表的任务：

1. 负责调查被接管单位的人事情况，业务情况，及其人员的生活情况。在解放区工作，大多是党员。现在到了新区，不但有非党员，甚至还有反动分子。你要和非党员一起工作，依靠他们工作，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政治情况、社会情况，便会出岔子。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生活有公家管。人家是薪金制，柴米油盐都要自己管，对物价、对货币比值都很关心。你要领导他们，就要注意他们的生活问题。至于业务更为重要，一个工厂的生产状况，从原料、市场销路到制作过程，都要了解，要学会，才能去进行管理。

2. 要监视督促，保证工作。我们所接管的单位，如果是生产机关，开始还是用它原来的机构人员进行工作，军事代表是站在监督的地位，不要忙于去代替他，但要监视他，督促他工作，保证完成我们所希望的生产计划，防止怠工与破坏。

3.被接管单位所发布的一切文件，军事代表要负责审查与签

4.要团结全体人员，进行思想和政策教育。

七、对旧职员的处理方针：

对被接管单位的旧有人员的处理，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我们的方针、原则，是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还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以下办法：

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

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

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第三、城市管理问题

管理城市的总任务，是安定秩序，团结人民，进行恢复与发展生产建设。

一、在安定秩序方面：要肃清反动派潜伏力量。对于肃清特务的工作，我们必须有中心有步骤，要集中力量，稳扎稳打。这就是说，先打击目前对我危害最大之敌，先打击军统的组、站长以上的头子，及有破坏暗杀行为的特务，对潜伏在文化机关中的分子，可缓一步进行。

建立市政工作，供应市民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书报的供应和钞票的发行）。广东是缺粮缺煤的省份，需要充分的准备。在我们进入城市后，便应立即输送足够的粮食、燃料到城市去，以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进城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现在我们就要进行组织和准备。

二、在团结人民方面：除特别情形外，党组织要公开，党政负责人要直接和人民见面。先由各界座谈会开始，了解社会情况，选择代表人物，然后有准备地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打好联系人民的基础，准备将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三、在生产建设方面：主要是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使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商业等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起来。我们一进入城市，便要抓紧这一工作。这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不能放弃了这一工作，而去忙于其他工作，相反的，其他一切工作都要为了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

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必须正确地认识城乡关系，这是关系到城市与乡村对立的消灭问题。中国革命过去主要靠农民。有了农民，我们才能支持战争。全国胜利后，农民翻身了，但他们的生产必须获得发展，他们才能真正翻身。因此，除了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以外，还要大大地发展农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一面要供给农民以日用品，同时要供给农业以大量的机器，肥料，及各种生产工具。关于这一点，列宁告诉过我们，城市光给农民以生活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他们以生产资料、文化资料、科学资料和人才。所以，苏联十月革命后曾提出“城市面向农村”的口号，并动员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专家下乡，帮助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我们今后也要这样做。因为不发展农业生产，不改善农民的生活，城市的工业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城市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工业产品需要有销售的市场，城市需要大批的工人投

进到工厂去，这都要靠农村与农民。故将来城市工业的发展必须有农业生产发展来配合，两者要密切地联系起来，缺一不可。

联系城市与乡村的手段，主要是商业，特别是供销合作社，将来一定要大大地发展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过去是不会做生意的，今后必须学会做生意。苏联革命后为了要发展商业，曾动员大量干部去学做生意，学管理经济。因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能脱离商业的，工农业生产，若没有商业来联系，物资就无法交流，产品销售不出去，生产便无法提高，经济亦无从发展。目前城乡互助，工农业产品交流，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城市的工业生产必须考虑到农村的需要，乡村的农业生产要注意供应城市的需要。因此，对于某些必要的成品，我们就不能用商人的眼光，单纯在目前赚蚀上去打算盘，要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上着眼。甚至有些农业的必需品，国营企业即使要赔本也要卖给农民，这对将来是有好处的，这才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如石景山要斤米斤铁，价格太贵，结果，华北的农民要铁，宁愿到东北去买。其原因就是由于缺乏这种观点。

四、在市政管理方面：城市管理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式，和农村不同。城市基本的特点是集中，人口集中，并拥有现代化的交通设备和科学设备。同时，城市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要准确掌握，不随便浪费，尤其是工厂。这些都是不同于农村的。针对着城市集中的特点，城市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要集中，市委、市政府直接解决问题，直接与群众见面，可以召开数十万人的大会，不需要像农村一级一级传下去。市是一级机关，事权要集中于市，直接地发布命令，可以不经区。城市中的区公所只是市政府的代表机关，街不应成立政府，应由公安机关的派出所来管理。因此，区委的工作范围，应明确划定。城市中的党支部应按产业和职业来划分，或可按街道。过去我们进入城市，由于没有掌握城市的基本特点，没有提高到理论上认识城市，把农村中的一套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机械地搬到城市，如市、区、街、间等多层政府，重重叠叠，这是错误的。我们在北平看到了其他类似城市的做法，也就“前面乌龟爬烂路，后面乌龟照样爬”，犯了同样的毛病，后来经少奇同志指示后，才改变过来。

五、我们在城市中的总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尽可能多的民族资产阶级，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尤其重要。我们进城之后，不必忙于去搞党，要把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首先要组织工会，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党组织，依靠工人，首先要解决工人的要求，要告诉他们，要求不要过高，现在主要是解决有饭吃与没有饭吃的问题，其次才是吃干饭与吃稀饭的问题。

工会大概有六种，一是产业工人工会，二是手工业工人工会，三是店员工会，四是苦力工人工会，五是文化工作者工会，六是机关工作者工会，机关工作者工会可以慢一点搞。

1. 工会的会员：凡是依靠工资生活，不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者都可加入，以出卖体力劳动为生的工人可以加入，以出卖脑力劳动为生的职员也可加入，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工人阶级有许多阶层：有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还有职员，他们同样是依靠工钱生活的。社会的习惯，把工人的工资，叫工资，职员的工资叫薪水。其实，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叫做

雇佣劳动者、工钱劳动者，没有分别的。如果我们不把职员一般地看作工人阶级，便是分裂工人阶级，是错误的。我们工会叫做职工会，便是包括职员在内的。

2. 以出卖产品为生的，如农民、独立手工业者或贫民，不要加入工会，以保持工会的阶级性。

3. 家庭雇佣者（如女仆），不要去组织他们。

4. 工业和商业的划分。工业是制造，商业是贩卖。要看他的收入从哪方面来，不要看是否有门市。要详细分析并区分清楚。

5. 宗教职业家（和尚、道士），不能加入工会，但工人信仰宗教者可以加入。

6. 娼妓是不正当职业，不能加入工会，但女工之行为不端者可以加入。工会是一个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组织。所谓阶级性即是必须限定以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所谓群众性，即是工人阶级全体的组织，不分性别信仰，进步落后都可加入，保护阶级性达到群众性是工会的组织原则。

第四、领导问题

一、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党委要把个人领导才能转到组织中去，成为党委集体的东西，去进行领导。党的七大选举时，毛主席曾解释过这个问题。全能的干部没有，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通晓各方面的知识。要集中人才，形成能够通晓各方面的领导机关，去管理各方面。因此，个人惟有从集体中求完全。其次，今天不能完全，明天可能完全。马克思说过：世界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有尚未认识的东西。这就产生学习问题。毛主席常常说：我们全党的政治水平不高不齐，马列主义我们只懂得一点点，不多，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像毛主席如此渊深博学，全党很少。他还如此的谦虚谨慎，积极学习，我们更应力戒自满。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如不以此出发，便不会有谦虚的态度。加强党委工作，要深思熟虑，大家研究，力求完全。“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只有集思广益，实行集体领导，才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因此，在检查工作时，也要从这方面着眼，要看是集体的作用还是个人的作用，马列主义者强调发扬集体英雄主义，而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

二、高度民主，高度集中。所谓民主与集中，是矛盾的统一。毛主席在七大说过：高度的民主，是最能团结同志，团结人民的工具；高度的集中，是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武器，统一起来，就是团结同志，战胜敌人。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来建立高度集中的领导。

三、善于预见，抓住中心。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所谓预见，就是能预先见到事物发展的前途和趋向，虽然现在还仅是刚刚萌芽的东西。最高的觉悟，就是最高的预见。所谓中心，就是最大量最普遍的东西。比方，今天我们要了解广东，这就是今天工作的中心，也就是全体同志所普遍要求的东西。抓住了最大量而普遍的东西，就是抓住了中心。即有了科学的预见，又抓住了中心，领导工作就会做好，也就是合乎毛泽东思想。凡是犯大错者，都是看不见大量而普遍的东西，看不见属于千百万人民所要求的东西。陈独秀[39]就是看不见广大的农民要求土地，为土地而要武装，这就是没有预见，没有中心。

四、谦虚朴素，勤劳工作的作风。进入城市后，作风是很紧要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特别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所以特别强调，要同志们“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告诫我们，不要因为胜利，因为进入城市就骄傲起来，以功臣自居，停顿而不求进步，或贪图享乐腐化的生活。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今天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多得很，必须要虚心地努力学习，不要有“衣锦还乡”的思想，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我党谦虚、朴素、勤劳和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谁要是一进城市便飘飘然，趾高气扬，便要脱离群众。

第五，团结会师

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现在是四面八方的干部汇合在一起，有外来与本地干部，有新干部与老干部，有上级与下级干部，有党与非党干部，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团结问题要特别注意。北上学习的有一套，坚持斗争的有一套，军队和地方各有一套，北方的和南方的各有一套，总之各有千秋，各有上下。必须认识别人的成绩和经验，要首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看到人家的本领，尊重别人，向人家学习。不忙于马上批评别人的工作，如发现别人有错误，亦须从团结出发，用与人为善的态度，作善意的批评建议，帮助同志，帮助改进工作，达到团结，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有的人老是把显微镜放在别人的毛病上，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这是唯心论的观点。必须全面地看问题，看到缺点时，还要看到好的一面，要发扬好的一面，善意地帮助改正不好的一面。现在是五湖英雄，集中在一起，要把英雄主义发挥到集体上去，要正确而恰当地去处理事情，全体干部，要团结起来。

今天，我军已占领了粤北的南雄。十月是革命的十月，胜利的十月，也将是最紧张的一个月。我们将思想准备好，将队伍整理好之后，就要进军了。我们要在十月解放广州，胜利地完成解放华南的光荣任务！

注 释

[1]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解放后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爪哇，泛指以爪哇岛为中心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原为荷兰等国殖民地，令大部地区属印度尼西亚。

[4]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5]一八四一年五月，英军攻占广州城郊的四方炮台，四出劫掠奸淫。

五月二十九日，广州城北三元里的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抵抗英军暴行。次日，附近百余村的团练武装赶来支援抗英斗争，在牛栏冈一带大败英国侵略军，并围困了敌人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三十一日，广州附近各县四百余乡的数万团练武装加入了围攻的队伍。由于腐败的清政府的压制，围攻群众最后被迫撤围。

[6]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在广西边境镇南关（今名友谊关）大败法军，乘胜攻克越南谅山。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7]这里是指辛亥革命前后，两广地区的反清革命斗争和武装起义。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曾先后在广东、广西境内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特别是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四月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同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统治迅速瓦解。广西、广东等地也先后响应革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

[8]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罢工坚持了五十六天，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入瘫痪，最终迫使港英当局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在罢工中死难烈士的家属。这次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

[9]这段话的新译文是：“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递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毗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民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通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0页）。

[10]安南是越南的旧称。暹罗是泰国的旧称。

[11]马来亚指当时的英属“马来亚联合邦”，现为马来西亚联邦西部领土。苏门答腊即苏门答腊岛，原为荷兰殖民地，今属印度尼西亚。

[12]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原为荷兰、英国殖民地，今北部分属马来西亚和文莱，南部属中印度尼西亚。

[13]苏兆征，省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杨殷，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罗登贤，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源，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

起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甦，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常务委员。邓发，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4]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5]彭湃，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月领导海陆丰农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

[16]叶挺，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等职，所部多为共产党员。

[17]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后来自卫战争发展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18]李宗仁，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19]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20]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南军政长官。

[21]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22]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驻守绥远的傅作义系国民党军队受到极大震动。为争取该部队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对其采取暂维现状、加强工作、等待觉悟的方针，并通过傅作义推动绥远军政当局与华北人民政府就划界停战、恢复交通和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六月八日，双方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二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部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将这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针扣办法称之为“绥远方式”。

[23]傅作义，曾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接受改编。

[24]这段话的新译文是：“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页）。

[25]艾奇逊，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6]军统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九三八年设立、长期由特务头子戴笠控制。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复兴社特务处”。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政府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一九四六年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27]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广东省政行主席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一九四九年后长期移居美国。

[28]唐纵，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保安局局长。

[29]李福林，一九四九年广东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粤省游击总指挥，一九五一年去香港。

[30]CC是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核心的一个派系。于一九二七年后按照蒋介石的授意逐步发展形成。因为它最初的组织形式“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 Central Club 和“二陈”英文字缩写都是 CC，所以被称为 CC 系。该派系以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宗旨，长期操纵把持国民党党务，专门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31]梁华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后离职去台湾。

[32]马超俊，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农工部部长。

[33]葛肇煌，当时任广州三合会（又称洪门忠义会）会长、国民党湘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34]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各总司令。

[35]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

[36]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欺骗和控制青年的民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并入国民党。

[37]民社党即中国民主社会党。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

[38]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成立。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它标榜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

[39]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加强战备，防袭防钻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世界大战是否发生，和平有无保障，都决定于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人、地、时，如果这几个条件成熟了，不想打都要打的。否则，要打也打不起来。从目前来看，条件并没有成熟，帝国主义方面的准备还很不够。从朝鲜战争来看，它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有联系的，也有区分的，这一点必须清楚的认识。应该了解：朝鲜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一个环节与步骤，但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开始。

同志们不要忽视我们自己的力量，世界上不一定永远是让帝国主义来攻打我们，有一天世界人民解放的力量会鼓起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的斗争，从根本上消灭帝国主义。对于我们，和平是可以争取的，但如果打不可避免，我们也要打，这种主动性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

总之，朝鲜问题与世界大战问题有联系，也有区分，是非常微妙的。但今天可以肯定，帝国主义要发动大战，它还没有准备好。在这个准备中我们是完全有优势的。不过也要作这样的估计：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就要估计到它的疯狂性与冒险行为，不这样去估计也是不对的。那末，这样说来战与不战是否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呢？不是，我们说基本上是打不起来的，可是必须防备万一，适当地估计帝国主义的冒险行为，而将我们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布置到“万一”这一点去。

朝鲜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支援朝鲜战争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正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自十月二十五日到十一月四日为止，十天的战斗，已歼灭了几千名敌人并且初步摸到了战争的规律和经验，今后会决心打下去，不管形势有何变化，我们也毫不畏惧，坚决地打下去。如果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帝国主义敢于冒险扩大战争，其结果不只是美帝国主义一个国家的存亡问题，而将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溃灭。在朝鲜战争中假如解决了美帝的军事力量，对东南亚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和越南的解放战争也将会引起形势的重大变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

在反美问题上必须认识到，如果能够将美帝国主义打下去，世界和平问题就基本上获得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果世界上其他各国资本主义残余力量没有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撑腰，人民是可以得到胜利的。今后，如果把美帝国主义打下去，或者将它赶出去，持久和平就有希望，所以打垮美帝国主义与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的。

帝国主义者是不甘于死亡的，垂死的挣扎将更加凶狠更加疯狂。在我们公开以行动支援朝鲜以后，敌人的动向如何，值得我们注意与警惕。倘若战争发展到另一阶段，美帝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求救无门的时候，蒋介石匪军可能被美帝用来补充朝鲜战场上的兵力，也有可能放到我们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各种扰乱和袭击。从形势上看来，广东被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三角洲、在汕头及其他地区，我们都应该从最危险的估计出发来布置工作，我们应有战争观点来处理当前一切问题。在防袭防钻方面，目前广东情况最危

这是叶剑英在广东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总结报吉的要点。当时叶剑英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险与最薄弱的在四方面：一、基层；二、水上；三、边界；四、海岛。这四件工作都必须加强。空中轰炸可能性最大的是在广州和汕头。

要防袭防钻就要依靠工农兵，要做好群众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各地要将地方武装搞好，要采取有效的方法训练和整理民兵，健全基层。水上的管制也很重要，也要搞好。过去，我们的政权工作还没有抓到底。过去所以没有特别强调是因为工作的步骤还没有到这一步，今天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解决，是会犯错误的。同时，广东的地理特点是一半陆一半水，要水陆并重。

总括起来农村中要做好下列几件工作：一、加紧防空；二、疏散物资；三、清理机关；四、建立后方；五、巩固秩序。关于巩固秩序中注意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安置一批，究竟杀多少，要实事求是，不要先造预算，不要错杀、枉杀。沿海工作要做好：一、控制海港工作；二、管理出入口，并恰当地与走私作斗争；三、控制水上航线；四、防卫海岛；五、海港布雷。以上这些工作必须在许多有关的会议上作动员，并召集有关部门联合开会解决。在工会工作上要注意：一、劳模的作用问题，就是如何将劳模组织起来作为工会的核心，成为我们在工作上的一个依靠；二、要有组织地开办一些夜校，加强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将反美的情绪及战备观念在人民中普遍的树立起来；三、要恰当地解决工资问题。总之，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人民，就必须通过各种发动群众的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样，才能够得到靠山。

在各种会议上、在报告中、在决议中都应该加上一条，这一条就是：要宣传政府和解放军，而且动员群众起来拥护，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广东的环境十分重要。要启发群众对政府、对军队的认识，从而真心真意地拥护政府、拥护军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过去我们的工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一个毛病。所以各地区的资料室、研究室要注意收集一些材料，反映今天的政府与过去的反动政权有什么不同，启发他们对政府对军队的拥护，这是很必要的。军队要注意爱护人民、纪律不好的、破坏军民团结的要在整风中批评反省改正，不对的应向老百姓认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抓紧广西剿匪工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同志们：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在明年五月一日以前，肃清广西全省股匪。中共中央中南局也发来同样的指示。这次会议，张云逸[1]主席根据毛主席及中南局的指示作了报告，大家作了补充。陶铸[2]主任的报告，给我们在政策上作了解释，并提出许多具体办法。这样看来，同志们对于方针、政策、做法和时限都掌握了，我相信任务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现在我想讲四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一、对广西的认识

1. 今天的广西，是人民的广西，已经完全不同旧日李[3]、白[4]匪帮统治时代的广西。但有些同志，对广西认识不足，因此，热情不高。说广西山多、匪多、蛇多、穷人多。我们应当指出，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勇敢而勤劳的。太平天国起义[5]，首先是广西农民搞起来的。广西人民，过去所受的封建压迫剥削很深，因此，反抗压迫剥削也很坚决。广西人民，从来就是勇敢的。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举行右江暴动[6]，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七军，虽然这支队伍很快就与主力红军会合，但在广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已有几块游击区和人民游击队，坚持斗争，加上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广西人民，不是倾向敌人，而是拥护我们党和人民政权的。这就说明广西工作，有优良的群众条件。

2. 今天的广西地处国防前线，与东南亚各国毗连。这些国家，正在进行解放斗争，帝国主义者，正在联合力量，镇压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成功与否，不仅与我国数百万华侨的利害有关，而且直接关连到我国的安危。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有责任去注意他们的斗争。而广西所处的毗邻地位，更是中国人民与这些地区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桥梁。因此，今天的广西，是负有光荣的国际任务的。

3. 但是，应该指出，广西虽然解放了，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但乡村封建势力尚未被摧毁，公开的反动武装尚未消灭，土改尚未完成。就是说，上层革掉了，基层未革掉，城市革掉了，乡村未革掉。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自上而下地，有领导地贯彻目前阶段的革命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就是说，我们必须彻底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地主阶级还掌握有一定武装，并以武装来反抗我们的时候，这个斗争，还是武装斗争的形式。我们要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不过在目前已不是两军对垒的局面，而是非常复杂的带社会性的剿匪斗争。我们要解除地主的武装，夺回土地，消灭地主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它必然会作临死挣扎，当反动武装未被解除以前，他们主要是用武装斗争形式，当武装已被解除之后，他们仍然要钻到我们的内部来，进行阴谋破坏。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指出这个长期性、复杂性，我们才有严肃的态度来对付当前的斗争。

这是叶剑英在中共广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4. 目前，广西人民比较普遍的要求是什么？假如大家所提的山多、匪多、蛇多、穷人多的说法，是合乎实际的话，那就是说明了：第一，广西农民，因为受到严重的封建剥削，所以生活异常贫困；第二，在土匪四处骚扰之下，广西人民的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所以广西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第一，要安定（剿匪肃特）；第二，要救活（吃饭）；第三，要保命（枪支）；第四，要土地（生产）。我们的党和政府，要为广西人民服务，就要满足广西人民的这些要求，就是要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在保证领导条件下，给他们枪支，用以保家乡、保生命，进行生产救灾，给他们生活出路，完成土改，给他们土地。总之，是为他们除害兴利，有害必除，有利必兴，二者不能偏废。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但今天来说，广西人民的四个要求，最首先最中心的是剿匪。匪不肃清，其他都谈不到。这是一条锁链的四个环子，而剿匪是中心的一环。我们今天用全力抓住这个中心的一环，然后才能胜利地转入第二环——土改。我们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善于全力抓住中心的环节。

5. 战斗的广西。这就是说，广西人民是战斗的人民，肩负着繁重的战斗任务。广西人民是勇敢善战的。过去受了敌人长期反动统治的剥削和压迫，这些战斗的潜力长期被摧残、被欺骗、被压抑，不能发挥出来。解放后，我们就应把它发挥出来，使战斗的人民，成为伟大革命的战斗力量。这是因为广西的人民，今天有战斗的任务。美帝国主义此次侵略朝鲜，其目的是企图进一步从东北直接进攻中国。但美帝国主义者，也企图侵略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企图进一步从西南直接进攻中国。因为这些国家，其大陆与我们毗连着，帝国主义者可从陆地闯进广西，侵略我国。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广西恰恰是国防最前线，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的战斗任务。

二、一年来的广西工作

一年来，广西工作在广西省委与张云逸同志领导下，有很大成绩。这个成绩属于广西人民、广西军队、广西党组织，属于中南局与中央的正确领导。我认为成绩主要表现在：

1. 广西人民及其地方武装，支援和配合了大军，解放全省，消灭了蒋、李、白匪帮十七万反动武装，支援了陈赓兵团经桂入滇，并保证了与邻省友区的交通和运输的任务。

2. 由于招降工作的成功，兵不血刃，消灭了李、白匪帮有计划遗留的三万五千武装，并组织民兵十六万，消灭土匪十二万（包括前述消灭大股残匪在内），镇压了特务，有许多地区进行了减租退租、反霸、救荒、农贷等发动群众的工作，稳定金融物价等等，给人民以不少的利益。

3. 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把人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一步。

4. 基本上建立了广西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

自从整风以后，从十月中旬开始，各师与各分区，积极努力，展开剿匪。四十五天时间，已歼匪二万五千六百人。这说明，剿匪有显著的进步，比过去有显著的成绩。你们的缺点，也经过你们的整风，通过自我批评纠正的。这说明广西党组织（包括军队党组织），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加上上级指示和帮助，就更有了保证。在此基础上，来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和剿匪任务，我想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当前，世界革命与战争的音乐交响着，旋律一度比一度快，而我们打板的人，还悠悠地敲着慢板、这就不合毛主席的拍子了。因此，我们现在要把板子打快一些，才配得上世界的音乐。这不是说，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而是说，过去打慢板，打得好，可是，现在新的情况已经来临，而我们还在打慢板那就会错误了。毛主席在我临来时，曾指示我，广东必须迅速广泛进行土改，广西必须加速剿匪，两广必须统筹，才能有效的对付敌人可能的侵略。广西工作有缺点，是一回事，从慢板要转到快板，又是一回事。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同志们必须好好地体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迅速地定期定额地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

三、目前的形势

目前形势，从朝鲜局势说起。这个问题，人民最为关心：朝鲜战争，是否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朝鲜开始了呢？或者朝鲜战争发展下去，就会变为世界大战呢？我们说，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准备第三次大战的重要部分，还不是大战的开始。因为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其范围就不仅限于朝鲜，或是亚洲或欧洲，而是扩至整个世界。世界战场，从整个地球说，东半球是主要的战场，在东半球说，欧洲是主要战场。总之，这是真正的整个的世界战争。必须要全球的战争准备。自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即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战争的准备，在全世界推行杜鲁门主义[7]、马歇尔计划[8]等等。在亚洲，与扶助蒋介石的同时，又想在朝鲜、日本、台湾、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来进攻我国和苏联。因此，美帝假使占领了朝鲜，不过是完成了它的准备之一，还要更进一步夺取越南与东南亚作为军事基地，同时加速在欧洲的准备。

既然美帝进攻朝鲜，是美帝准备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部分，那末，朝鲜战争，从朝鲜本身来看，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从世界观点来看，就是准备大战与破坏准备大战的斗争。朝鲜反侵略战争能坚持、能胜利，就能破坏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准备。我们支援朝鲜，就是破坏美帝国主义对战争的准备，阻止世界大战的爆发，保卫世界和平。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硬要把战争持久下去，把战争在朝鲜拖下去，也不是可怕的。这也是消耗美帝实力，锻炼和壮大我们自己的最好办法和机会。现在朝鲜的美军，有八个师，英帝及其仆从国家也派一些来，如果将他们的力量，在朝鲜消耗一点，使他们积蓄力量更加困难，这对阻止世界大战，是有利的。朝鲜地势大部与中国毗连，一部与苏联接壤，这种地势很有利，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下点力量，将帝国主义力量消耗掉，对朝鲜、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地支持朝鲜人民的义举，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美帝为什么不顾我国政府屡次发出的警告，公开武装侵略朝鲜和台湾呢？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最近二三十年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经过二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体系大大削弱，反资本主义体系大大加强。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资本主义英、美、法、日、德、意、俄的七“强”，变为六“强”了。苏联成为反帝的中坚力量。从此，世界产生了两个营垒。第二次大战以后，资本主义方面，德、意、日被打垮了，英、法被削弱了，六“强”只剩下一个美帝了。另一方面，社会

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却由一个变成十二个，人口达八万万以上。并且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大多数的人民，仍然是拥护民主和平的。最近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9]上，签名的人数，已达到十万万以上。这说明世界两个阵营对比，和平民主的力量大大的加强，帝国主义力量大大的削弱。因为力量对比优势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取得了主动。所谓主动即是可战可和。可以保卫世界和平，也可以打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看：在欧洲，德、意被打垮了，英、法削弱了，还有哪个国家敢号召人民向苏联进攻呢？在亚洲，日本被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被打垮了，还有哪个敢向中国进攻呢？在欧洲，没有人敢进攻苏联，在亚洲没有人敢进攻中国，应该说：二次大战以后，欧、亚两洲人民，已经获得持久和平的有利条件。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挑动战争的话，欧、亚两洲持久和平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所以世界还有战争威胁，就是由于有一个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一结束，立即就匆匆忙忙地准备新的战争，这正是说明他们的危机，而不是说明他们的强大。美国的力量，把美国本身作为单独一个国家来看，它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强了，但从资本主义整个体系来看，从全世界两个阵营力量对比来看，它是大大地削弱了。所以它要搞马歇尔计划，到处搞基地，到处侵占别人的利益。因此，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则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美帝企图在战争中逃避危机，因此要急着准备，因而不能不由阴谋活动进到公开武装侵略朝鲜。

世界人民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与主动呢？是利用此优势来进行战争为有利呢？还是利用此优势来巩固持久和平为有利呢？我们认为利用优势来巩固持久和平为有利。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趋势，是可以经过和平斗争走向胜利的。我们要努力阻止战争的发生。我们用优势的力量来巩固和平，而和平又是全世界人民所拥护的，是最能团结世界广大人民的。这样，就可使敌人更加孤立，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加增大。

但我们也应该准备强大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说，我们看问题，对于基本的方面，必然的方面，固然要肯定，但对于非基本的方面，偶然的方面，也要肯定。因此，我们也要肯定帝国主义中有不少的疯狂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逃避灾难。我们争取好的方面，但又要准备最危险的方面。因此，我们的任务，就要提防帝国主义的疯狂，提防帝国主义的冒险，号召世界和中国人民，起来阻止战争，打败战争挑拨者。

直到今天为止，敌人还没有准备好，美帝除在亚洲积极备战以外，又想在欧洲建立一支统一的军队，计划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组成五十个到七十个师。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因为要武装西德，就遭到法国人民和西德人民的反对。证明美帝在欧洲现在也没有准备好。但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准备中。为了对付敌人的挣扎和侵袭，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有战争的观点，反对太平观念。因此，我们剿匪工作，就要加快，要定期定额，消灭土匪，完成任务。定期定额完成剿匪任务，关键在于地方，关键在于配合。军队已动员起来，必须加上地方工作的配合，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就能保证胜利，巩固胜利。

四、当前的任务

这个问题，大家都讲过了，讲得很好。完成任务的条件，决定于正确领

导。领导的正确性，具体表现在：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

一、有重点：

(1) 要认识重点，不是单纯军事重点，而是整个工作的重点，是各种力量的汇合。

(2) 重点地区：中南军区有指示，张主席、陶主任都报告过，我不重复。

(3) 重点任务：消灭反动武装，并把这些武装夺取过来，武装人民自己，组织人民自卫。这样从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着眼，政权才有支柱，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基础。

(4) 重点要求：战略上的要求，是准备应付敌人登陆。因此，南区重面，创造战场，北区重线，保证供应。由线到面，面里有线。

二、有组织：

(1) 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全面进行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总其成。

(2) 党、团要做好宣传工作，做到人人开口，个个宣传，村村开会，户户访问。同时，组织干部，做好组织教育训练工作。

(3) 政权工作：要使政策与群众见面，召集群众会、代表会，整顿政权，特别是加强基层（乡）。战后，可以进行抚恤、救济、借贷工作，各专署各县府，亦可以设参事室，安置一批必要安置的人员。

(4) 军队是战斗队，主要消灭反动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同时，也是工作队，要指导地方，做群众工作。

(5) 民运工作：工、农、青、妇、学组织下乡，配合进剿、清剿。

(6) 财政工作：保证任务完成（包括后勤在内），贸易、银行、税收跟着去开展工作。

(7) 在重点剿匪区统一党、政、军、民、财全面工作的领导。在区乡，可设立防匪自卫委员会，执行乡村军管会职权（军队政治部、地方党政部门参加）。下设人民法庭、匪产处理委员会、人民武装科等部门。

三、有办法：

对于收枪、反霸、没收、镇压等，要制定出适合于当地人民要求的几条具体办法（南北区不一定要求一样）。

(1) 收枪。

A. 广西有匪十七万人（连消灭的在内），但枪支据说共有四、五十万支。这些枪械，有很多是为土匪、地主所掌握，一部公开反抗，一部潜伏待机。有一些却为群众所有，用以自卫。收枪时要分别处理。

B. 积极收枪，同时可以向群众说明，枪不离乡。

C. 收枪工作，在广西来说，应该作为发动群众的重要步骤、重要手段。（这是广西工作的特点之一，在广西，要满足人民的要求，一是枪支，二是土地。）

D. 收枪，是与建设地方武装不可分割的工作。收枪来建设地方武装，是解除主力守备任务，使主力能执行机动的任务，收枪来建设地方武装，是广西人民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步骤。

E. 群众工作是军队本身三大任务之一。而收枪，是发动群众重要手段。因此，收枪也是军队本身的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收枪自卫，又是群众自己的迫切要求，群众也应该有组织去做。因此，军队必须结合群众去

做，群众必须参加收枪工作。无军队政治机关带头，群众不敢自己动手，无群众参加，则军队自己也缴不清。

F. 收枪有缴枪（战场上）、搜枪（据密报）、收枪（出布告）、换枪（枪换肩要登记）、献枪五种，同时并进。但都要有领导，有组织去搞才会减少混乱，减少磨擦。

G. 收了枪，要建立地方武装，对转业的主力军和复员的游击队，不应忽视。应帮助本地生根，讲清任务，长期着想，努力建立和培养地方武装。

（2）反霸。

据广西情况看来、无枪不成霸，无霸不通匪。因此，反霸也是一个严重斗争。

A. 打倒地主当权派——打掉他们政治上的统治威风，这是主要的。没收其财产则是次要的。必须没收时，要经过上级组织批准。

B. 反霸斗争不要当成一个阶段，不能想在一次运动中把霸反完，要结合剿匪、减租、土改等工作进行。

C. 财产没收只限于参加武装反抗的地主，只限于农村，城镇工商业基本不动。

至于镇压的问题，中南局指示中已有十条规定，是正确的，我不说了。

最后，再说一句，上述一切工作都应该从发动群众着眼，都是为了把群众发动起来，任何忽视发动群众，不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作风，都是有碍任务完成的。

注 释

[1]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2]陶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3]李指李宗仁，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九年一月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

[4]白指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九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

[5]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同近代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反抗外国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四三年夏，洪秀全在广东创立“拜上帝会”。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一八六四年失败。

[6]右江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右江地区百色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伎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军政治委员。十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一九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

和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整编为红七军，经转战桂湘粤赣边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

[7]一九四七年三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指导思想。宣称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世界已分为“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要承担“自由世界”抗拒共产主义的使命。咨文要求国会立即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这个咨文后来被称“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美国政府第一次公开宣布将“冷战”作为国策。

[8]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9]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发表的。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签名运动。

一九五四年的建军工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

应该说一九五四年这一年是一切指挥人员，其中包括高级指挥人员紧张学习的一年，是以诸兵种协同动作为基础的学习的一年，是部队开始转到按条令要求生活的一年，是高级指挥人员和高级司令部作战教练展开的一年。关于一九五四年的建军工作，我提出如下的建议。

一、关于军队的基本建设。

建设军队，如同建设工业一样，首先必须进行勘测、钻探、技术设计、制图、施工、安装等一套基本建设工作，完成基本建设以后才能开始生产。军队基本建设工作，我以为是彭副主席和聂代总长[1]报告中所指出的：定员定额、定编制、定装备、定制度。我们要把这些工作，看做是建军的基本建设工作。⁷

(一) 定员定额。我同意彭副主席和聂代总长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定额。就是说按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规定全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以不超过三百五十万人为限。这个定额是适合的，国防现代化密切依序于国家工业化。我国军队定员定额和装备要受国家预算的制约，国家逐年预算中建设费与军政费的比例，又受当年具体条件决定。考虑到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条件，决定把我军总额四百二十万裁减到三百五十万，在今年来说是适当的。我们的军队定额与美国的军队定额比较，分别为三百五十万比三百五十二万。只要我们有好的装备和好的训练，在目前是可以担负起国防任务的。过多会妨害我国工业化的建设。

关于定额中所存在的问题，不在总定额，而在总定额之下如何适当地制定各军种、各兵种的比例。我认为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根据朝鲜作战的经验，更仔细地研究各军种、各兵种的比例。会中有人提出，要加强空军和炮兵的建设，这一点可以考虑。

(二) 定编制。军队正在转变为高度熟练的正规军，必须加快制定出完善的组织编制形式。现在，军队的员额基本上确定了，步兵师和步兵军的编制已经制定颁发和执行了，并经实践证明基本上正确。只有军委各部门和军区各部的编制没有规定。现在，编制工作做得不够有秩序，而且整顿得很缓慢。军委要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以前结束制定平时基本编制的工作。我认为，这些要求有些过急，实际执行有困难，但可以考虑。

我认为，我们目前存在着至少三种不同的编制，如国防军、公安部队和地方警卫团、营等不同的编制，这是现实。但原则上整个国防部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制度和统一训练，这是基本的。至于在某些特殊地区，如水网、海岛和要塞地区，在特殊气候，如寒带、热带，为了执行任务的需要，不能不用特种装备和编制时，是许可的，但当作为特种问题来解决。

一九五四年的整编，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一百三十万编余编外人员（其中有二十万干部），须妥慎地处理。除同意干部部报告中所提意见，分别回乡建设、疗养、供养等办法外，我认为今年要把整编问题和征兵问题

⁷ 这是叶剑英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收入本书时稍有删略。当时叶剑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司令员

结合起来考虑。就是说，今年中心工作是整编，先把编余编外人员处理好，在此期间征兵不宜太多，否则两项繁重工作同时做会产生混乱。在这里，我觉得今年编制工作坚持一条“先出（缩编）后进（征兵），多出少进”的方针是适当的。

（三）定装备。我军的装备，历来是在战争中缴获的。因此，种类、口径不能不杂。一九五一年夏，经中苏两国政府协议，统一两国军队武器的制式标准。除进口外，加上我们自己生产的一部分，我军有可能改换新装备，逐渐走向统一。在装备问题上，军委决定凡是一时没有的武器或数年以后还不一定有武器的编制，坚决不编，以便集中更多人力财力举办学校或教导队伍（为了迎接新装备，应不失时机地先办好教导队）。这种决定是正确的，应当坚持。

（四）定制度。军队是一个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备有各种武装的战斗组织，不能没有固定的编制形式，同样不能没有共同遵守的各种制度。报告中提出今年准备实行兵役制度、军官服役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勋章奖章制度，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条令的实行同样要有准备，要宣传，要先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教育，然后实行起来，才能有更多的自觉性。

会中，许多同志提到条令本身有些不妥当之处，要求收回加以修改后再颁发。共同条令虽已经颁发了，但政治工作条例尚待此次会议讨论通过、经军委批准颁发、才能实施，像这种不应该推迟到共同条令颁发之后的政治工作条例，因为推迟了，使全军政治工作受到某些影响和损失。上述两项意见，我认为是对的。在这里我提点意见：

1、共同条令，应该颁发。颁发以前，是经过审查的，当时没有发现不妥当的地方，但经过实施之后，从连队中，从各级机关中，就是说从下面的实践中，发现有不妥善之处，因此提出修改意见，军委则重新加以审查，择其应该改的地方，加以修改，这种过程无论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应该允许的，因此也是正常的。经过此次会议讨论，又经过一次修改之后，今天认为妥善了，但是，可以肯定，经过一些时期又会发现新的问题，到那时要求再作一次修改也是正常的。

2、关于条文本身，哪些应改，哪些可以不改？我觉得属于军事原则方面的东西必须慎重；但仅仅属于传统习惯的东西可以放宽尺度，沿用习惯做法。如果有一天，大家觉得这个习惯不适合了，那时再加以修改不迟。

3、要注意，我们建军方向是向着国际标准的方向前进的，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建设我军成为现代化革命军队。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时注意与我军优良传统相结合也是必要的。这一点，不仅在讨论条例时要注意，在许多问题上，关联到苏联先进经验与我军优良传统的结合时，更应该注意。

二、关于义务兵役。

我同意报告中所提的我军应该由志愿兵役制转变到义务兵役制的意见。但过渡到义务兵役制必需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制定各种兵役条例（兵役法及实施细则）、宣传义务兵役，成立兵役机构训练干部、进行兵投入口统计和体格检查等等，这些准备工作，大约需要一年时间的紧张工作。

义务兵役制的开始实行，牵涉到全国人民，因为它带强迫性，对社会影响很大。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我们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至少以一年的时间进行各种准备是必要的。其中，有些问题，须加讨论，作出妥善的决定。

(一) 起征年龄。一种意见主张从十八周岁起征，另一种意见主张十九岁起征，再有一种意见主张二十周岁起征，都各有理由。参照各国义务兵役的起征年龄是：苏联规定一般公民十九周岁，中学毕业生为十八周岁；美国为十八周岁半；英国为十八周岁；法国为二十一周岁；日本为十七周岁；波兰为二十周岁。参照这些征兵较早、经验较多的国家的起征年限，同时根据我国各方面的情况，我的意见，十八周岁、十九周岁、二十周岁部可作为起征年龄。特别是以军种来分，则海军、空军定为十八周岁，陆军特种兵定为十九周岁，步兵定为二十周岁，比较切合实际。

(二) 服役期限。一种意见主张陆军二年，空军三年，海军四年；另一种意见主张陆军三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也各有理由。参照各国的情形是：苏联是陆军二年，空军三年，海防部队四年，海军五年；美国新兵服役二十四个月；法国二年；日本陆军二年，海军三年；波兰陆军二年，空军三年，海军三年；保加利亚陆军三年，工兵三年，空军四年，海军四年。我队为，规定服役期，应照顾：1. 装备现代技术与人民文化落后的矛盾（期限长些，可补习文化）；2. 照顾动员复员大进大出与农村生产建设及互助合作运动的矛盾（轮番太快，农村受不了）；3. 照顾主观上争取和平时间从事建军与客观上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仍然存在的矛盾（目前以少进少出，保持多一点现役实力比保持预备力量更重要些）。因此，我赞成陆军二年，空军四年，海军五年。

(三) 今年兵役工作，还没有开始准备，尚在讨论中，而且今年正在整编现役，是有大批人员要复员、要处理的时候，最好把今年作为认真准备征兵的一年，从颁布兵役法、宣传兵役法、组织机构训练干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直到试点为止，不宜大证多征，彭副主席提出今冬拟试征十万左右，我认为正确。

三、关于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

军委今年的工作十分繁重。我们要边整、边征、边练、边建。但工作必须抓住中心。因此，我们必须有很好的分工和组织。要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各级兵役机构专搞兵役，以便集中力量从事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工作。我认为：第一，建军首先要培养干部，就是说军队现代化，首先要干部现代化；第二，培养干部的内容总括起来是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在今年干部训练问题上，我提出下列意见：

(一) 全军训练的重点在干部。训练干部必须有计划地提高老干部（这是骨干），培养新干部（这是新血液），改造旧干部（一批已经争取过来，但思想作风未改造）。我军干部情况是：有一批身经百战的老骨干。我认为，这一批老干部中可以继续在部队中工作的，心须坚决地补习文化，或加以深造，使之成为部队中坚强骨干，带领广大的青年干部前进。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除了提高老干部、改造旧干部、洗刷坏干部以外，还要大量的培养新干部。这是新鲜血液的功能，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从我们目前情况看来，部队中还保存大量的久经战斗的工农青年，又有大批解放战争前后参军的青年，约有三十万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产生三十万英雄模范。这六十多万青年，经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的锻炼，接受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建军之宝”。在这几年内，应当大量吸收这批青年入学（比刚从学校出来的好多了），解决我军现代化干部的需要。同时，我还要指出：过去有人认为大学生、高中生在军队中服务不合理，是浪

费，用指名调动的办法，把他们调离军队转业。我认为除了个别专业人员，工业上十分需要的以外，大批按学历的抽调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一方面是这些人对现代化建军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对这些人没有进行有计划培养和正确使用的缘故。此外，军队中还吸收一批旧军官（起义、投降、被俘），数目并不小，除了其中尚有一批潜伏分子须加清洗外，我认为今年必须将这批干部，加以精确地调查、统计，争取其有一技之长的为我军服务，加强政治教育，分别地进行改造（特别是思想作风）。

此外，在职干部的学习，今年也要认真加强，方针应该是做什么学什么。各行各业，除了要学基本的军事、政治课目以外，还要学习专业课目、掌握专业知识。因此，除了学校教育、学院教育以外，还有在职干部集训制度（召集各级指挥员、各级司令部进行集训），这是我军要遵守的教育制度之一。我认为，作战部提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一九五四年高级干部学集团军防御。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军委召集战役集训（集团军防御）半个月；其次各大军区召集司令部及军级干部集训（七、八月），约半个月到二十天，同样学集团军防御，这样做今年全军可以勉强的进行一次集训；至于冬季演习，听说光准备工作都要三个月到五个月，事情并不简单，因此，今年只能选择一个地区（如山东）进行一次演习，各大区派人见习或参观。这样做，我认为还是比较适合的。

（二）部队训练重点在军士。教战士的各个动作，到班教练，实际上靠班长，班长不教好，战士亦练不好。因此，必须加强教导营（连）的领导。所有没有武器的编制一概不编，在适当时机（例如新武器将要来的时候）先办好教导队，准备迎接新装备。因此，必须派强干部、好教员去做教导队工作。

今年我们要开始实行征兵制，全军的现役老兵一二年内要复员就业。其中有大批身经百战的人，这些人掌握现在手中的武器是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因此，我提议对将要退伍的老战士加以统计，对他们进行军事、政治、文化训练的比例应与新战士不同。新战士以军事教育为重点，对老战士教育应该照顾其转业，因此政治、文化应多于军事，特别在一九五五年，我提出其比例为政治三、文化三、军事四，请考虑。

（三）特种兵今年训练重点在技术，其次才是战术。

（四）陆海空军各办自己的军事中学、小学。目的为了把最高度、最机密的技术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为了培养体魄强壮、有科技基础的干部去学习并掌握最高度的技术，须有计划地长期地培养。因此现在就要开始。我党我军现有十万干部子弟，应该成为首批培养的对象。我提议今年军费开支，须拨出一笔款开办陆海空军的小学 and 中学。

（五）全国办一个教导师。征集全军优秀班长充战士，排长当班长，军官降一级使用。这样，搞九个月到一年（班长三个月，排长五个月，连长半年，营长以上九个月），从营房生活、制度、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党的工作等，全面地学习训练。

（六）全军办好一个高级干部的文化学院。我上面已经说过，要提高老干部的文化水平，我觉得：1. 提高他们的文化，靠他们来继承我军优良传统，靠他们把我军的优良传统传授下去，不至间断；2. 提高他们的文化，以便接受苏联军事科学和先进经验，以提高我军军事水平；3. 因此应大胆放手，给予三年或五年时间离职进学（要按正规学制来生活）；4. 应解决文化学院各

种设备，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5.有人主张，由军委及各大区分办，这点亦可以考虑。不过问题不在谁办，而在要过正规军事学校的生活。

（七）全军学习党的总路线。这时期，全国干部都学习总路线，我们都听过很多报告。总政提出今年全军学习总路线，是正确的。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要从思想上了解国家在经济上如何建设、怎样建成社会主义及如何努力去实践。

（八）计划教育统一。各个教育单位是有计划的，但整个教育则缺少整个计划性，因此军训部、军校部、作战部、总干部部及陆海空各有关方面须有统一的配合教育的计划。全国性计划纲要必须统一，但实施计划，应因地制宜，授权地方。

注 释

[1]彭副主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代总长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

现代战役法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军委这次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军在职高级指挥员战役法集训，经过了理论学习、想定作业。见学工程兵化学兵与模仿原子炸弹爆炸示范表演，以及周总理和其他同志的几个政治报告，一共是二十天，今天结束了。这次集训的总结，想着重讲一讲几个理论问题。因此，总结上所提到的问题，尽管是我们在课堂上已讲过的或在作业中已解决的，但把它综合起来加以理论的总结，在认识上提高一步，还是需要的。

一、对原子武器威力的认识问题

(一) 原子武器的威力。

原子武器是有很大威力的突击兵器，它具有冲击波、光辐射、穿透辐射及放射性沾染四种性能，对生动力量有很大的杀伤力，高技术兵器 and 工程物体有很大的破坏力，小型原子炸弹能使半径一千六百公尺内的人员受到伤害，一个营的兵力失掉战斗力，半径七百公尺以内的技术兵器受到严重的损坏。

但是光靠原子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原子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但不能代替其他兵种、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原子武器要有其他兵种兵器积极的密切的配合，才能发挥其作用。故原子武器的出现，如同当年在战场上出现火药、出现坦克、出现飞机时一样，对其他兵种的作用，及实施战役、战斗的方法，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但不能引起战役战斗原则上的革命。故实施战役战斗的基本原则是仍然有效的。

对原子武器的威力应该设法防护，而且可以防护的，在今后战斗中对原子防护应该看做是最重要的战斗保障之一，应该采取各种办法（积极的消极的）加以防护。总的说来，一切掩蔽物，都能减弱原子武器的杀伤和破坏，土地（堑壕）仍然是战士们的好朋友，只要我们加强工程作业，加强伪装，加强对原子防御的训练并熟练在敌人原子袭击下的行动方法，那末这种损害是能够大为减少，甚至可以避免的。

(二) 原子武器对各军种、兵种、兵器的影响。

1. 对步兵的影响：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步兵仍旧是遂行战役、战斗中的基本力量。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仍旧是人，在战场上只有步兵才能攻占阵地和巩固阵地，最后消灭敌人，决定战役、战斗的结局，因而在战役、战斗中各兵种必须为步兵的利益而行动。同时，步兵也必须在其他兵种协同之下才能完成其任务。所以原子武器和其他技术兵器的发达，不但没有减低步兵的作用，而且提高了步兵的战斗能力。有人怀疑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步兵是否仍起主要作用？是没有根据的。

2. 对装甲坦克及机械化兵的影响：装甲坦克及机械化兵的特性，就是它有强大的火力、行动的快速力和装甲的防护力，既能充分的利用原子突击的效果，又能抗击使用原子武器的敌人，所以在新条件下就提高了对装甲坦克及机械化兵的战斗要求，要求它在地面上提高进攻速度，要求它从行进间进

入战斗和交战，要求它迅速发展原子突击的效果以击毁敌人。

3.对炮兵的影响：炮兵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仍旧是主要的人力突击的力量，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中大量的炮兵，以其火力不断支援步兵、坦克行动的原则仍旧没有改变。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炮兵的新任务是协同航空兵以火力突击原子武器的威力所不及的目标，作为它的补充，并消灭炮兵射程内敌人的原子炮兵，同时也是发射化学武器的重要兵器。

4.对工程兵的影响：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工程兵增加了对原子防护和在遭受敌人原子危害的地面上保障战斗行动的新任务。因此工程作业量增大了，可是作业时间反而相对地缩短了，由于军队行动的深度远、速度快，使工程保障的任务更加复杂和艰巨了。

5.对防化学兵的影响：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防化学兵的新任务是保障军队避免遭受放射性物质的伤害。由于敌人可能将化学武器和原子武器结合使用，故化学兵的作用更为提高。

6.对航空兵的影响：航空兵是保障我军使用原子武器，及打破和抗击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的基本力量。在高速度，远纵深作战条件下，航空兵对军队的支援和护送的意义也增大了。

7.对空降兵的影响：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在战役进攻的第一天，要求第一梯队军的部队，要突进三十至四十公里，这就给空降兵造成着陆的条件，空降兵的新任务是：单独的或与快速军队协同的消灭敌人的原子武器。

8.对海军的影响：海军可以使用原子武器以突击敌人的基地、舰艇，争取海军战役的胜利。

9.对国土防空军队的影响：以前防空只注意敌人的机群，对单机一般不发警报，在新条件下，国土防空军队的新任务是：制止敌人的机群接近我军掩护的物体，同时，也不准让一次单机飞入

10.对铁道兵的影响：在新条件下，战略、战役的机动性增大，铁路输送的意义相应提高，而主要的铁路枢纽部又将成为敌人原子突击的对象，因而及时地修复被破坏的铁路。保障铁路的运输能力，对铁道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对侦察兵的影响：在新条件下，要求侦察兵运用各种侦察手段，查明敌人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时机、方法，以便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打破敌人的原子突击和进行防护，同时要求准确地查明我军实施原子突击的对象。

12.对通信兵的影响：在新条件下战场情况剧烈，军队行动急速，通讯联络又经常遭受破坏，因而通信兵对保障军队实施不间断地指挥和协同动作的责任更加重要了。

13.对后方的影响：在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实施战役时，要求大量的、迅速的物质器材的供应及充分的技术保障；同时，后方将成为敌人原子袭击重要对象，因而在新条件下，后方的任务空前复杂和艰巨了。

对卫生勤务工作的影响：原子武器对军队伤害的特点是：遭受原子武器攻击的军队，在短时间内既有大量的伤员出现，而且受伤者大部分是合并性损伤，即兼有各种不同的外伤、烧伤和放射性损伤。

由于放射战剂的使用，在沾染地区内行动的军队可能遭受放射性损害，由于原子核爆炸的强大威力，军队卫生勤务机关可能随着被攻击的部队一同遭受袭击而失去工作能力。

因此，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卫生勤务的组织与工作更加复杂化了。

救护所、医院必须疏散配置，隐蔽在掩蔽所内，尽可能避免遭受原子袭击的损害；原子伤的治疗恢复时间较长，因此医院数量也必须相应地增多；还必须组织一定数量的卫生勤务组织的预备队（包括人员与药材的储备，特别是血液的储备），配备足够的运输车辆，便于机动，以防某一地区的救护所和医院遭受原子弹损害不能恢复能力时，立即投入代替之。

总之，要尽一切力量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承担起救护、后送大量伤病员的任务。

由此可见，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的作用不但未减低，而任务反加重了。

（三）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对战役、战斗的影响。

由于原子武器使用的结果，影响到敌我双方加强了军队的战斗编成，扩大了战役规模，加深了战役布势，提高了军队的突击力量和进攻速度，因而在战役、战术上引起了以下的影响：

1. 战役目的更加坚决了。因为使用原子武器的结果，可以更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的基本兵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战役目的。

2. 战役速度更快了。在战斗编成内，有快速军队，充分利用原子突击的效果，发挥高速度的进攻，从而使整个军队的进攻速度提高了。

3. 任务的深度更远了。由于战役目的更加坚决了，突击力更强了，进攻速度更快了，因而突击的深度也愈加深远了。

4. 进攻地带（防御时同样）加宽了。由于使用原子武器的结果，防御军队正面加宽了，纵深加大了，防御的密度稀疏了；进攻军队由于参加兵种、兵器很多，为了减低敌人原子突击的效果，须采取分开配置，由于上述原因，使进攻地带加宽了。

5. 战斗行动更紧张了，运动性和机动性增大了，战役准备时间和战役持续时间都缩短了。无论在陆地、空中、海面，战况剧烈，变化迅速，战斗行动昼夜不停。在陆地使用原子武器，可能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显著的突然变化，能破坏敌人军队的稳攻性和战线的完整。在空军战役中，使用原子武器，更便于迅速夺取制空权；在海军战役中使用原子武器，即使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也能便于夺取制海权。

（四）关于原子武器的使用原则。

原子武器使用原则是统一使用、准确使用、经济使用。由统帅部统一掌握，方面军可根据拨给的数量，统一计划使用。原子武器应使用在主要方向上，为完成主要任务而摧毁敌人的军队和最重要的物体，不能在战役、战斗中到处使用。在战役各个时期中，如突破敌人防御时，可以结合炮火准备、航空火力准备、实施原子准备；在进攻过程中，在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第二梯队进入交战，抗击敌人反突击，合围和歼灭被围之敌等最重要的时机，均可实施原子突击，当发现敌人的原子武器时，必须迅速加以摧毁，此时亦可使用原子炸弹或原子炮弹。

（五）资本主义各国的军事评论，对原子武器的观点。

原子武器的作用，同样的也使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原则和组织上，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里不妨举出若干方面的观点，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员研究的资料。我认为从军事思想方面来研究敌情，了解敌情，是完全必要的。

根据我已看到的文章里，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军事评论有以下的观点：

1. 原子武器是现代战争中极猛烈的一种武器，但是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不能代替也不能取消其他兵种和军种。（美）

2. 原子弹是目前摧毁力量最大的武器，但尽管原子弹摧毁力量很大，进攻者仍须把军队派到原子弹爆炸的地区去，以便充分利用原子弹摧毁力所造成的战果。（美）

3. 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尽管各种战斗样式不同，但其组织实施战斗的主要意旨，均在诱使对方成为原子攻击的目标，同时使自己避免成为原子攻击的目标。因此要求军队集中分散要迅速、机动、灵活，通信联络要不间断，各兵种要协同动作，一切工作的程序要简化。（英）

指挥员必须把各军种各兵种，都看成是完成战役目的所必须的力量，但不能在空间上集中到把自己成为原子攻击的目的。（英）

4. 实施防御的目的，在于迫使或诱致敌人集中兵力、兵器，使之形成最好的原子突击目标，而给以原子攻击，以便在大量歼灭和摧毁敌军生动力量和物质器材后转入进攻。（美）

5. 在原子武器条件下防御战斗行动的重心，将转向防御的纵深。因此，第二梯队诸预备队的作用，大大提高了。防者应根据这一点来分配兵力和兵器，并增大防御纵深——建立快速预备队。

增大纵深的目的，在于对已经突破防御地带的对方，易于形成“火袋”，迫使其集中，以便造成原子突击的目标。（美）

6. 原子武器的使用，使攻者使用空降兵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地面军队开始冲击时突击力量很猛，尔后，逐渐削弱，而空降军队着陆时很弱，尔后逐步增强。因此指挥员将不得不以同等程度来注意后方防御的问题。

7. 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侦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侦察应提供有价值的材料，以便统帅部选定对敌军存亡有决定意义的目标。空中侦察，应规定每天摄照距前沿约十六公里的纵深内的敌军配置，比例尺应为一万分之一，其重叠程度为百分之六十，这样就能对相片进行立体研究。（美）

8. 在进攻中，使用原子炮兵连，用八颗原子炮弹，在敌防御阵地上可造成宽七公里的缺口，同时可击毁下列目标：

- （1）在主要阵地上的战斗队形；
- （2）第二梯队的战斗队形；
- （3）炮兵阵地；
- （4）浅近预备队。（瑞士）

9. 美军认为位于进攻出发地位的军队在听到原子爆炸声时，即可将此爆炸声当做冲锋信号。因此时冲击波、光辐射、穿透辐射作用已失效了。

10. 美军认为有权使用原子武器的指挥官及其司令部，需有一个专家（原子武器顾问），其任务是供给有关原子武器的可能性，选择信管，确定炸高，选择实施原子突击目标等。

以上十项，就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军事评论家，对原子武器条件下作战的若干观点。我们不仅要研究敌情、了解敌情，而且也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希望大家对原子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性能，要准确地了解，既不要夸大其作用，又不要抹煞其威力。根据总政的资料，最近在部队中，进行了对原子防护的训练之后，个别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反映了两种思想：一种是麻痹，认为敌人绝对不敢使用原子武器，或认为原子武器只能对后方使用，而不能对前方使用；另一种则是过高地夸大了原子武器的威力，而产生了恐怖的情绪，

两者都应该加强教育加以纠正。

二、战役准备的时间问题

进攻战役准备时间，在一般条件下，为七至十二昼夜，在新条件下，为七至八昼夜。

有的同志提出，在新条件下，集团军进攻战役准备时间，仅有七天到八天，是否太短了？我们军队的情况是否可能？是的！如果单纯从主观的需要来说，战役的组织愈复杂，战役准备的时间也愈长。但是现代战役由于原子和化学武器的杀伤和破坏力很大，在战地上的兵力对比，可能经过原子突击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时间太长怕暴露挨原子弹，又由于各兵种行动快速力很大，敌方很容易用机动来弥补其布势上的弱点，时间太长怕迟缓，因此现代交战双方关于实施战役、战斗基本问题之一都在力图赢得时间。进攻者如能在短的时间内，隐蔽的集中突击集团，突然的迅速的转入进攻，不让敌人有加强防御和增调预备队的时间，则进攻者初步的战术胜利，必将获得保障。并可造成在进攻过程中各个击毁敌人的条件。这就是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进攻的准备时间要更加缩短的基本原因，但是，准备的时间再缩短，也不能少于构筑进攻出发地位的工事，军队变更部署和展开，及组织战斗和协同动作所必需的时间。

如何才能缩短战役准备的时间，又能确切的完成战役准备呢？这就要求军队的训练程度必须优良；指挥员的军事素养要高；司令部的组织能力要强，工作上要迅速准确。

在战役准备时节只有精细地计算时间，最合理地分配时间，才能节省时间，特别要技巧地拟制战役计划。因为集团军拟制战役计划所使用的战役、战斗文书的时间愈长，则下级机关和军队，准备战役的时间就会愈短，结果不是准备草率，就是行动迟缓、这就可能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引起不良的影响。所以应该简化战役、战斗文书，以便留出时间给下级机关和军队作准备。集团军进攻战役七至八昼夜准备时间的分配，可按集团军、军，各占两昼夜，以三昼夜的时间给师、团、营作准备，并可将准备工作同时并进，以便加速完成战役准备。

由此看来我们应该加强对军队、指挥员、司令部的训练，将现在的状况加以提高，而不应该停留于现状，降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三、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与变更问题

主要突击方向，究竟是选在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还是选择在敌人防御坚强的地方？在讨论中，曾经有过争论，有人提出，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可以选在敌人防御坚强的地方，实施主要突击，这种想法是对原子武器的估计太高了！根据中国革命战

争的经验和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都证明，主要突击方向应选在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这一原则，即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仍然是正确的。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关于战役方向的意义和选择主要突击方向的思想方法。

（一）什么是战役方向和主要突击方向？

在军事学术中所谓战役方向，是在整个进攻战役过程中，主力行动的方向。它的含义有两项：一是这一方向，不是真空，而是有其一定的兵力、兵器的容量；二是这一方向，存在有我们必须攻取的在战略、战役、战术上有相当价值的对象。因而所谓战役方

向，就是使用一个或几个集团军所指向的方向，并顺着该方向进行交战，攻取有战役价值的对象，就是说歼灭敌人的战役集团，夺取有战役价值的物体，而地带是存在于方向之中。从而我们可以了解到，现代战争中的主要突击方向，已不是一点一线，而是我军要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实施突击的一个相当宽度的地带。

因此，我们不仅在战术上主要突破地段的选择，必须服从于战役方向，而且在战役上主要突击方向的选择，也必须服从于战役方向。

（二）主要突击方向应具备的条件。

在一般条件下所选择的主要突击方向，应能保障主要突击集团隐蔽地开进和展开，对敌人实施意外地突击；能在该方向上最有效地使用各军种、各兵种的武器，并便于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及便于军队的指挥；能迅速割裂敌人防御的战役布势对敌各个歼灭。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选定的主要突击方向，除上述之外，还必须：便于我军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同时还要利于避免或减弱遭受敌人原子突击的地带；能保障迅速地击毁敌人的基本兵力，于最短的时间内达成战役目的。

（三）选定主要突击方向的思想方法。

关于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是否正确，就看我们能否从事物

3.突破与发展的联系。机器战争时代的战役，使用大量军队和各种技术兵器，已成为普遍现象。现代进攻战役的实质，就是解决两个紧密衔接的基本任务：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即根据军队担负的任务，发展突破。必须指出，在现代化的战争，防御军队的机动不断增长的条件，突破了敌人战术防御之后，绝不允许中途迟滞，而要立即将战术突破发展为战役突破。因此，突破敌人的战术防御并非战役的止境，而是战役发展的开始，在进攻战役中，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要既便于突破敌人的防御的战术纵深，又便于向纵深或翼侧将战术突破发展为战役突破。这就要求选择便于隐蔽集中和展开兵力、兵器的出发地位，并在这个出发地位上，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在战役纵深内，便于发挥各兵种的最大效能实施广泛的机动，而迅速发展战役，将突击的锐锋，一举透贯敌人战役防御的全部纵深，使战役军团的主力，前出到敌人基本集团的翼侧与后方，从而合围与歼灭敌人这一集团，而达成战役目的。

4.点与面的联系。手工业时代的线式战术，只能进行线式的差不多没有多大纵深的突击，故指挥进攻只选定突击点，作坊工业时代（拿破仑时代）的纵深战术，因为使用的是轻兵器，参战的兵力，亦有一定的限度，故当时的战斗队形，纵深是很浅的，军事界把主要突击，认为是一条线。我们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战争，是集中重大的兵力、兵器，实施深远的突击，故主要突击方向。必须是一条适当宽度的地带。因此，对于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即不应在一点一线上孤立地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因一点而忽视整个突击地带内敌人的主力或起决定作用的目标。因此，就要求在战役开始的突破地带，要能容纳主要的兵力、兵器，向敌战役纵深发展突击时，要能便于机动。

不仅如此，在选定主要突击方向的同时，并要考虑在次要方向上采取何种手段，以钳制敌人，并应注意后方的前送后送是否便比较，全面思索，研究其相互的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要知道，正确选定主要突击方向，是正确确定下决心的基础；主要突击方向选对了，战役的胜利，就获得基本的保证。

（四）主要突击方向的变更问题。

有人主张，如果在原定的主要突击方向上进攻受挫，而在次要方向上发展顺利时，应该变更原定的主要突击方向，及时向原定的次要方向上变更部署，增强突击力量，发展胜利，这种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主力迂回到敌人主要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迅速地达成合围与歼灭敌人的战役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集团军司令员，必须确切地判明敌人真实的企图，不要被敌人佯动所欺骗，不要为突破地段上个别下级指挥员的“叫喊”所迷惑，而轻率改变部署；在作业中，也有人提出变更部署的困难，主张不要变更主张突击方向，而将第二梯队受挫的方向上进入交战，继续实施突击。这种固执，于战役不利，是有害的。不错！在进攻过程中，临时变更部署是有困难的，而且不应该稍遇敌人的阻止，就轻易变更主要突击方向；但尚若进攻确实受挫，如不变更主要突击方向，将影响到不能完成战役任务时，这个时候，仍然坚持原定的主要突击方向，不加以变更，则在战役过程中即可能由于敌人纵深内的机动增强抵抗，钳制我军的主力，演成胶着状态，从而束缚我军的战役机动，把整个战役陷于被动。

苏联卫国战争中，于一九四四年第三次打击[2]时（克里米亚战役），由于切实执行了斯大林同志关于“主要突击方向，不是经典”的指示，而灵活地变更主要突击方向，达成了胜利。

四、战役布势问题

这次作业关于战役布势问题，争论比较多的是预备队的问题。

我首先说一下集团军战役布势的编成问题，现代进攻战役，为了突贯敌人深远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必须保持有连续的突击力量，因此，集团军在进攻战役中，应编成纵深的战役布势。而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预备队的作用提高了，指挥员手中，必须经常掌握预备队，当着手中的预备队使用上去了，又要迅速重组新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实施现代战役是不可能的，故集团军战役布势内，除有强大的第二梯队之外，尚须拨出兵力组成强有力的诸快速预备队。如诸兵种合成军队预备队、防坦克的炮兵预备队、坦克预备队、工程兵预备队、快速障碍设置队、防化学兵预备队，并最好有炮兵预备队，以便用于增强突击力量，保持战役布势的稳定性及替换受敌人原子突击损失严重的部队。

战争经验证明，在许多进攻战役中，正因为攻者在交战中，善于适时的组织、掌握和调用当时所需要的预备队；正因为预备队在进攻过程中，保障了不间断地实施突击，方才获得了胜利。

在作业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有了第二梯队就不要组成诸兵种合成军队预备队了，这种意见，不适合于新条件下的战争。又有些同志对兵种合成军队预备队应从何处抽调兵力来组成的问题，发生争论，在原则上诸兵种合成军队预备队从次要方向的军，或第二梯队军内抽调兵力组成都是可以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如果次要方向的军任务深度较浅，当然可以由次要

方向的军内抽调兵力组成；但是如果次要方向的军任务较深，该军必须从纵深内增加突击力量才能完成任务，或者次要方向军的进攻地带较宽必须展开全部兵力，才能保障集团军战役布势的稳定性，此时最好从第二梯队军内抽调一个步兵师，组成集团军诸兵种合成军队预备队。

另外关于保持军队建制问题，在现代战役中变更部署，转移隶属，已经是常常发生的事，如能保持军队的建制固然是好的，但在情况必要时，亦不应拘束于军队建制而影响兵力的机动使用。

关于预备队的重建问题，在进攻过程中，由于情况变化急剧，必须及时变更部署使用第二梯队和诸预备队，进入交战。但在预备队（第二梯队）使用之后，为要遂行尔后的任务，还需要组织新的突击，故应立即从次要方向抽调兵力重新建立新的预备队（第二梯队）。

五、关于集团军快速集群的使用问题

这个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大家有争论的，主要的是快速集群的任务、使用时机、突破口地区选择几个问题，我就这三个问题来说明：

（一）快速集群的任务问题。

在进攻战役中，集团军的快速集群，是用以完成下列任务的：一、增强集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力量；二、先机夺取有利于敌人进行防御的地区；三、割裂敌军战役预备队的部署，打乱其指挥，使敌遭受损失，丧失其实施机动的可能性；四、造成围歼敌军集团的条件。

总的说来，快速集群主要是用以提高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将集团军所获得的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集团军快速集群是由快速兵团（机械化师和坦克师）组成的，故快速集群能否胜利的发展进攻，主要是依靠坦克的胜利，因此，要保障坦克获得胜利，心须为坦克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在确定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的地区。突击方向和任务深度时，必须根据集团军受领的任务、地形条件，和进入突破口地区内敌人对坦克防御性质而定。同时，必须考虑集团军快速集群可能首先遇到的敌人，及其遂行所受领之任务的能力。

（二）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的时机问题。

集团军快速集群在何处进入突破口和进入的时机主要决定于第一梯队军进攻的能力和地形的性能。

如果第一梯队军的进攻能力还没有发挥尽致，即使不使用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它也能够增强力量和保持高度的进攻速度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是过早的。过早地使用集团军快速集群，必将使其过早地遭受消耗，削弱它的突击力量，减低它的远战能力和顺利遂行其任务的能力。

如果待第一梯队军的进攻能力消耗殆尽时，再将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那又过迟了。这样，可能使第一梯队军的前进速度减慢，甚至被迫停顿，给敌人有机会调动预备队，在该方向上造成对敌有利的兵力对比。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快速集群只好与集团军其他兵团一样地进行战斗，而失去其作为集团军快速集群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最有利的时机就是：当第一梯队军尚

未完全耗尽其进攻能力，但为保持进攻的速度又需要增强力量时。

在我们想定的战役情况中，快速集群是为了提高进攻速度，要从行进间攻占敌人的集团军防御地带而进入交战的。所选择的时机，是趁敌人在其集团军防御地带上尚未来得及组织坚固的防御时候，进入交战，因而该地带是可以从行进间攻占的。

快速集群的使用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在集团军第二梯队攻占敌人集团军防御地带之后再快速集群进入交战。

这种方案可能是在下列情况采取的：当敌人集团军的防御地带已有军队预先牢固地占领，而不可能从行进间攻占时，在此情况下，使用快速集群突破敌人牢固占领的防御是不适当的。可使集团军第二梯队先攻占敌人集团军防御地带，而后再使快速集群前出至战役广场，击毁迎面开来的敌人预备队。

如果有敌人某一集团在计划战役时，并未发现，突然在其主要防御地带和第二防御地带之间实施反突击时，则必须使用快速集群突击敌人这一集团，以便迟滞它的行动，予以重创，并造成合围它的条件。此种方案是可能有的，但是，我们并不希望采取这种方案，因为这就会使快速集群失去遂行自己基本任务的能力。所以对快速集群的使用不应墨守成规，无论在计划战役或实施战役时，都必须根据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的情况、地点和时间而定。

（二）关于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地区的选择问题。

选择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地区时，应考虑下列各项：

1. 应能保障快速集群各部队和分队，仅可能隐蔽地前出至进入突破口的地区；

2. 在地形上，不仅应能容纳集团军快速集群各团的战斗队形，而且还应能容纳保障集团军快速集群进入突破口的兵力、兵器；

3. 最后，主要是在地形上要能保障第一梯队团的坦克展开成战斗队形，并以此队形向纵深（至少七至十公里）实施突击，突击时又不会遇到不能通过或难以通过（若无工兵和步兵的帮助时）的天然和人工的防坦克障碍物。

（四）对于快速集群的指挥问题。

对于快速集群的指挥，大家是有争论的。有人主张快速集群由两个师编成时，应组织一个临时的指挥机构，或由其中资深的师长统一指挥。经验证明是不适合的，因为快速集群在敌纵深内是大踏步机动，并非联系翼侧齐头并进的，如果临时组织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反增加一级指挥的层次，延迟甚至限制其机动，同时临时组成的指挥机构不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亦不能遂行其指挥的任务。而且在战役中，集团军本身更不应推卸责任，而规定一个师归另一个师师长指挥，故快速集群各师仍以直属集团军司令员指挥为宜。至于在纵深内指挥的方法主要是以无线电通信工具指挥。

六、合围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及第二梯队的使用问题

我军实施战役的基本样式，乃是合围与歼灭敌人的进攻战役。毛主席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3]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条件下，在所有各种类型的战役中，都应该遵守合围并歼灭敌人这一原则。

这个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大家是有争论的。合围与歼灭被围之敌，是一

个过程或是两个过程？合围与歼灭敌人是否可以使用原子武器？合围与歼灭敌人时主力应指向何方？以及第二梯队使用时机与开进等问题。

现在我就分别说明如下：

（一）合围与歼灭被围之敌是一个过程，还是两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发生间隙，这是一个争论问题。在过去的战争中，主要的由于攻城的压制兵器火力薄弱，防御的敌人常常利用坚固据点，进行持久防御，以消耗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对敌通常采取围困的战法，经过一定的时间，予敌以很大的削弱和消耗后，再行歼灭被围之敌。因此合围与歼灭是当作两个过程来进行的。但现代的战役，今后由于装备上具有现代的压制兵器，并将使用原子武器，这样就可能改变过去的状况，从而使合围与歼灭被围之敌成为统一的过程。即在构成合围对内正面的同时，不待敌人构成连续正面的环形防御，即分从几个方向，实施向心的突击，在最短的时间内，割裂与歼灭被围之敌。特别是在野战条件下更应使用这一原则。

（二）合围与歼灭被围之敌时，原子武器的使用问题，为求迅速对敌完成合围，在预期封闭合围圈的地域上对敌人重要物体，可实施原子突击，以支援进攻军队从两个方面的部队，迅速封闭合围圈之口，同时在割裂被围之敌时，为了支援进攻军队，从几个方面作向心的突击时，亦可实施原子突击，在这里应特别注意原子突击的时机，应在进攻军队距原子突击的目标二至五公里时实施，这样就能保障军队能利用原子突击的效果，而又不致打伤自

（三）合围与歼灭敌重兵集团时，第二梯队使用的问题。在合围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时，必须同时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与对外正面，此时主力应指向何方，则应根据战役企图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的说，如果在对外正面上敌人的战役预备队增援的威胁不大时，可以较大的兵力使用在围歼方面（即对内正面），如果增援的敌人是强大的战役预备队并且已向集团军地带内开进时，则应以主力使用在打援方面（对外正面）击毁敌人的战役预备队，同时留置一定的兵力继续监视或歼灭被围之敌。

因此集团军第二梯队在合围与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时，可能使用在合围的对内正面上，也可能使用在合围的对外正面上，或者先使用在对内正面上，尔后再使用到合围的对外正面上，至于究竟使用哪一方面，那就要看集团军的战役目的、任务及当时情况来决定。

在中国革命战争整个时期内，蒋匪军曾经常采用一面固守某些要点，诱我攻坚；另一面以重兵编成机动兵团，企图乘我军攻坚不克之际，夹击我军于坚城之下。因此，当时毛主席的军事原则之一是实施宽大的机动，创造与寻求敌人弱点，或围城打援，置重点打增援之敌。或拒援打城，置重点打守城之敌。甚或灵活转移重点声东击西，其目的都以合围与歼灭蒋匪兵力为主，把城市的夺取，认为是围歼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四）集团军第二梯队进入交战的时机问题。集团军第二梯队根据情况可能在突破敌人第二防御地带之后进入交战，这种场合，在我军目前装备情况来说，于一定时期内，会是正常的；也可能在突破敌人集团军防御地带之后，进入交战。这一问题、总顾问报告中已有详细说明，我不准备多讲，总而言之，不可过早消耗第二梯队力量，影响集团军尔后任务的完成，但亦不应过晚使用第二梯队进入交战，而贻误战机。应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而适宜使用之。

（五）第二梯队向进入交战地区开进问题。在一般条件下，因第二梯队

的配置地域距前沿较近（十二至十五公里），敌人的防御纵深亦较浅。当集团军突破敌人集团军防御地带之后，使第二梯队进入交战，由配置地域至进入交战地区的距离不过五十公里，此时在敌主要防御地带与第二防御地带之间指定一中间地域，使第二梯队分两个夜间徒步行军，隐蔽的进入交战地区是可以的。但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因敌人防御纵深大了，我第二梯队配置地域距前沿远了。在突破敌人第二防御地带之后，使其进入交战，行程有六十至八十公里，在突破敌人集团军防御地带之后进入交战时，则行程有一百至一百一十公里，在这情况下，为保障行动的突然，及不受敌人的空军及原子突击，又须夜间行动。因而在第二梯队向进入交战地区开进时，集团军在准备时节，就要预先为他准备足够车辆，使用汽车输送。

七、提高战役速度问题

关于现代进攻战役，速度要求这样快，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同志还是有怀疑的。我就这个问题说明以下几点：

提高战役速度，乃是现代战役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要了解，提高战役速度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在地面上有坦克，有机械牵引的炮兵和自行火炮，有摩托化的步兵，就是说有装甲坦克和机械化的快速兵团，这一快速兵团因为有高度的快速力。有猛烈的突击火力、有强固的防护能力，能够把火力与运动结合于它自己的本身，这样就能够在防空兵和炮兵及其他兵种保障下，进行边走边打边打边走的从行进间入交战，从行进间一举突破防御敌人的可能，有了这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提高战役的速度那就成为有可能了。

要提高进攻速度必须克服敌人在正面上加强的防御，或由纵深内调集预备队增强纵深的内抵抗；或实施反突击、要克服地形、天候等条件对进攻的影响。

要提高进攻速度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的作风（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第六条）。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但是要提高进攻速度还要依靠主观指挥。指挥高速度的进攻战役，必须：

（一）密匿我军的企图，造成敌人的错觉，并且乘敌之隙，运用新颖的战役、战斗方法，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突击。

（二）编成强大的突击集团，采取纵深的战役布势；并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既能实施初次的威烈突击，并能从纵深增加突击力量，始终保持对敌优势。如本想定中红军第一集团军除用一个师的兵力担任掩护外，其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及加强兵器都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了纵深的战役布势，并在战役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兵力兵器的对敌优势。

（三）迟滞敌人的战役预备队向前开进，这就首先要求以航空兵对敌战役预备队实施威烈的突击和原子突击，阻止其集中和向前开进；投掷空降兵占领重要地区。截断敌人战役预备队的来路；使用登陆兵上陆，阻敌从海面增援；使用游击队破坏交通迟滞敌人预备队的前进，以此隔断敌人的战役布势，孤立当面之敌而歼灭之。

（四）在战役过程中，实施高度的机动，迅速变更部署，将主要兵力集中到主要突击方向上，并同时抽调兵力组成新的第二梯队预备队，保持不间

断的突击力量。

（五）打破敌人束缚我军的机动（如航空兵保障及钳制行动），并对战役行动给予确实的保障（特别是对空防御、道路保障及对原子防护）、以便既能发展胜利，又能巩固战果。

（六）坚定的军队指挥，及时组织与保持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动作。这样一面制止敌人战役预备队向前开进，使其增调不来；一面提高我军进攻速度，迫敌撤退不及，而将突击的锐锋一举透贯敌人防御的全部战役纵深，而各个歼灭敌人。

注释

[1]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发起猛攻，先后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域，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其全部歼灭，生俘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保卢斯。这一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2]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初，苏军在对德军的战略大反攻中连续实施了十次进攻战役，史称“十次打击”。第三次打击指一九四四年四月苏军为解放克里木半岛等地而实施的进攻战役。又称克里木战役。苏军先后以陆、海、空两个方面军四十七万人的兵力协同作战。四月八日正式发起进攻，五月五日开始攻敌坚守的塞瓦斯托波儿城，十二日解放克里木半岛。此次战役，改善了苏军在苏德战场南翼的态势和黑海舰队的驻泊条件，并为进攻巴尔干和东南欧创造了条件。

[3]见毛泽东《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2页）。

辽东军事演习的总结讲评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国防部长同志，各位代表团团长及全体团员同志，请允许我向参加辽东军事演习的全体演员和见学人员作演习的总结讲评。

同志们！辽东军事演习已胜利结束了！我现在仅就演习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个战役性的总结讲评；关于战术和技术方面的讲评由各军种、兵种、勤务的负责同志分别进行。

第一部分，演习课目的说明

这次演习的课目是：在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在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主要方向上行动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演习的方法是：携带通信工具的，并吸收部分实兵参加的集团军两级首长——司令部现地演习。演习性质是示范演习，其目的就是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我军指挥员和部队。

抗登陆战役是一种特殊类型防御战役，它是陆军、海军、空军战役的总合。就是说为达成抗登陆战役总目的，在统一企图与指挥下，海军、空军组织独立海军、空军战役，陆军组织海岸防御战役，形成在海上、空中、陆上对敌人实施一系列的突击，达到彻底粉碎敌人登陆战役的目的。

抗登陆战役应包括海岸防御战役在内。多数场合，方面军是组织与实施抗登陆战役的基本军团。就规模来说，方面军可能协同海军单独实施抗登陆战役，也可能与友邻方面军密切协同实施。而集团军则是方面军实施抗登陆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担负海岸防御的任务。在个别场合下，集团军也有可能单独防守一个战役方向，遂行抗登陆战役的任务。在这种场合，集团军应加强必要的兵器，首先是航空兵，其理由是：登陆战役通常区分为准备、上船、航渡、上陆、攻占登陆场诸阶段。从接受任务起到开始上船以前止，为准备阶段；从兵力、兵器上船装载起到出航以前止，为上船阶段；从登陆兵出海航渡起到登陆兵开始战术展开进行换乘以前止，为航渡阶段；从登陆兵实施战术展开、进行换乘、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运动，到攻占登陆场止，为上陆阶段。抗登陆方面通常是要对上述诸阶段敌人登陆兵实施一系列的突击，但是集团军以其建制、加强及支援的兵器来说，是没有力量来进行的，只有方面军才辖有这种战役的兵力、兵器，首先是航空兵。我们这次演习是以实施集团军的海岸防御战役为中心，主要是为了训练在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主要方向进行滨海防御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这次演习——首长、司令部携带通信工具并吸收部分实兵参加的现地演习——是战役、战斗训练的一种高级形式。它的目的在于：训练高级指挥员及其司令部在组织和实施现代战役中按照一定的工作程序、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并学会组织指挥现代条件下的复杂的战役、战斗。

吸收一部分实兵参加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使演习更趋逼真，并通过实兵演习来检查首长、司令部所进行工作的熟练与准确程度，考核部队战斗训练的程度，同时以形象的教育方法给见学人员以更深刻的印象。但必须指出，

这是叶剑英在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演习后总结讲评的主要部分。在这次演习中，叶剑英担任总导演。

首长——司令部演习吸引实兵参加，仅是显示的作用，因此不能过多，否则就会转移演习的中心和重点。

第二部分，辽东军事演习的意义

第一，我国海岸线蜿蜒一万几千公里。百年来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主要是从海洋方面进来。美国在地理上和我国横隔着太平洋，假设今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要想来侵略我国，首先必须克服海洋的障碍，渡过海洋，然后才能从天空中、从海洋上和陆地上运用一种可能的战役形式，就是将登陆兵上陆和空降兵着陆的两种行动结合起来，实施登陆战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我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首先将从抗登陆战役开始（帝国主义从香港、澳门发动进攻，作为例外）。这就是说，抗登陆战役，是我们打败侵略者进犯的第一仗。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学会组织和指挥抗登陆战役这一门本领。

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仅号召我们要随时准备打退帝国主义的突然性的侵略，同时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除了抗击敌人的登陆，必须研究并了解敌人登陆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外，还必须进行登陆作战的训练，学会组织和指挥登陆战役这一门本领。

在现代条件下，登陆兵登陆与空降兵着陆，是统一的战役行动，我们为了完成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任务，不仅要进行登陆战，同时也要进行空降兵的着陆；同样，我们为了完成抗击敌人登陆的任务，不仅要抗击敌人的登陆兵上陆，同时也要抗击敌人空降兵着陆。因此，今天来研究登陆和抗登陆、着陆和抗着陆的课题，就具有保卫国防的现实意义。

第二，辽东半岛在我国国防上处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营口到安东一线以南的区域为辽东半岛，它与华北和山东半岛构成我国重要的战略方向。

从历史上来看，辽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和帝俄曾为争夺辽东而数易其手，就是一例。同时，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首先是向东北，而侵占东北首先又是先侵占旅大。为了夺取旅大，在历史上有二次不是直向旅大，而是迂回到旅大侧后，从庄河一带登陆，而日本侵占辽东，又都是从我们这次演习的几个方向即大孤山、庄河、花园口、貔子窝地区登陆的。

这次选择在辽东地区进行演习，就是要进一步研究辽东，为巩固辽东国防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在敌我双方均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条件下，实施登陆、抗登陆战役，这是全世界都没有作过的，大家都在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正在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将以此为常规武器；目前又在进行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此可以想见，帝国主义者如果真正发动新战争，无疑将是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争。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有所警惕，而且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同时，可以预见，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进行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有若干的改变。所以我们研究在新条件下进行战斗、战役新颖样式的同时，要改善军队指挥的组织和保障的方法，并寻找在战斗和战役中最有效的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方法。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

来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第三部分，从战役演习中看出的若干问题

第一，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是原子的世纪。原子的发现与运用到战场上，无疑将给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带来重大的影响。由于原子武器、氢武器、导弹、化学武器和大量摩托化的快速装备投入战场，现代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性增大了，战争更加艰巨、残酷了，战争的规模也更大了。因此，战争的组织 and 指挥就更加复杂、困难了，战局的获胜，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师团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的经济潜力了。但是应该指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说，更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拟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战役准备的重要性。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五条中曾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1]这说明我们要反对那些毛毛草草的没有准备好就投入战斗的冒险家。毛主席的这条原则，在新的条件之下，只是要求战役准备时间力求缩短，指导更具体，工作更紧张。

二、在新条件下作战，主要的突击力量还是要指向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地区，而不是指向敌人设有坚固防御的地区。这样才便于在突破敌人前沿之后，迅速前出到敌人的侧后和纵深，迂回包围歼灭敌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经过原子突击，条件十分有利的时候，才能设想对坚强防御的敌人实施进攻。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八条中曾作过重要指示。比如说：“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孤立分散之敌是比较弱，先把弱的打掉了，再打强的。毛主席并不是说不打强大之敌，而是说要打强大之敌，首先要把弱的打掉，孤立强大之敌，然后才能打掉强大之敌。关于国重要的战略方向。

从历史上来看，辽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和帝俄曾为争夺辽东而数易其手，就是一例。同时，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首先是向东北，而侵占东北首先又是先侵占旅大。为了夺取旅大，在历史上有二次不是直向旅大，而是迂回到旅大侧后，从庄河一带登陆，而日本侵占辽东，又都是我们从这次演习的几个方向即大孤山、庄河、花园口、貔子窝地区登陆的。

这次选择在辽东地区进行演习，就是要进一步研究辽东，为巩固辽东国防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在敌我双方均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条件下，实施登陆、抗登陆战役，这是全世界都没有作过的，大家都在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正在大量生产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将以此为常规武器；目前又在进行包括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此可以想见，帝国主义者如果真正发动新战争，无疑将是大规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争。为此，我们不仅应当有所警惕，而且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实际行动上有所准备”。同时，可以预见，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进行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有若干的改变。所以我们研究在新条件下进行战斗、战役新颖样式的同时，

要改善军队指挥的组织和保障的方法，并寻找在战斗和战役中最有效的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方法。此次演习就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与化学武器条件下来组织实施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第三部分，从战役演习中看出的若干问题

第一，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是原子的世纪。原子的发现与运用到战场上，无疑将给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带来重大的影响。由于原子武器、氢武器、导弹、化学武器和大量摩托化的快速装备投入战场，现代战争的突然性和破坏性增大了，战争更加艰巨、残酷了，战争的规模也更大了。因此，战争的组织和指挥就更加复杂、困难了，战局的获胜，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师团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的经济潜力了。但是应该指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说，更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拟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战役准备的重要性。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五条中曾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1]这说明我们要反对那些毛毛草草的没有准备好就投入战斗的冒险家。毛主席的这条原则，在新的条件之下，只是要求战役准备时间力求缩短，指导更具体，工作更紧张。

二、在新条件下作战，主要的突击力量还是要指向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地区，而不是指向敌人设有坚固防御的地区。这样才便于在突破敌人前沿之后，迅速前出到敌人的侧后和纵深，迂回包围歼灭敌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经过原子突击，条件十分有利的时候，才能设想对坚强防御的敌人实施进攻。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第二条、第八条中曾作过重要指示。比如说：“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孤立分散之敌是比较弱，先把弱的打掉了，再打强的。毛主席并不是说不打强大之敌，而是说要打强大之敌，首先要把弱的打掉，孤立强大之敌，然后才能打掉强大之敌。关于攻坚问题，毛主席指示说：“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2]这就是说，攻坚要创造条件，不是弱的打，强的就不打了，小的打，大的就不打了，为了消灭敌人重兵集团，为了夺取坚强的据点，我们必须创造条件，为了创造条件，我们必须先从薄弱的部分下手。

三、使用主要兵力进行集中突击，是我们今天指挥战役原则之一。毛主席在十大原则的第四条中告诉我们：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五倍或六倍，或超过六倍以上于敌的兵力），力求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能够取得绝对的优势，因为只有在主要方向上取得对比的优势才能够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在中国的孙子兵法上，叫做“十则围之”。关于如何分割围歼敌人的问题，毛主席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来打击敌人

正面或者打击敌人一翼，或者二翼，来求得歼灭敌人一部分，击溃其另一部分的目的。这样我们就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来歼灭另外一部分的敌军。这些指导原则，无疑也是适用于未来战争的。

四、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整个历史时期。毛主席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提出了一条作战的根本原则，这一条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条原则运用到今天的原子时代仍然是正确的、适用的。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呢？军队在没有发起进攻之前，军队配置要纵深，要梯次，要分散，要隐蔽，要伪装。不能在配置的时期，就为敌预先发觉，而遭到敌原子突击。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手段，消灭敌人是目的。如我在未发起战斗前即被敌人消灭了，那还有什么力量来消灭敌人呢？因此，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战中要有运动的保障，通信的保障，以及其他保障的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够坚决的迅速的为全军的、坚强的指挥核心和坚强的领导力量。为要强化领导，统一战役思想，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来保障战役的协同。党委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活动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战争规模很大，参与作战的军种、兵种很多，情况变化急剧，在战役实施过程中预先未预见到的新情况突然出现亦是常常有的，所有这些特点，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能主动地与友邻部队协同一致，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要做到这些，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和坚强的政治工作是不行的。在现代残酷的战争中，一旦遭受原子或氢弹突击，伤亡是会相当大的，如果没有政治的保障，士气会受挫折。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使用不仅对军队如此，同时对于战地居民也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在战争中不仅要求军队积极顽强地进行作战，同时要求广大人民坚决支援我们作战，没有政治工作没有政治条件也是不行的。所以政治工作在今后的战争中不仅不应该削弱，相反的，更要加强。当然，为了做好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干部本身的军事学习是很重要的；如果自己不学习军事，那么在战役的组织实施中，哪些是战役的关键问题要加以保障，哪些是薄弱的部门要加以保障，就没有把握。这次演习中政治干部热心地和军事干部在一起学习军事，同时又研究战时的政治工作，这是很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次演习表明，在新条件下战时的政治工作不但可以做、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得好。当然，这次还是预习的性质，还需要今后继续去加以研究和创造。

第三，关于战役组织指挥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判断。

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正确判断是组织战役的先决条件。带兵打仗，首先要准确地判断敌人究竟从哪里来，从哪个地段实施上陆，上陆后主要突击方向又指向何处。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加以深刻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集中力量向敌突击、消灭敌人。

五、毛主席在领导我们进行革命战争中，曾制订了一条原则——创造战场。特别明显的是土地革命时期，那时我们要打一仗，事先都要预想到一个战场，并努力创造在有利于我的条件下与敌进入交战。创造战场首先要创造群众条件。经验证明：只有这一条做好了，革命战争才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战争中才能获得群众的充分支持，从而为战局的胜利，提供可靠的保证。远的不讲，就以解放战争时期保卫延安来说，毛主席、彭副主席[3]在陕北作战时，经常与敌人隔一个山头，我们在这山宿营，敌人在那山宿营，为什么敌

人不晓得呢？就是因为有群众的掩护。其次，还要创造交通条件，如道路、各种障碍物的构筑，特别是在今天新条件下作战，要有一定良好的战场，首先要能容纳大兵团和机械化部队，并使之能够发挥机械化的作用，能够有机动的道路。在敌人可能占领的地区，我们要很好地利用群众的力量构筑各种障碍。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问题。

我军无论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不论是平时或战时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这次演习方面军给予集团军防守辽东半岛的任务，是在双方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条件下来抗击敌人的登陆，这在国防上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在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时，集团军党委必须亲自去组织，亲自去领导，党委要开会，在党委会上运用党的民主集中的形式，好好的研究与了解上级给予的任务，明确集团军在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在党委会上，无论是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及其他各常委同志，面临着这种严重的战争，国家安危所系，要以最高的责任心来考虑如何完成方面军给予的任务，哪怕是最细小的问题，自己有意见都要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特别是原则问题更要摆到桌上来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起来，才能使问题的考虑更全面、更客观。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委会成论。假若我们在组织战役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明确，防御决心就无根据，主要力量摆到哪里，如何确定战役布势等都不能正确的安排。敌人侵略辽东是以旅大为目标，这在我们演习过程中大家是同意的。但是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究竟是指向旅大呢？还是旅大以外的地区？则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其一，认为敌人主要突击方向是指向旅大地区及其附近的大窑湾和城山头地段；其二，敌人主要突击方向是指向庄河东西两侧的地段；其三，就是在庄河以东到大孤山地段，因为那个地区没有岛屿，水比较深便于登陆。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先把美军对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问题做一简要阐述：在我们所看到的材料中，美军登陆战役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原则是：第一，选择航渡距离比较近，并且靠岸比较容易的地方；第二，海岸地形性质便于登陆，便于机械化部队活动，又能够容纳大量登陆兵的地段；第三，有良好的港湾，有飞机场，登陆兵占领后就可以立即使用；第四，登陆兵上岸后有良好的道路网，便于迅速的向纵深发展进攻和前出到防御者主要集团翼侧，威胁防御的主要集团，求得迅速达成战役目的。同时，美军又认为，登陆地段不应该选择在坚固筑城的地区，但是在原子条件之下，其主要突击方向指向有坚固筑城地带（有良好目标）的可能性增大了；为了减少遭受防御军队的原子突击的损失，登陆兵主张在宽大正面实施登陆。根据上面的材料研究来看辽东的情况，有些便于在庄河登陆，有些也便于在大连登陆，因此需要从各方面来研究。我们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是庄河方向，大连只是作为辅助的突击方向。这里要说明，作战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新的情况发生了，条件改变了，就要重新考虑原定的决心和作战计划。所以主要突击方向根据战况的发展是可以改变的，这个方向发生了阻碍，进展很慢，而次要方向发展比较快，比较顺利，并已显示出一种胜利的象征，集团军首长就应当把自己的第二梯队向已显示胜利的方向上机动。把主要突击变成次要突击，把次要突击变成主要突击，这是在战役过程中常有的事，集团军首长及其领率机关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的头脑，估计到这一情况。

总的说来，这次演习设想敌选择在庄河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比其他地方较

为有利，虽然在战术上有些困难，但是在战役上是有利的。大家知道，战术利益终究是要服从战役利益的。我们对待这个问题应该从整个战役观点着眼，而不应从战术观点着眼。

二、关于战役布势问题。

我们判断敌人主要突击方向是庄河方向，因此防御方面、也必须集中自己的基本兵力、兵器在这个方向上实施反突击，用反突击的行动来消灭敌人登陆的重兵集团。

这是在策划战役布势时，应该特别着重加以考虑的问题。另外，战役布势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防御正面与密度问题。大家知道，海岸防御一般是宽大正面的防御，在主要方向进行防御的军队其防御正面在原则上一个师可有三十公里，一个军可有六十公里到八十公里，集团军一百五十公里到二百公里，甚至可达二百公里以上。这次演习的集团军防御正面是二百一十公里。集团军的战役布势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直接防御海岸的，并在敌人登陆的主要方向上建立兵力、兵器比较稠的密度，而且还要纵深的梯次的配置自己的防御，并把防御前沿配置在高潮线。一般说，防御军队在敌还未登陆之前，在组织准备防御工作结束以后，海岸上应留一部分警戒兵力，而把主要力量最好配置在战术地幅纵深的内部，在有敌上陆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就迅速的机动，占领预有准备的阵地，在必要时还可向其他方向机动。第二梯队的兵力，一般配置在防御纵深的一翼；这是因为战役的开始以前不可能确定敌人主要上陆地段，因此第二梯队也就下应过早的同敌人接触，这是第二梯队的配置问题。这次演习第二梯队与各种预备队比较多，纵深的力量控制比较大，这说明集团军首长要控制强有力的机动兵力，无论敌人从庄河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或向旅大方面实施主要突击，他都有可能在自己纵深内部机动足够的兵力，对付敌人的突击。

根据这次演习在组织战役准备的时节，应该强调如下几个问题：（一）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要特别强调注意从空中来的威胁（空降、空袭的威胁），因此我们要有防空降、防空袭的预备力量。现代登陆战役的特点，就是在防御者的战术或战役纵深大量使用空降兵，使用空降兵的目的，是为协助登陆兵夺取海岸，牵制防御者的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的机动，造成登陆兵上陆向纵深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防御方面的各级指挥员在消灭敌登陆兵同时，还要注意制止敌人空降兵的着陆，一旦着陆要立即将它消灭。集团军在海岸防御战役中通常也受领一定的防空地域，并负责歼灭降落该地域内的敌空降兵。为了便于指挥，最好是将防空降地幅区分为军的防空降地域，并由军首长负责。集团军首长应该从第二梯队预备队中指定军队组成防空降预备队来同敌空降兵作斗争。防空降预备队通常应由机械化部队、坦克部队、工兵分队、化学分队组成，防空降预备队中之步兵应该是摩托化。此外，还要建立通信联络，雷达配系；航空兵和海军的海防部队，在敌人进行雷达干扰情况之下能够及时发现敌人的机群，使得集团军全部防空兵器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准备。（二）要注意敌人的登陆兵利用夜间实施登陆，同时防御方面，也需要尽量的利用夜间实施突击。科学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是杀伤破坏的武器有极大的发展，白天战斗损失很大，另外夜间战斗设备也同样有发展，利用夜间能够掩护自己和保存自己，能够迅速机动的消灭敌人，因此熟悉利用夜间来进行战斗是非常重要的。利用夜间战斗是今后一种发展的趋势，它将由特种

战斗逐步发展为常规的战斗。因此我们要对部队、各级指挥员加强夜战的训练，这是我们今后训练的任务。要发扬我们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进行夜战的优良传统，夜战的本领不但不应该丢掉，而且应该发展，并作为我们战役内的一种准备，夜战对政治上反动的、内部阶级矛盾很深的、抵抗性不强、士气不旺盛的敌人，精神上的威胁效果是很大的，提倡学习夜战的意义就在于此。（三）要强调战斗保障。除了政治工作保障外，各兵种各勤务的战斗保障，要纵深、梯次、分散、疏开的配置，要注意到防原子、防化学，要构筑多条的通路，要认真进行伪装，以保障我们的军队在配置时期可以隐蔽，突击的时候可以迅速机动。

这里谈一下在战役布势内前沿与纵深的关系问题，即把兵力重点摆在前沿呢或者摆在纵深。首先，我们应该研究一下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美国对我们的防御曾经有这样的估计，它认为我们有一万几千里长的海岸线，不可能在这样长的海岸线上建立绵亘不断的巩固防御（这是说这个防线不仅仅前沿有足够的永备性工事，在纵深内部也构筑有永备工事，而且有特别充足的兵力，这种防御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人认为，我们只能够在几个作战的重要方向上，用装甲坦克、自行火炮和牵引炮兵组成一个快速兵团，这个快速兵团又同航空兵相结合，构成一个海岸防御的基础。这种防御叫做机动防御。即平时在海岸上配置若干兵力，而将主要的力量是摆在纵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认为要实施登陆作战就要求登陆兵在战术上要有高度的突然性，要大量使用空降兵配合。须知在今天原子武器已经成为常备装备，同时空中又有大量直升飞机，在空中已经开辟了一条大路，同登陆兵相配合作战的大量着陆兵的战争时代，空降不仅是战役性的、战术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航空的直升飞机这一类空中运输力量结合起来，将使今后战争样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由于原子武器使用于战争，大大减弱了坚固设防地带的抵抗能力；过去认为突不破的阵地今天可以突破了。直升飞机在敌人纵深内部可以进行大量的空降，因此将来战争不一定是先从前线开始，也可以使用空降兵，特别是战略空降从纵深开始。就是经过一个空军战役之后，夺取了制空权，紧接着进行着陆战役，这种着陆战役是战略性的。我们应该了解在这样条件下，边防的巩固，并不等于内防的巩固。法国军队在越南作战中，曾在奠边府空降了一部分队伍，它一切的运输完全靠空中，虽然最后被越南人民军所消灭，但曾坚持了好几个月，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今天巩固国防，要把海防、空防、边防、内防（内防纵深的内部）结合起来，四者的结合才能得到防御的巩固。

关于永备工事和机动兵力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认为永备工事是一种支撑点，它主要的作用是掩护机动兵力、兵器，以空间获得时间，没有这个永备工事是不行的。在原子条件下，认为永备工事已经不中用了，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在主要方向上，在极隐蔽的道路上，地形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构筑防原子的永备工事。但是，永备工事必须与机动兵力相结合；永备工事是个骨干，是个支撑点，机动兵力、兵器是主体。构筑防御工事除了基本阵地、预备阵地以外，还要构筑假阵地，做好严密的伪装和多条的交通路线，以便把我们重兵集团主要兵力摆在纵深内，在必要时进行机动。这在战术上是如此。在战役上是如此，在战略上还是如此。

三、在抗登陆战役过程中的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

在敌人战术展开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接近的时候，这是打击敌人的第一

个时机；敌人已经陆续上陆，但是还没有站稳脚，这是打击敌人的第二个时机。第一个时机，敌人通过了雷炮阵地时已航渡了第一梯队，这时我们应该集中全部的力量，给敌人一个所谓半渡的突击，中国古兵法叫做“半渡击”（敌人渡船渡了一半给它一个打击）。第二个时机，敌人已陆续开始上陆，但还没有站稳脚，屁股还靠着汪洋大海、我们就要进行反冲击、反突击、这在我们中国古兵法叫做“背水击”。在抗登陆战役中要集中主要的兵力、兵器在这两个主要的时机给敌人歼灭性的半渡击或背水击。

敌人通过雷炮阵地，距离海岸还有二十公里左右，这在我们防御方面的大口径炮有效射程以内，这时敌要进行换乘，要编队战术展开，要在我们雷炮阵地里进行扫雷，我们防御方面有水雷，有各种火炮，有海军的各种兵力，航空兵的各种飞机，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敌人登陆是消灭敌人登陆的最好时机。我们的国家今天还是落后的，装备不可能一下子就现代化，因此，在较长的时间内，争取海、空军的战略上的优势还不可能，战役上的空军和海军要取得优势，除非有特殊的条件，否则也不可能。那末，怎样办呢？我们的打法，是要依靠自己手中所有的力量，灵活机动的组织在战术上占优势，靠我们从陆地、空中、海上随时机动兵力、兵器，造成在一定的战术地域的优势。比如说从海岸到雷炮阵地二十公里的海域上面，以海军的航空兵，陆军的航空兵，炮兵，海军各种舰艇，陆军各种火炮，加上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等全部的力量，部集中在这个海域上来突击敌人，给敌以歼灭性的突击。敌人在这个时期是困难的，因为空军基地比较远，除台湾离我们海岸比较近以外，其他的都是在二千公里以上，敌航空兵远离了自己的基地，不仅对他的登陆兵掩护减弱，而且也不能及时。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是有限的，这个时候敌人要换乘，舰与舰要靠拢，人要下船，各种工具要卸载，要进行编队，编成一波一波的前进，敌人只能得到其舰炮和航空火力的支援，陆军的火力是不能发挥作用的；而且登陆兵又不能同时上陆，只能够有主次地分批上陆，因此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夺取大块的登陆场，只能零星的占领几个点点，以后慢慢打通，逐次增加兵力。在此情况下，如我们善于组织兵力和兵器，是给敌人一个歼灭性的突击的最有利的时机。对这个问题曾有同志提出，我们海军和空军的力量不够，还是等敌人上陆后，在陆地上消灭他比较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原则告诉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在海上就把敌人打垮，而不是等敌上陆后再来歼灭他。所以说，取得抗登陆战役胜利的主要关键之一，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演习中，我们对敌人登陆会适时地实施反冲击、反突击，虽然没有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但是给了他一个打击，给军的反冲击、集团军的反突击造成了有利条件。演习时显示了在敌人登陆同时，在庄河方向上进行了战术的空降和战役空降，由于预先估计到敌人有登陆和着陆的配合，集团军就能够立即从第二梯队中派出自己的军队来消灭敌人空降兵，这是第一个时机，也就是在消灭敌人上陆同时消灭敌人空降的时机。

从美军过去的登陆情况看，一般是不十分迅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登陆战役特点是把很多时间用在夺取与扩大登陆场上面，登陆兵进攻的速度很慢。在西西里登陆战役中，登陆兵进攻的速度一昼夜平均大约是五公里；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一昼夜平均零点六公里。美军条令规定：六小时到八小时可以登上一个师。另外一个材料告诉我们，美军认为利用原子弹突击效果，空降兵着陆，同装甲部队的连续突击，可以提高他的上陆和占领登陆场的速度，一个师四小时到六小时可以占六公里到八公里的纵深，一个军

上陆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之内可以占领二十公里到二十五公里的纵深。由此就可以知道，敌人上陆的兵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小时一小时的增强增多的。因此，我们应当乘敌人登陆兵不多，立脚未稳的时候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来消灭已上陆的敌人，不能让敌人上陆的更多了才开始突击。在这里有一个反突击的时机问题和反突击的地区问题。

（一）实施反突击的时机是在敌人尚未站稳脚，敌人后续部队还没有大批上陆的时候。因此反突击、反冲击，必须要比一般的防御战役早。第一梯队的团、营，敌人占领第一、第二阵地时，就要立即实施反冲击。第一梯队的师为了制止敌人突破我们基本阵地，就要实施反冲击；第一梯队的军为了争夺第二阵地，就应该实施反冲击。换一句话说，敌人一个团登陆，当敌人第一梯队上来了两个营，这个时候我们的团就要用全部力量实施反冲击，消灭敌人已经登陆的第一梯队的两个营；一个师的防御，当敌人第一梯队两个团已经上陆了，我们就要发起反冲击，用三个团的兵力来消灭敌人的两个团。

在集团军反突击的时机上，有的同志曾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集团军第二天开始反突击，时间似乎早了。而且反突击的展开地区又大靠近海，容易遭到敌人舰炮的射击。在理论上曾提出过，在直接靠近海岸来进行反突击，必须估计到反突击的军队可能遭受敌人舰炮的猛烈射击，因此，反突击展开地区及主要突击方向必须选择在使反突击军队不遭受敌人舰炮直接瞄准射击的威胁的地区上。所以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原理提出进行反突击的时间不能够在第二天，而应该让敌人进到离开海岸比较远的地区，这样可在减少敌人舰炮火力威胁的条件之下来进行反突击，因此时间上要推迟。想定告诉我们，当集团军决心用一个军向庄河以西登陆场实施反突击的时候，敌人还只是上陆了两个步兵师，还在进行夺取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三阵地。在定下决心到反突击实施的时候，过了一昼夜，敌人一个军全上陆了，这就到了三个师（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这个时候集团军组织反突击有多大的力量呢？共有五个师来对付敌人的三个师，我们占了一定的优势，这就是乘敌人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而上陆之敌立脚未稳，我们实行半渡突击。对这个问题，美军方面也有这样的理论，他们认为——在沿海防御的方面如果用大致相等的陆军、装甲部队兵力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登陆部队就会有被赶下海去或者被消灭的危险；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可是阵势不一样，防御方面有准备，登陆兵刚刚爬上来联系还没搞好，还没有站稳脚，因此即使是相等兵力，防御方面也可以把已上陆的敌人消灭。

（二）关于反突击的地区问题。反突击展开的地区，当然不同于反突击的方向。反突击的任务，是为了割裂敌人，歼灭上陆的敌人。反突击的方向要指向敌人翼侧，要指向敌人的根部。想定中关于反突击展开地区，照顾了以下的几种情况：第一、碧流河已经成了障碍，而我们事先要通过；第二、反突击方向选在敌人主要集团的翼侧、根部是容易包围歼灭敌人的，比正面好；第三、地形平坦，道路比较好，便于我们一个军的兵力的展开。如为了避免敌人舰炮的威胁，把展开地区向西北移一移，或者在正面上实行展开，那末离开海岸虽然远一些，但是中间隔着一系列的高地，妨碍机械化部队的活动，要是从正面向敌人实施突击，在兵力上要占绝对优势才行，否则想包围歼灭敌人的公算偏差就比较少了。反突击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所以当着击溃敌人抵抗以后，要不给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继续进行突击。

反空降在整个抗登陆战役过程中是个重要的问题。美国人认为登陆作战

中之登陆兵与空降兵的密切协同，不仅能够提高登陆兵上陆发展的速度，而且可以创造粉碎防御方面的防御配系的条件。由于现代直升飞机的改良和进步，在战场上是广泛的使用了，有些同志在莫斯科看过了苏联空军节的直升飞机，它不仅仅可以携带轻武器，大批中型武器，甚至重型武器也可以在空中移动了。在战役中间，用直升飞机可以从空中调动兵力，支援友军，可以在敌人的作战后方进行战术空降和战役空降。根据材料，敌人空降师在深远的后方作战略空降时，准备坚持三十个昼夜，来打通与登陆兵的联系。这是一个新问题。今天的战争在空中有条大路，不经任何突击，一下就可以到防御者的后方，能够调动兵力，能够进行机动，而且能够从空中保证供给；可以设想，战争发展的结果是双方都大量使用直升飞机。因此若对空降、空袭没有警惕，指导战争就会犯错误。根据我们看到的美国材料，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进行着陆作战，美军是使用直升飞机来输送空降兵着陆的。直升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原子突击后十至十五分钟，在距离爆炸的中心投影点八百到一千公尺的地方着陆，美军认为这样利用原子突击的效果，是空降兵着陆保障登陆兵登陆的一个最好的行动。美军在一九五一年大西洋舰队的演习中与一九五三年太平洋舰队演习中，空降兵在原子爆炸以后，在爆炸投影点大概一公里的地点着陆，当时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五十架直升飞机，装了八百人。所以美军认为在海岸防御内的深远纵深实施原子突击，同空降兵的着陆，是协同登陆兵最有效的办法。美军把这种行动叫做垂直的包围。平面包围与垂直包围相结合，这是将来战役样式的新发展。应当明确，空降作战要有大量的各种飞机，特别是要歼击机的掩护；滑翔机、直升飞机需要大量的物质力量。当自空中运输至着陆的时候，也将受到防御方面的坚决的突击，空中虽然有道路，但并不是通畅无阻的。所以在今后战役中，空降仅仅是个配合，虽然空降兵也可以单独进行着陆战役，但主要的还是地面上陆军。注意空降，忘掉敌人主力来自海上和陆上也是不合乎实际的。

总之，我们指导抗登陆战役的基本思想是：第一、就是坚决不让敌人登陆；第二、一旦敌人登陆，要不让敌人稳住脚根，立刻提前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第三、海岸防御的整体性，是海防、空防、边防、内防的结合。在打击敌人登陆的同时，要准备打击敌人着陆，就是抗登陆同时也要抗着陆。当我们向已上陆之敌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的同时要使用空军、海军的力量截击敌人海上的部队，切断敌人的登陆兵同后续部队的联系，制止敌人的陆续增援，以达迅速地消灭上陆敌人的目的。因此在陆地的反突击同时，要配合海上的截击，我们在组织反冲击反突击时，必须要掌握这一原则，不能光看到陆上敌人，忘记了海上，看到海上又忘记了空中。

四、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问题。

毛主席曾经在《论持久战》中，引用古人所说的：“凡事预者立，不预者废”，来说明事先的计划和准备之重要意义。有些同志提出，进攻战役计划为什么要按阶段，防御战役计划为什么按行动的方案？这是因为进攻战役（比如我们打台湾时我们是进攻），主动权是属于进攻方面的，它可以根据整个战役任务，按它可能

行动的性质来划分若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任务用一个战役布势，不变更部署来完成；这一阶段任务完成了，新的情况出现了，就需要重新变更部署，这种整个战役布势的更动，就标志着这一进攻战役阶段的结束和下一阶段的开始，所以进攻战役计划是按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拟制的。如果是防

御，它的主动权不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进攻方面。在防御交战开始以前，对敌人主要的突击方向还不能作出准确、肯定的判断结论。因此只能根据敌人可能的行动方向及我们战役方案来拟制战役计划。而抗登陆战役则与一般防御战役有所不同，抗登陆是防御性质的战役，但又必须以进攻的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因此，当敌人登陆兵在集中地域、上船航渡时期，我们应对敌人登陆的各阶段采取积极进攻手段，对登陆的敌人实施一系列的打击。虽然如此，在登陆战役开始的时间，敌人主要突击方向的选定的主动权仍属于登陆方面，为此又不可能完全按照阶段来拟制战役计划；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中，又必须拟定几个行动方案。由此可知，抗登陆的战役计划既不完全同于进攻战役，也不完全同于防御战役，而是既按阶段、又按行动方案来拟制的。抗登陆战役究竟要划分几个阶段来进行呢？这要根据敌人远近、战斗编成和兵力的对比等情况的不同而定。如敌人的集中地域与上船港口距我很近，比南朝鲜还近，那我们在敌准备时节、集中时节、上船时节都可以给他一个突击；如果隔的很远，远到我们航空兵，舰艇活动半径以外，在兵力对比上不可能给敌人预先突击的时候，就只能在航渡过程中对敌实施突击；若敌航渡中有空军和舰队的掩护，且有很多航空母舰，而防御者兵力也不够，不可能给敌人预先打击的时候，那末，抗登陆战役就不能从敌准备、集中、上船航渡中开始，而只能在上陆阶段开始，就是在敌人战术展开，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接近的时候开始向敌人实施突击。这次演习想定集团军海岸防御的战役计划，是按照行动方案来拟制的，每一个行动方案的内容，集团军首长在现地模型的作业、情况推演中，以及在整个演习过程中都讲的很清楚了，我不再重复。

五、关于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问题。

在抗登陆战役过程中，所谓协同动作，其实质就是把相关的海军、空军、陆军所能发挥的一切力量，按照时间、地点、对象，协调地行动起来，构成一个铁的整体力量，给敌一个严重打击。协同动作首先必须建筑在人民军队政治上的团结上，那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密切协同，离开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设想的。协同动作按它性质来说，有战术上的，有战役上的，有战略上的；在关系上，有内部与外部的，左邻与右邻的，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之间的。在组织协同时，对于仓促转入防御的敌人，一般说来，还可以在地图上组织协同，达到时间迅速的要求，它不同于遭遇战，也不同于阵地战，因此准备时间要短，发起冲击时间要快，对预有防御准备敌之进攻，战役准备时间比较长，到现地组织协同，然后再在沙盘上或在地形模型上反复组织协同。组织协同只要是时间许可，可以反复进行，使干部对自己的任务更加明确，对全盘的企图更加清楚的了解，在交战中协同动作就更加密切。有人问：“协同究竟谁同谁协同，以谁为主呢？”根据某个阶段，哪个部队为主来完成的任务，就是以那个部队的利益为主来组织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主任的协同。

关于军队指挥，问题很多，现在讲一讲。在新的条件之下，为了保障指挥员对军队进行不间断的而又确切的指挥，就必须要求集团军的首长善于组织稳定而灵活的指挥；为了组织稳定的指挥，必须设置自己的基本指挥所，预备指挥所；为了组织指挥反突击，要建立前进指挥所。基本指挥所应有良好通信联络组织；集团军的首长、参谋长及其司令部，各兵种司令，各勤务主任，通常都是在基本指挥所工作。预备指挥所是用来在基本指挥所一旦遭

受破坏时，代替基本指挥所的工作的。预备指挥所通常是由副司令员率领一部分作战组在这里工作，负责搜集战场上的各种情况，供给基本指挥所；当基本指挥所正常工作的时间，预备指挥所不能够下达命令，也不发通报，只是随时作好接替指挥准备工作。两个指挥所的相距，原则上要求在一个原子弹突击时不会同时被破坏。前进指挥所，是为了保障集团军的首长在组织和实施反突击的指挥而建立的，它的位置一般距前沿八公里到十公里左右，这样能指挥反突击的主要兵团，同时又能够兼顾到对其他方面的指挥。在新条件下，除组织以上指挥所外一般的不再开设观察所，这是因为集团军首长实施指挥时，不能够局限在自己眼睛所能观察到的那个地区，如在前线很近组织观察哨，用眼睛来看，势必要接近前沿、这样就难于保障对整个战役有稳定的指挥。当然，在个别的情况下，集团军首长也要亲自到主要方向进行观察，但是时间很短，而且常常是利用军长的观察所来进行，不另外开设观察所。此外，在选定指挥所的时候，必须避开交通要道，以免遭受敌人的原子突击，同时要设在敌人坦克不容易通行的但便于警戒、便于建立顺畅的通讯的地区，并应该构筑防原子的工事。要灵活指

挥，要使军队能够迅速机动，指挥员本身要有良好的军事素养，同时也要尽量地简化自己的工作程式；要很好地运用通信工具，在战役准备时节使用有线电（报）话，战役实施时节主要是使用无线电。在演习中指挥员对无线电工具的运用表现得还不够熟悉。因此，要求我们各级指挥员在这一方面加以注意。

注释

[1]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页）。

[2]以上两段引文，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1248页）。

[3]彭副主席指彭德怀，一九四七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论抗登陆与抗着陆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国海岸线蜿蜒一万几千公里。百年来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主要是从海洋方面进来。今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由于在地理上和我国横隔着太平洋，要想来侵略我国，首先必须克服海洋的障碍，渡过海洋，然后才能从天空中、从海洋上和陆地上运用一种可能的战役形式，将登陆兵上陆和空降兵着陆的两种行动结合起来，实施登陆战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我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首先将从抗登陆战役开始（帝国主义从香港、澳门发动进攻，作为例外）。就是说，抗登陆战役，是我们打败侵略者进犯的第一仗。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指挥员，必须学会组织和指挥抗登陆战役这一门本领。

毛主席不仅号召我们要随时准备打击帝国主义突然的侵略，同时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除了抗击敌人的登陆必须研究并了解敌人登陆战役的组织和指挥外，为了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还必须进行登陆作战的训练，学会组织和指挥登陆战役的本领。

在现代条件下，登陆兵登陆与空降兵着陆，是统一的战役行动，我们为了完成解放台湾及沿海岛屿的任务，不仅要进行登陆战，同时也要进行空降兵的着陆；同样，我们为了完成抗击敌人登陆的任务，不仅要抗击敌人的登陆兵上陆，同时也要抗击敌人空降兵着陆。因此，今天来研究登陆和抗登陆、着陆和抗着陆的问题，具有其现实的国防意义。

(一) 抗登陆

抗登陆战役乃是陆军战役、海军战役及空军战役的总和。它是按照统一的战役企图，在统一计划和统一指挥下，昼夜不停地，在海面上，在天空中和陆地上实施的。其目的是：消灭敌人的着陆兵，击毁敌人的登陆兵，以粉碎其登陆战役的企图。

敌人实施登陆战役通常要区分为：准备、上船、航渡、上陆到攻占登陆场等阶段来进行的。登陆兵从接受任务起到开始上船以前止，为准备阶段；从兵力、兵器上船装载起到出航以前止，为上船阶段；从登陆兵出航起到登陆兵开始战术展开进行换乘以前止，为航渡阶段；从登陆兵实施战术展开，进行换乘，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运动到攻占登陆场，为上陆阶段。抗登陆方面为要达成战役目的，必须依据的原则之一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1]。必须对上述诸阶段敌人的登陆兵实施一系列的突击；而最主要的是紧紧掌握以下两个对敌实施突击的有利时机。

第一个时机是：敌人登陆兵在我雷炮阵地之前，进行战术展开、换乘和通过雷炮阵地向我海岸接近时；或者是不在我雷炮阵地之前进行换乘而通过雷炮阵地向我海岸接近时。美军条令规定：在实施登陆战役中，距离防御方面的海岸不甚远、水深、岸滩又便于舰艇直接靠岸时，登陆兵应直接登陆，以保持行动的突然性。所谓直接登陆，就是不经过换乘，即行战术展开，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前进。如距离防御方面的海岸较远、水浅、海岸又不便

于舰艇直接靠岸时，就需要在防御者雷炮阵地之前，进行战术展开、换乘、通过雷炮阵地，向海岸运动，实施上陆战斗，以夺占登陆场。由此可见，登陆的敌人，不论采取以上哪一种手段，均必须在我雷炮阵地之前进行战术展开，和通过雷炮阵地。此时，敌人只渡来其战术的第一梯队，队形较密集，战术展开及换乘动作较慢，我们就要掌握战机集中力量予以半渡的突击，中国古兵法叫做“半渡击”。这时敌人的登陆兵由于远离他们的上船地点，其进攻和防御的能力相应地减弱了；基地的航空兵也由于受活动半径的限制，新的基地未建立，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数量又不多；同时舰与舰要靠拢，登陆兵与登陆器材要下船、编队、编成一波一波地通过雷炮阵地，向我海岸运动上陆；这时敌人航空火力与舰炮火力虽然较为猛烈，但是陆军火炮未上来，技术兵器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敌登陆兵只能在舰炮火力及航空火力的支援下，进行登陆战斗，而每一波的兵力又不大，不能夺占大块的登陆场，虽然敌人在空中、海上占有战役上的优势、只要我们善于机动兵力、兵器，是可以争取海、空军在战术上的优势的。这种时机，对登陆战役说来是最困难的时机，对抗登陆战役说来是最有利的时机，这时，抗登陆方面应集中海、空军的航空兵、原子武器、化学武器、海军舰艇、海岸炮兵、远射程的陆军炮兵，以及其他所有能发挥威力的兵力、兵器，给敌人以歼灭性的层层阻击和突击，力求在敌人登陆兵未登陆之前，就粉碎其实施登陆战役的企图；如果不能完全阻止敌人上陆，也必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为尔后消灭已经上岸的敌人，创造条件。如果在这种有利的时机，我们指挥员对敌人不实施猛烈的突击，在指挥上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第二个时机：敌人已经上陆以后，我们应趁其立足未稳，背靠海洋之际，机动各级的第二梯队（预备队）坚决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歼灭已上陆的敌人，恢复原海岸的防御态势，中国古兵法叫做“背水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登陆战役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是：登陆动作不快，进攻速度慢，夺取与扩大登陆场花费时间较长。如：西西里登陆战役每昼夜其进攻速度平均约为五公里；诺曼底登陆战役其进攻速度每昼夜平均约为零点六公里至一公里。但上述情况在战后略有改变。

美军条令规定：在登陆战役中，要求六至八小时上陆一个师；十八至二十小时上陆一个军。在另一个材料中告诉我们，美军认为如利用原子突击的效果，着陆的空降兵与装甲——坦克部队相配合的连续突击，可以提高其军队上陆和建立登陆场的速度，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师上陆约需四至六小时，可占领六至八公里的纵深；一个军上陆约需十二至十四小时，占领二十至二十五公里的纵深。在这里可以看出：敌人上陆的兵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次增多，逐次增强的。因此，我各级指挥员应趁敌立足未稳、指挥紊乱、协同动作不够密切及其各级的战术、战役后续梯队还未上陆的有利时机，即提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把敌人登陆兵打下海去。各级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的展开地区，必须选在稳定的防御正面，主要突击方向应指向敌人的弱点，最好由翼侧打到根部，协同友邻的军团、兵团、部队，作向心的突击，以求合围与歼灭敌人被围的集团，并阻止敌人由海上逃跑或其后续梯队的上陆，以求全歼。

要注意：在抗登陆战役中，反冲击和反突击实施得愈迟，就愈有利于登陆的敌人。因为敌人可利用这一时间和空间来巩固与扩大已占领的登陆场，将小块联成大块，将战术的联成战役的，将后续梯队陆续上岸，兵力就越来

越多了，造成对我不利的敌我兵力对比，增加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的困难，甚至不可能实施反冲击、反突击。由此可见，在抗登陆战役中，当敌人登陆兵立脚未稳，背水作战的时候，各级指挥员如不能抓紧这一战机，对敌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这在指挥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二）抗着陆

在抗击敌人登陆兵上陆战斗的同时，必须准备和消灭敌人着陆的空降兵。美军空军条令规定：“在实施登陆战役中，要大量地使用空降兵，其兵力相等于其登陆兵战役第一梯队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美军有一军事刊物指出：“在未来的战役中，从空中输送地面军队和武器到地面，将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使集团军的一切战斗部队（除装甲——坦克师外）和后方部队，都能实施空降战役。这就是说，在集团军内，应当将几个受过训练而装备完善的空降师，组成一个能从空中实施突击的骨干军队”。美军另一军事刊物又指出“既然承认空军是支配未来战斗的因素，因而在军事计划中，就应当特别重视空降兵，就是说，应当特别重视空运空降兵和技术兵器。我们只要从空中进行活动，便能达到最大限度的快速力和突击力”。又说“在登陆战役中，登陆兵与空降兵密切协同，具有重要的意义，空降兵不仅能提高登陆兵上陆战役发展的速度，并可创造粉碎对方纵深配置的条件”。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是重视空降兵的建设，并在今后登陆战役中将大量地、广泛地使用。

今天是原子武器和直升飞机大量发展的时代，空中已经开辟了一条大道。在登陆兵上陆的同时，将有大量的空降兵着陆与他相配合，不仅是战术的、战役的而且是战略的。原子武器与直升飞机相结合，将使今后的战争样式发生若干的变化。原子武器相对地削弱了坚固设防地带的抵抗能力，直升飞机可以在敌人纵深内地大量地空降，因此产生了抗登陆战役的特点是：战役不一定从前沿开始，而可能从纵深开始。前沿的巩固，并不等于纵深的巩固。根据美军的材料，美军空降兵，在防御者深远的后方作战略空降时，要求能够独立坚持三十昼夜，一直到与其登陆兵打通，连接成一个战役、战略性的登陆场。我们又看到美军的材料上说，在新条件下，实施登陆战役，将大量地使用直升飞机和其他运输机输送空降兵着陆；直升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在原子突击后十至十五分钟，即可在距离原子爆炸中心点八百至一千公尺处着陆。美军又认为空降兵着陆是保障登陆兵迅速上陆的最好行动。美军在一九五一年大西洋舰队，与一九五三年太平洋舰队演习中间，空降兵即在距原子爆炸中心点约一公里处实施着陆，美军将这种行动，叫做垂直包围。由此可见平面突击与垂直包围相结合，就是将来登陆战役的特点。

美军的刊物曾经估计，我国的海岸防御将是机动的防御；认为我们不可能从整个海岸建立绵亘不断的和有足够纵深的、永久的筑城工事防御，而只能在几个重要的防御方向，以装甲——坦克兵自行火炮和牵引炮兵为基础，组成快速兵团，并依托航空兵的支援，来建立机动防御。因此，美军认为登陆兵在战术上要有高度的突然性，因此，要求装备上要高度地机械化，各军种、各兵种在动作上要密切地协同，尤其是与空降兵的协同。

根据上述材料来看，美军日益强调空降兵在登陆战役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抗击敌人这种登陆兵与空降兵结合行动的登陆战役，在组织和指挥方

面，都增加了许多复杂性和艰巨性，就是说，既要抗击敌人的登陆，同时又要抗击敌人的着陆。

在抗登陆方面，应该根据具体条件，在海岸防御的前沿，尤其是在主要防御方向上，有一定的兵力，能够击退敌人登陆兵的进攻；而同时在纵深内，必须控制强大的快速的预备力量，以便随时向威胁（前面的、纵深内）的方向上，实施兵力、兵器的机动。在抗着陆方面，对敌空降兵的斗争，不仅是野战军的任务，而且是一个群众性的斗争。就军队本身来说，当敌人空降兵在集中地域进行准备时，以及在机动上和航空母舰上尚未起飞之前，应该使用航空兵突击和原子突击以破坏其行动；若在空中输送时，应该使用航空兵、高射炮兵和国土防空军队予以拦击，并歼灭之；如敌人空降兵已在我防御纵深内着陆，那末各级防空降兵预备队，应迅速予以围歼，阻止其与登陆兵会合，为各个歼灭敌人登陆兵和空降兵造成条件。总之对敌空降兵的斗争是：主力军、地方军、民兵、群众、机动人员、群众团体，人人皆有责任，对敌人空降兵，无论是明降的、暗降的、零星的、大量的、小股的、大股的、战术的、战役的乃至战略的空降兵都应当像扑灭野火一样，不让敌人降落的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

综合来说，我们指导抗登陆战役的基本思想是：第一，不让敌人登陆兵上陆；第二，若一旦上陆，不让敌人站稳脚，因此，各级第二梯队（预备队）应提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以歼灭上陆的敌人；第三，抗击敌人登陆兵的同时，要随时准备好歼灭敌人着陆兵的一切措施；第四，海岸防御的整体性，是海防、空防、边防、内防的结合。

注释

[1]见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页）。

必须办好军队的学校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今天结束了。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国防部各大部、各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已分别作了答复，现在我来综合他讲一下。

同志们！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而部队训练的重点，又主要是干部。因此，担负训练干部任务的学校的工作，就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党和国家是花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办学校的，这表现在全军集中了大批人才，用了很多钱，办了许多学校。

既然花了这样大的力量，就必须把学校办好。要办好学校，首先必须加强国防部各大部、各军种、各兵种对院校的领导；其次，提高教员质量，改进教学方法；再次，提高学员质量。此外，要把学校办好，还要有人力、物力保障和政治保障。在物质保障方面，同志们反映过去有许多困难。我们承认过去在这方面没有搞好，例如：教材、教具、营房、场地、原子教材等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后在拟订一个训练计划的同时，要拟订一个保障计划，临时追加的任务，临时解决其保障问题。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保证各院校训练出合乎规格的学员。所谓规格除政治条件外，就是使培养出来的干部能练兵、能打仗，能够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组织军队的训练，能够运用新的指挥方法组织和实施指挥，并且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成为部队的模范。要办好学校也必须责成各院校党委和首长加强对本单位训练工作的领导。今后像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会议，党委书记一定要参加，一定要管训练。

在物质保障方面，解决场地问题是重要的。训练要有场地，没有场地不能进行训练。中国有句老话：“英雄要有用武之地”；训练无场地就无用武之地。在解决场地问题时，要尽量给国家节省土地，要尽量利用季节，要把许多场地，合理的共同使用。

人力保障的问题，应根据需要和可能，使工作量与劳动量求得平衡。提议干部部门与编制部门，重新考虑学校干部的调整。

政治教育和政治保障是统一的，政治教育是政治保障的主要内容。甘副主任[1]说总政管学校的人不多，拟增几个人，我提议建立管理学校的机构。

会议中提到时间问题：一天是八小时还是九小时？是一贯制还是两节制？年度应在哪一个月开始？以及每天作息时间等问题。我提议今年可由各院校，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不影响学校训练计划条件下，可自定、试行，并上报，拟在今年九月再统一规定。

我们认为要办好学校，除上述讲到的条件外，还要在组织领导方面采取措施。提议在军委之下，训练总监部之上，设立一个统管机构即训练委员会，吸收总部有关部门、各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参加，对全军的部队、学校、机关于部军事训练和军外训练，实行统一管理。这个机构在年度训练开始之前，要召集必要的会议，对全年训练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统一规划，然后召集各院校的党委书记来讨论，经军委批准之后就贯彻执行。但是光这样统管，还是不够，还要实行分管，这就是训练总监部与国防部各大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之间如何分工掌管的问题。训练总监部负责组织实施合成军队学校的训练，全国军校共同科目的训练，军外训练，军事图书出版，军事科

这是叶剑英在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学研究，平衡进度，掌握比例；各个专业学校由专业部门分管，训练总监部只负责训练纲要的管理，各部门根据纲要制定年度计划即具体实施的计划。训练总监部可以组织各部共同实施检查、总结和推广经验。在各军区内的学校，军区就要负责督促监督和物质供应，各军种、各兵种专业性的问题通过专业部门分管，地方性的事务、联系，归军区管。为此，国防部各大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训练机构都要加强、可以在不增加定额的条件下，从内部实行调整，加强训练机构。军区一般也可成立训练委员会。

统管应该组织协作。不仅在时间、进度上要协调起来，而且要善于利用各种学校的功能，组织协作，好像组织工厂的协作一样。一个厂想把全部机件都生产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有行业协作。学校也是一样。如步校一九五五年给各兵种学校代训共同课目的教员，就是协作。再如防空军[2]、空军、海军都有歼击机，这就不要各自开办一个学校，可用组织协作的办法来解决，才算合理。

当然，办学校是有困难的，但这是发展中的困难。即使现在的困难部解决了，将来还会有困难。从历史上来看，过去的装备很简单，武器是陈旧的，现在是新武器，很多武器过去未用过；编制过去是步兵、炮兵，现在有陆、海、空、防空、空降、公安各军种，又有步、炮、装、工、通、化、铁、骑各兵种，比过去复杂多了；过去弹药、军械主要取给于敌方，后方勤务比较简单，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根据抗美援朝的经验，我军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品都要靠后方供应，后方勤务十分繁重，引起部队兵团首长，要用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精力，来从事后方勤务部队的训练和指挥；还有过去我们是在一般条件下，现在要准备在原子条件下；过去是志愿兵制，现在是义务兵制，等等；这些新的情况出现，不能不深刻影响军队训练和作战指挥等方面，增加我们在训练上的新的困难。

在新条件下，对于军队训练有新的要求：一、经常战备。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和平，推迟以至根本消灭战争，可是又要经常准备抵抗侵略者突然袭击，因此，学校、部队训练都要有高度的战争警惕性。二、在训练中要特别着重各军种各兵种各勤务的协同，前后方的协同；因为，今后战争，感受特别困难的是组织协同。三、未来战争的破坏和杀伤，都比以前增大多少倍，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整个军队特别是干部，能忍受连续作战的消耗和极大的破坏。因此，要加强德育、智育、体育的训练。所谓德育就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也就是说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智育就是善于掌握新武器，能组织和发扬新武器的综合能力，陆、海、空军和防空军在同时、同地发挥综合的力量以歼灭敌人；体育，就是要有健壮的身体。没有强健的体质，不能忍受现代战争昼夜连续的战斗活动；没有高度政治觉悟，不能忍受这样大的杀伤的破坏；没有现代知识，不能掌握和发挥新武器的综合力量。没有这些，就不能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军官。这就是对办学校和训练部队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条令的作用提高了，特别是关于技术训练。近年来，各技术兵种在训练中发生的事故，其中不按操作规程的占很大数量。今后必须按条令所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训练。我们办学校要紧紧依靠条令，这也是对我们新的要求。

此外还要求：一、应着重战术合练。既然部队是根据现代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来进行训练的，那末，为部队训练干部的学校，就要根据部队需要的一切来训练干部。这两者是统一的。训练是按计划，有进度，并且是适应建

军的程序的。但整个军队训练有一个重点，这就是战术合练。因此负责训练的同志，要明确技术训练是为战术训练打基础，分练是为合练打基础。基础要打好，但这是为战术合练打基础的。二、战术、射击训练，都要增加夜间训练的时间。夜间训练，并不是新课目，但现在要把夜间训练作为重点之一突出出来，事实上夜间战斗已经公认为常规战斗，不是特种战斗了。三、要求军官掌握新兵器。要善于利用各种时间研究新兵器，是今天给军官们增加的新任务。从去年冬开始进行射击和战术集训以后，今年部队军官训练情况改变了。在今年预备训练期间，各军的军长，自己当营长，师长当连长，团长当排长，营长当班长，全体军官都在预备训练期间进行了射击和战术训练。现在他们一般都能够领导训练，自己可以示范，并能纠正训练中的缺点了。四、军官要学会新的指挥方法，如学会简化文书，自己使用无线电、指挥直升飞机等。美国人说现代防御体系主要的是指：雷达、歼击机和导弹；英国有人主张，今后的对空防御可以取消高射炮，改用导弹。姑不论其观点的正确程度如何，但亦可见新的武器日新月异，无疑地要改变过去老一套的指挥方法。五、我们组织演习不应是仅仅一个题目的，而应该是多题的综合性的演习。在训练中不应做出轻而易举就取得胜利的想定，要从训练中明确今后作战是要经过艰苦奋斗、重大牺牲和连续不断的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困难的训练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学校各级党委要善于动员学校所有成员的训练积极性，把全校上下的训练积极性发动起来；二、要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善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及其他外国的有用经验。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克服新的困难，完成今后更艰巨的训练任务。

如何才能动员和发挥全学校的训练积极性呢？积极性能否发挥主要靠政治觉悟，但同时也存在工作上的问题。要把训练工作做好，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党委制，是我党我军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党中央一直到各地方各部门，都坚持这一制度，这是肯定了的，同志们不用怀疑。当然，集体领导，不是若干个人简单的集合，而是集体领导智慧的集中，是广大群众智慧的集中。因此，集体领导必须同时实行群众路线。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没有群众路线的集体领导是片面的、形式的集体领导。每个集体领导的成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倾听群众意见，及时修正错误。大家要办好学校，克服困难，必须抓住这一点。

当然，还要做好教员的工作。要发挥教员的积极性，就要了解教员的思想、长处、短处和困难。不要说教员，就是厨师的工作做不好，厨师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不是发生饭烧焦了，就是发生菜过咸了或者过淡了等毛病。教员工作做不好，上课马马虎虎，看来是按时间教完了，但质量很差。有些学校，对非党教员采取了许多毫无原则的限制，如许多政治教育性质的会议不能参加，看戏坐后排，看电影坐前排，人家看得东西他看不得，把缴来的武器也当成“秘密”，不让其参观；对某些薪金制教员不叫走大门，叫人家走后门。像这样在政治上和物质上不关心教员的生活，当然使教员的积极性低落，使训练事业受到损失。

院校党委和首长，必须从各方面发动学员的积极性。这样把干部、教员和学员的训练积极性都发动起来，掀起全院全校的教学高潮，那么院校的任务，一定能完成的更加圆满。

要善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过去有人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在基本上是结合的，但在一些小问题上发生矛盾，这种说法，值得注意。根据这几年来军队训练的经验，可以说我们的确学习了一些苏联先进经验，同时也坚持了我军优良传统。现在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苏军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问题。依目前情况看来有两种学的方法：一种人是学老牛吃草，不分青红皂白，通吃下去再反刍（事实上，老牛也是有分析的，好吃的草才吃下去，不乱吃）；这种人学的时候没有分析批判，难免在用的时候发生硬搬死套的毛病。一种人是学西方寓言上的驴吃草，东瞻西望老吃不下。西边一望，觉得西边的草不如东边的草好吃，但回头向东边一望，又觉得东边的草不如西边的好，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是一根草都没有吃进去。前一种人说，你根本没有吃或没有尝过味道，怎么能分析好坏，结论是赞成做老牛，但反驳的人这样说，学习要有选择，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但是，他们选择、选择，老迟滞在选择阶段，结果是做老驴。我想，这两个方面应该加以批判的结合。就是说学习既要分析，又要把先进的东西通通吃下去。首先要认真学，不要东瞻西望。但在学习中既要加以分析批判，学到手以后，又要加以发展；不加思考、不加批判，分不出青红皂白，是盲目的学习。照样教、照样学，不用脑子的学习，是搬教条。要提倡学习上用脑子，反对思想上的懒汉。有人把学习看成是简单的事，也不好。马克思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3]万事起头难。学习就是这样，我们要克服开端的困难。我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实践而学习。在学习上，要解决学习的认识问题，才能真正把苏联先进经验学到手，并真正用到实践中去。

除了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经验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学术也要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制度，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是反动的；它的军事科学有局限性，不能把战争规律全部地客观地反映出来；但也有相似和相同的地方，因为战争有特殊的规律也有一般的规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术，或多或少的也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这就是基本上和我们相同的一般规律。

此外，还有下列原因：一、双方使用的武器大致相同；二、一切现代军事科学成就，双方都用来取长补短；三、双方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人类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传统。所以，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除了由于阶级性所产生的反动的东西外，其他的東西可以学，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术，更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学习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不仅从学术和技术方面来说，我们应该学，而且从防止侵略的意义上来说，为了知己知彼，也应该学。我们是有条件来学习的；这是因为，过去在战争发生以前，常常是用宣传做武器，而现在不仅仅用宣传作武器，而且出现了用武器做宣传，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特点。既然要以武器做宣传，我们就可以获得若干资料来研究。其次，经过研究中立国家和某些小国家的军事也可以间接地研究英、美的军事情况和学术。

结论就是：

第一，要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实际上做到把学校工作放到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上来；

第二，要加强学校党委对训练工作的领导，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并动员全体人员的训练积极性；

第三，要加强各部门、各军区、各部队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和协助，而首先就是挑选学员和物质上的及时解决；

第四，要正确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有用经验，来充实我们自己，克服我们的落后状态。这样，就能克服军队训练上新的困难，完成新的任务。

注 释

[1]甘副主任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于一九五 年十二月六日，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防空军与空军合并，防空军番号正式撤销。

[3]选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空军要做到“飞得好，打得好”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认为空军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个经常的基本的任务，这就是“飞得好，打得好”。党、国家、军队和人民对你们的要求也是这样。“飞得好”和“打得好”的关系是：“飞得好”是基本的，而“飞得好”又是为了“打得好”，只有“飞得好”，才能“打得好”。我们的飞行员和飞机要做到：在各种高度、各种气象和各种队形的条件下都能飞行；就是遇到敌人的大机群，也能打得很好。空军在国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比从前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飞行员必须学会海上飞行，学会和海军，和其他军种、兵种的协同作战。在“飞得好”的基础上，学习“打得好”。“打得好”是射击技术问题，是战术问题，也是指挥问题。战术要巧，射击要准，要眼明手快，百发百中。这些能够做到，训练的基本任务就算完成了。

如何做到“飞得好，打得好”呢？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从空军本身，从集体中去寻找智慧和力量。只要空军上下全体人员都能发挥智慧和力量，就一定能把任务完成。但归根结底还是领导问题。

要“飞得好，打得好”，我以为要重视这样几个因素：

一、干部问题。我们要制定完成任务的计划，但如果没有执行计划的干部是不行的。干部条件是保证任务完成的决定因素之一。解决干部问题，第一要配齐；第二要稳定；第三要有后备。去年干部的流动性大，缺额多、水平低，是我们训练期间感觉最困难的一件事。一九五六年无论哪个军种都应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任务是繁重的，但必须做好。干部的补充要适合训练的要求，时间不要太迟，所谓稳定就是不要过多地调动。对干部的调动，领导上要作规划，要有季节性，尽量保证在训练期间不要调动。同时，要使干部参加部队的训练过程，必须尽量减少会议的次数。缩减会议时间，使干部多多接触实际，从生手变为熟手，从外行变成内行。所谓有后备，就是党委要掌握一批候补名单，有计划地培养他们，吸收他们参加有学习价值的会议，使他们成为提升的对象，一有缺额，立即补充，以保证干部的满员。当然，为了部队将来的发展，积蓄后备力量也是需要的。党委对干部的培养使用(包括提拔)和教育管理必须抓紧。党委会应吸收技术干部参加讨论技术问题。

二、时间问题。我们必须赢得时间，这就是说，要科学地利用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更不要丧失时间。时间之所以宝贵，因为客观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上运动者、发展着的。我们对一切工作的组织、安排和布置，时时都要考虑到时间的重要性。苏联在完成几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党内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时间问题，也就是速度和规模的问题。我们必须规划时间，不浪费时间。例如，一年中，战斗训练几个月？一天按几小时计算？学校是否实行六小时一贯制？军事、政治、文化、体育教育时间怎样分配等等，都应规划得好，安排得好。同时，还要灵活地使用时间，比如天气不好，不能飞行，就抓紧时间做别的工作，不让时间丧失。

三、保证问题。包括物质保证和政治保证。我们要射击技术好，如果没有靶场，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保证工作很重要。

要完成任务，还要解决以下几个关系问题：

一、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通过政治掌握技术，又由技术回到政治。我们的政治工作是为了保证“飞得好，打得好”，通过政治提高部队人员的责任感，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潜力。不懂技术就不能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必须与技术相结合，渗透到技术工作中去；而技术水平不高，检查其原因，又要回到政治上来。你们的总结，归根结底，还是回到领导上、政治上、思想上来了。所以强调政治而不管技术是错误的；光强调技术而不管政治也是错误的。

二、学校与部队的关系问题。我们对部队和学校的看法应当是：学校必须为部队服务，部队必须依靠学校。这个思想必须明确。否则学校和部队的训练就会脱节。学校的训练应当结合部队的水平和需要，所有新技术、条令要在学校首先使用。这样干部、学校就能走在部队的前面。学校应经常参加部队演习，了解部队的需要。学校训练出来的干部，应当在各方面成为部队的模范。因此，部队必须支援学校。过去很多部队调学员都不肯调好的，这是不对的。关心部队多，关心学校少。从领导思想上来检查，也是关系问题不明确。各级领导应认识学校工作的重要性，帮助学校解决困难，做好教学工作。

三、空勤与地勤的关系问题。有人对空勤人员关心多，对地勤人员关心少，这种情况应该注意。地勤是为空勤服务的、地勤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就会影响空中，增加事故，完不成任务。有许多飞行事故的发生，飞行日利用率不高，是由于地勤和各种保证工作没有做好而产生的。所以，必须在加强对空勤领导的同时，加强对地勤的领导，把空勤和地勤二者，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四、前方勤务与后方勤务的关系问题。我们要认识前方勤务与后方勤务的整体性。如果后勤保证工作发生问题，前方作战就会陷于极大的困难。而且今后作战可能从纵深开始，即从后方先打。所以后方勤务必须提到应有的高度，要用很大的精力来领导后勤工作。

五、民航与“军航”的关系问题。我们不但要建设强大的空军，也要建设强大的民航事业。民航是空军的战略预备队，民航的发展，可以为空军积蓄力量，培养干部。民航、“军航”应作一家人看待。

对党委和指挥员的要求：

（一）学习技术、战术。如果不懂技术，就不能由技术回到政治上来；要指挥部队，没有技术也是不行的。现代战争，无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都要求各级指挥员熟悉自己部队所使用的武器。技术不好，就会影响战术。只有在好的技术基础上，才能产生好的战术。学技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上面学，就是要组织集训。我们不能要求领导干部都当技术专家，但必须懂得技术，懂得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我曾向陆军干部提出四个字：摸、爬、滚、打。摸就是对各种技术都摸一摸；爬、滚就是携带武器前进运动；打就是学一学射击。这对于你们也是需要的。另一种是向下面学。就是要向下级学，向群众学。到部队去住一个时期，老老实实地学，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爱面子。战术学习是建立在技术学习的基础上的，只有学好技术，才能学好战术。我们必须认识学习技术的重要性，提倡大家从根底学起。

（二）反对骄傲自满。骄傲自满的人不向同级学习，不向部下学习，也不向上级学习。古语说得好：“满招损”，知识是无穷无尽的，是学不完的。大家知道毛主席的知识是极其广博的，但他还常常感到自己不足。毛主席经

常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骄傲自满常常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学习问题；一个是工作问题。如果在学习上骄傲自满，我们就再也不能前进；如果在工作上骄傲自满，我们就不可能做好工作。而在另外一方面，坏的东西就会发展，直至腐化堕落。所以批判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是很必要的。要求各级指挥员和干部以身作则，精益求精，把工作做好。

（三）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防腐剂，也是推进机。只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防止干部和机关的腐化，才能推动工作。不断地开展自我批评，就能够使工作不断地前进。

总之，第一要戒骄戒躁，第二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要学习技术、战术。只有反掉骄傲自满，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推动学习，推进工作。以上这些，如果我们在思想上有了明确的认识，而且在实际中又能体现出来，那末，我想一九五六年的任务虽重，但是也一定能够完成。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几年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诸兵种合成军队，顺利地实现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重大转变。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建设，今后除应继续努力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加紧正规训练，学习国际上的先进军事经验和科学知识外，还必须特别强调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例如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民主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

现在，特别强调一下保持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之所以是正确的，适时的，并不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了什么路线错误，人民军队的本质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因为近几年来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在原有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为贯彻这一方针，近几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措施也是正确的。我军虽然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编制、装备、制度、工作方法等方面有了重大的变革，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质并没有动摇过、改变过。但是，这决不是说我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没有问题和矛盾，没有偏向和错误。相反，问题不少，缺点也相当严重。举其大者，如：有人主张用一长制代替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有人主张把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作用降低到只是保证指挥员决心和军事任务的地位；有人反对在军队中继续实行民主制度、采取群众路线；有人主张军队提建设计划可以只按军事需要，不必考虑可能与否，因为那是国家的事，因此，计划不要怕大，费用不要怕多。近几年来军队中不关心士兵和下级生活，不关心人民生活，不愿倾听下级意见、不愿实事求是办事的偏向也有了发展，等等。这些现象虽然从整个军队建设方面来看，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但由于它们都是影响到我军根本性质的问题，因此是严重的。现在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法，虽然已受到了批判，有的已经纠正，但是并未彻底解决，仍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为此，下列问题必需统一认识，妥善解决。

一、官兵关系与上下级关系。

现在我军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如以前那样融洽亲密了。军阀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必将削弱我军的战斗力。为此，我建议，除应加强教育外，还必须修改现有条令和制度中那些不妥当的规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贯彻官兵一致、上下级一致的原则，才能保证我军真正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二、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

我军是我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为此，既需要有坚强的军事工作，又需要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两者不可偏废，但军事必须服从政治，政治是主要的，军事是从属的。所以我军在创建的开始，就确定了军事必须

这是叶剑英为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准备的一篇文章稿，曾经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服从政治的原则，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把政治工作看作是军队的生命线。这样，就使我军成了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必胜的基础。

但是，近几年来，我军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却出现了忽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偏向。有人主张现代化军队中只能实行一长制，政治工作只能摆在从属的地位。例如，在军队的训练和演习中就不赞成有党委的活动，反对给予政治工作活动以必要的场所和时间；在队列中有些单位就没有政治干部的位置，在物资器材的配备上就不愿给予政治工作以必需的保证。企图把我军的许多活动变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虽然这些错误的意见近几年来已得到了批评和纠正，但还不时出现。今后必须继续努力加以彻底的纠正，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政治工作在我军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防止单纯军事观点的发展。

三、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的关系。

拥政爱民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军民一家，乃是我军所以能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近几年来，我军和人民的关系一般的说是良好的。如在繁忙的作战、备战和训练中仍抽出一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人民春耕、秋收、修堤、挖渠，出钱出力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建设，并大力参加抢险救灾等，都是做的很对的；而人民群众和地方党政机关在动员优秀青年参军，妥善安置复员军人和在军队作战、备战、训练中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也是做得很好的。但应当指出，在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缺点。自我们陆续进驻新营房，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以后，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逐渐疏远了，对群众的生活和对党的某些政策、政府的某些法令逐渐冷淡和不关心了，特别是有些问题过分地强调了军事需要和军事安全，以致在修建营房、国防工事、训练场、机场、仓库时，占用耕地过大，迁移居民过多。在军事设施周围随意划定禁区，妨碍群众生活和生产的现象也出现了。这是很不应该的，必须加以纠正。当然，为了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有些军事设施是必需的，今后还应修建。但所有这些设施，必须根据军事上的确实需要，精密规划，本着军民两利的原则去办。

为了密切军队和群众及地方党政关系，军队必须接受地方党的组织、政府和群众团体的监督，军队负责人应参加地方党委，军队工作必须受军队上级党委和所在地方党委双重领导。我觉得，今后只要情况许可，军队中有些重要的会议和措施，还应邀请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参加指导。

四、集中和民主的关系。

军队要有坚强的纪律，要统一集中，这是肯定的。一般军队如此、革命军队更是如此。但我们革命军队的集中是建立在广泛民主、自觉基础之上的，没有广泛的民主就不能有真正的集中，因此我们坚持军队中必须有广泛的民主生活。但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就会成为涣散、削弱部队战斗力的极端民主化，因此民主与集中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把两者密切的结合起来是我军多年来的优良传统。现在全国已经统一，我军已由单一兵种发展为诸兵种合成军队。为了实施有效的领导和指挥，进一步强调一下统一集中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出现的偏向是部队中的民主生活被不恰当的削弱了。例如，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教学相长的群众路线是我军训练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但现在遭到了反对，理

由是现在我军和过去不同了，官是老官，兵是新兵，官是军事专家，兵则既无作战经验又无军事知识，啥也不懂。因此，官教兵理所当然，兵教官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既耽误训练，又损害军官的威信。显然，这种意见是片面的。军官职业化和实行义务兵役后，官教兵的条件固然较前好，官教兵的要求自然也应该强调；但这却不能作为否定群众路线的理由，军官处处都比士兵高明，上级处处都比下级高明的事是没有的。军官万能的观点是唯心的。以我军现在的情况来说，军官实行职业化和士兵实行义务制后，军官的军事知识比士兵丰富，但士兵也有他们的长处，何况有些新兵的文化水平、技术知识还比军官高，因此，兵不能教官的说法是不对的。反对发扬民主是错误的。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全面规划和按级负责问题。现在兵种、军种多，机关单位多，业务复杂，分工较细，这是现代化军队的正常现象，因而如何组织他们之间的协作，如何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各自为政，条条下达，必然会造成部队的忙乱现象。加上有些单位借口要统一集中，要具体领导，采取了所谓“一竿子统到底”的办法，许多东西都规定得死死的，结果不仅大大地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为克服这种偏向，必须加强全面规划和实施按级按职负责的制度，使该统的统、该分的分、该办的办、该停的停，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五、人和技术的关系。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是军队中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因素。不论是简单的技术或是复杂的技术，如果离开了人，没有人去掌握它，使用它，技术就成了死东西，一无用处。过去我军之所以能以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就是由于高度发挥了人的作用。今后我们要完成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任务，要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的也还要靠高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那种认为我军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只应强调技术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必须加以反对。但是军队没有一定的技术装备是不行的，技术落后了是要挨打的，而我军现代化的技术水平还很低，这是我们的弱点。因此，忽视现代化技术装备的重要性，不积极努力去改进我军技术装备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充分发扬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又要努力提高我军的技术装备水平。为此必须加强部队的训练工作，使全军官兵不仅有高度的革命觉悟，而且能熟练地掌握手中技术，充分发挥现有技术的作用。同时，必须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使我军的技术能不断地得到改善。

六、现实和发展的关系。

军队现代化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适当地照顾到发展。既不能脱离现实而空谈发展，又不能只看到现实不考虑发展。我军要发展，而且要用尽快的速度，这是肯定了的。但发展不能只凭热情和主观愿望，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和客观的规律，否则，便是空想。现在，我们有些工作就犯了这个毛病。例如，组织演习，拟制想定，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规模搞得很庞大，兵力、兵器总是按假想的密度来计算，而且总是处处比敌人强。理由是，我们的眼睛要向前看，现在没有的装备，将来会有。因此他们拟制想定时不是根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而是根据假想的情况作基础，结果很多东西不仅现在我军没有，甚至在十年八年内也很难达到。这样一来，演习时固然可观，但和我们

的现实情况是脱节的。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实际的。训练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做法，有使我们两头落空的危险，必须加以纠正。今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我军现有的物质基础，适当地照顾发展的情况，逐步地加以提高。

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家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国防建设则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国家工业化，就不可能有军队的现代化。所以，中央为了集中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加速工业和经济建设，减少国防预算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能够保障国防安全的条件下，我们还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缩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并用积极的行动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坚决反对那种不根据国家的实际需要和可能，而片面强调军事需要向国家多要钱多要人的错误观点。但我们也建议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适当照顾国防的需要。除保持和发展一定比例的国防工业外，其他工业和经济建设还应把平时和战时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既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又有利于保卫国防安全的需要。

八、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经验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关系。

为了加速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经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军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我军过去的丰富经验，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要求，但这些血汗的结晶对现代化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说来，仍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不能丢掉，而且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加以发扬。墨守过去的经验，不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是不对的，但丢掉自己的经验，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则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一再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国际上有些所谓新的军事理论，实际上是我军早就掌握了的老经验，关于夜战的理论就是一例。我军几十年来主要的是夜间作战。我军的经验一再证明，夜战不仅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极为重要，即使在比敌人处于优势的条件下也很重要。因为夜间作战可以减少损失，可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收到良好的战果。但过去几年有人反对这一论点，认为这是在敌强我弱时不得已的特殊手段，现代化军队则必须白天作战，因此，许多国家在条令中都把夜战列为特种战斗，训练中也很少注意这一课目。但是近两年来许多国家都修正了这一观点，认为在原子条件下，即使掌握着某些技术优势的军队也必须强调夜战的重要，因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拿出了大部分时间进行夜战训练。这个小小的事例就足以说明我军的历史经验虽有不足之处，但也有独到之处。我们固然必须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经验主义，但也要防止妄自菲薄的自卑观点，既要虚心，也要

有信心。因此，在努力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必须认真地总结我军的历史经验，并把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之更加完备。为此，迅速着手编写适合我国我军实际需要的各种条令、条例，实为当前我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民军队是我们军队的根本性质，也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能够生长发展和胜利的基础。任何损害我军本质的观点和行动都必须及时的加以反对和克服，哪怕是在萌芽时期，也应加以注意和防范。否则，久而久之，就必然会腐蚀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我军现代化、专业化、军官职业化后更要警惕。为

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不妨引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人员的观点作为旁证。最近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专家在分析我军的目前情况时曾说：我军步兵过去的作战方式原为西方国家所无法抗拒，但现代化机械化以后，倒反容易对付了。并说：我军几年来与人民联系已减少，过去军民不分，如鱼如水，单纯从军事上不容易击败，现在则产生了职业军队的缺点，有击败的可能。虽然这些军事专家们是用资产阶级军队现代化的观点来估计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意义，未免隔靴搔痒；但看来他们是很希望我们丢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建设成为一支一般的现代化军队的。可见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我军的现代化，而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这应该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敲起了一次警钟。因此，当我们满怀信心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下保持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乃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我们能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加速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就如虎添翼，就一定能够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就一定能够完成党和国家所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任务。

把我军训练提到更高的水平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

军委训练委员会的会议，今天做总结了。会议虽然没有把训练的全部问题都解决的很好，但对主要的问题已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注意到了下列情况：

一、我们的部队几年来在组织编制、技术装备以及各种建军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动，因此统帅部对全军的战斗力，需要重新加以估计。如果说，在过去战争的年代里，我们可以凭仗打得好不好来估计我军的战斗力的话，那末，现在估计我军的战斗力，完全依靠训练。因此，统率机关必须有总的训练机构，来统一训练计划，掌握总的训练进程，经常检查军队的战斗训练和院校训练——完成了什么、没有完成什么、完成的质量怎样。这样统率机关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确切的根据，来估计自己军队的战斗力。

二、训练与战备，需要密切结合。因此，要求各军种、各兵种对于训练进度和要求，在每个年度里都要达到相似的水平，要消灭各军种、各兵种间战斗力悬殊的高低差。

三、我国的国土很大，国防线很长，各军区所担负的具体任务不完全一样，加上东西南北、春夏秋冬这些自然条件的差异，全军不能使用一个统一的实施计划。因此，统帅部的训练机关，只能够掌握全军的训练纲要；至于具体实施的训练计划，应由各军种、各兵种因时、因地、因任务的不同，自行拟制。

四、根据中央削减军政费的方针，我军的训练计划，必须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和历年来的经验，实行适当的削减，以适应人力、物力、财力的具体情况。

根据以上情况看来，我们拟制一九五七年度的训练计划，情况更加复杂，工作更加困难。

此次训练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同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各总部共同协商全军的训练问题，通过协商来解决制订训练纲要中互相关联的问题。这样做，训练工作进行中的“摩擦”就会减少。过去训练部门与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有些协商，但和各总部协商比较少，例如对各级、各种的集训和检查缺乏统一的安排，临时活动和临时运动较多，形成条条下达、层层附加，大家有意见。

此次会议，经过了两天小组酝酿，三天汇报及一天训练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较清楚了，问题也明确了，我现在即把会上提出的意见归纳成四个问题，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训练计划问题。

一、指标问题。

根据几天会议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确定训练指标，即规定年度训练的目的和任务，是制订训练计划的基本问题。因而，训练指标规定的是否恰当，对战斗训练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确定训练指标的原则，应当根据党的“八大”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依照我军干部的实际水平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并结合国防的需要，使之更加符合于我军的实际情况。为此，凡是需

要并有可能进行的课题，必须进行；凡是需要而目前无条件进行的课题，则应暂不进行。但是削减计划，决不能伤害训练的完整性。今年我们削减计划，不是单纯的为了量的减少，而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质的提高。今年削减的题目，必须在下一年度陆续进行。本此精神，明年对陆、海、空军、防空军、公安军分别提出指标进行训练。

这些指标是属于一般性的要求，至于具体的训练计划，如科目的进度和时间的安排等，由各军区、各军种在制订计划时，依据具体情况作适当伸缩。

二、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上比较突出的问题。客观事物在时间上运动，我们的一切工作也是通过时间来进行，因此，在制订计划时，就必须首先考虑有多少时间。当然，时间是应当根据内容来决定，但实际内容又为实施时间所约束，所以必须二者协调一致。其中包括一年的训练时间、年度开始时间、军官训练时间等等，这里只提出一些意见，究竟应该如何安排法，要请国防部讨论和决定，我今天在这个总结会上不能作结论。

三、军、政、文、体训练的关系问题。

文化、体育训练，在军队训练中占有重要地位。没有文化，就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和技能；没有体育，就不能保证军人的健壮体质，来负担现代战场沉重的任务。为此，必须使我们军队能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相应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士兵经过三年训练，不仅是德育、智育要发展，体育也要发展。如果说德育、智育有发展，体育降低了，那就是部队没有训练好。

学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体育训练也不是为体育而体育。我们军队所以要学文化、要锻炼身体，为的是更好地提高军事、政治的训练质量。因为只有具备充沛的精神和健康的体格，才能学好军事和政治。因此体育、文化是为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服务的，文化、体育训练不能孤立地去强调它。在这里我特别说一说对军队干部进行政治训练的重要性。军队干部不仅要有军事科学知识和技术，能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而且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就是说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个爱国热情、这个自我牺牲的英雄品质，是在长期政治锻炼中才能养成的。我党我军几十年来，不管在任何时候，就是到了几乎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仍能巩固团结、坚持斗争，就是由于认真进行经常的政治训练的结果。因此，政治训练一定要占一定的比重，特别是我们职业军官，穿起黄军衣，一直到老，如要养成朴素的作风，爱护群众的观点，奉公守法、有知识、有锻炼、长期保持人民军队的品质，就要靠政治训练。这一点特别重要。军队和平生活久了，政治教育不加强，党的生活不加强，人民军队本质的保持就不是没问题的。所以必须要强调加强政治教育。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是没有他的地位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这一点上说，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军事要服从政治；但是，从另一点来说，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就能提高战斗力，二者是密切的相互关连着。过去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宁死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真理。我们的人民军队几十年来，为了实现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过去曾是今后仍然是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所以说政治又是保障了和提高了我们的军事。这就是军、政、文、体训练的辩证关系。

四、训练计划和物质保障计划的结合问题。

物质保障计划，应适合训练计划的要求，而训练计划又应以物质条件为

基础。可是，我们管训练的同志，常常是只管训练计划，对训练计划的物质保障考虑的很少。不仅仅是管物质保障的同志要去研究训练计划的物质保障，而且制订训练计划的同志也要考虑可能有多少物资来保障。比如说：明明没有夜视器材，计划上也要把使用夜视器材的课目写上去。此外，滑雪的科目，除东北可考虑外，其他军区根本不需要。这些就是没有考虑我们的具体条件。为此，做物质保障工作的同志要研究训练计划，并订出一个物质保障计划来；订训练计划的同志，也要事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物质条件。会上反映：有些课目没有教材，或没有器材，证明过去两个部门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协商。以后要把训练计划和物质保障计划好好的结合起来。

五、合练计划。

单个的、分队的训练，是为合练做准备的，合练是提高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的重要方法。如果一个团、一个师，在一定训练中，没有经过合练，就是没有完满地完成训练任务。因为只有在训练中加强合练，才能提高部队协同作战的技能。但是，几年来我们对合练的组织是不够好的。没有根据各军种、兵种可能参加合练的力量，去拟定全军的合练计划，造成任务过重、互不协调，以致原订计划不能实施。为此，一九五七年度的合练，统一由训练总监部制定合练计划。计划的制定，首先由各军种、兵种根据训练任务，提出自己能参加合练的力量和需要其他军种、兵种配合合练的要求，由训练总监部[1]根据各军种、兵种对合练的要求和实际参加的力量，进行综合调整。此计划只规定合练任务和参加合练的力量，至于具体的合练时间、地点和参加部队，由各军区、军种根据具体条件拟定。

这样作的好处，能实事求是地按照现有力量，合理地分配任务，因地制宜地进行合练，克服过去军队在合练上没有统一规划的缺点，克服不按实际力量片面地要求过高或临时层层追加任务、影响军队合练效果的现象。

第二，加强战斗训练的物质保障问题。

几年来，我们训练中的物力、财力和军事教材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各级有关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工作经验，对军队训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来的经验，训练中的物质保障，必须将需要与可能密切结合起来。但是，有些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常常有偏差的。一方面，片面强调需要，以致造成浪费现象，例如大连演习，以表现炮的威力为理由，打了很多空炮弹；明港演习买了六百九十公斤生橡胶没有用，发烟剂实际只需要一吨，却运去十五吨。几年来某些高级领导机关、院校组织的示范演习，固然起到了战术技术的示范作用，但有不少也成了浪费的示范，致使上行下效，多要东西，这不能怪部队，而是我们领导机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有些业务机关和有些干部，没有很好的计划，不善于利用现有条件，致使训练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例如训练场地，在过去的军训经费的条件下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有些军区一直到今年才开始购买；有些器材由于向有关部门提出计划过晚，工厂制造不出来，影响训练；有些不善于合理地使用现有场地，提高现有场地的使用率。因此，今后必须明确勤俭练兵的思想，练兵不仅要根据需要，而且要根据可能，同时在可能条件下也要满足需要。现在我分别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物力、财力方面：应该在勤俭练兵的原则下，合理地使用现有物力、财力。党中央已决定缩减今后的军费开支。一般地说，我们在明年训练中的物质供应和财政开支不能超过今年的标准。在物质供应方面，要注意到

目前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兵工生产能力还不可能满足训练的需要，特别是各种火炮的弹药等。因为这些弹药有些生产量小，有些自己不能生产，有些生产价格昂贵。因此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时，要减少不必要的课目，同时要充分地利用各种代用品，如采取以枪代炮射击等等。就是用代用品，也应力求节约。

对于装备应十分注意爱护，减少损耗。减少损耗，就是最大的节约。

为了使训练与战备密切的结合，除合理地使用一般的训练物资外，在不影响战备的条件下，各军区应适时提出要求，以便拨出一部分战备物资，特别是容易过时的物资，使用于训练。过去有些备战物资机械的封存，产生相反的结果，如果合理地使用备战物资，不仅不会影响备战，而且军队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会更加有利于备战。

二、教材方面：几年来我们翻译了大量的苏军教材，同时自己也编纂了部分教材，这些教材对于推动我军现代化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教材大部是从苏军翻译过来的，在某些方面和我军的建设及装备还不完全相适应。因此，军委决定要在三五年内编写完全适合我军自己的条令、教范，但在新条令没有出版之前，原有条令仍应结合实际执行。

为了使广大干部能充分利用现有教材，目前即须进行两个处置：一是放宽保密手续，对共同条令及营以下的战术教材、步兵武器技术教材、各兵种中级学校使用的一般教材（除了特别新式武器的技术器材教材外），应取消保密规定；二是各部队现有的教材由军区做统一的甄别调整，对已经失去作用的，除高级机关留少数作参考外，其余销毁。

三、关于训练场地问题：部队训练场地特别是战术演习场地，几年来我们是采取下列方法解决的：一是利用农闲；二是购买土地；三是利用荒山野地；四是使用后赔偿或租用。前述这四种办法，虽然一时还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今后还要继续采用。因场地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牵涉到人民的土地、房屋、坟墓、风俗习惯。就是有钱，也要请求地方党和政府帮助逐步地、慎重地解决。除前面讲的四个办法外，今后还要增加一个办法，就是逐年解决一部分帐篷，以充分利用第一和第三种条件，即利用农闲和荒山野地，或在荒山野地附近就地取材建筑一些简陋营舍，例如云南部队就是自己动手用竹子和土坯建筑了许多房子，这样就可以轮流离开营房，进行野营训练。这种办法不仅在冬季，而且在夏季和秋季都可进行演习，既养成部队野战生活的习惯，又加强了备战，同时也解决了连以上的演习都挤到冬季、形成冬季干部太忙的现象。

第三，组织领导问题。

一、党委对训练工作的领导问题。

1. 各级党委对训练工作的领导，最主要的一环，就是以训练工作为中心进行全面工作的统一安排。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以战斗训练为中心的全面规划，是解决领导上不集中、不统一和工作中矛盾与忙乱现象的重要环节。为此，在新年度的训练中，各级党委必须统一安排与战斗训练有关联的其他问题。如军、政、文训练的科目与时间安排，干部工作与学习的安排，以及会议和牵动部队与干部的其他活动，都应统一规划，以免相互牵连、彼此冲突。

军队的体育训练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应该研究如何达到统一领导。

2. 各级党委在统一规划后，重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些规划。凡经党委统一安排好以后，所有业务部门不得随意变动，额外附加任务。如急需变动时，

必须经党委与有关部门协商处理。军委各总部间，在指导思想，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对于不切合实际、理论与实际脱节的训练方法应及时纠正；在工作方法上，应贯彻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推广群众的创造和发明，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发扬我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与训练方法。

二、克服忙乱现象。

(一) 工作中的忙乱，主要是没有统一规划，临时任务过多，打乱下级的工作计划。各部门条条下达，互不协调，相互影响，加之在工作中缺乏预见性，常使工作处于忙乱状态。为了克服这种现象，首先必须统一规划，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克服条条下达，层层附加的工作作风。其次必须提高各级干部的业务能力，深入到业务中去，亲自掌握训练业务。各业务部门应相互协调，加强联系，防止互相争挤、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 稳定干部，克服干部的流动性。今年干部缺额虽已配齐（并有超额），较往年有所好转，但流动性仍是很大，一般达百分之

五十以上，连排干部近百分之八十。调动的频繁，主要是由于集训多、会议多、检查乱，严重的影响了军队的训练。为了克服这种现象，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必须：

1. 在训练开始前，将干部配齐。在训练中尽量做到少调动，尤其是对经过训练法集训的干部，不要轻易调动。

2. 调学和复员转业干部，应尽量与训练年度相适应。

3. 统一的安排军官学习时间。军官的训练时间和任务虽有规定，若不严格控制与合理使用，忙乱现象仍不能杜绝。各级军官的训练，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均不得超出规定的训练时间。

4. 改变会议多的风气，提倡领导干部深入下层，当面解决问题。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应该开的会议必须抓紧时间；可以合并的应尽量合并；会议应有充分准备，要有具体的内容，尽量缩短会议时间，力求解决实际问题。将干部从过多的会议中“解放”出来。

5. 改变检查工作的方法。检查工作是各级领导切实了解和掌握部队训练、工作情况的必要方法。但是各级的检查工作必须有统一的规划，部门之间应结合进行，避免检查工作过多而发生乱的现象。检查工作应有目的和重点。要求能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问题，特别是应注意发现部队中的积极因素，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检查工作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人数很少、轻便灵活的小型检查组，检查应与帮助工作相结合，与部队当前训练任务相结合，不得妨碍部队训练的进度，不得增加部队负担。

三、改革训练文书。

过去在一个年度训练中，国防部颁发训练命令，训练总监部颁发训练计划纲要和组织指示，这三部文件实际上是三大本书，达十余万言；另外各兵种尚有训练计划和组织指示，内容多，重复，前后矛盾，下边很难执行。除此而外，各军区、军种、军、师、团要照例下达这些文书，内容多系逐级抄转，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造成计划文书泛滥，并给部队增加繁重的负担。

训练计划文书应力求简化。在新年度训练中，训练总监部只制定年度训练计划纲要，以国防部长简短的训令形式颁发执行，以及军委各总部的综合性工作计划和训练物质保障计划；各兵种不再单独下发训练计划，只下达专业训练法指示；各军区、各军种下达组织指示，或以命令形式颁发训练实施

计划。军以下均按此原则简化文书。

四、改善训练制度。

军队进行正规训练，必须有相应的正规训练制度，才能保障训练的进行。有许多制度在过去训练中曾起了不少作用，现在仍可继续采用：

（一）请示报告制度。目前部队报告表格之多和乱，严重地影响了训练，有的特种兵一个连要填四十多种表格，在我军干部水平低而任务重的情况下，很难完成。今后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可依训练总监部一九五六年颁发的“战斗训练报告规定（草案）”暂行执行，并请试行中随时提出意见，以便修正，更臻完善。

（二）校阅和考核制度。这是组织推动和考查训练效果的重要方法，但在方法上和内容上还有形式主义的现象，今后应适当的改进。对部队校阅的次数不宜过多，今后改为每年度终校阅一次即可。校阅的方法、形式和内容也应适当加以改变，使被校阅的部队能得到很好的鼓励和教育。

（三）训练会议制度。在训练中各级应有定期的训练会议，以便及时地总结和交流训练中的经验，但不宜过多，一般应该有个规定和限制。

（四）训练法集训制度。这是提高干部训练能力的重要措施。各级领导应当坚持这一制度，但在集训时不宜分级过多。过去规定的各级干部分级集训，几年来事实证明还不完全适合于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应予以改进。

（五）讲评制度。这是加深理论与实际作业相结合的训练方法。在演习前虽然可以写好讲评提纲，但在现场讲评的时候，应根据训练中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结合起来讲评，不要把原稿照念，这样才有实际的教育意义。

关于军队的演习、首长训练、司令部训练等等制度，应研究改进方法，特别是繁杂的故斗文书，是不适合现代战争要求和我军实际情况的，应继续改进。

五、新老兵接送问题与地方党政工作有直接联系，我们应遵照国务院规定执行。

第四，关于教学问题。

目前在军事训练中，无论在学校或在部队，都存在着教学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多半集中在学习外国经验和我军历史经验的态度和方法上。就是说要用什么态度来学习，要用什么方法来学习？这个问题必须求得正确的解决，才能推动我军的训练工作前进一步。

究竟应该怎样学才是正确的呢？我认为一切学习首先要用批判的态度来进行，而实事求是又是批判的标准。所谓批判的学习态度，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作条文的俘虏。就是在学习中，不要满足于字句章节上浮面的和片断的一知半解，而是在把字句章节弄清楚以后，要进一步的去钻研，去独立思考，去分析比较。既要从正面去理解它，又要从反面去理解它；既要用肯定的态度去理解它，又要用否定的态度去理解它。就是说要用历史的态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它。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才能学深、学透，达到真正的理解。如果单纯地从一个片面去理解它，没有分析比较，没有批判，不能联系实际，不能实事求是，就必然产生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给学习和工作带来恶果。只有经过了这样一段艰苦学习的过程，达到真正理解的时候，才能够牢固的记忆它。也只有既能理解又能记忆某一条原理、原则的人，才能在实践中联系它，以至批判地运用它。

没有批判的学习态度，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理解，没有真正的理解，就不可避免地要死记条文和迷信条文，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把死的条文去套活的现实。因为有些人在学习中，养成机械地、单纯地用引证的方法和类比的方法，去解决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的习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是死的条文；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是理论和实践相分裂，结果到处碰壁，一无所获。比如说，对待一条政治原则，他们不去分析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的原则，是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因而他们就不能理解在新的环境中，产生新的条件时，经过列宁提出，并经实践证明，革命是在俄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条新的原则。当这一条原则用到中国来的时候，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不去研究列宁是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中，用新的原则去代替旧的原则，而是机械地、单纯地用引证和类比的方法，来硬套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们在一九三一年我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认为革命虽不可能在全国同时胜利，但可能用红军攻打大城市的方法，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因而提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原则，使革命遭受到惨痛的损失。这一条教训如果从学习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没有批判地学习，只是单纯用死记、硬套、引证、类比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因而也就不能批判地运用到实际的生活里去。

再举一个例子：在我们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党常常运用“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一条原则，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在学习这一条原则时，应该认识这也是有条件的。应该记得，当着我们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以后，这一条原则就不适合当时的具体环境了，必须有另一条新的原则来代替它，那就是要“在发展中求巩固”的原则。当时党中央批判了博古[2]等少数同志机械地运用“巩固地向前发展”的老原则来反对东渡黄河[3]的错误思想；坚持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正确方针。这就是说，实际生活是生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他们善于把死的原则灵活化。

对待军事原则也是一样。例如：我们学习野战条令，对于加强步兵进攻的纵深战斗，按条令规定，步兵军进攻的当日任务，要打到敌人的第三防御地带前沿，即要达到约二十五至三十公里（在新条件下为三十至四十公里）的纵深。这一条原则在现代化的军队说来，完全可以办到，因为现代化军队每个军内都有一个机械化师或两个机械化师，而步兵师又是乘坐汽车的摩托步兵。教员们在教这一条原则时，必须把现代化军队与我军现时的装备，对照起来研究，说明如果军队在还没有现代化机械化，步兵师又没有汽车可坐的情况下，决不能机械搬用。因此，对这一条原则作为学术研究的时候，应该有分析有批判，实际运用（或演习）起来，必须实事求是。再如，近年来在战斗训练中，很多人反对在冲击时“端枪前进”的动作，认为这是教学上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也要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用兵的总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端枪前进，在旧条件下是不符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的，因为敌我距离一二百公尺，不作低姿前进，将给敌人以射杀的良好目标。但是，如果在新的条件下，步兵跳出战壕以前，先经过空军火力准备和炮兵火力准备，之后，又有空军火力和炮兵火力护送，前面又有坦克和自行火炮掩护，在这样条件下步兵跳出战壕，跟着坦克端枪前进，肃清残存的敌人，那就不仅允许，而且成为必要了。我

们在学习这一条原则的时候，如果用批判的态度，把产生这条原则的具体条件弄清楚了，那末将来在实战中，就会知道：如果我们的空军、炮兵和坦克的火力密度，达到现代的标准，而且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歼灭和压制了、在这个时候还采用低姿跃进的姿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没有上述这些条件，我们也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端枪前进是错误的，而采用低姿跃进的动作是正确的。因为具体时间、具体的地点和具体的条件都大大地不同了。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我们在学习方面，不论学习外国经验或我军的历史经验，无论对待哪一条政治原则或军事原则，都应该采取批判的学习态度，从事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工作，深刻地理解它，具体地分析它，有机地联系它，多方面地比较它；才能达到正确地认识它，实事求是地运用它。就是说要按照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去理解原则和运用原则。那种背诵条文、洋洋自得的学究态度，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

从这里就显示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向教学工作提出了一项严重的困难任务，要求他们针对学员需要怎样学，他们就应该怎样教的任务。总的说来，只有用批判的、不迷信的、不盲从的态度去教，和用批判的、不迷信的、不盲从的态度去学，才能反掉教学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关于经验主义，有少数同志以为，这只是对不努力学习的人说的。当然，没有学习兴趣的人，应该属于经验主义的范畴，但不是我今天所说的对象。我所说的是在学习用经验主义的态度学习的那些人，他们不仅对外国的经验没有批判地研究和学习；就是对于自己的经验，也没有批判地总结和研究；他们迷信自己的片面的、低级的经验、无视科学的发展、因而不能接受新鲜的东西，自己不能进步。

因此，破除迷信，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思想；实事求是，是教育工作者进行正确教学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应有的学习态度。

现在我来说一说学习方法问题。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即批判的学习态度，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学习方法，即经过学习进行批判的方法，才能保证学好。

什么叫做“学”呢？广义地说：住学校是学，实践也是学；调查是学，研究也是学。决不能把学习仅仅局限在住学校和啃书本的小天地内。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都来源于群众实践的直接经验，在生产战线上许多新的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归根结蒂都来自于直接掌握生产工具和技术装备的广大劳动群众。因此，实践、调查和研究都应该属于“学”的范畴。

凡是抱着批判态度从事学习的人，他必然先把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解，先解决“是什么”，这就是先要“知其然”；然后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把提出这一原则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条件加以分析，再联系到我军目前的具体条件加以比较，求得全面的理解。这就是说，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是学习的初步，“知其所以然”是学习的深入，结合自己的实践来思考，是学习向全面理解的发展。学习不求甚解，当然不好，学习只求一知半解也不好，学习必须力求全面理解。

什么叫做批判呢？批判是思想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的头脑里，必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新的和旧的,先进的和落后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等等),才能产生批判。因为在人的头脑里，一旦分解成为两个对立部分，就必然要在思想上发生斗争，这种内心的斗争，常常通过各种偶然机会表现出来，这就是批判。如果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当然就无

从比较，也就无从斗争，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批判。

我军各军种、兵种在现代化建设之初，特别在技术科学方面，大多数干部缺乏科学知识和现代化建军的经验，脑子里只有“一家”，尚无“分号”，所以就很少提出什么批判和斗争，因而也很少提出合理化建议。但是经过几年来的学习和实践，不仅摸熟了，而且发展了，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时候批判就产生了，合理化建议也产生了。例如：空军近年来在执行教程各练习的实践中，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了教程中某些练习的程序，将原来的由双机编队以后接着就进行双机空战的程序，改为在中队（四机）编队以后再来进行，这种程序的改变，既保证了空战训练的质量，也保证了飞行的安全。

这说明，要批判旧的不合理的东西，产生新的合理的东西，必须经过一段实践、学习、调查、研究等过程才能办到。不经过学习，不可能产生批判。上面的例子，完全可以证明这个真理。

没有批判性的学习，就没有建设性的批判。没有建设性的批判，是不完善的批判。批判必须与合理化建议结合，才是建设性的批判，创造性的批判。

有一批老干部，在院校学习期间，对院校的领导，军事学术和生活制度等方面，有许多批评和建议。他们并没学完所有的课程，但是他们却有许多正确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将近三十年革命战争的实践，在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有许多科学上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学过，但有许多战役和战术的知识，实战经验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各院校，应该珍视这一批老干部的经验，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丰富我们的军事科学，同时也可以充实我们的训练内容。不能说他们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学校，没有学过现代化的军事科学，便压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批判的积极性。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过了几十年的战斗大学——红军大学，抗日大学，解放大学，抗美援朝大学。

有人提出，先要学完，再行批判。这种意见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其本质上对于漫长系列的世代来说，都是相对的，只是逐步的趋于完善。因此学习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的。如果要等学全了再来批判，那批判就永远不能实现，而成为空话。所以问题不在学全学不全，而是在自己的头脑中对所学的某一原理和原则有没有不同的东西存在；有了就应该允许批判，鼓励批判，没有不同的东西也不能勉强批判。至于批判的正确或不正确，则应该实事求是地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不能片面化、绝对化。

对于外国的军事学术、军事教材、训练计划以及生活制度上的各种条令等，也是如此。应该用批判的态度，先向他们学习，经过学习，进行批判。分析哪些是先进的，适合我们情况的，目前可以学的；哪些虽然先进，可是根据我们目前的条件，暂时还不能学的；哪些是属于生活习惯，但对于我军并不习惯，可以不必学的。我们对待生活习惯，应该和对待科学理论有所区别。对于我军多年的传统习惯，也要分析批判，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既不要硬性地改变，也不易机械地搬用。

总之，目前在教学工作中的中心问题是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只要明确了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并采用批判的方法去进行学习，教学中的若干争论问题，将会得到适当的解决，从而保障学校和部队的训练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们的会议要结束了。在会议中大家都能本着“八大”的精神，对我们

的训练工作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使大家相互间了解了许多情况，交流了工作经验，而且也使我们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很多，牵扯的面也很广，我在总结中，没有能够把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都谈到，因为这些问题还不成熟，有些问题非本会议所能解决。会后，我们准备把所提意见进行一次总整理，根据问题的性质，分别研究处理。凡属军训业务性的问题，由训总研究解决；凡属训总不能解决的问题，准备提请军委最后决定。

在我军的训练中，虽然存在的问题很多，但基本的问题，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我军具体条件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使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将提出的问题全部解决，有不少问题是要在我军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求得解决的。为此，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时，就不能仅从需要出发，还必须照顾可能条件。为了更迅速地提高我军的现代化的军事水平，我们在指导思想，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在工作方法上，必须贯彻群众路线；我们在实施步骤上，应当着重在现有基础上，作适合条件的和可能性的逐步提高。

今年上半年的训练，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和重要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今后重要的问题是巩固成绩，推广经验，克服现存缺点，使我军的训练达到更高的水平。我愿和同志们一起为完成今年和明年的训练任务而共同努力。

注 释

[1]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部长为刘伯承（未到职），后由叶剑英接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训练总监部并入总参谋部。

[2]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3]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派遣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同阻拦红军抗日去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于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

现代战争中的后勤工作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我首先祝贺全军后勤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开幕，祝贺我们后勤部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一大批先进工作者，创造了这样多的光荣事迹。通过这次会议，你们将交流先进经验，并把这些带回到部队去，进一步发挥你们的模范作用，推动全军后勤部门更好地完成一九五七年的工作任务。

后勤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我要谈谈如何从整个人民解放军的状况出发，认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

我们军队的组织状况，过去长期是“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现在已经在单一兵种的基础上，建成了多军种、多兵种的合成军队。这在我军建军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军这种组织状况上的改变，还在一天天地发展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军现代化的水平也将不断地提高。我们军队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后勤工作为了适应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需要，也由简单而复杂，由低级阶段进到了高级阶段，把过去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基本上是单一兵种的后勤，建成了统一的诸兵种合成军队的后勤。后勤工作不像过去那样简简单单了。在新的条件下，有许多新的问题，要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从我们军队的补给状况来说，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没有巩固的后方，没有工业，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主要是“取之于敌”和“就地取给”，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整个国家经济和六亿人民的支持，同时战争的形式也有很大变化，战争的规模巨大，物资的需要和损耗量也大大增加。从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也可看出，在现代战争中，如果没有后方的物质保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要战胜现代化的敌人确实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军队对于后方的依赖性和过去不同了，军队更加依赖于自己的后方和人民。后勤工作在今后战争中的任务，加重了不知有多少倍。因此，建设良好的强有力的后方勤务的组织和制度，在今天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未来的战争中，不仅要组织大规模的物资供应和技术保障，更重要的还是对有生力量的保障。一切技术器材，都是由人掌握的，胜败的主要因素决定于人的作用。对人的保障比物资的保障更加重要。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来原子武器将在陆、海、空军中大量地使用；战争不仅从国境开始，也可以同时在内地打起来，军队和人民都可能遭到较大的伤亡，医务人员本身的伤亡可能性也增多了，因此医疗卫生保障的任务特别加重了。同时，伤亡的性质也复杂了，不仅有炮弹、子弹的杀伤，而且有光辐射、细菌、化学战剂的杀伤，这就需要有非常高的军事医学科学水平，才能完成医疗保障的任务。

从上面所说的两点来看，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已非常明白了。

加强后勤建设要抓紧两个问题

加强后勤建设，完成一九五七年后勤工作任务，我想最重要的要抓紧两个问题。

第一，加强思想工作。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工农兵学商都要抓紧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如果只抓业务，不抓思想是危险的。这对我们军队全体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指示。在后勤工作人员中加强思想工作、政治工作，鼓励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防止思想上的落后，是保证完成后勤各部门工作任务的先决条件。我们后勤部门有少数同志，把后勤工作看成是一种简单的事务性的工作，看不到后勤工作在国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看不到后勤工作的科学性、技术性。有些人不安心后勤工作，认为这个工作没有“前途”，说什么“路走对了（参加革命），门走错了（做后勤工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的争名逐利、贪图享乐的衰退现象。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必须进行教育，加以克服。因此每个人都要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后勤部门也不能例外。只有把思想搞通，才能积极钻研业务，搞好业务。

第二，坚决执行勤俭建军的方针。

我们军队对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号召，要首先响应，起模范作用，厉行勤俭建军，一点一滴地省下钱来，支援国家工业化。工业化实现了，我们军队现代化的程度才能提高，军队才能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一旦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才可以更快地打败敌人。

为了贯彻勤俭建军的方针，我们各种工作中所使用的人力、财力在数量上都要减少一些，但是工作不能减少，应当做得更好。后勤工作也同样。负责全军物质保障的后勤部门，自己本身厉行节约，防止浪费，更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要靠大家发挥工作的创造性，精打细算，克勤克俭，尽量节约我们的物资和经费，真正做到钱要用得少，事情要办得好。

在节约的原则下完成后勤部门繁重的工作任务，就要提高工作质量，发挥潜力。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先进工作者，在工作中开动脑筋，积累经验，寻找窍门，发挥积极因素，更加努力，更加虚心，防止骄傲，团结群众，推动整个后勤部门的工作。同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热爱自己的事业，不仅在业务上、而且在思想上也成为先进分子。有了你们工作上的模范作用，各部门又加强对后勤工作的领导，依靠和发动群众，我们就可以做到既厉行节约，又提高工作质量，一九五七年后勤工作就将比一九五六年获得更大的成绩。

我衷心祝贺同志们在一九五七年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预祝这次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加强政治教育，抓紧军事训练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次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从十月十五日起到今天为止，共半个月。在会上发言的有三十一人，大家基本上是本着“整风”的精神，对训练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并着重地讨论了训练指导思想问题、组织领导问题和一九五八年的训练任务。此外，还讨论了如何做到训练同政治运动两不误，以及如何完成训练计划的问题。我认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特点，是吸收了各军种、兵种、军区、军、师、团的干部参加，其中既有军事工作者，也有政治工作者和勤务工作者。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对训练的指导思想的认识，趋于一致了。不管级别和军衔高低，大家聚集一堂，各抒己见，你以我为师，我以你为师，这种“相师”的精神，正是我国古代以来的好传统。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能使合成军队的干部或专业技术干部，彼此了解，共同树立合成的思想，这样就有利于军队的团结，有利于军队在战时的协同动作。因此，依我看来，这次会议基本上是开得好的。

会议上同志们对萧克[1]同志的总结报告和一九五八年的训练任务提了些意见。我们准备在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就呈军委批准公布。另外，还有陆军训练大纲，同志们也提了些意见，同样也需进行修改，尔后报军委批准颁发。

昨天下午，我们征求了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顾问同志和十一个军区同志的意见。顾问同志对我们这次会议和一九五八年的训练任务，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已代表大家当面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说我们的军训有些成绩的话，这是与他们的热情帮助分不开的。

今天，我要向同志们讲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提高军队政治质量的问题

你们都是天天在部队里转来转去的人，对于部队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依我看，开国以来，全军连、排干部的变动是很大的，根据总干部部一九五七年三月份的统计，全军连、排长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入伍的共占百分之九十三点五。这就是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新成分在全军连、排干部中占了极大的比重。这些同志虽然有一部分经过抗美援朝的实战锻炼，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接受了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可是，要使他们成为既能经受得住一切风险的考验、又善于指挥军队的指挥员，还需要很好的继续锻炼。

毛主席在谈到我们干部情况的时候，曾指出有些干部是“红”的，有些干部是“浅红的”、“桃红的”。这一点也符合于军队的干部情况。在我军营团以上的老干部中间，也并不是都是“红”的，有些是“浅红色”的，有些是“桃红色”的。他们虽然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在政治上并不是完全部坚定可靠的。

鉴于上述情况，就产生了如何提高军队政治质量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支革命的军队，过去和现在都担负着伟大的革命历史任

这是叶剑英在中央军委训练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务，尤其现在处在原子时代，军队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就必须把他训练得像钢铁一般的坚强。没有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和经受住现代战争的考验的，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提高军队的政治质量，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显得更加重要。我军在长征时期，到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减员很大。那时毛主席强调指出，部队虽然少了，可是骨干保留下来了。正是如此，所以能胜利地渡过了长征的困难时期。这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的結果。

未来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将是空前的，不论前方和后方，都同样会遭受战争的考验。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没有为人民为祖国自我牺牲的精神，那是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因此，我们认为，军队建设首先要保障军队的政治质量。如果我们对这方面不抓紧，不重视，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甚至会出乱子。所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要建设一支真正的现代化的革命队伍。现代化的革命队伍就是又红又专的队伍，苏军是世界上第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也是世界上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世界上有这两支军队的紧密团结与合作，加上其他兄弟国家的武装力量，就可以担负起捍卫世界和平的责任。

什么是现代化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和原动力呢？军队的生命线和原动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政治觉悟、政治品质。军队只有提高政治觉悟之后才能知道为谁服务、为谁作战、为谁勤学苦练，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任务，是党的任务，是全军的任务。凡是解放军的成员都应该对此负责。不仅政治干部要了解这一点，就是军事干部也要了解这一点。我们既要通过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使我军革命化，又要通过军事训练使我军现代化。现代化是军事任务，同时又是政治任务；革命化，是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军事任务。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从目前军队的状况来看，要提高军队的政治质量，还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军队中存在的各种不良倾向，使军队进一步在政治上巩固起来。这个问题，刘志坚[2]同志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了。党中央已经有计划，中央宣传部编了一部书，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书，大家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学。

提高军队质量，这是我们全党的责任，这是建军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和军委总政已决定一九五八年要继续整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做军训工作的同志，应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

我们应当根据党中央整风的指示，做到整风与工作“两不误”。根据一年来大部分部队的实践，以及刘志坚同志的报告，证明“两不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政治、文化教育（有政治运动时可使用文化时间）的时间，一个月内就有十天（包括党日），如每天按八小时计，一个月就有八十小时，一年按十个月计就有八百小时。这不是恰恰符合某军区同志计算的军官社会主义教育和义务劳动时间为七百至八百小时吗？这不是恰恰符合政治、文化教育占总时间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吗？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使用时间问题。以上就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关于充分利用一九五七年的训练经验问题

一九五七年的训练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各级党委的领导、首长亲自动手、群众路线。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了四句：“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合作社就是这样办的，我们也要这样办。军队训练没有规划是不行的。我们也要全面规划，也要加强领导，也要首长亲自负责，亲自动手。有很多同志讲：去年的技术和射击搞得很好，重要经验之一，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摸、爬、滚、打”的办法，由军长当连长，把师长、团长、营长、连长统统集合起来在一起滚。经过滚，他们就有了本钱，就能亲自下场。那末为什么在战术训练时有许多首长就很少下场呢？是因为他们懒惰吗？我说不是。说他们偷懒，那末为什么技术和射击训练他们就不偷懒呢？我看原因是：战术还没经过“摸、爬、滚、打”，他们还没本钱。明年我们已提出了要在巩固和提高技术和射击的基础上加强战术训练。要搞好战术训练，关键在于给他们以本钱，这是两年来训练的好经验。因此，一九五八年也要和过去一样，把各级干部集中起来，从单兵搞起，搞战术，使他们在战术训练时敢于临场，也能做示范。

为了具体的领导战术训练，今后应当采取下列办法：第一是抓，第二是钻，第三是操，第四是演。

抓什么？我们讲要抓辫子。什么叫辫子？党委、首长、各级军官就是辫子。不抓这些辫子是根本不行的。比方说，军区若不抓军党委和军首长是不行的，军委不抓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也是不行的。同样，党中央不抓军委也不行。抓辫子，就是要督促党委、督促首长和各级军官去搞。当然要抓的不只是这些，还有其他方面。比如，济南军区认为应抓关键、抓难题、抓弱点，这个办法当然也对，这是他们的经验。装甲兵提出要抓思想、抓机关、抓技术，这个当然也对。不管是装甲兵也好，济南军区也好，我们也好，总之，有一个共同点是抓。不抓紧党委，不抓紧首长，不抓紧各级干部，事情是搞不好的。有些军区首长对特种兵、海军、空军都不抓，这是个缺点。有些军区首长把训练工作交给副职去搞。副职搞也可以，但必须给他以具体指导和支持。必须强调指出，今后军区司令员要亲自搞训练。有人说，司令员应当抓中心工作。什么是中心工作呢？平时训练就是中心工作。一个领导干部，不去抓中心，还抓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二把手当助手，主要干部要搞训练。因为训练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战备。敌人来了要同你打仗，你自己不搞训练行吗？所以必须亲自动手。

第二要钻。既然抓住了军官，军官就要钻。钻什么？要钻技术、要钻理论、要钻条令。如果不掌握技术，不熟悉条令，在训练过程中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想去做，但做不了。有个很突出的例子。苏联顾问有一次到了青岛某师的炮兵团。当时，团长、营长、副营长、参谋长都在场，他们都是炮兵，但不懂得火炮的分解、结合、瞄准，不懂得火炮的牵引和运动。专业兵对自己的专业部不懂，当然对别的专业就更不用提了。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要了解下级的、本级的、上级的和可能配属加强的部队的技术、战术，还要了解敌人的技术和战术。如果不懂兵器的战术性能和技术性能，当然也就谈不到对兵器的正确使用和指挥。某地演习的时候，顾问同志给我讲，有一个领导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员，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敢给空军下达任务。什么道理呢？因为他对空军兵器的性能和战斗使用不很熟悉。所以，训练中间，各级军官必须要钻技术，必须掌握技术成为专家。

当然，钻技术、钻条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自己对技术也不懂。我曾经想把空军、海军、通信、坦克等技术兵种的基本原理学一学。于是摘了一些关于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喷气原理、雷达原理的书摆在桌子上。把基本动力学打开一看，首先是牛顿三大定律，什么惯性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等等，出现了一大堆问题，自己搞不懂，只得请教别人。当个军官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时代在前进，技术在前进，科学在急速发展，我们要么就是迎头赶上去，要么就是告老退休。不要占住茅房不拉屎。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是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奋斗到老。应当努力在上爬，像爬狼牙山一样，要有这个勇气。毛主席也是这样号召我们的，要成专家！毛主席现在还学英文、学自然科学。

操演两字差不多，我把它稍微分了一下。操，就是在作业场、教练场上，勤学苦练，操技术动作、队列动作。演，就是要去野外演习，到海上和空中演习。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一九五八年的战术训练任务。

当然，同志们又会提出一个问题：是首长任教呢，还是专长任教？所谓首长任教，就是首长教部属、上级教下级。所谓专长任教，是指对某些科目或某门技术有专长或较熟练的军官、军士担任教课说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些争论。我们的要求是首长任教，但事实上还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只能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这个问题是我们军队目前过渡时期中所难以避免的现象，是历史的产物（目前已有部分干部能按级任教了）。就是全军干部通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学习都真正成了专家之后，也不排斥若干专业采用专长任教的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关于在现代条件下的训练问题

关于是否要在现代（原子时代）条件下进行训练的问题，目前有一些争论。在这里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我军的战斗训练应该要在现代条件下进行。很多同志在发言中已经提到：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这个说法很对，是合乎马列主义原则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和认识这个实际。我认为，从军事范围讲，所谓实际，主要是战场上的实际。因为只有在战场上，敌我双方才能丝毫不保留地把一切本领，把一切秘密的东西都使用出来。假使平时大家都能保持秘密，那末在战场上全部秘密都会暴露出来的。这个时候，战场上表现出来的就是最全面的实际。如果我们要想抓住更全面、更充分的材料看问题的话，那只有在战场上。在这里应该指出，我们有过去的战场，也有未来的战场。如果发生战争，我们是在未来战场上打仗的。未来的战场上的面貌是怎么回事呢？未来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呢？这些问题，世界各国的军事活动家都在探讨。在我们看来，未来战争一旦爆发，可以预想，同我们作战的将是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兵器和装备，其中包括各种核子武器及投掷各种毁灭性武器的各种手段——导弹、飞机、火箭等。不管我们使用的是梭标也好，步枪也好，大炮也好，飞机也好，坦克也好，一句话，不管我们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武器，都必然要在敌人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在新的武器——原子弹、氢弹、导弹、化学、细菌及其他武器的杀伤、破坏和威胁之下来进行战争。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实际，虽然还是属于未来的。

可见，未来的战争就是原子时代的战争，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未来战场上的面貌，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武器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将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战场面貌。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

们的军事、政治和勤务工作人员，要不要研究新的技术装备，并结合我军的现实（装备）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学会在新的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本领呢？我想应该。否则，就会使认识落后于存在。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军要不要在现代条件下训练的问题，好像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就是不要用现在手中的武器一样。我认为，所谓在现代条件下训练，不是敌有我有，敌有我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以我军现有装备在原子时代作战的问题。现在，研究如何以我军现有装备在原子时代作战，正如抗日时期如何以步枪、机关枪同敌人飞机、坦克、大炮作战一样。一切脱离实际的做法是错误的，而这实际是原子时代的实际。毛主席说，落后于事物的发展叫右倾，超过了事物的发展叫“左”倾。我们要看到将来，并不丢掉现在，要客观地观察实际。

同志们已经提出了，我们要学，首先要学会防护。这话当然也对。毛主席提出的原则也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首先能够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要消灭敌人，必须首先要保存自己。学防护是合乎我们的原则的。这是全军上下都必须如此的。但是，只学习防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在进攻和防御战斗中对原子的使用和防护的一切战斗行动。道理很清楚，在战争中间，如果不懂得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就不会进行有效的防御。同样，如果不懂得敌人怎样防御，我们又怎样进攻呢？因之，防御和进攻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如果把它截然分开，就不合乎逻辑，不合乎科学其次，我还要谈谈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和如何对待我们的经验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锻炼的，因而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是一提到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就把过去的一切好的经验都抛弃呢？当然不是，应当分别对待。我们几十年战争的经验有许多是带有普遍真理性质的。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已经作了基本总结。如关于战争的规律及战略战术的许多指导原则，都是普遍真理。是马列主义学说的组成部分。这些原理不仅对于我们有用，对别人也有用；不仅过去有用，现在和将来也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我们没有很好地抓紧这门工作，没有把几十年在战争中所得到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整理，成为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作为传统传授给我们军队的干部。建国八年来，这项工作我们也没有好好做。除了沈阳军区在邓华[3]同志主持下把抗美援朝战争写成了初稿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素材。假使我们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系统起来，一定有很多是属于普遍真理性质的。带有普遍真理性质的经验，我们不仅仅要保留，而且要继续发扬。关于几十年军队建设的政治原则，绝大部分也是属于普遍真理性质的。比如，几十年来我们实行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个理论，也是个制度。因此，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军事民主制度，上下一致、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的制度，群众路线等，这些都是属于普遍真理的。我军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制度，等等，是我军几十年来在战争中间经过实践考验，也为官兵所深深体会到的。这些带普遍真理性质的东西必须坚持，而且还要发扬。要保持军队的政治质量，就是要靠政治保证。不管在现代条件下如何作战，我们经验中属于普遍真理性的东西一定要坚持，绝不能抛弃。对这个问题抱有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这是对待我军经验的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对于直接依存于技术的战术、战役来讲，就有一定的时代

性。装备改变了，作战的方法也要随着改变。我们曾经历过使用梭标与步枪的时期，那时的战术是梭标与步枪协同。以后慢慢地发展了，有了自己的火炮，也有了缴获敌人的火炮，从而进一步组织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步兵。这时我们的战术运用就有了步炮的协同。以后又慢慢发展为陆军各兵种的合同战术。在解放战争后期，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就有了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这时，我们的战术就是这些兵种的合同战术。至于陆、空的协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有了一点，但还是萌芽状态。海、陆、空协同的经验我们根本没有。我们的海军是建国以后才开始建立的，空军的训练时间也是很短的。至于陆、海、空、防（防空）、降（空降），加上新的武器——原子、氢弹、导弹、细菌、化学、人造卫星等这种天上地下、海面、海底的协同，全世界都还没有经历过。技术是不断地发展的，所以，我们的军事训练不能不密切地结合着这些新的变化来进行。我们在延安不是大大地提倡搞四大技术吗？那时叫的很响亮。在那个时候这样提倡是正确的，因为那时我们手中只有步枪。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也是要熟练手中武器。可是，手中武器是有变动的。一九四九年到现在，我们手中的武器变动很大，因为手中武器变了，所以运用武器的方法不能不随着变动。这个关系，好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样，是时时刻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如过去是用眼睛和望远镜观察，现在有雷达、电视传真、照相、声纳、声侧、红外线、无线电等等，手中武器、通信器材、侦察器材都改变了。因此，过去一个指挥官不能指挥五个以上单位，现在就发展到可以指挥五个以上甚至十几个单位。一切都在变化，仍然用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采取新的方法。因之，训练方法也必须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加以改进。如果笼统地讲我们是进步的，我们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万古长存的，这叫绝对化。但是，如果因为我们要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就把过去的一切都抛掉，认为过去的统统不适用，这也叫做绝对化。辩证的头脑之所以宝贵就在于他能适应客观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在现代条件下训练我们的军队，并不是否定我们过去的传统和经验。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从形容词来讲，这里需要分清的一个是“优良”，一个是“先进”，发扬的是自己的“优良”传统，学习的是人家的“先进”经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能作为一个辩论性的发言，不能算作什么结论。

再次，谈谈训练和战备结合的形式问题。

我们提倡训练和备战结合。至于运用什么形式使训练与备战结合，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所谓战斗训练，是指专业技术训练，专业战术训练和合同战术训练。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要在巩固和提高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战术训练，并结合战备。这是因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必须掌握技术才能够改进和发挥战术的作用，但是任何先进的技术，必须有很好的战术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最大效能。因之，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必须配合起来进行。同时加强战术训练就可以巩固技术的成就（只要在战术训练中适当注意）。空军在战术训练的同时，对巩固和提高技术上有着很好的例子。比如，空军练习如何接敌，如何占位，如何搜索，如何攻击、如何脱离，这本来是一个战术动作，但是这些战术动

作，是依靠熟练的技术动作来进行的。其他军种、兵种也是一样，战术和技术是不能够割裂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强调了部队的技术和射击训练。一九五八年呢？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各级军官和士兵的技术训练。这个问题在我们军队中间，特别是中级以上指挥员，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这个缺陷我们要补上去。在一九五八年只要时间许可，各军种、兵种的军官要好好去摸技术，争取在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前面说过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所以战术训练同战备结合的前提是解决技术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战备。因之，在我讲到训练与战备结合之前，首先强调一下技术训练问题。

那末，究竟训练同战备相结合要采取什么形式呢？陆军过去一提到训练与战备结合，只谈到一种形式，就是夜间紧急集合。夜间紧急集合是不是一种战备行动和战备训练呢？是的。但在这次会议中，大家强调地提出了另外一些形式：第一是野营；第二是转移驻地。所谓转移驻地，是指纵深内的师、团可以开到前线，开到边沿地区。我们要求接近实战，到那里不是很好吗？从营房搬到野外去，在作业场附近，搭起帐篷来，从早可以干到晚，时间的利用率提高了，也会大大有助于解决“拉不动”的问题。强调转移驻地，转移作业场，到前线，到战区，到野外去训练，我认为是陆军和地面部队把训练与战备密切结合起来的 effective 方法，也是一个良好的形式。

空军，经过基本训练，把基础课目学完之后，实施紧急转场，也是训练与战备结合的一种形式。因为从紧急转场中间可以看出许多问题，技术的、战术的、指挥员的以及空勤、地勤、起飞等，从接受任务到进驻指定地区这一段时间，一切工作都受到了考验。

海军的转移海区和远海抛锚训练，也是使训练与战备结合的有效方法，也是一个良好的形式。这种办法比过去那种老在港内早出晚归、消耗时间、消耗油料，消耗机器的办法要好的多。出海抛锚、转移海区的训练和空军的紧急转场一样，同样会使各项工作都受到考验。中国有句老话：平时当作战时看，战时就可以当作平时看。当然，真刀真枪的实战，到底是不能完全和训练一样的。

所以，陆军采取野营、夜间紧急集合、转移驻地和作业场等办法，空军采取紧急转场，海军采取转移海区和远海抛锚的办法，就会使训练同战备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就会使军队把在平时的训练当作实战来看。当然，训练与战备的形式不应局限于以上这几种。我仅仅是把问题提出来，引起同志们的思考，引起同志们在训练与战备结合这个问题上去更多的创造，使我军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保持高度的战斗警惕性。要知道，战争虽然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但是帝国主义还在扩军备战，还在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那里制造紧张局势，还在其他地区阴谋发动战争和挑衅。因此，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使军队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这就是对于军队训练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战斗训练以及勤务训练，都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只有使军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即使突然事变到来，我们也不会惊慌失措。

希望同志们在一九五八年的战斗训练过程中，开动脑筋，想出更多的方式和方法，使单兵、班、排、分队、部队，乃至兵团的训练，更能与战备紧密结合起来，使部队经常保持战备状态。

最后，关于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同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否相适应的问

题，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这是国家和军委已经肯定了的。但是，对积极防御应当如何理解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积极防御”就是进攻的防御。过去也有人这样说：“防御是最好的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们的国家制度，党中央和军委许多负责同志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我们国家是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国。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和

平民主的国家。我们也是一个拥有各种资源的天府之国，我们不需要夺取人家的资源，占领人家的土地，我们不需要扩张，不需要侵略，这是我们国家制度所决定的。但是，帝国主义还存在，它要侵略我们，因之，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以保障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我们的防御是积极的，是进攻的防御。敌人一旦来了，我们也不能采取单纯的防御，就是说不能因为战略上是防御，战役战术也来个防御。我们必须在战役战术上积极组织进攻，消耗和消灭在我国领土上和我国上空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战略上我们是防御的，战役战术上我们是有进攻的。

在战略上讲，防御是最好的进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最后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要使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和平，进行和平竞赛。我们一天天发展，帝国主义一天天缩小，一天天的困难。他们国家的人民在困难中间一天天的革命化，这样就可以不经受像世界大战那样大的牺牲，经过局部的革命，使资本主义体系慢慢地垮台。帝国主义要垮台，这是注定了的。全世界的没落阶级统治，必然要为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所代替，也是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很清楚：无产阶级要代替资产阶级，如同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一样。问题是如何以最便宜的代价来获得社会主义。我以为最好的方式是和平。从军事战略方针来讲，防御也是最好的方式（不打第一枪）。可是，这个防御并不等于没有强大武装的防御。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洲际导弹，没有可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没有人造卫星，没有这些武器，世界和平能维持到什么程度？有了这些武器，世界和平又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这个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些武器的存在，特别是人造卫星的出现，帝国主义就是另外一个态度，对战争又有另一种看法。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科学，发展我们的军事科学，必须加强我们的武装。无论我们的武装力量如何强大，我们的军事科学如何发展，可是我们在战略上还是要坚持防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真正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遭到了敌人的侵略，那时我们应以战役、战术上的进攻来完成战略防御，这才是最好的防御。但是战役战术上的进攻，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四面出击，到处进攻。要知道在战略防御方针下的战役战术，虽然基本上是采取进攻，但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也有防御。其所以如此，防御也是为了消耗敌人的力量，为了争取时间、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进行机动，以便在某个方面争取优势，利用这个优势实施进攻。所以，我们为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军队的训练、必须把进攻当成主要的战斗类型。同志们可以看看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对进攻是怎样解释的。虽然进攻和防御两个基本类型战斗是同时并提，中间却有主次之分。要消灭敌人，解决战斗的基本手段还是进攻。因此，我们说在现代条件下训练部队，防御和进攻二者都不能偏废。不懂得进攻的方法，就无从防御，不懂得防御的方法，就不会进攻。因此，我们说在现代条件下训练军队，不但不违反我们积

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且恰恰是为了执行这个方针。中国有句老话，叫“盘马弯弓箭不发”。所谓“盘马弯弓”，就是在马上把弓拉得满满的，也叫做有充分准备吧！所谓“箭不发”，是说你不过来我不发，你来我马上就发出去。我们的态度，不是偃武修文，而是盘马弯弓。只要看到敌人一动，我们就发出去。我们的原则是：不打第一枪，不发第一箭，不先发制人。否则政治上就会造成被动。要知道，战役是服从战略的，而战略又是服从于政略和政治的。如果“盘马弯弓”箭先发的话，那末，战略同政略就矛盾了，战略原则就违反政略原则了。所以，我讲要坚持在现代条件下训练，首先要学会防护，同时也要学会进攻。

我们在游击战争时期，战略上是绝对的劣势，战役上也多属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4]。为什么采取这个原则呢？因为那时和敌人在整个军事力量的对比上相悬太远；在战役、甚至战术战斗上，敌人也常常比我们强。我们只好采取在战争中壮大自己力量的这个办法。为了在战争中壮大我们自己，争取在较长的时间内积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以便转入进攻，所以那时我们的方针是：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着重在于消灭敌人，夺取敌人的武装来壮大我们自己。后来慢慢地发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我们虽然还处于劣势，可是可以造成某种战役上的优势了。我们已能够消灭敌人一个团、一个旅、一个师甚至一个军。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发展。整个形势的真正转变，我们在战略、战役上都占了优势还是从淮海战役以后。那时，我们不仅在战役上采取了进攻，战略上也采取了进攻。可见根据力量的对比，每个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了相当规模的现代化的武装，为完成积极防御的任务，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训练军队使其善于防御，又善于进攻。

注 释

[1]萧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2]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邓华，朝鲜战争时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4]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军事科学院筹建经过及工作方针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主席：

军事科学院根据军委的指示和决定，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已于三月十五日宣布正式成立。现将军事科学院筹建经过及今后工作方针问题，向您报告。

一、目前在训练中，大多数部队和院校的首长共同感到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一是，部队和院校训练所采用的各种条令（如战斗条令、野战条令、舰艇条令等等）均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固然，苏军的条令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采用的，但是它不可能与我国、我军情况完全相适应，如我国的经济条件、地形、气候、我军现有的装备、优良传统等等，与苏军有很大的差别；进一步的说，就是敌人对我国的攻略方式，与对苏联的攻略方式也可能不尽相同。

几年来，许多事例证明，完全采用苏联的一套，很难避免产生死搬硬套，削足适履的教条主义倾向。军事学院的学员反映，教员上课凡举例，差不多都是库尔斯克、斯大林格勒[1]的一套，很少有我军的战例。南京部队反映，他们部队在搜捕匪特的战斗动作中，竟完全采用正规的战斗方法，使伤亡增大、战斗时间延长。上述的事例，不是个别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例子。由此可以理解，编写适合我军的作战条令，已成为当务之急，有刻不容缓之势。

其二是，我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可是除了建军原则、军事路线、战争理论、战略问题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作了系统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而外，在战役和战术方面尚缺乏全面的总结。

上述的宝贵经验，如同一粒一粒的珍珠一样，散藏在过去的文电档案中和参加革命战争的广大干部的头脑里，目前如不抓紧时机、采取老少合作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和总结，因循下去在若干时间之后，老成的凋谢了，就会有失传之虞。

二、我们考虑认为：

(1) 编写自己的条令、总结自己的战斗经验、编写战史，已迫不及待。

(2) 军事科学上，不进则退，“落后的总是要挨打的”。特别是现代军事科学的成就日新月异，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势必引起军事学术和技术上一系列的变化，为了摆脱我军在现代战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将目前我军各军种、兵种、各高级院校已经分别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组织起来（一部分是自发性质的组织）以便统一规划、组织协作、交流经验，建立一个军事科学院亦属必要。

(3) 同时我们也曾考虑，承担上述任务，不单独建立科学院，就以现在的各业务部门（如训总、总参、兵种司令部等组织）分担责任，是否可行？经再三考虑和现实事例证明，是不行的。因为各业务部均有他各自的业务工作，很难有余力来承担学术研究工作。过去几年（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就是这样做的，结果证明是不行的。

(4) 是否可以和高等军事院校合并，我们也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由于两

这是叶剑英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者在其性质、任务、工作对象、保障组织各有不同，合办害多利少，分办利多害少。特别是两方面，为完成各自的任务，都必须提出相应的要求，两方面都不得作适当的迁就，以互相照顾，结果是两方的工作都不能抓紧，全力以赴。

(5) 建立军事科学院是否会造成人浮于事，产生浪费现象呢？经过精确的计算，我们认为不会的。按照军委批准的军事科学院编制，其中军官只占全军军官比例的百分之零点零四六。全年的经费（包括薪金在内）只占全军军费开支的百分之零点零三三。

由此可见，花费的财力有限、人力不多，如在工作方向上不出大的偏差的话，经全院同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努力下，则所获得的结果将是很大的，同时也是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针的。

三、一九五六年军委召开高干会议时，曾充分地考虑了上述意见，认为成立一个军事科学院，来总结我军经验，编写我军战史和作战条令，是迫切需要的、适时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军委例会上决定以叶剑英、张宗逊、彭绍辉等同志组成筹备委员会，以原训总科学条令部作为基础，筹建军事科学院。

现在已到职干部为一百六十余人，工作方针已初步预定，一切制度和条例，正在逐步拟定，营房建设尚未完成，目前只好暂借高等军事学院营房办公。根据现在情况来看，干部思想比较稳定，工作热情很高，经过整风和思想解放运动，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已大为提高，只要工作方针不产生大的偏差，完成任务虽有困难，但是也还是可能的。

四、军事科学院的工作方针，初步预定：以不破不立的思想，抱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采取厚今薄古、学习与独创、研究与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指针，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特别是学习苏军的军事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帝国主义为作战对象，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我军战史。

我们的工作步骤是：首先从总结我军经验开始。这样做，主要的是使我军的干部了解我军三十年来光荣斗争的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研究人员的水平，使研究人员逐渐地真正体会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的精神。否则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研究工作指针的方针就会落空，思想就不易统一。

第二步是从研究我军的具体情况下手，例如研究我军的编制、装备，我国地形、交通等，目的是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避免各种各样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设想。与此同时就是研究敌军，目的是：比较熟悉地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想出适当的对策来。

第三步是采取批判学习的态度学习苏军的各种条令，以便吸取其先进经验，充实我军现代战争的知识，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

目前军事科学院工作正在开始，这个方针是否正确，请主席指示。主席如果能抽出一段时间找我们当面指示则更好。

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注释

[1]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德军集中兵力对库尔斯克发起进攻，遭到苏联红军顽强抵抗。七月十二日苏军发起反攻，八月二十二日收复失地，歼灭德军三十个师五十万人。这次战役迫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场转入防御。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发起猛攻，先后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其全部歼灭，生俘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保卢斯。这一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1]后，又一次震动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下，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2]连接起来，是中国革命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的胜利起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对这个变化有着决定影响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从诞生时起，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些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马上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响应，也给从事革命三四十年来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3]，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以及改组过的国民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镇压了陈炯明[4]的叛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军阀，安定了两广局势，使后来的北伐革命有了巩固的基地与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开始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北伐军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时，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叛变革命，并与蒋介石合流。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害，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长江流域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面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识青年，遭此严重打击，因而义愤填膺，但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共产党必须挺身而出，高举自己的红旗，甩开一切动摇分子，把一切革命的力量团结起来，单独地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继续奋斗下去。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

南昌起义大大鼓舞了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并跟着南昌起义部队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随张发奎[5]南下的由原武汉军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南行至九江，曾引起张发奎的猜疑被缴了械。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效仿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鼓动工作，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万安，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暴动，把二十六军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当时团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敌人的心脏——广州之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广州是北伐军的根据地，人民素有革

命传统，在那里举行起义，不但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给敌人的打击也会远远超过万安。为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十月间，第四军赶跑了桂系[6]军阀，进驻广州。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广州虽然也为反革命的势力所统治，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觉悟了的广州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相反的，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我们回到广州后，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情绪，革命的气焰日益高涨。被国民党破坏的工会组织又恢复起来了，游行示威的声势越来越大，郊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

广州的革命群众曾对张发奎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渴望着由北伐军剩下的最后这支武装能领导他们继续革命。南下时，张发奎也还表示愿意回广东继续革命，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这种高涨的革命气焰时，却又动摇了，最后终于脱下了假左派的外衣，并与汪精卫[7]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这个一度曾是全国革命灯塔的城市，而今也为反革命的阴云所笼罩，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否则革命力量必将受到残酷摧残。十一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一年多以前，一个热火朝天的北伐革命，犹如燎原之火，从广州烧到南昌、烧到武汉、烧遍了整个长江流域。而曾几何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这股燎原之火几遭扑灭，只剩下星星火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在此历史紧要关头，继续高举革命大旗，把这星星之火，又从武汉烧到南昌。烧到南方各省、烧到了北伐的策源地——广州。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8]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9]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10]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竑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

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广东省委看到这一形势，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通过党的关系，把大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视与警惕，再加上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从中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活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二时许，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在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

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团长梁秉枢率领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并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红旗几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额，墙上写满了工农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沸腾的、洋溢着胜利的广州了。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总指挥部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11]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12]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13]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但从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来说，经验不足，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的，也是革命遭致失败的原因。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处于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那时候就已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认识还是不足的，而且缺乏积极、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14]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不去积极掌握军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样，就使党没有充分的力量来防止国民党的叛变，和粉碎他们叛变后对革命的进攻。大革命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彻底认识了：中国革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阶层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的军队，没有革命军队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发起的。这是坚决的、也是艰苦的大转变。由此起点，便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工农革命，并开始创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广州起义就绝不是消极的“退兵之一战”，而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党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奋起领导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的反击。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继续战斗了”。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我们当时的头脑，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思想，对农民的力量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15]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末，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注 释

[1]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内的蒋外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三日起陆续南下进军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2]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醴陵、平江、浏阳等县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这里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州岛，所以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办的，一九二六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后来入党的叶剑英等同志，曾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4]陈炯明，曾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发动反

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三年一月，被拥护孙中山的军队逐出广州。一九二五年，其所部武装力量在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的两次东征战役中被歼灭。

[5]张发奎，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6]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广西地方军事集团。一九二七年时与粤系李济深部共同控制广东。

[7]汪精卫，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

[8]陈铭枢，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一军军长。

[9]黄绍竑，国民党桂系首领之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广西省政府主席。

[10]黄琪翔，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1]薛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2]许志锐，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13]李汉魂，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14]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5]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大革命期间，在共产党员彭湃的领导下，形成了强大的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地农民于这年的五月和九月举行起义，都曾建立过革命政权。在同年十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三月。

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我今天的发言准备讲以下四个问题：

- 一、对会议的估计。
- 二、我军当前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及今后的任务。
- 三、完成任务的基本保证与措施。
- 四、在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坚决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

—

根据军委决定召开的第一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进一步促进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在正式开会以前，召开了预备会议，会议于一月十二日开幕，在历时十五天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用了一周的时间，采取先小组会后大会的形式、介绍情况，交流经验，摆问题提意见，使大家不受任何约束地畅所欲言，各行己见。大家除互相介绍了本单位的情况与经验之外，对进一步开展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实际问题和有益的意见。许多同志的发言内容丰富，观点明确，值得仔细研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育和启发。除此之外，在这一周的讨论中，基本上把问题都摆出来了，而且在讨论中逐渐集中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这些问题除关于规划、条令、战役、战史范围内的问题以外，还普遍而突出地提出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完成两年规划与编写战斗条令所确定的任务，因此，必须拿出一定时间讨论和解决有关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问题。会议第二周进入了专题讨论。为了争取时间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以小组会为主，采取了平行作业的方法进行，首先以一天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两年规划纲要，把意见集中起来以后，抽出少数人根据大家的意见研究修改会议文件，然后在讨论组织体制问题的同时，各以一部分人参加讨论战役问题与战史问题，最后又集中力量讨论编写战斗条令的问题。这样总共只用了四天半的时间，一面讨论，一面修改文件，并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向军委提出了一个调整与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组织机构的建议。此外，根据同志们的要求，我们邀请了总参张爱萍副总长，情报部刘绍文部长和钱学森[1]院长向我们作了很好的报告，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总的讲，会议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通过这次会议互相了解了情况，交流了经验，明确了任务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范围，统一了认识，制定了两年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规划纲要，并解决了一些主要的问题，为今后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能获得上述成绩，一方面是到会同志的一致努力，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聚精会神地讨论研究问题，敢想敢说地提出意见，积极踊跃地承担任务，这种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开好这次会议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军委的经常关怀和具体的指导，特别是彭总[2]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了到会的代表并对会议作了重要的指示，使我们的会议有所遵循，这对开好这次会议有决定的意义。同时各总部及各军种、兵种的首长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与支持。当然，我们这次会议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主要是会议的准备尚不够充分，首先是军事科学院在会议以前对情

况了解很差，会议的两个基本文件相当粗糙，发下去也迟了些；其次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准备也不够，有些单位由于工作繁忙，对军委关于召开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通知和附发的编写战斗条令参考方案没有来得及预先讨论。在会议期间，日程的安排与文件的印发也有不少的缺点，但这些缺点与我们上述的成绩来比，应该讲成绩是主要的，会议是成功的。

二

我党我军一向是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毛主席一面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一面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从事军事理论的研究。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极其精湛地阐明了有关战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从而大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我军在异常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从来就很重视总结经验，并研究当时当地的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条件，创造出各种克敌制胜的战法，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不断地改进与提高了我军战术、技术水平。全国胜利以后，各军区、部队、各军种、兵种和院校根据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需要，先后开展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陆续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介绍苏联先进经验与技术革新方面。但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空气很不浓厚。直到一九五六年彭总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适时地提出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并经总政治部大力提倡，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的群众运动一马当先走在前面，学术研究工作也开始有了起色。各军种、兵种和院校初步建立了一些专业研究机构。不少单位开始了修改条令和教材的工作，纪律、内务、队列三本共同条令经过修改，基本上体现了我军的领导制度与光荣传统。总高级步校组织的水网稻田地战斗实验性的演习，也获得了初步的成果。一九五八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军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不仅技术革新的群众性运动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而且以全军动手编写条令和教材为中心的军事学术研究的高潮也逐渐形成，全军的发明创造与合理化建议不计其数，编写和修改出来的条令和教材不下数百种之多。海军舰艇条令一九五八年四月已完成切稿，并对过去所用的教材作了部分的修改，空军飞行条令已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写出，现正着手编写《基本飞行规则》，《航行调度条令》和《伞勤条令》。空军现有的二百六十六种条令、条例部分已经过初步修改，各兵种编写与修改条令和教材的工作亦有很大进展。南京军事学院已编写出合同战术、进攻、防御三本概则和炮兵的三本概则，现正集中一批教员。研究员着手编写各级战术和各兵种教材的初稿，顶计三月底完成，同时并根据编写战斗条令参考方案所提的要求，准备组织一批教员，分赴各军区，结合部队的训练完成编写教材和条令的任务。第二军医大学组织了一下三百多人编写出五十四门课程，八百多万字的教材，除专业技术方面的以外，其军事教材也是自己编写的，其他院校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各军区编写教材的工作更获得很大的收获，北京军区仅在一九五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即编写出步兵从单兵到师，炮兵从单炮到师，坦克从单车到师以及通信、工程、防化、后勤等教材四百一十三种。沈阳军区已编写出排至营的海岸、大居民地、山地防御；排至营的对于有准备防御之敌的进攻和行军遭遇战斗；排、连的山地和夜间进攻；寒带及森林地战斗的特点，营的坑道防御、团的岛屿防御、团师防空降战斗及严寒地区战斗特点等教材。福州军区

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现在已编写出登陆作战概则和各军种、兵种的战斗运用以及单兵到连（有的单位已写到团）的登陆作战的战术教材和射击教材，守备部队则编写了小分队的坑道攻、防战术教材等。广州军区仅四十七军截至一九五八年十月已写出营以下的各种教材二千余份。南京军区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共编写了连、营、团的海岛防御，水网稻田地攻、防战斗以及海岛防御等教材数十种。济南军区已经写出守备部队连、营、旅，师的海岸防御和有机炮部队参加的军海岸防御；步兵营、团的山地防御；步兵团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的进攻，单兵至连的海岸坑道防御以及单兵至连的攻、防战斗等教材。其他各军区编写教材的情况和上述几个军区的情况大体相同，不再一一叙述。当然，所有已经编写出的条令与教材质量有很大差别，其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应当肯定群众这种热情与积极性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其中有不少的材料写得很好。由此可见，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单位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在一两年内陆续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材”的要求，已经主动地做了许多工作，并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以上就是目前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极不完整的概略情况。下面讲一讲今后的任务：

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大体可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当前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这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首先在一两年内陆续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材”，以及“用各种有效的办法来提高我军现代的技术水平，使之迅速赶上并超过技术先进国家的军队”。这次彭总讲话中对今后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又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

他首先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并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是经常的、长期的，只要军队存在一天，军事科学就不能取消，如果忽视这个研究，我们会落后”。这一指示对我们很重要，必须树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是经常的、长期的”的思想。我们安排任务既要从现时着手，又要作长远打算，那种把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看作是一件临时的附加的任务的观点与做法应该予以纠正。彭总还指出了军事科学院的五项任务，即：编写军事史和战争史；编写各种条令、教范和教程；统一军语及对军语的详解；研究技术装备和后方勤务等。他并说这些都要规划一下，组织各专职部门搞起来。由此可见，这五项任务不仅是军事科学院的任务，而且是全军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完成。

在这次会议中，大家根据军委和彭总的意见及各单位的实际情况，本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经过充分的讨论，对一九五九年任务的安排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作了具体的安排。一九六〇年的任务也大致规划了一下。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了两年规划纲要（草案）。总的精神是：一九五九年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以编写我军战斗条令为中心，使编写条令与编写教材的工作结合起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底完成初稿，以便通过实验、试行、审查、修改，求得在一九六〇年内定稿；与此同时以一部分力量继续进行编写我军战史和战役学；各军种、兵种的教令、教程、教范和操作规程等则根据各自的需要与条件自行组织进行。其他关于军语、后方勤务以及技术的研究，在规划中亦作了相应的安排，这样安排任务是否恰当呢？我看基本上是恰当的，因为：

第一，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指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又明确提出“在一两年内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教范和教材”。假使今年不鼓把劲编写出我军战斗条令初稿，势必难于按时完成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所赋予我们的上述任务。

第二，编写教材与编写条令密切相关，二者在实践中必然会结合，应该而且可以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所谓两条腿走路并不否认要有先后交错，我们走路总是要先迈一条腿，再迈一条腿。根据我军的现实情况，各军区、部队、各军种、兵种和院校，首先根据自己的战备与训练任务编写各自所需的教材，一面在训练中不断修改补充，一面根据编写条令的任务与要求，加工提炼编写条令，然后再根据写出的条令进一步修改或重新编写条令。教材、条令，再教材再条令，这样使编写教材与编写条令的工作紧密结合，相辅而行，不仅可以提早完成编写我军条令的任务，而且可以提高编写教材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在编写条令与教材的过程中检验各军区、军种的预定作战方案。当然，也应当承认在同一个时间内既要编写教材，又要编写条令，任务是繁重的，但只要组织得好，是能够做到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提出很多好的办法，如：军以下的单位编写师以下的教材和连以下的条令，军区编军以上的教材和营以上的条令，上半年重点放在编教材，下半年重点进行编条令；以军区为单位组织协作区，一部分写进攻，一部分写防御；根据各个部队驻地情况，这个军编山地战斗，那个军编水网稻田地战斗，等等。至于究竟应采取哪种办法，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决定。

第三，从各单位编写条令、教材进行的情况来看，编写条令与编写教材同时并举也是可能的，各单位早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就已经开始着手编写条令与教材的工作，大部分军区已将营以下的教材写好，目前编写教材主要是提高质量的问题，这样更需要与编写条令结合起来。

第四，关于任务的分配，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认真研究，基本上是根据各单位代表的意见确定的，大部分代表在提出承担任务之前还曾向各该单位作了请示，并得到各单位党委与首长的同意和支持。

综合以上理由来看，经过修改后的规划与方案所确定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是切实可行的。当然也可能有不够恰当的地方，但也不要紧，在执行过程中还可以再修改。

三

一、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党委统一领导，首长亲自动手，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党委汇报，请求党委讨论一次，对于如何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做出具体决定，把这项工作纳入各单位全盘安排的计划之内。特别要注意与有关方面的协作，如与训练机关、作战部门的协作，与政治机关、后勤部门的协作，军区与军区，军种与军种，兵种与兵种，院校与部队之间也应很好地协作。各大单位关于贯彻这次会议布置情况及具体计划、请送给我们一份，以备查考。

二、建立与趁全科学研究的专业机构。这次会议在讨论中突出一个组织机构问题，根据各单位的经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必须党委加强领导，首长亲自动手，发动广大群众以外，还需要调整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专业

机构，军事科学院党委综合到会同志的意见，向军委提出了一个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建设的方案，已经军委一月二十四日讨论，原则上同意。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可在自己编制限额之内，适当调整，建立与本身任务相适应的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军在军训处内增设五个人，师在作训科内增设三个人作为军事科学研究的专职干部。各单位的科学研究机构受各单位首长的领导，军事科学院对其在业务上挂个钩、建立业务来往和业务指导的关系，以求得更好地完成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希望各级党委根据军委的决定，注意精选干部充实研究工作的机构，确实调选适宜于做研究工作的干部、专人专责，亦尽可能保证科学研究干部的稳定性，不做过多的变动，以便于其熟悉业务，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三、研究与实验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要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编写我军的战斗条令，除必须收集、占有、研究必需的资料以外，还要强调实验，通过演习实地去摆一摆。从反复的、各样的演习和实验中，研究出带一般性的原理、原则。各军区可以根据研究和训练任务的需要，进行一些专题的实验性演习。请各单位在拟订编写的计划中，同时列出试验演习的项目，早一点进行研究和组织准备。希望各单位把部队演习的课目、时间、地点及早通知我们，以便有选择地派人参加实习。

四、准备在五六月间开一次现场会议交流经验和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万事开头难。这次会议为进一步开展全军的科学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应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各单位回去以后在实践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在逐渐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中也一定会有许多好的经验，还可能有些问题感到不好解决。

五、军事科学院准备在全军动手的基础上，随着全军编写条令工作的开展，逐步进行综合审修工作，以保证尽可能快地编写出我军战斗条令的初稿。综合审修、加工提炼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需要有相应的时间才能保证质量。因此，要求各单位编写条令时，采取下毛毛雨的方法，军以上的单位写的条令要求都寄给我们一份，以便综合研究，取长补短，写完概则以后就把概则送来，写完一章一节就可以随即送来，陆续送来就可以陆续组织研究。各单位编写的情况希望能经常向军事科学院反映，以便通过我们的刊物，介绍各单位的经验，并适时研究解决一些带共同性的问题。

六、在编写条令的过程中逐步统一军语。在会议中许多同志提出军语没有统一，编写战斗条令有困难，彭总在指示中也明确提出了统一我军军语，编写我军军语详解的任务。统一军语是个重要的问题，几年来也做了统一军语的工作，但由于没有坚定地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所以在军语方面存在若干的混乱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先统一军语再来编写条令呢？还是在编写条令的过程中来逐步统一军语呢？我们考虑统一军语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必要等待军语完全统一后再来着手编写条令，而是在编写条令，编写教令、教范和各种教材的过程中，对于所用的军语，加以研究、斟酌。各编写单位可以提出为什么用这样军语的理由，加以注释，自己没有把握的可以上报。通过上级研究机关的研究，或组织必要的争论，逐渐在编写条令的过程中加以统一。军事科学院应负责研究统一全军的军语，并在统一军语的基础上着手编写我军自己的军语详解。

七、关于加强外军研究与资料的供应工作。在会议中许多同志提出要求

更多地供应外军研究的资料，感觉过去研究工作的对象不明，这个批评是对的。不是说没有明确作战对象，作战对象早在一九五三年军委高干会议上就明确了，问题是在学术研究上并没有把它真正作为作战对象来研究，这是过去研究工作很大的缺陷。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把军事科学院现有的外军研究室，扩大为外军研究部，着重研究外军的军事学术思想、战略，战术和有关的技术。在这方面经常提供有关外军的研究资料。当然这还是一个打算，还不能马上兑现，但我们一定按此方向努力。同时希望各个单位，有条件收集和 research 外军资料的。也尽可能通过各种有效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研究资料提供军事科学院，以便交流这方面的资料。

关于外军研究之间的协作，准备在会议之后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四

毛泽东军事思想、“以我为主”，是我军建军最核心的思想。在会议讨论中同志们一致认为，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想出了一些问题要求加以明确，如：编写战斗条令如何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及如何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来指导战争，指导研究军事科学？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战争的指导思想如何理解？在战术上如何体现阵地战结合运动战的作战指导思想，以我军经验为主和学习苏军经验的关系，苏军的经验哪些学，哪些不学？总结我军经验如何结合现时？从现时情况出发照顾将来的发展照顾多远？编写原子条件下的条令我军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以我军经验为主？的确，这些都是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由于时间的限制，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有些问题是需要在研究编写条令教材的过程中逐步才能解决的。我们准备下次开会时拿出一定时间专门就一些重大的学术思想问题展开来讨论，希望同志们预先做准备，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拿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对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应作统一的理解。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时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这五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分割与孤立来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统帅和灵魂。总结经验，学习友军，研究敌人，都必须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武器。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的制定，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运用在现代国防的一个范例。我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主贵基础，现时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照顾将来就是要看到发展。总起来贯穿着一个“以我为主”的精神。所谓“以我为主”，我的理解是：在我军已有的经验基础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的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以我为主”有主就有次，主次是对立的统一。“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因此，“以我为主”还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敌人。“我”本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将来。由此可见，方针中提到的各点互相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其中主导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有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友、敌和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那末如何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来研究军事科学呢？是不是要关起门来学习几年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再来

编写条令呢？当然不能。因此必须采取学习、研究、生产相结合的方法，边学习、边研究、边总结、边编写。是否应该这样，请同志们考虑。

关于是否编写原子条件下的条令，以及我们所说的原子条件应如何解释，在讨论中有些不同的见解，经彭总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以后，问题明确了，认识上已经一致。我完全拥护彭总的看法。

关于编制、装备问题张爱萍副总长也向我们作了专门报告，明确了我军编制装备发展的概略方向，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当然，在实际进行工作当中还会遇到一些问题难于解决，有待我们在实践中逐步研究解决。

同志们！我的话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以后，经常地把你们的工作进展情况和经验告诉我们。祝同志们工作顺利！

注 释

[1]钱学森，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2]彭总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的意义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建立红军起，已经三十多年了。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长时期内，我军的训练与作战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脱节，但脱离的程度相当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几十年来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战争历程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农村到城市、从低劣装备到拥有现代化装备、从长期反围剿和长期防御到反攻，一直到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最后消灭敌人。在这样一种性质的长期战争中，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方法，除了有些是古今中外战争中共有的，即所谓战争的普遍规律以外，许多是我们特有的。这些特有的东西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是从战争的实际上产生出来的。所谓战争实际，就是深入了解敌人，深入了解自己，深入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敌我双方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当时的群众条件等等。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恰当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战略战术，这就形成了我军特有的东西。这种特有的东西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是在书本上找不出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般战争原则与当时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东西，不是前人所讲过的东西。这种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東西，是土生土长的，是在中国各地区作战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不是任何地方都能产生的，它紧密结合着历史实际，因而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具有各个时期的特点。土地革命时期的原则，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解放战争时期或抗美援朝时期。如果这样做，就是生搬硬套。这些历史实际情况，是每个参加中国革命战争的人都了解的。

战争的实际是这样，我们的训练工作是怎样的呢？当然在部队打仗的同志，直接组织与指挥战斗和战役的同志，由于实际需要逼迫着他们，不能不从对战争的实际研究中解决战争问题。他们从自己组织的战斗中，吸取胜利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也是我们训练工作的一个部分，是紧密地结合着战争的实际的。这些从实战中产生的结论，在几十年革命战争中，也常常用于学校训练中。但是我们的学校训练工作，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由于战斗频繁、经常流动，对我军的丰富的战斗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写出自己的本本。当然，也应当指出，我们主观上对这一工作的注意也是不够的，学校训练中没有能够把我军的丰富作战经验充分运用到教学中去。结果，我们的学生天天吃的是五年十年的“腊肉”，而不是“新鲜的鱼肉”，不能得到像“新鲜的鱼肉”那样的丰富养料。这是造成学校训练与作战不能紧密结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是战争时期，一切要服从战争，只有战胜了敌人，一切问题才能解决，根据地才能发展，军队才能发展，否则什么都谈不上。所以当时实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首先要满足前线的需要，大部被分配到前线去了；而做学校训练工作，又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因此，当时留下来做学校训练工作的，相对地也必然地只能是实战经验较少、而理论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些同志。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还是尽一切可能选调了相当一部分理论水平高、又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同志负责学校训练工作。也有一部分同志是

在部队工作一个时期，又被调到学校搞训练工作。但总的情况仍然是，实战经验较多的干部在前线的多。这是战争需要，不能不如此。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校训练工作不能充分地运用我军的作战经验。虽然也常向前线要战斗经验总结，但实际上用的不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依靠本本办事，形成了所谓“秀才衮衮，不离本本”的本本主义。这些本本是哪里来的呢？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主席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虽然已做了高度的概括，但具体指导战争的经验，由于战争频繁，没有功夫系统地总结出来，少数同志写了些文章，也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本本。自己没有，就用别人的。最初是用国民党的本本，什么步兵操典、队列教范，阵中勤务令等所谓典范令四大教程。这些东西原是德国的，德国传到日本，日本又传给国民党。这一套东西，当然是和我们进行的人民战争很难结合起来的。因为他们的一套本本，是服务于进行侵略战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军队内部的法西斯统治的，因而所体现的精神也必然是脱离人民、单纯依靠军队作战，贯穿着唯武器论的思想。它在思想体系上是与我们对立的，是不能照搬的。但是，这些本本中也包含一些军队作战的一般基础知识和一般规律。只要我们抱正确的学习态度，善于分析，善于取舍，并善于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这些本本还是有一定的用处的。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军训练与作战的脱节。后来在苏联留学的同志回来了，介绍和翻译了苏联的东西，便又改用苏联的本本。

解放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和平环境中，训练工作成为军队中心工作的中心。党用了很大的力量，从全军抽调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到学校和训练机关工作。他们对于培养我军现代化革命化的干部和加速我军现代化革命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一部分搞训练工作的领导同志没有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片面的强调现代化，忽视革命化，在学习外国经验时没有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也根本无视我军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和光荣传统，照搬照套，产生了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已做了批判，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1]。

这样说，是不是否定过去训练工作的成绩，或者说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没有用呢？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过去的训练工作成绩是很大的，训练出来的学生在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成绩是基本的。但也应承认，这样训练确实与部队的情况和实战需要有距离。训练出来的学员回到部队，往往不能立即把部队工作抓起来。在学校学的东西，到部队不能马上有用，而要经过一番研究和加工，才能结合得上。甚至在某些训练问题上，学校还有落后干部队的情况。

长时期来，部队训练、作战与学校训练工作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中间有距离，对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过分夸大距离是错误的，抹煞几十年来学校训练工作的成绩也是错误的；但要承认有距离，可能某些方面距离大一些，某些方面距离小一些，要有分析地对待，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现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是和平练兵。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认真批判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重视自己的经验，又有选择地学习人家的长处，在我军经验的基础上，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编写教材，训练干部。这样训练出来的干部回到部队去，虽然不能说在理论结合实际方面全无问题了，但肯定距离会比较小，结合起来将会比较容易。

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我们在军队训练、制定条令方面需要学习苏联；

历史又证明，我军有丰富的宝贵的经验，但只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后，才能真正地尊重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任务：集中一批干部，一面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的经验，一面吸收人家的长处，把两者融会起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学术，具体表现为各种条令和战略、战役、战术的理论。这一套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是几十年我军经验的总结，是我军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又吸收了人家的先进经验。所以军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在一二年内编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条令。这是我军建军几十年以来的创举，是第一次尝试，意义很大，困难很多。因为这一套东西对我们建军作战，特别是对于教学训练工作很重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吸收人家的东西，创造成为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要经过苦学苦钻才能做到。不仅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如此，编写其他条令也是如此。

编出这样的条令，要求我们的同志要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一定的作战经验和工作经验，还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光是“秀才”是不行的，他们没有实战经验；而有经验的同志，如果没有理论基础，不能把经验系统地概括地上升为理论，也不行。正如一箩珍珠，不用红线穿起来，还是一箩珍珠。这一条红线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把理论基础打好。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们同志的水平还离得很远。水平低一些，条件不够，更要多学习。正像游泳一样，要想学会游泳，就得下水，下了水可能会灌水，但不下水就永远也学不会游泳。我们条件不够，但只要勇于下水，依靠全军的智慧，就一定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注 释

[1]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全军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苏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此，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解放军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从一九五六年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学习苏军经验中发生的偏差，因而，从全军总体上看，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人”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

深入开展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军批判了教条主义[1]，解放了思想，掀起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和总结我军经验的高潮。这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真正的开端。

一、关于继续开展全军科研工作，提高研究质量问题。

(一)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切实作到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内容无比丰富，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实践考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都不能不承认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对现代战争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全军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要想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领会其全部精神实质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下苦功继续深入学习、不仅要学习他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尤其是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不辞劳苦、不避艰险、顽强战斗的高贵品质。

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人民而战斗的一生。为了人民的彻底解放和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而战，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赢得战争的胜利，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因此，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必须“以人民为纲”。编写战斗条令，要作到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首先就要贯彻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的思想。所谓贯彻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的思想，绝不能满足于专写一章或专写一本，更重要的是贯彻于全部条令的各章各节之中。绝不能认为条令一分二之后，有专门一本论述人民战争、人民军队，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在我们编写的战斗条令的各章各节中没有体现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与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那末我们的条令就仍然是没有贯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研究战争的基本方法。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理论结合实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基础上不断与错误的军事路线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坚决反对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与各种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了斗争。在他领导期间，尽管受到多方的排斥与打击，他仍然能坚持真理，顽强斗争，同时又顾重大局，严守纪律。

毛泽东军事思想所以是正确的，就在于他紧紧掌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因此，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他所制定的原理、原则，首先要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研究这些原理、原则是在什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二日，由军事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全军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本文是叶剑英在会议闭幕时的讲话。全文共四部分，收入本书时删去一部分。

么历史情况下、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运用毛主席制定的原理、原则，更要贯彻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首先是对现实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掌握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灵活地运用原理、原则，不是单纯地搬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的词句。

时代的发展，现实条件的发展，不仅给已有原理、原则带来新的特点和问题，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原则。科学研究工作的最艰巨、最困难而又是最光荣的任务就在于此。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各国同时胜利，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已在苏联实现。毛主席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大胆创造新原则的最杰出的代表。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都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依靠长期的工人运动，依靠工人罢工斗争，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然后普及全国。但毛主席却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了另一条路，即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首先在农村建立、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所以，不断发现事物的新规律、创造新原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不承认新原则的产生，科学的发展就会停滞。所以，我们不但应该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主席制定的原理、原则，还应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研究探讨新的原则。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离开毛主席军事思想谈创造，恰恰相反，必须严格遵照毛主席的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思想，并学习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从事研究和创造。

（二）学习“一论”、“再论”。总结我国战争经验。

我军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是发展我国军事科学的物质基础。编写条令必须以我军为基础。

总结经验是为了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这些普遍真理，不仅对我军今后建军与作战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怎样从经验中抽象出普遍真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典范。这两篇文章把无比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加以抽象概括，提出了五条基本原则（后来莫斯科宣言写成九条，内容基本同）。这五条基本原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把普遍真理与具体经验混淆起来。经验是可贵的，是普遍真理的基础，但经验有待于提高。经验有一定的局限性，普遍真理则无局限性。所以，不能把任何一条具体经验都看成是普遍真理。建议同志们再学习一下“一论”、“再论”，学习它总结经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军的经验，毛主席已作了高度的、全面的、系统的概括，但他主要是从军事思想和战略的角度来阐述的，虽然同样指导着战役、战术，但主要的还是讲的战略问题。许许多多战役、战斗方面的经验，还散藏在历史档案中和许多同志的脑子里，需要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以便从中抽出带普遍意义的原理、原则，并把它贯彻到条令中去。

已经总结起来的经验，要很好地研究和利用。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写了几大本。对这些经验，我们是否做了充分的研究？在我们写条令中是否充分利用了这些经验？比如，后勤工作在抗美援朝中的确创造了奇迹，敌人使用了一切残酷毒辣的办法，但我们始终保持了钢铁运输线，粉碎了敌人的绞杀

战、细菌战，保证了部队的供应，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中间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于未来卫国战争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们的条令中必须加以吸收。

更多的经验正在进行总结，尚未完成。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战史都正在编写。我们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编写战史的成果，同时又不能依靠等待，而应该广泛地搜集各种有关的资料，加以研究总结。务必把我军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体现在我军的条令中，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我们的条令是否贯彻了以我为主的方针。

（三）学习外国经验。

我们重视自己的经验，因为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适合我国我军的情况与特点。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观察问题。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不能割断历史。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不是孤立的，一般是从特殊中产生的，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因此，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经验，尊重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在这方面，不能狭隘保守。一切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就注意吸收前人理论的精华，毛主席也是如此。他们都做到了“集大成”。当然不是简单地继承，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扬弃和改造。

军委扩大会议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不是反对学习外国的苏军的经验，而是要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国经验。应该承认，苏军的确有许多好的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参考。苏联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苏军拥有尖端武器技术装备、进行过广泛的试验，又有丰富的现代各种合同作战经验，而我们还没有尖端武器技术装备，现代诸兵种合同作战经验也比较缺乏，为什么不可以学习、研究和参考苏军经验呢？比如未来战争问题，苏联正在进行研究。最近有一位苏联中将军克拉西里尼柯夫，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战争的特点》，刊载在一九五九年第三期《军事思想》上。他分析未来战争，首先着眼于时代条件的变化。第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体系威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第二是军事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各种新式武器。根据这些基本特点，他认为：未来战争愈来愈难以局限于一个地区，局部战争常常是燃起世界战争的火苗，往往会引起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更大的新的世界战争；未来战争既然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而这个阵营又包括几十个国家和几乎全世界的丰富资源，那末，不管现代武器的破坏力多大，要想用几次突击就把对手彻底击败，是不可能的，因而这一场殊死战自然会演变为持久性的战争；既然是持久战争，则战争初期的军事行动，虽然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出现而增加了重要意义，但战争仍就会有中期和后期。此外，他还对军队的发展方向，前线 and 后方，争夺制空权，争夺制海权，以及后备兵员，联盟之间的战争等问题作了探讨。

又如一九五七年中苏朝联合演习，苏军总导演在总结讲评中对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曾作了如下分析：

（1）大大加强了火力，使军队有可能在短促的时间内歼灭和压制最坚固的支撑点、同时向深远纵深实施突击。

(2) 扩大了战役规模，尤其是增加了进攻的速度和战役深度。

(3) 提高了战场上机动的作用，军队应充分利用原子突击效果，迅速集中实施突破，尔后迅速向两翼和纵深发展；疏开战斗队形，使其不成为敌人原子突击的目标；发展进攻的过程中，善于迅速将兵力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以迅速实施迂回和包围。

(4) 提高了遭遇战斗和遭遇交战的作用。

(5) 提高了突然性的作用。

我们也在研究未来战争，像上述的观点为什么不可以研究和参考呢？依我看，上述的某些观点是与我们一致的，取之，可收互相补足的效果；有些观点虽与我们不一致，但也有他的论点和根据，作对比研究可以加深我们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学习外国经验必须以我为主，也就是说学习外国经验是为了有利于我军建军和作战。因此，不能盲目地迷信外国经验，而应采取有选择、有批判的态度。适合我国我军情况和需要的，我们就学；不适合的，或违背我军建军原则与人民战争指导思想的，就不学。

值得提一提的是，反教条主义之后，有些同志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再提学习苏联，怕沾苏联的边，就好像一沾边就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危险，这是不对的。苏军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大胆地吸收。

苏军的经验产生于苏联和苏军的战争实践，他们的武器装备、作战对象、地形、战斗作风与传统都与我们不同。毛主席说过：“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2]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套。但是不适合于我们的，不一定不适合于他们自己。用我们的情况去衡量人家的经验，也是不客观的。

(四) 必须认真研究敌人。

战争是解决敌我双方矛盾的特殊手段。战争的双方都力求隐蔽自己的意图，用尽一切办法来消灭对方。所以，我们研究战争指导规律就必须熟知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朱总司令讲过，对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毛主席也一再讲：“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3]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所以，必须重视研究敌人。研究敌人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敌人的特点和行动规律，明确敌人的长处和短处，以便趋利避害，采用有效的方法战胜敌人。我军过去在许多战役战斗中，采取灵活的战法，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都是建筑在对敌人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

我们未来卫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着重研究帝国主义。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交过手，对他们有一些了解，但很不够，而且敌人的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还应继续加强研究。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朝鲜战争以来，美军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就有不少的变化。如现在比过去重视运动战，认为在现代杀伤武器和现代交通工具普遍发展的情况下，机动战斗已成为典型的战斗样式，很强调运动进攻、机动防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军实施战役，扩大了进攻地带和突破地带的宽度，增大了任务纵深，提高了进攻速度。在一九五七年“黑子”

演习中，集团军战役深度扩大到三百五十至四百公里，比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演习增大了一倍。第一天的进攻速度由过去的二十至二十五公里增大到三十五至四十公里。考虑到双方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美军认为：军队应该疏散隐蔽配置，在发起进攻时迅速集中兵力兵器形成优势、充分利用己方原子突击的效果。以高速度的扩张战果的行动歼灭敌人，而当完成每一具体任务后就要很快分开，以免成为对方原子武器突击的有利目标。为了适应战斗行动的要求，美军在试验与演习基础上，不断改变军队的编制和改善军队的装备。如一九五七年即将陆军步兵师、空降师改为五群制，现在又在作进一步的改变。军队摩托化的建设大大加快，以大量坦克、自行火炮、履带式输送车装备军队，并广泛使用飞机和直升飞机。

总之，美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战术以及军队编制装备等都在不断地变化。我们作战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不适应敌人情况的变化来研究我们的战略战术，就成为无的放矢，也就不可能战胜敌人。

在编写条令时，确定我们的作战原则与作战方法都必须考虑到敌人方面的情况。要考虑这个敌人的国家社会性质，政治情况，经济力量，军队编制装备和战略战术等方面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处。不考虑作战对象的情况，我们编写出来的条令就不能作到有的放矢。

（五）关于照顾将来。

总结过去，是为了从过去的实践中找出经验教训，运用于现在和将来，古为今用。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着眼点不放在现在和将来，总结过去就失去了意义。

要照顾将来，就必须总结过去，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不能凭主观臆测去空谈将来。将来是现实的发展，现实是将来的基础。从对过去和现实的研究中，才能科学地预见将来，否则就是主观主义。

什么是现实？时代不同了，一个是东风压倒西风并继续压倒西风，一个是科学技术发展到尖端，前者是新时代的政治标志，后者是新时代的技术标志，这就是所谓现代条件，一切战争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因为这是现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我国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因此，除充分考虑时代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应着重研究敌我双方的现实情况。

当然，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条件，还要考虑到最近几年内敌我双方可能的发展，这是照顾将来的另一方面。但是预见可能的发展，不能离开现实的基础。

针对现实情况，我们考虑问题还应贯彻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的精神。

未来战争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我们研究未来战争必须考虑到国际条件，但基点应放在自力更生上面。

在未来战争中，可能使用尖端武器，也可能不使用尖端武器，我可能有尖端武器，也可能无尖端武器，但基点应放在我以常规武器战胜使用尖端武器的敌人。

未来战争，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产生了速决的因素；但同时这一场战争又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殊死战争，要在这场战争中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势必作垂死挣扎，因而战争又可能比以前几次大战更为持久；既有速决因素，又有持久因素，但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持久方面。

时代不同，给未来战争带来许多特点，但未来战争的性质仍然是人民战

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思想仍然是未来战争的指导思想，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未来战争，但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人民战争，是在全民战、持久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的战争。人民军队是革命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军队。

我们在编写条令时，应充分考虑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比如对于原子武器，就不只是专写对原子武器的防护一章就够了，而应把原子武器对战术行动的影响贯彻到各章各节中去。如战斗原则中的各条是否考虑到了原子武器的影响，是否应该增加新的原则？军队指挥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步兵以及其他兵种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战斗队形、战斗部署如何才能适应迅速集中迅速分散而又要隐蔽的要求？后方勤务、战斗保障又有什么样的特点？等等。

这些问题是未来战争的问题，但都是建筑在现实物质基础之上的，不考虑这些现实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未来战争。

（六）发扬学术民主。

军委扩大会议以来，学术民主大有发扬，学术争鸣的空气逐渐形成。

学术民主、学术争鸣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争辩，才能显现真理。真理愈争愈明。

目前还不能认为学术民主已发扬得足够了，有些同志还有顾虑，还不敢大胆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些同志还不习惯争辩，沉不住气，所以，还应继续发扬民主，提倡学术争鸣。

民主与争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基础上统一学术思想，统一认识。所以，必要与可能时就应集中，然后再在这基础上继续前进，否则，也不利于科学研究工作，并产生不必要的学术混乱。但是学术问题毕竟不是行政问题，不能急躁和简单从事（当然行政问题也同样不应如此）。学术问题只能在充分成熟的思想基础上解决，要在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靠一纸命令就可了事。当然，也不是说，要等所有的人都无不同意见了才能统一。任何时候，都做不到这一点。但目前钻研学术问题才刚开始，学术论文刚刚多起来，意见分歧是必然的现象，也是好现象。有分歧，问题的研究才能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就得钻研。

二、关于健全军事科学研究组织，训练学术队伍。

随着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一支可贵的军事科研队伍正在形成和发展起来。

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之后，军上都建立了科学研究机构，师也设了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在编写条令和教材、教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编写队伍。这支队伍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如沈阳军区参加编写条令和教材的人员就达一千四百余人，南京军区也有一千余人。但由于这支队伍刚刚建立，刚刚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我军经验，编写任务就压在头上，所以还来不及深入地钻研理论，深入地调查研究，因此，我们这支队伍的学术水平还不是很高的。

根据了解，目前有些单位的科学研究机构还不够健全。为了能在一两年内完成编写我军条令的任务，希望各单位党委在最近期间下决心抽调一批适合作学术工作的干部，把科学研究机构充实健全起来。还应保持科学研究干部的稳定性，不要轻易调动，使他们能够长期做下去，这样才有利于积累经

验，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这也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必需的条件之一。

除加强组织建设外，当前的任务，就是在完成编写任务的同时，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学术水平，既要面向实际，又要认真钻研理论。把眼界打得开阔一些，古今中外军事家的著作都应涉猎，尽可能勿产生两种概念，否则各执一端，学术研究就变成了概念捉迷藏，失去了研究的对象，也失去了争辩的意义。

三、关于建立军事科学体系和统一军语。

科学愈发达，分工愈细。自然科学分为物理、化学、生物等部门。物理学中又分为力学、光学、声学、电子学等部门。分工愈明确、愈科学就愈有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同样分成若干部门，军事科学是其中之一。但军事科学又应包括哪些内容？分成哪些部门？这是我们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解决的问题。

苏联军事科学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军事学术三部分。军事学术中包括战略、战役、战术、军事地理、军事训练等。战略又分为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我们不很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划分。到底应该怎样分？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可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三部分，军事学术中包括战略、战役、战术。但是军队训练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等应包括在哪里？做为军事学术中的哪一项？还是放在战略学里面？

总之，这个问题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不弄清楚，学术研究中就常常碰到范畴划分不明确的问题，造成学术研究的困难。我们在编写条令概则中已经遇到不少这类的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回去研究一下。

军语统一问题，也急需解决。由于军语运用不统一，常常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必要的困难。比如反突击，按照过去军语的概念是属于战役范围的，但听说最近又出现了战术反突击，于是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战术反突击与战役反突击有什么不同？战术反突击与反冲击有什么不同？等等。所以军语必须统一。军语统一，也就是概念统一。我想下半年军委举办的集训应能就某些学术问题作些统一工作。

当然，统一军语不仅是为了便于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在运用时特别是在作战时不致因产生误解而出乱子。不但要在全军统一军语，我们在统一军语时还应照顾到国际的习惯。

至于在军委统一前，怎么办？我的意见：第一、继续发扬学术民主，开展学术上的争鸣；第二、各研究机关作好解决学术难题的准备工作，仔细的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并整理出系统的材料供领导解决这些问题时作参考。

注 释

[1]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全军部队在学习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苏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此，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解放军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从一九五六年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学习苏军经验中发生的偏差，因而，从全军总体上看，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

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

[2]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3]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毛泽东同志以其杰出的天才和智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军初创时期党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基本路线。自此以后，我军便有了一个锐利的武器，无往而不胜地抵挡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使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三十年来，这个决议的光辉一直照耀着我军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里，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解决了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军事领导政治。这些原则是通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来实现的。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决不允许凌

驾于党之上，或向党闹独立性。关于党和军队的这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后来形象地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和大力培育下，就正是这样一支完全听命于党的军队。在过去，它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今后，它仍然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一切军队，都是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及其政党的工具，这本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他们挖空心思地编出许多谎话，来标榜什么军队是超阶级超党派的，硬说什么他们的军队是全民的；对于我们由党来领导军队这一点，发出许许多多极其恶毒的嘲笑、诽谤和攻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分子自鸣得意地，尽力伸长脖子高声叫嚣：你们看哪！共产党人承认他们的军队是由党领导的哩！今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个叫梅里克的美国记者在一篇评论中说：“红色中国的……将军们被尖锐地提醒说，发出开始行动命令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军队。”“共产党控制军队，而不是军队控制共产党。”他好像抓住了我们什么把柄似地那样自鸣得意。对于这一点，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只能说：是的，先生们，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老道理。我们的军队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的。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你们的军队是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由某一个阶级、有了政党以后就由这个阶级的政党领导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乃是天经地义。你们之所以百般隐讳这一点，硬说什么军队是超阶级超党派的集团，那不过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鬼话。难道你们的军队不正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吗？不正是资产阶级老板们用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掠夺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劳动果实的“最顽固的工具”吗？但是，你们做贼心虚，所以要竭力加以隐讳，不过是欺骗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士兵去为你们的利益卖命罢了！不错，资产阶级内部也

这是叶剑英为纪念《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发表三十周年撰写的文章，原文刊载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八一杂志》第一百六十六期。

常常打仗，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常以这点为理由，说军队并不是某一阶级的工具。然而这个理由未免大可怜了。你们内部打仗，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争而已，其为狗则一也。你们不承认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事实，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因为如果你们讲了真话，那你们就完蛋了！

对于我军来说，为什么必须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道理非常简单。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就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军队则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而军队则是以战斗形式完成阶级政治任务的特殊组织。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战争，也从来没有超阶级的军队。战争本身并没有此外的特殊目的，它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军队本身也没有此外的特殊目的，它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武装集团。就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他一切组织，都应当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党是革命的最高司令部，其他一切组织都应当置于党的统一指挥之下。军队当然毫无例外之处。一九四二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我们的军队是党组织的，是当作党和人民的一个重要工具组织起来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军队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军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组织了军队，培养了军队，使它壮大起来；绝对不是为了让它凌驾于党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要争党的兵权，而不要争个人的兵权。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指示。

所谓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所谓我军是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我军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就是一切部门、一切人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对党绝对服从。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把我军武装起来，就是要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不论在什么时期，我们党的政治工作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旧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长远、多么曲折、多么复杂的路程，我们一关一关地过来了。我们过了战争关，过了土改关，现在正在过社会主义关。每过一道关，无不展开多次的、反复的、深刻的政治思想斗争，也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谁做不到这一点，谁就会在重要关头上被摔在后面。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这样不断地洗刷着身上的灰尘而前进。我们的军队也是这样。我军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军队，我军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出身，军队的小资产阶级成分非常之多。从这种成分改造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样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如果单凭这种成分去搞革命，那顶多也不过搞到民主革命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就超出他们的要求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同志，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了积极性，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则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民主革命一旦成功，他们就想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了。我们又看到，有些同志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不巩固，以致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发生了动摇。这是因为即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完全消灭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

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这种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在我党我军内部产生强烈的反映。因此，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前我们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主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一开头就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一指示，对我们是永远适用的。我军如不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头脑里经常摆着党的路线，自然也就不可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而奋斗，就不能充任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从组织上说来，就是要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我军的根本领导制度，必须永远坚持，坚决反对那些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有些有严重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同志，觉得党委集体领导束缚了他们，不能畅所欲言，就搞“一言堂”，以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破坏党委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断，企图用个人领导去代替党委领导。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来实现。从一九二七年三湾改编[2]时起，毛泽东同志就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就指出，“支部建在连上”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之一。南昌起义[4]的部队当时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把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于士兵，达于全部队，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连队支部是巩固党的领导的坚强堡垒，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的基层组织，是连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连队每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和中心工作，除紧急情况外，都必须经过支部，实现集体领导。这是我军组织建设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为了实现党的绝对领导，还必须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军队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早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党中央发布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就有了规定。决定说：“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地执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又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布了《中央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指示要求军队在进行训练和施工、处理内外关系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尊重同级和所在地的最高地方党委的意见，接受其监督和服从其领导，并在同级和所在地的最高地方党委的统一安排与统一领导下进行”。

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我军永远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员就是党的工具；要时刻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遵守党的纪律。

我们党所以有坚强无比的战斗力，就在于每一个党员，不论他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负责干部，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我们在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的时候务必不要忘记这一点。如果把党比作一个学校，那末每个党员便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中央是先生。

每个党员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了多大贡献，该打多少分，是五分、四分，还是三分，自有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中央来评定。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不计报酬，埋头苦干，而决不可以向党伸手，要这要那，决不可以向先生争分数；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做一个好学生，而不要做一个坏学生。这就是说，要努力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要有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有党性不要有派性。只有这样，全党全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实现党的一切意图。派性，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东西，它是削弱党的团结，涣散党的纪律的腐蚀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完全背道而驰。而我们的党性，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要增强党性，要同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和分散主义等等违背党性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就是针对当时军队个别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自由行动、标新立异，在组织上自成系统、个人专断、实行家长统治、进行派别活动、把他领导的地区搞成一个独立王国，在思想意识上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突出个人等危险倾向而发的。党中央发布这个决定已经快二十年了。随着党和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获得的巨大胜利，我军成员尤其是干部的党性有了极大的增强，绝大多数干部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经得起考验，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而奋斗。但是，也有少数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抱着资产阶级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没有党性或派性多于党性，他们个人主义的私心很重，朝朝暮暮，尽为个人打算，把个人和党的关系位置完全颠倒过来。这种人，如果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发展就会害了革命事业，也毁了他们自己。

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大。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着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我军要继续加强现代化建设，学习苏军和兄弟国家军队的先进经验，更好地学习掌握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科学和技术，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全军的战术技术水平。在进行这一切工作的时候，都要有党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军永远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在纪念《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发表三十周年的时候，让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性锻炼，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永远朝着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前进！

注 释

[1]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2]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顿和改编。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的小组，营、

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确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3]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三日起陆续南下进军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正确估计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

一、对战争的估计

对战争的估计。在目前还是毛主席经常讲的，从整个政治形势来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且继续压倒西风。现在，敌人的内部并不是那么协调，美、英、法、西德、日本之间相互争吵。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帝国主义本身是很大的打击。战争第一是打政治，第二是打技术。政治上是东风压倒西风，技术上某些方面美国又暂时落后于苏联，处在导弹落后时期。因此，对进行战争的问题，帝国主义阵营内意见并不一致，对要不要下决心打一场战争发生了犹豫，有的倾向于中立，反对战争。我们对战争的估计应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一个是帝国主义存在，帝国主义是要战争、要侵略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受目前政治形势、技术形势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战争又打不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两点论：战争有爆发的可能，也有打不起来的可能。我们打了几十年战争，过去在国内估计各种形势时，都是把战略和策略的基点摆在危险的方面。战争打起来了，估计到了，就有了准备了；打不起来，也没有什么损失。如果一切基点放在打不起来，真的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两种可能存在，重点应该放在可能的方面。有阶级存在，有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应该估计到这一点，把重点摆在这里。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近几年打不起来，不管是三年、五年、或者八年打不起来，我们都要坚持一种积极的方针，那就是如何在这三年、五年、或者八年内，利用这个短短的历史时期把我国的工业、国防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来。苦战三年、苦战五年、苦战八年，趁这个时期，努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更远的看一下，如果三年、五年以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了，技术也尖端化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了，东风将更加压倒西风。当我们取得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压倒优势时，那时敌人想打也不敢打了。

战争打不起来，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能，两种可能，还是存在。原因很简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下历史舞台，不可能像我们看舞台上演戏一样，表演一番之后自己下台，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统治世界多年，要它自己自动退下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目前虽出现短时间的和平，但我们不要被这短时间的和平所迷惑，要抓紧时间高速度发展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如果看不到阶级存在、帝国主义存在，看不到战争危险，放松警惕，不抓紧经济和国防建设，那是和平主义。如果认为马上要打起来，一切为了准备战争，那自然要减少经济建设，不敢大胆从事经济建设，不把经济建设作为国防建设的基础，那同样是错误的。国防建设最可靠的力量是什么？毛主席讲过两句话：第一是人民战争，第二是现代条件。应把这几十年最宝贵的人民战争思想作为灵魂、核心。当然沿海几千个工事，几千架飞机，几千门大炮，这也是力量，是物质力量，但最可靠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物质力量必须通过人民，通过人的作用才能发挥。战争要通过人民掌握武器，关键是如何组织人民的

这是叶剑英在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上校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当时叶剑英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广大力量。在战争初期，我们的常备军要顶住敌人，不让敌人毫无阻挠地给我们以大的破坏，尽可能用积极防御的办法打击敌人，就是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对付现代条件下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敌人。在现代条件下作战，要做到政治上不动摇，军事上巧妙组织指挥，撑得住敌人的第一个浪头，靠的仍然是军队政治质量和军事技术的提高。正如毛主席早已指示的，建立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才能顶得住战争初期的严酷考验。

我们几十年来有一个经验是搞民兵。要把广大的民兵普遍地组织起来，重点地装备起来，如在首都、各省的省会、工业基地、主要的交通枢纽、重要的仓库把民兵装备起来，不是红缨枪、梭标，也不只是有步枪，而且有自动武器、轻炮，配有防空的设备和通信工具，有独立的作战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独立支持。同时，事先训练人民防空、防毒、防化学，平时有适当的工事进行自己的防卫。今后的战争是长期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性的。现在美国也承认战争的长期性，批判那些认为现代化的战争是短期的观点。只有靠广大人民、雄厚的资源，才能进行持久的、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只有进行人民战争、全民战争，否则不可能坚持下去。未来战争是什么战争？是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所处的时代是现代条件，本质是人民战争，这是最核心的所在。

现在我们应该好好计算一下时间，珍惜这个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向现代化前进。究竟多少时间？我们计算时间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为标准数、基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二十一年和平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十四年了，也还有七八年时间。按敌人自己的看法，是还有三年，它要在三年内赶上苏联。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耳罗伊说：目前在美国是处在导弹落后的时期。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是赢得时间。时间拿来干什么？在导弹技术上赶上苏联。美国有一个导弹专家说，苏联导弹可以打一万三千公里，他们顶多打七千至八千公里。因此他们承认落后。一九五九年曾用很大的国防经费发展尖端技术，集中全国的高级干部、专家调到导弹生产部门，参加导弹生产。国防经费中以百分之三十九搞导弹，准备在一九六三年前赶上苏联。他们要把整个装备改装成导弹时代的，全部导弹化，陆、海、空三军整个部队搞成导弹的体系。他准备在一九六三年完成，计算时间是三年。如果还有三年，我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如果八年打不起，我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如果十二年打不起，我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如有了四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工业体系，可以建立起来了。大约那时可以基本上达到现代化的规模，达到真正现代化的阶段，那时我们国家将又富又强。要好好努力。最近的三年有决定意义。从时间上说，有可能三年，如果是八年，最重要的也是这三年。

总的是要抓紧时机，努力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大部分搞经济，也不放松国防力量，不是增加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历史上总是先富国而后强兵。经济上把现代工、农业建设起来了，育了基础才可能有现代化的国防。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没有现代化的国防。但也不放松在现有条件下提高国防力量的质量。

整个国家的力量安排如此，军队本身也有自己的任务，要利用这个时间集中搞现代化的工业。整个国防力量，包括汽车、工兵用的机械、交通运输工具等等，除了战备所必须掌握、控制的以外，尽量支援地方上的经济建设。军事费、行政费适当减少，增加到经济建设方面去。军队对经济建设还要担

负适当的任务，包括以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在一定时间内支援国家建设，这也是军队自己本身的任务。是否和国防建设发生矛盾？没有。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也是为现代化的国防创造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有现代国防。每年部队有多少劳动力、多少技术力量可以参加国家经济建设，要有个计划。如院校过去一年十个月训练，考虑参加政治运动和支援地方建设，使用于教育的时间可以为九个月，或略少于九个月。要在自己的训练计划中自觉地抽出部分时间支援国家建设，要把它纳入计划。工兵哪一个师、哪一个团，可以用多少时间搞水利，也要订个计划。如没有计划，地方上的需要和军队的工作就可能发生矛盾，有了计划就可以双方事先协商和统一安排。党中央发了通知给各省、市委，要他们提出对军队的要求，同时军队也对地方提出要求，两方面的要求都摆出来，哪些可以办到，哪些办不到，不要无政府，应该有计划地安排。部队、院校一年有多少力量，搞多少时间，大体定下来，纳入计划。支援地方建设不仅用现有装备的技术力量，在军工生产上也要抽出力量支援地方。现在工业生产还不成体系，协作没有搞好。机器大部分生产出来了，可是少一样东西，就不能出厂。军队也是如此，武器、装备也如此，大部分搞出来了，重要的几样没有搞出来，不能配套，生产了有什么用？不配套的不搞，轻武器够用了的不再搞。今年国家配几十万吨钢材，我们主动削减二十万吨，少生产，少要钢材，使更多的钢材用于现代工业建设。另一方面，在军事技术方面，加强研究、设计、试制。试制成功了，小量的生产，装备在少数部队。比方说让实验部队、模范部队、教导部队、学校去试用，在试用的实践中提出新的要求，再研究改进技术。这样大力来搞研究、设计、试制，军事技术本身不断提高，国家建设也得到支援。军队不仅拿枪保卫建设，而且自己本身实际参加建设，包括部队和工厂、有生力量和技术力量。这样，国家建设的速度提高了，真正现代化国防的实现就能更快地到来。这样是快呢？还是慢？是有利于和平？还是不利于和平？问题就很清楚了。

二、关于国防建设

我们的国防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是党中央提的，对不对？完全对。所谓积极表现在什么地方？根据几十年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给了我们启示。毛主席曾批评过李德[1]是两个拳头。两个拳头还算有拳头，如果一个拳头没有，就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了。积极不积极看看有没有形成拳头？拳头有数量和质量，看看整个国防的布局有没有形成拳头？准备有计划地、适时地拿出拳头反击，给敌人一个打击，这个国防建设就有积极性。

所以我们要看，第一，拳头如何形成？第二，拳头摆在哪里？第三，什么时候拿出去可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两个人打架，一个手抓，一个手捶。战争也和人打架差不多，一个防、一个攻；一个手抓、一个手捶；一个钳制方面、一个突击方面；一个主攻，一个助攻。究竟拳头放在哪里？你用左手去抓，无非是便于出右拳。

根据对敌情的周密研究，根据现阶段国防力量的情况和整个国家的地势，我们确定了正确的方针。表现为有准备，有预见，组成突击力量，在适当的时机给敌人反击。因此国防建设上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

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使用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战争发动不一定在前

沿开始。这我讲了几年了，从辽东半岛演习就讲了。敌人尽管和我们隔了太平洋、日本海，敌人要从海上来，但战争不一定从前沿开始，很大可能从纵深开始。首先是空战，彼此争夺制空权。在取得制空权后，敌将用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破坏、瘫痪我方防御、选择有利地带空降，开辟新的战场。这就是说，敌人可以用空中的力量，在空中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不从海上来，也可以下从陆上来，从空中来也是个坦途。在积极防御的方针指导下打击敌人，首先要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保存自己，首先保存脑袋。党中央和国家首脑机关、领导机关、军事指挥中心，这些在哪里？在后方。其次，赖以长期支持战争的是工业基地、交通枢纽、物资仓库，这是要紧的。对此，敌人可能从空中来打击。敌人的远程空军、导弹，都可以一直打到我后方。如果没有现代战争的观点，结果敌人电钮一按、集中空袭，我们可能会遭受严重损失。现代战争确实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而且确实打得准。苏联讲苏联的导弹能打到地球上任何角落，并不是吹牛。我们自己的演习，二万公尺以上的飞机，一按电钮，的确打下来了。不相信这个就是不相信科学。前线做了二千多公里的坑道，但有的大城市连一条沟也没有，这是没有科学，不相信技术科学。所以这次提出积极防御，一方面固守前沿，同时要保卫后方。美国空军司令讲他们战略空军的轰炸目标，第一是政府首脑机关；第二是军事指挥中心；第三是交通枢纽；第四是重要仓库。整个国防建设必须考虑到后方问题，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后方比前沿更重要。要抓紧两头，准备中间。两头是一个前沿，一个后方。

前沿又有分别。我国滨海，我们要巩固前沿就有个岛和岸的问题。过去没有深入研究，只在岸上做工作，未考虑岛的问题，或是考虑了但没有同陆军和岸上联系在一起考虑。巩固前沿、沿海，海岛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固守岛子的意义有二：第一，可以掩护大陆，岛与大陆的关系是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第二，海岛与海军的关系是游子与家庭的关系，如岛子都搞光了，长山列岛、庙岛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都搞光了，海军就无家可归了。因此，建设岛子在一定意义上比岸还重要。有岛有岸，岛重于岸。应该把大连以东的长山列岛、大连与蓬莱之间的庙岛列岛、上海和宁波之间的舟山群岛、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以及海南岛都按国防的要求建设起来，一方面屏障大陆，一方面给海军安家。就是敌人伸到大陆来了，这些岛也要死守。要用很大的决心和相当大的力量来建设海岛。当然岛子也有重点，如舟山群岛一共二千多个岛子，不能处处设防，要有重点。沿海的工事不是一万几千里，某一地段的工事不能停、要加强，某一地段的工事要坚决下马。摆拳头的地方工事要加强，不摆拳头的地方可以布置口袋。又有前沿，岛屿为主；又有后方，脑袋为主。北京市就要用现代的技术，保护脑袋。抓这两头，中间地带则准备设计方案和材料，到适当时候施工。国防工事也要在现代条件下考虑，也要考虑野战工事的构筑。纵深第二线的工事可以备，需要时再用。两头要抓紧。根据防御的需要，对工程的要求是防原子、化学武器重于防一般常规武器，重点地区要有坚固的工事。

三、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

美国人强调在战争开头两三个月给对方极大的破坏和瘫痪。这对欧洲国家，因其地方小、工业集中，可能有用，对于中国不行。我们地方大，工业

疏散，后备力量愈战愈强。不能把后备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放在国防计划之外。

值班部队是重要的。苏联的和平工业在战争的头三个月内可以转变为生产武器，从平时转到战争要三个月时间。如果我们也以这个作为要求，头三个月正规军要撑住，后备力量就上来了。如果国防计划忽视这一点，就根本错误了。在武装力量建设方面、应该兼顾常备军和后备力量，后备力量应作为重点。当然所谓重点不是说民兵的装备和训练要比正规军还好。正规军少，更要提高质量，但最后决定性的是后备力量。因此，在人民武装的建设中，常备军首先是人民武装的值班部队，同时又是为后备兵源储备干部的机关、补充后备兵干部的机关。对正规军有这样的看法，即要有新的观点，技术比重要增加。美国武装力量建设，陆军主要是三个兵种：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和空降兵。因为只有这些兵种才能赶得上核武器爆炸以后的时机，及时突入敌人纵深内部打击敌人。放射性沾染的地区，步兵走路是不大好过的，步兵走到了，缺口又被堵住了。我宣传直升机有一两年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区很难通过，空间的兵种要大发展。我看空军也要两条腿，一个飞高、飞快、飞远；一个飞得慢、飞得低，能沿着地面、海面、屋顶上飞行。技术兵要增加，而且整个军队中技术兵的比重要增加。不仅技术兵要应付战争的第一阶段，后备队伍补充的新建兵团也需要技术兵，其来源除工厂里的和一部分预备役里的，很大一部分靠常备军里的技术力量。因此，陆军的建设要适当地增加技术兵，适当地减少步兵，这是常备军建设的方向。

过去十年没有一个师是做到满员、齐装、全训的，都不满员，兵和官都缺。装备是有这个，没有那个，装甲、火炮应装备的没有装备上去，也没有全训。现代化的军官，不受学校训练还行呀？据六个师的调查，排长有百分之五十是没有经过学校训练的，连、营、团三级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干部没有进过学校。有些到学校学习过的上调了、退伍了、转业了。这样部队训练出来就不可能体现我们的条令、战术。战术训练是人与武器的结合，分队与分队的协同。野外演习是战斗训练的高级形式。通过演习，研究编制，确定编制；研究装备，确定装备；研究条令、确定条令。搞它几个月，把编制、装备、条令确定下来。

海军也是一样。按现在的工业水平，我们不能单独地和敌人在海上作战。海上的大目标便于敌人侦察、射击，远远地就命中了。美国是海上强国，海上还搞大的，但也不搞大巡洋舰了，搞大航空母舰，装备有导弹的。我们不搞大家伙。

空军也是两条腿，如果失去制空权，不能飞向高空、中空，可以在低空活动。如直升飞机、每机乘八十人，一小时飞二百公里，一个夜间如用六个小时可以机动一千二百公里，这给部队机动增强了很大的能力。直升机不只是运输器材，可以支持地面部队机动，参加作战。我认为直升飞机可能是有人驾驶飞机最后的一种形式，可以垂直飞行，也可以水平飞行。要固守岛屿，如果没有直升飞机和大陆取得联系和补给也不可能。虽然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如果没有物质支持也很困难，直升飞机贴在海面飞行，敌人的雷达不容易发现。

关于常备力量的建设，要在新条件下、现代条件下考虑这个问题。要抓尖端、抓民兵；少搞常备，多搞后备；少搞常规，多搞尖端。

建设民兵，第一要从思想上提高到战略地位，普遍组织，重点装备。要

配备骨干民兵，有一定水平的装备，选择重要地区配置。第二是国防体育要提到应有的位置，陆上运动、海上运动、航空运动都要搞。过去对此并不重视，殊不知这是储备后备力量的最好的办法。从滑翔训练，可以出空军。从熟悉海性的运动可以出海军。我们军队强调现代化，多搞技术兵，不是一两年可以养成的。有人认为义务兵三年，刚刚学会装甲兵的技术，又退伍了，这对军队有损失。其实这些人退伍以后对地方有很大支持，给他们训练了技术力量，可以支援生产。要打大算盘，不打小算盘。培养纯熟的技术员不是三两年的事情，为加强正规军的技术兵种，也可以搞一部分志愿兵。兵役制度也可以考虑义务兵、志愿兵和民兵的结合。武装力量的建设包括常备军和后备力量。

军工生产也是如此。提高国防力量，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不管配套不配套，盲目生产，大量生产轻兵器，而要力争上游、爬上尖端。常规的，加强研究、设计、试验，提高技术水平。适当制造，少进口。技术研究水平要大大提高。要少生产常规武器，大量生产民用机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基本建设没有搞好，生产不配套，因此要少制造、少进口，多搞基本建设。基建重于制造。搞下去几年以后就能配套生产了。突击尖端，注意一般，尖端先搞导弹。未来战争是现代战争，许多有关问题，美英等国在报纸上公开争论。在中国过去讲都不能讲，使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对常备军不讲在现代条件下训练不是现实的。美国有一个人讲：“核子武器的使用，对于人精神上的恐怖可能比冲击波、光辐射等破坏能力造成的后果更大。”意思是精神上的恐怖大于肉体上的杀伤。因此，要加强人的工作。对原子武器必须讲清楚，如果我们根本不讲，真正战争一来，要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解原子，才能不怕原子。了解必然，才有自由。国防的整个建设都是如此。

注 释

[1]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中国。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现代科学技术

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新办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五月)

—

根据我军十年训练情况看来，目前全军高级干部对现代战争的各门科学技术知识甚为缺乏。不仅对尖端技术知识不大了解，就是对现有常规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及战斗中的运用亦缺乏应有的研究。合成军队的首长，不大懂得各军种、兵种的专业知识，就不能熟练地指挥各军、兵种联合作战；各军、兵种的专业干部，不了解合成军队的全面知识和各专业之间的技术知识，就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主动地相互配合。为弥补这一缺陷，研究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采用最简便的、最易引起兴趣的方法，直观的方法来解决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人员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敢想、敢做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打算在军事科学院建立一个“军事技术研究馆”，把我军各军种、兵种现有的主要技术器材和新的技术研究成果（包括常规的和尖端的）模型，用实物、图表、照片、电动解说图等多种形式设置起来，抽调一部分专业技术干部担任教研员。这样就可以使全军高级干部分批轮流到此馆来研究新的专业技术知识；同时也给军事科学院和全军的科学研究人员，以及高等军事学院的学员建立一个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极好条件。这对提高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人员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研究战术和研究技术密切结合，相互推进，均有重大意义。

军事技术研究馆不同于一般的陈列馆和展览馆，馆内的设备也是机密的、新的军事技术器材。到这个馆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人员，也只能限于我军高级干部和军事科学研究人员。当然从全民战争观点出发，我们也欢迎省、市以上负责干部来研究。

我们于十二月四日召集各军种、兵种、总后、装备计划部、高等军事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军事技术研究馆的性质、任务及建设规模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军事技术研究馆，从目前我军建设来看，是十分需要的，除表示积极支持赞助外，与会同志并提议及早修建，争取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以前建成，作为向党四十周年的献礼。

军事技术研究馆的规模，根据各军种、兵种、总后等单位初步提的意见，从现有的主要技术器材（常规的、尖端的，我军、友军、敌军的）可在馆内设备的实物、模型、图表、照片以及教研室、小型放映室等所需占用的面积，共约二万至三万平方米（以后随着发展再行扩建）。建设这样一个军事技术研究馆，仅馆房的基本建设，约需三百至四百五十万元。馆内设备，另由各军兵种，各有关单位自己设计、制做、安装，所需经费再由各单位另行报销。

为加强筹建“军事技术研究馆”的领导，建议组织一个筹备委员会，并拟由以下二十二同志组成：

叶剑英、王树声、张爱萍、刘志坚、张令彬、杨至成、刘道生、王秉璋、匡裕民、邓家泰、徐德操、张迺更、李景瑞、何辉燕、安东、方强、杜屏、

这是叶剑英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二年五月关于筹建军事技术研究馆的建议和几次讲话的内容节录。

贺诚、唐延杰、叶楚屏、贾若瑜、高文智[1]。

在筹委会下设一办公室，由杨至成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叶楚屏、贾若瑜二同志任副主任，拟临时抽调各有关单位的技术干部一两人参加办公室工作。待军委批准后，即开始进行筹建工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七日写给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军事技术研究馆的建议》）

二

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

1. 研究对象：我们将来所进行的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它要求党政军各系统的各级的负责同志要掌握一定程度的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所需要的技术、战术知识，因此军事技术研究馆的研究对象应该照顾到上述情况。就是说参加研究的成员，不仅有军队系统的，而且还有党政地方系统的。军队系统是合成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各军兵种高级指挥员，高级院校的教员，机关中的高级干部。党政系统是指地方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兼任了解放军的和民兵的高级政治委员和军事工业中的厂的高级领导职务，他们忙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时间来研究军事技术和战术知识。但现代条件下的全民战争，不仅各军兵种要协同，党政军民也要协同。因此我们建馆计划中的一个综合馆研究战役法（有的馆如空军也要搞战役法）。各分馆搞技术、战术，然后进一步搞诸军兵种的合同战术。再后就是搞各军种、兵种的合同战役。

2. 陈设品的内容：有尖端也有常规（是与尖端结合的现代常规），有基础知识，也有专题作业；从技术、战术，一直到战役法。技术展品还要本着新陈代谢的原则不断更新。今后新东西肯定会陆续不断地出现，我们就必须逐一加以研究，研究其对战术的影响。我们不能等到全部革新和完全定型了才去研究。

3. 研究的组织：钻研技术和战术对战术影响的时候，要积极主动地组织全军干部来研究。钻研技术时，各分馆，按照专业系统，由各军种、兵种、院校来召集；综合馆研究合成军队战术、战役的时候，按照每一次集训的计划，按照研究的课题，按照作战编制中各军种、兵种的比来组织。如研究进攻、防御、抗登陆战役时候，则根据作战编制的比例，确定空军、海军、陆军各以多少人来参加。只有分工合作，共同组织，大家研究，战时才便于组织协同。技术走向尖端，干部要求全能，既要了解自己的，也要了解别人的。我们组织研究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合理地调配人力；集训要分期、分批，有计划、按比例地去做。研究的内容既要精干、又要丰富，研究的形式要活泼生动。这样就能钻研得更深。

4. 军事技术研究馆的研究工作和各军、兵种的专业研究工作，会不会重复：

我们认为是不重复的，而是两条腿走路。第一，军兵种主要研究各军、兵种的专业知识，军事技术研究馆在各军兵种研究的专业基础上研究合成军队的合同战术、战役法，是从合成军队的角度来研究和考虑问题，所以不会重复。第二，同军事院校的训练也不重复。军事院校是进行基本原则和基础知识的训练，主要根据条令实施的，而军事技术研究馆是根据新的技术对战

役、战术上的运用进行大胆的设想和探讨（它是正在研究中的，尚未定型的东西），如果以此作为院校和部队训练的依据，将会影响院校和部队正常的训练。为了使军事技术研究馆所研究的成果，与院校、部队训练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把研究的问题经过反复实验比较定型后，补充到条令中去，再作为院校、部队训练的依据，进行教学、训练。这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是两条腿走路。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在军事技术研究馆第三次筹委会上的讲话）

三

直观教研馆的任务，在使我军师以上高级指挥员对各军兵种的编制、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战术运用以及在战斗中的地位、能完成什么任务等有个系统的了解。了解各军兵种都有哪些部分组成，现有什么技术兵器、器材和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敌人和兄弟国家的武器、装备、编制情况。了解了各军、兵种的专业技术知识，还要系统地了解各专业兵种的战术知识，如炮兵开始是火力准备，尔后是火力支援、火力转移等，学会根据战术要求运用火力，支援友邻部队。这些，各军兵种都是有的，但合成军队指挥员必须了解各军、兵种的专业知识，否则，工作是有困难的。兵种指挥员主要是搞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要了解兄弟兵种的专业技术、战术知识，如果不了解其他兵种的专业知识，将来在战斗中就无法进行协同。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在发展，战术思想也在发展，但现在的战术思想还不够统一，如此打起仗来合成军队就会合不成。

军直各总部机关，平时对各军兵种的专业知识也要了解，因为打起仗来全军是一个整体，不了解各军、兵种专业知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也难做好。省军区也要懂得一些，当然他们主要是搞民兵，但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懂得什么是现代战争，如反空袭、反空降等，因现代战争往往一开始不是发生在前方，而是首先在后方打起来，要研究如何组织民兵协同作战。

政府机关党政干部也要了解现代战争，由于对现代战争特点认识不足，过去没有很好地去准备，如国防工事、工业布局、交通布局等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上海、西安、兰州等地工厂过于集中，目标过于暴露；上海、南京、宁波地区没有一个桥能够通过坦克，道路很窄也不隐蔽；这一点我们比朝鲜落后了，他们很多工厂都已经在地下了，早已结合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可见有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也不懂得这些，这就是没有现代战争观点。为此各军区也想搞，就是不知怎样搞法。我们怎么搞法呢？谁都没有经验，我们任在北京的各军、兵种、机关、院校来共同搞一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也给部队、院校、机关一个学习的机会，了解现代战争是什么东西，以便根据获得的知识来联系检查自己的工作是否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我们搞好了，各省、大军区也可这样搞。

先搞技术，再搞专业战术，以后再搞合同战术；搞合同战术主要是搞带通信工具的室内演习，从而提高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和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搞好各军、兵种的协同动作。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来，比如今年北京地区的来、明年南京地区的来，这样一年一年地进行。

要使指挥员了解我军现有装备和今后的发展，了解敌人、友军的装备、

编制，使大家了解我们生活在原子时代，人家有电子、原子、红外线、雷达、各种飞机和运输工具，和以前不大相同了。我们装备是什么水平，人家是什么水平，使来学习的人员对敌我情况都有个比较，注意研究在战争中如何运用我们手上现有的武器打败具有现代装备的敌人。过去设想我们自己有好多原子武器，那是教条主义。我们要设想在原子条件下训练部队，设想将来打起仗来敌人使用原子武器，我们是常规武器，而且还是比较差的常规武器，部队还没有机械化，还只是骡马化的。不了解人家有什么武器，就无法对付它。知己知彼，力争主动，我们军队掌握了这一点，战斗起来就有把握；我们的军官掌握了这一点，战争起来就不会为敌人的原子武器所恐吓。要研究怎样减少伤亡，躲起来待机消灭敌人；要承认原子武器、核武器的破坏杀伤力大，但使用这些武器后，还要用地面部队才能解决战斗。最后决定战争的是人，我们在近距离内消灭敌人，不与敌人比高、比远，显示我们二百米内的威力，避开敌人的长处近距离给敌人以杀伤、疲劳它、消灭之；在中距离主要是迟滞、破坏敌人。这就是以我之所长，攻敌之所短。过去有个赛马的故事，一个人以自己的下马赛人家的上马，以自己的中马赛人家的下马，以自己的上马赛人家的中马，结果不是以二比一赢了吗。我们白天不行晚上打，平地不行山地打，远打不行近打，高打不行低打，所以只要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了。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敌人是跑到太空里去了，而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发展和部队技术装备水平，不是所有同志都了解的。将来的装备发展是另外一回事，问题是现在如何对付敌人。

我们所以要在这一搞这个馆：

- 一、我们是从长期打算，培养、训练干部；
- 二、不但要搞专业技术，还要搞专业战术和合同战术；
- 三、这个所也是为院校和科研机构服务的。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科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战略、战役、战术是理论科学，还要发展技术科学。技术决定战术，研究理论不能凭空搞，研究军事理论的人必须懂得专业技术知识，所以研究机构也需要使用这个馆。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在军事技术研究馆
教研方案起草小组会上的讲话）

注释

[1]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王树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令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杨至成，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匡裕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邓家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参谋长；徐德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张迺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主任；李景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何辉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参谋长；安东，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方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杜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贺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延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叶楚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当时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高文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

研究未来战争特点和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

我们开展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要遵循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指针，以我军经验为基础，研究现代战争，并以研究的成果指导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军队训练。现在我本此精神就有关未来战争和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几个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

第一个问题，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下，探讨未来战争的规律。

毛主席告诉我们：“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1]因而我们在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那末未来战争所处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它的性质如何？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这些特点来指导我们的国防建设？我认为：

一、未来战争所处的客观情况。

政治上是“东风压倒西风”，并将继续压倒西风的时代，“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技术上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原子、导弹的新时代；

我们的敌人虽然拥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新的技术装备，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远涉重洋进行侵略战争，政治上不得人心，兵力分散，人力有限；

我们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党和毛主席的坚强领导，内部团结一致，人民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雄厚，文化科学事业突飞猛进。全民皆兵，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是在本土作战。

把上面四点联系起来说，就是：未来战争是帝国主义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新时代的战争，这个战争又是在原子、导弹等最新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只有经过艰苦、顽强的长期斗争，才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我们研究未来战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

一般说战争打两门：第一打政治；第二打技术。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加上技术决定战争的样式。因此，未来战争，就敌人方面来说，是现代条件下的侵略战争；就我们方面来说，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我们未来战争的性质，现代条件是进行战争的时代特点。

在这个时代一旦爆发战争，其特点就可能是：

(一)全民战。战争规模将空前巨大，尽管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存在，但局部战争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战争将会在广阔的空间（包括空中、地面、海洋）进行；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将空前巨大；战争不仅是复杂的、残酷的，而且是长期的。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规模的巨大，因此，必须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正如毛主席所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我们“动

这是叶剑英在武汉召开的条令审稿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列宁也曾经讲过：谁的后备多，准的人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二）总体战。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继续，它并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除武装斗争而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还继续着极其紧张而广泛的斗争。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总和。我们在布置、准备应付可能的战争时，不能单纯从军事上着眼，要努力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加强思想教育，坚持政治挂帅，为总体战进行准备。

（三）立体战。战争可能先从后方打起。现代空袭兵器使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处于它的威胁之下。敌人可能利用其侵略基地，使用各种空袭兵器（洲际导弹、中程导弹、战略空军等），从空中集中突击我们的后方（政府首脑机关、指挥中心、工业基地、交通枢纽、主要仓库），而不一定马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但也可能从陆、海、空三方面同时向我前方后方发起进攻，实施“垂直包围”。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后方要地的设防和防空、防原子武器、防空降等措施。

（四）合同战。是诸军种合同的与广大民兵密切配合的战争。原子、导弹等尖端武器是重要的杀伤武器，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的任务在于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即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认识它。原子、导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正确地认识它，才能有效地使用它和对付它。但它的出现并没有降低各军、兵种和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连美军也认为：原子武器破坏力的大小、杀伤的多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立即利用原子突击效果，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原子武器的杀伤作用，又不能把它神秘化。战争的胜利，依然取决于装备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各军、兵种的协同一致和广大民兵的密切配合。

（五）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为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增大了袭击的效果。根据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看，突然袭击的主要表现是不宣而战，往往通过演习发动战争。因此，我们在战备和训练上都应掌握突然性这一特点，使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有备才能无患。

（六）战场情况变化急剧。由于原子、导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和军队装备的摩托化、自动化以及空运能力的增强，将使军队的突击力、机动能力大为提高，攻、防两种基本战斗类型转化迅速，从而造成了战场情况的急剧变化。这是我们军队建设和训练上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思想与战备动向及我们所必须采取的战略方针。

我们在制定战略方针时，不仅要着眼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产生的战争特点，而且还应随时了解敌人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驾驭战争，指导战争。

美国军事当局认为，战争已经进入了导弹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军队的装备将从火炮过渡到核武器；从蒸汽机过渡到原子动力；从螺旋桨过渡到超音速；从卡车过渡到直升飞机；从望远镜过渡到电视；在导弹时代已经不可能再有真正可靠的防御。因此，在战略思想上极力主张突然袭击，先发制人，把他们的“胜利”，寄托于战争初期大规模的战略袭击上面。

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美方除加紧武装西德、日本，扩大其侵略集团和加强其战争基地，以便利用仆从国家的人力为其火中取栗而外，在战备上还采取了下列一系列的措施。

一、改组国防体制，调整海外部署，改变三军鼎立状况，解除三军部长指挥权，集大权于国防部长（实则是集权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因国防部长为文官）。

二、改变三军的发展比例，重点发展空军。

三、集中力量突击导弹的研究和生产。

四、广泛使用新兵器、新技术，提高军队的火力、突击力和机动能力。

五、编制小型化，减少指挥层次，改进侦察、通信，简化后勤补给。

六、加强后备役的训练，改善其装备和战备状况。

七、加强现役军队的训练，大量培养军官和保存技术兵，陆军训练加强单位训练和单个训练，单位训练主要形式是演习。

采取上述措施的中心目的，是为了适应在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件下的作战，以达其侵略战争的目的。

基于对未来战争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只能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既定的方针。所谓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在战争爆发前要用一切办法制止战争和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以便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当美帝国主义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坚决地以革命的人民战争消灭反革命的侵略战争。不仅要把侵略者驱逐出我国的国土外，而且要彻底消灭产生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制度。因此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是彻底歼灭敌人的方针。它是贯彻战争全过程的方针：不仅有战略防御阶段，而且有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阶段。毛主席早就指示过我们：反攻是防御战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这种带有决战性的战略反攻。

第三个问题，再接再厉完成编写我军作战条令的任务。

一、编写作战条令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有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但始终没有写出我们自己的条令。编写作战条令，在我军来说是个创举，虽然大家都没有经验，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并采取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经过全军一年来的刻苦钻研，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果（步兵战斗条令一定稿，概则二定稿），但距全部完成条令的编写工作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全军迫切需要的我军的条令，对我们寄托很大的希望。军委要求我们鼓足更大的干劲，在今年上半年把合成军队的各军种、兵种的战斗条令编写与审修完毕，以便通过实验于一九六 年内颁布试行。任务非常紧迫，必须做更大的努力。我们准备在三月份再召集一次专业会议、对军师、团营的条令同时进行会稿与审修，争取在五月底以前把合成军队的战斗条令（包括概则、军师、团营三部分）和步兵战斗条令（连以下）的初稿都定下来。希望同志们回去抓紧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已经写出初稿的，根据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与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工，尚未完成初稿的，应加紧完成。

二、组织试验性演习，检验我们所写的条令。

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实际摆一摆才能看出我们所写的东西是否正确，

军委常委的同志原则上都同意军委要搞一个满员齐装的军、每个军区掌握一个这样的师，每个军掌握一个团，每个师掌握一个营，每一个团搞一个连，一方面作为实验部队，一方面作为值班部队。科学研究部门应抓紧这些部队，有计划地由下而上，由分到合反复的组织演习来检验自己编写的条令。边研究边编写，边试验边修改。

军委常委还决定由总参和军事科学院负责立即着手准备编组一个满员齐装，全训的步兵师和一个军的架子，以及必须的空军和特种兵部队，以便在条令初稿定稿之后，于今年秋季组织试验。

实验的分工，一般可按编写条令的分工进行，具体计划请战术部与各单位到会的同志商量以后制定。

三、条令的性质、范围与要求。

究竟什么是条令，我们写条令的人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我们写的条令才能像条令。我没有很好的研究，试讲一下，目的是为了引起同志们注意去研究认识与掌握它。

条令不是教材，也不是教程、教范，也不是教令，更不是论文。它们之间有共同性，但又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讲条令。我认为条令是战斗经验的结晶，又是战斗行动的指南。因为条令是战斗经验的结晶（自己的也好，人家的也好），所以要求条令应该比教程、教材等更带有概括性和稳定性；因为条令是战斗行动的指南，所以条令的内容与辞句应该是肯定的。要求简单、明了、准确、坚定。主要是告诉我们的干部在各种情况下怎样作，怎样打。而不是讲一篇空洞的大道理。条令要求指挥人员在密切结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按照条令的规定去做。可以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但要有个一般的共同的准则，否则各有各的见解，就不能达到行动的一致。

其次，谈谈教令、教程、教范与教材。教令比较接近条令，但它是还不够成熟的新的原则，先写成教令，在训练中试一试。教程属于教材一类，但它是基本的教材，较之一般教材更广泛更全面更原则一些。教范则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如射击教范、维护修理教范等。但必须指出所有教令、教程、教范、教材都必须根据条令来写。有些是具体解释条令原则，有些是根据条令所规定的原则，具体阐述本身的专业战术与技术。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条令写成教材、教程、教范或教令，写成论文就更不合标准。有些地方我们写得很长，道理讲得很多，有点像教材。虽然写条令需要看很多材料，研究很多东西，但应该是把我们研究和考虑这一问题的结论，用简单、明了、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而不是把所研究考虑的问题都写进去。

还有，就是我们所写的条令是战斗条令，范围是战术的，不是战争的。因此，尽管我们要联系战争的特点，并在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来写的。可是一定要落实到战术范围。比如，我们合成军队战斗条令的概则，要写一写现代战斗的特点，这是应该的。在写的时候要考虑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以及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也是对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出现代战斗究竟有什么特点。再如写合同战斗的基本原则时要考虑到军事必须服从政治，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应该的，但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等大的道理都作为战斗的原则写到战斗条令里面就不太恰当。

以上所讲的条令的性质、范围与要求是否对，请大家研究，要统一一下认识。这不单是个编写技术与表达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问题。

第四个问题，掀起学术研究的高潮，大力培养学术队伍。

一、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与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军事学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编写作战条令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当前的一项中心工作，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绝不能看作仅仅是编写作战条令这样一项临时性的突击工作，而是我军一项经常的长期的重要工作。只要战争危险存在一天，就不能有所放松。

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与军事技术三个方面。三个方面互相密切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不能截然分开。

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战争观、军事辩证法、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等。

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队训练学，以及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等。

军事技术：主要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与使用等。

二、为了进一步开展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们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

（一）加强领导。建议各级党委与首长把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列入自己计划并适时地把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提到党的与行政的会议的议事日程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党委、首长都要抓科学研究，号召与鼓励大家从事于研究工作，并支持与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

（二）组织起来，形成体系。应该选拔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和一定学术水平的优秀干部，充实各级研究机构。此外，为了把广大干部组织起来，参加研究工作，还可以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小组、学术报告会与学术讲座等群众性的组织。

（三）发展学术民主。在学术研究上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学术研究高潮。边学习，边研究；边工作，边研究，造成一种钻研学术的空气。不仅是专业研究机构军事科学院，各军种、兵种、军区、院校的研究部、处要研究学术，各级首长与行政业务部门都应该研究学术。搞训练的要研究军队训练学理论，搞编制的要研究军制学理论。

（四）培养学术队伍。在普遍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形成一支学术队伍。领导上应十分重视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号召他们多读书，除认真精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与马、恩、列、斯的军事著作之外，还要阅读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同时应给他们必要的保障（资材、时间、器材、实验等）。开展研究的方法是指定与自愿相结合，由他们自愿或由领导上指定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研究某一个或几个问题；读某一本书或某几本书，限期完成并作报告。

（五）要端正科学研究的態度。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的態度，即实事求是的 attitude。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4]并解释说：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一句话，不了解

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作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然，仅仅站在那里远远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为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将要看各方面的东西，倘若没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的态度研究问题，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因此，重温毛主席的这一告诫是十分必要的。

注 释

[1]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2]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480、511页）。

[3]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4页）。

[4]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现代战争与军队训练问题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

一、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一) 阶级存在，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威胁就存在。

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永久消灭战争的时刻已经到来，将要进入没有战争生活，没有军队的世界”。甚至还有人认为：“应突出地强调目前形势的新变化，应强调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是历史的转折点，是国际事务中发展的新阶段，是质的变化。艾森豪威尔[1]是主张和平的，他是代表美国人民的”。这种观点如果不加批判，任其泛滥下去，将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极大的危害。

帝国主义为了消灭社会主义，保存资本主义，对我们采取了两种斗争策略：一种是硬的，即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一种是软的，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也就是杜勒斯[2]所讲的促使社会主义内部“演化”。目前美国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其具体办法是：政治上伪装和平，麻痹我们。对苏联用长期谈判的办法应付；对我们则在世界范围内挑起反华运动，集中力量向我们进攻，并离间中苏团结，挑拨我们与亚洲民族

主义国家的关系；对民族主义国家进行拉拢、诱惑，扶植右翼势力，打击进步力量，同时在暗中进行颠覆活动，以便在颠覆不成时实行军事政变，建立亲美政权。军事上除继续加强武装日本、西德和巩固扩大军事集团外，集中力量发展导弹等尖端武器，加强外层空间的活动，企图在一九六三年在导弹技术上赶上苏联，把陆、海、空三军建设成为一支导弹体系的军队。为此一九五九年曾将国防体制和尖端技术的研究、生产体制作了很大改变，把许多高级领导人员和优秀的专家集中到导弹研究、生产部门，并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度国防经费中拨出一百四十七亿美元（占国防经费总预算四百零九亿的百分之三十九），加速发展导弹，以便在对它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因此，我们必须看穿美帝国主义目前伪装和平的阴谋，不能对它有任何幻想。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二) 世界大战暂时可能打不起来。其原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尖端技术方面暂时落后于苏联，战争的准备还没有完成。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美国当权派认为目前局势对美国不利，在这种不利的局势下发动战争是愚蠢的。美国军事当局也承认，目前美国是处于导弹落后时期，苏联远程导弹储备量是以三比一至四比一的优势领先于美。

(三) 和与战两种可能，我们在准备上应以后者为主。战争可能打得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我们估计形势时必须从最危险的方面着想，才是最可靠的。因此，我们应把基点摆在可能打与准备打的上面，有备才能无患。

(四) 暂时打不起来我们怎么办：

1. 加紧经济建设，这是决定性的，富国然后才能强兵。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国防。把握暂时（三年、五年或八年）打不起来这一时局的关键，

拼命搞经济建设。苦战三年、五年、八年，高速度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2.不能“偃武修文”，而要“居安思危”，准备打起来。在加紧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国防力量的质量，大力发展尖端技术和特种兵，培养储备干部，搞好民兵建设。这样既能大量节省军费，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又能促使国防现代化的迅速实现。军队训练是我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训练工作上有四个内容（政治、文化、学术、技术）、四个对象（学校、部队、机关干部、军外）。

二、关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

战争打两门：第一打政治，第二打技术。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加上技术决定战争的形式。未来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就我们的观点来说，未来战争第一是人民战争，第二是现代战争。把这两点用逻辑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战争的本质，现代条件是时代的特点。

战争按其性质来分，有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有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是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但是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人民战争的条件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由于原子、导弹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使未来战争的样式和遂行战争的方法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只看到进行战争条件的改变，而看不到我们未来所进行的战争依然是人民战争，是错误的；反之，只看到战争性质的不变性，而看不到由于进行战争条件的改变所产生的许多特点，也是错误的。

现代战争的特点：

（一）战争规模是巨大的，是阵营之间的战争。未来战争将在广阔的空间进行（空中、地面、海洋），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空前巨大，战争具有残酷性、长期性。为了支持这种战争，必须要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必须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正如列宁所说：“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二）是总体战争。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继续，它并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除武装斗争而外，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还继续着极其紧张而广泛的斗争。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的总和。我们布置、准备应付可能的战争时，不能单纯从军事上着眼，要努力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加强思想教育，为总体战进行准备。

（三）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为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增大了袭击的效果。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突然袭击的主要表现是不宣而战，往往通过演习突然发动战争。因此，战备和训练都应掌握突然性这一特点，使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

（四）战争可能先从后方开始。现代空袭兵器使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处于它的威胁之下。敌人可能利用其侵略基地使用各种空袭兵器（洲际导弹、中程导弹、战略空军等）首先集中突击我们后方（政府首脑机关、指挥中心、工业基地、交通枢纽、重要仓库），而不一定马上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有时也可能前方后方同时开始。在实施登陆时，通常是采用“垂直登陆”手段，登陆与着陆同时进行。

（五）是诸军种合同进行的战争。尖端武器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杀伤武器，

但它并没有减低各军种、兵种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连美军也认为：原子武器破坏力的大小，杀伤的多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立即利用原子突击效果，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因此，我们绝不能把原子武器神秘化，相反，更需要有装备着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的各军种、兵种协同一致的努力，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但是由于原子武器的使用，军队的战斗行动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根据最近翻译出的苏军一九五九年野战条令来看，有下列几点：

1. 编制装备有所改变。

摩托化步兵、坦克兵和空降兵是陆军的主要兵种。步兵全部摩托化。摩托步兵师、坦克师是陆军的基本兵团（过去步兵师是陆军的基本战术兵团），并认为：坦克兵是最适于原子条件下作战的兵种；现代条件下空降兵的作用大大提高。

炮兵的火力大为加强。炮兵种类：有身管炮（迫击炮、榴弹炮、加农炮、防坦克炮）；火箭炮（轻、重型）；导弹。炮弹种类：有普通炮弹；化学炮弹；原子炮弹。

防空兵增加了地空导弹。

增加了无线电技术兵。其任务：实施无线电控制、侦察，干扰与反干扰。

工程兵的作用更加提高。工程兵分工程、舟桥、道路三种。要求广泛地使用机械作业，适应防原子、化学武器的需要和保障军队实施广泛的机动。

2. 在作战原则上强调机动灵活。

集中与分散。集中兵力的原则未变，但在方法上要求：分散配置，多路开进，集中突击，再迅速分散，以充分利用原子突击效果和避免敌人的原子突击。现代战斗中的集中，首先是在短期内集中军队的火力，主要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火力。

进攻与防御转化迅速。由于使用原子武器，双方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的变化，要求灵活运用进攻与防御这两种基本战斗类型。

原子武器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杀伤兵器，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应着眼于利用原子突击效果。

广泛实施机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要求军队广泛地实施机动（兵力、火力）。战斗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军队实施广泛机动（包围、迂回）的可能性。要求军队具有坚决顽强、迅速勇猛、主动灵活和独立作战的精神。

强调夜间战斗（现代条件下夜间战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连续战斗。

3. 在军队指挥上：强调及时了解情况，迅速定下决心，用最简便的方法迅速传达任务，要求各级指挥员机断行事。

我们在上面之所以要讲一讲现代战争的特点，介绍一下苏军一九五九年新条令上的某些改变，主要是为了引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以便进一步来探讨在现代条件下进行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

三、关于今后训练工作的几个问题

整个训练工作要通盘打算，要有一盘棋思想。训练有四个内容：

一是政治教育。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我们军队，使之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

二是文化教育。文化是掌握马列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必须大搞

文化教育，使我军成为一支既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高度文化的军队。

三是军事技术训练。军队的技术装备日益复杂，这就要求我军必须重视技术训练，以便使广大官兵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现代化的武器和器材。

四是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军事学术上一系列的变化，因此，必须加强军事学术的研究与训练，以便不断提高我军的学术水平和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训练工作有四个对象，就是学校训练、部队训练、机关干部训练和军外训练。

第一，学校训练。

要大量培养又红又专精通业务的指挥人员（军事专家）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学校的数目可多不可少。培养干部是军队建设的中心。

目前干部的情况，据概略的统计还有半数以上来进学校学习。如：步兵排长占百分之五十二；步兵连、营、团干部占百分之四十八；炮兵占百分之五十；装甲兵占百分之五十六；工程兵占百分之六十六；通信兵占百分之六十九；后勤占百分之七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一）把目前的学校任务调整一下，以完成和速成相结合的办法，在三年内做到补齐缺额，达到全训。为此，应作出一个三年全训的计划，各军种、兵种亦应本此精神进行规划。

（二）军官的训练分完成与速成两种。这是一种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法。完成训练，采取三级制。根据军官服役条例，由战士、军士晋升为军官，必须进一次完成学校（步兵学校），由尉官到校官进一次完成学校（军事学院），校官到将官进一次完成学校

（高等军事学院）。主要是搞基础训练。训练内容应比较完备，时间可稍长一些（两至三年）。速成训练，主要是搞深造和提高。以尉官来说，根据军官服役条令，由少尉到大尉需要十年时间，在这十年时间内，军队技术装备和战术方面都有很大变化，为了培养

与提高军官的能力，可选拔优秀军官到速成学校学习，加以短期深造，担任上一级职务。校官、将军同样如此。速成训练要根据军官在完成学校学习的内容和服役年限而定，比如少尉到中尉可不进速成学校学习，由中尉到上尉一般的需要进一次速成学校学习，从而达到深造提高的目的。要求学习内容少而精，学习时间短

（每期半年到一年）而少（每天正课时间少些，复习时间多些）。课程的排定，必须要教员讲解的列为正课，学员可自修的则不列为正课。各类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以本级为主，上下各挂一级。

正规学校不学文化，在职干部要抓紧文化学习，这是学校与部队的分工。

第二，部队训练。

加强部队训练是进行军队建设和提高军队作战能力的重要措施。对部队训练问题应作通盘研究，我认为应该是：由下而上；先分后合。具体说：

（一）分练为合练做准备。分练是基础，合练应在分练的基础上进行。分练就是培养单兵和分队的专业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战术），打好基础，并且要在合练中继续巩固与提高。但是部队的训练只有通过合练，才能使各兵种的战斗行动达到协调一致。

（二）技术训练为战术训练做准备。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服务于战

术，在战术训练中不断地巩固与提高技术。战士是以技术训练为主（学会武器的使用及利用地形和作工事），战术训练为辅。

（三）分队训练为部队训练做准备。分队训练完成之后则进行部队训练，由下而上逐步提高。

（四）部队训练为兵团训练做准备。在整个年度训练程序的安排上必须是先部队后兵团，无论从场地条件，器材条件以及部队训练水平来说都应该这样。各部队训练完成后，则可进行各兵种联合的兵团训练。

（五）训练为演习做准备。演习是在一定战术背景情况下进行的，是最逼近实战的训练，所以，演习是部队训练的最高形式，是检验部队训练成绩的良好办法。演习应以分队的小演习为主（班、排、连、营），但也应组织一定次数的大演习（团、师至军）。组织大演习时要有目的（试验性、示范性、考核性或复习性）、有准备，要求做到三好：准备好、演习好、总结好。

第三，机关干部训练。

（一）学习任务：所有干部都必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在此基础上学习现代条件下的作战知识。干部学习以战术为主，但需要了解各种武器性能和运用。合成军队干部，以合同战术为主，并学习兵种技术装备的性能和使用；各兵种干部，以专业战术为主，并学习合同战术和其他兵种的战术、技术性能。对于技术的学习还可以通过下连当兵达到一专多能。为了便于干部学习现代技术知识，正准备建立一个军事技术研究馆（时间短、办法简易、效果大，直观教学的好办法）。此外会上还有同志提出用请客或送上门等办法，也可以研究采用。

（二）学习方法：集训和自学两种，应以自学为主。

自学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经验证明，强迫与自学相结合是个好办法。指定读书，限期报告，一人读书，众人受益，通过这种办法，掀起学术研究的高潮。

为了搞好机关干部的学习，必须加强领导。党委、支部都要抓。应把干部学习列入党委（支部）的工作计划，组织起来走群众路线，掀起一个学习研究学术的高潮。

四、军外训练

（一）军外训练包括：民兵（农村、学校、工厂、机关）训练、复员兵和预备役军官训练，国防体育训练。

（二）训练的方针：应贯彻军事、政治并重。军事训练以简易防空、防原子、防化学和射击投弹等基础知识为主；政治教育主要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宣传我军的光荣传统，提高民兵的组织性纪律性。

（三）训练方法：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紧密结合生产、文化学习和国防体育，广泛的开展群众性的练武活动。

凡有驻军的地区，都应派出干部划定地区帮助民兵训练，今后部队训练要把民兵训练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可采取吸收民兵参加部队演习，组织工作队深入公社帮助民兵组训，或采取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组训民兵相结合等办法进行。

最后，还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培养优良作风（生气勃勃，生龙活虎）。

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党的总路线政策教育。教育部队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

团结（思想上、同志的相互关系上）、紧张（工作的雷厉风行、干劲十足，反对散漫疲塌、木头官、木头兵）、严肃（开展思想批评和严肃军纪，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无原则的庸俗风气和闹无原则的纠纷）、活泼（民主风气，生活愉快、活泼）。

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反对骄傲，提倡相互间谦虚尊重。

注 释

[1]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2]杜勒斯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曾任美国国务卿。

编好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加强军事学术研究工作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四日)

这次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和团营部分汇稿专业会议，是在中央军委广州扩大会议[1]的新精神指导下，由军事科学院具体组织召开的。

现在趁这个机会谈谈编写条令的几个指导思想以及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对军事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编写条令的几个指导思想

一、关于条令的编写方针。

这个方针，我认为即：以毛主席军事思想为指针，以战略方针为根据，在总结我军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充分依靠群众，大搞学术民主，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适应未来的战争需要。

二、从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这在理论上谁都承认，就是争论的双方也没有人反对。争论的焦点是原子、导弹条件下的战争，究竟是将来的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因为氢弹，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化学、细菌武器；电子、红外线、电视、传真、雷达等技术器材；以及空中、地面、水面、水底等兵器的出现，必然对未来战争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乃是现实的任务，而不是将来的任务。从装备情况来说，世界各国并没有全部尖端化，可是有的国家已经把这些武器和技术器材装备了部队，甚至有的国家提出把尖端武器常规化，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战术原子武器。许多装备敌人已经有了，我们的朋友也已经有了，有的我们也有了或者快要有了，况且我们的常规有的已经插上了尖端，是现代常规，这些就是现实问题。敌用我防是现实，我有我用也是现实。朱总司令讲过：“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现实出发。根据敌人的编制、装备、战术特点，研究对策这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将来的问题。马列主义者，从来都认为：观察研究一切事物，都必须从过去看现在，从现在判断将来。任何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预见，都是在全面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内在矛盾基础上预测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结果。因此，我们任何时候，办任何事情，都必须把立足点和出发点放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如果离开现实，只是向后看，就会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时代，就会在未来战争中吃亏。同样，在展望未来时，也必须立足于现实，因为未来是现实矛盾的发展，如果离开现实基础去展望未来，就会陷入空想的深渊。我们所说的瞻望将来，不是立足将来，这点必须明确。

三、守常与应变。

所谓常与变的问题，常是属于基本的、稳定的、原则性的东西，变是属于临时的、变化的、灵活性的东西。我军的编制、装备、训练、作战，都是

这是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组织召开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和团营部分汇稿专业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共三部分，收入本书时删去一部分。

一个常与变的问题。如编制、装备有平时的，也有战时的；战术上有基本战术，有应用战术。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战场情况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只有变化而没有基本原则，也就没有什么规律和原则可言了。所以言变首先要求常，先把原则搞通，然后才能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也即古人所说的先求稳当，再求变化，先“正”而后“奇”。孙子遗说有这样一段话：“或问，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2]其中心意思是说：兵法只能讲原则的、基本的东西，不能包罗万象，把一切问题都写进去。这段话，对我们编写条令来说很有用。我们的条令要写基本的、稳定的、原则性的东西，而不是写那些属于变化的、灵活的、临时性的东西。如果企图把各种情况都写进去，写得很具体，不仅写起来有困难，用起来也有困难。因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写得再具体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况且太具体了，反而缩小了稳定性，也缩小了应用上的灵活性，从而也就减弱了理论的指导意义。当然太原则了，也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好应用，所以要写基本的东西。战斗条令写基本原则，技术条令写基本知识。条令的概括性要强，概括性越高、稳定性越大，要写活一些，不要规定得太死，繁简要适度，这样，便于我们的干部掌握住基本原则，熟悉各种各样的战法，便于他们战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基本原则、基本知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从各种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就是根据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一定的地形条件、一定的编制装备、一定的背景、一定的技术条件，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统帅，以战略方针为依据，又以我军的经验为基础来确定的。因而完全符合一定时期内的训练、实战的需要。有些东西就是再过若干年也还是适用的，有些东西可能变化较大，如战斗样式问题。战斗的基本类型，毛主席早已讲过，只有进攻、防御两种；至于两类战斗中的样式则是多种多样的，究竟以什么为主，要结合具体情况确定。如果在条令上写死了，结果战时反而不适用。诸如此类问题，审查条令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研究军事学术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一、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应有的正确认识。

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服务，研究、解决训练和战备中所提出的学术问题。通过训练和战备实践进行科学研究、以研究的成果指导训练和战备的实践，这样研究和实践就结合起来了。目前我军战胜敌人的丰富经验，有待于作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条令编制还未最后完成。未来战争中的许多学术问题，全世界的军事家都在那里研究和探讨，如军队如何编制，如何装备，如何训练，如何作战等。我们对待这些问题要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以我为主地去研究解决。这对国防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号召全党全军注意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问题。中央军委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再强调说明研究军事学术的重要性，对每次编写条令的专业会议都非常关怀，并不断地给以指示。现在各级党委对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也都非常重视，都在积极建立与健全军事科学研究组织。就这次与会的一百九十一名代表情况来看，直接参

加编写条令者占百分之八十三，专业研究干部占百分之三十八，人员比较整齐，水平比较高，说明了我们初步形成了一支既有一定工作能力又有一定学术水平的队伍。

这支学术队伍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军事学术工作究竟搞些什么？过去有人主张军事科学院可以同高等军事学院合并，说搞两个教学机关干什么？养老院又是一种看法。一九五八年建立军事科学院之后，遇到许多困难。要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学术，就必须搞研究，研究要有机构、有干部，这些干部要有一定的专业，专业还须经常地坚持下去，所以军委在广州会议上提出了研究机构系统化、研究干部专业化、研究工作经常化。有了机构，有了干部，又有专业知识，就能培养研究干部，帮助首长解决一些问题。过去研究工作抓迟了，现在应急起直追，军区、军种、兵种、院校的首长要再三体会军委的精神，抓紧军事科学研究这一门，建立健全这个机构，配备一批干部，给他们一定的任务，对他们经常地给以领导和指示，他们会搞出一点东西出来的。

二、研究军事学术的正确态度。

由于全军研究军事学术的风气日益提高，从训练、备战和编写条令中提出了许多学术问题和分歧意见，虽然有些问题还未经过广泛的探讨与争论，有的也未经过实践，但这是一种可喜的正常现象。因为大家的经验、水平、思想方法和对我军经验的认识不尽一致，分歧意见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不经过实践，不经过反复的争论，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可能达到一致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克服矛盾的过程。每经过一次争辩，认识上就会深化和提高一步。我们不怕争辩、要不断地展开争辩。在研究和争辩学术问题时，必须具有正确的态度，才能促使学术研究工作的的发展，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研究科学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

什么是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呢？

（一）要实事求是，要敢想敢说，要会想会说。

实事求是，就是研究问题要有客观的态度。敢想敢说是共产主义的风格，有了好的风格，还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还要确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想会说，就是在研究问题时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毛主席教导我们，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研究，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研究问题要防止武断，发表意见要有客观根据，要抓住问题的本质，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和别人争论时，首先要弄清对方的观点，研究对方的论据，找出矛盾的所在，然后再客观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军事科学院有的同志做得较差，就是掌握不住谦虚的态度。这是个思想问题，也是个作风问题、意识问题。自高自大、目空一切，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作风，也不是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有夹起尾巴的精神，要谦虚谨慎，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科学院必须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扭转这个局势，树立实事求是，虚心谨慎，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及互相尊重等正确的科学研究态度。争论中即使人家的论据、立足点错了，也要让人家说完说透；即使十句话中只有一句是真理，也要吸取他合理的部分，抛弃他不合理的东西。科学的态度就应该这样。此外，研究学术，必须下苦功夫，有旺盛的求知欲，不能投机取巧，不懂装懂。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个人求名欲，个人求利欲，但提倡科学的求知欲。不断地增长知识，是人生的最

大乐趣之一。没有旺盛的求知欲，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学术上就不可能有所成就。

（二）要有科学研究的民主，坚持真理的集中。

正确的意见是在同错误意见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方面，研究问题要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要提倡学术民主，不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真理就不能发扬，问题就不可能研究清楚。这次会议中，出现了“框框”、“圈圈”的问题，少数同志对此有些顾虑。因此正确地认识“框框”，科学地分析“框框”很有必要。“框框”、“圈圈”是个形式，问题在于这个“框框”、“圈圈”的内容是否适合，内容适合了，框框也就合适了。突破框框，打破形式是我们的良好愿望，需要认真地去做，使新的比旧的更有生命力，更好一些。破旧立新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曲折乃是正常现象，只要下苦功钻研，不断地奋勇前进，不仅能够破旧，而且能够立新，新的质量会更好。“优质”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启发、鼓励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善于从争论中选择真理，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选择要有研究，集中须等待条件、当条件尚未成熟时不忙作结论，条件成熟或基本成熟了，则必须作出结论。如果结论后，还有不同意见仍可继续研究。此外争论中要善于听取相反意见，多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商量研究。争论商量都应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争论中不应带刺，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同时也不要怕刺，怕“框框”、“圈圈”、“条条”。只有这样，才能把科学研究的民主和坚持真理的集中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军事学术的发展。

三、军事学术研究的方法。

（一）不孤不空。研究军事学术最根本的方法是不断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学术研究是为了谋求真理。真理来自实践。广大群众的斗争实践，是研究发展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必须明确，我们科学研究的源泉，不是在书本里头。书本固然重要，但它是“后天”的东西，先生在实践中间。对我们来说，先生就在连队中间、士兵中间、下级干部中间，他们天天摸，经常有点发明、创造。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他们各方面的发明、创造一点一滴地搜集起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然后开动脑筋进行钻研，把钻出来的东西补充到我们的军事科学里头来。所以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群众，把自己封在“象牙塔里”去研究学术，那就会变成“无的放矢”、“闭门造车”的老学究，对革命非但无益，甚至是有害的。毛主席屡次教导我们：要注意调查研究，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并曾明确指出研究理论必须以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我们一切做研究工作的同志必须严格地遵循这一教导，深入到军队训练实践和各项战备实践中去，去开发军事科学理论的源泉。这是我们不孤不空的根本方法，是研究学术的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学术的方向。

（二）抓资料，钻问题，出主意，出产品。

抓资料。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原料”和基础，资料的主要来源是实际，书本则是其次的。我们要以李时珍上山采药写《本草纲目》的精神，深入到连队的士兵群众、下级干部中间去抓资料。只有充分占有资料，才能发现问题，说话才有根据。否则所研究的东西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空想的东西了。有了资料放在一起，不去分类、分析

研究，也就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有用的东西，所以抓来之后就要钻。钻，就是对占有的大量资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综合研究。钻的时候，不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地去钻，还须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有选择地去进行分析研究，一个一个地排列，找出问题的关键，否则就会陷入庞杂的资料迷雾中，一无所得。

出主意。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整理资料，把原材料翻版，而是根据自己的推理、判断，对原材料加工制造，进行科学的概括，提到理论的高度，创造出新的成品。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阶段。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解决任何学术问题，也不可能完成学术研究工作的任务。

总之，我们学术研究工作者，要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出成绩，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重视态度问题，重视方法。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巧妙。有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还要下一番苦功夫，要苦钻、狠钻、巧钻。其次必须有专业的学术干部，这样才能驾轻就熟，最后还要有必须的物质保证和学术保证。

注 释

[1]中央军委广州扩大会议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一九六一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

[2]见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0页）。

伟大的战略决战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

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

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

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1]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继续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

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3]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4]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5]后，归绥[6]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7]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8]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9]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

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0]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

图。”[1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

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

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

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状态，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12]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百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

韩庄、沐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13]，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集团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

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14]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百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15]的初战原则。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16]。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围攻我军的情况，改变为我军战略上围攻敌人的情况。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17]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

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百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傅作义集团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18]“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19]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窜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百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百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

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个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20]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军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阵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辅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经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问题。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可能和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21]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22]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百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百韬、黄维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傅作义集团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创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军对敌军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23]；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24]，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25]，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幸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26]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27]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绥远国民党反动军队董其武[28]部，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绥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29]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30]。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决了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多个二线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

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多辆大车，九万六千多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多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

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

比，而且是人力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他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

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

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注 释

[1]石家庄战役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解放华北战略重镇石家庄的攻坚战，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首创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四平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至十三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对固守吉林省四平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攻坚战，全歼守军一万九千余人。开封战役指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为解放河南省会开封进行的攻坚战，全歼守军三万余人。

[2]新式整军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3]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剿总”总司令。

[4]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接受改编。

[5]察绥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在察哈尔（今属河北、内蒙古）、绥远（今属内蒙古）境内对国民党军的进攻作战。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万

一千余人。攻克了集宁、丰镇、崇礼、尚义、陶林、武川、包头、和林、萨拉齐等城镇。

[6] 归绥，旧市名。一九五四年改名呼和浩特。

[7]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徐州“剿总”总司令。

[8] 白崇禧，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剿总”总司

[9]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0]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11]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2] 济南战役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济南的攻坚战。此役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万四千人（内有一个军战场起义），俘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13] 杜聿明是国民党政府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集团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由徐州南撤时，归杜聿明直接统辖的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

[14]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6页）。

[15]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16] 十大军事原则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其内容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庄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17]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18]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7页）。

[19]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20] 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21]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4页）。

[22]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16页）。

[23]曾泽生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率部起义。郑洞国是国民党政府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部队和新编第七军全体官兵在长春放下武器。

[24]何基沣、张克侠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率一个军部和三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廖运周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一一师师长，中共秘密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率该师师部和两个整团共五千五百人，在安徽宿县西南罗集起义。

[25]孙良诚是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一七军军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五千八百人，在江苏睢宁西北投诚。赵壁光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五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率残部二千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黄子华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率该师师部和所属残部及第二一六师一部、第八十五军部分直属部队一万余人，在安徽省蒙城东北双堆集投诚。

[26]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天津警备司令兼防守司令。

[27]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5页）。

[28]董其武，一九四九年时曾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驻绥远指挥所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由他率领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等部及地方式装共六万余人，分别驻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地区。

[29]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30]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5页）。

[31]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广州军区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把训练作为今后的工作中心，这就把平时工作的中心问题抓住了。要把会议的精神很好地贯彻下去，必须各级党委负责。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是代表党委来的，希望回去很好地传达一下。为了便于各级党委讨论和贯彻，建议把会议的几条决定用军区党委的名义通知下去。这样小型的会议很值得推广，小会可以使问题讨论得细一点、透一点。

我的讲话，务虚多，有些问题强调一下，目的是为了便于工作。一共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党委抓总，首长分工，有主有从有结合。

领导训练和领导其他工作一样，党委要抓总。所谓抓总，范围有大有小，例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针、政策要由党中央来抓总，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要由军委来抓总。我所讲的党委抓总，不是指这些大范围的问题，而是指党委必须抓部队工作中有关带兵、练兵、用兵方面的总。我们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带兵、练兵、用兵是军队工作中带有根本性的三个问题，是使军队达到又红、又专、又健的总要求的保障，各级党委都必须把这三个问题很好地抓起来，各级首长都应该具备这三套本领。平时能把兵带好、练好，战时用兵才能运用自如，打胜仗。三者相互关联，带兵第一，但要落实于用兵。兵带好了，才能谈到练兵和用兵。兵带不好，纪律不严，军容不整，武器、器材损坏，事故不断发生，拖都拖不动，还能谈到练兵和用兵吗？

要带好兵，我认为有四个标准：第一是团结紧，就是军内、军外团结好，官兵一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第二是纪律严，执行命令坚决，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一声号令，人人都能自觉执行。这是我军优良传统之一，今后随着我军建设的发展，更加需要有严格的纪律。但是铁的纪律，必须有高度政治自觉做基础。第三是斗志高、士气旺、部队生龙活虎，平时有旺盛的工作情绪和高度的警惕性，战时积极要求打仗。第四是军容壮，部队整齐划一，装备完整无损，纪律严明，体力强健，行动雷厉风行。但是要做到这四点，需要做很多的政治工作、训练工作和管理工作。政治是军队的灵魂和统帅，无论何时何事都必须政治挂帅，但是政治要落实于训练、落实于管理。在会议中间发了一个材料说明目前部队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最近农村城市物资供应有些紧张，紧张的原因在哪里，战士不大清楚，只看见物资少，粮食不够，有些反映。要教育部队认识到这是个暂时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于连续两年天灾，加上我们的工作没有经验或经验不足所造成的，是在发展中间出现的，因而是暂时的，情况很快就会扭转过来走上正常轨道。可能由于解释工作不够深入普遍，个别出现一些讲怪话、发牢骚的现象，还有在训练中有些不够积极或对待病员不关心等等问题。这些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要从政治思想工作上去检查，另一方面，也要从生活制度、管理教育、经济生活方面找原因。除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因外，在管理教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就是说有的干部没有从阶级友爱、亲兵亲民的态度出发来对待战士和群众。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士兵和老百姓是阶级弟兄。我们的干部总的来说是亲兵亲民的，但有的干部发现少数战士有错误时，不是采取耐心教育、耐心等待的办法来关心和帮助他们，不是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而是乱斗、乱戴帽子、吹毛求疵，结果呢？人是整了，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从根本上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一定要有阶级感情，要帮助、教育士兵。打骂士兵是封建制度的残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对士兵热情关怀，耐心说服教育，才能使我们整个军队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使士兵觉得军队就是他们的家；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兵带得好，真正达到团结紧、纪律严、斗志高、军容壮。把队伍带好了，上级的计划和命令就能够很好的执行。无论教育也好，施工也好，演习也好，将来作战也好，首要的问题，是士气旺盛、上下团结、纪律严明。所以，要打好仗，首先要把兵带好。

怎样练兵？练到什么程度才算练好了呢？讲来讲去还是那两句话：“开得动，打得准”。这两句话非常浅显、易懂、易记，是一种高度的概括。任何一个军种、兵种，首先要能够开得动：飞机能够开得动，舰艇能够开得动，汽车能够开得动，炮车能够开得动，坦克能够开得动。现在我们有的部队就是开不动，车辆开不动，个别的飞机、舰艇也开不动，事故不断发生。开不动，当然有一部分是物质保证的原因，有些也是技术上的原因。打得准，也是一样：炮要打得准，坦克炮要打得准，舰炮要打得准，飞机航炮要打得准、炸弹也要投得准，步兵武器也要打得准，导弹也要打得准。真正消灭敌人，就要枪、炮都能打得准，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是从普遍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技术熟练了，熟能生巧，不仅会使用，故障也能排除，这是对技术上的要求。战术上的要求是指挥得好、协同得好。如果把练兵的要求归纳起来讲，就是要四好：技术上，开得好、打得好；战术上，指挥好、协同好。所谓指挥，当然包括组织协同在内，但根据我军的情况和未来战争的要求，有必要分别提出来强调一下。组织协同是一种艺术，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无论在空中、海上、地面都要按照目的、时间、地点把各军、兵种的行动协调起来，可是实际作战中就不那么简单

了。距离有远有近，地形、道路有好有坏，敌情对我们机动的影响也不同，遇到敌人的障碍和敌人的阻击，当然运动就慢了，甚至于通信联络中断了，有时还会有山河阻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素养是撒不开、捏不拢的。开得好，打得好，指挥得好，协同得好，无论哪个军种、兵种，哪个部队、分队，都要具备这四条。这四条具备了，练好了，到战时用兵的问题就不大了。正像毛主席所指示的，只要你摸熟了自己部队的脾气，摸熟了敌人的脾气，不断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然后根据地形、天候灵活使用兵力、兵器和运用战术原则，就一定能够多打胜仗。

部队要真正有战斗力，必须具有三大要素，第一要红，第二要专，第三要健。这里也是有主有从，第一是红，落实于专。红是领导、是统帅，可是光红不专不行，必须以红来统帅专，在红的基础

上求专。谈到训练问题也是一样，红是第一，它能使全体人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心，高度的对帝国主义的警惕性，并能提高战备思想和战备工作效率，这样红就落实了。但红不等于单纯地强调念书本本，不把理论同实际结合，就是空头政治家。要专，要健，首先必须有个灵魂，就是在思想上要红。毛主席讲教育方针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德育就是红，智育就是专，体育就是

健。

红，就是坚定不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讲红，学理论是要的，不要理论是不对的，但理论必须和实际结合。毛主席讲过，学理论要有目的去学。马、恩、列、斯的著作有几十本，毛主席的四本，要带着问题去研究，带着目的去学，要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为学习而学习。应该为解决工作难题而学习，这样才能学好。我们党委一定要使我们的部队是红的，是现代化革命军队，红是第一、其次是专。

专，就是精通专业，干什么精通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苦练。我想不仅是军队，任何一个专业，任何一个专业的成就，都要经过苦练才能成功。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士兵充分认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里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学问（就是科学）没有平坦的道路，不像我们现在走马路那样大摇大摆地走，而是要爬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山，要披荆斩棘一步一步地登攀，才能够走到它的顶点。同志们看过杂技团演出，就是那么一个坛坛，演员顶在脑袋上能搞出很多名堂，成为绝技。因此，任何专业的成就，必须经过苦练，才能成功。也可以说，凡是苦练的，必能成为专家。这是逻辑推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用这种精神来练兵。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分队，每一个部队、兵团，每项技术、战术，都要反复练，一次不好再来，要不怕疲劳，不怕麻烦，这样才能专。讲了半天，到底从何专起？概而言之，就是要搞专业技术、专业战术，把专业技术搞好了才能搞专业战术，在专业技术的基础上来训练专业战术。各兵种、军种专业战术搞好之后，才能进一步搞合同战术，军队才能合得拢。过去兵种简单，技术简单，现在比过去复杂了，技术装备多了。我们提出干部要学兵种知识是什么道理呢？无论任何军队，合成军队的干部都必须懂得兵种知识，因为他是合成军队，要组织合同作战。一个合成军队的指挥员，不懂得军种、兵种的常识，就不能指挥作战。若干年前，美国、德国军队就提出所谓全能干部，实际上样样都能是做不到的，只能有主有从。自己本专业一定要钻进去、掌握好，别的专业懂得一般原理、性能和战斗使用，能够协同就行了。学习军种、兵种知识，主要应采取直观教学的办法，就是搞集训、见学，以速成的办法补救我们干部军种、兵种知识之不足。将来准备在北京搞一个军事技术教研馆，着重直观教育，有空、海军，有步、炮、装、工、通、化、铁、后勤，既有分馆又有综合馆。干部入馆集训时，先一个兵种一个兵种地学，分段把它学完，专业技术学会了，然后在综合馆里搞图上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搞战术、战役的演习、使我们的干部逐步地熟悉和掌握现代技术。要专必须先红，要非常谦虚、非常谨慎，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要戒骄、戒躁。没有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就不可能谦虚谨慎，必然会骄、会躁，这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要谦虚谨慎地向别人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毛主席的这个普遍真理，放之四海皆准。任何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人总是有优点和缺点的。毛主席在七大时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是带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有多有少，程度不一，缺点总是会有的。我们看人不能光看到他的缺点，还要看到他的优点，要掌握住这个原则，要善于鉴别，诚心诚意地学习别人的优点，对别人的缺点也要诚心诚意去帮助，吸收人家的长处，不断提高自己，逐步达到又红又专。

红了，专了，身体还要健，特别是军人，身体更应该健壮。要号召我们的干部加强身体锻炼并敢于同自己的疾病和衰弱作斗争，疾病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坚决同疾病作斗争。有些干部负了伤或者得了病，这是革命者常有的事情，有了病就是要做斗争。疲疲塌塌，脚步都抬不起来，你怎么打仗！所以健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健，主要是体质。因为今后的战争，由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战场上的情况是艰苦的、复杂的，而且战斗是连续的，甚至一下子搞多少昼夜、从前沿到纵深同时展开。我们要战胜敌人，不仅要同敌人斗智，也要斗力，只有健壮的体质，才能承受这种负担。体质是物质基础，我们唯物论者要承认这个物质基础。不然的话，你纵然有雄心大志，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那怎么办吧！杜甫有一句诗：“身欲奋飞病在床”。

[1]政治觉悟，军事技能，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去显现它、发挥它的，身体健康的人就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这是体质问题。队伍的体质强壮不强壮，是战斗力的要素之一。所以无论是带兵、练兵、用兵，要红、要专、要健，这些东西部应落在党委身上，党委就是要抓这个总。如果队伍带得不好，练得不好，或者是打仗打得不好，这要党委集体负责。队伍不红、不革命化不行；不专技术、战术不好不行；不健，软垮垮的也不行。主要是党委负责，集体负责。但是党委是抓总的方面，抓全面工作，抓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尤其要抓首要的方面，善于抓中心，把一个时期的中心突出出来，妥善安排工作，组织力量适时检查、总结工作。中心的转变，首先从党委开始。平时工作的中心是训练，今年军委要抓一抓训练工作，各级党委应坚决从思想到工作把中心转到训练方面来。不仅党委要抓住这个中心，第一把手也要抓起来，不应把训练交给二把手、三把手甚至四把手来抓。以上是讲的党委抓总问题。

首长分工负责问题大家都熟悉，我不多讲。政治委员是党委会中的成员之一，他着重于政治思想工作、党的工作。部队红的问题，除了党委之外，他和政治机关负重要责任。司令员也是党委成员之一，在分工方面他着重于军事工作。所以，训练工作搞不好，首先是党委，其次是司令员和司令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搞不好，第一是党委，其次是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经济管理和健康等保证工作，首先应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由某个副职（如副连长）来专门抓这个东西，然后才是后勤首长（如司务长）。生活不好，第一是党委（支部）负总责，其次是副职（副连长）。管理经济工作的同志在副职指导下工作，保证部队物质上、生活上的需要，保证部队的健康和训练。要这样来分工，又拿总，又有分工。

另外要有主有从有结合。政治首长、政治部门主要是搞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兼管或负责训练工作；司令员、司令机关主要负责军事训练，也要兼顾政治思想工作；专门管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也要兼顾政治思想和训练工作。在整个党委里要共同负责，如果有的主要部门的首长没有参加党委，他应在党委领导之下负责。这样就把军事训练的责任明确了。党委要真正拿起总来，适当安排一下，既照顾中心、抓住中心，又要旁及其他。你讲重要性，当然学毛著重要，一切工作都要用毛主席思想统帅，干部军事训练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但论时间先后那就不一定哪个在先，这是

另一个问题。在每年的训练中一定要学毛主席著作，但毛著不是一天能学通的，而且不是全本学就叫通了，就能红了。红是要在斗争中间，在战场上、工作中，在同志间不断帮助之下，加上理论认识，长时间红的，像西红

柿一样，是慢慢经太阳晒红的，吸收了太阳的热量才红的。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毛主席著作就可以不要学或者慢慢地学了。要学，并且要抓紧时间大力地学。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目的的去学。比如讲训练问题，就要学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对军队训练的指示；学战略战术或进行演习作业时，就要结合实际来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总之，只要党委拿起总，安排好，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老干部要亲自传经，现身说法。

会议中提出的问题很多，我感到对训练问题关系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基层新、上层老的问题。

目前部队的基层很新，不仅班长、战士新，很多连、排长是一九六一年新提的，没有战斗经验，教育训练的经验也不多，而且他

自己也没有学得很好就来教别人。基层新，可是上层老，军、师、团三级干部都比较老。所谓老是经验丰富，传统的东西没有忘记。新的同志经验不多，而且传统的东西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全接受，或者接受的不好。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同志们提倡老首长亲自传经，现身说法，这个经验很好，应该大大推广。老首长、老干部特别是上级首长要亲自开战例会报告战例，讲战斗故事，哪怕小故事也好。讲一讲，就是传经，就是现身说法。讲我们当年的事，可以从土地革命战争起，一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四年解放战争，自己亲自参加的都可以讲，尤其要把自己哪些体会得比较深、总结得比较好的向下作报告，哪怕一个班、一个侦察战士的动作都可以，传授带兵、练兵、用兵的经验，介绍政治工作、政治教育、群众工作的故事、要把我们战斗队、工作队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下去，这就要靠老干部。

此外，还要向下边介绍怎么样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搞减租减息[2]，一直到土改。红军时代是筹款，财政收入靠打土豪劣绅；没有兵工厂，武器要靠缴获敌人的，那时是靠敌人的武器打仗。在现时我们已有这样大的国家，已有兵工厂了，武器弹药主要靠后方供应，不能靠缴获。按照抗美援朝的经验，美国人撤退后，往往派很多飞机来，把他们的坦克、火炮都炸烂了，真正能缴获到的不多，遗弃下来能用的也不多，所以要靠自己。讲这些故事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明我们前一辈人在没有后方没有兵工厂的情况下，怎样战胜了强大敌人，说明一个革命精神。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实在了不起，这可以增强他们“红”的革命斗志。除了讲革命故事，讲我们的战例、地方工作、群众工作等故事外，俘虏工作也可以讲。我们的俘虏工作是全世界没有的，从不搜俘虏腰包这个规定起，一直到训练俘虏，争取俘虏，进行诉苦教育，使刚刚缴枪来的俘虏经过训练，经过诉苦，马上就掉转枪口打敌人。这些故事对我们后一代人，对新兵新官有很大作用。这些都是具体工作，是一个群众工作，可是这些工作，在今天来说已成为政治性的东西了，而不是技术性的东西了，变成政治教育的教材了。所以，首长作战例报告，讲讲故事，交班传经，对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抓紧灌，各级一齐灌，把我们带兵、练兵、用兵的优良传统，不断地贯下去。在训练上老干部要作示范，不是要求上导下演吗？这个道理也对，也是合乎需要的。初级干部在学校里又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现在要靠老干部，特别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在学校又学了一个时候自己能总结经验的，到

实际中去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各种战术教育，上导下演。要提倡大干部抓小科目。老干部的作用在今天特别重要，新老不要脱节，一定要把老干部在实践中间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東西传授下去。好的东西继承不下去，失传了，在历史上我们就要犯错误。所以我们要动员老干部，有战斗经验的，有练兵经验的，有带兵经验的，同时又进了学校整理过经验的，把自己的东西传下去，自己亲自下连队里头去，把连队的基础搞好。

连队的基础在哪里呢？有的同志讲，连队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基础是在连，讲班是不对的。同志们可研究一下，班的装备应该怎么样？将来的战争破坏、杀伤性这样大，要求我们的队伍能够迅速地疏散，迅速地集中、隐蔽，突然地袭击敌人，单刀直进，哪怕打得通信联络中断、完全失掉了联系，到那个时候，一个小分队仍能够按照上级意图独立作战，而且能进行夜战和近战。这个东西，未来战争十分需要。要提倡夜战、近战、坑道战、地道战，分队本身要有一定的突击力，将来还要有一定的机动力、防护力，这样一个小单位就可以迅速地疏散地机动作战，也可以迅速地集中起来实施突击。小分队具备了独立突击的能力，它就可以利用原子条件下敌人配置上的空隙大胆地转到敌人后面或翼侧去，特别在我国内，更便于这样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基础打好。连队的基础重点是要把班搞好。首先把个人技术搞好，然后把班搞好。所谓搞好，就是要根据少而精的原则，把班的必需科目搞详细点，训练次数搞得多一点，力量搞大一点。把班搞好了，排、连问题就不大了。

（二）干部稳定问题。

一九六一年，有些军把团长以下的干部调动了一千多人，这样调动后多剩下些新手，上气不接下气。调走的太多，在营的很少。本来干部调的就多，新手就多，而且又有很多不在家的。今年要下决心把干部稳定下来。

我看了个材料，团长管生产，副团长打黄羊，主要的干部不管训练。今后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把手要搞军事训练，军长、师长要亲自抓。要稳定干部，干部部门要照顾这一点，把干部稳定下来。还要规定一些制度。

以后领导干部下连当兵改为下连当官，这样做有很多好处，可以帮助连队做教育工作，可以弥补干部不足，又可传经，而且对下去的干部本人也有好处，可以得到实际锻炼。下连当官不一定在本兵种，如合成军干部可以到炮兵去当初级干部，不能当正职可以当副职，向人家学点兵种知识。要采取适当的方法，使我们现在干部情况与训练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扭转过来。

第三个问题：军事训练中若干矛盾的解决。

（一）军事训练时间同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矛盾。

军事训练时间同政治文化教育时间的矛盾，要善于调剂和妥善安排。时间定了，就不要侵占，训练时间是完成任务的重要保障。

（二）训练与国防施工的矛盾。

根据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军委决定，各个战区要迅速地组织起战备值班部队。一个是值班连，一个是战备值班师。要满员、齐装、全训，以便万一有情况时能够应付。全军除了进行训练的部队外，很多部队要去施工。做工事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战备；一种是锻炼部队，培养部队会选择阵地，会做工事，会利用工事进行作战，锻炼施工力量，锻炼部队的战斗生活。除若干处需要工兵指导外，主要由施工部队自己去搞。各地区工事要有重点，要有极大的机动性，不管敌人从哪里来，都可以控制。施工任务，一定要分

清缓急、主次、大小，到了一定时候，部队要能够转入全训。施工中也要利用时间进行训练，这样才能应付意外情况。

（三）军队训练同支援地方的矛盾。

我们支援地方的任务很多，如修水库、修铁路、挖矿场、架高压线、修桥，还有抗旱救灾、秋收秋种，我们都参加了。军队一定要支援地方，参加地方劳动很重要。一方面可以学习生产，养成劳动观念，特别是干部要作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教育；另一方面可以帮助群众生产，主要是搞好军民关系。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真正成为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可是不要靠我们军队搞产值，如果真正是抢种、抢收、抗旱，某个县、某个专区只有这几天下雨，如果不抢种就种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出动一下。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意义。但时间不能过多，一年搞一个月，其余的时间就是搞训练和国防工程建设。现在我们有的队伍搞得不像样子，锣齐鼓不齐，锣响鼓不响，拉不出去。人走马不走，人马走了车不走。要开得动，打得准。值班部队，要能真正值班，有事情要能随时出动。

人民解放军所以有很高威信，就是因为能打仗。打仗对我们的考验，比什么考验都实际。要打好仗，就要练兵。日本在日俄战争[3]后没有打过仗，全靠训练提高战斗力；苏联红军在苏德战争[4]前长时间也没有作过战，就是靠平时训练提高战斗力。因此，支援地方是要支援的，可是不能没有限度。这个矛盾首先从上面来解决，另一方面部队自己也要适当安排，此外，还要和地方上协商解决。

（四）训练与物质保证的矛盾。

车要开得动，必须有油，有车公里。现在车公里不够，缺油料，缺零件，这是一个物质问题，是一个矛盾。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解决：一方面是从上而下的，供给部门要好好调查一下，重新安排一下，特别是对值班部队。另一方面部队也应该想一些节约材料、油料的训练方法，如空军一样，天上精飞，地面上多练，多搞战术训练，多搞练习作业。总之，上面要研究、下面也要创造。

（五）训练与兵役时间的矛盾。

步兵也好，技术兵也好，兵役都是三年。头一年是单个训练，同时还要参加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施工任务，训练时学的东西又不精，第二年第三年刚刚学会了就复员了。我们军队训练出来的驾驶员和通信兵，转到地方上去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很有好处，这些复员兵到地方去很受欢迎。可我们是战斗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随时要准备战斗，军队的司机还不如地方的，那就不好了。

为了保持与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保存军队的骨干，必须把大量干部稳定下来，一方面从政治上、军事上加以提高，另一方面要从兵役制度方面研究一下，总结一下这几年实行兵役制度的经验。总而言之，要像贵州茅台酒一样，为了保持年年有一定的香味，每年只能卖出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做老底子，次年新酒要和老酒结合，否则就失去了老传统、老味道。这说明，老底子很重要。我们要保持老传统，基层必须保留一些老干部、老班长。

（六）“条条”、“块块”的矛盾。

“条条”、“块块”的矛盾需要解决，否则工作布置下去了，就是不能落实。如宣传部门来一个任务，要多少打球的，下象棋的等等，加起来数目字不少，一大部分士兵和班长就要离队。要不要搞呢？要搞，文化、体育都

要搞，但是过去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文化学习是为文化而文化，没有解决为军队训练、专业训练所需要的问题。所以，今后文化教育，除语文以外，主要学专业文化。如炮兵的专业文化，就围绕着炮兵需要学些数、理、化。防化学兵和通信兵也是如此。空军和海军，为了驾驶和航海，也需要学习些空气动力学和气象学。

体育训练，也要搞专业体育，如山地作战部队要练爬山，江湖地区作战的部队要学会游泳等。学专业体育，就是要学习为作战所需要的体育。因此，在体育训练计划安排上要有主有次，适当结合。

“条条”、“块块”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训练工作还是有困难的。党委负总责，就要解决这个矛盾，业务部门是没有办法的，开会时天天吵也解决不了。“条条”、“块块”的矛盾，各级机关都要注意，特别是政治机关、司令机关、后勤机关要注意，要服从党委的布置，如果有新的工作增加，要报告党委，党委要抓紧，这个权力不能下放，否则各个人强调各个人的重要，那就要乱。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还在党委。

第四个问题：要从实战需要来训练军队。

（一）按实战需要训练军队是一句老话，是一个原则。如何落实法，我认为，主要应从研究我们作战的预案做起。军委对整个国防划分了若干战区，规定了各战区的基本任务。各区应根据军委所规定的任务，具体地结合本战区实际情况，制定出作战方案。方案不只是一个，要根据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出多种作战方案。根据作战预案，进行兵力布署和配备。各军应根据本军担任的具体作战任务、交通条件和气候，研究出自己多种的作战方案，再根据作战方案进行训练。如海岛部队就研究海岛训练，滨海的部队要研究滨海训练，纵深部队要研究纵深训练，山区的研究山区的，平原研究平原的。当然，不是抓起一点抛弃其余，还是要分清主次，互相结合。因此，少而精，就是根据作战的任务和要求，按作战预案来训练部队，重要的课目要多些，次要的课目要少些。所谓多，就是重点课目的内容要多，训练的时间要多，训练的次数要多，并且要按本单位作战任务的要求，提出在战术上、技术上应该训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完成各种不同方案的作战任务。比如说，有的地区战争来了要死守，那就应专门进行坚守训练。守岛部队要根据守岛的任务，以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时间专门进行海岛防御的训练，如果把防御与进攻课目搞一样多，那就不符合任务和实战的要求。当然，作战预案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年年修改，真正战争来了，也不可能完全与我们预想的一模一样，所以，要研究出若干个作战预案来训练部队。

（二）要在极端困难和复杂条件下训练部队。要培养部队善于独立作战，敢于打恶仗。要想到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多练几手，练出真功夫、硬本事。

（三）要在原子条件下训练部队。对原子武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把它看得过高，也不能轻视它。因为我们认为武器和技术固然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和政治。除了这些基本道理外，还因为：

策一，新武器大量采用或少量采用，对战斗行动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新武器刚出现时是少量的，装备到部队是少数的，通常对战斗行动的影响并不大。比如说，在日俄战争时，重机枪是新武器，最初只有少量的装备到了部

队，对战术的影响不大，只有当它普遍装备到部队时，战术运用和战斗队形才起了变化。我们对原子弹也应做具体的分析，要看看装备到部队的是大量的？还是少量的？

第二，新武器出现，不可能完全代替旧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发明了坦克，当时都感到很奇怪，但它不能够代替原来的常规武器。即使新武器大量装备到部队，也不能完全取消和代替常规武器，还必须结合常规武器来使用。原子武器只有结合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的突击才能产生更大效果。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有的人讲，就像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喀秋莎”火箭炮一样，“喀秋莎”那时是新武器，可是，单纯靠“喀秋莎”还不行，必须和炮兵火力密切结合。只不过是新武器在战场上所起的破坏、杀伤作用更大些。

第三，原子武器的使用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战术性原子武器虽正在装备到部队，可是它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目标随便可以乱打的。能否使用原子武器，地形、气候、战斗发展的态势等都有影响。

第四，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原子弹、导弹以及放射性的、生物的、化学的武器等等）出现后，依然必须依靠诸军种、诸兵种的合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陆军战役、空军战役、海军战役的结合，整个国家战略指导意图是不能够实现的。整个战略指导一定是要进行若干空军、海军、陆军相结合的、统一的战役行动，换一句话说，不能单纯靠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靠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合同作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第五，军事学术常常落后于技术的发展。比如，过去许多人常常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也很容易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用到未来战争中去。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新的东西没有看到，老的东西记得很牢。如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人认为有了马其诺防线[5]就可以保住法国，这个思想很牢固。他们不知道，有了飞机和坦克后，马其诺并不是不可超过的防线。所以，对原子武器，一方面不要估计过高，另一方面也不要用过时的老观点来对待新事物，把老的观点用在未来战争中。新武器出现后，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它、了解它。只有认识和掌握了它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对付它和利用它。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原子武器，我认为其特点可能有如下两点：

（1）最主要特点之一，是国家的后方安全已经失掉它原来的意义。有了洲际导弹、远程飞机，战争可能常常不是从前沿开始，而是首先从纵深开始。过去一种新的技术的出现，无论机关枪、各种炮，甚至飞机，首先影响到战术，然后影响到战役、战略。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各种现代通信、侦察工具出现后则不同了，首先影响到的是战略，这是一个特点。

（2）由于原子时代各种技术的飞速发展，部队机械化、摩托化程度大大提高，使地面部队作战的快速性和机动性增强了。可是，地面部队运动速度的发展，现在看来没有赶上火力的发展。原子弹、氢弹、大规模破坏性杀伤武器的发展，特别是空中的轰炸机、超音速飞机的发展，使空中力量速度快、火力大，可是地面部队的运动速度赶不上，这就产生了火力同运动在若干程度内的脱离。

原子是时代的特征，是时代的代表，而实际上，原子时代是包括一系列的东西，不单纯是原子武器。

未来战争初期，战争第一阶段，敌人将首先使用无人驾驶杀伤兵器，用导弹、原子弹轰炸摧毁我们纵深内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空军与海军基地、军事仓库等。科学技术和侦察器材日新月异地发展，对我们的伪装可以了解的很清楚。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只要能保存住有生力量就是胜利。就是要能藏得住，我们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敌人非常注意战略设计，大规模地搞地下工厂、地下机场，分散军事工业和一般工业，同时大规模地训练军队、人民和进行城市防空建设。美国人认为：如果把一定当量的原子弹投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城市没有防空设备要损失百分之二十五，有一般的防空设备就可以减少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八。有设备和无设备相差很远。因此，战争初期，我们要保存住有生力量，在平地的钻地洞，在山区的钻山洞，待敌人到地面的时候，我们着重打近战。近战是我们的长处，这时敌人也不敢使用原子弹。总之，要发扬我们的长处，抓住敌人的弱点，我们就能胜利。这就告诉我们，各部队在训练时要因地、因任务进行训练，不要希望军区制定一个谁也适合的计划，军区只能有重点地提出一些要求，具体训练计划要由各部队制定。

大家知道，敌人在拼命地研究我国，他们认为中国国大、人多、山多、水多，能持久作战，用原子弹和氢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人多吃饭是个大问题。敌人为了对付我们，正在研究准备用生物、化学战来毁灭我们的农作物。这一着很厉害，我们要研究出办法，准备对付和粉碎敌人化学、生物战的进攻。

注释

[1]见杜甫《寄韩谏议》。

[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代之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为限。

[3]日俄战争指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它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俄军战败，日本取代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4]苏德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反击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苏联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英勇的卫国战争。苏德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主战场。一九四四年苏军发起总反攻，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攻克柏林，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历时四年的苏德战争最后结束。

[5]马其诺防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我军条令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反映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我们验收条令[1]的工作今天结束。我只是从几个方面来讲一讲。第一，从军队建设方面来看我们的条令；第二，从国际水平上来看我们的条令。

第一个问题，从建军方面来看我们的条令。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看，从发展上看，从我们目前需要上看。

我军条令的产生，是以我为主思想的体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建军、作战都要以我为主。我们有几十年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几十年作战中，我们锻炼出了一整套的全军共同承认的战法和全军共同承认的制度，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战法和人民军队的制度。这一整套都是几十年来在毛泽东同志不断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是我军的光荣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我们脑子里头，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脑子里头已经有了一个体系，并且不断地贯彻到我们的训练和作战中。可是胜利后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迷信外国的东西，不是以我为主地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而是不分先进与落后一齐照搬，不重视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后来纠正了这种倾向，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建军和作战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作基础，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以我为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示，要在一两年内编写出我军自己的条令。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即组织全军力量编写条令，各院校、部队也积极地编写自己的教材。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已经验收了第一批成品。这一批成品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我军经验作基础、以战略方针为依据、学习友军、研究敌人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不仅总结了我們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了别人现代的东西，所以这些条令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思想的，尽管这些条令还不能看成十全十美。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只要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上升。所以验收这一批条令是一件大事，解决了历史上多年来想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使部队训练和战备有了条令的依据。

我们的条令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反映，反映了毛主席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几十年来，毛主席的东西多得很，光毛选就有四卷，还有没有选入选集的，如文件、电报、书信等等，东西丰富得很。要从这么丰富的文件当中，把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吸收起来，反映到我们的条令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我们的条令是否反映了呢？是否有遗漏呢？肯定是反映了，但不能说很完全。有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电报上的东西还没有搞下来，同时许多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也能应用到军事上来。我们的条令肯定还没有全面地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可是我们工作要朝这个方向走，力求全面反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把他的普遍真理，把既可以用于过去、现在也可以用于未来的东西，完全集中地反映到我们条令里来。

我们的条令，也是中国人民及其军队同国内外敌人打了几十年仗的经验的基本总结。这些经验虽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但在国际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们这本条令，是前一辈人向后一辈人交班的一个文件。打了几十年仗，有丰富的经验，装在脑子里头，可是一进棺材什么都没有了，这很可惜，对

这是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条令验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总结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后代未作交代。人死是自然法则，人是从自然界来的，要回到自然界去，这是个规律，可是要有个交代。这个条令是具体交代的一个文件，是比较集中的文件。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把它集中得更完全，交代得更好。

从目前需要来看，对训练也好，备战也好，我们验收的条令是可以做为一个依据的。其次，各军种、兵种编写自己战斗条令的时候，也要以合同战斗概则为标兵。尽管它的内容写的还不够很完善，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标兵。各军种、兵种编写的条令要同这本条令对起口来。这样各军种、兵种才能真正地协同起来，如果思想上、学术上都合不成，那叫什么合成军队呢！再次，从军事学术发展来看，对全军研究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有所推动，对个人也有所提高。从条令开始编写到现在验收，我们军队的学术队伍逐渐扩大起来，形成了一支军事学术研究的队伍。总之，在目前来说，这个条令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需要的东西，基本上可以满足现在的需要。

验收的条令、教令部还有一个指头的问题，还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是不是九全九美呢？还不敢说，大概有六七成就差不多了。要达到十成好，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怎样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呢？还是要靠全军。所以公布之后一定要组织写文章，组织报告，组织讨论，除了宣传我们的条令是一本好条令之外，还要靠大家充实它的内容，纠正一个指头的缺点。还有保留意见，这是正常的情况，也很必需，在学术问题上一无保留，全部都赞成，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对保留的问题，要今天来解决也是不可能的，继续研究，将来会解决的。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次会议中有保留意见的问题，还需继续研究。如果忽视这些问题的提出，那不是科学的态度。到了全场鼓掌的时候，领导上就要注意还有哪些人没有鼓掌，或鼓掌有点勉强。这不是要收集材料打击他们，而是必须充分重视少数人的意见。他们不鼓掌或鼓得有点勉强，那就说明他们还不完全满意，一定还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都想把条令搞好。对某些问题他有怀疑，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时要请教他们，要设想他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注意少数，不注意到不赞成的同志，以多数压服少数，采取粗暴的态度，这是错误的。虚心地听取少数人不同的意见，求得把一切不同的意见都摆出来，从而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求得集中，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不同的意见尽可以保留，现在不能解决，继续进行研究。这次我们是验收条令，更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讨论。条令是我们军队训练、备战的依据，要见之于行动。验收条令是一件对全军负责的工作，必须严肃认真，每一条每一句都要慎重考虑，等于医生开药方一样，是二钱还是一钱半，他是有分寸的，这是一种负责的精神。不能解决的问题暂时挂起来，把问题挂起来，以后就有工作做了，若是百分之百的解决了，还有什么工作可做。不是要留有余地吗？我们搞条令也要留有余地。这不是能解决的问题故意不去解决，而是有些学术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要经过一段实践和继续讨论才能解决。

第二个问题，从国际水平方面来看我们的条令。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夜郎自大，是有根据的。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主观方面，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几十年的作战经验，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界上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最多，理论也应该最多，才合乎逻辑。我们验收的条令、教令、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也吸收了外国先进的东西，应当说是达到国际水平的。从客观上讲，我们不

从国际水平来看，人家也要把你拉到国际水平来衡量。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原子弹，还没有宇宙飞船，现在还拿不出手，可是人家不是这样看法。人家把毛主席看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文学家，军事是他一生活活动最精采的部分，从井冈山起，他指导革命战争、建设人民军队，有极为丰富的创造；我们是毛主席的部下，毛主席的学生，人家就要从毛主席在全世界的地位来看我们的条令。我们的条令一公布出来，人家就要研究，看看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写出的条令，究竟写了些什么？就要把它拉到国际水平上来衡量。好像乒乓球赛一样，究竟是冠军，还是亚军。人家定要来作这种比较的。所以要恰当地看一看自己的条令。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自满自足，要如实地看待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通过的概则也好，步兵战斗条令也好，飞行教令也好，有若干点，我认为在国际上来说是比较先进的：

一、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政治与技术两者中间是有个关系的，正确解决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光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是片面的、不对的；光强调政治，忽视技术的作用也是片面的。究竟它们的关系怎么样呢？毛主席讲：政治是主要的，是统帅，技术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两者的正确关系。又有重点，又有区分，又有结合。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条令，没有把政治放在主要的地位，过分地强调了技术。我们的条令，在这个问题上，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解决的比较好。我们充分估计到现代技术对战争和战斗的影响，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对待；又明确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人和政治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是我军强大战

斗力的泉源。

二、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有些外国条令，只讲军队本身，不讲人民的支援，没有把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显示出来。军队是作战的主力，可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武装的配合，是不能取得胜利的。特别在现代战争中这个问题更为重要。我们的条令反映了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这是我们条令的特点，也是优点。我们国家这样大，交通这样不方便，从南到北相距这样远，从东到西交通这样困难，没有足够的人民力量的支援是不行的。我们依靠广大民兵的配合和全民的支援，战争一来、就将使敌陷于广漠无边的人民战争的海洋。不管军队在哪里作战，都会得到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不管敌人在哪里空降，我们无需乎从很远的地方机动队伍，就可以在当地依靠一部分正规军同广大民兵对付它。

三、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办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客观，了解客观；可是要把客观可能变为现实，把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还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首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通过主观的努力，客观的可能不会自然地成为现实。毛主席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的根本方法，我们把知彼知己列为合同战斗基本原则的第二条，当成唯物论来看，就是这个道理。不是从唯心出发，是从调查研究出发，要知彼知己，然后加上主观的努力。我们的条令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系问题。毛主席指导每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都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他自己首先就亲自去摸、去钻。不调查、不研究，不可能知己，也不可能知彼。我们不是要蹲点子，到这个那个连队去吗？这就是为了调查研究。不管解决哪个问题，训练问题也好，作战问题出好，动员问题也好，干部问题也好……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就是要知己。还要研究敌人的情况，如美国的五群制师

[2]的编制、战术怎么样？日本最近军事力量发展的怎么样？肯尼迪[3]对付我们最基本的办法，一个是抓日本，一个是拉印度，你不研究这个不行。用什么方法调查研究呢？对自己，要蹲点解剖麻雀；对敌人要运用各种手段，广泛搜集材料，分析研究。如果不这样，就既不能知己，又不能知彼。《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而不知彼，一胜一负。这是个思想问题，也是个方法问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在我们条令里也反映出来了。不论战争和战斗，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消灭敌人，不消灭敌人一切都不好办。如何才能消灭敌人呢？必须采取进攻手段。要进攻必须集中力量。为了集中力量，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如隐蔽突然，灵活机动，很好的部署，很好的协同等。在战争的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但也要注意保存自己，特别在现代条件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不注意有生力量的保存，就不能消灭敌人。不仅要防备敌人使用这种武器进行突然袭击，在自己使用时也要注意安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两者要结合起来，又要分清主从。外国条令上只讲消灭敌人。我们的条令根据毛主席的看法，明确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目的，是一切军事活动的根据；既十分强调了勇敢战斗消灭敌人，又要求保存自己，把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方面辩证地结合了起来。

五、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有些外国条令只把进攻作为基本战斗类型，并把进攻和防御截然分开。我们强调进攻是主要的，又认为防御是不可缺少的，攻、防同为战斗的基本类型，并着重阐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刚才讲过战斗要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必须要进攻，可是同一个进攻时间，在某一个次要方向和地点要采取防御，以便牵制、吸引敌人，保障主要方向的进攻。可见防御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防御和进攻不是半斤和八两的，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为进攻服务的。

六、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我们的条令虽然是战斗条令，但是我们没有把战斗与战略、战役截然分开，而是把战斗做为战争全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强调局部要服从全局，战斗要服务战略、战役。因而，我们的条令处处注意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如：在进攻中既写阵地进攻，又强调了要力求歼敌于运动中；防御中体现了“顶”的精神。

七、顺利与困难的关系。有些外国条令，只讲顺利，不讲困难。我们根据毛主席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条令中既充分估计到我们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又承认技术上的相对劣势，明确提出了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困难和不利因素，这样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八、党委与首长的关系。有些外国条令强调单一首长制，强调指挥员个人的权威。我们的条令充分体现了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强调了一切有关作战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又强调了首长必须积极负责。在党委领导下，自始至终，从战斗开始准备一直到战斗结束，首长要积极负责。在情况不可能召开党委会议时，指挥员可以独断专行，容许他这样做，授权他这样做，事后向党委做报告。

九、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外国条令把政治工作仅仅看作是政治保障工作，还没有认识到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是领导工作。我们很明确地强调政治领导，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把它当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十、集中与民主的关系。在外国条令上只讲集中不讲民主。战斗条令概

则》和《步兵战斗条令》。

[2]五群制师是美军五十至六十年代初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群是介于营与团之间的编制单位。

[3]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军队训练的总体要求和勤俭练兵问题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七日)

军队训练总的要求

现在陆海空三军都在训练。对训练究竟应当提出什么要求？我们训练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拿出去打仗呢？当然，情况需要，像抗美援朝战争那样，不管训练到什么程度也要去打仗，在战争的实践中学会打仗的本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和平时期，军队要靠训练来学会打仗。经验证明，我们的义务兵能打仗，勇敢，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打过仗的干部也很积极，很勇敢，听命令。因此，可以肯定的说，靠训练能够提高战斗力。问题是有些干部意志衰退了，好的作风和传统在他们的身上丢掉了。现在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我党我军传统作风贯彻下去。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提出军队训练总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红专健结合。

我们军队要又红又专又健。红专健就是毛主席指示的“德育、智育、体育”。军队的训练工作必须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三者不可缺一。

红，就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要非常无产阶级化，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就海军来说，首先要使全体人员具有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的事业心。达到的方法，最主要的是抓思想，抓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

专，就是各行各业熟练地掌握本身的业务技术，学会战场上能过硬的本领，能够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时技术复杂的军种兵种来说，尤其重要，要由外行变成内行，要十分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我完全同意海军党委关于舰艇长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轻易改行的决定。前一个时期，某些地区生产上有“瞎指挥”，在苞米长到一人高时硬要拔掉，说不是高产作物，换种稻谷、番薯，结果两头落空，这不是瞎指挥吗？把培养了三五年甚至七八年的技术干部改了行，这是我们军队建设上的“瞎指挥”，也可以说是“瞎调动”，这是大浪费。技术骨干一定要保留。这几年来，由于技术骨干的削弱，不仅影响了部队专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全军已有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与现行兵役制度有关，与干部政策有关，需要作适当的研究。这次会议大家也提出了一些这方面的意见。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就要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方向是：在广大民兵的基础上，产生义务兵，在义务兵中留一部分超期服役兵作为职业兵，其中一部分通过学校培养提升为军官。只有这样，才能保留技术骨干。

此外，在这里顺便讲一讲文化教育问题。文化也是一样，要搞专业文化。海军要讲些海洋知识和航海知识，要讲些风雨云电。整个地球，海洋比陆地大。海上有无限的知识，海水有五十多种元素，海上科学研究大有可为。我们海军要搞点专业文化，把海讲清楚。

健，就是要有健壮的体质。只红不专不行，是空谈的政治家；只专不红更不行；但只有红、专，没有健也不行，这是“物质基础”。特别是高度技术化的军兵种，要驾驶飞机、军舰，不但要有熟练的技术，而且还要在摇摆

二三十度、抗七八级大风、机仓温度五六十度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更需要有健壮的身体。我们战斗、生活在海上、空中，除了红、专以外，强调健很重要，不然出不了海、上不了天，又有什么用。杜甫有句诗：“身欲奋飞病在床”[1]，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技术再好也没有用。这次汇报中，反映了舰艇干部、飞行员在健的方面存在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培养一个技术干部不容易，以潜艇艇长为例，时间要六七年，费用达二百万元，搞上几年身体垮了，岂不是很大的损失。所以除了要抓红、专之外，还要抓健。要做好劳逸结合，严格执行定期休假疗养制度，改进疗养方法，增设必要的淋浴设备。要进行专业体育锻炼，划划舢舨，搞游泳。要加强伙食管理，在可能的条件下保持营养。要使干部、战士懂得，锻炼好身体是建军的需要。

（二）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

技术决定战术，战术是技术的运用，这是正确的解释。在技术与战术的关系上，有一个时期被搞乱了，现在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训练是战术训练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进而学会运用战术。战术是人掌握和运用武器遂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也只有学会掌握战斗行动的原则和方法，才能更充分地发挥技术的效能。因此，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技术训练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开得动，打得准”。军事训练要做到这一点，并且要以开得动、打得准来考核训练成绩的好坏。所谓过技术关，也就是要达到这个要求。

开得动，打得准的具体条件是什么呢？同志们在汇报中提到了，有些更加落实了。比如，潜艇要开得动：（1）深透了解各种机件、仪器的性能；（2）熟知开动与起动的要领、顺序、规则，动作要合乎条令要求；（3）精通本专业并善于协同。能在复杂情况下开动、航行和管理，并排除故障；（4）有健全的维护保养制度，使武器、仪器经常处于良好状态；（5）有良好的损管组织和损管能力。要打得准：（1）使用的武器、装备、仪器维护保养得好，诸元精确；（2）能在复杂情况下熟练准确地操作；（3）熟悉射击规则，能够熟练地进行射击指挥。

战术训练的要求是合得成。合得成包括搞好通信联络（联得通）、密切的协同动作和实施坚定灵活的战斗指挥等。目前在作战和演习中，暴露了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上下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兵种与兵种之间，联不上，合不成，锣齐鼓不齐，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我们已经是一个诸军种、兵种的合成军队。现代战斗是诸军种、兵种的合同战斗，必须合得成，才能发挥诸军种、兵种的整体力量。就海军来说，一条舰的各个战位、各个部门之间要合得成，编队中各个舰艇之间要合得成，水面舰艇与水下舰艇要合得成，舰艇部队与航空兵要合得成，再往上说陆海空三军要合得成，不搞好这一方面，同样是不可能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这就是要在分练的基础上搞一点合练，在过好技术关的基础上过好战术关。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安排和组织各兵种、舰艇之间的合练。组织合练并不是要搞像穿山半岛那样示范性的大演习，而是搞小型的、简而易行的、在分练基础上的合练。当前主要是解决开得动打得准的问题，搞好基础训练，切实过好技术关，然后再过第二关，着重解决合得成的问题。

（三）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

在训练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训练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

过程。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间就有一个大脑皮层的艰苦活动过程，也就是思维、概括、抽象的过程，这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从群众中来，也就是从实践中来，广大群众的实践是智慧的源泉，又是真理的标准。把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制定恰当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再回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实践。在训练过程中，就是要运用这一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将训练、战备以及执行各项任务的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进行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再运用到训练、战备以及各项工作实践中去。如此不断反复，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结合。毛主席关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指示中所说的调查研究，就是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调查，科学的研究。海军航空兵某师的汇报中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根据敌机入侵时由昼间高空大速度变为夜间低空小速度的特点，研究出了教范上所没有的七个练习进行训练，使部队学会了新的作战方法，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战备。

我们的条令和教范，是我军过去作战、训练的结晶，又是指导我们今后作战和训练的指南。同时，随着今后作战、训练经验的不断丰富，条令、教范也将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因此，人人都必须遵守条令和教范，这在技术复杂的军种、兵种来说更为重要。对违反条令的行为要严格进行教育，对所发生的事故要“抓紧、解剖、追根、总结”，认真的解决。人人有权提出修改和补充条令、教范的意见，但任何人不得违反条令、教范，不能随便修改条令、教范。

教学人员的教学过程，同时又是具体的科学研究过程。边教学、边研究，是技术、战术不断发展的条件，我们的备课、教育准备会、试教、训练实施、考核等，无不体现着科学研究工作。例如，施教以前必须研究教学对象的水平和经验，研究技术装备的性能和情况，研究以往的成果，研究现代战争的条件和要求，等等。在教的过程中，又经过学的人员对这些问题的学习和研究，就会产生出新的认识、新的窍门、新的经验，把这些总结起来，加以提高，不仅会推进以后的教学，而且会推进技术、战术的发展。上面谈的海军航空兵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

（四）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

海军在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总的来说这两方面的结合是好的，但也有结合不够好的地方，还有一些意见和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统一认识。两者之间既要有分工又要紧密结合。因此，院校要虚心听取部队的意见，不断地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部队也要认识到，任何时候在学校里只能学会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技能，要达到熟练，还必须在部队中经过一番锻炼。因此，部队对毕业的学员应热情帮助和积极培养。

院校培养干部要适应部队的不同需要，部队要派出好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去住学。好的去，更好的回来，这样就提高了部队的质量，也提高了院校的威信。过去有些院校留的学员过多，部队送去好的回不来，就不送好的了。以后要改变这种现象。部队要保证送好的去，学员毕业以后基本上要回原单位。学校需要补充教员时，经党委批准后通过干部部门调。

以上就是对军队训练的总要求，也是训练工作的总目标。我们全军要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只有达到了这些要求，才算完成了训练任务，才能用来作战。古人兵书上有一句话：“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2]要达到以上的要求，就必须坚决贯彻少而精的训练方针，根据不同的部队、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需要和要求，突出重点，反复多练。一切真本事都是练出来的，要天天练，经常练，反复练。为了掌握练的要领，讲是必须的。讲与练要结合，要讲讲练练，边讲边练，精讲多练。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海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勤俭建军，勤俭练兵

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海军的建设对国家经济力量的依赖最大，所以困难也就较为明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装备暂时造不出来，现有舰艇、飞机因为缺乏材料、配件，维护修理能力不够，在航率逐渐减少，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发展；二是不少人员技术和业务还没有很好的过关，还不能熟练掌握现有的装备在复杂情况下作战。当然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是难不倒我们的，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是能够克服的。但正因为如此，有这些客观情况，我们更须发愤图强，发扬勤俭建军、勤俭练兵的精神，加强对现有装备器材的维护和修理，充分发挥现有装备器材的利用率，进一步深入贯彻军委少而精的训练方针，勤学苦练，争取在两三年内过好技术关和业务关，以便巩固和提高现有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搞好军事训练呢？根据同志们的汇报，我认为在海军训练中，必须抓紧三个环节。这三环节是：岸上训练，港内训练，出海训练。其中又以出海训练为重点。因为海军是担任海上作战任务的，要练出过硬的本领，最终必须在海上去过技术关和战术关。海军如不能出海，就等于步兵不能爬山。出海训练不仅可以练技术、练战术，还可以练顽强的战斗意志，练紧张的作风和海上生活的习惯。这次会议上大家都强调了出海训练的重要性，并把它看作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仅舰艇要出海训练，航空兵也要争取出海飞行，掌握海上飞行的规律。

为什么还要提出抓紧岸上训练和港内训练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舰艇和飞机有一定的寿命，特别是快艇的主机小时、飞机的摩托小时、潜艇蓄电池的使用周期等都有限，我们自己暂时又不能翻修和制造，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东西用完，所以还必须要抓紧在岸上练和在港内练，力求以岸代海、以地代空。在训练质量上要求少而精，高标准；在训练器材保证上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做到在港勤练，出海精练，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在岸上、港内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再到海上去练，海上训练的质量也就有了保证。如某潜艇支队某艇在试验室练鱼雷攻击六十次，在海上练鱼雷攻击二十次，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他们的经验是岸上练与海上练的对比是六比四，大家可以参考。

下面分别说一说怎样抓这三个环节。

第一，岸上训练。就是在岸上建设各种实验室，我看叫教练室比较好，如鱼雷、枪炮、雷达、机电、对潜攻击，等等。总之，凡是舰艇上有的装备，尽量求得在岸上设置一套，使舰员能经常地进行练习，还可以去观通站学，到轮机检验所学。这种训练主要是练习舰员的单人和战位的动作，以打好技术基础，并逐步巩固与提高。这种方法既不损耗舰艇的装备，又能使舰员经常地练，是一种多快好省的训练方法，是勤俭练兵的具体落实。

第二，在港训练。就是舰艇在港内进行战位、部门和全舰性的战斗操演，离靠码头、以及军官的理论学习、航海和战术作业等。这种训练主要是从个人操作到联合操作，也就是技术合练，把战位、部门、全舰捏成一个整体，使全舰人员能在一个号令之下统一行动。

无论岸上训练、在港训练，都是为出海训练做准备，目的是在海上。

第三，出海训练。要出海，但不能盲目出海。在我们舰少人多、装备器材缺乏的条件下，出海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细致的准备和充分的保障，使出海训练一次确能提高一步。出海训练的方法，同志们提出的有早出晚归、锚地集训、转移基地、远航训练等，时间也有长有短，这些都要根据不同舰艇的性能和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以及每次出海所进行的科目等而定。采取一条舰几套人，轮流操作，互相检查，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的经验也很好，值得推广。同时还可以考虑抽几条装备旧、性能差，将来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舰艇专作训练之用。有些战备器材老了，不能再作为战备器材了，可以把它改做训练器材用。

海军党委所提出的“日日有操演，周周有训练，月月有出海”的要求，就是指的岸上、在港和出海训练要结合进行。总之要能够不间断地练。据说外国训练海军也很重视岸上训练。苏军的各个海军基地，岸上均设有各种实验室，如攻潜实验室、鱼雷攻击实验室、枪炮实验室等。他们非常注意爱护装备和节约器材，如把陈旧的舰艇作为训练舰艇用，或将舰上的新炮拆下来换上旧炮来轮流操作，有战斗任务时再将新炮装上。此外，苏联和英、美等国海军学校的学员，在学习期间或结业后用机帆船练习航海，以锻炼学员的天文、地文航海和船艺以及海上生活。人家物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得多，还采取这样一些方法，减少战斗舰艇机器的磨损，节约器材和油料，我们就更应该如此。必须明确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我们的建设要在困难条件下建设，我们的训练要在困难条件下训练，将来打仗也要准备在复杂、困难条件下战胜敌人，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海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加强工程机务工作，保证飞行安全

保证飞行安全要从人和机器两个方面加以注意。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思想问题，身体问题，技术问题，还有指挥问题。机器问题就是维护修理的问题。只要人的工作和机器的工作都做好了，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飞行安全。

飞行训练所以会发生事故，有几个原因：有制造性质的、有修理性质的、有维护性质的、有驾驶性质的、有指挥性质的，等等。为什么提出事故原因有制造性质的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制造的某些重要配件虽然可以用于飞行，但是产品质量在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我们的机务人员和飞行人员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其余几个方面的原因，同志们讲了很多。比如在维护、修理方面：就有工作质量不高，机务人员成分新、调动多、责任心不强、技术水平低；责任制不严，不遵守规章制度；机务干部又不带头参加维护、修理；各级党委也很少抓机务工作等等。在驾驶方面：有的飞行员违反操作规程；有的技术没有过关，或者因为间断飞行过久，技术生疏，不能处置紧急情况；有的身体状况不好，等等。在指挥方面：飞行日组织不严密，塔台

指挥不当，飞行员身体不好，或者气象突然变化了还要飞行员继续飞行，等等。所以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避免发生事故，就应从改进上面的具体问题着手。

工程机务工作是飞行训练最重要的物质保障措施。空军建军十二年来，在工程机务方面成绩很大，建设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组建了一批修理厂。工程机务工作在保证飞行训练和执行其他任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工程机务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对工程机务方面的看法和同志们一样，发生飞行事故，机务方面要负相当的责任。为着保证飞行安全，就要大力改善机务工作。怎样改善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动员工程机务人员，发挥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努力完成机务保证方面的任务。而要动员机务人员的积极性，首要的条件又在于加强领导，加强我们的主观努力。各级党委分工掌管机务工作的委员，要认真地钻进去，扎扎实实地抓起来。如果分工管机务工作的党委委员自己既不抓、也不钻，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关心机务人员的生活，不同机务人员一起研究改进工作的办法，机务人员有些什么困难问题不拿到党委会上讨论、机务工作一些实际困难需要上边帮助解决的、也得不到上面的支持，那末，就会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感情也不融洽。这样，机务人员的积极性就发挥不起来，机务工作的问题也就会更多。如果说，一切工作做好做坏的关键在于领导的话，就要求各级领导从思想上、业务上来抓紧机务工作。第一是领导，第二才是机务。这次会议的纪要草稿中写道：“从空军工程部直到机务大队，要以认真负责、严格要求的精神进行一次整顿。彻底扭转不认真负责，不勇于承担责任、推卸责任的错误思想和恶劣作风。”这个很对。

出了飞行事故，特别是严重事故，是令人痛心的不幸的事情。无论领导干部、空勤人员、地勤人员，心里都是难过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分析原因，接受教训。我想，今后发生事故要具体地分析原因，首先应当从指挥、操作、维护、修理、制造各方面去找原因，得到教训，然后再着重从机务方面找原因。事故原因要从各方面去找，但着重是要搞好机务，这样讲比较好，比较公允。

保证飞行安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机务人员和他所维护的飞机之间建立固定的制度。固定制度就是责任制，一个机械师管一架飞机。哪架飞机是你管的，出了乱子就要找你。另外，飞行员对飞机的使用是不是也要相对地固定下来？农村公社生产小队实行土地、劳力、耕畜、家具使用权的四固定。步兵对步（骑）枪的使用也都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是一支枪。我们因为飞机少，所以只搞相对固定。我问过一个飞行团，他们的飞行员没有固定飞哪架飞机，今天是四二一，明天是四二四，他们飞的是运输机，问题比较少。但是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和飞机就要相对地固定下来，因为他经常使用那架飞机，就可以摸熟它的脾气。好像步兵对自己使用的步枪一样，偏左，在瞄准时就要向右边一点，偏高偏低也容易修正，遇到卡壳子或是其他什么故障，也容易排除。真正发现飞机的毛病，一方面在维护检查之时，同时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也要善于判断，善于紧急处置。这样，飞行人员自己就要多懂得一些机务知识，能够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里不对头了，飞行员一定要有这个知识。飞行人员和他使用的飞机相对固定下来，还有一个好处：便于和机务人员机械师建立联系。飞行员可以熟悉这个飞机的特性，同时他可以经常同机械人员开联系会议，告诉他们飞行中间在通信方面、机械方面、

驾驶方面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机务人员也可以向飞行员介绍飞机的历史，过去有没什么毛病，现在有什么毛病，哪个器材缺乏，哪个机件老了，你要特别注意等等。因为机器的结构不像人。人一生下来就是那样一个结构，一直到死为止。机器却可以换一些东西下来，把这个零件换下来，另一个换上去，因此，一部机器上的零件有新的也有老的，是拼凑起来的。但机器和人也有的相同的地方。“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的身体有一点毛病就感到不舒服。人体结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好。机器多一个外来物会出毛病，少一个又会开不动。最简单的机器莫过钟表，少一个螺丝、缺一个齿轮就不能走。飞机的结构更是复杂，对飞机的维护、修理更要细心。在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相对的协作，可以经常交换情况，这样对飞机的维护、飞行员的驾驶和飞行安全就更有保障。

保证飞行安全，执行条令是第一。这次会议的纪要中提出，每个月要组织二至三个机械日，搞一搞技术检查，要组织示范飞行日，审查飞行计划，要整顿机场秩序。团每个月实行一到两天一个小预备期制度，开展安全立功运动等等，这些措施都很好，很具体，很扎实。我在海军开会的时候，听到一个师长汇报，他说过去他那个师也是常出事故的，最后事故差不多没有了。根据他讲的经验，摸来摸去，要杜绝事故，要做一系列的工作，要注意飞行驾驶、指挥、机务维护等等，可是有个最后的关键，就是要把住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就是实行集体审批团的飞行日计划。第一要解决思想问题，第二是检查技术，第三是身体健康，第四是检查机械。思想、技术、身体，总之是一个红、专、健，又红、又专、又健，最后一个是机械。这些都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后，才批准他明天飞行多少小时。最后带关键性的这一关一定要把住，团要精精细细地组织好每一个飞行日。师要把最后这一关把住了，大体上就差不多了。飞行员思想有问题，技术不行，身体不好，飞机维护不好，就不放飞。这样，带故障飞行不就少了么？带病飞行的事情不也就少了么？带着生疏的技术去飞行的事情不也就少了么？发生事故，无非是技术生疏了，身体有疾病，或者是飞机有故障了，如果这三个东西都很良好，事故就可以大大减少甚至可以杜绝。最后这一关要把住。这一条经验，空军也是这样做的，我所以强调一下，是因为我感到很重要。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在
空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贯彻少而精的方针

贯彻少而精的方针，最终要落到“练”字上面。各行各业都要搞出一套经常练的东西来，哪些要天天练，哪些要周周练，哪些要月月练。有了这一套东西，各行各业就有了努力方向，就可以在这上面下一番苦功夫。

一、突出重点反复多练。

少而精的少，就是要抓关键。什么是关键？一般地讲，就是重点、要点、难点。训练是为了作战，要根据战争的需要来训练部队。各行各业的干部和战士所担负的任务不同，所需要学的东西也有所不同；各种人员的基础不同，需要学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需要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一本教程或教范，有十几个、几十个乃至数百个练习，我们从中抓住若

干最需要而又是最难掌握的练习作为重点。比如炮兵指挥员作业有八个练习，他们从中选了三个，并以第四练习作为重点，这不就少了吗？少是从多里面抽出来的，所以要先摸后抓。空军训练会议搞出了一套天天练、周周练的内容，听说这里也搞了，这很好。开始粗一点不要紧，让下边补充，不成熟也不怕，让大家在实践中来修正。

多少不等于有无，不要把多少的关系和有无的关系混淆了。重点、难点不同其他课目结合起来是不行的。为了解决几个重点、难点，不能把其他的课目完全不要了。次要的东西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课外的方法，简单直观教学的方法，使他懂得一点。比如射击，你拚命的搞射击学原理那怎么行呢？可是你不学射击学原理也不行，重点是练瞄准击发。所以多少不等于有无，在时间、精力的分配上，重点的要多些，非重点的要少些。

少而精的精就是这个道理。先有铁砂，后有毛铁，再一般的铁，再有合金钢、优质钢，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过程。我们的战术、技术，要达到精，也要通过一次、二次……一百次的演练，才能从很粗到比较粗、到一定粗，尔后到精。从初步精到很精是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训练思想不注意这一点，把很粗、比较粗的过程忽略了，就不能到精。由粗到精，由多到少，达到少而精，百练成钢，所以我们提倡一教百练。练里头从低到高，有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这是一个过程。陆军要先在营，后野营；空军先在地面，后在空中；海军先在海岸、码头，然后才出海，这都是一个过程。训练要有韧劲，要苦练，要有毅力。为了搞的好，就要天天练。

一切真本领、硬功夫都是练出来的。要一教百练，百练才能成钢。唐朝韩愈有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3]，是有道理的。凡是带练的东西都要下苦功夫。苦练不是死练，要懂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各行各业都要搞出一套练的内容，同时各军、兵种还要搞出一套练的方法。

海军已经初步摸出了一套方法，叫做“在港苦练，出海精练”。日日有操练，周周有训练，月月有出海。为了打好出海训练的基础，先在岸上的各种实验室练，在港内练。出海训练的方法有：早出晚归，锚地集训，转移基地，远洋航行，同时采取一条舰几套人，轮流操作、互相学习的方法。

空军也初步摸出了一套方法，叫做：“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采取在地面练习器上练，徒步演练，座舱实习等，以打下空中精飞的基础。实行长流水，不断线，不怕短，只怕断，少吃多餐。

陆军各兵种也应当把自己练的方法总结总结，是不是可以提出“在营苦练，野营精演”，就是在营区附近的操场、靶场、演习场搞好基础训练，练到一定程度，就拉出去搞野营，全面锻炼部队的行军、作战。每次野营时间的长短，根据训练目的而定。野营前要有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

二、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

苦练的要求是少而精，苦练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在掌握了基本要领、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就要强调多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条件下去苦练。先基本后应用，先技术后战术，先分练后合练，先一般后复杂。真本领、硬功夫，就是能够在白天、黑夜、黄昏、拂晓、阴雾、风雨、各种季节、各种天候、各种地形的复杂条件下都能发挥威力，就是能够在二百米以内的距离上硬过敌人，就是要能够同敌人进行近战、夜战。我们的训练一定要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我在空军讲，要创造这样的训练条件：地面逼似空中，空中逼似实战。地面部队的训练也

应当是在营逼似野营，野营逼似实战。要设想各种困难，以最复杂的情况来训练部队。平时训练，就要练出战时的作风来。最重要的是练近战、夜战。

在未来战争中，夜战、近战将占很重要的地位。胜败取决于几十米。善于夜战、近战是我军的优良战斗传统，我们要在新的条件下发扬这个传统，把我们的部队个个培养成夜老虎。

三、牢固地树立勤俭练兵的思想。

现在我们国家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但达到我们国防上的要求还要一个时候。这个是目前暂时的状况，但我们勤俭练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这个地方。人穷当然要勤俭，可是我们的勤俭练兵的思想不在这，不是因为穷才提出勤俭练兵，穷固然要勤俭练兵，就是将来不穷了，很丰富了，我们练兵也是勤俭练兵，这是百年大计。比如海军训练尽可能在码头，尽可能在岸上打下基础，然后才出海；空军尽可能在地面上练，无论练驾驶、练射击、练仪表，无论是在教练场上练编队，尽可能在地面上设置若干教练室、教练场，利用代用的东西，把常识搞清楚，把基本动作在地面上搞好，做到出一次海提高一步，飞一次空提高一步。空军各个师都有练习室，海军也有实验室，问题是过去很长时间把这一类的训练当作是辅助的、业余的，而不是当做经常的、正式的训练。要认识到我们的东西，比如飞机的摩托小时是有一定时限的，天天飞，机器就磨损了，汽油也有一定的消耗。海军也是一样，护卫舰走一个小时要一吨半油，如果开到二十四节要五吨油，机器磨损了，油料消耗了，可是技术还不行。所以需要加强地面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为了常规武器的训练，越到尖端越要这样子。苏联的载人火箭不是到了太空吗？有名的加加林[4]何尝在太空练过呀？他的成功主要是在地面上练，可是他的伟大完全在天空、太空中。这就证明在地面上是可以完成训练任务的，证明是可以在地面上打基础的。所以地面练不是一个辅助的训练，是基础训练，不是业余训练，是正式训练。

我们陆军是不是可以提一下，在营苦练，野营精演，经常在营练。在营不是指在房子里，是在营房附近，在练习室、练习场、射击场、演习场多化费功夫。各兵种都有这个问题。车辆要多开，可是不能多开，飞机要多飞，可是不能多飞。你把飞机寿命飞完了，敌人来了，你就驾不动了，新的来不了，老的不行啦，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考虑全军的技术装备要来一个安排，把若干需要保存作为战斗使用的作为战备器材；有些老掉牙的诸如旧飞机、旧炮、旧枪支等，打仗时也用不得了，干脆拨作训练器材用，拿到学校、营房改为训练器材用，可以解剖为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进行直观教育。只要把勤俭练兵的思想讲深讲透，把实际困难告诉大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人人献计，就一定能在现有物质条件下搞好我们的训练。我们建军是在困难条件下建军，训练也要在困难条件下训练，将来作战也要准备在困难条件下去战胜敌人，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在陆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条令问题

同志们知道我们第一批条令就要颁发了，一本是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一本是步兵战斗条令，一本是飞行教令。其他的条令、教令将陆续验收。这是我军建军史上一件大事情。我们要搞自己的条令，自己的条令是什么？它是

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以我军经验作基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为依据，并研究了苏联朋友的东西，也研究了敌人的东西，而且充分地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特点，以我为主制订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条令。这是全军的干部，两年来，在军委不断的关怀下写成的。军委讨论时大家认为是个好条令。因此，我们对条令，不管是技术条令、战术条令，我们要树立贯彻条令的思想。条令不是十全十美的，对毛主席的思想也不一定完全体现了，而且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技术、战术也不断在发展，我们的经验也是发展的。所以这个东西要不断研究，不断发展。训练过程，贯彻条令过程，要有一个平行的工作就是科学研究。搞一个技术训练，搞一个战术训练，脑子里就要想想这样做合不合乎实战要求。在训练过程中，我们的武器，我们的编制，我们的战术，有没有问题，脑子里要存在这么一个科学研究的思想，然后才能动员我们全军，无论战士，无论干部，在不断训练过程中，通过演练发现我们装备上的缺陷、武器上的缺陷、条令上的缺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条令、我们的装备不断的发展。没有这个东西前进就困难。我们要执行这个条令，研究这个条令，通过训练来检验这个条令。但是有一条必须定死，任何人必须遵守这个条令，贯彻这个条令。任何人可以在训练过程中发现条令中的问题、规章制度上的问题，任何人都能提出修改的意见，也必须这样做，我们才能有进步；可是没有修改之前、必须遵守，必须贯彻。此外，还有一个规章制度问题。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几年来事故惊人，产生事故有很多原因，不遵守条令规章制度也是原因之一。战术条令固然要遵守，技术条令更要遵守，一不遵守就要出乱子。这个问题空军最敏感。所以，执行条令、规章制度特别重要。

条令和规章制度必须贯彻。人人都有权提出修改意见，可是人人没有权不执行。这两条要定死。你有意见可以提，大家研究，修改可以，但没有修改之前必须遵守，否则我们集体生活、集体行动就不可能。

军队是大量武器、装备和人的结合，只有人和武器装备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作战，发挥军队战斗的威力。有些武器装备是一人一件的、飞机、坦克、大炮、舰艇是几个人或几十人共同操作一件的，这些武器装备要把它维护好、保养好，维护保养不好同样不能发挥威力。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在陆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

注 释

[1]见杜甫《寄韩谏议》。

[2]见孔子《论语·子路》。原文为“不教民战是谓弃之”。[3]见韩愈《进学解》。

[4]加加林，苏联航天员。一九六一年四月驾驶“东方号”航天飞船完成世界上首次航天。

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军委：

根据军委的指示，陆、海、空三军于五月六日到六月七日分别召开了训练会议。三军的会议均着重讨论了训练方针的落实问题。我过去由于很少抓海、空军的训练，这次用了较长的时间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和讨论，觉得内容很丰富，问题也很复杂，今后很有必要多抓一抓海、空军和陆军各特种兵的训练。

据到会的同志反映，这次三军的训练会议开得都好。真正是一个合成军队的训练会议。陆、海、空军对各兵种的训练问题都研究到了，特种兵的同志对这一点特别感到满意。真正是一个落实的训练会议。绝大部分同志的汇报内容都比较实际，每一个问题讨论都比较具体。讨论的结果都写入会议的纪要或专题总结里面，三军训练会议的文件，已分别呈报军委审批，这里仅就陆、海、空军训练中共同性的几个问题，简要报告如下：

一、关于贯彻训练方针问题

今年开训以来军事训练的形势是好的。部队经过两忆三查^[1]和国内形势教育，思想基础好，情绪高，干劲大；军委的训练方针已经深入人心，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改进，党委、主要军事首长亲自抓训练，同时又能够发挥分工负责训练的副职的积极性；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已开始形成风气；训练作风有很大转变，训练质量也有所提高。实践证明：军委的训练方针完全正确。当前军事训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少而精的方针进一步落实的问题。

目前部队和院校在贯彻少而精的方针上面，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一般来讲，宣传还不够深入，措施还不够有力，“少而不精”、“不少不精”的现象仍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练的精神不够。练什么，怎么练，还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東西出来。因此，为了进一步贯彻少而精的方针，根据三军训练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认为必须：

(一) 突出重点，反复苦练。

少而精的少，一个是取舍问题，一个是主次问题。各行各业的干部、战士所担负的任务不同，其需要的东西也各有不同；同一行业各种人员的基础不同，需要侧重学习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取其需要的，舍其无用的。在需要的东西中还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主要的多练，次要的少练，无用的干脆不练。多少不等于有无，两者不能混淆。不能只抓主要的，次要的完全不要了。次要的东西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如课外的方法、直观教学的方法等来解决。少是从多中来的，因此，要先摸后抓。摸要全面的摸，抓要抓关键，抓战争中最需要的东西。目前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对军委关于各行各业要搞上一套经常练的内容的指示正在贯彻执行中。我认为凡是已经初步搞出来的，要进一步落实到基层和个人，尚未搞出来的，应迅速搞，开始粗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实践中补充和修正。抓住了关键，就要反复练、经常练、勤练苦练，特别是要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练。一切真本事、功夫都是苦练

出来的，只有勤练苦练，才能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由不精到精。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下苦心，用苦劲，树立勤练苦练的思想，发扬勤练苦练的精神，养成勤练苦练的习惯。并使个人自觉的练与有组织的练结合起来。练必须持之以恒，特别是技术兵种最怕中断。过去有许多经常练的课目，常常在各种运动时就中断了，训练预备期又不去进行补习，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规定，凡是天天练的东西，在训练预备期和各種运动期间也要坚持。

（二）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

苦练必须掌握练的要领，讲究练的方法，通常应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根据陆、海、空三军训练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在练的方法上需要抓住两个环节：海军要“在港（包括在岸）苦练、勤练，出海苦练、精练”；空军要“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陆军要“在营苦练，野营精练”。两个环节中，出海训练、空中飞行、野营训练是主要环节，陆、海、空军各兵种的真本事、硬功夫，最终必须在这里过硬。但是，在出海训练、空中飞行和野营训练之前，必须在港内（在岸）、在地面、在营地天天苦练，打下一定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出海精练、空中精飞、野营精练的目的。两个环节，有先有后，有主有从，相互为用，缺一不可。在港（在岸）、在地面、在营的训练，受气象条件和装备器材缺少的影响较小，便于更多的人同时练和经常反复练、既可以提高训练质量，又可以节约装备、器材、油料，因此，是多、快、好、省的练兵方法。如空军过去的仪表飞行训练要十二至十四小时，二四六四部队和二七四七部队经过在地面的仪表练习器上反复苦练后，只飞了四至六小时就学会了；一一五八部队，有一艘潜艇在教练室练鱼雷攻击六十次，打下了基础，然后出海只练了二十次，命中率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因此，港内（在岸）练、地面练、在营练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训练阶段；

不是一种业余的活动，而是一种正常的课目；不是一种临时的插曲，而是一般的训练程序。

为了加强在港（在岸）、在地、在营练的效果，目前应在这方面下一点本钱，花一些精力，建立和充实各种教练室、教练台、教练场（不是指大的战术演习场）、射击场等，创造便于勤练苦练的条件。

训练中的这两个环节仅是一般性的，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具体实施起来不尽相同，应在实践中及时总结与积累经验，摸出自己的一套具体的练的规律来。

（三）明确练的要求，提高练的质量。

根据我军以往训练的经验和当前的情况，鉴于目前通信联络工作问题很多、技术很差，部队在剿匪、平叛、作战以及演习中常常联络不通，因此，这次在三军训练会议中将“联得上”也作为技术训练的一个要求补充进去，成为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

考虑到部队在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之后，还要学习战术，因此，对战术训练也要相应地提出几点要求。我想，是否把“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作为战术训练的基本要求提出来。“合得成”就是诸军种、诸兵种在战斗中协调一致，“摆得开”就是正确部署兵力、兵器，“捏得紧”就是掌握部队形成拳头，概括起来也就是指挥好、协同好。

一切技术训练都要为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一切战术训练都要为了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要动员全军广大干部和士兵群众为达到这一要

求而努力奋斗。严格说来，目前各军种、兵种技术都还没有过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开不动、打不准、联不上。这就需要狠抓技术训练，打好技术基础，过好技术关。首先着重解决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合得成、摆得开、捏得紧的问题，过好战术关。一定要把基础打好，要根据上述的要求来考核训练的成绩。坚决克服过去某些赶进度、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努力提高训练的质量。

（四）严格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切实防止和减少事故。

近几年来，我们部队中对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的观念有些削弱。在训练中，有的部队由于不遵守条令和操作规程，或由于制度废弛、维修不良，造成了不少严重的事故，如机毁人亡、舰沉人亡。损坏或浪费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器材、油料，很有必要加以整顿。必须强调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条令和操作规程去练，严格遵守维修制度，以切实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强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的观念，养成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的习惯。一方面，人人有权对条令和规章制度提出修改的意见；另一方面，没有修改以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条令和规章制度，不得违犯。这一点必须肯定。

二、关于勤俭练兵问题

当前训练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训练和装备器材保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陆、海、空三军的技术兵种，这个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海军部分舰艇停航待修，空军停飞的飞机也不少，飞行员的飞行训练时间比往年减少一半以上，平均每个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也达不到要求。这就影响到海军不能多出海，空军不能多飞行。陆军在车辆、训练用油、弹药、电池等方面也比往年困难。这就更加需要发扬勤俭练兵的精神，在装备器材困难的条件下把部队练好。为此，必须：

（一）大力宣传勤俭练兵的思想。勤俭建国，勤俭建军，勤俭练兵，勤俭办一切事业，是毛主席指导各项建设工作的根本方针之一。因此，勤俭练兵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但近年来许多同志在这方面不大注意了。我认为在当前有必要大力宣传一下勤俭练兵的思想，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奖励发明创造，及时总结并推广勤俭练兵的经验，使勤俭练兵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风尚。

（二）在训练质量上要求高标准，在器材保障上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尽量以旧代新、以假代真、以土代洋。建议从我军装备中除储备足够的战备器材外，可将陈旧的装备器材，拨出一部作为建设各种教练室、教练场之用。这样，既可以解决人多器材少的矛盾，又能减少装备器材的耗损。

（三）贯彻军委颁布的“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加强维护保养工作，爱护装备器材，提高现有装备的利用率。

另外，少量进口一些目前国内还不能制造的器材和配件，解决某些特殊需要，也是必要的。

三、关于训练的领导问题

从三个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今年训练的领导比过去大大加强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一是一般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没有把上面的东西

和本部队的情况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上级的指示落到实处。二是各项工作的安排还不尽妥善，不少同志反映政治教育和生产劳动安排得过于集中，工作落到基层形成“横队前进”，有的同志形容今年军事训练有点像金门打炮、“打打停停”。在训练工作本身安排上也有问题，干部训练还很不落实，许多训练课目都推到了下半年，各级干部工学矛盾还很突出。三是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结合得不够，管训练的不注意科学研究，管研究的不注意抓训练中的问题，对加强军事训练中的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因此，为了全面贯彻少而精的训练方针，提高训练的质量，必须：

（一）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训练工作必须越做越细，要真正深入基层一摸二抓、一带二帮，摸清情况，抓住问题，传授经验，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特别要切实带领基层干部，继承我军光荣传统，善于把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每一件工作都落到实处。

（二）党委抓总，统一安排。上级领导机关要注意协同，各项工作要互相都有联系，不能孤竿直插；布置工作要给下级留有余地，不应限制过死，要求过急。下级党委要善于抓总和关闸，要抓得起、顶得住。要以“四好”[2]为纲，以军事训练为主，统一安排各项工作。

（三）把军事训练和科学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明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从事任何工作都包含有科学研究的过程在内，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间就有一个思维、概括和抽象的过程，也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把广大群众在训练和作战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及时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将研究成果再用以指导训练和作战的实践。如此不断反复，就可以更好地推动工作、改进技术、发展理论，使学用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海军一二四一部队的经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他们根据敌机的入侵由昼间、高空、高速度变为夜间、低空、低速的特点，研究出教范上所没有的七个练习进行训练，使部队的战术水平得到提高，作战信心大为增强。因此，需要提高全军干部对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各行各业干部都应抓紧工作过程中的研究工作，以便使我们各项工作的质量不断提高。

此外，关于院校的培养干部和调整问题，干部部和军校部已起草了一个文件，我的意见，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牵涉面很广，为慎重起见，拟先发到会同志酝酿一下，会后由军校部、干部部加以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然后再召开专门会议解决，这里不再细述。

在三军训练会议上，听了他们汇报之后，都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将三个发言稿一并送上。请审查。

注 释

[1]两忆三查指一九六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忆阶级苦，忆民族恨，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思想教育运动。

[2]“四好”指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八日)

第一，充分认识新条件下司令部的地位与作用

司令机关是军队组织极关重要的部门，是军队的领率机关和指挥中心。军队的管理教育、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等，都需要司令部来具体的组织与实施，一切军事计划只有通过司令机关才能实现。司令部在我军建设与作战中具有根重要的地位。

党中央、军委、毛主席及各位元帅历来都很重视我军司令部的建设。我军的司令部，随着军队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步地健全起来，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健全，从早期到现代；反过来，它又不断地促进了军队建设的发展，适应了战争形势的需要。在我军建军与作战史上司令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古田会议决议[1]为建设人民革命军队的新型的司令部奠定了基础。

在我军建军初期，司令部的建设着重是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把司令部工作纳入党委的直接领导，克服军阀主义倾向。在毛主席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明

确地指出：“红军的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的执行工作。”并正确地规定了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决议案指出：“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这就是说、我军的司令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与政治机关分工协作，互相尊重地进行工作。从而把我军司令部的建设纳入了正确的轨道，为建设人民革命军队的新型的司令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军在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健全了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

随着军队的大发展和长期抗战、准备反攻的需要，对司令部建设引起了更多的重视。在这一时期内，除继续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外，强调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与业务建设，重点在于组织建设。选调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员作为司令部的骨干，并吸收了大批政治上纯洁、经过一定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以后建设正规的司令部奠定了组织上和工作上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司令部建设上，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1.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毛主席和军委对这些会议均做了具体指示。

2. 一九四一年颁布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司令部的任务、司令部的组织、分工和建立司令部的各种工作制度，等等。

3. 一九四一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健全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的指示。指示中强调了加强司令部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健全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改进司令部的工作作风和提高司令机关威信的具体要求和措施。

4. 各位老总对建设司令部的重要性，健全司令机关的组织、选拔与训练

这是叶剑英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参谋人员、培养司令部的工作作风，提高参谋人员的地位，树立参谋工作的威信等，都做过重要的指示。

5. 军委以及各个根据地都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

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进入正规化建设和大兵团作战，要求有一个正规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有了很大的发展，装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战争的形式由分散的游击战转为大兵团的正规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要求司令部必须进一步健全组织，提高工作效率，成为正规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四、全国解放后，我军进入建军的高级阶段，对司令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国解放以来，我军司令部工作随着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日趋健全。建设起来了各军、兵种司令部和合成军队司令部，选调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充实各级司令机关，参谋人员的政治觉悟、军事学术和参谋业务的水平均有显著的提高，在完成作战、训练、战备、整编、管理教育、民兵建设等任务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军队建设的要求来看，从未来战争的需要来看，应该承认，还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

现在，军队是诸军种、诸兵种的合成军队，现代战争是诸军种、诸兵种的联合作战。一切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困难得多了。诸如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协同动作、战斗保障、后勤保障以及部队的训练、整编、动员、管理教育，等等，都需要周密的计划组织，而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通过司令部来组织实施。现代战争又要求一切工作既要快，又要非常准确。这就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非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2]为了贯彻上述指示，一九五八年七月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司令部工作的专门决议。由此可见，加强司令部建设仍然是我军当前建设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各级首长和参谋人员必须足够认识新条件下司令部工作的地位、作用，沿着毛主席、军委所指示的方向，发挥我军司令部工作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地把司令部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各级司令部均已按军委确定的编制进行了整编。今后司令部的建设，除继续从人员选配予以加强外，应着重于思想、业务、作风三个方面。

第二，加强司令部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作风建设

一、思想建设。

思想建设是司令部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哪个司令部疏忽了思想建设，哪个司令部就一定会发生问题，做不好工作。你们的会议反映了有的参谋人员工作不安心，缺乏事业心，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待遇，责任心不强，不能任劳任怨，政策水平低等等思想问题，不同程度地给工作造成了损失。因此，各级司令部必须加强司令部的思想建设，使全体参谋人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一定的政策水平和优良的品德。根据司令部工作的要求和现实情况，我们认为参谋人员必须：

1. 要有政策观念。军事为政治服务，军事服从政治，这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司令部工作是掌管军事工作的，必须要使我们的一切军事行动符合党和

国家的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军委的各项方针、原则。如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3]和海边防的斗争，打什么目标，什么时机打，打到什么程度等等，政策性很强。司令部在组织指挥这种斗争时，必须根据党的政策办事，如果考虑不周到，违反了政策，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平时的许多重大工作也是和党的政策，国家的法令，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就必然会犯错误。因此，参谋人员必须加强时事政策的学习，认真研究上级的各项指示。

2.要有全局思想。参谋工作是很具体的业务工作，每一项具体业务工作都与整个工作，及各领导部门的工作有有机的联系，以及与部队的思想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参谋工作必须要有全局观点，要善于同政治部门、后勤部门主动协同，密切合作；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善于从全局看局部，从现象看本质，从业务看思想。特别是现代作战，兵种多，更要树立全局观点，合成军队观点，一盘棋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司令部的整体力量，发挥请兵种合同战斗的威力。

3.要树立高度的事业心。做革命工作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参谋工作是革命工作的分工，是为了建设好军队，训练好军队，为了打胜仗而工作的。因此，参谋人员必须对参谋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在工作中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要做无名英雄。参谋工作是根据党委和首长的决心进行工作的，是以首长的名义和代表首长进行工作的，而不是以个人名义按照个人的决心进行工作的。因此，参谋人员在工作中不应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应为实现首长的决心，维护党委、首长和整个司令部的威信去努力工作。

要任劳任怨。参谋工作是很艰苦的工作。特别在行军作战中，工作量大，任务繁重，经常睡不上觉，吃不上饭，走路多，有时还要挨批评，等等。对待这些，要从积极完成任务，积极改进自己的工作来解决，要有为了工作和战斗的胜利，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精神。

二、业务建设。

现代作战，兵种多，技术复杂，情况变化快，时间因素对战斗的胜败起着决定的作用。因此，司令部的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效率，参谋人员必须精通自己的业务。目前我们的司令部工作之所以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作战的要求，主要原因就是业务不够精通，水平不够高。如你们这次会议上所反映的：不少的参谋人员拟制作战文书迟缓，质量不高，文字冗长；有的不会调制要图，甚至不会用地图；情况掌握不住，部队出发了，报告不出实力来；有的司令部在部队野营时联系不上；对上级的指示照抄照转，提不出有力的建议；不少的参谋人员缺乏必要的战术、技术知识，等等。因此，加强司令部的业务建设是当前司令部建设的一项中心任务。

为了适应现代作战的要求，参谋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1.具有一定的战役、战术水平。掌握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原理原则；熟悉有关的战斗条令；熟知军事工作的各项方针、原则；有一定的战史知识；能根据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有价值的建议，并善于根据首长的意图和决心组织指挥战斗和各项工作的实施。

2.具有全面的参谋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能熟练地拟制各种作战文书和工作指示、计划，调制各种图表；会使用现代的通信器材和计算工具；会

识图用图，熟知作战地区的兵要地志；熟知部队的编制、装备和实力；敌军的番号、序列、兵力、位置，战术特点；敌我态势；等等，以便随时能为首长定下正确的决心提供准确的资料，能迅速完成首长指示的各项任务。

3. 具有必要的军、兵种知识和各种现代武器装备知识，并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各军、兵种和各种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了解各种装备的性能和特点，并根据需要尽可能会驾驶和操纵；了解敌人的新式武器、器材的战术、技术性能；对于数、理、化、史、地，乃至天文气象，均应有一般的常识。以便能够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更好地组织各军、兵种协同作战。

总之，参谋人员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本行本业的活字典，成为专家。这是比较高的标准。达到这样的标准，不是每一个参谋人员在短时间里很容易能够全面做到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经过长期的刻苦努力学习，是可以做到的。为此，必须加强司令部的训练，除了有计划地选送参谋人员入有关院校培养和在部队组织短期参谋集训以外，大量的的是加强在工作中学习，加强自修，缺什么补什么，并有计划地下部队锻炼。

三、作风建设。

一个好的司令部必然有一个好的作风。没有好的作风，司令部工作就一定是稀稀拉拉的。你们这次会议上反映了一些作风不好的例子：如工作不细致，不准确，粗枝大叶；有的司令部起草文电丢三拉四，上报数字一错再错；有的司令部工作忙乱，被动应付，拖拉迟缓，制度不严，长期不开部务会，办公迟到早退，等等。为此，必须加强司令部的作风建设。司令部的工作作风应当是：积极、主动。这是做好参谋工作的前提。没有这个作风一切都谈不到。积极性高、主动性大的主要标志是：对首长的指示，千方百计地设法去完成，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即使首长没有指示，只要是工作范围以内的，对部队的建设、训练、作战有利的工作，就积极主动地去做，并及时报告首长。坚决反对那种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的不良作风。

有计划、有预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司令部工作如果没有很好的计划性，就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行动和工作的实施。计划性主要表现在，能根据对情况的分析，根据对上级的指示和党委、首长的决心的正确理解，根据科学的计算，给部队提出明确的任务，确定完成的时间、步骤和方法，周密地组织协同和保障。同时，计划性还表现在，司令部本身工作的安排，人力的使用，有条不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既要以主要力量完成当前的中心任务，又要以部分力量兼顾经常工作和做好完成下一个中心任务的准备。计划性必须和预见性结合起来。没有预见性，计划性也就很难实现。科学的预见是建筑在科学分析情况的基础上的。因此，参谋人员要善于收集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从而预见工作和战斗的可能发展，及时向首长提出建议，修改或制定新的计划。特别是在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司令部要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的情况，及早向首长提出防范措施的建议，并提醒部队注意，以避免和减少损失。

迅速、准确。现代作战，情况变化快，要求指挥员下决心要快，部队的行动要快。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司令部的工作就要快。否则，“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就是不可能的。快，就是紧张，就是雷厉风行，就是闻风而动。司令部工作的快要做到：收集整理报告情况要快，拟制传达作战号令要快，处理问题要快（特别是团、师司令部）。为此，必须简化作战文书，经常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指挥工具等。快，但不能毛草，

要非常准确。传达命令，上报情况，提出建议，总结经验，必须是有根有据，准确无误。凡是可能时，一定要亲自看到，经过亲自调查。不能凭道听途说，凭想当然做报告，尤其反对做假报告。特别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大小问题，要有冷静的头脑，分清先后缓急，区别主次，绝不能粗枝大叶，丢三拉四。

虚心，负责。对上，对下，对友邻部门，必须抱虚心的态度，诚恳地接受批评，虚心地听取意见。下部队检查工作时，一定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同时又必须是负责的态度，坚持原则，根据首长的决心和指示办事。不能无原则的迁就，看到明明是错误也不批评。这两方面都不可少。只有虚心而不负责，就会毫无决断，做工作没有力量。反之，如果只有负责没有虚心，就必然是到处指挥人家，犯主观主义，和人家关系搞不好，也就会到处碰壁，做不好工作。

第三，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

为了在军队建设和现代作战中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首先司令部本身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能；要按照司令部工作的规律去进行工作；要积极主动地了解首长的意图，正确领会上级指示和全面地分析情况和形势，及时提出建议，并根据党委和首长的决心，组织一切军事工作的实施。司令部人员应当明确：司令机关不仅是个执行机关，而且又是个倡议机关。必须全面地实行这两个方面的职能，才算充分发挥了司令部的作用。这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当然，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还须要首长善于使用司令部。首长要和参谋长保持密切的同志式的关系，主动及时地将自己的意图告知参谋长和司令部，通过他们去组织实施各项军事工作，并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严格的要求，经常检查司令部的工作，表扬成绩，批评缺点。在这一方面，我军有着优良的传统，应当予以保持和发扬。如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所指出的：“首长与参谋长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应在政治方向与军事见解一致的基础上，互相尊敬、互相信赖、互相维护威信，并在政治立场与工作利益上，保持情感之融洽，使工作顺利进行。”

同时，首长还要关心并注意亲自培养参谋人员，像师傅带领徒弟一样，耐心地教导和帮助，不断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使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真正成为首长进行各项工作与作战的得力的机关和助手。那种只管使用不管培养的现象是要改变的。

第四，战备、训练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在加强参谋业务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司令部的军事学术的研究工作。现在，由于新式武器的出现和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对军队的建设和作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在积极地研究、探讨新式武器条件下部队的编制、装备和作战问题，我们不能落后于这一客观现实。

目前，虽然在司令部编制上取消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但并不等于取消了这一工作。相反地，学术研究工作的面更加广泛了，要使它渗透到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各项工作中去。学术研究工作的队伍，也要更加壮大，要使每个参谋人员都成为学术研究者。

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并不是什么神秘而高不可攀的工作，它是非常具体的与当前任务紧密相结合进行的。当前在军事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战

备，大搞训练，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等。在这些工作中何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如编制、装备如何更适应现代作战的要求，在战备工作方面，在海岛防御，国防工程的构筑，反突然袭击、动员、后方保障等等，总之，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很多。司令部的各个部门，要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有计划地逐个地解决。不断实践，不断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反过来又促进战备和训练工作，使战备、训练与学术研究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又可以提高参谋人员的学术水平和业务水平，从而提高司令部工作的效能。为此，各级首长和参谋长必须重视学术研究工作，把它做为领导司令部工作的一项经常的任务。

注释

[1]古田会议决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2]见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3]中印边境的自卫反击作战指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

军工生产要与科学研究及军队使用密切结合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国防工业生产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在贺总[1]、聂总[2]和罗总长[3]领导下，经过大家努力，这几年来成绩很大。这是大家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敢想敢于与科学实验相结合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所确定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说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能仿制一些外国的产品，而且能自行设计出某些性能比外国好的产品，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次你们开会，聂总和张爱萍副总长要我讲讲话。事先参考了一些材料，也派人请教了一些军、兵种的同志，但我是个外行，从来没有摸科技和军工生产方面的情况，所以只能从军事学术研究和军队训练的角度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科学研究、军工生产与军队使用三方面的关系问题；二是就战术上的五个问题对军工生产提出一些意见。

一、科学研究、军工生产与军队使用密切结合。

研究、设计和试制这是一行，军工生产是一行，训练、作战和武器的使用又是一行，这三行是个整体，必须密切结合。因为研究必须根据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军工生产必须根据研究的成果和满足作战的要求，而作战训练方面和使用方面又必须照顾研究与生产的可能。三者结合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国家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尽量使部队装备得更好一些、更现代化一些。关于科学研究、军工生产与使用三结合的问题，贺总和聂总这几年来都不只一次他讲过。这次再重新提一提，我想是有益处的。

(一) 需要与可能。

使用单位往往从战争的需要、国防建设的需要、军事训练的需要出发，不断向科研单位、生产单位提出要求。要求研究、设计、生产出来的武器，既要威力大、射程远、命中率高，又要体积小、重量轻并便于操纵。这说明大家都关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机动力、突击力。这对科研与生产单位经常是个压力，推动科研、生产部门要不断革命，不断改进。这是好事，也是应该的。但是，科研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能力、工业与科学技术水平，只能逐级上升，不能扶摇直上。要满足需要必须有个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历史性和继承性，这是个普遍的规律。人们的经验和知识都是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积累下来的，任何新的东西都是在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洲际火箭就是从V—2火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我们工业和科学技术水平，一般地讲，有仿制条件时，要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然后过渡到自行设计，搞出适合我们情况和条件的新产品出来；在无仿制条件时，一开始就要自己摸索，自己研究设计，这是目前我们军工生产必须走的道路。

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然后过渡到自行设计，这是一条捷径。这样做，可以培养技术力量，可以尽快地拿到我们所需要的军工产品。科学技术要逐步发展、逐级上升，这样才有基础，才有阶梯。由V—2火箭到洲际火箭，一直到宇宙飞船，它的最初的一步落脚在V—2，最初的起点是V—2。他们把它当成一个麻雀，解剖的清清楚楚，理论上认识的明明白白，了解了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把V-2里面“十万个为什么”都解决了，就能够在这

这是叶剑英在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个基础上，生产出更新的东西来。如果甩开 V - 2，另外东翻西翻搬资料，来搞什么洲际火箭可能不可能？也许可能，可是这种没有基础的上升，没有阶梯的上升，恐怕不是一个好办法，不是一

个可靠的办法。我们的飞机生产也有力他说明了这个问题。米格

- 17 大家认为是好的，它是从原材料到零件，从零件到配件，从配件到总装配，完全依样划葫芦，按照人家的东西一模一样做的，

工艺规程也是照样搞的，小心谨慎、夹起尾巴搞，结果效果很好。

为什么到米格 - 19 就上不去了呢？就是甩开了人家的东西，不把米格 - 17 当成一个麻雀、把它里面的“十万个为什么”加以解决，就东翻西翻，想搞出一个米格 - 19、米格 - 21，结果上不去，还是要回过头来，一模一样地照人家的搞。所以研究和仿制要结合起来，才能改型，才能自行设计。仿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培养我们的技术力量、实现自行设计的手段和阶梯。所以我觉得掌握先进技术还是一个过程，是一条逐步攀登的路，这样上楼才有阶梯，发展才有基础。苏联人也不是天生的聪明，还不是一路摸上去的。马克思早就讲过，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只有毫不疲倦、披荆斩棘、一步一步地攀登，才能到达顶峰。现在一些东西没有过关，是不是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提逐级发展、逐级上升，并不是说，人家走几步我们也一定走几步，老是跟在人家后面，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技术上的落后状态，在科学技术上永远赶不上世界先进水平。逐级发展、逐级上升和科学技术上的跃进是不矛盾的，只有在稳固基础上的上升，才能更好、更快地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上面说的这条路，是条捷径，可是，凡是新的东西，人家从不轻易给我们，总是想拿我们一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自己摸索着自行设计。这样虽然可能慢一些，困难多一些，但只要我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本着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经过艰苦的努力，一定可以开辟出我们自己的道路，突破科学上的尖端，研究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收到了一些良好的效果。只要我们坚持走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自己是能够搞出一些好东西出来的。

不论仿制也好，自行设计也好，都必须集中力量，全国一盘棋。现在我们科学技术队伍还不强，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够高，如果分散力量，你摸我也摸，就什么也搞不成。前年我到长春看了一个研究所，一、二、三楼我都看了，有的研究室只有一个研究员，有的是两个人，有的是三个人，当时我讲了句笑话，说你们的研究室是“一、二、三”。我是外行，可是我想，你一个青年学生，尽管是大学生，一个人孤陋寡闻，坐在房子里，能摸出什么东西来。后来了解同类的研究项目，上海、昆明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搞，结果哪里也没有完全突破科技上的难关。回来我就提了意见。要突破科学技术上的难关，不集中力量是不行的，就像打仗一样，不集中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就不可能突破敌人的坚固阵地。现在我看，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必须继续坚持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力量越少，越不能分散，越需要集中。

（二）当前与长远。

从当前战备的需要来讲，主要是多生产一些已经定型的常规武器和零备件，使武器装备能配套，使军队能齐装。从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讲，主要是多

研究、设计、试制一些新产品，集中力量搞“高、大、尖、新”。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只考虑到当前需要，只搞常规，只搞旧的，只搞零备件，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技术装备上的落后状态。相反，只搞尖端，只搞新的，我们军队的装备就配不了套，甚至飞机不能飞，舰艇不能航行，火炮、坦克开不动，这就不能适应整军备战的需要。因此，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突破尖端，加强常规”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方针兼顾了当前与长远的需要。目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正在加紧联合反华，中南半岛局势动荡，蒋介石企图向大陆窜扰，因此，党中央告诉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应付突然事变。为了适应战备的要求，在努力突破尖端的同时，还必须用足够的力量保障部队按现有编制配齐装备，首先是配齐值班部队的装备。现在有些值班部队还没有完全齐装，一旦有事，难以应付；所以要把现有的东西搞起来，现有的东西维持起来，现有的东西配起套来，这是最近两三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技术与战术。

技术决定战术，这是恩格斯的一句至理名言，通俗的讲法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战术又反过来向技术提出要求，促进技术的发展。因此，军事学术研究部门，军事干部，要认真研究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及运用，不然军事学术就没有技术基础。军事科学院这几年在总参、总后和各军兵种大力支持下，搞了个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目的就是为我军的高级干部、学术研究人员、高级机关的参谋和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学习和了解现代军事技术知识提供便利条件。技术研究与军工生产部门同样需要研究现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了解敌人的编制、装备和战略、战术，特别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我们的战法。这样研究、设计、试制和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基于此种认识，我认为军工生产不仅要技术配套，而且要与战术配套。

技术不配套，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能使用。生产一种新式火炮，就必须生产相应的炮弹，以及指挥、观察、测地仪器和牵引车辆。其他武器装备也是一样。

仅仅是技术配套还不够，还要与战术配起套来。这里所谓与战术配套是指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在品种和性能

上都要适合作战的要求，适合战术的要求。因为，生产出来的武器，不是为了在靶场上用，是要在战场上用，在战场上不是一件一件武器单独用，而是要各种武器结合起来用。所谓合成军队、合同战术，就是打起仗来要协同作战，因此，为了适应作战的需要，武器装备还必须与战术配套。

战术对军工生产的要求只是规划与进行军工生产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上面讲过，军工生产不仅要根据作战的需要，而且要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水平。

二、战术上的若干问题及其对军工生产的要求。

政治上我优敌劣，技术装备上敌优我劣，这是当前敌我对比的基本情况。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后发制人。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就以下五个问题谈谈战术对军工生产的要求。

（一）远战与近战的问题。

未来战争将会在空中、海洋、地面同时进行，是陆海空联合作战。但空中打也好，海上打也好，都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在地面，还是

要靠陆军攻占地面目标，因而地面作战是主要的。地面作战有远战、有近战，但是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近战，远战是为近战创造条件。在目前情况下要避开敌人的远战火（远程火炮、导弹、航空兵），同敌人打近战，这是我军一贯的战术思想和优良传统。在敌人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更要突出强调近战歼敌。只有近战，才能避开敌人的远程优势火力，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

打近战，在战术上、技术上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最近我看了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二年的条令，看出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防坦克的问题。在打近战的时候，敌人的核火力、炮兵火力和航空火力都转移了，这时我们要刺刀见红，充分发挥我们的近战威力；可是在这决定胜负的短短时间内，对我们来说最讨厌的是“铁牛”、“铁乌龟”，刺刀穿不进去，他缩在里面打机关枪，而且坦克不是一个两个，密度还相当大。所以打近战，怎样对付敌人的坦克是个中心问题。美帝国主义军队非常强调坦克等快速部队的作用，认为坦克等快速部队最能有效地利用核火力和其他火力的突击效果。因而美军在编制装备方面加强了坦克的数量，并注意了质量上的改进。如新编的三旅制步兵师由原五群制师[4]的一个坦克营增加为两个营，中型坦克由八十九辆增加为一百零八辆；装甲师由三百零六辆增至三百二十四辆，并降低了车高，改进了体形，减轻了重量，增大了火炮口径，以提高坦克的机动能力和突击力。如美军师的进攻正面按五至十公里计，仅本身编制的坦克每公里可达到以下密度：步兵师十至二十辆，装甲师三十二至六十四辆。因此，今后我们在防御中如不能粉碎敌人大量坦克的密集突击，防御就很难制胜；在进攻中如不能粉碎敌人坦克的反冲击和反突击，就很难取得胜利。美军一九六二年作战纲要讲，它的防御有地域防御，有机动防御，着重搞机动防御。它所谓的机动防御就是以少数的掩护部队摆在前方，以大部兵力，特别是以快速部队、坦克部队摆在后头，摆在纵深内，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和地点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在这种情况下，突破敌人前沿不是困难的事，最困难的是在纵深内对付敌人的反冲击和反突击。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举几个战例。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在德国法西斯空中的突然袭击和地面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密集突击下，曾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战争第一天德寇就侵入二十五至五十五公里，战争第二十六天就深入八百余公里。尽管苏军的许多部队和分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内多数防御还是失败了。其原因除主要由于战争准备和战役指挥上的错误外，最大的问题是防坦克火器太少和缺乏防坦克的经验。每公里正面上只有防坦克火炮二至五门，而且分散使用，指挥不统一（由炮兵指挥员指挥），因而当德军在主要方向上每公里以三十至四十辆坦克密集突击时，防御阵地很快就被敌人分割和摧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

我志愿军在长津湖作战[5]中，虽将敌包围，但由于我们无法克服敌坦克的阻击，未能将围敌全歼。二次战役[6]中，我一个师两次攻击苏民洞美二十五师一个营，伤亡五百余人，仅俘获四十六人，最后敌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大部逃跑。因此，防坦克问题是个大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解放战争时期，敌人虽有坦克，但为数不多；抗美援朝战争，敌人虽有不少坦克，但因地形限制不便大量使用；中印边界反击作战[7]，打的是弱敌，而且是在高原山林地区，很难使用坦克，但是，这绝不能说明在未来战争中敌人将不大量使用坦克。应该承认，我们防坦克的经验还是不多的，特别是还缺乏对付敌人大量坦克密集突击的作战经验。因此，必须在部队的装

备和训练方面充分注意这一问题。当然，坦克对付坦克是一个办法，可是，以我们目前的情况，生产大量的坦克还不可能，所以在军工生产方面多研究、多生产一些防坦克火炮及其他防坦克武器就更为必要。我想除了进一步改进现有的防坦克火炮、提高其射程和威力外，也应抓紧研究试制一些轻便的适合于近战要求的防坦克导弹和小型的步兵防坦克武器，以加强团以下的防坦克火力。根据有关材料，目前美、英、法、比利时、瑞士等国都装备有空心装药防坦克枪榴弹。美军装备到步兵班的 M28 式枪榴弹，仅重六百四十三克（约一点二市斤），射程七十五米，穿甲厚度二百毫米。二百毫米厚装甲的坦克用一斤二两的东西就干掉了。一斤二两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带好几个，可在自动步枪、卡宾枪、冲锋枪上发射，既轻便，又有相当的防坦克能力，制造也不大困难，很值得研究。

总之，在未来战争中，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武器，是在空中和海上解决问题？还是在地面解决问题呢？我说是在地面；地面上是远战还是近战解决问题呢？我说是在近战，就是几百米解决问题，二百米过硬。近战的中心问题是防坦克问题。所以，我们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都要重视这个问题，进行重点地研究，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躲和打的问题。

要避开敌人远战火力的，同敌人打近战，有一个躲和打的问题必须解决。躲，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古代兵法叫做隐匿，外国条令叫做隐蔽，但实质上都是躲。抗美援朝几年，总结起来，就是躲得好，打得好。那时敌人的装备还没有现在强，而且打的是局部的常规战争，但我们的部队稍不注意，就往往会受到敌人空中、地面火力的很大杀伤，有的在接敌运动中还没有接近到敌人跟前就伤亡一大堆，结果使攻击受挫。上甘岭战役[8]所以能够在一小块阵地上坚守四十余天，除人民解放军政治因素外，在军事方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坑道，躲得好，所以最后能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我们研究了抗美援朝的经验，并考虑到未来的情况，在合成军队军师、团营条令中明确提出了“躲、打、杀、反”四个字，作为防御战斗的基本打法。躲，就是在敌人用地面和空中的远程兵器向我实施突击时，除了值班火器和观察人员外，部队应迅速利用地形、工事疏散隐蔽，并采取各种防护措施保存战斗实力，待机破敌。打，就是在敌人开进过程中，派出少数部队在地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地袭扰、杀伤、消耗、阻击敌人；当敌人进至我各种火器有效射程时，突然开火，予以大量杀伤，并在有利情况下实施阵前出击，破坏敌人进攻准备。杀，就是当敌人发起冲击时，以短促、猛烈、准确的火力，英勇顽强的白刃格斗，同敌人死打硬拚、反复争夺，大量地杀伤敌人。反，就是当敌人攻击钝挫、协同失调、立足未稳时，实施坚决、猛烈的反冲击和反突击，消灭进攻之敌。躲、打、杀、反必须紧密结合，穿插运用。躲，不是消极的躲，而是为了保存力量，在近战中消灭敌人。

在对拥有现代技术装备的美帝国主义作战的情况下，躲，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战略上，敌人很可能凭借其技术装备的优势，从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之外实施战略空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是躲；在战役、战斗行动中，敌人亦将在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之外实施火力袭击，我们没有远程导弹，身管火炮受射程限制打不到那么远，在我空军力量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航空兵又不宜广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待机消灭敌人，主要的办法还是躲。现代作战中，不仅要躲过敌人的各种火力，还要躲过敌

人化学、生物武器的袭击。美军一九六二年条令规定：“无论在核条件和非核条件下，无论大战和小战中，化学武器都可用于进攻和防御”，“化学武器宜于在战术上广泛使用，而生物武器，由于发生效果迟缓，宜于对付战略目标”，“化学武器必须突然而集中地使用在主要方向上，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他火力结合使用。”因此，现代条件下，躲的要求比过去更高、更复杂了。

不仅防御要躲，进攻也要躲。无论进攻和防御，都有保存自己的问题，躲的问题。进攻中的迅速分散、迅速集中、迅速隐蔽接敌和迅速构筑工事，都是为了躲过敌人的火力，发挥战斗的突然性。防御中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阵地、疏散隐蔽配置兵力和火器，也是为了在敌人火力准备时尽量减少损失，以便在近战中粉碎敌人的进攻。苏军一九六二年军师团野战条令在进攻一章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军队占领进攻出发地位，当敌人火力反准备时，除留观察员和值班火器外，所有人员均应迅速隐蔽。这不就是躲嘛！他们的装备那么强，有能力压制敌人的火力，又是处于进攻地位，还主张躲，我们更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躲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隐蔽、迅速、突然的接近敌人，同敌人打混战，躲在敌人的战斗队形里面，使敌人优势的远战火火力无法使用。美军条令指出，“疏散、迅速、隐蔽接近敌人，就是减少敌人核武器突击损害的良好办法”。现代条件下美军强调队形疏散，我们就可利用敌人部署中的空隙，同敌人弄在一块、混成一团，使敌人无法使用核武器。这是一个很好的减少损失的办法。这是战术问题。另一种办法是加强防空、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措施和工程保障等。特别是工程保障。在现代条件下作战，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工程兵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无论防空、防炮、防坦克、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等，都离不开工程保障措施；无论进攻和防御，都要进行大量的工程作业。目前我军构筑工事基本上靠手工劳动，速度太慢，但是要求大量装备工程作业机械，我们还作不到，需要考虑搞一些小型轻便便于携带的半手工半机械的东西，如人力操纵的挖壕打洞等器械，以便加强作业进度和节约人力。据外军材料介绍，美军有一种单兵使用的爆破式掘坑器，在中等硬度的土壤中，能炸成直径一点二、深零点七五至一米的坑，然后很快即可加工成单人掩体。这件事我在广州军委常委会上讲过，这个办法好，要把它研制出来。另外，还需要加强防原子、化学、生物武器的研究，制造些防护器材和药品。你们现在已经搞出了一些东西，如防原子、化学、生物的侦察、洗消器材和防治药品，福州军区研究出防原子的感光自动密闭门，这些都很好，证明我们已经开了路，希望作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最后，现在防空是个很大问题，不仅要防飞机，而且要防导弹。防空除了工程保障以外，就是要有一定数量和威力的防空兵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少量的防空导弹，但是部队的防空能力还很弱。这个问题请同志们作些研究，如何提高部队的防空能力。

（三）火力与机动问题。

火力、机动、突击是战术上的三个基本要素。美军一九六二年条令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和其它武器的改进，在火力和机动这个天平上增加了火力这一端的重量，因此就出现了火力与机动的不平衡，要恢复这个平衡，只有大大增加机动能力。其办法是：（1）加强空中机动能力，广泛使用飞机从空中机动军队，实施空降作战和空中机动作战；（2）加强地面机动能力，增加输送车辆，并广泛使用装甲部队作战，以提高部队的机动能力、有效地利用火力突

击的效果。美军新编步兵师有飞机一百零三架，其中直升飞机九十九架，装甲运输车、汽车三千多辆。美军新建的空中突击师，装备有各种飞机四百六十架，可完全靠本身装备进行空中机动作战。苏军的解决办法大体也是如此。

我军作战同样也有一个机动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地形复杂、交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使各种武器装备能够带得走，部队能够开得动，并做到既能迅速分散的躲起来、又能适时的集中打击敌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国经济条件、地形条件和今后作战的需要，要求编制装备都要轻，要适合陆战，适合车少的条件，适合山地作战；营、连无论白天、黑夜、天晴、下雨，各种情况下，都能随时进入战斗。这样一旦有事，能够配套，能够开得动。这在目前条件下是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低，我军机械化程度还有限，不能全靠汽车，主要还是靠走路，要在走路的基础上解决开得动的问题。人走到哪里，武器装备能够带到哪里，人和武器结合起来才有战斗力。所以，不论装备强弱，只要能够配起套来，才能开得动，才便于机动，才便于发挥武器装备的作用。

为此，要求武器的设计和生产，在保持一定威力的前提下，尽量减轻重量，使之轻型化，并尽量能够分解携带，使之既可以驮载，也可以车拉、挽曳。这次展出的六炮、八二迫击炮、七五无后座力炮、山地火箭，我看都很好，很适合实战的需要，今后我们仍应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此外，还需要发展一定数量的直升飞机。

使用直升飞机利于军队的输送和作战，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苏、美军一九六二年条令很强调在各种战斗行动中广泛使用直升飞机，进行空中突击和空中机动作战，作为解决火力与机动、分散隐蔽与集中突击的矛盾的重要办法之一。如美军条令规定：进攻中可用直升飞机机动步兵、轻型坦克、炮兵抢占突破口，实施包围、迂回；防御中用以机动部队堵塞突破口，向敌侧后实施反冲击；登陆时进行垂直登陆；以及用以指挥、侦察、校正等。据有关部门资料，目前亚洲许多国家如南越[9]、缅甸、老挝、日本、印度等也都有一定数量的直升飞机。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前沿阵地的补给和增援，主要靠直升飞机。

我们因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大量发展这种飞机，并把它广泛运用于战术范围，但从目前边界斗争和今后作战的要求以及可能的条件来看，生产一部分还是必要的，主要用于：

(1) 紧急时刻的军队机动，如调整部署，封锁突破口，抢占隘路、渡口、制高点 and 桥梁，以及反空降等，只有这个东西才来得快。

(2) 后方对前方的紧要补给。

(3) 大陆对海岛的支援。这件事情我同许世友[10]同志在舟山群岛谈过，这次海岛会议也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海岛部队本身要下死守的决心，与岛共存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统帅部需要考虑到对岛子的紧急支援，如弹药粮食的补给、伤兵的后送、派部队去支援等，如没有一定的支援，长期固守是有困难的。支援时船不好去，怎么办，这就需要部分直升飞机。

近几年来摸了一些材料和情况后，特别是今年在广州搞条令后，得出了这样的认识，直升飞机这个东西，与其说是空军需要，不如说是陆军更需要。如美军一共有直升飞机三千一百架，其中陆军就占了二千七百架，空军只有一百多架，主要担任救护用。真正要用的是陆军，侦察、指挥、运输、机动都是靠它。还有，与其说是前方需要，不如说是后方更需要；与其说是大陆

需要，不如说是海岛更需要。当然，直升飞机也有它的缺点，如：数量不能满足大量的陆军的需要，造价较高，不大容易保养，燃料消耗较大，使用时必须掌握制空权，还有飞得低、飞得慢、本身没有武器，容易受到地面火器的袭击等。目前外国正在研究改进，克服这些弱点，使之装载量增大。美国目前已有一种直升飞机最多能载二十三人，听说英国正在试制一种能装四百五十人的直升飞机，苏联已装备部队的最新式的直升飞机能装七十人。另外就是使之飞的高、飞的快，飞的远一些，并装备些武器。为了研究直升飞机的武器装备，美国专门编了一个叫八三 五的空中战斗侦察连，进行了四年半的试验，据说已经试验成功了。那一个连的空中火力排，有四架装备了火箭的直升飞机，有两架装备了 SS—11 防坦克导弹。这样，一架飞机的火箭发射架就有二十四个，九十六枚火箭，一枚火箭相当于它的一发一 五毫米的榴弹炮弹，九十六枚相当于五个以上一 五榴炮营一次发射的火力。证明他们正在向这方面研究和发展。所以发展直升飞机是目前的一个趋势，是增强陆军机动的一个重要方法。

（四）山地和平原作战问题。

未来作战是在山地打？还是在平原打？根据战略方针和装备情况，平原地要打，因为平原地人口多，政治经济中心、交通枢纽多半在这里，必须坚决保卫。但考虑到山地便于持久作战，以山地为依托，可以避敌之长、击敌之短，更好地消灭敌人。因此，我们要更好的利用山地与敌人作战。

山地作战，部队需要一些特殊的装备。这次中印边境作战，反映出这方面不少情况。中印边境东段是高山、狭谷、森林，西段是高原严寒地区。经过这次作战，可以看出我们的装备有些还不完全适应这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例如：

（1）火炮笨重，运动困难。

（2）克服障碍用的绳子、斧头、锯子等器材太笨重，不便携带和使用。

（3）现在部队装备的通信器材还不能完全保证作战指挥上的需要。营以下除了少量的步谈机外，其他通信工具如旗子、信号枪、哨子等在森林中都不便使用。功率大一些的电台，离开公路不能行动，需要研究减轻重量。

（4）防寒、防冻是个很大的问题。

（5）野战干粮少，体积大，不便携带。这次东段的部队都是喝生水拌糌粑面，热量不够，还拉肚子、浮肿。

因此，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并生产适合于高山、狭谷、森林、高原严寒等条件下作战的武器装备。

（五）白天作战和夜间作战问题

未来作战中，我们主要是打近战、打夜战。白天敌人的火力可能压住我们不能动，所以，我们白天不动，夜间干，白天采取防御，夜间反攻。为保障夜战的胜利，除了进一步提高我军政治素质和战术水平以外，适当地加强我军夜战的技术装备也是很必要的。

目前，世界各国都很注意发展夜战器材，主要是照明器材和夜视器材。我们的情况不同，应该以发展夜视器材为重点，并改进夜间射击设备，加强反夜视器材的能力。这次展出的成品中，有一部分夜视器材，比较适用，其中红外线夜视镜，我觉得很好，建议好好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希望继续努力，取得更大成绩，确保我们在夜战方面战胜敌人。

以上五个问题，不是系统他讲我们的打法，也不是谈科学研究和军工生

产的方针、原则，而是从学术研究、军事训练和作战要求的角度提出与军工业生产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和同志们研究，提

出一些考虑问题的线索供同志们参考。

注 释

[1]贺总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2]聂总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3]罗总长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4]五群制师是美军五十至六十年代初陆军步兵师的编制。群是介于营与团之间的编制单位。

[5]长津湖作战指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进攻战斗。是役毙伤敌军四千余人。

[6]这次战役指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鲜北部地区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的反击战役。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运动战阶段进行的五次战役中的第二次战役。

[7]中印边界反击作战是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

[8]上甘岭战役指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在朝鲜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进行的坚守防御战。此役共歼敌二万五千余人。

[9]南越指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获得胜利。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了越南南方，建立了所谓“越南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五月，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统一。

[10]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关于人民解放军战史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九六三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四月）

一

同志们都有丰富经验，多数经过学院学习，可以说是有理论、有经验的。今天是向大家请教的。想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战史究竟

怎样编写。院里常委分工是钟副政委[1]负责你们部，有些具体问题可以请示他。我今后也准备参加这一工作，请同志们准备一下

以下几件事。

（一）写全军战史要有个组织领导，要组织个编委，要组织编史队伍，要选个“战场”，要向中央军委请求专搞一个单独的地方。

你们所设想的编史方针、目的、内容和要求统统写个报告给中央军委。组织编史队伍是否区别一下，确定基本队伍和临时参加的。先写哪个时期？基本队伍要调多少人？基本队伍组织就绪就可开写。基本队伍要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写下去，临时队伍则写一个时期调一批，只参加写一段。

（二）我想听听各编史单位的汇报，请你们接头安排一下日程。

（三）把各个时期主要战役排个队，请那些指挥过各该战役的同志给我们做些报告，我也学学。

（四）编一个各历史时期的部队组织序列表，编到师和独立团以上的，把各地区各方面都包括进去。

你们想把抗美援朝战争单写一本的意见也写到给军委的报告中。抗美援朝不能都写到我们的帐上，还有朝鲜。但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对我们指导未来战争意义颇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战史和军史“分合”问题。过去别人是分开写的。我们是否也分开写？我考虑从“一切服从战争”、“一切附属于战争”的观点出发，军队发展与作战是很难分开的。我看就在写战争过程中把军队发展反映出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这些都是和军队的发展分不开的。战争具体来说，就是战略、战役、战斗。我们的战史就是从战略战役战斗中吸取经验教训的。

编史的目的，主要是教育干部，当然也为了留赠后人，但主要是为了当前斗争需要。现在正是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时期，我们有责任把经验介绍给他们。

我们应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抓这个事以前，自己有个准备。要有一套机构，并要配套成龙，否则难于适应工作需要。请你们考虑。

（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分干部座谈时的讲话）

二

各编委在编史过程中，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你们要把它汇集起来。他们

这是叶剑英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的四次谈话中有关人民解放军战史编写工作问题的内容节录。

在编史方针、战史内容要求方面都有些经验教训。比如陈梦还同志可以谈谈你们的编史方针与指导思想。我们草拟编史方案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需要多少人？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写，要多少人的基本队伍，要多少人的临时队伍，要多少保障人员。比如做茶杯一样，做这样的要多少料、多少力量，做那样的又要多少力量。最近外军部译出一部苏联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你们看到了没有？

编委组织叫什么名义？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编审委员会”。我军建军三十六年，打了二十五年仗。日本人现在说我军能打仗，战争时间之长，经验丰富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现在写还有个条件，许多老同志都在，但都到了秋天，果实累累，都成熟了，不收获就有失掉的危险。林、罗、刘、陈、徐[2]诸帅的一生有多少宝贵经验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罗帅、刘帅身体不好，如有三长两短那是多大损失啊！毛主席脑子里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拿出来，他领导革命的许多经验、许多窍门还没有拿出来。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现在要急起直追。在组织领导上，是不是成立一个解放军战史委员会，负责决定大政方针。诸如编写一本什么样的战史，以及编写的目的是不是以教育干部指导现实斗争为主，同时留赠后人并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等等。在战史委员会下面设战史编纂委员会，具体负责编史。大编委会委员散在各地，只能开开决定大政方针的会，不可能参加实际编写工作。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部。你们是怎样想的？

几个时期全面铺开，同时并进，那要很多干部。好处是时间可能短些，可以利用各编委的人和成果。但用人太多，现在就是人才缺。采取拉夫式勉强凑数，数量可以凑够，但水平不行，仍然不能胜任。战史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要有一批专门人才来写。写的人多了，写出的东西像和尚的袈裟，东一块西一块，各色各样，不好统一。

是否设想两个方案：一案是几个时期全面铺开，同时并进；一案是逐段“蝉联”，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逐次编写。

逐段“蝉联”，可以节省些人力，可分基本队伍和临时参加的。写前一个时期时，有一部分人准备下一时期的史料，搞粗坯工作。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在胡宗南[3]进攻陕北时，许多人要我劝毛主席离开陕北，毛主席就是不离开。直到刘邓大军[4]南下战略进攻开始，我才明白。哪里形势紧要他在哪里，敌人重点进攻，两翼钳形攻势，我们就来了个中间突破。这些是从文电资料中看不到的。还有长征到达陕北，有人主张先巩固再发展，不同意东征[5]。毛主席则主张发展中求巩固。巩固再发展这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陕北的条件，必须在发展中求巩固，否则就无法巩固，更谈不上发展。毛主席是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的。像这样的事例很多。而这些是历史文电资料上所没有的。要从他们身上去挖宝。所以我们要有一批一贯到底的基本队伍。同时也要有临时参加的力量。

同时铺开，力量分散，而且各写一段最后合拢就困难，返工会多。表面看来好像几个时期同时开写省时间，实际不一定省多少时间。逐段“蝉联”，力量集中，容易统一，还能使一些人从头到尾写下去，培养一批专家。

你们是否有这样想法：先从解放战争写起。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干部对于毛主席思想的接受是统一的，有些问题也是小问题。抗日战争有一些路线性、方针政策性的斗争问题。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则充满着路线斗争。

而七大以后问题就没有什么了，全党统一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路线斗争主要是：是先要乡村，还是先要城市；是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队，还是保持旧军队的一套；要不要根据地等等。如果这些在战史中不能突出，并以战争历史史实来证实这些，那就没有红线了。红线就是这些。抗日战争是：是采取独立自主的敌后山地游击战，还是正规战、运动战；是独立自主、壮大人民力量，还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通过国民党。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这样才能有思想性和战斗性。这是新东西、新事物、新任务，所以要反复研究。你们写个报告，不要急，但不要拖。现在还是酝酿阶段。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在听取军事科学院战支部汇报工作时的谈话）

三

编写全军战史，我们做实际工作的，第一步要把资料搞完全。现在各个野战军、各个方面军的战史初稿已经有了，我们有二十八个研究员同志，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研究。明年一部分人继续搞资料，一部分人搞研究，把各单位已经写出的东西好好研究一下。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以毛泽东思想为红线，看毛泽东思想在全军起什么作用，哪些贯彻了，哪些没有贯彻，哪些接受了、哪些没有接受、结果怎样。把我们的准备工作搞好，明年接近于下笔的阶段。二十八个人定下来，集中力量搞，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研究。过去谈过，要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研究，现在扩大一点，把同一个时期纵横的活动联系起来。成立组织比较容易，组织成立起来怎么办？最中心的还是研究人员本身要有研究。二十八个人要变成战史通。我们听听你们的报告，提出问题，作为顾问团。先研究现成已经写好的，在这基础上来写通史。一方面军的没有搞，现在聂总[6]督促。有人督促，有好处。赖光勋[7]同志当“校长”，先读党史，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摸起，不然大家一鳞半爪、一知半解，不知毛泽东思想在几个历史时期究竟起什么作用。摸完一个时期，听你们的报告。现在看，问题在于基本队伍。要通过学习，形成队伍。集中力量搞，不分散，一路摸上去，摸出个名堂再说。

整个历史过程有个全貌。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斗争。毛主席和好些外国人谈话，讲几十年有些什么曲折，他讲自己的经验，你们可以看一看。要抓住关键，抗战八年，关键几个；解放战争几年，关键是几个战役；二次国内战争也是如此。先有个全貌的认识，然后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来搞。两个结合起来。

次序是由远到近，还是由近到远？按历史发展。战史和战术不同。研究战术先搞抗美援朝，这是最近的经验。战史要把全部内容搞清楚，按历史发展摸下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在军事科学院常委会议上的发言）

四

编写战史要积极准备，不求速效。要有了准备再动笔写。过去编战役学，许多应该做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就开始写，结果返工，现在反过来先搞战役战例研究。战史也是这样，落笔困难在动笔以前，琐碎一点，要采集资料，

如李时珍上山采药，对研究有用的他就采。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战史都摸一摸，摸清楚再搞。

下笔的准备时期比较长，一个是准备人，一个是准备物。准备物是要有必要的资料，准备人是要使你们成为熟悉中国革命战争史的“通家”。你们要打定主意做精通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干部，定下心来做。历史学家有好多专门，你们要做这一行的专家。因此要从实际中摸材料，通过研究材料提高自己。

积极工作，不求速效，两者结合起来。不怨天，不尤人。积极工作在于积极准备资料、准备自己。编写战史是个困难的任务，准备工作也很艰巨，不要认为写出、印出来战史才算有成绩，积极准备资料也是成绩。这几年没有开始编写是我控制的。如果放手让你们写、你们一年可以写出来，不过对头不对头是另一问题。闹是我们关的。写还是比较容易，准备工作难。一年四季，三季准备，一季下笔。准备工作中要把两条路线斗争和毛泽东思想在几十年斗争中的发展这根红线抓住。不要只能看一点，而要从全面中看一点，中间有道红线。这是准备工作的中心。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对战史部工作的指示）

注释

[1] 钟副政委指钟期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委。[2] 林、罗、刘、陈、徐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林彪、罗荣桓、刘伯承、陈毅、徐向前。

[3] 胡宗南，一九四七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为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四七年三月指挥军队进攻陕北。

[4] 刘邓大军这里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5] 一九三六年秋，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派遣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同阻拦红军抗日去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于五月五日，发表回归通电，等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

[6] 聂总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7] 赖光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

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现代战役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

这次总参召集的编写战役教材的会议，前一阶段研究解决了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学中的许多问题。在会议过程中，根据同志们的提议增加了一项任务——讨论编写全军通用的战役学。由于时间短，准备不足，对军事科学院提出的战役学纲目只是初步议了议。整个会议在张宗逊[1]同志主持下，全体到会同志共同努力，高等军事学院全力以赴，各军区、各军兵种大力支持，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议讨论的问题，张宗逊同志已作了总结。编写战役学的问题，军事科学院宋时轮[2]同志讲了话。今天，我只就几个问题谈谈我的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与研究现代条件下作战

这次会议讨论了在战略、战役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如何体现现代条件等问题。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就是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问题。

毛主席的著作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各个方面，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完整的科学理论。现在，世界上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都非常注意研究毛主席的著作。据说肯尼迪[3]就在研究，当然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如何对付我们。许多革命的领袖、革命的人民都是喜欢读毛主席著作的。为什么喜欢？因为毛主席著作能帮助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国内，一九五九年以来，中央带头，一直到各个地方，包括我们军队的各级干部，形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雷锋是普通一兵，他日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全军都在学。当然有些学得好，有的学得不好。学得好不好，原因很多，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天资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个人的世界观问题，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我们不仅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而且要学习毛主席伟大的战斗一生。具体他说，就是要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毛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包括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在内）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毛主席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比的热情；学习毛主席最坚定、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最灵活、最巧妙的斗争艺术；学习毛主席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以及谦虚谨慎、苦学苦干的精神。如果对这些基本的方面不注意、光是拿书本来啃是不行的。且不说学习毛主席的全部著作，就以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来说吧。毛主席从写《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以来，一向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实事求是。对此，大家也赞成、也学习。可是问题是看你采取什么立场。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精神，没有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就没有一股旺盛无比的热情，就发现不了问题，或者看不到问题的焦点所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连续几年天灾，工作上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那时，大家也到下层去蹲过点，但是所见有深有浅、有高有低、有的全面有的片面、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再说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

这是叶剑英在总参谋部召集的编写战役教材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作风，有些人学习是学习，但真正工作起来又不能按照那样去做。我们应该响应刘少奇同志号召的要苦修、苦练、苦学、苦干一生，艰苦奋斗，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要我们毕生努力；在职学、在院校也学，活到老，学到老。

在教学中发生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学习军事，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外，还学不学别的？一九六一年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4]中曾明确规定：“一切干部的理论学习，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作为主要内容。部队和院校的军事、政治训练，都要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课程。”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必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所以，我讲各门课程要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所谓“基本课程”、“基本教材”，是说这是挂帅的东西，必须要重视、要学好，但不是说是唯一的课程、唯一的教材，还要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学习根据毛泽东思想所编写的条令和教材（理论、战例），并进行想定作业或演习，把毛泽东思想落实到我们的专业中去。另外，有的人认为学了一两遍就完了，不必再学。这也不对。学习应该是毕生的事情。毛主席的经典著作要读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是自己有问题时，要向毛主席著作去请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讲列宁的一生时说，列宁在工作中发生了问题时，常常是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仅要一遍、二遍、三遍、四遍地反复读，而且要带着问题去读，看看那些问题在毛主席著作上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应该既是普遍地学，又要有重点地来学，两者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着的。比如，集中力量歼灭敌人，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怎么解决的？什么叫集中？要有多少倍？在解放战争时期，不论东北也好，其他地方也好，都不是千篇一律的三至五倍，而是针对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集中兵力是一个军对一两个营的敌人同是一个问题，各个时期的运用却不一样。学院现在搞了毛主席有关战役问题的《汇编》，这样就可将毛主席著作从头到尾地读完以后再看看《汇编》，既按历史顺序读了，看看各个时期是怎样讲的；又有针对性地来读，集中在几个观点上，学深学透几个主要的观点。如在战役教学中，要解决进攻问题，就可以看看在进攻问题上毛主席是怎么讲的，然后，再由《汇编》转到读原著。这样由全编到《汇编》，又由《汇编》到全编，二者互相联系，互相结合。当然《汇编》还要搞完备一点，不要使人感到零碎片面、一鳞半爪。

关于在战略、战役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首要的是必须明确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解决现代条件下的作战问题。全军干部从一九五九年全面展开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来，有很大的成绩。大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原著，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治军事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根据毛泽东思想，根据军委的战略方针，在总结我军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了我军的战斗条令和大量的教材。这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问题的一个方面，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当然，这个工作还差得远，现代条件下作战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决不能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上，要在已有的基础上

解决现代条件下所提出的问题，把毛主席军事思想学得更深更透。就学院来说，就是要把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深入到各门课程中去，与解决各门课程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各门课程均必须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认真学习，确实掌握，这是现阶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不好，就要看在理论学习、战例研究和想定作业中，领会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如何，这样的教法和学法就是要达到把毛泽东思想学得更深更透，并且能够活学活用的目的。

高等军事学院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现代条件下建军与作战问题的方向；在我军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研究和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组织与实施战役作战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把什么是现代条件搞清楚。

所谓现代条件，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大量的海空军参战，并且使用核武器、导弹才叫现代条件。战争包括敌我两个方面，敌我双方现实情况的对比和总合就是现代条件。概括来讲，第一就是人民战争、反对侵略的战争。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是在世界上两大阵营对立、两大潮流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政治上我占绝对优势。我们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前后方巩固，所以在战略上我们有根据、有条件可以藐视敌人。第二，我们是以劣势技术装备反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敌人。以常规武器来说是敌多我少，尤其是海空军；以尖端武器来说，基本是敌有我无，因此，我们要更加认真小心，在战术上更加重视敌人，不能轻敌，要更好地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我们只能在这个具体条件下，来研究如何体现现代条件的问题。

总之，我们研究现代条件下作战，就是要研究以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去战胜优势技术装备的敌人。抛开我军现实的实际情况来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作战，必然要犯脱离实际的错误。衡量我们战役战术训练是否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否体现了现代条件，就要看我们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核武器出现后在战役、战术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找出了战胜敌人的作战方法，就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条件。否则，即使在我们写的讲义中引用了大量的毛主席的著作，在作业中设置了核武器、导弹等情况，也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不能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现代条件。

二、关于高等军事学院训练内容的重点

高等军事学院训练内容的重点，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基本上是明确了，在训练内容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再谈谈我的想法。

训练内容必须服从训练对象和训练目的。这是院校、部队训练工作中一个共同的原则。不同的训练对象和训练目的，就应当有不同的训练内容重点，也就是说，要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训练对象有变化，训练内容重点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发生所学非所用，学用脱节的现象。

高等军事学院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以来，基本系训练了三期，速成系训练了五期。由于军以上的高级干部大部分已经在学院学习过，收生对象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对象的变化，训练任务作了必要的调整。基本系接收师的干部，培养军的干部；速成系轮训现职军以上的干部，简单他说，就是培养和

轮训军的干部。训练内容必须符合这一训练任务的要求。

“连、团、军”的思想，是我军建军、作战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连队是我们的基层，一切工作、战斗首先靠连队，所以强调抓基层、打基础、创造四好连队[5]。把连的干部培养好，是搞好连队的前提条件。团是组织各项工作、组织训练、组织诸兵种合同战斗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诸兵种合成军队来讲，团又是一个基层单位。军是我军固定建制的最高单位，通常部署在一个战役方向上，又是全国战略战役机动的基本单位，打大仗时起码是军。无论训练、编制装备、干部培养等工作都要贯彻“连、团、军”的思想。因此，确定高等军事学院训练内容以军为重点，就是贯彻军委“连、团、军”的思想。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其重要意义。

军有两重性。建制的军本身的行动是战术行动，是组织指挥战斗，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军是在集团军编制以内与友邻和其他兵种协同作战共同完成战役任务。战役任务要通过战术兵团来完成，军在整个战役行动中打得好不好，是胜利还是失败，将直接影响战役任务的完成。如果军单独执行任务，这时的军无疑是加强的军，也不单纯是步兵，还有其他兵种，不单是正规兵团，还有地方兵团和民兵的配合来共同完成任务；这时就是执行战役任务，或在战略性的战役中某一个方向上行动，保障主要兵团的作战。所以说军是两重性的，是联结战役与战术的中间环节。根据以往的经验，就军的编制装备以及布防、战斗编成来看，今后三个师建制的军一般是在战役兵团编成内完成战术任务，如果是加强的军，就可以在一个独立方向上执行战役任务。

因此，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学重点仍然是合同战役。一个军在集团军的编制内作战，不学合同战役怎么进行协同？所以，合同战役部分不管是理论和组织实施都要学，不然，军兵种就无法主动密切协同。高等军事学院有两种对象。速成系训练军的干部，来时是军，回去也是军，学高一级是集团军，因此基本上是学合同战役。是否要学一点战术？这就等于是否要看一看军兵种技术一样，是属于补习的性质，如果完全没有学过军的战术，当然要补课。基本系训练调来的师级干部，学高一级是军。要不要学合同战役？要，但没有学过战术的不可能更好地学战役，如同没有技术基础不能学战术一样。对军兵种知识以及各种兵器都不知道，技术性能、战术性能、战术使用都不知道不行，这不是补课的问题，而是必修课。因此，基本系除了战役课以外，还要学军战术。所以，就整个学院来说，重点是合同战役，但是在教学中要落实到军。想定作业，学员不能站在方面军、集团军指挥员的地位去处置问题，而是站在合成军队军级干部的地位来处理问题，如果不落实到这一点，又是学大家伙，回去还是用不上。应该是根据对象、目的、任务，针对学员的需要来施教。现在我们要学哲学、学战略、学合同战役，三者的重点是合同战役，而且要落实到军。

为了突出训练重点，还有必要谈谈战略教学的问题。必须切实掌握战略教学的目的。我们战略教学不是为了培养统帅，而是为了使战役、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规律。什么是某种程度的战略规律？战略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在军事方面包括武装力量编成，军队建设，战争准备，动员，战略方针和战略指导原则等等。学院的学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学习一下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我们的战略方针，如果超过这种限度，就会影响训练的重点。

三、关于战役、战术教学的三个环节

战役、战术教学要抓住理论学习、战例研究，想定作业（或演习）三个环节。这并不是什么新创造，是从部队训练、院校教学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这个问题去年讲了一下，这次我看了大会的简报，所有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同志都只讲理论部分和作业部分，几乎没有一个同志说战例部分应该怎么研究。战例研究应该是作为一个环节，而且是中间环节。这不仅对高等军事学院适用，其他院校也适用，部队和机关的战役、战术训练也适用。

学习战役、战术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战役、战术的指导规律，掌握住几条基本的原则，并彻底把它搞通，学会灵活运用。学习理论，用不同的方法就有不同的效果。我们不能用读死书的办法，而要采取活学活用的办法，就是要结合实际学习理论，即从抽象又回到实际。我们所说的教学三个环节就是这种学习方法的具体化。通过理论讲授，了解战役、战术一般原理原则和组织实施的方法。然后再通过战例研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看看别人如何运用毛主席所提出的原理原则来组织指挥自己的军队，因而获得了胜利，如何违背了那些原则，因而遭到了失败。这可以使得我们不会把理论学死，而是把书上的理论作联系实际的了解，得到符合实际的结果。最后，再按照这个认识进行想定作业（演习）。学会在各种条件下运用原则。这样，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一方面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自己灵活地应用原则。达到学得更深更透、用得更好的目的。

为什么把学习战例作为一个环节？理论来源于实践。战略、战役、战术理论都是从战争的实践经验概括出来的。因此，学习理论必须结合实践经验。为了教好、学好，必须认真研究战例。特别是今后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干部越来越多，有指挥小部队、小兵团实战经验的干部，现在要去指挥大部队、大兵团，因而通过战例学习丰富和充实他们的经验就更为重要。

毛主席向来是重视用战例来教育干部的。他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指出：“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毛主席的著作，是运用战史、战例说明理论原则的典范。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道理，详举了春秋时的齐鲁长勺之战，还列举了七个闻名的古代战例；为了说明慎重初战的原则，详举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至五次反“围剿”[6]的详细情况和经过。毛主席不仅重视中国古今战史、战例的研究，而且还重视对外国战例的研究。可见，学战史、学战例是学习战役、战术的最好的方法。

历史上有名的军事理论家，都是精通战史和运用战例来说明问题的。恩格斯在他的军事论文中，研究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各国的许多战史、战例。克劳塞维茨[7]也很重视史例的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共有八篇，已译好第一篇、第二篇，在第二篇的最后一节里，克劳塞维茨专门论述了如何运用史例的问题。

把战例作为战役战术教学的一个环节，不仅要引起院校教学方面足够的重视，部队、机关干部在自修和集训时也要重视。毛主席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专门解剖一个乌鸦，对于其他乌鸦的了解也就差不多了。同样的道理，

好好解剖一个战役战例，对于其他战例的了解也就差不多了。当然，不是只讲一两个战例就够了，由于时间所限，只能将一两个战例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加以解剖。研究战支、战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编写理论教材，必须在研究大量战例的基础上，才能写得更为深刻、生动。讲理论课，也只有运用大量的战例材料，才能讲深讲透。所以不能设想，写理论教材和讲理论课的人不研究战例而能写得好和讲得好。

战例作为一个环节，除了在讲理论课时运用战例说明外，还必须专门开战例课，解剖几个典型战例，进行研究。但课程不同，做法可以不一。有的课程在讲解时运用片断战例说明问题就可以了，不必要千篇一律地专开战例课。

院校的想定作业，前几年一度有所削弱，想定少了，独立作业少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了转变，但是还要加强。团以上学战术、战役要多搞图上作业，练抽象思维。练多于训嘛！要多练学员的独立思考，要他们在想定作业中去灵活运用理论原则。这一个环节在部队的战役、战术训练中则主要是搞演习（首长——司令部演习或实兵演习）。

三个环节确定了，教材的体制就要按照这三个环节配起套来。

根据这种教学法，要求我们编写教材的同志不单是准备一门课，一个想定，还要准备若干战例，抓住一个乌鸦去进行解剖。因此，教员的任务加重了。不这样搞就不可能讲深讲透。当然，讲战例主要是讲我们自己的。登陆、抗登陆方面的经验我们不多，也可以研究些外国的战例。最大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军在诺曼底的登陆[8]，美国打日本也有很多战例。可以从外军战例中找出敌人作战行动的规律，达到古为今用，敌为我用的目的。总之，对于研究战例要予以充分重视，这正如我们学习政治一样，要读历史、有些问题人们早已解决了，我们不要再去重复。所以，实际上讲学战例是最便宜的，效果也最好，可以避免重复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同时，从研究战史、战例中也可以产生新的东西，找出和发展新的原则、新的方法。

四、关于编写战役学

这次会议提出并初步讨论了一下全军动手编写战役学的问题。名字叫什么，是叫战役学还是叫战役学教程，可以讨论，由军委最后来定。反正是搞个全军战役训练和战役作战的依据性的东西、和战斗条令差不多，但不是战役条令。它是全军通用的，好比“中药铺”一样，写得比较全。施训时，各个部队、院校可根据各自的对象、任务、目的以及训练时间开一个“药方子”，然后再到“中药铺”里去捡药。军区搞战役集训，可以结合当前任务、自己的地形、设想的敌人，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然后订出计划，所讲述的理论部分就去从战役学中选用。所以，战役学只能是带普遍性的、一般的东西，还需要各个院校、部队自己结合任务灵活运用。

什么叫战役？苏联、美国各有各的讲法。我们在编写《辞海》时也有自己的讲法。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要根据毛主席著作中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结合我军的经验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指出：“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毛主席对战役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战役与战略、战术的关系等，也都有论述。这些都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依据。

外国军事家特别是苏联军事家目前在研究战役学的发展，认为战役的起因是随着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他们说，十九世纪前半期，所有国家的生产都很弱，工业也不发达，那时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没有什么现代兵器，同时，运输工具也很差，无所谓铁路，通信工具也很差，无所谓电报、电话，不可能指挥大规模的脱离自己视线以外的战斗，甚至在几公里以外都不可能。所以，那时的战争只要经过一次、两次交战，短兵相接，整个战争就解决了。就是说战略是通过几次交战来解决，中间没有战役。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种兵器有了发展，各国都有了足够的武装力量，还有雄厚的后方资源，可以支持自己的军队坚持长期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四年，二次世界大战是六年。战争不能通过一、二次交战解决问题了，要通过若干次战役，在各个战役里又有若干战斗，最后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所以，战略和战术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单位——战役。战役一方面执行战略任务，同时又通过战术来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对，只能供我们参考。我们要根据对我国战史的研究和对世界战史的研究，作出我们自己的结论来。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国家大，作战方向多，一旦发生战争，这样多方面的、大兵团的、大规模的战争，不会是一两次交战，而是要通过许多次战役才能最后解决问题。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打败蒋介石，是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几次大的战役[9]和各战略区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消灭了他的主力兵团，蒋介石才自知垮台逃到台湾去了。可以设想，未来战争中战役的组织指挥是更加复杂而艰巨了，如果不会组织战役，战略任务完不成，战争也就不能取得胜利。将来帝国主义一旦发动起战争，我们几百万军队就要发展成为千把万，那时现在的一个师长、一个军长就要担任一个战线的指挥员。我们如果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不会组织战役，对战役学没有研究，那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吃一些败仗。我们要避免这个大的损失，避免走大的弯路。所以，不论从军队的发展，战争的规模以及从战役本身的复杂程度来讲，组织战役是我们整个反侵略战争中很重要的一环。因此，必须要编写出我军的战役学，我们的干部要好好学习战役学。

这次会议在研究了高等军事学院的教材问题之后，讨论一下如何走群众路线、全军动手编写战役学的问题，是适时的和必要的。前几年，我们重点搞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并且是全军动手写，因此就不能同时动两只手，也同时写战役学。现在战斗条令已经搞出来了，并已颁布试行，司令部工作条令也快出来了，共同条令也搞得差不多了，到了该搞战役学的时候了。我们不仅人力是可能的，从条件来讲也是可能的。首先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挂帅，有毛主席著作，有战略方针和军委的许多指示作依据，这是前提。同时几年来，全军各级干部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无论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这是我们能够编好战役学的一个很好的条件。还有原来各个野战军的负责同志都有很丰富的战役经验，我们要吸收到战役学里来。一九六一年全军的将军们写了很多文章，其中有许多很好的内容，我们也要把它们反映到战役学里来。我军历史上进行了数百次战役，这些战役，内容丰富多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比得了。我军所进行的战役，有很多独特的东西，诸如：歼灭战的思想，外线速决的进攻，调动敌人，开辟战场、创造战机，集中兵力的艺术，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等等。我们编写战役学，就是要从我军的实际出发，把我军的战役经验系统地总结起来，教育

干部，指导今后的战役作战。我们还有十多年的战役训练和战备工作的经验，编写了战斗条令、教令，编写了战役教材，在学术上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这些都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很好的条件。

编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战役学，不仅对指导当前的战役训练和今后的战役作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我军高级干部传经交班、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编写战役学，可以把高级干部的“宝”挖出来，整理起来，留给下一代，培养下一代，使我们目前的高级战术指挥员迅速成长为战役指挥员。编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战役学，也是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一种义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民，迫切需要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义务把自己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贡献给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

关于编写战役学的方法，还是按照编写战斗条令的办法：走群众路线，全军动手。首先要把战役学的纲目定下来，这好比造房子，先要有蓝图，然后才施工，否则，施工以后又要返工。蓝图如何订？还是要经过全军。我们提议：各个军区、军兵种、总部、院校所有到会的负责同志把这个纲目带回去，向各级党委提出编写战役学任务的报告，讨论纲目，并加以充实，甚至提出新的纲目来。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能将所有各个方面对纲目的提案集中起来，重新加以安排，以便产生一个比较完备的纲目。所谓完备顶多也是篇、章、节，至于一节写几条，由编写的同志再来安排。我们准备在春节后再开一个有军区首长参加的会议，具体研究解决分工编写的问题，比如指导思想、结构安排等等，然后结合任务，能写一本就写一本，能写一篇就写一篇，能写一章就写一章。拟在明年底或后年春综合汇稿，争取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把战役学初稿拿出来。

总之，编写一部高质量的战役学，需要全军动手、集中全军的智慧才行。其中党委挂帅、首长亲自参加更为重要。因为编写战役学，需要有亲自组织指挥战役经验的高级干部参加领导，亲自动手，才能搞得好。另一方面，也需要组织一批有战斗经验、又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写作能力的干部参加，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组织指挥战役的经验，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研究我军战例，在各级领导组织下参加编写战役学。

注 释

[1]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

[3]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4]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至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成绩，总结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军队建设的指针，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指针；政治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必须加强思想工作，认真进行思想教育，坚决反对各种不良倾向；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个决议是在复杂的国内外斗争形势下特别是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推行“左”的一套东西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决议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左”倾错误的特征，存在着若干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由于决议本身具有正确的积极的内容，同时又存在许多严重错误，因此，决议在全军贯彻后，对军队建设一方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后果。

[5]四好连队，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6]一至五次反“围剿”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军事“围剿”。

[7]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争论》。

[8]英美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进行的战略性登陆作战。战役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陆开始至七月二十四日占领圣洛一线结束。美英方面共投入兵力四十五个师、德国防守该地区的兵力约十五个师。

[9]辽沈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今属连云港市），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区），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唐沽、唐山，包括北平（今北京）、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渡江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上海。六月二日，战役结束。

认真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

看了郭兴福[1]和广州军区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的表演，非常高兴。听罗总长[2]说，毛主席听到郭兴福教学方法把兵练得像小老虎一样，也很高兴。过去我们老一辈的人担心没有打过仗的官和兵究竟能不能把我们的传统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看过了郭兴福的表演以后，解决了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确是好方法，是过得硬的，新兵、新官经过这样的训练，我们的部队就成为一个真正能接得上班的部队了，几十年的练兵的优良传统可以得到继承和发扬了，我们的国防就有了依靠。所以，毛主席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

从南京到广州，可以看出广州军区党委对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抓得紧，赶得快，学得好。抓得紧，从广州军区党委、军区领导开始到各级党委、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各军种、兵种，在去年六月间看了郭兴福的表演以后就雷厉风行地提出要求，抓住不放。赶得快，你们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实际上也不过三四个月，有些方面已经赶上了，有些地方还有所发展，当然有些还差一把劲。你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获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很快的。学得好，学得很像，并且正在继续普及和提高。从南京到广州，看到郭兴福教学方法到处开花，非常高兴，非常兴奋。下面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对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这样重视郭兴福教学方法呢？我们说郭兴福教学

方法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方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搞好训练的捷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郭兴福教学方法体现了军委的战略思想和有关训练的方针原则。关于未来战争怎么打法，这个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各有各国的看法。有核武器的考虑怎么运用核武器，怎么使用导弹、原子弹，怎样使用空

中快速力量。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考虑，我们现在还没有核武器。军队的快速机动能力没有人家强，将来打起仗来我们如何使用现

有手中武器战胜使用现代武器的敌人？打远战，拼火力拚不过人家。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出现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消极的，一

种是冒险的。消极的就是见到人家有核武器，首先就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赫鲁晓夫[3]就是这样的人，苏联有了许多核武器，但是他不是利用自己力量和威力来支援世界革命、相反地，迷信核武器，恐惧核武器，在美帝国主义核讹诈面前投降。正如毛主席曾经讲过的，自己拿泥巴捏成一个菩萨，反过来自己又去拜它。创造了核武器，自己又向它投降。冒险的就是对敌人的远战火力和快速突击力量没有一个对策，打烂仗或者蛮干。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末就是失败主义，要末就是拚命主义。我们不能走失败

主义的路，也不能是拚命主义，我们一定要战胜敌人，也一定能战胜敌人。如何战胜敌人？主要是靠政治，同时也要靠战术、技术。我们的战术，

这是叶剑英在广州军区召开的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要是同敌人打近战、打夜战，就是避开敌人的远战火力，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依靠我们手中武器，同敌人打近战、夜战。近战、夜战在未来战争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不管你火力多么强，射程多么远，归根结底要解决战斗，还是要靠近战。你火力准备完以后，还是要派部队上来，要在二百米以内决定胜负，这时氢弹不能打，炮兵火力转移了，主要靠短兵火力，靠拚刺刀，只要我们在二百米内的功夫能过硬，能硬过敌人，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夜战也是为了打近战，进攻时利用夜暗接近敌人，插入敌人心脏，同敌人打近战。怎样使部队在二百米以内过硬？这就要狠抓基层单位的基础训练。要真正发扬近战、夜战威力，战胜敌人，必须抓紧基层单位——一个班，一门炮，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艘舰艇的基础训练。比如一个步兵班，既有突击力，也有一定的火力，有步枪、冲锋枪、手榴弹，根据任务，还可能加强轻机枪、火箭筒等。一个班训练好了，就能够形成一个拳头，就可以完成一个小小的战斗任务。基础训练有基础理论和基本功。郭兴福教学方法，就是解决基层单位基础训练的好方法。基层单位基本功过硬了，我们就能在近战、夜战中战胜敌人。这是我们战胜有原子弹、导弹的敌人的主要办法。这样是不是复古？是不是落后？是不是人海战术？赫鲁晓夫把我们民兵说成是一堆肉，当然也把我们人民解放军看成一堆肉了。这完全是对我们的诬蔑。我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是近战不是远战，兵民是胜利之本，近战、夜战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手段。最近刚果人民武装用箭射死了阿杜拉[4]军队的参谋长埃贝亚，何况我们现在不是解放战争时期，更不是弓箭时代。我们的装备改进了，火力加强了，部队的成员也不同了，干部战士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提高了，部队里面有很多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基本上没有文盲了，我们军队的发展到今天有了很大的跃进，我们有条件把部队练得生龙活虎一样，把部队的基础训练打得很牢固。基础打好以后，剩下的主要是组织指挥和协同问题了。总之，我们把郭兴福教学方法抓住了，可以把我们二十多年来经过流血牺牲总结出来的优良传统经验通过这个办法得到继承和发扬。所以，我们说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是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引起全军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重视。

二、关于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现在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向横的发展叫普及，向纵的发展叫提高。过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些典型，现在要普及，由点普及到面，由步兵普及到炮兵、工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由陆军普及到海军、空军，由部队普及到学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又在提高的水平上再普及，普及和提高互相促进。比如，班长提高了，这样一来要当好排长、连长就不容易了，这就叫水涨船高，下级和上级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班长促进了排长，排长掌握了方法之后又来帮助提高了班长。

发展的动力是干部还是战士？当然，干部起很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领导是不是走群众路线。比如一个排长要领导好一个排，你不从下边去发现问题、想点子，你光是一个人想，那领导就是个空家伙。领导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共同研究，同群众一起去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讲的，群众才真正是英雄，我们这些人常常是幼稚可笑

的。斯大林讲安泰[5]是一个无比的英雄，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当他站在大地上的时候他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这里讲的大地，意思是指群众；后来当安泰离开了地面，也就是脱离群众，他的敌人就战胜了他。我们依靠的是群众，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如果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那就是不可战胜的。大而言之领导一个国家是这样，小而言之领导一个班、一个排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讲的发展提高的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在于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是不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善不善于从群众天天练、天天摸的东西里去总结、提高，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只有这样的干部才有作用，如果是天天好吃懒做、高高在上，看不起士兵，不知道士兵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他的工作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同志们看看，十多年来发明创造难道都是发明家、工程师发明创造的吗？如果发明家不到工人中去摸，去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是不能有什么发明的。实际上真正的发明创造都是从下边来的。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基层干部呢？要从群众中来的、有觉悟的，真正感到我们的战士都是阶级弟兄、把连队当作一个革命大家庭的这样的干部。干部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当群众的先生。干部还要真正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刻苦锻炼来带动部队。郭兴福就是这样。我看了郭兴福单兵进攻作业的示范动作，他在接近敌人阵地前沿冲击的时候，一边端枪，一边前进，一边射击，一边投弹，动作做得很好，他为了这么一个动作，下了很大功夫，练了差不多半个月。这个例子就说明要有这种精神的干部，不是走在士兵后边，而是经常站在群众的前面，发现问题，自己首先苦练，练出过硬的本领，然后再来教战士。当然还要加上思想红，作风正。有了这样一些好的干部就能教好战士。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里面都有很多好的人才，在这些人中挑干部，会越挑越好。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就是要把郭兴福教学方法普及、提高。要普及要提高又有两个任务：

（一）培养尖子班。善于培养尖子，善于使用尖子，使尖子成为种子，使种子到处生根、发芽、长苗、开花、结果。团里要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

（二）师、军、军区对排长、连长要进行短期集训，让他们当兵，从单兵的动作教起，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真正学到一套过硬的本领；回去以后加上自己联系群众，思想又红，三八作风[6]好，按照郭兴福教学方法去联系实际地实施教学，做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会作思想工作，并且教的时候能够使战士易学、易懂、易记、易用。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干部，我们军队就是依靠这些

干部。

现在，从上而下思想上都统一了，不但在步兵中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在各军种、兵种里也要推广。可是要真正落实到下面去，究竟怎么搞法？步兵看了表演以后，是同行，比较容易接受，其他兵种是间接的，要经过加工、创造才能用上，不然是用不上的。我看了你们无后座力炮班的表演，那是经过加工了的；看了防化

学兵班的表演，不但能掌握这个方法，而且有了发展。不管是炮兵也好，通信兵也好，要推广这个教学方法就要动动脑子，进行创造。困难在这里，关键也在这里。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不能生搬硬套，要创造性的学习，根据各兵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灵活地运用到我们兵种军种中去，运用到学校中去。

全军陆海空军部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把基础搞好，剩下的就是指挥与

协同问题了。我们采取平行作业的方法，一方面训练部队，打基础；一方面训练干部，让他们补课，摸爬滚打，使他们练出一套过硬的本领，这样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在练兵场上有发言权了。同时，在基础训练上要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班长对单兵小组要完全负责，建制班要排长负责，加强班要排、连长共同负责。

注 释

[1]郭兴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

[2]罗总长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阿杜拉，当时为美国扶植的刚果（利）（现扎伊尔）政府的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5]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格斗时，总是身不离地，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发现他的这一特点后，将他举在半空中扼死。

[6]三八作风指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毛泽东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制定的“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后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一九六一年林彪将上述内容不适当地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的作风”，简称“三八作风”。一九七一年后，不再使用这一提法。

郭兴福教学法的几个突出特点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看了郭兴福[1]和其他几个分队的表演，他们的教学方法对头，战士的本领过硬。这说明了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郭兴福教学方法确实是贯彻了军委提出的少而精的训练方针；贯彻了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苦练二百米内硬功夫等项训练原则；体现了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

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贯彻军委提出的训练方针、原则的必然产物，也是群众的集体创造，首先是陆军第十二军和南京部队的集体创造。早在一九六一年，郭兴福教学方法就在连队里萌芽。一九六一年，南京部队十二军发现了这个“苗子”，经过各级领导的鼓励、帮助和郭兴福本人的努力，初步形成一套新的教学方法。一九六二年，南京部队党委和首长抓住这个典型，召开现场会议、组织巡回表演，不断总结提高，在全区部队、学校大力推广，使部队训练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大批“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现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的活动，正在逐步向全军扩展。一九六三年，广州、武汉、沈阳部队专门请郭兴福去作了表演；看了表演的人一致称赞。各部队首长部下了很大的决心，号召部队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北京、兰州等部队党委作出了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决定。这次福州和其他地区部队来见学的同志都准备回去每人培养一个郭兴福式的教学班，当好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宣传员。可以预料，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高潮很快就会形成。

经过四年实践的考验，证明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个好方法。部队要真正把军委有关训练工作的指示落实，练出过硬的本领，就要学习郭兴福的方法。因此，要把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推广到全军中去，推广到陆海空军中去，推广到军事学校中去。全国基干民兵的训练，也要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如果全军所有部队、学校和全国基干民兵都能认真按照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战斗力就会进一步增强，就更加会成为不可战胜的部队，更能够在近战中过得硬。

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它有很多突出的特点。

郭兴福在教学中很注意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一个战士摆在他面前，他能够做很多文章。不管新战士老战士，到了训练场都能够自然而然地把积极性提起来。练兵场上气候怎么样，场地有什么特点，战士情绪有什么变化，每个动作的练习可能有些什么困难，他看得清楚，想得周到，适时进行简短有力的思想动员，抓住现实材料，进行现实教育。战士做动作，有好的就表扬，以表扬为主。动作全部做对、做好的，他表扬；就是在几个动作中只有一个动作做得好的，他也是先表扬战士这一个优点，再指出缺点，实事求是。练习每个动作，他都要大家说说谁做得好，哪一点做得好，进行群众性的表扬，并且及时树立标兵，造成练兵场上你追我赶的热烈情绪，使大家越学越有兴趣，越练越有劲头。

郭兴福教学方法充分发扬了教学民主，集中了群众智慧，实行了官兵互

这是叶剑英在总参谋部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教，评教评学。郭兴福自己有一套硬功夫，练兵场上的教学民主，是在他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又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训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先摆情况，提出问题，让大家来出上意想办法。他自己一边听，一边想，及时支持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准的办法好就用谁的，谁做的动作好就要谁示范；自己讲不好、做不好的，就向战士虚心学习。他还经常动员新战士向老战士学习，动员老战士帮助新战士，也动员老战士向后来居上的新战士学习。他及时进行评教评学，发动战士献计献策，让每个人的长处都能发挥出来。

郭兴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他的单兵进攻作业，有一系列战术动作的训练，有五大技术的运用，有激发对敌人仇恨心的阶级教育，也有刺刀见红、非常紧张的作风培养。战士冲击接近敌人堑壕的时候，他出了许多情况：子弹打光了，刺刀断了，枪托坏了，等等，把过去战场上出现过的和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到战士面前，诱导战士在最紧张的时刻用各种办法去战胜敌人。这就既练了战术、技术动作，又培养了战士的勇敢精神。这样反复训练，人和武器结合得作常熟练，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个个身强体壮，都像小老虎一样。

郭兴福教学方法是采用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等办法，使战士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一步一步提高。组织很周密，教得很灵活。例如投手榴弹，他把每个动作分解成若干细节：手榴弹怎么抓法，抓紧一点，还是抓松一点；什么时候抓紧，什么时候抓松；甩的时候，前脚怎么样，后脚怎么样，腰杆怎么样，等等，都讲得很清楚，使战士在学甩手榴弹的时候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他们的刺杀、攀登、利用地形地物、冲击等等动作的训练都是如此。每个动作分解成为几个细节，提出一种、两种、三种、甚至四五种方法，让大家去考虑，去体会。每个动作的训练，都是先讲解、后示范，边讲解、边示范，再让个人体会掌握要领，然后进行各个教练，分组练习，小型比赛，评比讲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打好基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套办法，能将道理、要领概括成几句话、几个字，使战士易学、易懂、易记、易用，并且用情况诱导战士学和用，使战士苦练与巧练紧密结合。这样教，这样学，引人入胜，教而不倦，学而不厌，教的人很起劲，学的人也很高兴，练一次有一次进步，练一次有一次提高。

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既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在练兵场上，他对战士做的动作，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出了岔子，发生了问题，也不轻易放过。但是，在纠正动作的时候，他又很耐心，先讲清道理，说明这点小岔子、小问题在实战中会有什么危害，反复比较，用比较的方法使战士认识自己的缺点，启发战士自己改，自觉地改，使战士喜欢改，改得快，改得好。他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要求战士做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言教和身教结合。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论技术训练还是战术训练，不论是步兵训练还是技术兵种、军种和学校训练，都是适用的。各军种、兵种和学校都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和特点很好地运用，并且加以发展。

要充分认识郭兴福教学方法的重大意义。有了正确的方针、原则之后，解决方法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在这个问题上，郭兴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为

了使军委提出的训练方针、原则进一步落实，我们陆海空军各部队和学校都必须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单兵训练是整个部队训练的基础。打仗，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打的，步兵至少是一个班，技术兵种至少是一门炮、一辆车、一艘舰艇、一架飞机。但是步兵的班也好，技术兵种的单炮、单车、单舰等等也好，归根到底，它的基础还是单兵。如果单兵练不好，一个班就练不好。打好单兵的基础，是为了形成一个战斗单位。能够按照郭兴福的办法，把每一个单兵训练好了，全班几个兵捏拢起来，就成了一个拳头，就成了一个战斗单位，派出去就能够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几个班结合起来就能完成排的任务。

郭兴福所以成为全军教学的模范，是因为他体现了军委的训练思想，真正扎实地搞好了单兵、分队的训练。为了打好单兵的战术、技术基础，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一个兵有许多动作，一个动作又分解成许多小动作。他搞单兵训练抓紧了单兵每个动作的许多细节，反复地练基本功，真正打好基础，这是很重要的。步兵如此，其他军种、兵种，特别是技术兵种更要如此。他们机械更多，装备更复杂，更要运用郭兴福这一套教学方法，抓紧每个动作、每个细节的训练，打好基础，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好像我们的钟表一样，每一个螺丝钉，每一个齿轮，都不能出毛病。每一个动作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就不行，要有这样严格的精神。所谓严格要求，就是这样严格。如果基本功都能这样练好了，那末我们部队的每一个战斗单位都会非常有战斗力。打仗的时候就能够像古人所说的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常灵敏，脑子一想它就动作起来

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单兵基础，就要反复苦练。熟了就能生巧，熟了就能提高，熟了就能够提出新的东西。工厂的工人如此，军队的士兵也是如此。天天摸，就能摸出名堂，就能够提出革新的意见。一切革新，一切倡议，一切提高，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我们军队里的士兵，直接掌握武器，他们天天不离武器，天天摸，天天钻，就能够掌握现代所有的技术，而且能够创造新的东西。

中国有句话，叫做“艺高人胆大”。“艺”就是本领。本领高，胆就大。为什么？他相信自己的技术，相信自己的能耐，相信自己的本领，所以胆大。我们的战士本领练得过硬了，他的胆子就大了，大到不怕敌人到我们面前来比高低，不怕敌人逼近，敢于和敌人打近战，一直到短兵相接。同志们知道，敢于近战，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思想因素，靠政治工作，靠大无畏的勇气，另外还要靠技术。要叫我们战士相信进到敌人战斗队形里头去打短兵，迫使敌人和我们近战，不但可以避免原子武器的杀伤，而且更有把握消灭敌人。所以近战的战术，近战的技术，要在训练中去苦练。我们的空军、海军，主要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陆军的各个兵种，炮、装、工、通、化等等，主要是支援步兵，步兵主要是打近战。要根据这样一个思想，指导我们的训练。

教练员本身必须苦练一套硬功夫，学会一套教学方法。按照郭兴福这个方法来教学，看来当班长不那么容易，当排长、连长就更不容易，必须自己有一套本领，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我青了郭兴福单兵进攻作业的示范动作，他在接近敌人阵地前沿冲击的时候，一边端枪、一边前进、一边射击、一边投弹；到了敌人堑壕面前，一边刺杀，一边对付从几个方面来的敌人。这样复杂的动作，这样大胆的动作，他做得很好，始终保持眼睛能够观察敌人，枪口对准敌人，在前进中枪口不左右摆动，又能跑得快。听

说，他为这么一个动作下了很大功夫，开头做的时候，枪口晃来晃去，还走不快，后来他天天练，经常练，随时随地练，练了差不多半个月、终于练出了这样的硬功夫。教练员本身如果没有这样硬功夫，就很难把战士的动作训练得那么好。教练员不仅要能够示范，还要在训练中能够看出战士动作的优点和缺点，能够有一套教学方法，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人家，还要人家能够接受，能够领会，能够很好地掌握和运用。要学会这一套本领，各级干部非下苦功不可。我们学校的训练也要像部队一样学习郭兴福，使学员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有一套硬功夫。这样的学员派到部队里才有用。如果不是这样训练学员，学员的本领过不了硬，到部队里就没有发言权。这次来见学的干部亲自摸爬滚打，身体力行，这种风气很好，要把这种风气带到全军去，带到你们自己的部队中去。

连队政治工作干部不仅要懂政治，也要懂军事，学会一些技术和战术。这次演习分队有两个指导员跟班作业，自己以身作则，爬上悬崖，爬上高杆，这本身就是无言的政治工作。战士们很信服他们，提出了向他们学习的口号，这对战士练兵情绪是个鼓舞，对战士苦练技术是个活的榜样。连队政工干部平时和战士一起苦练，战士想些什么，什么情况下思想会起什么变化等等就看得清，体会得深，思想工作就能抓得及时，抓得有力。连队政工干部跟班训练，学一些军事，也是实战的要求。比如说，打仗的时候，遇到悬崖，连长、排长、战士都爬上去了，指导员爬不上去，那怎么能行呢？

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传统风尚。全军同志在训练方法上，都应该以郭兴福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加强相互学习，坚决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情绪，使我们部队训练工作更加生动活泼，朝气蓬勃。

注 释

[1]郭兴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

推广南京军区机关野营训练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去冬我在南京期间，在抓郭兴福^[1]教学方法的同时，对南京军区直属机关的野营情况进行了一些了解，觉得机关野营是个新鲜事物，很值得研究推广。

根据军委的指示，这几年各军区都普遍搞了野营训练，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东南沿海紧急备战以后，参加野营的部队一年比一年多，成绩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把省军区以上机关拉出去搞野营训练的还不多。解放以后，机关长期驻大城市，住营房，养成了一套城市的生活习惯，作风比较散漫。在老干部中，不少人对我军的优良传统逐渐淡漠，同时，未经战争环境锻炼的新干部在机关中越来越多（据南京军区统计约占半数以上），改造他们的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是一个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战时需要考虑，为使机关能很快拉出去，适应战时环境，也需要在平时加以锻炼。南京军区把机关部分批轮流拉至偏僻的农村，编成班、排、连过严格的军事生活，以政治野营为主，并适当进行一些军事训练，是锻炼机关的有效方法之一。

注 释

[1]郭兴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

编写好我军的战役学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八日)

我们编写战役学，是从一九五八年反教条主义[1]以后开始的。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给我们提出任务，在一两年内编出适合我们情况和需要的条令和教材。我们当时考虑了一下，就学术本身讲，战术隶属于战役，战术、战役隶属于战略，按照这样一个系统，是不是先把战略的东西搞出来，然后来编写战役学，战役学写好了以后，再来写战术方面的东西，从上而下地写起。以后，为了训练和广大基层的需要，同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同志在战斗方面的经验比较多，所以，我们确定了从下而上地搞，先写战斗条令（包括军种、兵种战斗条令）。现在，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军师、团营战斗条令基本上完成了，各军种、兵种的战斗条令也基本上编写出来了。当然，以后经过实践还要修改，那无非是提高的问题。当前的任务主要是写战役学。编写战役学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了，由军事科学院部分同志作了准备工作，也曾试写过一本，这些工作为今天写战役学做了资料上、学术上的一些准备。去年，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全军动手来写战役学，并委托军事科学院来主持这一工作。

今天，无论从国内、国际来看，编写战役学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每天看报纸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著作（包括军事著作在内），在国内无论工农兵学商、男女老幼、党员非党员，举国一致地都在学习，用毛主席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来激发自己的革命热情，来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不管什么人，哪个行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都起作用。在国外，不管是敌人、不管是朋友、不管是同志，都在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反革命的人想利用我们的东西来反对我们；革命的人用毛主席的思想作武器，来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是继马、恩、列、斯之后，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进行武装斗争的人民都希望从中国吸取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经验。因为，凡是革命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开始规模都是很小的，基本上都采用游击战形式，可是不能永远停留在游击战阶段，必然要向运动战发展。所以，我们不仅要提供游击战的经验，还要提供运动战的经验；不仅要提供战术方面的经验给他们，还要提供战役方面的经验给他们。用我们的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革命战争中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因此，我们除了编写游击战和战斗条令以外，还要编写战役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把几十年来几百次战役积累起来的经验理论化、系统化，适时提供给他们，使他们便于学习，便于使用。要看到编写战役学不仅我们自己需要，全世界革命的人民也迫切需要。这是从国际范围来说的。

从国内方面来看，我们是大国，国土很大，人口很多，打起仗来要动员几百万、几千万人作战。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战争不是局限在一个小战场上、一个地区内，而是在几个地区同时展开；战争不是一次会战就能解决问题，要经过多次战役，几个战略阶段。我们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兵种很单纯，现在兵种多了，不仅有陆军，而且有海、空军；我们的武器也

这是叶剑英在编写战役学南京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不单纯是轻武器，而且有其他武器。打起仗来，统帅部要组织若干方向，每个方向又组织若干战役集团，每个战役集团本身也有步、炮、装、工、通、化、铁等兵种，还有战役之间的配合，所以，不仅统帅部考虑的问题复杂了，就是战役指挥员考虑的问题也复杂多了。万一战争打起来，需要很多战役指挥员，需要每个战役指挥员都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组织战役，所以，平时要加强战役训练。无论作战或训练，如果没有战役上若干条的共同原则，思想上就合不成，各个战区自己搞自己的，统帅部就很难指挥了。所以，无论是作战和训练，都需要写一本战役学作依据。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战略上给各军区都规定了任务，备战中也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研究解决，我国的科学技术也在一天天地发展，训练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解决。

编写战役学的迫切性，还可以从总结我军经验和“挖宝”、传经方面来看。我们看到沈阳军区的报告，沈阳参加编写组的五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亲自组织过战役，其他军区也大致是这样。没有组织过战役，靠什么写呢？靠学，靠钻，靠“挖宝”。从毛主席著作里去找，从各方面军、各野战军中经过各个时期的其他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脑子里头有很多“宝”可以挖。如果现在不赶紧挖，将来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我算了一下，将军的年龄有多少，校官的年龄有多少，算来算去，我们跟马克思越来越近了。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规律，人也是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衰老，就会死亡的。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到罗帅[2]那里去“挖宝”。他是从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以后就跟着毛主席的，一直到逝世。罗帅那里的好东西很多，经验丰富，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深刻、正确。我们曾打算用录音机把罗帅的东西录下来，但没有这样做，当时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还有其他老帅们老将们，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在内，都是身经百战的，有很多“宝”，如果不挖出来，不晓得哪天“三长两短”，过去了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时光逼着我们也要把战役学搞出来。我们现在要趁一些老同志健在的时候，把他们的“宝”挖出来。毛主席的思想，不单是写在本本上的，脑子里的东西还多得很，其他老同志的东西也多得很，要从他们的著作中去挖，从战例中去挖，同他们开座谈会去挖。当然，对古代的经验，对外国新条件下的好的东西也可以参考，也要吸收。将来，老干部逐渐减少，要把我们的经验传给新干部，条令可以起传经的作用，战役学是更高级的传经。所以，作为传经来说，也需要编写战役学。这件工作无论对于国际，对于国内，对于现代，对于后代都有重要意义。认识了这些，才能使我们这些老将们更加重视编写战役学的工作。现在各个单位都是“头子”亲自抓，调的编写干部都是“尖子”，是“头子”和“尖子”结合，这很好。编写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的“宝”挖出来，人人都挖自己的“宝”，综合起来就是全面的，就能产生出好的东西。总之，编写战役学很重要，是一件庄严的工作，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的庄严工作。

当然，编写战役学同编写条令一样，有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编写条令困难更大。这是因为参加编写的同志自己没有经验，对毛主席思想很难说都学到手了，全军的战史也还没有写出来，我们二十五年的战争经验还正在总结，我们是边学习、边总结、边编写；敌我双方的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就拿现代条件这一点来说，究竟现代条件现代化到什么程度，有美国的现代化，有法国的现代化，有苏联的现代化，有日本的现代化，有我们的现代化，

现代化水准不一样，而且一年一年的在变化，人家在不断的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要搞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比较固定的东西就很不容易；这些，都是编写战役学的困难。我们要重视这些困难，不能马马虎虎地东抄西抄，这样开出的药方子，吃了要害死人，至少是没有用处。

重视困难，同时要树立信心。要树立我们的自信心，只相信古人，只相信洋人，看不起自己，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我们有条件写好，也一定能够写好。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有各位元帅和许多老将，有战略方针作依据，有我军的丰富经验作基础，还有战备训练和编写条令的经验。

在毛主席的著作中，高度概括了我军各个时期的作战经验。我们要集中力量去读毛主席的书，研究我们几十年来的战史和战例，去访问我们身经百战的老将，把毛主席的思想、我军的经验同新的条件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基本的东西，别的东西只能作参考。

关于历史经验方面，有个不完整的统计，自从建军以来到抗美援朝，比较知名的战役有四百余次，较大的战斗有三万多次。世界上哪个国家比得上？没有的，苏联也没有，其他更不要说了。我们打的战争，时间长，规模大，次数多，敌人强大，情况复杂、残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支前工作和民兵的巨大作用，这也是全世界没有的。所以，我们研究战史、战例，编写战役学，都要考虑到前方作战、后方支援、敌后活动等人民战争的特点。将来作战，前方固然是基本的，围绕前线的后方工作、敌后活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火炮射程只有二十余公里，二十公里以外，只有人家打我们，我们不能打人家，那怎么办？我们有一种办法，就是组织敌后民兵、游击队，敢于打近战，敢于打夜战。最近，北京军区开的现场会议，一百几十个课目中，夜间课目占将近三分之一。他们还创造了很多夜间训练器材。我觉得这里头有很重要的意义。战斗条令上有“躲、打、杀、反”的原则。不管你的武器有多大射程，多大的威力，我在躲过你远程火器的杀伤，待你进入到我们有效射程以内，不断给你削弱，不断给你消耗，最后在二百米、几十米、几米过硬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们有了这个过硬的本领，就什么也不怕。所以，我们军队要练这个过硬的本领，还要指导民兵特别是基于民兵练夜战、近战的功夫。我们的敌后民兵、游击队，就是我们的“活导弹”。所以过硬的本领不仅在前线，而且也在敌后。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

我们在二十五年的战争中，打过各种敌人：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现在还在打，和日本打过，和英、美打过，和印度军队也打过。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不是完全无知的，我们和它交过锋，摸过一下子的。我们打的仗是多样的：小米加步枪的仗打过，简单的联合兵种协同作战也打过。在打法上更是丰富多采：有围城打援、攻城阻援；有伏击性包围、侧击性包围、遭遇性包围、前进包围、后退包围；有分进合击，有超越敌人作战；有对分散孤立之敌的各个围歼，也有对绵亘正面防御的突破；有袭击，有强攻。在作战地区上，在山地、平原、高原、热带、丛林、江河、水网、草原，我们都打过仗。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这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有利条件。

从战争中固然可以学习战争，但在没有战争时就要靠训练学习打仗。这些年来，我们搞了不少的战役训练和演习，这也是我们编写战役学的有利条件之一，也必须研究这一部分的经验。参加编写的同志要尽可能的参加一些

演习，进行调查研究。

总而言之，编写好战役学的有利条件是很的，只要我们认识这些条件，抓住这些条件，深入研究，就可以写出一本好东西来。

自从军委号召全军动手编写战役学以来，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党委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讨论，也组织了编委会，首长亲自挂帅，组织了理论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有四百多人。工作从二月份以来先后展开，进行了学习，研究了许多战例，许多首长领导研究了纲目，有的还向编写人员作了组织指挥战役的报告。总的看来，党委、首长的决心很大，干劲很足，行动也很快，“班子”也很强，编写战役学的形势很好。

编写战役学既然是全军动手，自然有分有合。大家分头回去写，到一定时候再碰一碰头。我们考虑大体上要组织三次会议。第一次就是现在的会议，是确定“蓝图”的会议，把纲目定下来，然后回去写。到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进行“总装配”，把“零件”配成“部件”，把“部件”配成“机器”，这就是汇稿会议，把几本汇成一本或两本。然后，再印发给各单位研究，加以审查修改。最后，报军委并召开验收会议进行验收。

这次会议，同志们把经验交流一下，大家研究一下各单位对纲目提出的一些问题，把认识统一起来，把“蓝图”订出来。会议的开法是，先务虚后务实，先交流经验，后讨论纲目。既然是开会，就要发扬民主，要大家把意见提出来，有一样提一样，不管是大题目、小题目、大问题、小问题、大意见、小意见，都提出来，充分发扬民主。这样使得我们接触各种不同观点，思路比较通畅一点，眼界比较广阔一点，才能订出一个较好的纲目，回去才比较好写。所以，不怕方案多，不怕不同的意见多，多了才能取长补短。这里有个要求，一方面要发扬民主，同时还要同心协力。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虚心向别人学习，互相学习，搞好团结。讨论学术问题，要以理服人。对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甚至是个别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意见。

编写战役学有个情况要考虑到，那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个条令概则。概则里面实际上都是毛主席讲过的东西，相当概括。这样概括的东西，它就不单是战术性质的东西，许多原则是战略、战役、战术通用的。概则中已经写了，战役学中还不写？如果写又怎么写法？如果不写，可不可以考虑把概则上升一级成为战役性的东西？因此，在研究纲目时，要考虑到战役学同条令概则的关系问题。从同志们提出的纲目中可以看出，许多原则同概则上的东西似乎差不多。当然，同志们提出的还只是纲目，内容还没有装进去，可能瓶子一样装的东西不一样，装了酱油就是酱油瓶子，装了醋就是醋瓶子。如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个原则，当区分开战术上怎样集中、战役上怎样集中、战略上怎样集中的时候，它的内容就不完全相同了。我在这里提出战役学同概则的关系问题，

是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战役学如何落实法，怎样把战役的东西装进去。我们努力的方向就在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军事上的东西就是那么几条，如果讲来讲去都差不多，那就雷同了，那就不必要了，写出来将来又要返工。所以，写战役学的时候，安排原则的时候，要考虑同概则的关系。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

编写战役学是创造性的工作，要把我军几百次战役、几万次战斗，各种

地形、各种兵种的运用，对各种对象的打法，以及使用现有的兵器、编制通过演习、通过研究得出的一些经验，能够比较

完全地反映到我们战役学上来，就需要我们作很大的努力。毛主席和我军的东西多得很，仅在运动战的实行方面，毛主席就给我

们开了一大篇单子，他说：“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毛主席那个时候各方面都说一下就好了！可是他没有说，意思大概是让我们去搞。这仅仅是一个运动战，我们的纲目中还有很多东西，进攻战役一大篇单子，防御战役一大篇单子，特种战役一大篇单子，政治工作一大篇单子，后勤工作一大篇单子，军队移动一大篇单子。光开单子就不容易，开出单子以后，还必须加以条理化、系统化，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同志们都是“秀才”，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一次完成，不要返工，完成毛主席、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

注 释

[1]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全军部队在学习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过一些生搬硬套苏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对此，中央军委多次明确指出：学习苏军经验，要与解放军的实际相结合，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防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从一九五六年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高层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在学习苏军经验中发生的偏差，因而，从全军总体上看，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却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等领导人进行批判和斗争。会后，在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这次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给军队建设造成了很大损害。

[2]罗帅指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把我军的夜战本领练好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北京军区在学习和推广郭兴福[1]教学方法当中，狠抓了一下夜间训练，并且搞出了一套经验，很好，方向完全对头，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符合军委的指示，说明军区党委、首长、机关对于贯彻执行上面的指示是坚决的、认真的。

我军二十二年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绝大多数战斗是夜间打的。夜战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未来战争，不管敌人使用什么武器，使用不使用原子弹，不管它的火力多么强，射程多么远，机动力如何大，我们还是要靠夜战、近战来对付它。夜间，它那些比我们优势的东西总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核武器不能最后解决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人，靠陆军，靠步兵，靠近战、夜战。核武器、各种远战火力，只能为近战作准备，为突击创造条件。认清了这一点，进攻时，在远战阶段就要很好保存自己的力量，利用夜暗秘密迅速接近敌人，和敌人打近战，猛打猛冲，克服敌人的各种障碍物和堡垒，用白刃格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防御时，就是要“躲、打、杀、反”，千方百计地打掉敌人的坦克，利用夜间反突击，死打硬拚，消灭敌人，守住阵地。因此，一定要把我们的部队训练得敢打近战，善打夜战，相信自己的刺刀，不怕敌人的核弹。我们的军队政治上是强的，再把近战、夜战的技术、战术搞好了，真正能过硬，就像周总理所讲的，我们就无敌于天下，就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全军必须要有个统一的认识。

部队的训练一定要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胜利后我们搞了十多年的训练，但真正扎根打基础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万丈高楼从地起，基础打不好，功夫就过不了硬。连队的基础训练主要是解决人和武器的结合，分队与分队的结合。使人和武器结合得很密切，对手中武器非常熟练，像古人所讲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做到打得很准，开动很迅速，联络很通畅，像杂技团的演员那样纯熟。在这个基础上，在统一的战术思想下使分队和分队密切协同，形成强有力的拳头。这些，不仅要在白天练好，而且要在夜间练好。这是不容易的。要靠苦练，靠巧练。这样，下边把单兵、小组到连的基础打好了，上边把干部和首长司令部的训练搞好了，大兵团作战就好办了。

提倡孤胆作战。夜间最容易锻炼人的胆量，谁也看不见谁，各人发挥自己的技术和战术。有了孤胆，孤人、孤组、孤班、孤排、孤连就敢于大胆插到敌人里边去，单独完成任务，并不感到自己孤单，也不怕自己孤单。这样就可发挥比白天大许多倍的威力。因此，要把我们的战士个个都训练成夜老虎。他们复了员，又成为民兵的骨干。一旦发生战争，前线有我们正规军的夜老虎，敌后有我们民兵、游击队的“夜猫子”，任何敌人都是招架不了的。

夜间由于视力困难，精神容易疲劳，更要注意解决训练方法的问题。如这次座谈中同志们所讲的，先白天练后夜间练，白天先睁眼练后蒙眼练（不是所有课目），先分后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在夜间训练的时间上由短到长；在练的过程中有了问题和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精神疲劳了就讲战例（特别是本组、本班、本连的战例），开展评比竞赛；有了难点，就发扬军事民主，大家研究解决，等等，把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练战术结合起

这是叶剑英接见北京军区部队夜间训练“尖子”分队部分干部时的讲话。

来。这些方法都是对头的，要进一步总结，把有关夜间训练的计划、组织、设备、实施等方面的经验，搞出一套东西来，在全军推广。

为了取得经验，在一定时间内突击某一个课目或几个课目是可以的，但不能停留在单项突击上，要使突击和经常结合起来，要持之以恒，要成龙配套。龙，有头、有腰、有尾。成龙训练就是一个兵、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从战斗开始到结束，有哪些必须学会的技术、战术动作，有主次、有先后地逐个学会，不能只会一截子。配套训练，就是在课目上有技术也有战术，有攻也有防；在单位上这一分队与另一分队，这一火器与另一火器，这一兵种与另一兵种，战斗分队与保障分队，指挥人员与战斗人员，等等，都能配套地进行训练，不是跳独脚舞。

目前着重抓培养尖子、搞样板是对的，但目的不是为夺锦标，不要搞那种舞台式的、杂技式的表演，而是搞战斗中过硬的功夫。有了尖子，有了样板，还要由点到面，普及提高。在现有的尖子的水平上去普及，使所有部队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在普及的基础上又去提高，发现和培养新的尖子；然后又在提高的新的水平上再去普及，交互前进，不断提高我军的技术战术水平。现在我们只是搞出了样板，这仅仅是开始，这条路还是相当长的，不能停留在这个上面，应该向成龙配套、普及提高方向发展。继续努力、把我军的夜战本领练好，把夜战的胆量练出来，把部队训练成夜老虎，我们的国防就更加巩固了。

注 释

[1]郭兴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

加强参谋业务基本功的训练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今天的参谋标图作业表演很好，有白天，有夜间，有各种不同情况，有各种不同姿态（坐着、站着、走着、趴着），还戴了防毒面具，情况决心一宣读完，图也标完了，标得快，标得好，这是过硬的功夫。所谓苦练出专家，这是苦练得来的。北京军区这次不仅突出地抓了夜间训练，抓了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的训练，还抓了参谋业务训练，行行都出了尖子，这是军委提出的方针、原则在各行各业落实的结果。

现在的参谋工作，比我军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古时候打仗，一个指挥官就能指挥他的军队。拿破仑[1]就是用一根鞭子、一个棍子站在山头上指挥他的军队的。现代战争就不同了，情况极其复杂，战争会在空中、地面、海面、海底、前方、后方同时展开各种斗争。敌我双方不是小兵力，而是大兵力，不是小地区，而是大地区，不是浅纵深，而是大纵深，不是单一兵种，而是多兵种的联合作战。侦察、通信、后方勤务、各种保障都复杂得多了。组织指挥现代的战役和战斗，除了要有坚强的指挥员以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过得硬的参谋人员，要有能干的司令机关才行。因此，必须加强司令部的建设，加强参谋业务基本功的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参谋业务的基本功，除了你们说的要会画、画得好，会写、写得快，会传、传得准以外，还要会读、会记、会算。

会读，就是要会判读地图。地形是敌我决定作战行动的基础。参谋人员对到过的地方的地形要记得很熟，对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地形，凡是和自己部队作战有关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和重要的城镇、乡村，对军事行动有重要意义的山脉、河流、道路、桥梁、港口等等，都要通过经常读地图把它们的关系、位置记得很熟。对于地图上的比例尺、标高、坐标、各种地形地物的符号等等，都要搞得清清楚楚。

会记，就是要熟记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熟记自己部队的编制、装备和实力；熟记敌军的番号、序列、兵力、战术特点，乃至了解敌军指挥官的个性等等。只有知己知彼，才有可能为首长下定决心提供可靠的资料和有价值的建议。

会算，就是要会计算为首长定下决心所必需的各种数据。如计算敌我各军种、兵种的运动速度，各种火炮的射程，各种武器的威力，兵力、火力的密度，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作战定下决心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为此，参谋人员要熟记各军种、兵种的战术、技术性能，并且学会用心算、笔算、计算尺、计算机等进行计算，以便能及时准确地报告首长。

此外，参谋人员还应具备一定的战役、战术理论水平。有了这个水平，才能提高业务工作的质量，否则就成了单纯技术工作者，起不到又参又谋的作用。为此，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熟悉有关的战斗条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首长的左右手，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练好上面这些基本功，也要靠天天读、天天练，练写、练画、练记、练算，还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统帅业务，使所有参谋人员达到又红又专。

这是叶剑英观看北京军区部队几位参谋的标图作业表演后，同他们座谈时的讲话。

培养一个参谋不容易，参谋强了，司令部就强了；司令部强了，指挥就灵了。我们必须加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加强司令部的建设。

注 释

[1]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七九九年在法国大资产阶级大持下发动雾月十八日（十一月九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一八 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进一步提高全军军事训练质量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全军开展学习郭兴福[1]教学方法以来,出现了大批“尖子”。六七月间,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普及的号召,军委对普及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各军区、各军种兵种普遍重视,积极响应,普及工作已全面展开,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这次全军军训工作会议就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和军委关于普及工作的指示,研究确定两年的普及规划。

这次会议很重要,是关系到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总参军训部曾召开了预备会议,各军区对普及工作的情况作了调查,有些兵种(炮兵、工程兵、防化学兵)召开了训练会议,许多问题都比较明确了。同时,在这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赫鲁晓夫[2]下了台,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会议在张副总长[3]主持下,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指示,然后讨论了普及规划,研究了贯彻执行的各种措施,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会议开得是顺利的,解决了不少问题。我讲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从军队训练的角度看军队政治素质对国家政权的作用。

利用军队篡权的事例,古今中外很不少。三国时代的司马懿父子[4],就是先夺军权的;赵匡胤[5]也是先抓军队,搞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蒋介石也是抓军队的。我党历史上张国焘[6]就是抓军队搞分裂企图篡党的。在外国也都有过这种事例。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谁想夺取政权、保持政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国内外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条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必须永远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成为党的路线政策的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原理,以防个人野心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而用以篡党、篡政。现代外国军队在政变中所起的作用,为我们军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教训:军队要训练的首先是政治而不是战术、技术。枪杆子究竟为谁服务,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军队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那样的军队是危险的,它可以为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另外一个阶级服务。

为了使我们军队永远控制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必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7],切实做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使我们的干部都能够懂得马列主义,全心全意地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全人类,为全世界人民,不是为个人、为局部,也不是为一个团体、为一个国家。只有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把全部积极性调动起来。毛主席说,五条标准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第一条是方向、是理论,第二条是目的,第三、第四、第五条是方法问题。按照这五条标准做好挑选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才能切实保证我军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这是叶剑英在全军军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是久经考验的，绝大多数中下级干部也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和考验，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是忠诚的。这已经为我军几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但是，随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还必须重新教育干部。要重视在干部和士兵中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培养和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特别是要培养和增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培养这些观点不能光靠看一本书、一篇文章，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中去锻炼，长期培养，使之成为真正可靠的接班人。有了这样的接班人，军队就不会被某些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我们的干部就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就能紧紧地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千秋万代的大计着想，我们一定要坚决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条件，培养好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第二，从军队训练角度上看我国原子弹爆炸的意义。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大力协同、日日夜夜辛勤劳动的结果。它在世界上所产生的政治威力之大，影响之深，是不可估量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和同情我们的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全世界人民都相信，帝国主义的原子弹是用来搞垄断、讹诈和侵略的；我们的原子弹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是和平的原子弹。所以，我们原子弹一爆炸，就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拥护。

我们原子弹爆炸不仅政治威力很大，同时在军事上也使我们的国防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国防力量。但是也可能产生各种不同的认识。比如，有的认为有了原子弹了，世界上没有问题了，什么战备工作，普及工作，搞得那样紧于什么？有什么必要以临战姿态大搞普及呀！或者认为，有了原子弹，什么步枪、手榴弹、迫击炮都无用了，天天练也没有用处了。这些看法，都是过高估计了核武器的作用，是不对的，是危险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领导干部必须抓紧对部队进行教育，特别是要认真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关于核武器、核战争的论述和指示，以便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

首先，要认识到我们虽有了原子弹，仍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加强训练，绝对不能放松警惕、放松训练、放松国防建设。

我们不要认为，核武器是万能的。核武器不可能解决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侵略本性。帝国主义并不会因为我们有了原子武器就从台湾撤走，从南朝鲜[8]撤走，从南越[9]撤走，从日本撤走。相反，他们丝毫没有放松侵略活动。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拉我们加入核禁试条约，以束缚我们。美国继续加强对我核技术情况的侦察。今年十一月十二日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佐世保，继续加强对我国的“弧形包围圈”，并仿效北大西洋军事条约[10]，在亚洲推行“核保护伞”。美国的一些官员主张要用强硬的手段对付我们，要轰炸我国生产核武器的工厂。最近泰勒[11]公开讲，要把南越战争扩大到北越。台湾蒋帮也在叫嚣，要求美国帮助他们提前反攻大陆等等。总之，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原子弹爆炸并不意味着我国周围的形势缓和了，太平无事了。帝国主义搞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帝国主义要独霸世界，我们就要支持世界革命，我们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长期的。因此，不管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不管制造出多么

强大的武器，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各项战备工作就必须搞好，部队训练工作必须搞好，使我军的战斗力经常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战备工作搞不好，训练工作搞不好，尽管有再强大的武器也等于“纸老虎”。因此，我们虽然有了原子弹，还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加强训练。

其次，要认识到我们有了原子弹，仍然要坚持搞近战、夜战，练二百米过硬的功夫。

关于人和武器的关系，我们的观点向来是明确的。毛主席讲：“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2]在没有原子武器时我们这样看，有了原子武器还是这样看。我们手里有了核武器，首先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用来打破敌人的核垄断、核讹诈，用来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来说，我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有多少原子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我们不靠原子弹来解决战争问题，也不靠原子弹来解决战役、战斗问题。在战役战术上，有了核武器，只是火力上得到了加强，并不能决定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国家这样大，敌人打原子弹，我们可以转移，可以机动。我们有广大的民兵、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作战，随时随地可以主动地向敌人进攻，去和敌人打夜战、近战，使他的原子弹不起作用。同时他打了原子弹，他自己行动也不方便；他能到哪里，我们也能到哪里，结果还是短兵相接，还是靠常规武器，靠常规武器所装备的合成军队，靠合成军队的协同动作，靠合同战斗。我们的条令上规定防御要“躲、打、杀、反”，在敌人进行火力准备时，我们在洞子里躲起来；待敌人进到我们炮兵火力有效射击距离的地方，用炮火猛烈杀伤他；敌人步兵接近我们以后，就和他拚，和他杀，向他反冲击，消灭敌人步兵。总之，不管使用不使用核武器，最后解决问题还是在二百米内，还是近战、夜战，还是靠人，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炸药、刺刀来消灭敌人。所以，我们只要有原子武器知识，有防护的技能，又具有原子条件下作战的战术，有近战、夜战的本领，那就不怕敌人的核弹。因此，我们有了原子弹更加需要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加强基础训练，加强干部、司令部训练；绝不能因为我们有了原子弹就对近战、夜战的训练有丝毫的改变。我们必须死死咬紧近战、夜战的训练，练好二百米内过硬的功夫。

再次，要把“研究原子、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进一步落实。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全军在认识上已经统一，在部队中也进行了一些防原子知识的教育。但由于前几年我们自己没有原子弹，不能实际试验，没有感性知识，只好照人家的一些材料去训练，心里总是没有底。现在有了，就有资料可以研究了。因此我们更要抓住我们自己的东西来训练部队。

这次试验的结果正在研究，还没有全部总结出来。我找了几个参加试验的同志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认为，通过这次试验进一步认识到原子武器确实有很大的杀伤、破坏作用，对军队战斗行动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只要掌握了这种武器的规律，是可以防护的，是可以大大减少伤亡和损失的。关键在于要使我们的指挥员、参谋人员、战士懂得这方面的知识，掌握它的规律，学会必要的技能。

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了解原子武器的性能，了解它的杀伤破坏作用，了解它的规律和各种防护的方法，以及如何组织侦察、洗消等基础

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的时候不慌张。熟悉了原子弹的性能和战斗使用，了解了它的规律和防护的方法，就不会慌张了。认识了必然性就自由了。

对司令部要特别加强以下方面的训练。第一，要学会使用必要的仪器、计算工具，在原子爆炸的短时间内测出爆炸地点和烟云上升的时间、高度，求出当量和杀伤范围。当量不一样，光辐射、冲击波的威力和杀伤面积也就不一样。所以及时测出当量非常重要。其次，司令部要学会组织辐射侦察，并根据侦察的结果和计算作出各种不同时间的剂量率分布图。第三，要学会组织对受污染地域和人员的剂量监测。不了解各分队的照射剂量就等于不了解各分队的战斗力。

对分队的训练来说，特别要使战士对原子弹有个正确的认识，使他们懂得原子弹的性能和作用。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它，不能马虎。同时，要有原子防护方面的科学知识，要学会防护动作，学会土工作业，学会用爆破法快速构筑各种工事，还要锻炼穿戴防护器材的耐力和适应力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学会了，在敌人使用原子弹时就可以做到不慌、不乱、听从指挥。

总之，有了原子弹就要正确认识它，要能够防护它、要不慌张。至于要不要使用，能不能使用，作为第二步研究。我们讲不首先使用，并不等于不使用，万一敌人使用，我们有了为什么不使用？当然还是要研究使用问题。现在，第一是能够认识原子弹，做到不慌张；第二是能够防护原子弹，可以作战，最后达到在二百米内胜利。

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对我们主管训练的同志和搞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根据试验的结果，逐步充实我们的训练内容，逐步充实和修改我们的条令和教材，逐步研究和改进我们的装备器材，从而更进一步地把军委关于研究原子弹、导弹等条件下的作战与训练的指示落到实处。

第三，关于军队训练中的普及问题。

今年以来，全军继续大力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方法，训练工作成绩显著。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都根据郭兴福教学方法，结合自己的任务、自己的特点进行了训练，各有独到之处。就各军区来说，有的干部、司令部训练搞得好的，有的夜间训练搞得好的，有的主要首长亲自抓训练比较突出的，有的野营训练好的，有的训练和战备任务结合得好的，有的步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得好的，有的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得好的，有的民兵训练抓得好的；就各军种、兵种来说，有的抓干部学毛著搞得好的，有的在训练中继承和发扬我军的老传统、好方法比较突出的，有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搞得好的，有的以整风精神检查了训练工作中存在的“框框”，为使军委提出的方针、原则进一步落实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之，今年的训练成绩比任何一年都好，各军区和各军、兵种在训练中各有特长，希望你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比学赶帮，把我们的训练工作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但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对待任何一件工作都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优点，又要看到缺点，特别是在成绩越大时，越要看到不够的地方。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还不到一年，经验还不多，不可能样样都做得那么好。因此，既要巩固已有的成绩，发挥各自的特长，又要善于发现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和薄弱环节，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冷静的促进派，推动工作不断前进。

毛主席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的表演之后，指示我们要很快在全军普及。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贯彻、努力完成。为此，必须以整风精神改革训练工作，掀起普及的新高潮，造成声势。

郭兴福教学方法的产生，以及在全军的迅速推广，受到广大官兵热烈欢迎，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产生了大批“尖子”，这决不是偶然的。这种教学方法的产生，是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贯彻军委的一系列方针、原则，突出了以我为主，打破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框框”的结果。不然，就不能突破“框框”，不突破“框框”，就不能产生郭兴福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思想上打破了只练技术、战术，不练思想作风，只教动作不教人的“框框”；在训练内容上打破了多而全，只强调大演习和大合练，不重视训练单兵和小分队基础动作的“框框”；在训练方法上打破了死板生硬，搞注入式、命令式教学，言教多于身教，讲得多练得少的“框框”；在训练要求上打破了只看环数、分数，不考虑实战要求的“框框”；等等。全军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有破有立。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训练；立了加强训练中政治工作的地位，抓好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立了练技术、练战术和练思想、练作风相结合；立了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立了搞少而精，搞单兵、小分队的基礎动作训练，苦练基本功；立了民主教学、群众路线、启发诱导；立了身教重于言教，既耐心说服又严格要求；等等。因此，可以说，这次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是一次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同时也是一次教学思想上的改革。

全军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单位行动很快，效果显著。有的单位行动较慢，有阻力，因而效果不突出。主要原因是还残存着各种各样的“框框”没有冲破。因此，要想更快、更好地普及“尖子”经验，进一步加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工作，必须以整风的精神，以革命的精神，以临战的姿态，破除训练工作中存在的各种“框框”。明年全军院校进行整风，搞教学改革，部队训练也要以整风精神搞训练改革，这是搞好普及工作的前提。

一九五八年以后，特别是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来，各军区和各军、兵种都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了许多改革。例如：空军这几年突破了许多“框框”，根据军委提出的方针原则，逐步搞起了自己的一套。首先在少而精方面，他们将飞行员从航校到部队整个训练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确定每个阶段训练的重点，打破了过去按苏联一套训练程序进行训练的方法。他们还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从我国空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编写了一套操典、大纲、教材，根据不同的训练对象、训练时间、训练要求和条件，确定最需要的和可能完成的训练内容，达到少而精。其次，关于经常练、天天练的问题，空军经过摸索提出了一些办法，如航空兵部队实行地面苦练、空中精飞；高射炮部队实行炮下苦练、炮上精练；雷达、通信部队实行机下苦练，机上精练；探照灯部队实行灯下苦练、灯上精练；等等。从他们不断取得的空战胜利中，就可以看出经常练、反复练的成果。

其他军兵种突破“框框”的事例也很不少。比如，海军的枪炮射击规则和鱼雷艇攻击，炮兵的分队训练方法和山地射击方法，坦克兵的射击检查方法，通信兵的训练计划，防化学兵的喷火方法以及工程兵的地雷、爆破、架桥等，都突破了过去学苏联的那一套“框框”，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以上说明，只有突破了“框框”，才有发明创造，训练工作才有进步。只要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我军的经验，发挥人的积极性，就可以突破各种“框框”，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创造出来的东西，不但不比别人的坏，而且会比别人的好。

用整风精神搞训练改革，炮兵已经开始了。大家都说炮兵训练会议开得好，我也认为他们的会开得好。他们把多少年来在炮兵训练中所存在的三个方面的“框框”初步揭露出来了：一个是在纲目、规程、教范上脱离我军实际的“框框”；一个是训练任务指标上“高、大、多、全”的“框框”；一个是组织指导训练上统得过死、方法不活的“框框”，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根据这次会议上大家的发言来看，训练中的“框框”不仅炮兵有，其他军、兵种也有，各级都有。看来，这是客观存在，应当承认。可能有多有少，程度不同。所谓“框框”，就是脱离我军实际情况的、束缚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东西。不破除这些“框框”，“尖子”经验的普及工作就搞不好，我军的训练工作就不能前进。“框框”，不仅训练工作有，其他工作包括供给、管理等规章制度中也有。训练工作中的“框框”一定要改革、破除，其他工作中的“框框”也要改革、破除，不改革、不破除就会闹矛盾，互相影响。比如油料供给制度的“框框”不改革，就会影响到训练工作。因此，一定要发动群众，集中一段时间，通过训练会议或干部会议等形式，用整风的精神认真检查一下训练工作中的各种“框框”，真正使军委提出的方针、原则落到实处。

破除“框框”，改革训练，是一件艰巨复杂的工作。要不断认识、不断破除，要有破有立。首先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要敢于揭露，敢于破除，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认真对待。这个工作请各级党委抓一抓。

全军比武后，各军、兵种都根据配套的原则搞出了自己的普及项目。如步兵十三项，侦察兵十九项，工兵九至十七个题目，其他兵种也大多在十项以上，并对每个项目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这些项目是平排并列的要求呢？还是要有重点的要求呢？这是制定规划时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平均要求，一个兵样样都达到“尖子”水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的由单项到多项、成龙配套，并不是要求所有项目不分主次、样样精通，而是要求根据一个兵的任务，在主要项目上达到“尖子”水平、能够过硬；同时次要项目也要会，不是单打一，只搞一项，其他不会。战士以学技术为主，学战术为辅，两者就不是平排的。在学技术方面特别要抓紧搞射击，要用大部分时间把射击搞好，也不是平排的。对干部、司令部训练的要求也是一样，一定要突出重点。因此，对普及项目的要求，在一定的時候，在一定的计划中间，只能提出一、两个重点。既不要单打一，又不要平均主义。

如何搞好普及，会议上提出了很多好的措施，我完全同意。在这里，关于领导训练工作的方法问题，我提出几点意见。

（一）上下结合。对上要吃透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指示的实质精神，对下要抓第一手材料，充分掌握连队中间、士兵群众中间的活的资料、用毛主席思想和军委的指示精神回答和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只有抓紧了这两头，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下要抓得紧，经常检查、帮助和督促；而下级机关、干部和群众，又要经常坚持和发扬我军的民主作风，经常向上级如实反映自己的问题，提出建议，求得上级帮助解决。就领导方法来说，凡是上级经常抓的，底下又充分发扬民主的，能够向下找

镜子的，工作就比较好；凡是死水一潭，太阳从来没有照到过的地方，那就一困糟。院校如此，机关、部队恐怕也是如此。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二）蹲点和跑面相结合，就是毛主席讲的下马观花和走马观花相结合。首先要进行蹲点，蹲到一个单位，改造一个单位，取得经验，带动面上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能够从面上的情况中发现苗头，去充实点上的经验。利用面帮助点，利用点推动面，互相结合，互相推动，全面发展。搞普及工作，领导干部不亲自下连蹲点，不去摸普及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就没有发言权，指导普及工作就没有力量。

（三）要把当兵（蹲点）和现场会议（大的或小的）结合起来。领导机关要想整顿、帮助一个单位，就应当有个计划。组织干部到这个单位去当兵或蹲点，把当兵和蹲点结合起来。通过当兵在士兵中交知心朋友，真正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把问题搞清楚之后，由当兵变为工作组，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存在的问题，直到整顿好这个单位。然后再召开现场会议，利用活的材料、活的典型进行教育或传播、推广他们的经验。把当兵（蹲点）和现场会议结合起来搞，这样，可以提高当兵的质量和蹲点的效果，也能更好地发挥现场会议的作用。

第四，讲讲勤俭练兵问题。

这次军训器材展览，内容丰富，体现了全军广大官兵的智慧，说明群众当中有天才。各军种、兵种的部队和院校的广大官兵确实花了心血、用了脑筋，发明了许多东西，而且有科学水准，既为国家节省了资财，又缩短了训练时间、提高了训练质量。

这次展品会上展出的展品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有关训练和教学方面的方针、原则，对部队普及“尖子”经验会起很大的作用。他们提出的“代用器材苦练，装备器材精练”，完全符合勤俭练兵的目的。

从展览中我觉得比较好的几个方面是：一、各军、兵种都围绕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的问题创造了大量天天练、经常练的器材。这些器材具有以土代洋、以假代真、以简代繁、以小代大等特点，体现了自力更生、勤俭练兵的精神，更好地解决了人多器材少的矛盾和经常练与武器磨损的矛盾。如空军制做的地面练习器，铁道兵某部制作的许多简便的训练器材，装甲兵展出的二十三毫米的内膛炮，以及济南、福州、广州、北京等军区的部分展品，都具有用钱少、性能近似实物的优点。二、各院校为了教好基础理论、学习基础知识，创造了许多形象化教学器材，使复杂问题简明化、抽象问题形象化，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教学质量，也为国家节省了资财。如空军制作的讲解机械工作原理的五种示教板，体现了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分到合的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有空军制作的波动显示仪，通信兵的无线电演示教具等，都使得过去十几个小时讲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就解决了。三、各军区、各军兵种都有大量的技术革新展品，有的是提高了装备器材的性能，有的是节约了时间，有的是大大减少了武器装备的磨损。既便于训练，又便于作战。如沈阳军区革新的半自动步枪的撞针，工程兵发明的倒刺爆破筒等，都很有价值。

我们管训练的同志，必须重视训练器材的创造和革新，这是搞好普及工作、提高训练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展览，许多单位看了之后都反映很好，学到了不少东西。海军组织了一百三十多名院校干部，用三至四天时间参观座谈。他们认为，不仅技术上、方法上有很大的收获，首先在思想上有

很大的启示，认为只有有了革命化的思想才能有这样的发明创造。有的院校和部队总是喊器材不足、经费少，伸手向上要，自己不动脑子、不发动群众，问题老是解决不了，训练质量提不高。他们应当从这次军训器材展览当中得到启发。

希望各军区，各军兵种首长对这次展览的器材认真鉴定一下，有推广价值的要进行推广，简单的器材由部队、院校自己仿制，复杂的器材，安排到工厂生产，迅速下发部队。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训练和使用器材的过程中开动脑筋、想办法，突破没有过关的地方，并且自己动手，利用就便材料进行制作，以弥补训练器材的不足。

这次军训器材展览再一次启发我们，有关国防工业生产的三个方面，即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和使用必须密切结合起来，相互推动。特别是如何充分发挥使用武器装备的士兵和干部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利用他们的技术革新成果，来改进我们的研究设计试制工作，推动我们的军工生产，这二点非常重要。因为广大的士兵和干部，在训练过程中，成天摸武器装备，摸透了它们的脾气，发现了它们的弱点，就会在熟练技术的基础上产生革新技术的创议，进而革新技术。沈阳军区部队改进撞针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从训练器材的改革很快就转到了装备器材的改革，对于这一点我们管训练的、搞研究设计的、搞军工生产的同志们必须引起注意。

注 释

[1]郭兴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

[2]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苏共中央解除党政领导职务。

[3]张副总长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

[4]司马懿父子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懿，三国时魏国大将军、相国，把持朝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任魏国大将军，相继专权，擅自废立魏帝。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

[5]赵匡胤即宋太祖，五代时为后周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掌握兵权。公元九六〇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

[6]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革命。

[7]五条标准指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四、有事要跟同志商量，要讲民主。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8]南朝鲜指大韩民国。

[9]南越指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办议签订后，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获得胜利，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了越南南方，建立了所谓“越南共和国”。一九七五年五月，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统一。

[10]北大西洋军事条约即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以美为首的英、法、意大利等十二个西方国家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简称“北约”。同年八月

二

十四日起生效。希腊和联邦德国等国相继加入，共十六国。根据这项公约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是美国为加强对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

[11] 泰勒，当时任美国驻南越大使。

[12] 见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办抗大式的学校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我们究竟要办什么样的学校？办好一个学校，最重要的要解决哪些问题？对这个问题，我着重讲讲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抗大[1]为榜样，办抗大式的学校。

抗大的办校方针。

抗大之所以闻名全世界，就是因为它培养出了大批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甚至在极端困难环境中，坚持党的方针，克服一切困难，不屈不挠奋斗到底的坚强的革命干部。它很好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所赋予的历史任务。毛主席说，抗大之所以是最革命的、最先进的，就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我们现在办学校，就是要以抗大作榜样，办抗大式的学校。全军院校只有像抗大那样，才能培养出大批坚强的干部，满足军队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粉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阴谋破坏，把我们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把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全军院校一定要发扬抗大的革命精神，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向“抗大式的学校”这个目标奋勇前进。

抗大的光荣传统，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具体说来，主要是：

(一)有正确的方针。抗大创建初期，毛主席为抗大规定的总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主席说，这三者是造就一个抗日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就是根据这个方针来办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员都是根据这个方针进行教育和从事学习的。毛主席对这个学校有很严格的要求。他对抗大二期的毕业生说：你们要“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毛主席除了强调学习政治、军事以外，还特别强调搞好生产。在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时候，他给抗大的题词是：“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他还说：“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2]要把我军干部锻炼成坚强的干部，不是光学几本书就行了。要把我们的干部放在战斗、生产的大熔炉里，进行冷处理、热处理，敲敲打打，锻炼成为坚强的干部。学习知识和理论，要同劳动结合，同斗争结合，同实际结合。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开花结果，不然理论还是空的。抗大的办校方针，就是我们今天的办校方针。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条方针，我们的院校才能办好。

(二)有坚强的领导。抗大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毛主席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亲自给抗大讲课，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发表演讲，作报告，题词。中央派林彪、罗荣桓、罗瑞卿[3]担任学校领导。他们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又是学员，是三结合的。三结合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革命化。它的方针是革命的方针，它的领导是革命的领导。而现在我们有些院校的领导同志，既谈不上当教员，更谈不上当学生，就是单纯领导，天字第一号的领导。院校领导高高在上是不行的，一定要学抗大的三结合。我们还要动员各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同志，都向毛主席和中

这是叶剑英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央的其他负责同志学习，亲自给学员讲课。

（三）有优良的校风。抗大的校风就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的校风，是建军以来，毛主席在实际斗争中加以总结和发展起来的。抗大的同志为了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革命任务，亲密地团结起来，发扬雷厉风行的作风，紧张地工作，严格遵守纪律，既有严肃性，又很活泼。抗大优良的校风是闻名全国的。

（四）有正确的教学原则。校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实践经验，把抗大的教学原则概括为：少而精，短而少，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以后还讲到理论和实际并重，集体研究，教学相长，互相帮助。

（五）教学内容少而精。抗大办学校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抗日。学会打日本的本领就毕业。我们今天办学校的目的、任务和学校的课程、教学内容，都要好好研究一下，认真加以解决。

（六）学制短。抗大的学制，一般为六到八个月。住学校读点书是必要的，但时间不能太长，时间长了，就容易越学越空，脱离实际。干部主要靠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培养提高。

（七）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当时提出三种教学方式：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就成为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教员先启发学生，学生受了启发之后看本本，看参考书，经过一番研究，再去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证明理论是否正确。抗大的教学方法，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八）有又多又好的教员。抗大很重视教员队伍的建设。教员又多又好才能教的学生多，出的优秀干部多。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抗大办了教员训练队、建立了助教制度，还经常举行干部讨论会。为了提高教员的积极性，曾想了很多办法，加强对教员的政治教育，健全党内生活，减少教员的工作时间，改善教员的待遇，建立教员的威信，实行表扬的方法，等等。教员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了，他们就天天钻研，天天发明创造，教学工作也就搞好了。

（九）十分重视政治教育。抗大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加强思想意识锻炼。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落实到中国，具体运用到中国，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我们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老死于斯。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指示。

（十）自力更生，勤俭办校。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自己生产，解决生活困难。我们现在院校学员去参加农村劳动，有的手上起了个泡，脚磨破了点皮，就发牢骚，讲怪话。这就不符合抗大的光荣传统。

抗大的光荣传统可以概括许多条，最主要的有上述十条。我们只要以抗大为榜样，向着“抗大式的学校”这个目标奋勇前进，两三年之后，全军院校的面貌就会完全改观。

当然，我们不是把十条经验平列起来，它有个中心。中心是什么？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办学校。毛主席从建军起，他就狠抓党对军队的领导，建立和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抓军队中党的建设、强调人民军队的性质，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军阀主义。著名的古田会议[4]，解决了很多问题，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军事要服从政治的问题。这是我军几十年来建设的根本经验，我们院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以抗大为榜样，办抗大式的学校，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建军以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全国胜利后，毛主席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一系列教育方针。这不仅是地方院校的教育方针，也是我们军队院校的教育方针。

领导班子要革命化。

抗大之所以办得好，就是领导班子强。他们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目前我军院校多数领导班子是好的或基本上好的，如大家所知道的长沙政治学校、空军四高专等学校，都是办得比较好的。他们之所以办得比较好，有很多原因，其中领导班子比较革命化，是个重要原因。我们常讲，一切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关键在于领导，办学校也是这样。从第一批院校整风的情况来看，真正搞得乌烟瘴气、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的院校，也只是个别的。办得差的院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他们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思想学得不好，不革命化。不搞革命化，就搞庸俗化，搞蜕化，搞自由化，搞腐化，所以问题成堆。这是值得各院校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引以为戒的。

根据我军几十年办校的经验来看，领导班子革命化，有以下几条主要标志：

（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能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现实思想问题，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做到政治统率业务。

（二）领导班子很团结，民主作风好，能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坚持原则，又心情舒畅，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

（三）干劲大，能“脱鞋子下田”，深入教学第一线。能放下架子，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实行教学相长。敢于大胆破除框框，能钻进去，闯出自己的路子来。

（四）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既能言教，又能身教，平易近人，联系群众。院校领导干部革命化，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主要是这几条。这几条主要标志可作为检查院校领导干部是否革命化的一个尺度。

怎样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我们的经验是：

（一）自觉革命与有计划的整风相结合。一个革命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苦学苦修，经常检查缺点，改正错误，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领导干部自觉革命，还要与群众帮助、监督、批评以及有计划的整风相结合。群众的监督，群众的帮助，是使领导干部革命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院校的领导干部每年结合整顿一次，是非常必要的。

（二）领导干部对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必须认真研究，吃透精神，坚决贯彻。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结合下面的情况，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在执行中发挥创造性。上面要经常督促检查他们的工作，总结他们的经验，及时纠正他们的缺点，从上面加以鞭策、督促。同时，还要鼓励教职学员对领导干部提意见，从下面给他们以监督和促进。这样，院校就会办得好一些，错误就会少一些，即使有了缺点错误，也能较快地得到纠正。

（三）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从制度上保

证领导干部不断革命化。如果只强调分工负责，不接受集体领导，就会产生分散主义，甚至搞独立王国。如果只强调集体领导，没有分工，工作就不能落实。应通过集体领导，统一研究，统一认识，确定解决问题的方针、原则、方法、步骤；又通过分工负责，加强每个人的责任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革命干劲，使工作落到实处。

（四）必须同懒惰作斗争。毛主席几十年前在长沙教学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懒是万恶之渊藪。”主席前几年讲蜕化变质的人的五步曲是懒、馋、占、贪、变，也是由“懒”字开始的。懒人是办不成事的。毛主席曾经提到曹操[5]的几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的干部要有这种精神。毛主席的一生，就是苦修、苦练、苦学、苦干，我们要学习毛主席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以“苦”字当头，应有的修养要苦修；应该锻炼的本领要苦练；应该具备的知识要苦学；应该干的工作要苦干。要使我们的院校成为部队的表率，培养出大批坚强的干部。院校的领导干部，就必须以“苦”字当头，破除“懒”字。只要院校的领导班子能够实现革命化，我军院校的前途就大有希望。

建设好教员队伍。

院校是培养干部的场所。提高学员的无产阶级觉悟，传授各种知识，教会各种技术，大部分是通过教员进行的。因此，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办好一个学校，没有一支好的教员队伍是不行的。抗大之所以办得好，教员又多又好是个重要条件。

教员队伍的建设，既要保证一定的数量，更要注意提高质量。提高质量的主要办法有：

（一）领导干部要亲自任教。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可以言传身教，交好班；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可以通过任教提高自己。

（二）有计划地培训教员。最重要的是认真组织教员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思想，促进思想革命化。在学习中，除了强调学以致用外，还要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实践。使教员真正认识到，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才能克服困难，搞好教学工作。培训的办法，开办教员训练班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此外，还应经常组织教员下部队锻炼，参加地方的实践活动，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许多院校这样做了，普遍反应受益很大。

（三）组织上要作适当的处理。教员队伍一定要保持纯洁，对一些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思想作风极端恶劣、屡教不改的，应该坚决调离院校。但是，整顿教员队伍一定要慎重，对绝大多数人要和风细雨地进行思想教育，耐心说服，不要随便扣帽子，不要把教员搞得灰溜溜的。对于一些身强力壮，但教学能力低的同志应有计划地同部队干部进行交流，或者派到部队去学习。对于一些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也可以考虑适当集中起来学习，给他们一定的题目，赋予一定的研究任务，保障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能够尽可能地为社会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

注 释

[1]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先后共办八期，并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二所分校。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宣告

结束。

[2]这是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全文是：“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3]林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曾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罗荣桓，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曾在抗大学习，同时任该校一科（高级科）政治委员。罗瑞卿，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曾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等职，一九三七年八月林彪率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曾主持学校全面工作。

[4]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5]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为丞相。死后为其子曹丕（魏文帝）尊为魏武帝。这里的诗句引自《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大力发展国防工业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我们的国防工业建设在尖端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特别是氢弹爆炸成功，对世界震动很大。我们必须继续狠抓尖端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根据需求和可能，我们还要以很大的力量抓常规武器装备的研究和生产。高射武器、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及其他配套产品的研究和生产，争取在“三五”期间改变落后面貌，使部队装备有新的改善。

为改变落后面貌，必须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在狠抓常规武器生产中，大力发展高射武器。在科研、生产方面，要调整和充实力量，建立完整的体系，形成拳头，并要重视部队技术革新工作的开展和革新成果的推广。

第一，调整科研组织，整顿科研队伍。要把从事武器装备研究及其配套的科研单位，集中组建成若干研究院。适当加强国防工业部门的研究工作。科研部门要有自己的试验场所。研究、试制、生产要配起套来，这项工作聂副主席[1]在亲自抓，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搞好这件事。

第二，使用、研究、生产要三结合。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主要是为了使用，为了战胜敌人。必须明确，无论是武器装备的研究也好，生产也好，都要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使国防科研和生产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防建设，为战略方针服务、而不能脱离部队的实际需要。各军、兵种所要求的战术技术性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设计与生产的主要目标，世界先进的技术也应注意研究。科研、生产部门要经常听取使用部门的意见和要求。科研设计人员要分期分批下部队调查研究，吸取经验。

这次会议是使用、研究、生产单位都来参加的三结合的会议，三家坐在一起谈，是一种好形式，今后还可以采取这种办法。

第三，充分利用越南战场的实践经验，开展科研工作。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2]我们是研究部队武器装备的，战场是最好的研究试验场所。我们要抓住援越抗美这一时机，利用这个条件，特别是对我们的高射武器的研究、试制、生产，很有价值。在座的同志都有亲身体会，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科研部门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研究，用于改进我们的武器装备，然后再将改进的武器装备送到部队，使用于战场上去，不断地反复提高。这就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检验的道理。

除了科研工作之外，还要研究和改进我们军队的编制、装备、战术、技术、后勤供应以及军队的生活管理。

第四，专业的科研和群众性的发明创造要结合起来。毛主席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3]在越南战场上，广大指战员有很多发明创造，使用土办法改进了旧武器，打下了敌人新式的飞机。专业研究人员和生产部门，不但要重视群众的革新创造，把它充分地运用到科学研究和生产中去，而且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把参战部队的发明创造的成果，迅速在全军推

这是叶剑英在国防科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广，并运用到生产中去。

第五，要充分重视新型高射武器装备的研究和发展，走自己的路，搞出自己的东西。尖端方面的新技术研究成果，凡常规方

面能用的，要在常规武器装备上推广应用，以提高常规武器效能。

注 释

[1]聂副主席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见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39 页）。

[3]见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90 页）。

办好教导队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

关于训练问题，看来一般的方法不行，一般方法扭转不过来这个局面。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提出个意见来。现在的营长中都很少有打过仗的了，建议你们以师为单位，办好教导队。师长或副师长任队长，把打过仗的团、营长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连的架子，对那些没打过仗的干部进行训练。要从单兵学起，进行示范，进行传、帮、带，把经验传给新一代，争取两年之内把连、排长轮训完，使他们平时会组织训练，战时会指挥打仗。两年扭转现在的局面，通过办教导队，把老作风传下去。

是否还办点学校？林彪不要学校，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要什么学校！”那不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是从战略上讲的，战术上随便就走是要被砍头的。要办一些学校，技术的、战术的，包括卫生学校。我们国家很大，中央包办不了，很多事情要下放给军区办。

要经常按着地球“脉搏”的跳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帝有原子弹，五十年代美帝是一霸，后来，苏联有了原子弹，六十年代以来是美苏两霸。美、苏、英、法都是经济大国。日本、西欧受美国的核保护，经济上发展也很快。在苏美争夺之下，西欧形成共同市场，要从政治和经济上摆脱两霸。还有日本，经济力量很大，也想摆脱，想自己独立，但由于有苏修[1]威胁，目前还依赖美国，摆脱不了。两霸又争夺又勾结，新兴的国家又摆脱，又依赖。

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同时又是形势大好。大乱和大好，要辩证地看。敌人越乱越好。敌人骂我们越凶，我们就对了。在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内部怎么乱，哪个集团内部怎么乱，天下大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要研究。乱的形势对我们有利，至少可以争取更多时间。还是毛主席在《五二 声明》[2]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战争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革命是主要倾向。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都是革命倾向，针对帝、修的。战后独立的国家有几十个，还有哪些没有独立？被哪些帝国主义占着？民族解放运动冲击哪些地方？目前这些条件还不能完全制止战争，但帝、修发动战争有很大困难。

战略方面，苏修扩张侵略的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还是南下作为短暂的计划？目前，它向东、向西部有困难，主要向南亚等抵抗力比较小的地方扩张。而美帝则曾把发动侵朝对华战争看作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3]。

还要研究苏修国内因素，从内部联系上归结为几个问题进行研究。斯大林说过，发动战争要有巩固的后方。苏国内不巩固，民族有矛盾。它要发动战争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条件，它是有困难的。苏修一旦发动战争，动员不了举国一致的力量。

东欧有很大的势力是倾向西方的。苏修怕战争一爆发，它们尾巴翘起来，后方不稳。苏修通过欧安会[4]要稳定战后边界。苏修要固定边界，美帝则要和平改变边界。

核武器能解决问题？过去有意大利杜黑[5]的空军制胜论，但空军不能单独解决问题。现在出现了导弹、原子弹，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还是得靠地面部队、常规部队。核战争问题要研究一下。你们要注意一下敌人的空降作战。要把军事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一个一个问题仔细研究一下。综合起来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者创造条件来发动战争，由于条件没有具备，准备战争的时间就拖长，但是它还是要发动战争的。苏修有一亿二千万吨钢，还不够用，估计用在海军上了。它的海军兵力要超过美国。两霸又勾结又争夺。他们在陆地争夺，世界的革命潮流对他们有抵抗，除了继续在大陆发展外，海洋也要争夺。他们海上力量很大，争夺激烈。整个地球上，海洋比陆地大，大部分是水，五份中三四份是水。海底有资源，有的比陆地

这是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军事科学院汇报《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与苏美两霸的战略动向》时的谈话要点。

还多，又很廉价，是有力方向，他们抢先去争夺。我们现在的船很小、台风一来就吹翻了。他们向海洋发展，是开辟了一个争夺的新方向，但并不放松争夺陆地。

要加强战备。不要因为出现表面和缓而放松警惕。你们和总参的有关部门合拢起来搞战后世界形势分析。

现在要关心世界大事。总参掌握的情况多，你们与他们要建立联系，以后要定期汇报，定期座谈。如勃列日涅夫[6]跑到美国谈判，得出什么结果？欧安会情况怎样？要经常接着地球“脉搏”的跳动。这工作由宋院长[7]主持。要有专题，考虑世界问题时资料要多，要像老牛吃草，要反刍。

中国是八亿人口的国家，手上有氢弹，他们封我们为超级大国，我们当然不承认。我们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不用物质力量搞侵略，不输出革命，但精神力量影响是大的。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了精神武器和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我们没见过马克思，但马克思的思想影响、理论影响很大。林彪的东西要批判，但是不要否认思想精神力量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十月革命鼓舞着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人民。

美帝打越南战争，对一个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小国家，它都打不下去，最后只好撤兵，夹起尾巴走了。毛主席说，得道多助。世界人民觉悟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打败蒋介石，当时美帝出钱出力支持蒋介石。美国侵朝战争，乘我们刚刚解放立足未稳，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后来美国又侵略越南，我们支援越南抗美。中国解放战争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三次战争，美帝都惨败，所以它现在要收缩。在亚洲，在中国、朝鲜、越南战场的失败，造成美帝内外交困，但它不死心。两个小国打败美帝。美帝在越南从一九六四年起拚命干，死了很多人。连越南部打不赢，还打中国？美国有人说，要使战争成为无利可图的东西，就打不起来了。从商人的角度看，蚀本就不干。任何侵略战争对国家和人民都是破坏，无利可图，而军火商专门造军火、卖军火。两次大战期间，军火商为了赚钱把军火卖给双方，军火工业集团发战争财。美国的实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苏修也在往这方面过渡。他们是战争制造者，靠战争卖军火，不然就要垮台。

注 释

[1]苏修，当时指苏联。

[2]《五二 声明》指一九七 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3]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关于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上所作证词中的一句话。原文是：“赤色中国并非谋求成为统治世界的大国。说老实话，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采取这样一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4]欧安会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是欧洲国家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非欧洲成员国讨论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的国际会议。一九七三年七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开始，会议共分为三个阶段，至一九七五年八月结束。会议通过了《最后文件》。这个文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相互妥协的产物，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却使苏联基本上取得西方对战后欧洲边界现状的承认。

[5]杜黑，意大利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其代表作为《制空权》。

[6]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7]宋院长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打敌集群坦克是我军在今后战争中的一个主要课题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八日)

今天同大家一起学习北京军区组织的这次反坦克群的战斗演习。这次演习，除地面部队以外，还有空军参加，规模很大，演习得很好，从中学到一些很重要的经验。

我们从事战争，不单单是靠野战军本身，主要的要依靠广大群众来参加战斗。正如毛主席所讲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讲过，民兵工作要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张家口民兵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凡是组织战争，必须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自有红军以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组织战争的老办法。现代战争还是一样，不能光靠武器，主要还是靠人。这一点北京军区也是个榜样。我们全军训练，在重点抓好战术和技术基础训练的同时，要再搞一些较大规模的合同战术的演习，现在开了个端。在演习过程中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这是对我们的教育之一。

今后对敌作战，敌人的坦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有几千辆或是几百辆；不是冲一次两次，而是一个波一个波地向我们连续冲击。我们现在如果不想办法，就不能对付敌人的坦克。敌人是唯武器论者，它依靠的是坦克、飞机和大炮。如果我们不能战胜它的坦克，地面作战的这个关就很难过。它有步兵，不过都是藏在装甲车里头，地面上只看见战车在隆隆前进，人都在乌龟壳里头。它依靠这个武器一个劲地往前冲，所以需要对付的办法。一方面要改造地形，限制坦克的活动，取得我们打坦克的机会。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民兵。在预定的战场上，在准备同敌人进行一个战役的战场上，布置战场和创造战场的时候，主要是靠群众、靠民兵。创造战场，主要的是组织民兵，武装民兵，其次是改造地形。改造地形，当然是与农业水利有关系了。北京军区这次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一面改造战场的地形，同时又不损害农民的农田利益。用改造梯田的办法很好。梯田本身既扩大了耕作面，又构成了一个反坦克的陡坡，群众也高兴。一旦打起仗来，敌人的坦克碰到了陡壁，就会受阻，在它短停的时间，就给我们造成打它、消灭它的一个好机会。这是一个梯田问题。第二个就是反坦克的沟。这种沟，过去我们都想把沟的宽度挖得大大的，使敌人坦克掉下去就爬不出来。现在看来，还是这次我们所看见的反坦克沟比较合理、比较科学。它不是很大，敌人的坦克下去之后的角度差不多有七十度，或者是五十度左右。如果敌人坦克下去后与地面成五十度角，或者成五十度角以上，它就起不来了。所以说，一个梯田，一个反坦克沟，就可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前进。修梯田可以扩大农民的耕地量，反坦克沟也可以作为农田水利灌溉的渠道使用。平时作灌溉的渠道，战时把水放干，我们的人还可在沟里运动。如果敌人向这里前进，又可以阻止敌人。创造战场，一是靠群众，二是改造地形。在改造地形方面，北京军区的演习给我们指出了两点，一个是在丘陵地上搞梯田，一个是挖反坦克沟。这两个给我们的启发很大，同志们再想想，除了这个以外，看看还有其他的办法没有。

此外，我们还要想新的办法，创造新的武器，包括正规军使用的武器和民兵使用的武器。坦克是运动与战斗结合在一块的武器，履带的转动可以使

坦克前进，炮塔是它的战斗部分。我们要想办法如何破坏坦克的运动，如何破坏它的火炮射击。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跳跃式炸药包，一抛射，就跳到坦克的炮上去了，如装有适量的炸药，并能更牢靠地附贴在炮筒上，它一炸就可以把炮破坏，或使其变形。破坏坦克的战斗部分，除了这个跳跃炸药包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要研究一下。除了破坏坦克的战斗部分，还要破坏坦克的运动部分。珍宝岛打坏敌人坦克的不是火炮，主要是炸药把它的履带炸断了。破坏敌人坦克的运动部分，就是把它的履带搞断。使敌人坦克一下会运动，二不能战斗，这个坦克就等于零了。这个问题，全军今天都要作为一个主要课题来研究，特别是军事科学研究机关。

还有民兵，民兵的武器，民兵的战斗组织，民兵的地道战。张家口的民兵是比较好的。从张家口一直到张北，一直到前面，有一条地道，中间的战斗部分还可以扩大，要能打能藏。这个地道要起两种效能，既能打能藏，又能够在地下转移、输送部队。我想了一下，每个战斗组三五个人，每人拿一种武器，其中有一个弹药手，这个小组专门打坦克。战斗手段要多种多样，作战方法也要经常研究。张家口民兵到战时都是三五人一组，一群一群的从地道钻出来，钻到敌人后方打，一直到敌人进入市区了还要打。总而言之，民兵作用很广泛，密密麻麻遍布在整个战场上。敌人每前进一步，总要给它一个损伤，给它一个打击，我们广大民兵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打坦克要从几个方向打，一个叫对击，敌人坦克来了，我们炮打出去；一个叫侧击，敌人走到我们前面了从侧面打过去；还有个叫背击，就是从背后打过来。比如说快速布雷，当敌人通过我们的山谷隘路时，我们可从两边使用这种武器，从背后布雷上去，使敌人根本想不到从背后布雷。我们民兵经常可以侧击，经常可以背击，让敌人坦克过去，不要当面挡它。它的战斗部分都在前面。它最硬的最厚的甲板在前头，武器也都在前头，它的炮塔虽然转动三百六十度，但前进中主要面向前方。它的两侧腰部和后边都比较薄弱。我们民兵地形熟，工事做好了，地道做好了，经常可以出现在敌人背后，出现在敌人两侧去打击敌人，这样可以避开它的强处、打击它的弱点，可以使用近距离的武器。要研究发明这种近距离的反坦克武器，搞些打坦克的办法。

看了今天的演习受到了启发，在这个启发下触动了我们的思考，应该继续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参观学习的同志都要动脑筋想一想，这次演习启发我们什么，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搞。看了以后，各个军区都要拿出办法，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都要提倡。我们提倡北京军区今天组织的这个演习，我们也提倡北京军区、广州军区所发明的新的打坦克的武器。不能说什么百分之百完善、定型。基本上可以用了就生产，先拿去用，在使用中间识别，发现问题再来解决，这样就一步一步前进下去了。我们军工部门中也有个别人提出武器装备要百分之百的好，哪里有百分之百？一个东西出来就百分之百的完善，何必有米格 19、米格 21、米格 23 呢？从米格 15 到米格 19，就是一代一代地前进的。没有第一代就没有第二代，没有老子就没有儿子，儿子是从老子那里传下来的。所以，基本上可以用就行，用了之后又发展第二代，又上升到第三代。请各军区回去发动大家想一想，特别是科研人员要想一想。关于打坦克的问题，毛主席多少年前就讲过了，要消灭敌人坦克。北京军区这次演习，就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大家回去研究一下，各军区和各军、兵种的同志回到北京后开三天会，座谈一下北京军区这次反集群坦克的经验，写出一些条条，供全军学习。

敌人向我们进攻从哪里来呢？那无非是地上、空中、海上，所以我们除加强东北、华北、西北防御以外，海上也应加强，空中也应该加强，主要是把广大民兵认真搞好。我们要守北京，要守住首都，必须要巩固张家口，以及前面的阵地。所以在我军防御的地方，首先考虑这个方向。在这个主要方向，敌人上面有空军，地面有机械化部队，包括坦克兵；我们在这个主要方向作战，要首先研究用什么手段打击敌人坦克。敌人坦克有办法对付了，跟随坦克后面的装甲步兵、步兵最后还要下来，不能老在乌龟壳里边，所以他们致命的弱点是完全依靠乌龟壳。今天演习这个课题，是我们今后战争的主要课题。在一个战场出现的不但有坦克，还有空军支援坦克，掩护地面部队作战。

我们张家口是个城市，在全国说来，还算个中等城市，可是战略地位很重要。我们一个大区准备作战，要研究敌人是从哪里来，我们在哪里守，大体上可以估计。从历史上看，几次战争，比如苏联对日本作战[1]，我们历史上成吉思汗[2]的战争，都可以大体了解，可以摸一个方向，他们来大体上是从哪几个方向来，哪条路来。所以，凡是有交通的地方，历史上敌人走过的地方，便利作战的地方，便利打北京的地方，都要注意研究。如果是机械化部队，它还是要找公路。张家口这个城市不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但是战略要点。从战略观点上看，张家口这个城市是个要点，敌人要打北京，是必争之地，我们必守，所以必须争夺。房子打烂不要紧，我们重建，要把敌人吸引到城市里面来打。到城市里边，我们有地道，地面的街道很熟，可以把巷战和地道战结合起来，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争夺，我们在楼上居高临下也可以打。到那个时候，敌人的部队进来了，原子弹也不能撂了，飞机轰炸是自己炸自己，我们可以避开敌人的炮火、飞机、炸弹，甚至原子弹，专用短兵相接打巷战、打地道战，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利的条件。吸引敌人到城市里来消灭它，敌人来了放开大门，逐步逐步地阻击它、消耗它，死守我们的阵地；遇到强大的敌人，万不得已了，我们就保持有生力量，退到第二线，也要坚持战斗，我们要有这个决心。敌人必夺，我们必守，形成争夺城市这种情况，我们守不守？一定要守。毛主席说，准备打一个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式的战役[3]。在敌人包围中间我们也要死守，要懂得这个道理。要防卫城市有

很多问题，扼守要留多少兵，壮丁怎样组织起来，老、弱、病、残、妇女怎样疏散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疏散好，疏散出去之后，既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又便于守城的部队机动。要把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编起来，守城的部队打得差不多了，第二梯队可以上去，再差不多了，第三梯队可以增加上去。城市的地道战很重要，他在明处，我在暗中，容易打。所以疏散计划，怎么疏散，向哪里疏散，疏散道路怎么样，疏散哪些人，组织哪些人起来武装作战，这是一个很精细的计划。再一个是怎么打法，分区、分片打，各

自为战，又互相支援。你们的地道要搞活，要能够把粮食、布匹运进来，打起仗来要防原子和化学武器，要防水。总而言之，一个城市的保卫战有很多问题，北京市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各大军区的同志回去，看看你们的大区里头，比如，西北、东北，有几条道路，敌人从哪几条道路来占领城市，守住守不住。守住了迟滞敌人的时间，使我们后方更有时间来组织力量，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当然，过去有

那个时候，我们也曾这样考虑过，在我军历史上向来都是用诱敌深入办法把敌人消灭了，后来，看到越南战争，美帝占领了沿海城市，它既不长驱、也不深入，所以好像这个诱敌深入又不适应于对付美国了。美国得到很多教训了，解放战争它支持蒋介石失败了，后来支持李承晚[4]又失败了，在越南也失败了。所以，它尝到了人民战争的厉害。诱敌深入，不是敞开大门，而要节节阻击，节节消耗，节节歼敌，最后把结扣紧，就可以把它消灭。这有很多的准备工作。不仅是北京军区，各大军区部一样，不管敌人从哪里来，我们都可以守，守起来要认真地守，像斯大林格勒的守法，列宁格勒的守法。注 释

[1]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为履行雅尔塔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正式对日本宣战。九日，苏联红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对日军发起进攻，迅速击败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日本军队。

[2]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名铁木真，古代蒙古首领、著名军事统帅。[3]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发起猛攻，先后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其全部歼灭，生俘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保卢斯。这一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军包围列宁格勒，苏联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历时十六个月，消灭了德军及其仆从军二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苏军击破德军的包围封锁，列宁格勒解围。[4]李承晚，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

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在我军占主导地位。但是，林彪[1]把持军委日常工作达十二年之久，对我军建设干扰破坏很大。他反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宣扬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部队；他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破坏我军的团结和统一；他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取消军事训练，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他对抗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推行消极防御的错误方针；破坏我军的组织建设，破坏民兵建设，破坏国防科研和军工生产，严重损害我军战备工作。

九一三事件以来，全军指战员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展开了深入的揭发批判，部队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执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2]和辽南抗震救灾[3]等任务中，以及在最近部队的调防中，充分证明，我军不愧是一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但是，必须看到，部队建设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怕字当头，不敢负责，有些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懒”、“散”的严重现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差，事故多，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和腐蚀；有些单位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够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和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林彪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有责任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这两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使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真正落实。

要准备打仗，又要压缩军队定额，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理解。

毛主席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4]他还讲过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毛主席这些指示，对我军的组织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方向。

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把军队编制搞得很乱，很不适应打仗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党中央确定，压缩军队定额，编制体制也作相应调整，这是加强我军建设，准备打仗的一项重大措施。这次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可以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小打，现有部队就

这是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可以；中打，稍加充实也能对付；大打，能保证部队迅速扩编。

我们的方针是实行人民战争，过去依靠人民战争取得了胜利，今后仍然要依靠人民战争战胜敌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大国，兵源雄厚，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压缩定额，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平时我们把民兵建设搞好，储备好干部，储备好兵员，储备好装备，作好战时动员扩编计划，把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挂好钩，一旦战争打起来，就可以就地出干部，就地出兵员，就地出装备，迅速把部队扩编起来。

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武器也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国防工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总的看还是比较薄弱的，我军现有的武器装备还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全军定额压下来以后，每年就可以节省军费几个亿用于加强军工生产，改善技术装备。这样，我们有了有觉悟的人，有了比较先进的装备，再把各项战备工作搞好，把人和物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斗威力发挥出来，就能更好地完成一切作战任务。

精简整编的重点是机关。毛主席说：“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5]有些同志总想把机关人员搞得多一些，牌子搞得大一些，权限搞得高一些，不然就觉得不好办事。你给他减下来，他总是不那么舒服，总要找点理由，把它再长上去。这已经成了一种癖病，必须动手术，狠狠地攻一攻。这次攻得还不够，今后还要继续精简。不然，机关庞大，平时工作效率提不高，战时还会成为包袱。机关人员能不能减下来，主要看领导上有没有决心。这次会上，大家对编制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有不少意见是要增加机关人员，这是不符合精简整编原则的。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切实搞好机关革命化建设。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各单位对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三总部已分别同有关单位进行了研究协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些涉及体制、制度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总定额一定不能突破，整编原则一定不能违反。编制确定后，要严格执行。编制表就是法规，不能自行修改。以后，增加单位、增加定额要经军委批准，要保持编制的严肃性。

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相应的有一个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这次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关怀和爱护。总的精神是，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干部的成长。

把超编干部安排好，这是一件大事，直接关系到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方针的落实，一定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好，解决好思想问题。要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军队长远建设的需要，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全国解放后，我军有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是党的工作，要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党需要我们穿军装就穿，党需要我们脱军装就脱。要鼓励和支持干部到农村去，到边疆

去，扎根农村，扎根边疆。要树立和宣扬好的典型，对不服从组织分配，不愿意离开城市，不愿到艰苦地方工作的同志，要进行批评教育，不能迁就。要同时大力做好家属的工作，使家属愉快地同干部一起到新的工作岗位去。

设置顾问，是为了精干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这是加强我军建设，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当顾问，要集中精力搞好学习，搞好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不要做“钦差大臣”。顾问组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既要部队工作提出建议，供党委参考，又要注意不干扰党委的工作。当顾问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应该愉快地听从党的安排，坚持继续革命，兢兢业业，为革命做出新的贡献。设置顾问是一个新问题，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在安排超编干部的同时，要做好留队干部的工作。既要使走者愉快，又要使留者安心，担负起整军备战的重担。特别是我们的老同志，一生革命、战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争取时间搞好传、帮、带，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传下去，带起来。我们不仅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知人之明。要善于在工作中和斗争中，发现那些思想好、作风正派、有能力、有培养前途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们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共产党人要具有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搞好精简整编和军队的建设，关键是调整和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条件，按照“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一个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要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闹不团结的散班子。对那些搞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调离。今年下半年，首先配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和军以上的军、政一把手。然后再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

注 释

[1]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2]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所属部队在陆军和民兵协同下对入侵我国西沙群岛的南越军队进行的自卫还击战。

[3]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辽宁省南部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地震。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赶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

[4]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3页）。

[5]见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

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主席：

遵照您六月二十三日对孔从洲[1]同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重要指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研究了四次，我还个别找孔从洲同志进行了交谈。根据研究的意见，以总参名义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个专题报告。十一月五日，总参、总政、总后联席会议进行了讨论。十二月八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列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对加强国防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近几年来，电子对抗技术发展很快。苏、美两霸对此极为重视，他们认为“争取和保持电子优势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争取空中优势还重要”，“发展无线电电子器材和发展火箭核武器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目前电子自动寻找目标装置的应用，已从导弹弹头向大口径火炮弹头发展，苏、美的电子侦察、干扰，已经对我军的雷达、通信、导弹制导造成了很大威胁。我军的电子对抗装备，则处于既缺防御能力，又少进攻手段的状态，如不及早采取措施，战争一来，就可能使我指挥失灵、通信中断、兵器失控，处于不利的境地。

为此，经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军委常委讨论，当前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把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加强起来。

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参、总后、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海军、空军、炮兵、二炮、工程兵、四机部等单位各参加一位领导同志，组成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由王尚荣[2]同志任组长，王诤[3]同志、总参四部部长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电子对抗和雷达发展方针及科研、生产、规划的建议，协调科研、生产、使用部门的关系。

二、在总参谋部成立第四部，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暂编业务干部八十人。

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特别要搜集苏、美电子对抗技术情报，以拟制电子对抗的技术、战术对策。

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同时积极发展电子对抗的侦察、干扰设备。

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拟纳入院校训练规划，加强专业技术训练。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叶剑英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注 释

[1]孔从洲，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2]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王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后兼任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四人帮”[1]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极端敌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搞了一套反军乱军的谬论，从根本上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建军原则、方针、政策、方法和制度，否定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现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在军队建设中，有哪些被“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需要澄清和纠正的呢？主要有以下十个问题：

(一) 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四人帮”竭力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煽动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群众和党组织的对立，下级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甚至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对立。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给部队写信、送材料、发黑指示，拉关系，安钉子，任意点名整军队领导干部，为所欲为，称王称霸。在“四人帮”毒害和影响下，军队中党的领导受到很大削弱。有的单位，党委说话没人听，决议行不通；有的单位，用“第二党委”代替党委领导；有的单位，拉帮结伙搞地下战斗队，同党委“对着干”，甚至攻击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批任命干部是什么“破坏了党管干部的原则”。他们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处心积虑地把党委和领导机关搞乱，搞瘫痪，破坏革命权威，妄图用他们那个帮派取代党的领导。

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自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搞好路线教育，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那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同党委“对着干”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上级党委要支持下级党委的正确领导。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2]要坚持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3]切实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4]。我们一定要用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彻底批判王、张、江、姚结帮篡党的罪行，使枪杆子永远受党的指挥，绝不能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二) 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派性？

一九七五年，我们曾经批判过派性。“四人帮”一听到批派性，就像挖了他们祖坟一样恼火，恶狠狠地说什么“批派性就是批造反派”，“就是打击新生力量”，“就是批左派，批文化大革命，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人帮”为什么那样害怕批派性？就是因为他们要结帮篡党，结帮夺权。他们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分裂群众，搞垮党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破坏军队

这是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建设，破坏安定团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处捣乱夺权。实践证明，过去我们批派性，是完全必要的。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5]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派性，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团体这条党规党法。我们党历史上出现过的山头主义，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我们承认和照顾山头是为了消灭山头。必须指出：“四人帮”结成的帮派，性质根本不同。他们背叛“三要三不要”[6]的原则，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对他们必须彻底批判、坚决清除。我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集中，绝不允许搞派性，绝不允许帮派的存在。

（三）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四人帮”对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讲革命传统，他们就疯狂反对，叫嚷什么“过去那一套吃不开了”，讲传统“是回头看，开倒车，搞复辟”，“是宣传民主革命”，“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为走资派树碑立传”。甚至宣传红军的长征精神，宣传雷锋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成了罪状。一句话，我军的优良传统不香了，“过时”了，要用他们那一套来代替，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妄图否定我军光荣历史，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本色。在“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下，有的部队军史不敢编了，“传、帮、带”不敢提了，荣誉室被关闭了，革命传统教育不搞了。不少基层干部和战士不懂得我军的优良传统，不知道我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有些传统在基层失传了。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7]党指挥枪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及拥政爱民、尊于爱兵，等等，我军这些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优良传统，是在长期艰苦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是革命的传家宝，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体现，我们要永远发扬。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我们要大力加强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计划地在部队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对“四人帮”诬蔑我军优良传统的种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要不断总结符合毛泽东建军路线的新经验，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使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四）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

“四人帮”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最害怕讲“整顿”。他们狂叫：“整顿是复辟的同义词”，“整顿就是复辟倒退”，“整顿就是矛头向下”，“整顿就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罪名一大堆。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加强了路线教育，批判了歪风邪气，部队劲头很大，各方面工作很有起色。可是，“四人帮”一个劲地打棍子，扣帽子，给“整顿”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一瓢冷水泼下来，严重挫伤了部队的革命热情。

反对整顿，是“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一大暴露。整顿，是毛主席一贯

的思想。红军时期，毛主席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9]，整顿部队；抗战时期，开展整风运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战争时期，开展“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又遵照毛主席指示进行过多次整顿。“九·一三”事件前夕，毛主席针对林彪[11]破坏军队建设的情况明确指出：“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12]实践证明，部队每经过一次整顿，就大大前进一步。按照毛主席指示进行整顿，决不是复辟的同义词，而是革命的同义词，建设的同义词，前进的同义词。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部队中问题不少，确实需要整顿，不整顿，党的领导怎么能加强？不整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贯彻？不整顿，不正之风怎么能纠正？不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怎么能改变？不整顿，部队的战斗力怎么能提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掉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我军沿着毛主席建军路线不断前进。

（五）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

打着“造反”旗号，破坏军队纪律，是“四人帮”乱军夺权的一个毒辣手段。他们攻击诬蔑“条令条例是条条框框”，“是紧箍咒”，“走资派可以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战士训练成小绵羊”，“遵守纪律是奴隶主义”。他们拼命反对毛主席一九七五年批准颁布的《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阴谋使部队无所遵循，以便他们把军队搞乱搞垮，篡党夺权。在他们的煽动下，有的单位批了两个条令，有的单位不遵守规章制度，纪律松弛，秩序混乱，事故增多。他们大搞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不管这一套。甚至胡说“顶顶撞撞就是反潮流，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试问：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命令不服从，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早在建军初期，毛主席就为我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证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批判了林彪破坏纪律不听指挥的恶劣行径，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13]毛主席还多次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不仅会唱，而且要照着做。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严格执行革命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上级命令、指示，是符合革命根本利益的，绝不是什么奴隶主义，这同资产阶级军队奴役士兵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棍棒纪律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军的条令、条例是军队的法纪，每个指战员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尤其是干部，更要身体力行，做遵守纪律的模范。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在执行纪律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强说服教育，但是，进行说服教育是为了更自觉地执行纪律，两者是一致的。维护革命纪律，要赏罚严明，对自觉遵守纪律的同志，应当表扬奖励；对违反纪律的同志，应当批评教育，严重的还要处分。只有严格遵守军队的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才能有效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六）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14]搞好老中青三结合？

“四人帮”打着老中青三结合的旗号，拉山头，搞宗派，结帮营私。他们选拔干部，不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只讲年

龄，只讲对“四人帮”有“感情”，只讲所谓“有造反精神”，只看能否为他们篡党夺权卖力，大搞“闹而优则仕”。他们还恶毒攻击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配备和落实党的政策是什么“请隐士”、“举逸民”、“纠集复辟势力”，等等。他们把一些野心勃勃、伸手要官、唯权是夺、投机钻营、溜须拍马的人，塞进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班子。他们搞的哪里是什么老中青，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唯帮，妄图把忠心耿耿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和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同他们斗争的中、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搞他们的帮天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5]领导班子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今后我们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些符合毛主席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特别是经过揭批“四人帮”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干部，有计划地培养选拔到领导班子里。要坚持实践论，反对天才论。对于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青年干部，要使他们在实践斗争中锻炼，特别是取得连和团两级领导的经验。这样做，不是压抑青年干部，而是对青年干部的真正爱护。老干部要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青年干部的成长。新老干部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而对那些按“四

人帮”的标准选拔出来的，根本不符合接班人五项条件的人，不管是老是中是青，经过教育没有改的，都要坚决地把他们调离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七）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

“四人帮”是乱字当头，乱党乱军乱人民。这些年来，他们千方百计要把军队搞乱。他们煽动部队搞“四大”[16]，“揪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17]；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打“土围子”[18]；反击右倾翻案风[19]，挑动军队搞大辩论，“揪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他们诬蔑这个单位是“复辟班子”，那个单位是“谣言分公司”。他们疯狂叫嚷：“军队是老家伙治军”，“军队层层有代理人”，“还乡团回来了”。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勾结起来，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革命领导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妄图一棍子打死。更为恶毒的是，“四人帮”一方面阴谋从军队领导机关“打开缺口”，另一方面点火于基层，煽动部队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反，妄图把军队搞乱，乱中夺权。

毛主席一贯重视保持军队的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一再强调军队要稳定，军以下单位要坚持正面教育。毛主席明确指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党中央、中央军委也强调要保持军队稳定。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柱石不稳，房子就会摇晃，长城被毁，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对“四人帮”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罪恶阴谋，要彻底揭露和清算。任何时候，军队都要保持稳定。

（八）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四人帮”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制造革命和生产、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技术、红和专的对立。他们把抓训练、抓业务、抓技术的同志统统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单纯业务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很乱，干扰和破坏了部队的训练。我们一些同志受

“四人帮”影响，还存在着“抓军事无用”，“抓军事危险”等错误思想。不少部队年度训练没指标、没措施、没考核，只求训练过得去，不求训练过得硬。有些院校不抓战术技术的基础训练，有些科研部门不抓研究，部队军事素质严重下降。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号召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指出军队经常要训练，否则不是军队了。毛主席还为我军制定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判了林彪只搞文不搞武，指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我们应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训练，提高技术战术水平，一定要抓出成绩来。

（九）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长期以来，“四人帮”挖空心思地妄图把民兵搞成一支脱离党的领导、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他们别有用心地伪造毛主席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妄图彻底改变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他们反革命的需要把民兵改造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叫嚷：军队不如民兵，军队靠不住，要取消常备军，民兵可以接管部队，要成立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妄图篡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加强民兵建设曾经作过许多重要指示，特别强调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20]。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体现。民兵是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自成系统，必须置于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的双重领导之下。“四人帮”搞“第二武装”，搞“民兵指挥部”，鼓吹民兵、治安、消防“三位一体”等货色，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指示的，要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流毒。

（十）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四人帮”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们抓军事训练，他们说是搞“单纯军事观点”；我们抓武器装备，他们说是搞“唯武器论”；我们抓战备落实，他们说是“只知反侵略，不知防夏辟”，是“用战备压革命”。总之，一提到要准备打仗，他们就跳，就反，就批，就骂。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21]的指示，切实加强战备，加强军事训练，学习军事技术，提高战斗力。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22]的指示。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的罪行，加强战备教育，加强敌情研究，加强军政训练，加强国防工程，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加强人防建设，加强军工生产，加快步伐，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注 释

[1]“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2]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3]见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4]见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9页）。

[5]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2页）。

[6]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

[7]这是毛泽东给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见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8]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9]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详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0]新式整军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11]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2]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外地观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的。

[13]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外地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的。

[14]指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15]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16]“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方法，源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后被毛泽东认为是一大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一九七五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7]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看到了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材料，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也是“尊孔反法”。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久，江青等背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连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发表煽动性演说，以反对走后门为借口，提出要在部队中“放火烧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领导人，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指责他们“形而上学猖獗，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搞“三箭齐发”。

[18]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接着，在全国开展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四人帮”借题发挥，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排斥扫击有丰富经验的革命老干部；利用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当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许多正常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的“土围子”。煽动人们去攻打“土围子”。

[19]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为坚持其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革命”的实践而发动的批判邓小平的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同年十一月在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很大成绩，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0]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负责人的指示。（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2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22]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3页）。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今天，在欢呼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伟大胜利的时候，热烈庆祝我军建军五十周年，我们感到无比喜悦！

自从一九一九年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就把自己的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从此就将结束了，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看到曙光了。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1]。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然而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作为人民武装革命胜利伟大起点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2]和向井冈山进军。毛主席亲自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五十年前的青年人，现在已经白发苍苍。当时革命的领导人，许多已经不在世了。但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我们无限怀念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我们无限怀念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无限怀念同毛主席一起建党的敬爱的董必武副委员长，无限怀念对创建和发展我军卓著功绩的贺龙同志、陈毅同志、罗荣桓同志、叶挺同志和方志敏同志，刘志丹同志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3]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中壮烈牺牲的同志，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的白求恩同志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威武雄壮的史诗，也是一部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要不要搞武装斗争，要不要一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这是我们党同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直到林彪[4]、王张江姚“四人帮”[5]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工农，中国革命还有没有希望，究竟向何处去，问题严重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6]的著名论断。敌人搞白色恐怖杀我们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为什么不下决心去杀他们？敌人杀我们是因为他们手里有刀有枪，难道我们不可以从敌人手里夺，不可以自己造吗？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拿起武器，在山区的上山，在湖滨的下湖，以武装的革命

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7]

毛主席对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充分地估计了农民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聚积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毛主席的这个光辉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方面反对了陈独秀[8]的右倾投降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了“左”倾冒险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路线[9]都试了，都行不通，都失败了。只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才是胜利的道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广大农村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军队，准备干部，建立政权，使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地波浪式推进。这样，支持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发展壮大人民军队，逐步削弱以至最后消灭了敌人。

中国人民正是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用枪杆子造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这是继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毛主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10]“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1]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一支党领导下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旧中国就不能破坏，新中国就不能建立，就是建立了也不能巩固。解放后的二十八年，我们所以能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胜利地进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保持全国局势稳定，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由于有一支党领导下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的胜利，应该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毛主席的旗帜是团结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有了毛主席，我们的党才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同样，有了毛主席，我们的军队才成为伟大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如恩格斯称颂马克思那样，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宝库，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胜利源泉，是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战胜敌人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军队的思想。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12]这个纲领性文件，把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成为一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又不断发展了人民军队的思想。

我们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任分工负责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依靠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使我军保持了无产阶

级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致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工具。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从张国焘[13]到林彪、“四人帮”，阴谋破坏我们这支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打仗是我军的主要任务，还要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14]。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就是打仗这一项，也不单纯是军事斗争，而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很多情况下是打的政治仗。

我们军队有一种极其重要极其显著的东西，就是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军的生命线。有了这个，我们军队才一新面目。毛主席提出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5]，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以彻底破除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军民之间的对立关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样的政治局面，不仅对军队，对党对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政治局面，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就能团结一致，战胜各种困难，经受住任何风险。

归根到底，我们军队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是不是人民的军队，自己说不算数，要人民说了才算数。军队在人民眼里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我们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打败了蒋介石，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强大凶恶的国内外敌人，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就是依靠人民。我们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实行的是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实行的是武装人民和非武装人民相结合。依靠人民这个对我军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就弥补了武器装备的不足，就能使我军由劣势变为优势，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我们是靠人民战争起家的、取胜的。这个法宝，我们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仍然要靠它。

毛主席在建设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的伟大实践中，极大地发展和完善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胆略，高超的军事艺术，统率那么多军队，指挥那么多战役，领导那么艰巨的长征，打了那么多大胜仗，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毛主席用兵如神，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但得心应手地指挥我千军万马，而且迫使敌人不得不听从调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握主动，在危急关头都能化险为夷。从井冈山的十六字诀[16]，到十大军事原则[17]，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仗，从来不拘一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把唯物论辩证法用于战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时指出，要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毛主席无一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又无一不是根据革命的实践进行伟大的创造。毛主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本身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长青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18]，只要战争这个怪物还没有从人类社会消失，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始终是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毛主席革命路线。老同志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搞好传帮带。年青的同志要立志把这无比珍贵的遗产继承下来，代代相传。林彪蓄意歪曲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王张江姚“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说成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东西”，重弹修正主义的“过时论”老调。他们从根本上否定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林彪、“四人帮”极端仇视我们这支伟大的军队，他们疯狂地反军乱军，残酷打击和迫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干部，妄图毁我长城。我们一定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总结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进一步把我军建设好，就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必须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决不能让“四人帮”、林彪那样大大小小野心家篡夺我军各级领导权；

必须搞马克思主义，搞团结，搞光明正大，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摘取片言只语，骗人吓人；

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唯心论、形而上学，说假话，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结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唯利是图，唯权是夺；

必须坚持正常的民主生活，广开言路，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一提不同意见，就把人一棍子打死；

必须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纪律，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搞无政府主义，“踢开党委闹革命”，肆意破坏捣乱；

必须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决不能像“四人帮”、林彪那样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破坏革命化，取消现代化。

我们要加速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革命化，就是要把毛主席关于军队建设的路线、方针、原则全面贯彻落实，这是统帅，是灵魂。革命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强革命化，才能加速现代化。我军的现代化，就是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空军海军，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和核武器，要严格训练，按实战要求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熟练掌握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新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战术。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一定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和人防建设，加强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只要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有哪个国外的敌人对我们发动侵略，我们一定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毛主席教给我们的人民战争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他们消灭掉！

“一定要解放台湾”，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是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解放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无权干涉。我们一定要和台湾同胞一道，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

同志们！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巩固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为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要以革命和生产的优异成绩，迎接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使伟大的精神力量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一定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夺取这场伟大斗争的全胜。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来一场革命和生产的大竞赛。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 释

[1]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办了反击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于同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三日起陆续南下进军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2]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醴陵、平江、浏阳等县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3]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4]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巨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5]“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6]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7]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8]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9]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路线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1]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2]古田会议决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听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3]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二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革命。

[14]见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15]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6]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一九二八年毛泽东、朱德等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提出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7] 十大军事原则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其内容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年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18]社会帝国主义，当时指苏联。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次军委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大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落实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下面，我讲一讲治军的十项任务。

第一，把揭批“四人帮”[1]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全胜。(略)

第二，贯彻毛主席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

毛主席对战略问题的重要指示，是指导我军作战的强大思想武器。一九六二年以来，毛主席先后指出，要防止外敌对我们的颠覆破坏和军事进攻，并强调要坚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根本的办法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林彪[2]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处处设防，浪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军委在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着手解决防御外敌侵略的作战问题，都遭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军战备工作许多方面不落实。

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战备的罪行，统一作战思想，做好以防御外敌侵略为主的作战准备。

外敌进攻我国，将利用其装备优势突然袭击，企图一举瘫痪我们的防御，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行动，可能在空军、海军、空降兵配合下，使用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实行高速度大纵深的正面进攻。

对付外敌侵略，最根本的是实行人民战争。要充分发挥我国地大人多、制度优越、具有人民战争光荣传统等有利条件，依靠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整体的威力，运用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3]，经过持久作战，最后战胜敌人。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战略突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指针，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抓紧时间，尽快改善现有武器装备；搞好基干民兵建设，制订动员扩编规划；认真搞好部队训练；加强情报工作和指挥、通信建设。有重点地加强防御体系，加速战场经营；加强要地防空和人防、城防建设，尤其要贯彻落实好“深挖洞”的方针，加快地下工程建设，准备打地道战；加强边海防建设；加速大小三线[4]建设。抢在战争爆发之前，搞好各项战备工作。我们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立足于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我军的历史任务，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准备工作。

第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整顿军队，重点是整顿干部队伍，关键是选配好、建设好团以上各级领导班子。

这是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要实行无产阶级“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按照接班人的五项条件[5]，尽快选配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比较年轻精干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军政一把手，一定要选准、配好。要做到“知人善任”。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干部。所谓“善任”，就是正确地使用干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对干部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要把那些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现好的同志选配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决不能把那些搞“地震”的人，投机钻营的“风派”人物，犯了错误惯于把责任推给别人、装着自己一贯正确、文过饰非的“溜派”人物，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以及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配进领导班子。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

为了培养接班人和准备打仗的需要，作战部队的干部要逐步做到比较年轻。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提到日程上来，采取有效措施，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培训，在实践中积极选拔。

干部交流要成为制度。要有计划地搞好机关、院校同部队干部的交流。军以上干部要在全军范围交流。

对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的干部，要妥善安置。要发挥顾问的积极作用。要关心和解决干部的实际困难。

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加强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路线，继续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干部大权必须掌握在党委手中。要整顿好干部部门，选配好干部部门的干部。做干部工作的人，一定要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不怕鬼、不信邪。第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

根据毛主席的建党学说，把军队党的各级组织整顿好建设好，恢复各级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发挥优良传统作风，大力加强政治工作，这是整顿军队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加强党的建设，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6]的基本原则。要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罪行，在斗争中搞好整党整风，使各级党组织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顶住修正主义的狂风恶浪，战胜宗派分裂活动，揭露搞阴谋诡计的人。

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抓好各级党委的建设。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健全党委制，恢复党委领导的权威，使党委真正成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会议上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得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要纠正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无限上纲的坏风气；同时必须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许另搞一套。要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要抓大事，不要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真正做到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政治委员要主持好党委日常工作。

我们要力争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使政治机关成为强有力的、有很高威信的党的工作机关，真正成为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治机关的领导，要选配好政治机关的干部。政治干部要坚持原则，起模范作用。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全军同志都要维护政治机关的威信，关心和支持政治机关的建设，共同做好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

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7]，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为我军政

治工作奠定了基础，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个决议所确定的根本原则。一九四四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于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是毛主席主持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也是政治工作必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文件。一九四七年毛主席亲自总结的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要认真学习 and 运用。一九六一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是集中了到会同志的集体智慧，大家动脑、动口、动手写成的，是毛主席主持修改和批准的，把林彪塞进去的东西删除后，仍可作为政治工作的学习文件。

为了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总政治部应于最近召开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第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

毛主席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8]全军的训练取得很大成绩。一九六四年，全军掀起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毛主席曾亲自检阅，予以肯定。随后被林彪打了下去。“九一三”以后和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军两次掀起的练兵热潮，又受到“四人帮”的破坏。我军教育训练遭到严重损害，干部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普遍降低，很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加强部队、院校的教育训练，是军队建设和准备打仗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过去我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没有战争条件下，就要通过教育训练提高我军的军政素质。现代战争对于部的指挥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苦学苦练，才能提高指挥能力，学会杀敌本领，在未来战争中克敌制胜。

我军训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要针对作战对象，结合任务，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技术水平。突出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训练；多练夜战、近战。重点抓好干部训练，恢复战役训练；当前要继续办好教导队，多搞近似实战的演习，使干部具备现代战争知识，熟练作战的组织指挥。要切实抓好连队训练，使战士熟练运用手中武器和技术装备，达到一兵多能。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注重训练质量，更好地运用我军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练兵方法。

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院校，加速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才。学校要担负起训练、选拔和推荐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使学员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学好军事专业技术。学校要继承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特别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下决心配好院校领导班子，把优秀干部调来办校。选政治思想好、有专长的干部当教员，鼓励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部队要选送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战士入校学习。要优先培养野战部队、边海防守备部队的领导骨干。

部队、院校的教育训练，必须加强战斗作风的养成。要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的教育，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严守保密纪律。大力表扬遵守纪律的好人

好事，对于违法乱纪而又屡教不改的必须严肃处理，做到赏罚严明。要加强管理教育，健全责任制，发动群众，严防各种事故的发生。

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建立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努力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我军经验，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有益的经验，着眼敌我双方的特点和发展，探讨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尽快编写出我军的战役学和各种条令、条例。同时，要着手编写我军战史和战略学。

第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

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改善武器装备，是准备打仗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建国以来，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有较大发展，部队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和加强。但是，目前，我军主要装备的性能比苏美落后许多年。现有装备的质量差，不配套、维修能力和零备件不足，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

毛主席说：“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0]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国防科学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一散、二乱、三落后的局面，实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把科研和军工生产很快搞上去，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对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体制要抓紧整顿，搞好科研机构和工厂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严重的要改组。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科研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要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壮大科技队伍，发动群众，缩短科研周期。重要的国防工厂继续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领导为主；但下管是中央部领导为主或下放以地方领导为主的国防工厂，都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岗位责任制，恢复军代表制度，确保军工产品质量。充分发挥一线科研和生产的潜力，加速大小三线建设。

我们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来优先发展重点武器装备。

部队必须立足于现有武器装备打仗，加强现有装备的管理。国防科研、国防工业部门要协同部队整顿好现有装备。要研制出一批新型武器装备，把我军装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七，继续搞好精简整编，改革兵役制度。

兵贵精不贵多。要从全局出发，正确认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加强经济建设。平时必须严格控制军队定额。要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当前有一种要求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的倾向，这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的。编制就是法规。要加强编制管理，各级党委一定要严格把关，严格执行。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精简整编的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推迟了这项工作的进程。要继续抓紧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的工作。

根据装备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部队的定额和编制拟在一九七五年方案的基础上作适当调整。已经颁发的编制和确定的体制，要稳定一个时期，一般不作修改。

现行义务兵的服役年限过短，不利于培养、保留技术骨干和基层干部。为了适应建军和作战的需要，兵役制度要作部分改革。从一九七八年起，实

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义务兵改为普通兵服役三年，技术兵分别服役四年和五年。保留超期服役制度。技术和专业人员中可将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义务兵改为志愿兵。

第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

后勤战备是全军战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各级党委要重视后勤建设。

要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加速后勤战备建设。调整后方布局，要有重点地搞好后方基地建设。逐步增加物资储备。加速建设修理工厂，提高武器装备的修理能力。做好卫生战备、后勤科研和战时后勤支前的规划。

军队要关心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充分发挥现有财力物力的最大效能。要整顿后勤业务，加强财务和物资管理，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按照《五七指示》[11]精神，整顿和搞好“军工”、“军农”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减少生产兵力。除组织好家属生产外，军以下不搞“军工”工厂。抓好连队业余生产，保证干部战士身强力壮。

第九，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

广大民兵是我军战胜敌人的有力助手和强大后备力量。加强民兵建设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的方针，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统一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坚持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双重领导，保证三结合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部，主要任务是做好民兵工作。各级民兵指挥部应予撤销。

民兵建设要切实搞好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要重点抓好武装基干民兵，随着武器装备的增加，逐年扩大武装基干民兵队伍。要加强民兵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管好武器装备。搞好边海防地区、战略要地、重点城市、预定反空降地域的民兵工作，加强军民联防，落实战备措施。各部队都要积极做好民兵工作。

为加强民兵建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应于明年召开一次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第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了无产阶级本色，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并作了深刻的阐述。所有这些，条条都很重要，符合军队情况，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涉及各个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重要的一环，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相结合。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要坚持下连当兵、代职、蹲点等制度，掌握第一手材料，抓好典型，进行具体指导，搞好传帮带；特别要帮助基层干部学会管理部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下去，要亲自写出有事实有分析的调查报告。要克服“五多”[12]，改进文风。各级领导应努力做到：连对战士了如指掌；团营对排、班了如指掌；军师对连队了如指掌；大军区、军兵种对师团了如指掌。这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文牍主义以及说假话、搞浮夸、讲空话等不良作风就能大大减少，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就能得到发扬。

同志们，现在全党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对军队来说，继往开来，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把毛主席培养的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下来，把我军建设成能够经得起现代战争和任何政治风浪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

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了我们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决不能让它受到任何削弱和损害，只能把它建设得更好、更强大。这是我们大家的决心，也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愿望。

我们这支军队，确确实实是一支好军队。五十年来，我们这支军队在艰难中诞生、在战斗里成长，战场上的严峻考验证明它过得硬，党内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证明它挺得住。王明[13]要葬送它，张国焘[14]要分裂它，林彪、“四人帮”要搞乱它、篡夺它、毁掉它，哪一个也没有能够得逞。古语说：疾风知劲草。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是深深扎了根的。军心向党向人民。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关键时刻，我军广大指战员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稳定全国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同志们，过去我们遭受王明的祸害，三十万红军搞得只剩下不到三万人。有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很快又发展壮大起来，并取得全国的胜利。今天，“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创伤虽然很重，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很快把军队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注 释

[1]“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无、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2]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民革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3]十大军事原则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其内容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

[4]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大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小三线指各省、市、自治区的战略后方。

[5]五项条件指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6]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简称为“三要三不要”。

[7]古田会议决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8]这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转发一九七六年战备训练指示》中转引的毛泽东的话。

[9]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10]见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11]《五七指示》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12]“五多”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解决“五多”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13]王明即陈绍禹，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

[14]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他投

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革命。

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今年三月十五日，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

毛主席领导我国革命战争和我军建设，历来深切关怀、十分重视军事科学的研究。在戎马倥偬、战斗频繁的年代里，毛主席就以巨大的精力，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并经常唤起全党注意军事问题的研究，指出：“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1]建国以后，毛主席在提出“钻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之后，又号召我们，要以我为主，总结我军经验，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它的骨干，军事科学来自军事实践，又反过来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恩格斯说过，“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2]。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改善武器装备，是很重要的；研究军事科学、军事理论，也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如果只掌握现代的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地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都要铭记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作为准备打仗，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见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正是我们的毛主席。

毛主席领导我国军民打了几十年的仗，进行了数百次大的战役和数万次大的战斗，用劣势装备打败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内外敌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奇迹。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得心应手地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指导战争，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完整体系。

毛主席创建的我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在当代是最先进的，是一切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无法比拟的。现在在世界上张牙舞爪的超级大国，尽管手里有那么几件新式武器，军事技术上暂时还跑在前面，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军事理论是落后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唯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军事科学体系，才是革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要十分珍视，认真学习、研究和应用，不要手里拿着宝贝不知宝。我们克敌制胜，过去依靠它，现在依靠它，将来还是要依靠它。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违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停止了，它就没有生命了。政治上是这样，军事上也是这样。战争的情况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也有所不同。我们

这是叶剑英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二十周年而写的文章。

的同志研究军事科学，一定要着眼于现代战争的特点，着眼于发展。毛主席就曾经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3]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是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决遵循的。

我们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以它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

毛主席的军事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瑰宝，我们应当着重地学习和研究。毛主席对我军建军作战的大量指示、命令和文电，同样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我们应当尽快地加以整理，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要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统一我们建军和作战的思想。我们还要抓紧研究和编写我军的战争史，把我们丰富的建军经验、作战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总结。对我军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采取妄自菲薄的态度是不对的。武装斗争是我们党史的重要内容。编写好战争史，对于编写党史也是非常必要的，不可缺少的。要通过编写战争史，把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给军事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要尽快地研究撰写出充分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地理学和其他军事学术著作，不断完善各种条令条例，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修改和补充。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4]的指示，特别注意研究人民防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在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下来，使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更加绚丽多采。毛主席在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几十年的斗争中，一向重视并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最好的榜样。

古人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今的世界很不安宁。所以，我们军队要整顿，要抓紧时间，把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搞好。过去二十年，我们的军事科学研究是有成绩的，我们军事科学院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林彪[5]和“四人帮”[6]的捣乱破坏，耽误了我们许多时间。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广大指战员相结合，全军动手，建立和健全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又红又专的军事科学研究队伍，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制订军事科学研究的规划，促进军事科学研究的迅速发展。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奋发努力，积极开展对军事科学的研究，攀登军事科学高峰！

注 释

[1]见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见恩格斯《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65 页）。

[3]这是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的一段话。（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5 页）。

[4]这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全文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8 页）。

[5]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6]“四人帮”即江青、长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同志们：

我热烈祝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关怀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建设。虽然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但一直关心着这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军委就提出要召开这样一个会，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1]的破坏捣乱，没有开成。现在开成了，开得好，全军同志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高兴。

这次会议着重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大课题。这就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同志们要我讲话，讲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问题。

毛主席从缔造我军之日起，就把革命的政治工作做为我军的生命线来看待。我们军队是党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生命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唯一宗旨，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抵制资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不能坚持我军的宗旨，就要脱离人民。团结是我军的力量所在，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坚强团结，保证组织上的纯洁和巩固，军队就会涣散、瓦解。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政治工作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要打仗的，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使部队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英勇战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有这些，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的源泉。

我说了这些，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否则，我军就有脱离党的领导危险，就有改变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就有失去战斗力的危险，就有被野心家篡夺领导权的危险。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关系着我军的强弱、胜败、生存和发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想，它的深刻含义就在这里。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审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回顾一下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对为什么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就会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我们许多老同志曾亲眼看见过毛主席在秋收起义[2]和我军初创时期，怎样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我军的政治工作。许多老同志都直接聆听过毛主席关于不能忽视政治工作的语重心长的教导，聆听过如何做好政治工作的深入浅出、生动具体的指示。许多老同志也亲自看到由于政治工作的威力，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威武不屈，勇往直前，胜利不骄傲，困难不动摇。我想，在座的同志，全军的老同志，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政治工作确实是我军的生命线。

这是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

三湾改编[3]，是毛主席创立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端。当时，毛主席主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亲自担任书记。这样，红军便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再一个是破除旧军队的习气和带兵方法，确立了我军的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的关系。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对于我军至为重要。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使红军士兵懂得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时，实际上已经形成。毛主席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用于军队建设，这是个伟大的创造。我军官兵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生活上艰苦与共，俘虏兵一到红军，就感到红军与白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部队打下茶陵以后，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二大纪律八项注意[4]，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它是无产阶级军队本质的体现，也是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在纪律上的体现。红军的官兵关系很亲密，就像长兄幼弟，军民也很团结，就像鱼水相依。干部的模范作用很好，就连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大家一起挑粮背米。那时生活很艰苦，战斗很频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是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的光辉著作中，谈到北伐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过，当时由于陈独秀[5]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就是在叶挺[6]同志的部队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尽管这样，由于叶挺同志指挥的独立团，有共产党员，有党的组织，有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成为威震敌胆的铁军。为什么叶挺同志的部队能够屡建战功，特别是汀泗桥关键性一仗[7]，以少胜多，扭转战局，打败军阀吴佩孚的部队，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也证明，军队中有无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情况大不一样。

古田会议，对我军建设，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8]，是我军建军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强调要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指出，不提高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建立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毛主席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把军事和政治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就是批判脱离党的领导，轻视和不要政治工作的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我们军队就会走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道路。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9]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我们党又粉碎了张国焘[10]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使长征得以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胜利前进。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也是史无前例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政治工作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红军斩关夺隘，枪险飞渡，爬雪山，过草地，虽然风餐露宿，野菜充饥，但是官兵上下那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是十分动人的，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几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党的正确路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顽强战斗力，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战争的开始，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党和国民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这个重要关头，王明推行有倾投降主义路线，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把政治部改成国民党那样的政训处。有个别人受国民党酒色逸乐的引诱，以做国民党的官为荣耀，不愿意再过艰苦的生活，新军阀主义开始抬头。毛主席坚决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批判了新军阀主义倾向，及时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原则。当时，毛主席亲自大力抓军队政治工作，一九三七年十月还亲自兼代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指示重印古田会议决议，发到连长，每人一本，要求大家当作课材，加以熟读。一九四四年，毛主席主持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在毛主席领导下，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使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的战争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到了解放战争，我军政治工作又有了重大发展。一九四七年，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了辽东三纵队诉苦经验的报告，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指示全军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用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1]。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革命团结、纪律性和战斗力，加速了把俘虏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这对以后实行战略决战，推翻蒋家王朝，取得全国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毛主席亲自起草命令和指示，谆谆教导志愿军同志要尊重朝鲜的人民、军队、政府和党，尊重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同朝鲜同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毛主席指出，这是完成抗美援朝军事任务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志愿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最可爱的人，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国侵略者。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不仅对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而且对全国各条战线都有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是坚持加强政治工作，还是取消削弱政治工作，历来是党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先是“左”，搞教条主义，后是右，搞取消主义，张国焘搞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们都反对毛主席创立的我军政治工作，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林彪[12]、“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破坏之严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王明、张国焘到林彪、“四人帮”，他们用种种手法，毁坏我军政治工作这个生命线，都是要改变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

林彪一上台就全面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党的革命学风，反对完整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搞所谓政治冲击一切，表面上把政治工作捧到天上，实际上是把我军的政治工作摔到地下。“四人帮”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们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

法西斯专制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成为他们篡党篡国的工具。

林彪、“四人帮”一脉相承，不仅从理论、思想、作风上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破坏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处心积虑地从组织上摧垮、搞乱我军政治机关。先是林彪“砸烂总政阎王殿”，后来“四人帮”又继续整总政，打“闷棍”。他们给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并把下面一些政治机关诬蔑为“阎王分殿”，“阎王殿的缩影”，等等。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个阴谋。这绝不单单是一个破坏总政的问题，而是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成绩，使全军政治工作失去统一领导，从而达到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罗荣桓[13]同志在世时，就同林彪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军政治工作是有卓著成绩的，是继承和发扬了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是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是团结全军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我们绝大多数政治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对总政治部和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予以推倒。对他们在政治工作领域里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只要彻底肃清了他们的流毒，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军的政治工作必定会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我军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各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古田会议以来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认真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政治工作过去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为保卫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要准备打仗。那种当“和平兵”、“和平官”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都会损害我军的战斗意志。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我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随时准备为保卫祖国而战。现代战争比过去更残酷更激烈，这就需要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更精更强的技术战术、军事本领和指挥艺术，更坚强的团结，更严格的纪律，更高度的集中统一。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政治工作。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要靠毛主席教给我们的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来取胜。要充分发挥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威力，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都要由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组织去发动。在这里，我读一下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写的（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他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主席的这段话，精辟地透彻地指明了政治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我们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仍然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们，我还想讲一下，如何把革命接班人培养出来，把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传下去的问题。这是我们政治工作要抓的大事情。我们的老同志要有“踏遍青山人未老”[14]的革命情操，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把革命的接班人选拔培养出来。大家都要当伯乐，慧眼识人，知人善任。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老同志热心的传帮带，有全军院校的努力，有年轻同志的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我相信，优秀的接班人一定会大批地成长起来。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说得好：“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15]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全军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要做，政治委员要做，军事指挥员要做，后勤干部、技术干部要做，干部要做，战士也要做。当然，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更是责无旁贷。总之，要形成一个大家动手来做政治工作的大好局面，这样，政治工作才能发挥出无穷的力量。全军同志都要维护政治工作的威信，而政治工作威信的提高，主要是靠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各级政治干部的模范作用。我们政治干部要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岗位光荣。

导师创业垂千古。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其中就包括了创建我军政治工作这个伟大业绩，它也是千古不朽的。毛主席关于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的。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指示，全面系统地把它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运用和发展。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伟大革命实践，学习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做好我军政治工作，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最后，我热切地期望同志们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在新的长征中建立新功！

注 释

[1]“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2]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醴陵、平江、浏阳等县举行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农村革命根据地。

[3]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顿和改编。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立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确定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

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5]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巨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6]叶挺，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等职，所部多为共产党员。

[7]一九二六年八月，国民革命军迅速从湖南向湖北挺进，直系军阀吴佩孚调集主力一万余人扼守武汉南面军事要隘汀泗桥，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八月二十六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向汀泗桥发起进攻，遭到敌人顽抗。二十七日，共产党人叶挺率第四军独立团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攻，击溃吴佩孚主力占领了汀泗桥。这次战役对北伐军直取武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8]古田会议决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9]王明即陈绍禹，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驻共产国际代表、长江局书记等职。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

[10]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八年，他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革命。

[11]新式整军运动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军运动。主要内容是：全军指战员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12]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13]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主任，领导军队的政治工作。

[14]见毛泽东《清平乐·会昌》（《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

[15] 见朱德《攻克石门》（《朱德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做好人民防空工作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

要搞好人民防空工作，首先要解决领导思想、领导认识问题，也就是解决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对人防工作怎样看法、把它摆在什么位置的问题，是对大搞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时候还要不要搞人防战备建设的认识问题。

在人防问题上，林彪[1]、“四人帮”[2]把人们的思想也搞得很乱。林彪一伙不是说搞人防是“劳民伤财”、“干傻事”吗？张春桥[3]不是说人防工事“临时挖也来得及”、挖了的要“下决心填掉”吗？这些东西都要批判。人防工作中领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有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也有我们自身的问题。是自身的问题，就要正视它、解决它，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是流毒影响。

对人防工作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虽然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决不能麻痹。我们观察世界风云，可以看到，在革命因素增长的同时，战争的因素确实在增长。

现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都在搞民防、挖洞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战略动向。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战争危险确实存在，人防战备一定要搞好。我们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根据我们历来的经验，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新的长征，集中力量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应当看到，经济建设和人防战备建设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人防战备搞得越好，经济建设的安全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战争史上，有备无患、无备受挫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侵略者总是欺软怕硬，先拣弱的打。你准备不好，它就乘虚而入，准备好了，它就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把四个现代化搞好了，把战备、人防搞好了，苏修[4]要打就得考虑考虑。我们准备了，敌人不来怎么办？不来更好嘛！我们就是希望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间来搞建设。如果我们不抓紧争取到的时间认真做好准备，一旦打起来，仓促应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那就将成为革命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我们党领导的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想问题、办事情要有战略头脑，要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备战这个事，人防这个事，大得很、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个事情办不好，我们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有人也许以为这是杞人忧天，我看这是忧国忧民，是尽我们的历史责任。哪有共产党的干部不忧国忧民的道理呢？在抓战备、搞人防的问题上，毛主席、周总理都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切实把人防战备搞好，是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和宿愿，也是华主席[5]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和重托。我们就是要战备搞好，把人防搞好，做好一切准备。

人民防空是现代战争条件下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战略措施，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钻洞子是个好办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几十年流血战争

这是叶剑英在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当时叶剑英兼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

的经验总结。我们要重视挖洞子，要把人防工作，特别是工程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归根到底，还是看实践，看落实。我们搞人防战备，应该说了算，定了干。广大群众总结了三句话，我认为是对的，就是“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力量在群众”。这次会议规定的人防工程建设任务，要按照“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方针很好地去完成，不能马马虎虎，粗制滥造。要解决好工事的安全、通风等问题；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从实战需要出发，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要认真研究、正确处理人防战备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人防战备工作和生产的关系，人防和城防的关系，重点工程和一般工程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很重要，否则人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很难得到贯彻。

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切实加强对人防工作的领导，把它摆到党委议事日程上来，第一书记要亲自过问、亲自抓，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群众拥护的、需要的是革命的实干家，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实干家多了，空谈家少了，我们的人防战备工作才能真正作出成果，才可能经受住现代战争的考验。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万里长城这样的世界奇迹，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我相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不了很久，一定能够建造起一座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的地下长城。

注 释

[1]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2]“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

[3]张春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4]苏修，当时指苏联。

[5]华主席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月任中共中央主席，一九八一年六月辞职。

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工作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同志们，我们军队建军五十二年了，建国三十年了。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开始建军，我们的军队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十年国内战争，打败蒋介石，取得长征胜利。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打垮了蒋介石统治集团。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侵略者。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又教训了越南。这是我们军队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四个现代化有个特点，就是要进入国际舞台，先进技术要引进来，许多外国人要进来，许多中国人要出去，要同外国人打交道。因此，要加强“四个坚持”[2]的教育。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华主席[3]代表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我们军队里头，有没有“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问题呢？同志们要向这方面想一想。粟裕[4]同志打报告要我们和大家见面，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示要我讲几句话，我讲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有五十二年历史的军队要前进，我们的军队工作同经济工作一样，在今后三年中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来消除林彪[5]、“四人帮”[6]的流毒和影响。比如说，调整。调整领导班子，有没有这个需要？“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领导班子动乱，他们打击老干部，老一辈战斗几十年的差不多都挨斗了；他们用“双突”的办法、超级提升的办法，将一些年轻的干部提起来，把一批青年搞坏了；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不要党，规章制度荡然无存了。现在来看一看，我们军队的干部从军委到各个军区，一直到军，年纪都不小了，特别是军委、军区这一级。大会中间有人提议老同志要让位，讲的道理很对，新陈代谢嘛！所以说，在位的老同志还有一个历史任务未完成，就是要“传帮带”，这要作为一个事业来看，还未完成，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为了使我们的各级领导班子真正坚强起来，在老中青、传帮带的问题上就要有个安排。我们这些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有的失去工作能力了，应该自觉地、主动地转到第二线，把实际工作让人家担任，自己总结经验，写点东西，把自己一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贡献出来。这不是小事，要使我们的后一代接受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把它传下去。这个问题，思想上怎么认识、组织上怎样安排，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应当重视。老同志要让位，又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问题，老同志自己要想通，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失去工作能力老同志要退出来。这个事情要把它安排好。要调整领导班子，调整人事，强化我们的组织，强化我们的领导，所以老同志要考虑，需要调整一下。作为革命干部当然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个人，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行，精力不行，下去调查研究不行，情况不了解，对工作有妨碍，对建军有损失。小平同志说，我们老家伙还有些用处，用处就是要传帮带，要作好交代。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是国家的支柱、政权的支柱。要永远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就要有组织上的保证。这是调整问题。

改革。要提出改革意见，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改革。整顿。整顿我们的思想作风。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慢慢滋长起一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有损于军队优良传统作风的东西，这些要整顿。在调整、改革、整顿的基础上，提

高我们军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现代化程度。

怎样进行教育训练？过去军队强调合同战术，现在有空中、太空、海上、海底的纵的联合、纵的协同，还有地面的协同，要合得成、联得上。小平同志讲，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的位置上，当做战略任务去完成，这完全对。第一，要求战士们，人同技术结合起来；第二，部队与部队之间、各军兵种之间要协同起来，合得成、联得上才能打得胜。现在我们部队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还击作战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新兵、新将能打仗，中印边界反击战[7]证明了，这次作战也证明了。勇气不成问题，要加上技术，把人和技术结合起来。组织战斗时，分队之间要联得上。教育训练很重要。新技术不断装备我们，要使之能够发挥力量。部队首尾的配合、结合就像手和臂那样，手连臂、臂连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人和技术之间、分队与分队之间，也要像手和臂的关系一样协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没有严格的训练不行。

这里有个时间问题。一切事物都在时间、空间中运动，时间、空间控制着我们，我们有多少时间作多少事情，进一步还要要求我们用一年时间作两年的事情，一年完成两年的任务，要加倍努力。目前，在新技术方面与人家相比，我们落后太远了。许多外国政论家都预测，一九八五年世界可能有动乱。现在生产力提高，帝国主义抢市场、抢原料。世界能源一年比一年紧张，逼得他们特别要去抢能源。现在都在抢能源，抢战略资源，抢交通运输要道。所以是否能完全按照我们要求的时间完成现代化建设，还是个问题。我们搞现代化，时间逼着我们要抢先，要抢时间。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经济建设如此，军队建设也如此。军队要在三年时间内调整好、改革好、整顿好，提高战斗力，对这项事业，军队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责无旁贷。所以，我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正在这个地方。传帮带搞好了，老干部的历史任务就完成或基本完成了。

我们要抢时间，要快，但又要有步骤。经济建设比例失调，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前进。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乱了步调，就要调整，叫踏步走，步子走错了的改正过来，走齐了，再前进。步调调整了才能前进。军事干部队伍、政治干部队伍、各级领导班子要调整，规章制度要改革，思想作风要整顿，战斗力要提高。需要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在这几年内把军队搞好。三十年没打仗，这次打得不错，再加上整顿、改革、提高，我们就比较有把握了，就能对付未来战争。

注 释

[1]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2]“四个坚持”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3]华主席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月任中共中央主席，一九八一年六月辞职。

[4]粟裕，当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

[5]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

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6]“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7]中印边界反击作战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

军事思想应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将有很大变化，同我们过去打国民党、打日本大不一样了，同抗美援朝打美帝时也大不一样了。将来打起仗来，敌人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前方和后方差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要设想准备打全面战争、打核战争。局部战争也可能转为核战争。就是打常规战争，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地面作战，主要是对付敌人的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敌人的空降、机降。埃及打以色列的中东战争，除了对空作战以外，主要是打坦克，坦克反坦克。地面还要对付敌空降、机降。这同我们过去打仗是不一样的。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也不同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增加了，这同过去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部队越现代化，越依靠后勤，后勤组织也扩大了。敌我双方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军事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它对付希特勒[1]还是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结果很快就沦亡了。苏联在战争初期，也是由于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作战指导上有错误，造成很大被动。战争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说明，不少军事家往往用上一次的战争经验去指导下一次的战争实践，结果带来很大损失。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过去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间，大部分时间用小米加步枪。为什么我们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呢？除了战争的革命性、正义性和人民的赞助这个根本条件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先进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理今后仍然是适用的。但是，由于受到一定历史条件 and 实践范围的限制，过去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对今后的战争不可能完全适用，它必须依照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即便是一些基本原理，也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具体运用。未来战争，就敌强我弱这一点来说，同过去是一样的；但是，具体内容、具体情况就不大相同了。不论打阵地战、运动战，还是打游击战，都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新的条件下，如何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是摆在全军面前的一个中心课题，希望同志们在实践中继续深入研究，使我们的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不断地向前发展。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战争必须充分准备。我们打的是总体战，要总动员，打人民战争。怎么动员法呢？首先是思想动员。群众动员起来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容易解决。例如兵员，游击队、地方军都可以作为补充。思想动员起来，要组织地方军，组织游击队，都比较好解决。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军队、对人民要进行广泛的教育，普遍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使全体军民充分相信我们是正义战争，能取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勇敢地坚持打下去就可以取得这个战争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年？第一次四年，第二次六年。将来打起来，坚持打三年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就会把敌人拖垮，它作战消耗大，人力、物力都不够。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的依据。但是在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敌人技术装备比我们强，要战胜这个敌人，必须认真地对部队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做到各

个兵种捏得拢、摆得开、合得成，战役、战术协同好，运用自如。解决好这些问题，都是要思想领先的。

动员工作，平时就要做好。各省军区要负责组织地方部队，组织游击队，在驻地周围选择比较好的地方组织战斗村，如果敌人打到那个地方，就可以领导民兵同敌人作战。要登记适合的人身体好的，作为预备役、后备役，战争一来，马上就可以组织军队，野战军马上就可以补充。所以抓一抓省军区工作也很重要。我从前对动员部的工作没管没抓。准备战争，动员部的任务很重。转入战时体制以后，一切都要服从战争，要进行紧急动员。这就要求我们工、农业转到战时体制，保证军队的衣、食、住、行、打。这由国务院负责。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战略方针问题。我在七七年的讲话中提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次讨论，大家都主张改为“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包括了持久作战和诱敌深入的含义，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注 释

[1]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三三年任德国总理，次年自任国家元首。一九三九年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重视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我完全同意邓副主席[1]的指示、韦国清[2]同志的讲话。根据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我们的军队的实际情况，我觉得小平同志的指示，国清同志的报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会议是开得适时的，我完全赞成。

我们军队精简整编的工作，在两三年内，要当作一件重大的任务来抓。精简整编，年轻干部要进来，老同志要退出来，这一进一出，如果我们思想工作跟不上，做得不好，就会引起思想混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要给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讲清楚。作为一个老干部也要衡量一下自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对于所担负的工作是不是还能吃得消？希望老同志都能好好考虑一下。考虑以后，如果自己能够提出退到第二线或退出来的意见，经党委讨论通过，上级批准，就好办了。各级党组织，对于老干部退出来以后的安排，应当认真细致地做好，同时也要做好年轻干部的接替工作。

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一年这个期间，世界形势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现在世界上许多经济评论家、政治评论家都在议论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说，这个期间，世界上经济状况将是很混乱的，世界上的政治形势也将是很动乱的，所以，我们要抓紧这几年的时间，努力作好准备。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动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要安定，都要团结；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技术，都要不断地提高，才能够应付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更加动荡的新形势。

我们军队这几年的工作，一定要朝着政治上更加团结，武器装备上不断地改善，技术上进一步提高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充分地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毛主席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军队要随时准备打仗。

选拔干部要经过院校培养训练。林彪[3]就是反对我们从学校里培养训练干部。所以，他就大砍院校。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军官也都是经过院校培养出来的。

干部队伍建设，一定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重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是一年比一年地提高。现在的战士一般都是初中生、高中生，我们的干部也应当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如果自己没有这个水平，就应当很好地学习，努力把自己的文化提高到高中以上的水平，不然我们干部的文化水平就不如战士。我们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在不断发展，如果没有数、理、化知识，掌握和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就有困难，甚至不会使用。所以说，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世界上可能发生各种突然事变，要扎扎实实搞好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许多老同志打了几十年仗，但只凭我们过去的经验很难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每个同志都要在这方面认真衡量一下自己，努力学习现代战争的知识，提高自己的组织指挥能力。

我们老干部的现在，就是年轻干部的将来。现在老同志退休了，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现在年轻的同志也要退出来。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所以说，老干部的现在，就是年轻干部的将来。安排好现在的老同志，不但能使这些老同志很好地安度晚年，而且也为年轻干部解除了后顾之忧，使他

们能全心全意地努力做好工作。

注 释

[1]邓副主席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2]韦国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3]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策动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长征的艰险历程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日)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前三次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打赢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以后，开始研究我们的作战方法。从第三次“围剿”开始，每一次都采用了与前次不同的方式。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用堡垒战法，层层筑堡垒，节节推进，步步为营。

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最后决定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是没有办法了，才采取的行动。

毛主席讲过，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不应该这样打，也不需要打那么长时间。应该深入到敌人心脏里去，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主席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长征开始时，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司令是我，第二纵队的司令是罗迈。

我们行军很艰苦，突破几道封锁线后，部队减员很大。我在一路上都看到有许多战友牺牲，心情十分沉重。有一天，爬到一座高山上，休息的时候，我想起毛主席、朱老总苦心创造的中央根据地丢给了敌人，苏区群众在受苦受难，我们转移的队伍前路漫漫，便哼了几句诗：越过千山与万水，问君西游何时还？……

我们进入广西境界以后，在一座山上，敌人的飞机发现了我们，飞过来扔炸弹。有一颗炸弹正巧在我不远的地方爆炸，把我震倒了。等我爬起来，才发现右大腿上部被一块弹片击中，流出的血把裤子染红了。手上拎的大衣也炸了几十个小洞。警卫员范希贤马上跑过来扶起我。总卫生部的贺诚闻讯赶来，给我包扎止血，扶上担架。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留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来。后来我就坐担架行军。

到了遵义以后，遵义会议我没有参加。当时，我的伤还没有全好，我在军委管作战。

过雪山的时候，我是拄着拐棍走的。山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行走十分困难。我向部队提出要求：一不能走快，二不能说话，三不能坐下来休息，四要发扬阶级友爱，搞好团结互助。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来想歇一会儿，就再也起不来了，好多战士就这样牺牲了。虽然雪山气候非常恶劣，但我们终于战胜了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1]提出，让叶剑英同志来当参谋长。毛主席和周恩来商量同意，我就去了。早在北伐的时候，我和张国焘就认识了。

那时候，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他闹分裂。从理论上讲，徐向前、陈昌浩[2]的认识都一样：北上抗日才有出路。但是，讨论该不该采取北上行动时，徐向前、陈昌浩两个争辩，徐向前赞成北上。

过草地的时候就更加艰苦了。当时，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我们在右路，张国焘在左路。从毛儿盖出发时，陈昌浩强调困难大，草地走不过去，我说我愿当开路先锋。毛主席支持我。我和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了一位向导叫老李，向他调查行军路线，问他过草地怎样走，需要多少时间，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和我几个同志开会研究后，决定让陈昌浩给我带两个团。那时，一军团已经走了，我带两个团为中央、军委机关和右路军开路。草地天气变化无常，

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雨，把人淋得浑身透湿。到处是沼泽，走路要踩着草萑，要不陷进泥沼里，就出不来了。我当时带着病，踏着一窝一窝草前进。到了后几天，干粮吃光了，饿着肚子走，一点力气也没有，许多人在草地倒下了。走了近十天，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住在牛屎房子里。这是过草地以来第一次住上房子，大家都很高兴，好像到了“天堂”一样。

在班佑，我们派少数部队去“打粮”，与好几千敌人骑兵遭遇，打退了他们，还缴获了许多头牛羊，我和程世才商量送一些给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于。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3]。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4]和秦邦宪[5]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定，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先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罗迈、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6]，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在路上碰到彭德怀、秦邦宪，还有张闻天。过了一会儿，秦邦宪拉了我一把，他说：“老叶，你要先走啊！这里你不能呆。”我说：“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走吗？”秦说：“你和我不一样，人家会干你的。”我说：“好，我走。”

走到天亮，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毛主席看到我很高兴。

到了俄界。秦邦宪看到我，说：“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你走了大约十多二十分钟的时候，追上来四个持驳壳枪的

人，到处找叶剑英。我问：‘找他干什么？’他们说：‘把他打死后再说。’”我说：“谢谢你提醒了我。”在俄界，中央开了会，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毛主席当政治委员，我当参谋长。然后，我们又继续北上了。

注 释

[1]张国焘，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

[2]徐向前，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3]彭德怀，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

[4]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5]秦邦宪即博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杨尚昆，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克农，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萧向荣，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我军的后勤工作,从红军时期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都曾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后勤工作的光荣。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因为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它的特点是突然性增大,战争的规模大,物资消耗多,人员伤亡大,前方与后方差别小。这就对后勤基地建设,战略物资储备和医疗救护、装备维修、交通运输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规定了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当今世界,交战双方对后勤保障都十分重视。如第四次中东战争[2],以色列遭到埃及、叙利亚军队的突然袭击而未受到重大损失,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于战前在西奈半岛搞了三道防线,并根据每道防线的不同任务,储备了必要的物资,因此能够在三天之内保障武装近三十万人投入战斗。再如英国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3],英军的后勤保障也是相当成功的。英军联合参谋部在三天内组成特混舰队,这个舰队航行一万三千多公里,历时十九天,平均每昼夜七百公里,经受远洋航行的考验并立即投入了战斗。如果没有良好的后勤保障,英军取胜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不论从现代战争的特点看,还是从客观实际看,后勤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战争的胜败。

我军的后勤工作必须加强,要能做到在战争初期、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保卫后方基地的安全,保障各战区战略防御作战和应急扩编、动员扩编部队的需要,保障战略,战役预备队按统帅部的意图和决心适时地投入作战,保障及时组建、训练和输送新的兵团支援前线等等。后勤业务是一门科学,要号召后勤各级干部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以适应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对于后勤系统的干部配备,我想应当与司令部、政治部系统的干部一样对待。

最后,我于一九八一年讲过争取五年改变后勤面貌的问题,现已过去两年多了,要抓紧今后两年多的时间。明年的工作,你们做了具体安排,我没有意见,望你们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鼓舞下,不失时机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注 释

[1]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

[2]第四次中东战争,亦称十月战争。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叙利亚为收复失地和摆脱美、苏造成的“不战不和”局面,向以色列突然开战。伊拉克、约旦、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科威特、突尼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参加了对以战斗。埃、叙两线夹击,首战告捷。以军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于十一日转入进攻,并逐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二十四日,双方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战。埃、叙同以分别于次年一月和五月签署第一阶段脱离军事接触协议。

[3]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指一九八二年四月至六月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领土主权进行的战争。

